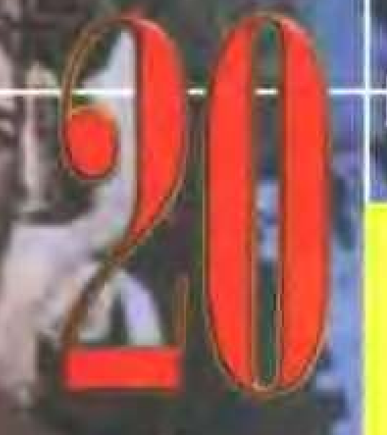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愚人船

〔美〕凯瑟琳·安·波特著
鹿　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愚人船

〔美〕凯瑟琳·安·波特著
鹿　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愚人船/(美)波特(Porter,K.A.)著;鹿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7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327-2446-8

Ⅰ.愚… Ⅱ.①波…②鹿… Ⅲ.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133 号

愚 人 船
〔美〕凯瑟琳·安·波特 著
鹿 金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 插页 5 字数 485,000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 5,200 册
ISBN 7-5327-2446-8/I·1430
定价:38.50 元

向

芭芭拉·韦斯科特致意

一九三二:巴黎、朗布伊埃、达沃斯镇、
萨尔茨堡、慕尼黑、纽约、穆尔霍卡怀、
罗斯芒特:一九六二

本书名译自德语 *Das Narrenschiff*，塞巴斯蒂安·布伦特[①]（1458？—1521）的一部道德寓言故事，该书最初以拉丁语于一四九四年出版，书名叫 *Sultifera Navis*。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在巴塞尔[②]阅读那部著作，当时我的首次欧洲航行的印象在我的脑子里仍然栩栩如生。当我开始构思我的长篇小说的时候，我采用了这艘从这个世界上正在驶向永恒的船，这个简单而几乎具有普遍性的形象，作为我自己的作品中的形象。这个形象一点也不新——在布伦特使用它的时候，它已经是很古老和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的，而且是极熟悉的；这完全适合我的意图。我是那艘船上的乘客。

凯·安·波

人 物 表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十七日，在劳埃德德国北方轮船公司"真理号"上的人员；该船从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启航，抵德国不来梅港。

德国人

船长蒂勒。

舒曼医生，船医。

事务长和六、七个年轻的高级船员。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她带着一个本子。

奥托·施米特太太，最近在墨西哥丧夫。

西格弗里德·里贝尔先生，一本妇女服装业刊物的发行人。

利齐·斯波肯基克小姐，经营妇女服装，来自汉诺威。

胡滕教授先生
胡滕教授太太 —— 前墨西哥一所德国学校校长和他的妻子；带着他们的白叭喇狗贝贝一起旅行。

卡尔·鲍姆格特纳先生
鲍姆格特纳太太
汉斯·鲍姆格特纳 —— 墨西哥城来的律师——无可救药的酒鬼；他的妻子格蕾塔，和他们的八岁的儿子。

卡尔·格洛肯先生，驼背，他出售了在墨西哥的小纸烟、书报摊，在返回德国。

维利巴尔德·格拉夫先生，行将去世的宗教狂，他相信他有

治愈疾病的力量。

约翰，他的外甥和护理员。

威廉·弗赖塔格先生，跟墨西哥一家石油公司“有关系”，在回德国去接他的妻子和岳母。

尤利乌斯·勒温塔尔先生，犹太人，天主教教堂用具制造商和推销商，在回杜塞尔多夫他家乡去探望他的表妹萨拉。

瑞士人

海因里希·吕茨先生
吕茨太太
埃尔莎·吕茨
——原墨西哥一家旅馆老板，十五年后带着他的妻子和他们十八岁的女儿回瑞士。

西班牙人

一个西班牙音乐喜剧小歌舞团，唱歌和跳舞的演员，他们自称是吉卜赛人，在墨西哥被困以后，在回西班牙。

女人：安帕罗、洛拉、孔查、帕斯托拉。

男人：佩佩、蒂托、马诺洛、潘乔。

孩子：里克和拉克，洛拉的双胞胎，一男一女，六岁。

女伯爵，一个失去社会地位的贵族，在古巴居住多年，政治流放犯，从古巴被押解到特纳里夫。

古巴人

六个去蒙彼利埃的古巴医科学生。

墨西哥人

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到西班牙去蜜月旅行的新郎和新娘。

埃斯佩龙－查伟斯·德·奥尔特加夫人，墨西哥驻法国公使馆专员夫人，带着她新生的儿子和印第安保姆尼古拉莎。

加尔萨神父
卡里洛神父 } 前往西班牙去的墨西哥天主教神父。

政治鼓动家，穿樱桃红衬衫、唱歌的胖子。

瑞典人

阿尔内·汉森，同里贝尔先生一直是对头。

美国人

威廉·丹尼，得克萨斯州人，一个在去柏林的年轻的化学工程师。

玛丽·特雷德韦尔，一个四十五岁的离婚女人，在回巴黎。

戴维·斯科特
珍妮·布朗 } 两个一起生活的年轻画家，第一次赴欧洲。

统舱乘客

八百七十六人：西班牙人，男人、女人、孩子，古巴甘蔗田工人，在食糖市场不景气以后，被遣送回加那利群岛和西班牙各地（他们来的地方）。

同房舱者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	威廉·弗赖塔格
施米特太太	阿尔内·汉森

特雷德韦尔太太
斯潇肯基克小姐

戴维·斯科特(戴维宝贝儿)
威廉·丹尼
卡尔·格洛肯

珍妮·布朗(珍妮天使)
埃尔莎·吕茨

维利巴尔德·格拉夫
约翰,他的外甥

加尔萨神父
卡里洛神父

鲍姆格特纳先生
鲍姆格特纳太太
汉斯·鲍姆格特纳

里贝尔先生
勒温塔尔先生

六个古巴学生占用两个相邻的
房舱

奥尔特加夫人
保姆和婴孩

音乐喜剧小歌舞团:
马诺洛和孔查

女伯爵(独住)

蒂托、洛拉和里、拉克
佩佩和安帕罗
潘乔和帕斯托拉

新郎和新娘

吕茨先生
吕茨太太

胡滕教授

胡滕太太

贝贝,叭喇狗

阴暗的寓言　精致的刻画

——《愚人船》译本序

在介绍凯瑟琳·安·波特的长篇小说《愚人船》以前，我认为有必要先扼要地介绍一下她的生平，因为“波特的小说不是带有自传性质，就是从她亲自的见闻中提炼出来的”。在她的相当一部分中、短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米兰达就是她自己。所以简略地谈一谈她的生活经历，有助于有心的读者了解和欣赏她的作品。

一八九〇年五月十五日，凯瑟琳·安·波特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迈阿密海滩附近的印第安河市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哈里森·布恩是美国著名拓荒者丹尼尔·布恩的曾侄孙。母亲玛丽·阿莉斯·波特同有世界声誉的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沾亲。但是，在她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了。用波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一场打败了的战争的孙女儿”。所谓“打败了的战争”，当然是指那场南北战争。波特在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由祖母抚养，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农场上度过她的童年，八岁到十二岁在一所私立学校上学，十二岁到十六岁在厄苏林修道院读书。她后来说，在那所修道院里，她受的是“零零碎碎、完全没有用的装饰性教育”。天主教修道院里刻板、繁琐的清规戒律不但束缚不了波特

的倔强的性格，反而激起了她强烈的反感。她抛弃宗教信仰，从修道院里出走，同人结婚，从此结束了她的正规的学习生活，也同她的家里人，尤其是同她父亲的关系产生了一道始终没有弥合的裂痕。但是，波特始终未能消除美国南方旧家和天主教修道院生活在她心头留下的痕迹；这些经历每每反映在她笔下的人物身上。她的婚姻生活持续了三年，同她的第一个丈夫分手，独立谋生，先后在芝加哥的一家报纸工作过，在得克萨斯州短期演唱过苏格兰民歌；后来，从事卖文生涯，主要写书评和政治性评论。一九一七年，进《评论家》周刊编辑部工作。一九一八年起，在丹佛的《落基山新闻》当记者和艺术评论员；一九一九年，因病辞职去纽约，重以卖文为生，有时候为了糊口，不得不代人捉刀。二十年代初期，她离开美国，到墨西哥去研究艺术，在那里曾经参预左翼政治活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玛丽亚·孔塞普西翁》在《世纪》上问世，这是一篇描绘一个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刚强的性格和火一般的感情的作品。一九三〇年，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开花的犹太树和其他的故事》出版，书名小说也是以墨西哥为背景的。该书使她获得了一九三一年美国古根海姆研究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她重游了墨西哥，并且在墨西哥启程去欧洲。长篇小说《愚人船》中的航行路线同她自己的这次航行的路线完全吻合。可见这次航行对《愚人船》的形成具有密切的关系和起了重大的作用。

自从一九三〇年《开花的犹太树和其他的故事》（这个集子在一九三五年有扩大版问世）出版以来，十四年中，波特又出版了两部小说集，《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三篇中篇小说》（一九三九年）和《斜塔和其他的故事》（一九四四年）。一九六五年，《凯瑟

琳·安·波特中短篇小说全集》出版，其中收上述三个集子中的二十三篇和四篇从未在集子中出现过的小说。美国的中短篇小说界灿烂如银汉，名家辈出，晶莹夺目，但是波特在其中却有她独特的光彩。自从一九二二年在《世纪》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玛丽亚·孔塞普西翁》以后，相隔五年，才在《新群众》上发表第二篇作品《“他”》，在她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她一共才写了二十七篇长短不等的小说，却享有盛誉，受到美国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和美国南方女小说家尤多拉·韦尔蒂这样艺术鉴赏力极高的人士的激赏。她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文体家，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艺术大师。关于她在中短篇小说中构造的逼真的现实世界和她所描绘的人物的活灵活现的内心世界，以及她运用得不落痕迹的艺术手法的特色，我在收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精雕细刻的艺术家凯·安·波特”一文中，已有简略的论述，在这里就不再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看那部小说集。集子中虽然收的不是她的全部中短篇小说，但是她的那些名篇大致都包括在内了。书名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就是波特自己最喜欢的作品，那是以她自己在丹佛的《落基山新闻》当记者的时候的一段平凡而悲伤的爱情经历为素材的。

《愚人船》是波特唯一的长篇小说。《斜塔》问世后，她有十八年没有出书。一九六二年，《愚人船》的出版打破了这个沉默，虽然在此以前，小说的片断陆陆续续地出现在杂志上。小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美国的评论家和作家们纷纷对它交口赞誉，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波特一向以她的精湛的、貌似质朴无华、内涵却十分丰富的艺术手法赢得行家叫好。小说还吸引了广大

普通的读者，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愚人船》的巨大的销数使波特走进了千家万户，从此不再是位“作家的作家”（即只为作家所倾慕，而不使广泛的文学爱好者所着迷的作家），也得到了丰厚的版税，摆脱了四十年来始终困扰她的经济拮据的情况。但是，也有一些评论家对本书持不同的看法。譬如说，西奥多·索洛塔罗夫在《评论》杂志上就批评它“臃肿，沉闷和阴郁”。雷·布·小韦斯特却巧妙地对这个抨击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他说这叫人想起了对《白鲸》有过的贬斥“……劣作，属于最差的乱糟糟的文风”。拿《愚人船》同梅尔维尔的《白鲸》相提并论，这对本书是极高的赞赏。随着时间的推移，评论家对《愚人船》的评价越来越高，因为弥漫在全书中的“阴郁”气氛被不少评论家认出是当时弥漫在西方社会中，至少是西方中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气氛。

波特最初给《愚人船》起的书名叫《应许之地》（典出《圣经·旧约》，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乐土迦南），这个书名当然是反语。三十年代初期，全世界都笼罩在经济大萧条的愁云惨雾中，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哪里有什么“应许之地”呢？那艘航行在大西洋上的“真理号”，也可译作“真相号”；实际上，这个船名含有两重意义，一是船名揭示船上的乘客都是受天命摆布这个“真理”；二是通过船上的头等舱乘客的活动反映出一幅世态画，尽管它只是人间的一角，却是众生“真相”的一个侧面。拿船上的头等舱乘客来说，他们也各有烦恼，难以沟通，心情冷漠，甚至互相怀有敌意，近乎存在主义者的“他人就是地狱”的心态。那个有限的空间里哪里有丝毫“应许之地”的迹象。后来，波特又把这书的名字改为《没有安全的海港》，这是指当时全世界海港码头工人的大罢工，同时暗示全世界没有一

片“应许之地”,但是书中的情节是绝大部分发生在“真理号”上的。这个书名并不能涵容全书的内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波特当然不会对此感到满意。她最后起的书名,据她自己在前言中说,是借自德国讽刺诗人塞巴斯蒂安·布伦特用拉丁文写作的道德寓言故事《愚人船》的,而她自己写的也是一个寓言,所以她说这个形象“完全符合我的意图”。她甚至承认,她自己也是“那艘船上的乘客”。

为什么波特这么激赏这个书名呢?我想,仅仅用基督教义来说明是不全面的,甚至会起误导的作用。不错,书中反映出波特的确有这样的思想:跟上帝的智慧(或者说天命、天意,反正是一个意思)相比,芸芸众生无非都是愚人,但是她的另一段话却更值得注意,“……至于我自己,而且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从我有意识和有记忆的年纪起,直到今天,这一生始终处在世界性灾难的威胁下,而我的绝大部分智力和精力一直用在努力领会这些威胁的意义,追溯它们的根源上,用在努力了解西方世界人的生活中这个巨大而可怕的缺陷的逻辑上”(见美国现代文库版的《开花的犹太树》序言)。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愚人船》同她的另一篇小说《斜塔》的性质相似,都是她运用她的绝大部分智力和精力努力领会那些世界性灾难的威胁和追溯它们的根源的产物。所不同的只是,《斜塔》的场景是在柏林,而《愚人船》的场景是在赴欧途中的“真理号”上,但是都处于“大萧条”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不仅是一部寓言,或者说一部具有一般意义的哲理作品,而且是同《斜塔》一样,是一部有强烈针对性的政治小说。全书曲折地反映了满天乌云、遍地骚乱的萧瑟景象,是预示纳粹德国即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首前奏曲。把握住波特的这个思想脉络,对《愚人船》当会有更深

人的理解。

《愚人船》中那艘德国船"真理号"是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从墨西哥的海港城市维拉克鲁斯启航，开往德国的不来梅港的，航程二十七天。说来凑巧，波特自己在一九三一年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提供的研究金乘船去欧洲的时候经过的航线完全相同。她凭着艺术家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以一艘远洋轮为背景，创作了这部写法别致的小说，构造了一个漂流在水面上的小小的社会，使读者欣赏到一幅现实主义的世态画，而在人物的刻画上用的是染上几分荒诞色彩的讥讽的笔调。

《愚人船》没有一个中心故事，也没有主人公。情节绝大部分发生在头等舱乘客中，但是头等舱和统舱的乘客并不处于密不通风的状态，而那八百七十六名统舱乘客是由于制糖业的萧条从古巴的种植园里被强迫遣送回他们的来处的西班牙工人和他们的妻女。他们的处境同头等舱的乘客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种不同舱房里的乘客发生的事情不可避免地互相产生影响。因此，书中的有些情节是有机地把头等舱和统舱结合在一起的。

"真理号"头等舱中有五十多个乘客，分别为德国人、瑞士人、西班牙人、古巴人、墨西哥人、瑞典人和美国人。其中德国乘客最多，占十四人：有随身带着一本笔记本的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新近在墨西哥丧夫的施米特太太(她丈夫的棺材就在轮船的底舱里)、发行一本女性服装商业杂志的里贝尔先生、开女性服装店的斯波肯基克小姐、前墨西哥一所德国学校校长胡滕教授先生和他的太太还带着一头叭喇狗贝贝、律师鲍姆格特纳先生和他的太太格蕾塔还有一个八岁的儿子汉斯、在墨西哥摆出售报纸和雪茄摊的驼背格洛肯先生、自信有治病功能的垂死的格

拉夫先生和服侍他的外甥约翰、弗赖塔格先生(他在墨西哥一家石油公司供职,正在回德国的途中,决定把妻子和岳母迁往墨西哥,因为她们是犹太人)、天主教教堂用具制造商犹太人勒温塔尔先生,加上船长蒂勒、船医舒曼、事务长和六七个船员。瑞士人是原来开旅馆的吕茨先生,带着他的太太和十八岁的女儿大个子的埃尔莎。她渴望爱情,为着没有小伙子喜欢她,整天闷闷不乐。西班牙人是一个歌舞班子的四男四女,带着一对小魔鬼似的孪生兄妹。他们是一伙走江湖的艺人,却坑蒙诈骗无所不为,女的还出卖色相。另外还有一个女伯爵,她是个政治流放犯,从古巴被送回到西班牙的比戈。六个到法国蒙彼利埃的古巴医科学生是船上全部的古巴人,他们经常一起边歌边舞,自寻乐趣,当时非常流行的《蟑螂》是他们最爱唱的歌曲。波特用这支歌渲染了三十年代的时代气息。最后,是四个美国人:一个叫丹尼,是个无赖,结果脸上挨了一顿痛打,留下斑斑伤痕;另一个叫玛丽·特雷德韦尔,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对巴黎情有独钟,书中她对巴黎的那段回忆是极美的抒情散文,不妨看作是波特自己对巴黎的一往情深的回忆;另外两个美国人是画家,一个叫戴维·斯科特,另一个叫珍妮·布朗,他们互称“戴维宝贝儿”和“珍妮天使”,这足以说明他们是一对情人,虽然整天拌嘴吵架,随时准备散伙,却始终黏在一起。

波特在《愚人船》中主要就是描述上述这些人物在船上排遣时间的种种日常活动和揭示他们在脑海中充满七情六欲的种种心灵活动。她对一个朋友说过,她对她笔下的人物并不“预先安排不利的结局”,她“不会偏袒哪一方”。她“站在每个人方面”。这话无非是表明她是按照人物的本来面目逼真地,也就是说恰如其分地,来塑造他们罢了,并不是说,她对她的人物没有好恶,

没有褒贬。在文学创作中,"纯客观"的记录是不可能的。即使作者自以为在纯客观地记录,但是在记录这而不记录那的选择中,也透露了作者的倾向性。何况波特根本不是一个自然主义作家。她只是表示她不愿在小说中现身说法,发表自己对笔下人物的看法,而是要让读者从他们的言行和内心活动中去认识他们的个性和品质。这是高明的现实主义写作艺术。波特在《愚人船》中运用得得心应手。雷·布·小威斯特认为,尽管"'站在每个人方面'可能会被看作是不站在任何人方面,但是这个声明的背后的态度阐明了始终贯串在凯瑟琳·安·波特作品中的精神;一种建筑在坚决相信人的不完善性上的理解力,但是这是怀着同情态度的理解。没有同情的理解可能会导致愤懑、讥讽,甚至专横;没有理解的同情可以轻易地导致滥用感情。"他的这种看法,说实话,未敢苟同。《愚人船》全书的基调固然是俏皮,但是其中不乏冷嘲热讽之处,对有些人物的刻画是尖刻得深入骨髓的,根本说不上同情。头等舱的乘客固然没有一个可以称为正面人物,都是一些自私的人,但是波特对他们不是一视同仁的;她对他们的批评的程度不同。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里贝尔先生、蒂勒船长和满嘴广征博引的假冒为善者胡滕教授先生。从对他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波特对他们三人的厌恶甚至超过对那八个走江湖的男女艺人;他们固然用不正当的手段骗人钱财,还结伙偷窃,在比戈做下不少坏事,他们的恶劣的行为已经腐蚀了他们的后代孪生兄妹里克和拉克,但是同上述三个德国人相比,他们仅仅是"小巫"。波特毫不容情地勾勒里贝尔、蒂勒和胡滕的丑恶的嘴脸和揭示出他们的卑劣的灵魂。他们实际上从三个不同的方面代表着第三帝国的支柱:商人、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是法西斯细菌孳生

和繁殖的土壤。全书中虽然没有提到希特勒，但是读者不难观察到正因为有了这种德国人，纳粹才会掌权，才能在欧洲土地上建造集中营和毒气炉，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在他们的心目中，犹太人早已是听凭宰割的俎上肉。那个浅薄、猥琐的女人斯波肯基克是个助纣为虐者，她同里贝尔去向蒂勒密告弗赖塔格是犹太人的那段情节对她的小市民的幸灾乐祸的心态有淋漓尽致的暴露。波特态度鲜明地表明了她对不人道的反犹太主义的极端厌恶。这就是她的主要政治倾向。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一个高明的艺术家，她绝不会满足于只对犹太人作肤浅的描绘和表示廉价的同情。她塑造了那个制造和销售天主教教堂用具的犹太人勒温塔尔，赋予他一颗被扭曲了的灵魂。他是个十足地道的犹太人，信奉犹太教，却假造和贩卖天主教教堂用具。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犹太教的亵渎。他还振振有词地自我辩解，说什么他的买卖并不妨碍他做一个“纯正”的犹太人。这样一个虚伪的小人物在正在汹涌澎湃地袭来的反犹太的浪潮中绝不会有所作为，而势必遭灭顶之灾。他的回转德国无异是在走向髑髅地。勒温塔尔当然不能代表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但是他不失为当时犹太人中的一种典型，而不幸的是，这一部分犹太人在当时人数还不少。

弗赖塔格的心灵也是不健全的。他是个身分特殊的人，自己属于日耳曼民族，却娶了个犹太姑娘，从此在德国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尴尬的境地。日耳曼人认为他自甘堕落，竟然让“卑贱”的犹太血统玷污他们的“高贵”的日耳曼血统，而犹太人呢，却认为他糟蹋了他们的“纯正”的犹太血统，使他时时有一种“里外不是人”的感觉。他此次回德国是打算把他的妻子和岳母接往墨西哥——他工作的地点。确切地说，他决定逃避那个正在酝酿

一场浩劫的德国，远走异邦；尽管作者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就明白地告诉读者，墨西哥并不是一片乐土，但是在弗赖塔格的心目中，却是一个避风港。他在当时的世界上不得不寻觅一个一家三个平凡的人的容身之地。在这件事上，他算得上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也许他能逃过即将在欧洲大陆上进行的“大屠杀”吧。实际上，他正是波特塑造的另一种典型，清醒的因而是幸运的“愚人”。这个人物显得个性丰满，引人注目，正反映出作者的高超的艺术手腕。

《愚人船》的头等舱乘客，可以说是当时西方的自私自利的中产阶级的缩影。他们的种种活动构成的是一个色调灰暗的画卷。但是，波特在这个画卷上安排了一个亮点。那就是统舱乘客、年轻的巴斯克人埃切加拉伊。他不但极有艺术才能，善雕各种动物，而且心灵高尚，不惜舍身救人。不料他救起的不是人，而是胡滕教授先生的那头白叭喇狗贝贝；他自己却送掉了生命。头等舱里的狗竟然断送了统舱乘客的性命！这实在是对人的命运的辛辣的嘲弄。接下来，作者用平静的笔调叙述了胡滕夫妇听到埃切加拉伊是孤身一人，他们用不着为他的死亡作丝毫补偿后，产生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的笔锋的犀利，真是叫人毛骨悚然。

波特被人称为“阴暗的寓言制造者”。《愚人船》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阴暗的寓言”。上述埃切加拉伊牺牲的那段情节，我认为，精彩地显示了她的“阴暗”的特色。

总的来说，《愚人船》的艺术风格，如果拿形象艺术来作比较，它不像海明威的作品那样，产生一种印象派绘画的效果，而像是精雕细刻的蚀刻画。他们两人都是运用意识流手法的高手，但是由于题材和两位作家的气质不同，他们所显示的画面也

风采各异。海明威对意识流画面的描述往往写得就事论事，故意表面不带感情色彩，其实其中蕴藏着浓重的感伤，而波特的笔下明显地流露出“留连光景”的抒情味。也许她毕竟是位女作家，感情比较纤细，字里行间有时会流露她自己的真情。读者如果高兴拿《愚人船》中特雷德韦尔对巴黎的那段回忆同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主人公追忆巴黎的情景对照来看，一定会别有乐趣。

不少美国的评论家都认为波特在写作技法上深受后来人英国籍的美国亨利·詹姆斯的影响。也有评论家说，她继承了美国文学中《红字》作者霍桑的传统。她自己却不止一次地说，她早年爱好的是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作为读者，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对她的艺术渊源追根究底，作细致的剖析。这属于专家学者的研究范围。反正她本人就是位出色的文体家，是位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大师。

如果我这个《愚人船》中译本能多少反映出原作的风貌，使读者能多少领会她的艺术魅力，那么，我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经受的种种“力不从心”的苦恼，也算得到补偿了。

鹿　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目　录

第一部

启程

我们何时向幸福出航?

(波德莱尔)



一九三一年八月——海港小城维拉克鲁斯[1]是在陆地和大海中间的一个小小的给旅客们吃苦受罪的地方，但是住在那儿的人却很喜欢他们自己，和这个他们帮助建造的小城。他们生活在那儿，熟悉当地的风俗，那些风俗则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性情；他们过着不是充满暴力、就是毫无生气的日子，却对外界的意见采取得意扬扬的轻蔑态度；他们入迷地抱着这样一个观念：他们的行为和想法是超越批评的；这就是他们的态度的依据。

他们在公家和私人的宴会上尽兴享用的时候，报纸纷纷发表抒情散文说，那是多么欢快的盛会啊，排场是多么丰盛和贵族化——措辞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享受装饰和美点；他们对上流社会的人士既能保持高雅的礼节又能轻松地欢乐的这种微妙的平衡手腕赞美得没完没了；这种手腕是维拉克鲁斯人的一个秘密，它受到首都这个内地城市中土里土气的社交界人士的强烈的忌妒和不成功的模仿。“只有我们的人懂得既态度文明、自由又尽情享受，”他们写道。“我们生性豪放、热情、好客、敏感，”他们继续写道；他们是打算不但让他们自己读到，而且要让居住在高原上那些多种语言混用的野蛮人读到的；那些人一直固执地把维拉克鲁斯看作一个讨厌的出海的地方。

也许，在这自以为有高度教养的、好斗的断言中，有一丁点

儿小小的心里不踏实的迹象；这种迹象出现在这个断言中，和他们对那些不得不经过他们的手中才能登上海港中某一艘船作为暂时的栖身之地的旅客采用的有条不紊的、粗鲁、野蛮的手段中。旅客们巴不得离开这地方；维拉克鲁斯人也巴不得不再看到他们，不过要等每一种可能的通行费、酬金、勒索和向这座小城和它的居民们交的贿赂榨取到手以后。事实上，在过往的人的眼中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海港小城，在本质上是冷酷无情的，在经历上是厚颜无耻的，不惜对外来者强硬地现出最丑恶的一面；路过的外来者十有八九是绵羊，由于羊毛被他们剪掉而发出咩咩叫声的绵羊；十之一二，是恶棍，要是骗不过这个人那就太可惜了。不管怎样，反正有这么许多钱得从每个人那儿取走，而且时间总是挺短。

在八月里一个大清早，白热的天气中，几个穿白麻布衣着那个阶层的、神态平静的市民穿过在沾满灰尘的夜来香的树荫笼罩下的公共广场的烤硬了的路面，悠闲地坐在皇宫饭店的平台上的椅子里。他们伸出双脚，凉快凉快他们的鞋底，叫唤那个浑身给汗水湿透的小服务员的名字，要冰镇酸橙汽水。他们好几代人都是一起长大的，娶的不是别人的表姐表妹、姐姐妹妹，就是姑妈姨妈，互相熟悉一切事情，传播着他们听到的一切流言蜚语，听到他们讲过的事情重复讲给他们听；还利用收生婆的悄悄话互相参预制造对方的身世；可是仍然几乎每天早晨在去他们的店铺和办公室的途中在这儿相会，在开始干每天的正经事以前，作一次最后的休息，捞一点儿信息。

广场上空荡荡的，只是树下的一张长凳上坐着一个身材矮

---

① 维拉克鲁斯(Veracruz)：墨西哥东部墨西哥湾主要海港。

小、消瘦的印第安人，一个乡下印第安人，穿着一条旧得变了颜色的白棉布长裤和一件长衬衫；一顶弯得很厉害的旧草帽扣在他的眼睛上。他的两只脚上穿着一双用皮带系着的凉鞋；皮带已经断了，靠打结重新连接起来，脚温顺地并排地搁在灰色的泥地上，脚趾甲凹凹凸凸，像锯齿似的，脚跟开裂。他看上去好像睡着了，坐得直挺挺的，两条胳膊交叉着。他迷迷糊糊地动了一下，把帽子推到脑后，从一条折着的蓝棉布带里取出一卷凉玉米粉圆饼吃起来，眼睛东张西望，或者盯着看远处，下狠心把他的整齐的牙齿咬进那坚硬的玉米面饼，咀嚼，咽下，不带一点享受的神情。平台上那些悠闲的人没有注意他，只把他当作是景色的一部分，而他呢，看来也没有察觉他们在那儿。

那个乞丐每天早晨为迎接清早的来往行人，准时来到平台，他出现在街角上了，歪歪斜斜、慢条斯理地在爬过来，他的断臂断腿用皮和细绳包裹着。为了给他干这个行当做好准备，他是在早年被一个干这一行的高手动了复杂的手术，截去手脚，变成残废的；他的模样简直不像是人。哑巴，半瞎，他一路走近来，鼻子几乎碰到人行道，好像在跟踪一股气味似的，时不时地停下来休息；他的极丑的、长着乱蓬蓬的浓发的脑袋带着没法承受的痛苦，慢腾腾地左右摇摆。那些坐在桌子旁的人对他瞧瞧，好像他是一条叫人讨厌得不屑一瞩的狗；他耐心地等在每个人的身旁，直等到一枚枚小铜币掉进那个挂在他脖子上的张着口的皮袋发出响声为止。那些人当中有一个递给他半个挤过汁的酸橙的时候，他向后蹲坐着，张开那张可怕的嘴，接受那个水果，然后又趴倒，他的下巴在扭动。接着，他爬到街对面的广场上，躺倒在那个小个子印第安人后面的树底下；那个印第安人没有回头看他。

那些人懒洋洋地望着他一路爬过去，没有一点儿表情；他们

望着一片垃圾在风中打转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模样；然后，他们仍然懒洋洋地，可是带着内行的眼光把眼睛转来转去，盯着看那些结着伴去上班的做工的姑娘；她们都穿着色彩鲜明的薄棉布连衣裙；她们的黑头发上都插着鲜艳的粉红色或者蓝色的赛璐珞梳子；他们还盯着看那些正在穿过广场，慢腾腾地走进教堂的上等阶层的姑娘；她们的穿戴是正式去教堂的打扮，黑色的薄纱连衣裙，玳瑁壳的高梳子上披着抽纱披肩头纱；她们手中的黑色大扇子已经张开。

最后一个姑娘消失以后，那些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的男人就把眼光转移到居住在离他们最近的窗台内和阳台上的小东西的滑稽动作上。一只长长的灰猫警惕地蜷伏在它自己家里的窗子内，盯着看它的敌人，那只鹦鹉；那不请自来的家伙曾经一再用人的语言欺骗它邀请它去吃东西。鹦鹉侧着黄褐色的眼睛看一只猴子；那只猴子每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就用鹦鹉听不懂的语言开始嘲弄它，要嘲弄上整整一天。猴子从隔壁的阳台的栏杆上扑向鹦鹉，把拴着它的链子绷得笔直；鹦鹉尖叫起来，拍着翅膀，猛拉着它的脚链。猴子对这种情况感到腻烦了，悄悄走开，鹦鹉安定下来，用单调的声音诅咒，抖动着羽毛。楼下人行道上，从小贩的篮子里传来开裂的椰子的香味，引诱着猴子。它向下面的椰子扑去；由于它的柔软的腰被拴着，它被挂在空中，气疯了，又从它自己的链子上往上爬到安全的地方。

一个女人从窗里向鹦鹉伸出一条光着的胳膊，给它一条烂熟的香蕉。鹦鹉发出小小的呱呱声，表示感谢，用一只爪子接下，吃了起来，用冷酷和危险的眼光盯着猴子看；猴子带着贪婪和恐惧的神情叽叽呱呱地叫着。那只猫轻蔑地瞧着鹦鹉和猴子，对它们都不怕，因为它是自由的，要打要走，可以随意挑选；

它被挂在下面那个小小的肉摊上的一块块不新鲜的生肉的气味逗得兴奋起来。不久,它悄悄地跨过窗台,无声无息地落到那个卖肉的脚旁那堆下水上。一条癞皮狗跳起来,对着猫吼叫,接着发生一场猫狗赛跑,狗一边跑,一边汪汪吼叫;猫一边跑,一边嘶嘶尖叫,真是好不热闹;它们一直跑到离广场最近的一棵树旁,在那儿猫利用爪子逃离了危险,而那条狗气得发狂,没有注意,在那个坐在长凳上的印第安人的受到亏待的脚上磕磕绊绊地跨过去。印第安人看来好像没有动,然而他的腿在膝盖处猛地一摆动,动作迅速和干净,到了完美的程度,他的凉鞋的硬帮踢中了狗的瘦削的肋骨。它一路号叫,奔回肉摊。

有个男人大模大样地打了个呵欠,抖开他面前那份弄皱了的报纸,再仔细察看一张满版的照片,那是一具支离破碎、五脏六腑都流出来的尸体,躺在一个炸弹爆炸造成的小坑附近,在瑞典领事馆的院子里,背景是一棵棵盆栽的植物和一个个柳条的鸟笼。那是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男仆,归根结蒂,只死了一个人。脸没有受到伤害,两只睁大的眼睛显得平静地忧愁;一只手优美地伸开着搁在他身旁一堆凝结在一起的肠子上。附近的一张桌子旁,有一个男人站起身来,探出身子,也去看那张照片,接着摇摇头。他是个年纪比较大的人,有一张油光光、黑黢黢的脸,他的白麻片衣服和柔软的衣领被汗水沾软了。

"一件糟糕的事儿,"他说得相当响,"跟以往一样,是一个过错。"

"那还用说,而且报纸也这么说的,报道这么长,"那个比较年轻的人对这两个说法都表示同意。他们开始看社论。社论撰写人斩钉截铁地说,在整个墨西哥,至少在整个维拉克鲁斯,没有一个人可能希望损伤瑞典领事一根毫毛;领事早已证实他自

己是这个城市的坚定的朋友，是这个城市的所有外国居民中最文明和最可敬的。事实上，炸弹是打算对付住在隔壁那个富有而肆无忌惮的地主的；由于发生了一个无论怎样谴责都不能说过分的、致命的失误，炸弹炸错了房子。社论撰写人完全明白，由于这种意外的不幸，可能引起最严重的国际纠纷。所以维拉克鲁斯这个城市急于向领事和他代表的那个伟大而和平的国家，表示最深沉和最衷心的歉意，而且确实准备作出在此情况下两国政府间的礼节所必需的任何和一切的补偿。最幸运的是，领事本人当时不在府内，而是同他的家人在他的一个朋友家中享用兑了生命之水酒[①] 的酸橙汁。维拉克鲁斯全体公民无不希望，瑞典领事会同意原谅和宽恕这个悲剧性的过错，因为眼下是严峻的日子，大伙儿都可能遭到处处潜伏着的危险。在此期间，这个可悲的事件如果被用来作为对老实的维拉克鲁斯佃农进行剥削的狠心而无耻的人的一个警告，说明革命确实已经控制局面，工人们不但已经痛下决心，不但要充分报复对他们的种种迫害，而且要结束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公正行为，这样就可能发挥有益的作用。

那个年纪比较轻的人翻过报纸；两个人一起看下去。社论撰写人希望还要说明一个情况。尽管那些献身于这项破坏工作的人的目标遭到尴尬的失败，原来筹备好的庆祝活动结果还是举行了，显然，没有人有什么过错。筹备活动是花了一些钱和工夫完成的；烟火爆竹是八天前付款预定的；胜利的情绪到处弥漫。使维拉克鲁斯那些欢庆活动的制造者、他们的妩媚的太太和他们那些在自由的新世界成长的孩子失望，对大伙儿来说，将

① 生命之水酒(aquavif)：一种用马铃薯酿造的斯堪的纳维亚烈酒。

会是极不光彩的。一个老实的小伙子，一个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中低微的成员，这么过早地丧失生命，当然是一件足以使公众悲伤的事情。将会为他的遗体举行一次排场巨大、仪式体面的葬礼，尊他为献身于伟大的自由和正义的事业的烈士；他的悲痛的家人将会得到巨大的物质补偿。城里所有的工会已经用自愿捐献的方式提供了两卡车鲜花；有五支乐队将从大教堂门前一直排到墓穴旁，演奏葬礼进行曲和革命歌曲；估计每一个能走路的男女工人都将参加伟大的送葬队伍。

"唷，这儿越来越热啦，"那个年纪比较轻的人一边说，一边用手绢擦颈窝。年纪比较大的那个把声音压低，低得几乎像是凑在耳朵上说话，说话的时候嘴唇简直不像在动："这帮猪猡明摆着要蛮干到底了。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收到他们哪一个的一个比索房租，我也许再也收不到一个了。他们坐在偏远区那一片三十五栋房屋里抓虱子，让我遭受损失……"两个人默不作声地互相盯着眼睛看。"看来他们好像不知道这类事情可以被用来在两方面起作用的。"

那个年纪比较轻的人点点头。他们一起挪到那些服务员听不见的地方。"我那些制鞋工人在七个月里罢工四次，"年纪比较轻的那个说。"他们几乎当着我的面谈论接管工厂。他们动手干的那天，整个工厂准会烧成平地，没错儿。样样都办妥了保险手续。"

"我们等什么呢？"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人问，从他的警惕的语调中突然爆发出硬压着的激烈的口气。"我们昨夜干吗不弄上五十挺机关枪来对付欢庆活动？他们还没有部队——我们干吗不召集军队？五十挺机关枪？干吗不弄上五千挺？干吗不弄上一车手榴弹？我们怎么啦？我们丧失理智了吗？"

那个年纪比较轻的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面看，好像有个叫人兴奋的景象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似的。“才刚开始哪，”他说，流露出一丝含有寓意的微笑。“让它折腾得更热闹一点儿，变成值得干的事情。别担心，我们会把他们砸成稀巴烂的。他们永远赢不了。他们是一群蠢牛，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战斗只是在为调换主人罢了……得了，我还会做一阵子主人的。”

“要是我们光是坐着，让他们向我们拥过来，那可就当不成了，”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人说。

“他们永远赢不了，”年纪比较轻的那个说。他们继续往前走去。

那些留在他们身后的人慢腾腾地从平台上散开去，把他们的报纸留在桌子上。他们反感地看到，条条街上又开始挤满了城里最近出现的那些等下一艘船的人，他们是天知道从哪里来的候鸟，叽叽呱呱地说着种种难听的语言。甚至说的西班牙语也不是墨西哥西班牙语。至于他们中间那些女人，除了偶尔有个把温柔美丽的真正的墨西哥姑娘以外，她们总是一个样的，不管她们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国籍：相貌丑陋、涂脂抹粉的中年女人，不是太胖，就是太瘦，还有胸脯平坦、粗声粗气的小妞儿，剪着平头，穿着平跟皮鞋迈着大步转悠，她们的裙子短得露出大腿，那绝不是打算给任何眼睛看，而是给上帝的眼睛看的。要是那些规律出现了例外的情况的话，它们就会被完全忽视了。一切这样的外国女人都是可憎和可笑的。维拉克鲁斯的人们把嘲笑外国女人的容貌、她们的服装、她们的说话声音、她们的粗野的没有女人味的举止，当作是永远不会厌烦的娱乐——尤其是北美人更糟。有钱的和显赫的人有时候乘那些船来到和离开；

不过，既然有钱和显赫，他们简直不抛头露面，除非坐在开得很快的汽车里，或者是神气活现地逗留在码头或者站台上，他们的阔气的行李乱糟糟地堆在他们周围。他们的容貌，不管怎样，倒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是由于别的和更高级的理由被嘲笑的。他们——他们看来好像全都无知无觉和自由自在，端详着一个为他们制造的世界，向眼前的每一个人发号施令，自己压根儿不动手——他们被指明要被毁灭，工会领袖们就是这样告诉他们的追随者的，而且他们已经可以被带着好奇心看是一个将要消失的种族。那些观察的人断定，新来的这伙人都是这个样儿——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坏，不过总是有一些有趣的差别。

旅馆的接待员出来见见天日；那些穿着油迹斑斑的、皱巴巴的白上衣的服务员开始拍掉桌布上的灰尘和面包屑，准备开午饭。他们轻蔑地打量着，他们那一部分当天的旅客整个早晨涌来涌去，走遍这个小城以后，又零零落落地回来休息了。

不用说，旅客们的气色不怎么好。他们从那列把他们从内地载来的火车上艰难地下来，由于穿着一本正经的套装，坐在椅上试着睡觉而浑身发硬，由于从他们的生活中被连根拔起，感到脑子疼痛，带着神秘的精神不济的感觉、被迫的离别感觉、没有家的感觉，不管这种没有家的感觉是多么短促，都有一点儿忧郁。个个只是马马虎虎地洗了把脸，没有修饰整洁，浑身灰尘，疲倦和担心使他们眼圈发黑，眼睛里呈现茫然若失的神情，手里都拿着盖过印、签过名的证件，用来证明：他出生于某个时间和某个地方，有一个他自己的姓名，在这个世界上好歹有一个容身之处，有良好和充足的理由指望作一次旅行，和有一份在两国的边境上值得检查的财物。

人人希望这些证件至少可以为他的冒险精神暂时不至于受

到危害确立豁免权;人人的第一个想法是,在其余的人能到达以前,他必须马上赶去,在形形色色的办事处里、领事馆里,和这样那样的部门里,先解决他自己的最关心的事儿;这个开始不像一次航行,倒像是障碍赛跑。

到眼下为止,他们都一个样,而且抱着相同的希望。他们个别地和集体地生活着,为了唯一的目的,有一天能安全地登上一艘眼下停在船坞里的德国船。船是从南美洲航行了许多路而来的,将要开往不来梅港[1]。甚至在旅客们离开墨西哥城以前,叫人心慌意乱的谣言已经迅速地传到了他们的耳中。一路上,沿海地区都有严重的飓风。一场革命,或者是一次大罢工——到底是什么,必须由时间来判断——正以最快的速度在维拉克鲁斯这儿蔓延开去哩。一场不算厉害的天花流行病在沿海的几个城市里爆发。旅客们一听到这个消息,都急忙赶去种牛痘,而且全都一个样地发烧,在膝盖或者胳膊肘的上部都有一个结盖和化脓的小小的痛点。还听说那艘德国船在航行中延误了,因为它在坦皮科[2]的一个沙洲上搁浅了三天,耽误了时间,可是最新的说法是,它在海港里,而且会准时启航。

看来这次旅行他们自己必须比往常冒更多的险,而他们的来到维拉克鲁斯证明,他们有需要而不是忽发奇想地要作一次愉快的航行,才硬着头皮来实现他们的打算,面对这些叫人泄气的流言蜚语的。他们大伙儿的经济情况显然可以分为从还算舒服到穷得一点不舒服这个范围内,可是个个在他自己看来都有

① 不来梅港(Bremerharen):德国威悉河口海港,属不来梅州。

② 坦皮科(Tampico):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东南部一海港城市,位于墨西哥海湾畔。

手头拮据的痛苦。他们人人都在担心付费这件事儿：一次小心谨慎地打开钱包和手提袋；一次紧皱着眉头，用正确的手指头仔细地数找头；一个男人把手伸进上衣里面的兜，吓了一跳，在魂飞魄散的一刹那，他的钱没有了；从上面的那些事儿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贫穷了。

大伙儿都相信，他们正要去的地方，由于某种理由，比他们将要离去的地方更可爱，可是必须以最少的耽搁和花费来完成这个变化。耽搁和花费是他们的共同的遭遇；造成他们这种遭遇的是一大伙以谋取小费为职业的人、收赏钱的人、半睡不醒的领事馆办事员和腻烦的移民官员，他们压根儿不关心旅客们是不是上得了船，或者当场摔死。他们整天、每天看到太多这种人，还看到从他们的体面的服装上散发出来的、为财务和家庭担忧的、叫人不快的、热气腾腾的气氛。官员们一点儿不把这种人摆在心上；他们自己有足够的烦恼。

几乎有二十四个钟头，那些没人知道姓名、也没人认识面貌的旅客——他们整个儿人性已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了，他们各自的痛苦、记忆、意图和受到挫折的意志紧紧地锁在他们身子里——顽强地奔跑着（因为出租汽车罢工），淌着汗，死了心，饿着肚子（面包师罢工，制冰人也罢工），从旅馆到移民局，到海关，到领事馆，到船边，然后又回到火车站，进行种种最后的尝试保住他们的处于危险状态中的生命和财物。在车站上，每个人的行李被一个搬运工抓住，被他马上强横地抢过去，讲着蛮不讲理的单方面的当地规矩；接着那些家伙带着财物全都走得无影无踪；他们上哪儿去了呢？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呢？人人开始惦记他的发刷、干净衬衫、女衬衫、手绢；他们邋里邋遢地奔波了一整天，甚至还没有用清水清洗一下哩。

所以旅客们恼火了;他们在一切他们注定要去的叫人受罪的地方一再相遇,承受着同样的苦恼:几乎没法忍受的炎热,和白得炫目、烤得人透不过气来的、像复仇者那么冷酷无情的阳光;恶劣的食物,恶劣得叫人难以相信,由傲慢无礼的服务员砰的扔在他们的神情阴沉的脸前。他们全都至少有一次把一盆那上面停着一只苍蝇或者蟑螂的油腻的菜推回去,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说,就付了账,另外还赏给服务员小费,因为空气中弥漫着暴力的气氛,他们一下子就吓得浑身无力,目瞪口呆了。一个人可能由于一句不相干的话和手势就轻易被杀害,而那将是个愚蠢的结局。大家都吃这种食物:清咖啡、温吞吞的啤酒、瓶装的人造柠檬水、铁皮罐装的潮湿的咸饼干、直接凑着壳喝的椰子汁。他们的搬运工在意料不到的时候回来责问他们,提供错误的意见,为了纠正他们自己的错误却胡搅蛮缠地索取更多的小费。这些没完没了的琐碎事儿像梦魇似的在进行着,渐渐吸空他们的钱包和消耗尽他们的精力,而他们的紧迫的事情却看不到有一丁点儿进展。女人们忍不住发出一阵阵哭声;男人们忍不住发脾气,这种情况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他们的眼睑都发红,脚肿得好不厉害。

共同的困境丝毫没有使他们承认大家都是受害者。恰恰相反,人人都情愿各自在内心保持着骄傲和与他人毫不相关的关系。在最初那段狂热的时间内,互相不理睬以后,他们的眼睛不情愿地相对第二十次后,渐渐出现一种不承认的、怀着敌意的认识的神情。"唷,原来你又在这儿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你,"那双眼睛说,闪闪烁烁地避开去,固执地盯着看他们自己的东西。旅客们互相看见各人遭到的屈辱,在人人听得见的范围内详细地叙述他们的私事,一再回答种种尴尬的问题,让一个难

对付的小接待员又一次记下。他们三三两两地停留在相同的地方,异口同声地念出招牌名,向同一个过路人提问,可是他们中间没有联系。好像他们在展望面前的漫长的旅程的时候,都终于下了相同的决心,人对偶然的相遇、无意的相识,不管怎样提防,都不嫌过分。

“嘿,”旅馆接待员跟离他最近的服务员们说,“咱们的蠢货又来啦!”服务员们晃动着油腻的抹布,带着恶意眼光紧紧地盯着那伙乌七八糟混在一起的人看,表示已经注意到了:那伙人悄没声地占领着平台,猛的靠在一张张桌子旁,漫无目的地坐在那儿,好像他们已经完蛋了似的。又是那个胖得异乎寻常的女人,两条腿粗得像树干;她的胖丈夫,穿着那套尽是灰尘的黑衣服;还有那条肥胖的白叭喇狗。“不行,太太,”那个接待员前一天庄严地跟她说,“哪怕只有墨西哥这么办,我们还是不允许狗待在我们的房间里。”那个可笑的女人在那个服务员把那条畜生拴在厨房天井里过夜以前,亲了亲它的湿润的鼻子。叭喇狗贝贝凭着它的英勇的血统带着悲伤的沉默忍受考验,一点不抱怨任何人。它的两个主人马上开始翻看他们处处随身带着的大食物篮。

一个高个子、瘦身材的年轻女人——一个大腿细长的“姑娘”,一颗由她的长脖子支撑着的、头发剪得很短的小脑袋在摇来晃去,一件宽松的绿连衣裙软绵绵地在她的腿肚上飘动——一边迈着大步走,一边像只母孔雀似的用德语跟她的同伴尖叫,她的同伴是个矮矮的胖男人,粉红色皮肤,长着个猪鼻子。一个骨骼很宽大的高个子男人,手脚大得异乎寻常,泛白的金色头发剪成板刷头,罩在他紧张地皱着的额头上,他转悠着走来走去,好像他不认识这地方似的,又转回来,独自个儿坐下,神情恍惚。一个约摸八岁光景、身子显得单薄的红头发小男孩,穿着一身橙色的墨

西哥牛仔穿的皮骑装，喘着粗气，浑身是汗，他的白里泛绿的皮肤上清楚地显露着黄铜色的雀斑。他的面带病容的德国父亲和悲伤、恼火的德国母亲催着他在他们前面走去。那个小男孩单调地说着："我要去，妈——我要去，"接着他浑身扭动地走着。

"去哪儿？"她母亲问，尖声地。"你要什么？说清楚。我们在去德国，这对你还不够吗？""我要去，"那个小男孩沮丧地说，求他的父亲。这对父母交换了一个眼色，那个母亲说："天啊，我的神经要垮啦！"父亲握住了男孩的手，拉着他加快穿过旅馆休息厅深处。

"想想那两个游客吧，"那个接待员跟一个服务员说，"在八月里给一个孩子穿皮衣服，把他打扮成一只猴子！"那个做母亲的听到这话，把脑袋转开去，涨红了脸，咬紧嘴唇，然后一声不吭地用双手遮住脸，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地待了一会儿。

"提到猴子，你管那叫什么？"那个服务员问，用他的抹布向一个年轻的女人作了一个仅仅能看得出的摆动；那是个美国女人，穿着深蓝色的棉布长裤和浅蓝色的棉布衬衫；加上一条阔皮带和她脖子上围着的有蓝图案扎染大头巾，这就是她的全副行头，她是未经许可就模仿了住在城里的墨西哥印第安人穿的上班服装。她没有戴帽子。她的黑头发在中间分开，挽成一个发髻，贴在颈窝上，在纽约看起来相当老式，可是在墨西哥仍然很合适。那个跟她一起的年轻男人穿着一套合身的白亚麻布衣服，戴着一顶普通的巴拿马草帽。

那个接待员压低他的声音，可是压得不够低，说出了他知道的最恶毒的侮辱语言。"那也许是一头马骡[1]，"他大胆地说。

---

① 马骡是公驴和母马所生的杂种动物。这话就是骂人杂种。

他走开的时候，带着恶意的满足察觉那两个美国人也懂西班牙语。那个年轻的女人的身子僵住了；那个年轻的男人的鼻子变得煞白，而且皱了起来，接着他们像敌人似的互相瞅了一眼。“我跟你说过，在这儿要穿裙子，”那个年轻的男人说。“你原该懂事点的。”

“别作声，”那个年轻的女人用疲劳的、没有表情的声音说，“千万别作声。现在我没法换，要等到我们上了船才行。”

四个漂亮的西班牙姑娘，黑皮肤，长脖子，带着职业的放肆神态，她们的质地低劣的黑裙太紧地裹在她们的小巧的屁股上，她们的彩色的褶裙边寒碜地盖在她们标致的大腿上；她们在广场上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到处乱转，又在狭窄的街道的小路上低矮的土屋的刷着白灰浆的墙壁间转悠，那些墙壁上打出着一个个枪弹窟窿。她们急匆匆地进出一家家店铺，她们杂乱地坐在平台上吃水果，把果皮撒得满地都是，她们的急促的西班牙语吵吵嚷嚷地说个不停，好像一群在拌嘴的鸟儿。她们由相同数目的黑皮肤、细身材的小伙子陪伴着。那些小伙子的亮晃晃的黑头发上抹着油，油一直抹到他们的狭窄的头盖骨上；宽皮带紧紧地勒在他们的细腰上。另外还有两个脸色暗黄的早熟的孩子，一男一女，孪生兄妹，约摸六岁光景。旅客中，只有他们在上一个夜晚出来，参加烟火盛会和舞蹈。烟火纷纷腾空的时候，他们欢呼了；他们同人群中的人互相跳舞；后来，他们单独稍微走开一点距离，又跳起来，霍塔舞① 啊、马拉加舞② 啊、波列罗舞③

---

① 霍塔舞(jota)：西班牙南部一种古老民间舞蹈，由响板伴奏，男女对舞。

② 马拉加舞(malaguena)：一种欢快的西班牙民间舞蹈。

③ 波列罗舞(bolero)：一种轻快的西班牙舞。

啊，拍着响板。他们的周围拥着不少人。最后，一个姑娘走到人群中间去收钱，把裙子张在她前面接受硬币，窸窸窣窣摇晃着她的裙子褶边。

这个演出班子不知有多少事情还需要整理。他们总算勉勉强强地结成松散的、硬凑合在一起生活的一伙；在叫那两个双胞胎的时候，两个小孩总是对他们不管哪一个都不服从；他们也同样地一再掴他们两人耳刮子和一路拉着他们走。他们的包裹实在捆得松松散散、太不成模样了，这使他们心烦意乱，恼火得眼睛闪闪发亮，屁股四处摇晃，这会儿显得衣衫更凌乱了，可是他们的情绪从不低落。最后，他们冲上平台，紧紧地挤在一张桌子周围，用拳头敲桌子，大声喊叫服务员，全都一下子尖叫出他们的吩咐，两个孩子毫不害怕地跟他们在一起。

一个不显眼的、身材苗条的、刚进入中年的女人，符合习俗地穿着深蓝色亚麻布衣服，戴着一顶宽边的蓝帽，帽子遮着她的黑头发、她的相当标致的小脸和神情热切的深蓝眼睛；她一边拉起她右胳膊上的短袖，一边带着一点儿厌恶的神情打量着那些西班牙人，又向那个女要饭的刚才拧她的地方瞧了一眼。那条柔软的胳膊的肌肉上已经肿起一个呈青紫色的硬块。这个女人按捺不住这样的念头：把这个疼痛的伤痕给一个人看，轻轻地说，好像她在说另一个人的事情似的：这当然不是一件真正发生了的事儿，是不？可是没有人，她放下拉起的亚麻布衣袖。那天早晨，她洗了一个冷水澡，从旅馆里走出来，喝了大量糟糕透顶的咖啡，睡了一觉后不那么难受了，又一次去移民局。那个要饭的女人坐着，背靠着墙，两个膝盖蜷起在一条很大的破破烂烂的裙子内，正在吃卷着辣酥酥的青椒的玉米圆饼。她一看到那个美国女人，就停住不吃了，把她的饼转交给左手，爬起身来，用瘦

削的小腿向她一心要算计的那个人飞跑过去；那双嵌在她的皮革颜色的脸上的黄眼睛像武器那样瞄准着她。

“看在上帝份上，给我一点儿钱吧，”那个要饭的女人威胁地说，在那个外国女人的胳膊上狠狠地搂了一下；她记得那声表示正当的愤怒的好听的、清晰的尖叫，她用她最好的西班牙语回答，她当然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就在这当儿，那个要饭的女人像一只飞扑下来的鹰那样凶猛，倏地伸出她的坚硬的长爪子，抓住肩膀附近的一块肉，拧了一下，死命地拧，她的指甲掐进了皮肤，接着她飞也似地逃掉了，她的一双光脚啪哒啪哒地敲在人行道上。唉，这好像是一个恶梦。当然喽，这样的事儿是不该发生的，那个穿蓝色连衫裙的女人说，或者说，至少不该发生在我身上。她垂头丧气，用手绢擦擦脸，看表。

那个穿着尽是灰尘的黑衣服的胖德国人和他的胖妻子把脑袋凑在一起，悄悄地说话，点点头，表示同意。接着，他们带着盛着午饭的篮子和牵着他们的狗，穿过广场，坐在那个一动不动的印第安人对面的长椅的一头。他们拿掉巨大的白色三明治上的白玻璃纸，慢腾腾地吃着，轮流用大热水瓶的盖喝水。那条肥胖的白狗坐在他们的脚旁，抬起那张信任的嘴，啪哒啪哒地一张一闭吃着他们给它的一口口食物。他们肩并肩坐着，神情严肃地、庄重地吃个没完，而那个小个子印第安人坐在他们附近，没有一丁点儿表情；只有他的瘪下去的肚子随着他微细的呼吸微微起伏。那个德国女人用主妇的手指头节俭地把剩下的零碎食物包起来，摆在那个印第安人附近的长椅上。他很快地向食物看了一眼，又转过头去。

两个德国人牵着狗，带着篮子，回到他们的桌子旁，要了一瓶啤酒和两个玻璃杯。那个缺胳膊断腿的要饭的从树下直起身

来，用鼻子闻闻，向食物的气味爬去。他直起一点身子，用两只包着皮的断胳膊根部夹住那包食物，夹到椅子下面。他靠在长椅上，弓着身子，在地上吃起来，穷凶极恶地又是嚼又是咽。那个印第安人一动不动地坐着，望着别处。

那个穿蓝长裤的姑娘伸出手去，拍拍那只白叭喇狗的头，抚摸它。“真是条可爱的狗，”她跟那个德国女人说；德国女人亲切地，可是含含糊糊地回答，不看那个陌生人的眼睛：“啊，我可怜的贝贝，它真好，”她的英语几乎没有外国口音，“又真有耐心；我有时候害怕，它遭到这些事儿，可能会以为它在受惩治哩。”她倒了一点啤酒在手绢上，温和地擦擦那条狗的大脸，她也几乎温和地不睬那个看上去不顺眼的、穿得不恰当的美国姑娘。

那个穿着绿长袍、头发剪短的年轻女人跳起身来，用德语尖叫，把人人吓了一跳：“啊，瞧出了什么事儿！啊，他们要对他干什么？”她的两条长胳膊慌慌张张地挥着，接着指向广场上那棵大树。

六七个小个子印第安人从教堂的阴影里走出来。他们的胳膊下都夹着轻步枪；他们迈着短促、灵活的步子，走得并不匆忙，向坐在长椅上的那个印第安人走去。他望着他们走近，表情没有变化；他们的脸色并不严肃，而是冷淡、深沉。他们在他面前站住脚，包围他；他没有一句话，或者一个眼色，或者一个停顿，站起身来，跟他们一起走掉；他们的破烂的凉鞋都没有一点声音；白长裤在他们的脚踝子周围飘动。

旅客们冷漠地望着这个场面，好像不去理睬他们自己的永远不会满足的好奇心似的。再说，在这地方，什么人发生了事情，可不是，哪怕他们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毫不关心。“别瞎费心思，”那个猪鼻子男人跟穿绿衣服的姑娘说，“这儿没

有不寻常的事情。他们最终还不是把他给崩了！说不准他偷了一把辣椒！要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乡村政治问题罢了。”

这话激怒了那个面容瘦削、手脚巨大的金发男人。他挺直长长的身子，放下架着的腿，满脸怒容对准那个胖子。“可不是，”他用带着外国口音的德语说，洪亮的说话声滔滔不绝，“这很可能是政治。这儿没有别的事情。政治、罢工和炸弹。瞧他们甚至还非炸瑞典领事馆不可。甚至还是个意外，他们是这么说的——鬼话。干吗不是别处，偏偏是瑞典领事馆，我可以问吗？”

那个猪鼻子男人勃然大怒，用大嗓门粗声粗气地回答：“干吗不是瑞典领事馆呢，换换地方嘛？干吗不是别人有时候也该有一点儿小小的麻烦呢？干吗总是一定要德国人在这些他妈的外国吃苦头呢？”

那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儿男人不睬这个问题。他向后靠去；他的白眼睫毛盖住他的苍白的眼睛；他用麦秆吸管不急不慢地一口气吸干了他面前的柠檬汽水。周围的德国人不自在地动了动身子；他们的脸色都沉下来，表示不同意。他们的脸上一本正经地表示出，这话说得不合时宜、不合礼仪；就是这种德国人，使我们在异国的土地上都获得坏名声。那个小个子男人脸涨得通红，简直有点儿肿，看来好像在怨恨他个人遭到了莫大的冤屈。接下来的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天气炎热、人淌着汗，太阳火辣辣地烤着；然后是人们在挪动，站起身来和往后推椅子，提箱包，在慢腾腾地、陆续不断地散去。船四点钟开，是该去的时候了。

舒曼医生迈着一个老军人的整齐的脚步走过甲板，坚定地

站在栏杆附近，一动不动，神态自在，可并不懒散，双手放在两边；他望着零零落落的乘客队伍走上跳板。他长着漂亮的鹰钩鼻、端正庄重的脑袋，左脸颊上有两道弯弯曲曲的、痊愈了的、深色的决斗伤疤。其中一条，德国人管它叫“绝招”，是从耳朵到嘴部的叫人钦佩的巧妙的一击造成的，当时一定使边上的牙齿都露出了。痊愈了这么些年，这道伤疤的表面仍然节节疤疤，一个缝线留下的伤痕。舒曼医生的伤疤并不使他显得难看，就像六十岁的年纪并不使他显老那样；伤疤和年纪对他都挺合适。他的淡棕色眼睛平静地对准着一个固定的地点看，那儿人们来来去去；他的眼神中并不流露出他在推测和有好奇的表情，而是现出抽象的和善，甚至亲切的神情。他看来和蔼可亲、有教养，态度极沉着，站在那儿，背景是一些穿着白制服的淡色头发、年纪很轻、身材比较矮小的高级船员，和全体水手，他们都是大个子，身子结实，面相滞钝；水手们都在走来走去，忙乎他们的活儿，人人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态度专注，是受过完整训练的低级人员。

乘客们从阴暗的、霉迹斑斑的海关的棚屋式建筑里涌现出来，被阳光照得人眼前一片漆黑，逼得人不由得眨巴着眼睛，个个都是一副有气无力地、走完最后一段路硬撑着进医院的病人模样。舒曼医生看到一个他见到过的背驼得最畸形的驼子；那是一个矮子；从上面看下去，他好像大腿连接在肩胛骨上，陡直的胸膛好像躺在摇晃的骨盆上，那颗脑袋上长着流露出耐心和痛苦的干枯的长脸；脑袋向后靠在驼背上。就在他身后，有个高个儿孩子，闪闪发亮的金发；他的嘴显示他在发脾气，磕磕撞撞地推着一辆轻便轮椅，车上坐着一个身材瘦小、神态疲惫、快要咽气的男人；他的没有力的深色胡子上有灰白的斑点；他的伸直的双手软绵绵

地搁在盖着毯子的膝盖上；眼睛闭着。他的脑袋随着轮椅的挪动轻轻地摇晃，要不然，他没有一点儿还活着的迹象。

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女人，因为最近生过孩子，变得软弱和精神消沉，穿着雅致的、永久哀痛她的社会阶层的衣服，靠在那个抱着婴儿的印第安女保姆身上慢腾腾地走过来；那个婴儿的绣花长袍从她的胳膊上垂下来，几乎垂到地上。那个印第安女人戴着镶嵌了色彩绚丽的宝石的耳环；在她的下摆宽大、绣着花里胡哨的花样的普韦布洛人[①] 穿的裙子下面，一双小小的光着的脚在谦逊地前进和后退。一对难以归类的夫妻跟在后面；他们是走在他们中间的那个大姑娘的父母，姑娘比他们两人都长得高和壮实；三个人呆头呆脑、神情困惑地东张西望。两个墨西哥教士，他们的恶狠狠的眼光和青黑的下巴很相像，步子轻快地走在那支慢腾腾地走着的队伍旁，最后走到队伍头上。"这次航行真倒楣，"一个年轻的高级船员跟另一个说；他们两人都谨慎地看着别处。"不过，没有像遇到修女那么糟，"另一个说，"修女乘的船才要沉！"

四个漂亮、邋遢的西班牙姑娘——她们的油光水滑的黑头发披在耳朵上，薄底黑舞鞋的脚趾部分太短；高跟部分磨坏得很厉害——从容地告别，吻着周围六七个带来了鲜花和食品篮的当地年轻人。然后，她们一伙的四个蜂腰的年轻人走来跟她们会合，接着他们一起慢悠悠地走去；那些姑娘向那排年轻的金发船员瞟着估量的眼色。那对双胞胎兄妹，一脸油腻，冷漠地跟在他们后面，同时在不断地从不干净的纸袋里拿甜食吃。接着走来的是几个形形色色的北美人；舒曼医生几乎看不出他们的相

---

① 普韦布洛人(Pueblo)：定居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印第安人。

貌有什么区别，只看得出他们明摆着是美国人。他们通常比德国人瘦一点，骨骼单薄一点，可是不像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那样优雅。他还发现不可能分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像他能区分别的人那样。他们的脸色全都古怪地紧张，显得心事重重，然而从他们的表情中丝毫没有流露出他们的身分。一个穿深蓝色衣服的相当俊俏的中年女人看起来模样很体面，可是在她的一条胳膊的短袖下面有一块不平整的乌青色的大伤痕，极可能是打情骂俏捏出来的，使她蒙上爱开下流玩笑的模样，跟她的穿着极不相配。那个穿蓝长裤的姑娘长着一对俏眼睛，可是在舒曼医生看来，她的大大咧咧、神气活现的态度破坏了她的容貌；他认为谦逊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可能具有的最美的外貌。她身旁那个小伙子显出固执的高鼻梁、鹰钩鼻的侧影，像一匹执拗的、非纯种型的马，他的蓝眼睛躲躲闪闪，流露出不爱与人交往的模样。一个拖着脚走的高个子、深色皮肤的小伙子，舒曼医生记得他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港口上船的，上岸去过，这会儿回来了；他懒洋洋地跟在那些西班牙姑娘后面，用只能被认为是色迷迷的眼神打量着她们。

人流仍在零零落落地登船，这时候，舒曼医生不感兴趣了，走开去；高级船员们散开了；那些一直在给轮船不慌不忙地装货的码头工人开始喊叫和跑来跑去。还留着一些行李、孩子和成年人没有上船；那些上了船的人混乱地转悠，神态都像是把什么极重要的东西丢失在岸上似的，尽管他们想不出那是什么。他们三三两两地回到码头上，一声不吭，跟别人毫不相关，懒洋洋地站在一边，望着那些码头工人拉着运货升降架的绳索。形状难看的大包小包、包扎马虎的床垫弹簧和褥垫、看起来质量低级的沙发和炉灶、装在轻便的柳条箱里的钢琴和旧皮箱，还有一车普韦布洛瓷

砖和几千根运往英国的银条、运往欧洲的一吨生树胶、一包包大麻和糖，正在被一件件吊送到放货的地方。这艘船不是那种专门运稀罕物品的船，远不如一艘从纽约来的精美的游船，油漆和室内装潢全部焕然一新；那种船送来阔绰的、衣着讲究的游客，衣袋里装着钱。不，"真理[①]号"是一艘客货同运的船，航向固定，底舱宽大，从一个遥远的港口赶到另一个，一年又一年，忠实、可靠和朴素，像一个德国家庭主妇。

乘客们满怀兴趣和奇怪的喜爱之心仔细打量着他们要坐的那艘船，哪怕是最丑的船也能激发这种心情；他们觉得不管他们有什么事情，现在终于都交托给它的货运舱和房舱了。他们开始向跳板走回去：那个在尖叫的穿绿衣服的姑娘、那对带着叭喇狗的胖夫妻、一个穿着黑衣服、梳着几条光滑的棕色发辫、戴着一条沉甸甸的金项链的体态丰满的小个子德国女人和一个拖着沉重的样品箱的矮身材、神情焦虑的德国犹太人。

总算在最后的时刻一伙在手忙脚乱的办喜事的人出现在跳板下：女人们都戴着有网眼花边的帽子，穿着色彩柔和的薄纱连衫裙；男的都穿着亚麻布上衣，钮扣眼里都插着粉红康乃馨花。这是一场墨西哥人的婚礼，女傧相里有几个北美姑娘。新郎和新娘年轻美貌，不过这当儿，他们尽管穿得讲究和单薄，脸上却显得筋疲力尽，因为他们受过长时间的折磨，而且直到眼下为止，折磨还没有结束哩。新郎的母亲紧紧地搂着她的儿子，轻轻地、伤心地哭泣，吻他的脸颊，喃喃呐呐地低声说着，像一只哀鸽[②]："我生活中的欢乐，我的心肝小儿子，我已经失去了你，这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Vera，意为"真实的"。

② 哀鸽(mowming dove)：一种鸣声凄厉的北美洲小野鸽。

可能是真的吗?"

他父亲用胳膊支撑着她;她拥抱她的儿子;新郎亲她,轻轻地拍着她那张厚厚地涂着胭脂和粉的脸,孝顺地低声说:"不,不,亲爱、温柔的小妈妈,我们三个月以后会回来的。"新郎的母亲一听这话,缩了一下,好像她的儿子给了她致命的一击似的,抽抽搭搭地哭着倒在她丈夫的怀抱里。

新娘穿着符合新娘身分的旅行服装,被她的女傧相们围着,站在她的父母中间;两人各自握着她的一只手;三个人脸上的神情是平静、庄重的,而且非常相像。他们耐心而有点严肃地等着,好像在等一个叫人厌烦但是不可缺少的仪式的结束;最后,女傧相们想起了她们的责任,每人羞答答地取出一个小小的花里胡哨的盛米的篮子,开始把米撒在周围;她们只是嘴唇上保持着凝固的微笑,眼睛里流露出紧张和注意的表情,感到她们在这么干的时候,这件喜事中的欢乐的时刻倒好像已经过去了。最后,新娘和新郎迅速走上跳板;跳板几乎立刻往上升起;下面的家人和朋友们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招手。新娘和新郎转过身来,向那些折磨他们的人招了一次手,有点儿发狂似的,然后手握着手,几乎是在跑,他们径直穿过船,走到较远的甲板上。他们来到船栏杆旁,好像那是一个提供给人避难的地方似的,互相偎依着,眺望着海。

引擎的发动声越来越响,最后变成节奏稳定的声音的时候,那艘船突然震动了一下,颠簸起来,然后慢腾腾地开动了;发出噗噗噗、啪啪啪声音的拖船在那艘船的两旁又是拱又是推;接着,在那艘船和起锚防擦垫中间,出现一片渐渐越来越宽阔的肮脏的水域。乘客们好像都对他们正在离开的陆地珍爱起来,一

下子行动一致地挤在甲板上，一溜儿站在栏杆旁，惊奇地盯着正在向后退的海岸看，向码头上一簇簇小小的、看起来一副寂寞相的人影招手，贼叫，抛着飞吻；那些人也贼叫和招手，作为回应。海港内所有的船降下了旗；码头上那个小小的乐队演奏了几节"Adieu, mein kleiner Garde-Offizier, adieu, adieu...[①]"接着就冷淡地停止了，走得无影无踪，没有回头向维拉克鲁斯瞅上一眼。

酒吧间里冒出一个胖得吓人的墨西哥人，他穿着樱桃红棉布衬衫，松松垮垮的蓝斜纹长裤，手里摇摇晃晃地拿着一个盛着啤酒的巨大的啤酒杯。他用胳膊肘开路，拨开一个个避让的身子，迈着大步来到栏杆旁，像公牛吼叫似的突然唱起一支歌来："Adios, Mexico, mi tierra adorada![②]"他不合调地吼叫着，他的浮肿的脸比他的衬衫颜色红得更深，粗大的紫色血管暴出在他的淌着汗的粗大的脖子上，他的额头和喉咙绷紧着。他摇晃着啤酒杯，严肃地皱着眉头；他的领子钮扣飞进海水；他把他的衬衫扯得更开，放松他的费劲的呼吸。"Adios, adios para siempre![③]"他急迫地扯着嗓门大叫，接着在看上去油腻腻的波浪上面轻轻地传来一阵小小的合唱的回声，"Adios, adios!"从那艘船的正中心响起巨大的、深沉的、瓮声瓮气的像牛叫似的声音，像一条忧郁的海牛的回答。一个年轻的船员悄悄地走到那个胖子的后面，用生硬的西班牙语低声说起来，他那张学生脸上神情很坚决："请到下面你该待的地方去。你没有看到船已经开动了吗？三等舱乘客是不准到上甲板上来的。"

---

① 德语，"再见，我的小近卫军军官，再见，再见……"

② 西班牙语，"再见，墨西哥，我敬爱的祖国！"

③ 西班牙语，"再见，永远再见！"

那个声音像公牛叫的男人转过身子，蛮不讲理地瞪着眼盯着那个小伙子看了一下。他没有回答，一仰脖儿，喝干了啤酒，胳膊转了一个圈，把啤酒杯扔进海去。“我高兴来就来，”他对着天空喊叫，但是马上笨手笨脚地走开，恶狠狠地沉着脸。那个年轻的船员走过去，好像没有看到那个胖子，或者听到他的话似的。一个西班牙姑娘正挡在他前面，紧张地向他微笑，牙齿和眼睛闪闪发亮。他温和地看她一眼，算是回礼，避到一旁，让她过去，稍微有点脸红。他的左手，那只几乎是出于本能举起来的、好像在挡开她的手，上面有一个式样朴素的红金的订婚戒指在闪闪发光。

乘客们在查看那些狭窄、气闷的房舱；房舱里一面靠墙放着一张老式的双层铺；对面墙前放着一张狭窄、坚硬的长沙发，那是给不幸的第三个乘客睡的；他们念着房门板上的名字——大多数是德国人——带着怀疑和迅速闪现的不高兴的神态，望着他们的房舱里那些堆在他们自己的行李旁的陌生的行李；接着每个人又找到那个他认为已经遗失了好一会儿的东西，尽管他叫不出那是什么——他的自我。渐渐地，他认出了他的自我，那个被旅行折磨得身心交瘁、对什么事儿都不太关心但是仍然在呼吸的人；他是从一件行李或者某件熟悉的所有物上认出的；那是他以前买下所有权并引以为豪的东西；它在这个陌生的、可能是不友好的环境中又被看到了，让它的主人确信他并不永远是一个受困扰的陌生人、一个号码、一个无人知道的名字和护照上的一张容貌被漫画化了的相片。乘客们由于自尊心的恢复得到了安慰，望着镜子里开始认识的自己，洗脸，梳头发，恢复正常，然后又溜出去找女（或者男）厕所在哪儿，还有酒吧间和吸烟室啊、理发室啊、浴室啊（浴室很少）。大多数人断定，考虑到票价，

这艘船的设备达不到它应该达到的标准——事实上,是一个蹩脚、寒碜的玩意儿。

甲板上,服务员们在摆出躺椅,摆得遍地都是,把躺椅拴住在顺着墙的横木上,接着在躺椅的头靠上的金属槽中一一插进姓名卡。那个穿着绿连衣裙的高个子姑娘几乎马上找到了她的那一张,随即懒洋洋地躺了下去。那个对瑞典领事馆被炸冒火的、大骨骼的男人,皱眉蹙额,直手直脚地躺在她身旁。她把她那颗小脑袋晃来晃去,格格地笑起来,然后尖声说:"既然我们要坐在一起,我不妨马上告诉你我的姓名。我是利齐·斯波肯基克小姐,我住在汉诺威[①]。我跟我姑妈和姑夫来墨西哥城观光。啊,我发现搭这艘上好的德国船重新回汉诺威,是多高兴啊!"

那个皮包骨头的男人没有挪动身子,看来好像缩到他那身宽松、单薄的衣服里去了。"阿尔内·汉森,乐于为你效劳,我亲爱的小姐,"他说,好像他的话是从他的身子里用钳子硬拉出来的。

"啊,丹麦人!"她高兴地尖叫。

"瑞典人,"他说,看得出打了个激灵。

"那有什么不一样?"利齐尖叫,眼泪莫名其妙地涌到她的眼睛里,接着她哈哈地笑,好像她在痛苦似的。汉森把原来架着的长长的大腿放平,把双手撑在躺椅扶手上,好像要站起身来似的,接着绝望地倒下去,他紧皱着眉头使他的一双眼睛几乎不见了。"这不是一艘好船,"他愁眉苦脸地说,好像在对他自己说似的。

"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利齐叫起来。"船是美的,美的——啊,里贝尔先生又来了,瞧!"接着她把身子伸出老远,两

---

① 汉诺威(Hannover):德国北部城市,下萨克森州首府。

条胳膊一下子举到头上，这是给那个正在走近的、长着猪鼻子的小个子男人的信号。里贝尔先生潇洒地回礼，他顽皮地眨巴着发亮的眼睛。一看到她，他赶快走上前去，他的长裤紧紧地绷在像苹果那样圆滚滚的屁股上，又裹着他那个又硬又高的肚子。他的步子是得意洋洋的；他是一只趾高气扬的矮脚小公鸡。下午的亮光照在他长满着一条条棱儿的脑壳上剃过的粗硬的浅色头发根儿。他带着一件肮脏的雨衣，一个衣兜里插着一份折叠的报纸。

里贝尔先生没有流露出任何他以前见过汉森的神色，宁愿不提维拉克鲁斯平台上发生的小小的风波，站住脚，悄悄地向汉森的脑袋旁那张卡片瞅了一眼，首先用法语，接着用俄语，接下来用西班牙语，最后用德语，用不同的语言说着同一件事情："打搅你，我真抱歉，不过这是我的椅子。"

汉森抬起一条眉毛，皱起鼻子，好像里贝尔先生的身上有股很冲的味儿，或者比很冲更糟哩。他挺直身子，站起来，用英语说："我是瑞典人，"说罢，就走开了。

里贝尔先生的脸涨得通红，他的鼻子抖动着，在汉森身后勇敢地叫着："原来是个瑞典人吗？难道这就是你该占我的椅子的理由不成？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能成为瑞典人。"

利齐向他转过头去，几乎像在唱歌似的说："他刚才并不是存心跟你过不去。你的椅子刚才毕竟空着嘛。"

里贝尔先生亲切地说："椅子既然在你身旁，我要它一直为我空着。"他咕了一声，放松身子躺下去，从雨衣兜里取出那份不是当天的 Frankfurter Zeitung[1]，烦躁地把报纸乱翻一气，他的下

---

① 德语，《法兰克福报》。

嘴唇噘出着。利齐说："拿吵架来开始一次长途航行，可不是好办法啊。"

里贝尔先生放下那份报纸，推开那件雨衣。他情意绵绵地、调皮地看着她。"你知道得很清楚，我跟那个大个子丑八怪吵架并不是为了这把椅子，"他跟她说。利齐顿时变得比他更调皮了。

"啊，你们男人啊，"她高兴得尖叫起来，"你们都是一个样的！"她探过身去，用一把折叠着的纸扇在他的脑壳上重重地打了三下。里贝尔先生早就完全准备好，好生乐上一乐了。他是多么喜爱和紧盯着瞧那些细高挑的姑娘，她们长着剪刀形状的、像鹳似的大腿，大腿的底部是狭窄的脚，大腿在起伏飘动的裙子底下迈着大步。他逗引地用食指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背；得到这样的暗示，她打他打得更重、更快了，她高兴得露出闪闪发亮的牙齿，直打得头皮通红。

"啊，一个坏透了的姑娘！"他说，最后躲开对他的惩治，但是仍然对她眉开眼笑，没有叫饶——说真的，仍然挺兴奋哩。她站起身，在甲板上一路欢快地走去。他滚出躺椅，蹦蹦跳跳地在她后面追赶。"咱们去来点儿咖啡和蛋糕，"他热切地叫着，"眼下，酒吧间里已经开始供应了。"他舔舔嘴唇。

两个打扮得过火的古巴女人，一看就知道是干那一行的，在船启航前一个钟头，就在酒吧间里玩开纸牌了。她们架着腿，露出扑着粉的膝盖；大腿上穿着卷口的薄丝袜。她们丰满的、猩红的嘴里叼着沾着红渍子的烟卷，烟向她们眯成一条缝的眼睛和浓密地卷起的眼睫毛里袅袅上升。年纪大的那一个是个气派十足的美人；年纪比较轻的那个小一些、瘦一些，显然身子虚弱。

她聚精会神地打量着另一个，打着牌，好像她简直不敢赢似的。那个走起路来慢腾腾的高个子得克萨斯年轻人，他名叫威廉·丹尼，走进来，坐在酒吧柜的一个角落里，用密切注意的、会意的眼光看着她们。两位女士不睬他；尽管她们在打牌的时候，时不时地停下来抿一小口彩虹酒[①]，傲慢地向着拥挤然而不失为舒适的酒吧间瞟上一眼，但是她们一次也没有向丹尼瞟过一眼；他觉得那是对他个人的冷落。他砰砰砰地敲酒吧柜，好像在叫服务员，眼睛仍然盯着她们看，脸上浮出一丝恶意的微笑。辣椒女王。他知道这路货。他不是白白地在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过了他的大多数日子的。在他看来，她们不是呱呱叫的货。他又吵闹地敲起来。

"你要的啤酒已经送来了，先生，"服务员说。"请问，还要什么吗？"

两位女士这时瞟了他一眼，她们轻蔑的眼光停留在他身上，好像他是个在酒吧间里闹事的无赖醉鬼。他的盯着看的眼光颤抖了，他的微笑不见了；他垂下脑袋，拿起有柄的大啤酒杯，喝酒，点上一支烟卷，探出身去，仔细打量自己的皮鞋，在兜里胡乱找手绢，手绢不在身上，最后他猛地冲出门去，来到室外，像是一个有急事的人似的。不过，看来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没有多少事情可做，除非回到他的房舱去，打开行李，整理一些东西。倒不如着手安顿下来。

为了在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土地上保持自己这个人不走样，他所作的种种努力，已经把他累得几乎筋疲力尽了。他感到

---

① 一种在杯中按酒的不同比重形成不同色层的鸡尾酒。

自己受到挑战,为了在每一个各别的遭遇中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他却被他自己的重要性究竟应该以何种面目出现,完全闹糊涂了。这个问题不是第一回呈现,但是在他抵达维拉克鲁斯后变得极为尖锐了。他父亲在那个位于边界上的小城[1]里是一个显赫的公民,当过许多年市长,是个拥有当地房地产的有钱人,下层阶级由墨西哥人和黑人组成,这就是说,浑身油腻的乡巴佬和黑鬼[2],还有几个够不上注意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一生下来就具有种族和阶级的优越性,他一向完全依靠这种优越性,受到法律和风俗的支持。在维拉克鲁斯,他的周围尽是沿海一带的黑人-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混合的、好斗的黄眼睛人;他从来没有找麻烦去学他们的语言,不过他听了一辈子;他采用正当的白人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呢,用毫不含糊的顶撞回答他。他开始的时候,思想倒是挺开通的:归根结蒂,这是他们的国家,尽管确实脏得很,他们喜欢就行——他打算待在那儿的时候,对他们好生相待。他几乎马上被迫认识到他的错误;他对他们以礼相待的时候,他们认为他是在居高临下地装出一副和气相;他完全合法地下达一个命令的时候,他们会让他明白他在试着把他们像奴隶那样对待;要是他漠不关心,听凭事情发展的话,他们就会瞧不起他,捉弄他。得了,他妈的,他们是下等人——只要瞧瞧他们就行了,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让彼此的隔膜消除一小会儿是没有用的。在移民局,他叫那个小个子办事员潘乔,就像他回家的时候叫一个出租汽车驾驶员迈克或者叫一个火车站搬运工乔治那样,是一种亲切的表示。那个小个子黑鬼——所有沿海

① 指布朗斯维尔,该城是美国和墨西哥交界的边境城市。

② 这是美国白人对墨西哥人和黑人带有侮辱意味的称呼。

地区的墨西哥人都有黑人血统,有人跟他说过——浑身僵住了,好像他被人触及身上敏感部位似的,脸涨得成紫色,眼睛通红。他盯着丹尼看,用他的难懂的方言说着又短又快的话,接着用纯正的英语和气地请丹尼坐几分钟,直到文件填好为止。丹尼,像个蠢货,坐在那儿浑身直淌汗,那个办事员在为长长一溜儿比他进来得迟的人办事的时候,那些苍蝇一直在他面前发出嗡嗡的叫声。他终于渐渐感觉到他在被耍弄。不过,这使他懂得了怎么办。他站起身来,走到队伍的最前面,插到办事员面前,非常清楚而缓慢地说:"我现在就要文件。"那个办事员随即取出文件,盖上印,递给他,甚至不瞅丹尼一眼。这应该是他首先干的事儿;下一回,他会知道了。

打开他的房舱门,他看到三个名字,而不是两个。戴维·斯科特先生,卡片上写着。威廉·丹尼先生,还有出人意料的卡尔·格洛肯先生。他望进去,看到一个拥挤的场面。一个中等身材、紧绷着脸的小伙子在用散发出似乎是石炭酸气味的东西在擦洗脸盆。他刚才看到过他跟一个穿着蓝裤子的漂亮姑娘在维拉克鲁斯晃悠。有两个陌生的提箱和一个磨损了的皮袋子摆在丹尼的卧铺上,下铺。他的船票上规定是下铺;他要的也是下铺,想要让他吃亏上当可不行。那个小伙子很快地抬了抬眼,说:"你好。"

"还可以,"丹尼说,跨进一步。那个年轻人继续擦洗脸盆。格洛肯先生坐在搁脚凳上,在一个制作粗劣的粗呢袋子里乱摸盛着的东西。他是丹尼看到过的状况最严重的残疾人,也许只有维拉克鲁斯广场上那个缺胳膊少腿的乞丐除外。他弯着的身子离地板是那么近,他的两条长胳膊能比他的伸开的腿伸得更远。他带着抱歉的神情伸直身子站着,差不多四英尺高,他的哀

伤的长脸在跟他脑袋一样高的驼背里转动，接着倒退到那个下铺的没有被行李占着的另一头坐下。“我会马上挪走的，”他说，脸上浮起痛苦的微笑。接着，他在行李中间床垫边上放松身子躺下去，看来他好像要昏过去似的。戴维·斯科特和威廉·丹尼交换着不乐意的、会意的眼神：他们明摆着摆脱不了这个家伙，眼下也找不出有什么法子。

“咱们还是叫服务员的好，”戴维·斯科特说。

格洛肯先生睁开眼睛，摇摇头，有气无力地摇摇他的一只长手。“别，别，”他用干巴巴的、没精打采的声音说，“你们别麻烦了。这没什么。我只是休息一下。”

“好吧，再见，”丹尼说，一边退出去，“我过一会儿来。”

“嘿，让我来把这些挪走，”戴维一边说，一边拿起提箱。铺位下没有容得下提箱的地方。丹尼的行李已经摆在那儿了。壁橱太小，也放不进。他暂时把它们放在长沙发上。

格洛肯先生说：“我不该待在这儿的。我的是上铺，可我怎么才能上去呢？”

戴维说：“你睡沙发床，我来睡上铺。”

“我不知道我怎么睡在那儿，它这么窄，”格洛肯先生说。戴维用睡椅的阔度衡量着那个奇形怪状的身子的弧度，痛苦地懂得了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的眼睛不看他们两人，说：“你还是睡你的铺位的好——你认为好吗？”他跟丹尼说。

戴维在找一个盛牙齿的玻璃杯的时候，一片寂静。

尽管丹尼的船票明白无误地规定是第一号铺位，他大方地让格洛肯先生睡下铺，叫戴维吃了一惊；格洛肯先生呢，表示热切的感谢，接受了。

格洛肯先生几乎马上睡着了。他侧睡着，面对灯光，弯着的

膝盖抵着下巴，身子贴近床边，腾出地方来放他的弯曲的脊骨。他的稀疏、干枯的头发凌乱得像被阳光晒焦了的玉米须子，死气沉沉的忧郁表情笼罩着他那张畸形的大脸。他的皮鞋尖向上跷着，两只鞋跟上都打着掌儿。

戴维注意到丹尼的那些杂乱的小东西已经占去洗脸盆上面那个小架子的大部分地方。丹尼一上船就忙着梳洗，把房舱里弄得乱糟糟的，好像他在自己的家里似的。"吃酵母素，"戴维在心里说；他不但深切地感到事情出了错，还产生了厌恶的情绪。他在墨西哥得到那个售票员的保证，每个房舱里只有两个乘客。"抽抽烟斗，看看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书。"他从躺椅上取出一本有很多插图的布面书，书名叫《作为精神预防法的性娱乐面面观》，还有一个副题"真正生活幸福的指南"。"耶稣啊，"戴维说。

消毒剂的气味并不能把另外的脏衣服的冲鼻子的恶臭、格洛肯先生的皮鞋的酸臭、房舱里原来有的霉味压下去。船在海港外遇到第一阵波浪，微微颠簸。戴维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他的脸看来有点泛绿；他感到头晕；他脚底下的地板看得出在倒立起来；他不由自主地要呕吐。他赶紧向门口跑去，差一点没在格洛肯先生的粗呢袋上绊倒，往上甲板直奔去。又冒起一阵怒火：答应给他一个在上层甲板上的房舱的，但是事实上，他是在C甲板上，没有窗，只有一个舷窗。

一阵阵温暖、柔和的风吹在他的脸上像柔和的水汽，清新、叫人舒畅，而且很潮湿。倾斜得很低的黄昏的太阳，在海中投入一道道光芒。海洋深处是深蓝色的，海面上是清澈的绿色，带着一道道长长的白色。戴维看到珍妮·布朗向他慢悠悠地走过来；他们分手去找各自的房舱后，这还是第一次会面哩。她已经

换掉蓝长裤，换上一身白亚麻布连衣裙，白皮凉鞋，没有穿袜子；她跟一个男人在一起走，一个陌生人——戴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好像他是老朋友似的。他痛苦地注意到，那个男人长得好看，却显出一副叫人讨厌的派头，像粗花呢茄克衫，或者是威士忌的广告，有一张典型的沾沾自喜、自命不凡的德国人的脸。珍妮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从哪儿和怎样找到他的呢？他站在栏杆旁，假装没有看到他们，然后在他们走近的时候，他希望，恰巧转过身去。

“嗨，喂——戴维吗？”珍妮心不在焉地说、显出含含糊糊、似曾相识的神情。“你好吗？”接着，他们没有站停，走过去了。

她的淡褐色的大眼睛里闪射出他最熟悉的盲目兴奋的神情；她可能已经在谈论最属于个人的事情了，说出她的想法，尽管那些想法不怎么高明，因为甚至珍妮在看来好像聪明或者真诚的时候，他仍然不信任她的女人的头脑，天生是别有用心和看不清真相的；毫无疑问，她在问一些早就想好的、引导那个男人谈他自己的问题，蓄意引诱他上当，在一些小事情上信任她，向她吐露；将来在需要的时候，她可以用来作为武器攻击他。戴维已经感觉到她正在构造一个对那个愚蠢的外国人不利的情况；等吵架的时候一来到，她早已准备得妥妥当当了。他望着她的娇小、匀称的身段，像一尊小小的古典雕像那样和谐；圆脑袋、黑发髻，有点拘谨、端庄的脚步，这些是用来掩盖或者迷惑一切关于珍妮的情况的，而他却认为他了解她的一切哩。看她的脚步，她可能是一个古板、娇小的教师，牢记着她必须挺直肩膀，屁股不可以撅出。

戴维看看表，打定主意，是喝这一天的第一杯酒的时候了——他近来生活中老盼着这个时刻——随即走进酒吧间，一

下子就感到被他讨厌的海洋所包围，而且被闷得透不过气来，海洋使心中充满了一种暗藏着的、深沉的恐怖。没有地方，压根儿没有地方可去。

这次异想天开地向欧洲出逃，整个儿是珍妮的主意；他压根儿没有离开墨西哥的打算，但是他跟往常一样被她牵着鼻子走。不过，并没有到百依百顺的程度，他的第一杯威士忌开始在手里的时候，他深思了。她以为他的同意是理所当然的，计划首先是去法国；他马上打定主意，他要是得上欧洲去的话，是去西班牙。他们为这件事情不可开交地吵过两三回，然后互相妥协去德国，他们两人可谁都不要看德国哩。那就是说，他们从三根不同长度的写着地名的吸管中抽出一根——他握着那些吸管，由珍妮抽——抽出来的最短的那根，写着德国。他们都万分失望，又吵起来，然后都喝得有点过头，接着就作爱，狠狠地干了半宿，好像是对任何使他们一直合不拢的东西怀着报复的怒火似的，可这一切什么都解决不了。他们两人都顽固地坚持这个偶然的决定，所以他们上这儿来了——然而，尽管到了这个地步，珍妮早就计划好了。她有一个下午高高兴兴地宣布，他们要是改变主意的话，仍然可以在比戈[①] 的法国领事得到去法国的签证。那个在德国北方劳埃德保险社的德国船代理人向她赌咒发誓地说，这是事实。

"请求批准就在比戈上岸去西班牙怎么样？"戴维问。

"我不去西班牙，记得吗？"珍妮说。

好吧，她要是感到还是掌握着王牌更好的话，由她就是。她要是喜欢上法国去的话，可以去嘛。他要去西班牙。到时候，她

---

① 比戈(Vigo)：西班牙西北部港市。

会发现，她是不是要完全由着她的性子办。

"*Bitte*[1]，"特雷德韦尔太太腼腆地想着她不妨开始温习一下她的德语，跟一个身材矮小、圆滚滚的女人说；那个女人梳着光亮的发辫，戴着金项链，独自个儿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喝茶。只有她的对面有一张空椅子。酒吧间里相当拥挤，看来充满节日气氛，但是寂静无声的场面却显得相当怪。甚至那些分明有种种关系的人都坐着，默不作声，好像跟陌生人在一起似的。

一阵亲切但是茫然的微笑在那张胖胖的、皮肤滋润而五官和善的脸上展现。一只不难看的白手温和地举起来了，手掌向外。"别，别，"她说，"别麻烦你自己。我讲英语讲了多年了。我甚至教英语——请坐吧——在瓜达拉哈拉[2] 的德国学校里教英语。我丈夫也在那儿教书。不过是教数学。"

"请来杯茶，"特雷德韦尔太太跟服务员说。她已经换掉了深蓝连衣裙，换上了淡灰色的，袖子更短了；她的胳膊上那个难看的大伤痕乌青相当深。

"我是奥托·施米特太太，"那个身材圆滚滚的女人说，一边搅着她的茶，又放了点糖。"我是年轻的时候从纽伦堡[3] 上这儿来的，现在终于回那儿去了。那本来应该是我的巨大的幸福，我丈夫盼望了好久的欢乐，可是现在，归根结蒂只是悲伤和失望；我忍不住——尽管我知道这是罪孽——有时候问自己：什么是生活，归根结蒂，就是这样吗？"她用不带抱怨意味的低声说，

---

① 德语，"请求"。此处有"请允许我坐下"之意。

② 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墨西哥西部城市。

③ 纽伦堡（Nürnberg）：德国东南部城市。

但是好像她在希望哪怕是通过偶然的相识马上来确认她自身的悲痛遭遇是唯一值得知道的、极为重要的事实似的。她的淡蓝的眼睛明显地在乞求同情。

特雷德韦尔太太感到心头一阵预感不祥的刺痛，不由得打了个冷战。"甚至在这儿也会遇到，"她想。"真是躲避不了。我在这次航行中要听人说伤心事了，毫无疑问，我要在航行结束以前坐下来，跟人号啕大哭了。好吧，这是一个好开头儿。"

"你上哪儿去?"施米特太太说，她停顿了足够的时间，希望那个会引出她那个悲痛的遭遇的问题提出来，但是没有提。

"巴黎去，"特雷德韦尔太太说，"回巴黎。"

"啊，你只是去墨西哥观光的?"

"对。"

"你在那儿有朋友?"

"没有。"

施米特太太的盯着看的眼光转到特雷德韦尔太太的胳膊上。"你把你自己伤得不轻，留下了这个乌青块，"她微微带着兴趣说。

特雷德韦尔太太说："叫人吃惊的是，一个要饭的女人拧了我。"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周济她，"特雷德韦尔太太说，第一次想到那次拒绝给钱听起来简直是自私和愚蠢得异乎寻常，就平铺直叙地说了出来。在墨西哥，没有一个正派人会拒绝给乞丐钱；跟她认识的每个人一样，她习惯上带着一些铜币，准备着给他们的。那人不是要饭的，而是一个蛮横的吉卜赛女人——在胳膊肘上来一下子！不过，对她来说，这整个事情，不知怎么的，真叫人害

臊;她怎么能让一个那样的下等人吓得愣在那儿呢？这事儿是没法解释的，哪怕是对她自己。“我自然不指望有哪一个会相信，”她一边说，一边挑了一片薄脆饼干就茶。

“干吗不指望呢？”施米特太太孩子气地问。

“得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这我知道，”特雷德韦尔太太说，“可是我总是发现自己在想，我自己也不信。”嗨，她干吗要说这些呢？这给问更多的“为什么”和“为什么不呢”开了一个口子。她不自在地东张西望，马上看到酒吧间的另一面那个美国姑娘珍妮·布朗已经跟船上那个唯一容貌像样的男人坐在一起了，他们面前都摆着鸡尾酒。她把眼光转回到她对面这个乏味的小女人身上，不得不承认这次航行和这个社交圈跟其他任何一个一样，是长时间的厌烦，没法抛弃，没法反对或者不睬，但是可以轻手轻脚地，一点一点地，一刹那一刹那地逃避，她会在逃避这个行动——这种逃避的行动使她有一种短暂的隐身的幻觉——中，在厌烦中找到一刹那间松一口气的缝隙。

“我们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施米特太太带着平心静气、确信无疑的态度说。“我丈夫——我们盼了多久一起回纽伦堡啊？可现在我独自个儿去，虽然他的棺材也在这艘船上。啊，一想到这，我就透不过气来！我丈夫是在六个礼拜加两天前早晨七点去世的……”

死啊死的，说个没完，特雷德韦尔太太想，对这种注重情感的人，除了死以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影响。没有什么可能穿透那层脂肪，触及活生生的神经。不过，我不得不说话啊。“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她说，随即震惊地发现，尽管她的想法不友好，她的话倒是认真的，她同情这个女人的悲伤的心情，还有那死亡，就在她们身旁桌子前，死亡是她们共有的。

施米特太太的柔软的嘴的两个嘴角耷拉下来了。她搅着她的茶，一声不吭。她的眼睑变成粉红色。她既然吃下了那块裹着粉红糖衣的同情的茶点，马上就沉浸在她自己的同外界隔绝的奢侈的悲伤里。特雷德韦尔太太剩下一半茶没有喝，就悄悄地开始她这次航行的第一次出逃。

她在回房舱的路上，用同样的声调，带着同样的微笑，跟每个人说话和微笑：跟船医说，注意到他那个潇洒的、陈旧的决斗伤疤[①]；跟那个褐色头发的年轻的高级船员说，她不知道他的姓名和职务，而且也不会费心思去记住（不过，在航行结束以前，就是那个年轻的高级船员会一本正经地吻她）；跟一个脸上带着热切神情、穿着衣带束得很紧的衣服的女服务员说话；气势汹汹地跟一个小男服务员说话，他用被冒犯的眼光回瞪着她看。她觉得房舱门上她的姓名下面那个姓名太有趣了，不可能带来坏运气的：利齐·斯波肯基克小姐：窥探的幽灵[②]？——她有点高兴地想着，船上有那么许多看来不会有大出息的女人，不知道她可能是哪一个。

稍后，她在她的小壁橱的那个狭窄的架子上整理她的东西，捋平盖在看样子不牢的衣服上的各种颜色的薄纸，抖开打褶的绸衣服，把金、银和缎子的拖鞋排成一溜儿，她又把头埋在衣服堆里微笑了；这时候，有人进来了，她没有转过身去，说："Grüss Gott[③]！"原来是那个声调尖锐的高个子姑娘——那个讨厌透顶

① 旧时有一些好勇斗狠的德国男青年无缘无故地决斗，在脸上留下伤痕，表示勇敢。

② 斯波肯基克这个姓的发音同窥探的幽灵在英语中发音有点相近，引起了特雷德韦尔太太的联想。

③ 德语，"你好！"

的小胖子的游戏伙伴。特雷德韦尔太太浑身的神经轻微地哆嗦了一下，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小小的冷战。她甚至更亲切地微笑了，没有被人看到，接着很专心地拾掇着东西。

斯波肯基克小姐在房间里短短地打了一个转，在混浊的空气中混合进了一股科隆香水的麝香味儿，然后走掉了，门也没有关。特雷德韦尔太太关上门，把斜对面那个房舱内的说话声音关在门外，那个房舱门上的姓名卡上写着：鲍姆格特纳。

那个叫鲍姆格特纳的女人正在精力旺盛地排揎一个在表示不满的、声音软弱的小男孩。啊，家庭生活，良好、健康的德国人的家庭生活，特雷德韦尔太太高兴地想着。一想到这里，特雷德韦尔太太感到心里闷得透不过气来，把头伸出舷窗，深深地呼吸。

"妈，"汉斯坐在长沙发边上，避免挡她的道儿，等到有胆子开口，又说了，"妈，我可以脱掉我的衣服吗？"

鲍姆格特纳太太双手捏成拳头，在他的脑袋上面晃晃。"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她说，又恼火了，"在我给你另外的衣服穿以前，你不能脱掉身上的衣服？现在我没有时间给你。别再问我。"

那个孩子裹在缝得密密麻麻、绣着许多花纹的鹿皮服——那是一件给那个寒冷的山区里的人穿的墨西哥牛仔装——里，给热出来的疹子和含有盐分的汗水折磨得浑身发痒，不断扭动着身子。"你得穿着你现在穿着的衣服，等我打开你的行李再换，"她固执地跟他说，继续寻找她丈夫的衬衫。"我样样都得干，可我不能一下子样样都干。"她把火气出在他身上。"别出声，要不，我就要惩治你！"她举起手，手掌摊开着，气势汹汹。

他瘫倒了，抽抽搭搭，浑身淌汗；他的皮长裤的皱纹上有一道道深色的水渍子。“我要死了，”他用快要昏过去的声调跟她说，他的苍白皮肤上的雀斑看起来好像一个个碘酒印子。

“要死了！”他母亲轻蔑地说。“像你这么个大男孩竟然这么胡说八道。等你爹来看你这个模样吧。”她甚至在匆忙和不方便中，也有条不紊地在一层层折叠的衣物中搜寻，有时候停下来，把她的潮湿的头发从她的额头上推开。她也皮肤苍白，松弛，脊背上和胳肢窝里直淌汗；透过她的深色薄料子的衣服，她的两条胳膊湿漉漉地闪闪发亮。她可以感觉到汗水从她的大腿上直淌下来。“我想，你以为你妈不是也很累不是也在受罪吗？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受罪吗？别哭哭啼啼地诉苦，吵得我更加烦恼了；从那儿站起来，别哭鼻子了，帮我拾掇这些手提箱吧。”

“难道我只脱掉茄克衫也不可以吗？”他不存希望地坚持着说，用手背擦擦鼻子，不由自主地又掉眼泪了。

“好吧——就脱掉吧，”她说。“我看你仍然还是个娃娃，要给你一个奶瓶喂你吃哩——一个有橡皮奶头、盛着牛奶和糖的奶瓶；这就是你的晚饭，没有别的了，”她接着说，开始对她自己的狠心感到乐趣，这是一种愉快的感觉：尽管他在茄克衫这件事情上赢了，她能损害他的自尊心。他压根儿没有自尊心——他马上脱掉茄克衫，从舷窗外吹进来的微风吹遍他的全身，遍体舒适地起了鸡皮疙瘩。他的脸色开朗了；他感激地盯着他母亲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表示幸福。

“等着吧，我要告诉你爹你是多么折磨我，”她说，不过声音比较柔和，“我要是再看见你老是哭哭啼啼的话，你知道你会尝到什么滋味的。”

他怯头怯脑地坐在躺椅一头的角落里，巴望着体贴的对待，

盼望他母亲不久又变得美丽、善良。她母亲已经变成一个眉头紧皱、老爱大声斥责的陌生人了，在他最意料不到的时候对他大发脾气，打他的手，吓唬他，看来好像恨他似的。他耷拉着脑袋，双手垂在身旁，他从淡淡的、稀疏的眉毛下盯着看，不是害怕，而是在等。她站起身来，把她的裙子拉拉直，眼光锐利地看着他，眼中充满着怜悯和悔恨的神情。

"得了，我的小乖乖，我的汉斯，"她温柔地说，亲了亲她的一个手指头，按在他额头上。"嘿，好好地去洗洗脸和手，也洗洗手腕和脖子吧；穿上你的针织的套衫和短裤；咱们去喝一些冰镇紫莓汁。不过，快些。我在外边等。"好像她从来没有发过火似的，对他微笑着，亲切极了。汉斯悲喜交集，心情混乱，差一点没又哭起来，但是脸上的凉水止住了他的眼泪。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在 A 甲板上，利用她的同舱的乘客不在这个优势建立起占用空间和挑选铺位的优先权和特权。她的船票上表明上铺，但是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早就仔细地打量过那个小小的奥托·施米特太太，马上发觉情况是容易控制的。她要人拿来两个花瓶，小心谨慎地取出两大束她自己通知人送来的鲜花：一束是淡粉红的玫瑰，另一束是栀子花，那是她在维拉克鲁斯买的，裹在湿棉花里，还有用银色缎带上拴着的卡片："给我最亲爱的南内赖尔，约翰赠"，"向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致意。卡尔·冯·埃特勒"。

鲜花看来挺好，而且这不真正是一个骗局，因为要不是这两位很有意思的朋友已经去世这个可悲的情况的话，他们本来是会在这样的场合，或者许多其他的场合，送花给她的——再说，他们两人新近才去世——她还不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在

人间，所以这两束鲜花使她有他们仍然活着的感觉。从前，他们送的还不止是鲜花哩，愿上帝记住他们两人。她在自己胸前画了几次十字，尽管她是路德宗的信徒[①]。这是一个她觉得适合她的手势，会防止她交恶运。

她摆出两瓶香水：一个是银瓶，另一个是雕花水晶玻璃瓶，名叫"阿拉伯花园"和"情人的纪念品"，还把一个精致的缝出花纹的绸袋子拴在洗脸盆的右边，那是用来盛她的银背的刷子和镜子、梳子、绞指甲刀和鞋拔的，右边是最方便的地方。她梳好头发，慢腾腾地换了衣服。她提早上船，避免讨厌地跟拥挤的人群混在一起，那些人看来风度低下。她拿着镜子，赞赏地看着她的侧面像。她有许多次被称为美人，这是她应得的赞美。不管你怎么说，反正她现在还美。她坐了一会儿，打开一本镀金的、印有浮雕图案的佛罗伦萨红皮面笔记本，本子上附有一支金笔，开始写起来：

"所以从某个方面来看，让我承认，这是历险——因为人的一生不是一次历险吗？——还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结束，然而没有事情向更坏方面转变。我确实还可能在历险中看到我们的种族的指导一切的意志。德国女人不该通过婚姻成为深色皮肤的种族的一员，哪怕那个意中人有高贵的西班牙血统，是统治阶层人士，有足够的财富……西班牙经历过那些灾难的世纪；在那些世纪中，犹太人和摩尔人[②] 的血统当然一定在不知不觉中流进这个国家——谁知道还有别的情况呢？我一时有了这个想

---

① 路德宗是马丁·路德创建的脱离罗马教会的基督教新宗，没有在自己胸前画十字的旧宗（在我国称天主教）的仪式。

② 指非洲西北部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公元8世纪，摩尔人成为伊斯兰教徒，进入并统治西班牙。

法，毫无疑问，这是我应该感到害羞的弱点。然而，既然我处在种种外国人的影响、朋友们——那些善良的德国人，他们的意见我是尊重的——的好言好语的劝导的包围中，既然我独自个儿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手头又有点拮据，也许我不应该受到太严厉的指责。归根结蒂，我是个女人，我需要一个丈夫的牢靠而温柔的指引，他的权威将会支持我，他的原则将是我的……”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停住笔。灵感熄灭了，下一个词儿不会来了。她清楚地知道，看任何问题永远只有一个靠得住的方法；她总是像她受到的教导那样，像她应该的那样，精确地看每样东西。她已经说过，想过这一切许多次，为什么要再说，再想呢？她闭上眼，陷人白日梦，梦中出现堂佩德罗那张长长的、黑黝黝、严肃而仁慈的脸，显出孤傲、高贵的神情；太阳穴上的头发稍微有点花白，他身上散发出西班牙人的财富和西班牙人的骄傲的光辉，那种光辉是结实地以一家墨西哥大酿酒厂为基础的——啊，这一切为什么又浮现出来折磨我呢？为什么一度看来可能他会向她求婚呢？她的先夫有几个表弟在墨西哥城，也都是酿酒商，认为他会求婚的；他的亲爱的朋友，领事，施通普芬先生，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这事儿准会发生；她自己甚至已经想到挑选——在她的心中——结婚的请柬了……她稍微咬紧牙齿，睁开眼睛，合上笔记本。通知进晚餐的喇叭声带着英勇的声威响起来，好像在召唤英雄们奔赴战场似的。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马上站起身子。她眼中闪出女孩子的热切的亮光。她当然要坐在船长的那一桌上喽。

“啊，我的上帝啊，喇叭响了，咱们要去晚了，”胡滕教授太太跟她丈夫说，但是她仍然把一块洗澡毛巾托住贝贝的下巴。胡

滕教授先生用一些扯开的报纸在擦掉附近角落里的一堆呕吐物，可擦不干净。贝贝，他养的那条白毛大叭喇狗，面对着这个丢脸的景象，转动着眼睛，接着对着毛巾呕吐。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胡滕太太耐着性子绝望地说，“已经晕船了，咱们怎么办呢？”

“它以前晕船过，那是我们去尤卡坦[1]的时候，几乎一路上都在晕，而且一开始就发病，”那位教授说，一边卷起那些脏报纸，表情庄严仁慈，好像他在准备上课似的。“我们用不着害怕，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器官方面会有什么激烈的变化。它还是条小狗的时候，你要是记得的话，它就是很容易烦躁不安的，它只要受一丁点儿惊扰，就没法把奶瓶里的牛奶咽下去，它现在这个样子了，既然这个样子了，”教授断定地说，“不用说，它也许会越来越多地出现这一类症状，到咽气那一天为止。”

他妻子的苦恼是，既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会不会还会出现别的事情。“可我怎么能在它处在这样的状况中的时候把它撇下呢？”她问。她坐在地板上，好大一堆结实的肉，贝贝躺在她身旁，四条腿伸得直挺挺；一个人、一条狗，都没有一点办法。“在你回来前，我也起不来，”她提醒他，“我的膝盖……”

“你再怎么也不能不去进晚餐，”教授坚决地说。“我来代替你，待在它身旁，而你得去吃东西，要不，你会在这个夜晚的晚些时候，因为没有进晚餐，好生不自在的。”

“可是我亲爱的，这样，你就要挨饿了，想想看，”胡滕太太感激地说。

“小事一桩嘛，”她丈夫说。“事实上，我一点也不会挨饿的，

---

[1] 尤卡坦(Yucatán)：墨西哥一州，那里有玛雅文化古迹。

亲爱的凯特；一个人只少吃一餐，是不会挨饿的；他只是觉得肚子里有一点儿空，那倒并不总是最大的不幸。事实上，人可能四十天不进食品；我们现在已经用科学证实了《圣经》[1] 中的话。要是那个对象的身上长着肉，可供消耗，有大量的水，也许间歇性地有一点某种小小的刺激的话，我敢说，情况尤其是这样……话又说回来，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从最坏的方面看，你可以通知他们用一个盘子送一点吃的来给我。好一点的话，我们要是有一块干净毛巾拴在贝贝的下巴上，下巴底下填上许多报纸，它独自个儿会干得很好的，譬如说，在一个钟头里。"

胡滕太太点点头。她抬起贝贝的脑袋，仔细地打量着它。它看来似乎比较自在了。"别以为你的好爸爸和好妈妈在抛弃你，我的宝贝儿，"她用圆润的、妈妈的声调说。"我们只去一会儿，"教授在她背后用两条前胳膊钩在她的胳肢窝底下，用由于长期锻炼而显得灵活的手势，把她拉起来，在她站稳身子的时候，扶住她，免得她摇晃，然后按照他自己刚才提的建议，实行那些照顾贝贝的措施，它看来好像对他们或者对它周围的情况简直毫不关心。

"啊，"他妻子叹了一口气，探出头去，在他垂下的肩头上靠了短短一会儿，"真是困难得很啊。"

"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教授安慰地说。不过，贝贝跟往常一样，将成为一个问题，哪怕不是一个十足地道的累赘的话，这他可以看到。他为心中涌出一个强硬的想法而责备自己，但是他没法否认。"在汤冷以前，我们就走，"他内疚地带着虚假的欢

---

① 此处暗指拉撒路在坟墓中埋了4天后复活。典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1章。但是胡滕把4天改成了40天。

乐叫喊。

大个子姑娘埃尔莎·吕茨跟她的父母海因里希·吕茨先生和太太沉闷而悠闲地在甲板上第一次散步。埃尔莎比她的瘦长的父母长得高,但是,走在他们中间,是他们的听话的孩子,握着他们各自的一只手。他们停住脚,透过铁栅栏向下面盯着看,欣赏到一片统舱乘客就餐地区的景象,一溜溜上而摆着食物的、用支架支起的木板桌,桌旁排着一溜溜长椅。烧菜的味儿热气腾腾地升上来;人们慢腾腾地走进来,各自坐下。他们认出那个穿樱桃红衬衫的胖子的鼓起的脊背和垂下的脑袋,已经在打起精神大吃特吃了,他自己动手,随心所欲地从他的盆子前而那些摆成半圆形的椭圆形大盘里拿种种丰盛的食物。

"嘿,上帝保佑我们,"吕茨先生有点惊奇地说,接着戴上眼镜,可以看得清楚些。"嗨,他们要是像这样地准备饭菜的话,那怎么可能赚什么钱呢?"他是瑞士人,祖上许多代都是旅馆老板;他自己以前也在墨西哥开过一家旅馆;他的兴趣完全是出于他的职业。

"炸土豆,"他咕哝着说,"他盆子里准有一磅哩。整整一个炖猪脚,加上炸洋葱、糖醋红叶包心菜、干豌豆泥——不错,说真的,没有什么价钱贵的东西,然而也都多少值些钱啊。还有咖啡。加上水果和烤苹果卷[①]——不行,他们没法一直维持这个水平不亏本。瞧那个家伙狼吞虎咽的模样!看着他吃,我的肚子也饿了。"

---

① 烤苹果卷(Apfelstrudel):一种德国点心,用薄面卷填入苹果、葡萄干、糖、黄油和柠檬汁,烘烤而成。

他妻子，一个矮胖而模样不怎样的女人，干枯、没有亮光的发髻上密密麻麻地夹着铁丝发夹，带着她习惯的表情望着这个情景，那种表情好久以前就已经固定了，是始终不变的不满和正当的发脾气的混合。“这不过是在开始的时候装装门面罢了，”她发表议论。“在航行结束以前，他们会开始在我们身上节约花销的。新开的饭庄，”他说，“亏本卖。”

“哈，哈，”她丈夫哈哈大笑，“你的意思是说，第一回上门的顾客吃得精光。”他女儿的笑声孝顺地混在他的笑声中，不过有一点儿不自在；他妻子轻蔑地对待这个笑话——它也应该受到轻蔑——仍然沉着脸，让他确切地看到她对他的胡说八道是什么想法。他继续哈哈发笑，让她看到，没有她，他也能欣赏他的小小的笑话。

“可是爸爸，”埃尔莎说，又靠在铁栅栏上，“你有没有注意到另一件事儿？三等舱几乎是空的，只有十几个乘客，然而他们不卖三等票给我们。你不认为墨西哥城的那个办事员跟我们说没有空的三等舱给我们是错的吗？”

“嘿，可不是，”做爸爸的承认，“从一个方面说。从另一方面说，买卖做得精嘛。我们还是来啦，乘了头等舱，他们已经在我们身上多赚了三百五十多块了；得了，你把那笔钱换成德国马克，着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哩……”

“不过，除此以外，一定还有别的理由，”埃尔莎说。

“啊，可不是，总是有许多充足的理由，而且他们全都知道，用来欺骗咱们，”吕茨太太说。“我倒希望你可以在那些理由中学一些，由你自己用，”她跟她丈夫说；她的语调里流露出长年累月深深怀着的、始终没有平息的怨恨。三个人继续走过去，动作笨拙的一家人，眼睛直勾勾地向前看，由于有一些小小的忧虑而

显得神情黯淡。

“回答我一件事情，我可怜的妻子，”吕茨先生用温和的、讲道理的声音说，他知道这种声音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叫他妻子恼火。“我们在墨西哥，说到底，干得很糟吗？从这个糟字的任何意义上来说，怎么样？你不妨尽量发挥你的想象力，咱们能说是失败了吗？我不这么想。”

“你怎么想，我再也不在乎了，”吕茨太太说。

“哪怕是你吧，这话说得也有点儿过分了，”吕茨先生说。“不过，尽管这样，这并不能使我不想。有时候，也许你碰巧在想的时候，可能想到咱们眼下回家的情况，三个人都身体健康，有足够的钱，规规矩矩地挣来的，到圣加仑[1] 去开咱们的小旅馆。”

“可不是，经过了这么许多年以后，”他妻子愁眉苦脸地说。“可不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什么事情都不一样了，埃尔莎已经长大成人，对她的自己的同胞来说是个外国人了——啊，想想看，咱们要花多大的麻烦，让她在讲本国语言以前，首先要不讲西班牙语！可不是，不用说，现在咱们能体面地回去，经营买卖，觉得显赫。为的是什么呢？”

“说到觉得显赫，”吕茨先生说，“让我们等着瞧吧。”

“妈妈，”埃尔莎怯头怯脑地，想要改变话题，“跟我住同一个房舱的是跟那个长着浅色头发的小伙子一起上船的美国姑娘。我原以为他们结婚了，你说呢？不过，他住在一个房舱里，而她在另一个里。”

“我听到这一切，觉得真不是滋味，”她母亲严厉地说。“我

---

① 圣加仑(St. Gallen)：瑞士联邦东北部圣加仑州的首府。

本来希望你可能跟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人，一个可敬的女人，住在一起。我不喜欢那个姑娘的相貌或者行为。在街上穿着紧身裤，想想看。她真的跟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一起旅行吗？”

“这个，”埃尔莎看到这个话题不成功，含含糊糊地说，“我想是这样。不过，她毕竟住在另一个房舱里嘛。”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她母亲说。“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仔细听我说吧。你得一直疏远那个姑娘。哪怕是最小的事儿，也别听她的意见，别学她的样。用十足地道的冰冷的态度对待她，压根儿别跟她交往。不得让人看到跟她一起在甲板上。你跟很坏的伴儿搅合在一起了；我要想办法给你换个房舱。”

“不过，我会跟谁住在一起呢？”埃尔莎问。“另一个陌生人。”

“唉，是啊，”她母亲叹了一口气，在她周围东张西望，看形形色色的在他们身旁经过或者走近他们的女人。“唉，是啊，谁知道呢？也许一个比一个更糟！你只要听我话就行，就是这样！”

“是，妈妈，”埃尔莎专心和顺从地说。她父亲向她微笑，说：“这是我们的乖小女儿。你一定要总是按照你妈妈说的做。”

“可是爸爸，她换了一条裙子以后，看起来好像成了另一个人似的，压根儿不像是个美国人了。”

“尽管这样，还是别睬她，”吕茨太太说，摇摇头。“别忘了，她是美国人。不管她是什么模样。”

那个吹喇叭的人来到甲板上，吹出欢乐的喇叭声，招呼人去进晚餐。吕茨一家人马上脸向里面，加快脚步。在扶梯顶部，他们差一点被那些跳舞的西班牙人从背后挤倒，他们大模大样地闯过去，像一阵波浪那样在他们周围越过，一阵胳膊肘的波浪。吕茨一家人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那些西班牙人已经在船长那一

桌附近那张式样好看的桌子周围坐定了，而且在一个服务员还来不及找到那个供三个人用的小桌——不用说，是靠墙的，但是幸运地靠近一个舷窗——那两个六岁的双胞胎兄妹已经在扯一盆芹菜了。

“我高兴地看到他们已经洗过脸了，”吕茨太太说，带着早就显出来的不存希望的神情开始看餐桌上她的姓名卡，“不过，要是他们也洗了脖子的话，那么对周围的人来说，要显得顺眼些。我看得很清楚；他们的脖子都灰不溜秋的，被抹了好多的粉。粘得转动起来不灵活了。埃尔莎，你不知道，我干吗老是跟你说，洗干净你的脖子。还有你的手腕子；至于粉嘛——你希望你再怎么也别这么蠢。”

埃尔莎眼光向下，瞟着自己的鼻子，鼻子上的亮光折射进她的眼睛。她用手绢擦擦鼻子，小心谨慎地忍住叹气，什么话都不说。

餐厅拾掇得干净而闪闪发亮。桌上都摆着鲜花，还适当地陈列着一些干净的白餐巾和餐具。服务员们看来好像由于另一次航行的开始而受到鼓舞，显得精神饱满和神情兴奋；那群新来的乘客的脸上露出饥饿的神色，眼睛里却闪着克制和盼望的光芒。船长没有出场，但是舒曼医生站在他的餐桌旁迎接船长的客人，而且向他们解释，船长的习惯是，在航行的事关重大的最初时刻是在驾驶台上进晚餐的。

客人们都点点头，表示完全同意，并且感谢船长的这项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海上去的繁重的工作；在这些精选出来的客人中间进行的无非是沉着安详的交谈和自由自在的交往：胡滕教授先生和太太、里贝尔先生、利齐·斯波肯基克小姐、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奥托·施米特太太，和那位特雷德韦尔太太刚才看到他

跟珍妮·布朗坐在一起的"模样挺帅的"年轻人。他叫威廉·弗赖塔格,他们那伙人坐下以后,在轮流互报姓名的时候,他说过几回他的姓名。三分钟以后,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肯定他跟墨西哥的一家德国石油公司"有关系",已经结婚(实在可惜),而他就是在回曼海姆[1]接他年轻的妻子和她母亲的航行途中。里特斯多尔夫太太也马上断定,里贝尔先生相当粗鲁地横闯直撞和格格地发笑,配不上船长餐桌上的其他客人。施米特太太和胡滕夫妇在知道他们以前都是德国学校的教师,胡滕两口子在墨西哥城,马上互相友好起来。

里贝尔先生心情好极了,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对着利齐闪闪发亮,但是考虑到他处身其间的那些伴儿,神态不得不有所收敛,他建议请允许他请客,向全桌人士敬酒,作为一个良好的开头。其他的人无不万分乐意接受。酒端上来了,是尼尔斯泰因[2]真正的名牌多姆塔尔半干白葡萄酒,在墨西哥很难找到,找到了价钱也很贵,他们全都对它很想念,很喜欢,德国的美妙、优良、正宗的白葡萄酒,跟鲜花一样清香。他们闻着手中的冰凉的高脚玻璃杯,他们的眼睛湿润了,他们互相满脸笑意地看着。他们摸摸酒杯边缘,跟同桌的人碰杯,互相说一些祝愿健康和幸运的应酬话,喝酒。

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时刻更得体、更迷人、更亲切的了。他们畅开好得惊人的胃口,迫不及待地大嚼那些大块的德国菜。他们都在回家的途中,终于要回家了。他们在这艘船上,

---

① 曼海姆(Mannheim):德国南部城市。

② 尼尔斯泰因(Nierstein):德国莱茵河畔黑森林地区一小镇,此处以产葡萄酒闻名于世。

第一次有一个共同感觉：他们已经踩在一片神秘的祖国上了。他们吃饱以后，体力恢复，精神抖擞，时不时地停下来擦擦他们塞满了食物的嘴，默不作声地互相点点头。舒曼医生带着节制饮食的人的克制态度吃着，那样的人几乎不记得上一回是什么时候肚子真正饿过。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钦佩地向他瞟上一眼。这是他们可以看到的最高层次的、教养优秀的德国人，他的富于人情味的职业尊严更为他增添了光彩；他的漂亮的伤疤表示他进过一所了不起的大学，还表明他是勇敢和头脑冷静的：这么大一个伤疤，处理得这么完美，证明他早就懂得决斗的意义，那是衡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的标准。如果说他看起来有一点儿心不在焉、好像在想心事、不说话，那是他的权利；这种权利属于他作为船医的职责的重要性。

"猪蹄子，戴维宝贝儿，"珍妮·布朗说，三天来第一回又称呼戴维·斯科特他这个隐蔽的、特殊的名字。他的心情不怎么好——他想她可能还有几天对他来说不是珍妮天使——如果说曾经是过的话。不知磨损了多少神经组织，爱情还可能继续存在吗？还不知吵了多少回呢，还可能有爱情吗？

"我一直在水龙头和一切小标记上死背硬记德语，可是这些人几乎全都讲英语或者法语，或者两种都讲。你看到那个跟我一起散步过的家伙吗？就在那边——坐在船长的餐桌旁。那个剪成不可战胜的发式的人。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德国人，直到他告诉我……"

"长着那张脸？"戴维问。

"他的脸有什么不对头？"

"像德国人的。"

"戴维宝贝儿,你真不害臊!嘿,我要利用他练习我的德语,可是我说了第一句,他就受不了啦;我不得不说,他讲英语比我讲得好——确实是棒极了的英语。我以为也许他是在英国长大的,可是不对,他在柏林的学校里学的……嘿,我的瑞士姑娘——我跟你说过我跟那个大个子瑞士姑娘给塞在同一个房舱里吗?她穿着一件紧身胸衣,胸衣周围都是梭织花边。我敢肯定地说,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件……"

"我母亲以前常穿这种东西,"戴维说。

"戴维!你的意思是说,你母亲穿衣服的时候,你在偷看吗?"

"不,我常常坐在床中间,望着她。"

"噢,"珍妮说,"我的瑞士姑娘既讲西班牙语,又讲法语和英语,还讲一种她管它叫罗曼什语[①]的方言——德语就不用说了——而且她只有十八岁。她只跟我讲英语,尽管我的西班牙语跟她的确实不相上下。要是事情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我就找不到一点儿学会任何语言的机会了。"

"这些人不是典型的,"戴维说,"咱们也不是。只是在外国晃来晃去,在每一条边界线上换钱和换语言。咱们干着同样的事儿。瞧我吧,甚至还在学俄语哪……"

"可不是,瞧你吧,"珍妮赞赏地说。"可你甚至还从书本上学语法。我再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事儿。我没法学语法,那是沉闷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也觉得用不着。"

"你要是有时候能听到你自己的说话,就会觉得是用得着的。你说的那些话真的吓坏人,我是说在说西班牙语的时候。"

---

① 罗曼什语(Romansh):使用于瑞士东部和意大利北部的一种方言。

“你穿着那件蓝衬衫，看起来漂亮得像一幅画，宝贝儿，”珍妮说。“我希望没有吓坏你。我的上帝，我饿啦！维拉克鲁斯这时候不是死气沉沉吗？那座小城怎么啦？我原来对那地方有最温柔的记忆；现在我希望我再也不看见它了。”

“在我看来，它跟往常一样，”戴维说。“热、蟑螂，以及维拉克鲁斯人等等。”

“啊，不，”珍妮说，“我夜晚下雨后常去那儿散步，样样东西都洗得干干净净；素馨花和夜来香开得茂盛绚烂；刷着白灰泥的墙的颜色是很素净的。我会遇见那些没有预料到的广场、角落和喷泉。它们都结构妥帖，等待着人去画，而且没有一处的模样看来跟白天的是一样的。一扇扇窗都打开着；淡黄的灯光从窗内流出；一顶顶珠罗纱白蚊帐笼罩着一张张巨大的床；半裸着身子、半睡不醒的人们走来走去，已经进入梦境，或者坐在外边的小阳台上，享受乘风凉的乐趣。真可爱，戴维，我喜欢这些景象。人们看起来是这么友好和随和——人人都是这样。有一回，下起一场惊天动地、吓得人没命的暴雨，雷电交加，打中了我住的旅馆内离我的房间约摸二十英尺高的那个电梯竖井，差一点没把我打昏。真有趣！确实危险，可我没死。”

戴维对这些回忆冷静地、怀疑地表示不同意。“这些你以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说。

“我不希望说，”她说，“那不是挺乏味吗？不过，你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叫人愉快的回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回忆成是美的，至少有这么一回吧。”她轻松地停顿了一下，加上一句：“我可以肯定，你要是在场的话，那么，一切看起来都会不一样了。”她带着医生临床的注意态度望着他那张光滑、皮肤绷紧的脸；在他受到攻击的时候，他的脸

上是不流露出一丁点儿迹象的。

“当时，你是跟谁在一起呢，让你这么高兴？”

“没有人，”她温和地说。“我独自个儿在那儿；我按照自己的方式看那一切，没有人给我破坏它。”

“也没有遇上机会[1]。”

“没有。我乘一艘船从纽约出发的。我在船上待了美好的九天，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只跟餐厅里的服务员和女乘务员讲话。”

“他们应该感到荣幸，”戴维宝贝儿挖苦地说。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满意。

珍妮放下刀叉，喝了一小口水。“我不知道，”她神情严肃地跟他说，好像她在深深地思索一个重要的问题似的。“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在整个航程中跟你一起坐在这张桌子旁。至少，我对咱们有各自的房舱感到高兴。”

“我也是这样，”戴维马上说，眼睛里闪着阴冷的怒火。

接下来，他们两人都变得一声不吭了，对事情突然闹得这么不可收拾感到沮丧；知道这像一向那样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它也没有真正的开头。他们间的争吵就像是他们在踩踏车[2]，踩啊踩的，踩个没完，直踩得他们筋疲力尽，或者绝望为止。他继续憋着气吃东西；她又拿起叉。“你要是停嘴的话，我也停嘴，”她终于说。“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我再怎么也说不清。”

戴维知道，她表示让步，一半是她累了，另一半是她腻烦了，

---

① 此句照字面可译为“没有乘上船”，所以下文珍妮才会提及船。

② 踏车是古代惩罚囚犯的一种工具。

但是他对这次暂停还是表示感激。再说，她已经狠狠地给了他一下，心情一定感到舒坦些了。

他没有宽恕她；他会在某一天像他以前经常干的那样，反过来向她突然袭击，望着她变得苍白的脸；她一向知道报复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承认它的野蛮的公道原则。至少，她有点懂得互相报复的事儿，她并不指望始终被允许免遭毒手，而且他会想方设法地使她不指望，把这作为他的一部分事情。他感觉到他心中的冷静的情绪是一股他贮藏着的真正的力量，就对她微笑，那是一种一直使她神魂颠倒的甜蜜的神情，并伸出手去，热情地放在她的手上。

"珍妮天使，"他说。她顿时感到她的心——她坚决地相信，她的心能够感觉——有一点儿变软，羞怯地和不信任地；她知道，要是她让自己像戴维所说的那样，被"温柔地逮住"的话，戴维就可以和会对她干些什么。然而，她没法控制自己。她探出身去，说："你这位老兄啊，你！啊，让咱们尽一切努力快活吧！让咱们别败坏咱们一起的第一回航行，这可能是非常愉快的。我会尽力的，真的，戴维宝贝儿，我向你保证——让咱们努力。难道你不知道我爱你吗？"

"我拿不准，"戴维带着阴沉的温和态度说。她看来好像快要难以理解地掉泪了，她忍住了没掉泪，因为她知道戴维把她的啼哭看作只是在有作用的时刻使出的另一个女性的花招。他带着一丝保留的微笑注意看着她是不是会让步；然而，她以前还没有在公共场合吵闹过。她没有吵，反而也用微笑回答，拿起她的酒杯，伸出去，跟他碰杯。"*Salud*[①]，"她说。"*Salud*，"戴维说，接

① 西班牙语，"祝您健康"。

着他们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酒。

他们两人都对他们互相暴露出来的坏性子感到害臊；各自原来都希望，在他们初恋的日子里，给对方一个理想的形象，因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害怕暴露自己，害怕现出和学习对方的不可爱的东西，使他们变得不老实和狠心。在他们休战的时刻，两人都相信他们间的爱情是很纯洁和高尚的，就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只需要……只需要什么呢，确切地说，他们两人都暗暗地和各自地想要知道，却找不到回答。只是在这样的短短的时刻，他们在一起喝着和平相处的酒的时候，他们的身子才变得柔软和平静，他们在言归于好的气氛中自在地呼吸，对他们自己，还互相对对方用含糊的措辞发誓，要保持忠诚——对什么忠诚呢？对相互的爱情，或者尽力——但是戴维至少仍然独自个儿知道，尽力过得快活也许是他们一半的烦恼，或者说是一半烦恼的原因。另一半是——？

虽然白天仍然很亮，八月里的太阳刚浸入遥远的水平线下，在水面上投下一道火焰似的亮光，像是在轮船尾部留下的航迹中奔流着的油。那两个干那一行的小姐出现在甲板上，穿着一模一样的黑纱晚礼服，她们的优美、光滑的脊背闪闪发亮，露到皮带上面，她们的缀着宝石的凉鞋光芒闪烁。她们慢腾腾地踱过去，跟两个天主教神父面对面地遇上；他们也在慢腾腾地踱过来，他们的黑沉沉的能说会道的嘴紧紧闭着，他们的凶狠的眼睛盯着看他们的祈祷书。两位小姐必恭必敬地鞠躬；两位神父没有理睬，要不，也许没有看见她们。威廉·丹尼隔着安全的距离，跟在她们后面，时不时地停住脚，好像对海洋深处的什么东西感兴趣似的，他的喉结在轻微得几乎看不出地上下

晃动。那对新婚夫妇一起坐在帆布躺椅上,默不作声地眺望落日,他们的眼睛流露着出神和迷惑的神情,他们的手轻轻地握着。

那个墨西哥印第安保姆把刚生下不久的娃娃抱到他的母亲面前,她没有经验,用两条胳膊接过他,不知怎么办才好。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正好经过,虽然她从来没有生过孩子,而且始终对没有孩子表示高兴,却不惜利用她是个真正的女人的身分,出于本能,欣赏别的女人乐于奉献的做母亲的牺牲。她流露出对那个母亲亲切的同情的微笑,默不作声地,跪下了几秒钟,爱慕这个神圣而神秘的小生命,赞扬他的柔软的眉毛、柔和的嘴、可爱到极点的皮肤。他的母亲带着出于礼貌、心里却不情愿的微笑望着,心想她的儿子早已被宠够了,她希望人们别去睬他;她忘不了他在夜晚醒着大叫,在她累得要掉泪,只想睡觉的时候,像一头猪那样对她使劲拉拉扯扯。

"一个这么漂亮的小男孩,"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他是你第一个孩子吗?"

"啊,是啊,"做母亲的说,她的脸上闪现一丝恐怖的神情。

"一个良好的开头儿,"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将军。实际上是 El Generalissimo![1]"她听到她的德国朋友们说,每一个第二胎的墨西哥男人都是将军,或者立志要当将军,至少是自称为将军。

做母亲的终究没法抵制这种奉承,不管多么粗俗,多么德国式。El Generalissimo,真是的!多俗气;话得说回来,她知道她儿子了不起,她喜欢听到他受到夸赞,哪怕是用外国口音重得吓人

① 西班牙语,"最高统帅或总司令!"

的西班牙语。不知怎么的，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把谈话从娃娃引到母亲，开始说相当过得去的法语，这使那个墨西哥女人感到高兴，她为自己掌握那种语言感到骄傲。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非常满意地摸清，这位太太是墨西哥驻巴黎公使馆专员的妻子；她眼下正在去跟她丈夫相聚的途中；原来她前些日子不可能——“嘿，你能明白这是为什么，”——跟他丈夫在一起。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在乘客中间发现了一位外交界中的夫人，从最高的社交意义来说，对此感到欣慰；归根结蒂，有一个可以交往的人了。拿埃斯佩龙-查伟斯·德·奥尔特加夫人来说，她看来很快地陷入沉思，变得有点儿走神，也许在她的新状况中是完全自然的。最高统帅睁开眼睛，冲着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的脸摇摇拳头，像神似的打了个呵欠。他母亲皱了皱眉头，刚能被人察觉，恳求地说：“请别弄醒他。他还刚睡着。你要是能想象我们跟他在一起有多麻烦——肚子痛啊什么的！”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觉得受到数落，马上站起身来，用这么夸张的礼貌语言告别，这几乎掩饰不了她的举止粗鲁。这个小个子墨西哥女人可能终究并不特别明智，甚至也许并不特别有教养。对深色皮肤的种族的标准作出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虽然毫无疑问，他们有标准；甚至墨西哥的堂佩德罗，在作出了那些看来不可逆转的表示以后，却没有向她求婚——在他的天性中不是有居心不良的成分吗——难道可能是他拥有一个大酿酒厂这个事实吗？——他有时候看来对她这么富于人情味，这么德国化，她被哄得神魂颠倒，认错方向了。她走得快一些，微微打了个害怕的冷战，摇摇头。

晚餐以后，酒吧间外那些小房间里的桌子全都被专心的写信

人占去了;信将在哈瓦那[1]寄出,是关于墨西哥的最后的话。只有那几个跳舞的西班牙女人在甲板上转悠,混时间。她们在墨西哥没有朋友,在西班牙也很少;这一点儿也不使她们烦恼。看得出有某种风流韵事在她们中间慢慢地传开去。她们的皮肤是琥珀色的,散发着麝香味儿,头发上插着鲜花,她们应该在黑影沉沉的地方被看到,几乎每一个都跟一个金发的年轻船员在纠缠。

那些船员个个穷困,严守纪律,对他们的职业有献身精神,攒下他们的少得可怜的收入娶妻成婚;他们个个在左手上戴着式样朴素的红金订婚戒指,而且局限在他们那个狭窄的流动的天地里,从来不踏进任何海港。到海港去很花钱,而且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再说,海港也太多了。他们对女乘客担负界限清楚但是并不一直繁重的任务,譬如说,她们在晚上看来没有舞伴,就伴她们跳跳舞,哪一个都不得怠慢,要用彬彬有礼的方式使他们自己变得叫人愉快。他们没有,譬如说,把爱情关系进行太远,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任何一个人不应该利用送上门来的机会,只要保持着体面就行。在这个特殊的西班牙小姐们的事件中,面子是明摆着保不住的,但是一定要伪装好,要是可能的话。

在驶往许多冷僻的海港的航行中,他们跟女乘客打交道的经验,已经使他们大多数人受到一定程度的威吓。那些年轻的船员穿着没有丝毫污点的白制服,领口或者肩膀上佩带金色或者银色徽章,在第一个夜晚,发现他们自己带着受过传授的潇洒的姿态,但是怀着极大的愉快和兴致,每人搂着一个惊人的肌肉丰盈但是身子柔软的西班牙女人的腰身的时候,心里存着并不

---

[1] 哈瓦那(Havana):古巴首都。此次作者暗示这艘船从维拉克鲁斯启航后,第一个停靠的港口是哈瓦那。

强烈的指望，看到那些闪着火焰一般热情的眼睛里只有买卖，没有别的。

总是有事情使他们合不拢；他们的一对对组合神秘地拆散了，重新组成不同的对子，直到最后，在一大清早，一切看来都过去了——毫无疑问，那是一个金钱问题，威廉·弗赖塔格断定，他已经把脑袋凑在啤酒杯上面，跟阿尔内·汉森谈话了。他们一直注视着在各处演出的一幕幕小小的活剧。

"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呢？"阿尔内·汉森问，他尤其是望着其中一个姑娘看，他那双现出性子暴躁的蓝眼睛变得温柔了，倾注的尽是爱慕之情。她的确长得很美，尽管跟其他姑娘是同一个类型，汉森却可以看出她身上不同的地方，即使他没法把这指明给另一个人看。她们个个长着漂亮的深色眼睛；闪闪发亮的黑头发光滑地披在她们的耳朵上；她们走起路来带着自觉的摇摆，圆滚滚的小屁股摇晃着；她们的弓得很厉害、呈弧形的脚都被狠心地塞在无带的浅口舞鞋内。她们都抹着胭脂，深红的、油腻的胭脂；方正、野蛮的大嘴覆盖在她们的天然的、又薄又硬的嘴唇上；但是他中意的那个叫安帕罗，这他摸清楚了。他已经想到他将面对的第一个障碍：他只能讲很少的西班牙语，而安帕罗呢，据他知道，不会讲别的话。

"我想象不出她们是干什么的，"威廉·弗赖塔格说，"当然她们眼下在干的除外。她们看来像是一伙吉卜赛人。我看到过她们在维拉克鲁斯的大街上跳舞，讨钱。"

汉森没法把情况告诉他。他们是一个西班牙喜剧歌舞班子，从格拉那达[1]来的，也许是吉卜赛人，或者是假装的。他们

① 格拉那达(Granada)：西班牙南部一城市，格拉那达省省会。

被困在墨西哥了，这种戏班子是往往落到这个地步的；那个伟大的帕斯托拉女皇只是勉强穿着随身衣服脱身的哩，他听说——墨西哥政府跟往常一样，把他们遣送回家，由它支付费用。弗赖塔格认为他们是一伙歹徒，尤其是那四个男人，狭窄的头盖骨、暴徒的眼睛，一副鬼鬼祟祟相——既像桌面舞蹈者，又像拉皮条的，还像飞刀手。

汉森仔细打量她们。"我认为没有危险，"他判断说，"如果不说相当安全的话。"他把他的强健有力的身子靠在椅背上，把两条在桌面下的长腿伸直。

那个歌舞班子里的男人带着那两个孩子坐在酒吧间里，明摆着在他们的那些小姐施展她们的花招的时候，避免去碍事。他们一声不吭，即使有很少的动作，也完全是态度文雅的，而且像猫那样保持着警惕。他们坐着，面前摆着一杯杯咖啡，不断地抽烟卷；两个孩子呢，都服服帖帖；而那些女人在场的时候，他们却不是这样的，最后他们把脑袋和胳膊搁在桌子上，都睡着了。

鲍姆格特纳太太跟她丈夫一起坐在一张小桌旁，疲倦地，一只手托着脑袋；她丈夫已经开始他的有条有理的长夜之饮，来缓解他的不断的疼痛。他的头发已经潮湿，粘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吃东西以后，有那么短短一会儿，他感到胃里轻松了，但是他又一次没法面对他的疼痛再次发作，所以急忙喝了第一杯兑水的白兰地。这种疼痛是约摸两年前开始的；当时，鲍姆格特纳先生在墨西哥的法庭上打输了三场重要的官司。他妻子知道他输掉那些官司的原因。他不停地喝酒，喝得没法正儿八经地准备辩护词，他没法给法庭一个好印象。在这背后是一个叫人悲伤的谜——他干吗开始喝酒呢？他没法解释，他也抵制不了他对白兰地的渴望。从白天到夜晚，他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喝

酒——没有乐趣，心情也不好，不感到轻松，也没有目的，在无能为力的良心的痛苦中，他的手仍然偷偷地伸出去拿酒瓶，而且他确实是带着恐惧的心情，抖抖簌簌地倒酒的。

在长长的一段时间中，间或有很少几天，他听妻子的劝告，没有喝酒，胃里会痛得没命，躺在床上，打滚，呻吟，直到把家庭医生请来，给他服用麻醉剂。他们请来专家们诊断；专家们各自作出跟他们关心的领域有关的种种猜测：什么溃疡啊、原因不明的肠套结啊、这种或者那种急性（或者慢性）感染啊；有一个甚至暗示是癌；但是没有一个能使他轻松一些。他看来病情没有恶化，但是也没有一点儿起色。鲍姆格特纳太太不再相信她丈夫的病是真的；她因为有这种想法，不断地受到良心责备。她不知道她相信什么；她确实什么都不相信，而她的不相信是没有固定的形状的，是一团黑沉沉的、移动的疑云：她丈夫的痛苦一旦被查明，就会成为对她的可怕的责备。不管什么时候，一场婚姻不幸，或者做丈夫的在事业上失败，人人知道，是妻子的过错。她也会不得不责备自己，因为正像她经常说的，她丈夫是男人中最好的和最宽厚的。他给了她的那种爱是她懂得的爱：天天忠诚而愉快，一年到头，天天这样，而且体贴周到。在他开始毫无顾忌把钱挥霍在酒上以前，他们一直有一个美好、舒适的家，而且积攒着钱，而且把积攒下来的钱，她感谢上帝，自从马克恢复稳定，商业在繁荣，德国现出全面兴旺的迹象以后，都安全地投资在那个国家里。她丈夫从头到尾参加了那场战争[1]，安然归来，连皮肤也没有擦破过——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个他应该感谢的奇迹，但是不——当时他一提起，就咬牙切齿地表示他的痛苦。

---

[1]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们是战后结婚的，去了墨西哥，德国人的新的应许之地[1]……啊，她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的生活怎么可能落到这个地步呢？原来一切看来都很好的嘛……

"啊，卡尔，别再喝了，已经喝了四杯了，晚饭吃了两个钟头还不到啊。"

"我受不了，格蕾塔，我受不了，你没法知道痛起来是什么滋味！"

老是这么诉苦。他的脸皱起来了；他的嘴扭曲和颤抖；他的明亮的、表情空虚的蓝眼睛由于他受到的痛苦现出凶狠的神情。

"卡尔，这有什么用呢？明天还不是老样子。"

"格蕾塔，请再忍耐一会儿。再来一杯。我答应今晚不喝了。"他悲伤地、害臊地弯下身子。"请原谅我吧，"他说；他这么低声下气，使她为他脸红。

"别这样，亲爱的，"她说。"行，喝吧，要是这能使你好受一点的话，"她探出身去，盯着桌布看，避免看到他那张脸上流露出的、他不打算遮掩或者控制的、皱眉蹙额的痛苦的表情。医生们说，他非回家去不可，那可能治好他的病。她原来希望平静的长途航行，船上自在、安全的生活，避开了那些跟他一起喝酒的假朋友，离开了那片他落得一败涂地的地方，是一个良好的开头。这个开头没有出现。鲍姆格特纳太太喝干了她的大玻璃杯里的饮料。

"好了，我亲爱的，"他用使人掉泪的声音说，"好了，你要是会帮我的话。"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她随即紧挨着他站着。

---

① 典出《圣经》，上帝许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土地，迦南；后来广泛地指希望中的乐土。

他们一路上走出拥挤的酒吧间的时候，他沉甸甸地靠在她身上；鲍姆格特纳太太，眼睛笔直盯着前面，完全有把握人人都用轻蔑的眼光盯着她的喝醉了的丈夫看，他假装是个病人。

尤利乌斯·勒温塔尔先生独自个儿被安置在一张小桌旁，在研究晚餐菜单上列着的不洁净的菜名[①]；他要了一份煎蛋卷，另加一些新鲜嫩豌豆。他喝了半瓶优质白葡萄酒来安慰自己（旅行中唯一的烦恼是这个问题：在这个几乎完全由异教徒经营的世界上，得找到一些他能吃的东西），还吃了一篮端给他当甜点心的水果。后来，他晃悠了一会儿，先是在交谊厅里，接着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心烦意乱，留神注意着，但是没有人跟他说话，所以他也没有跟人说话。他这儿看看，那儿望望，对着每一张他看到的脸，很快地瞟上一眼就把眼光避开，试着走过，不让人注意到，然而希望看到一个他自己的同胞。真叫人难以相信。在他的一生中，他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但是在这儿遇上了，他最害怕的事情临头了：整艘船上，没有另外一个犹太人。一个没有。一艘德国船，正在开回德国；除了他自己以外，船上却没有一个犹太人。出于本能的不自在所造成的痛苦顿时愈来愈厉害，终于成为不折不扣的惊恐；他出于天性，对这个充满陌生的敌人的非犹太人世界满怀敌意，这种敌意是这么深、这么无处不在，好像是充斥他的身心的流动的血液。在这一阵情绪高涨中，他的勇气恢复了，尽管只是部分，而且摇摆不定，但是给他带来了精神恢复健康的感觉。他又一次转悠起来；这一次，他的

---

① 勒温塔尔先生是犹太人。犹太人有一些食物，如猪肉，是不吃的。凡他们不吃的食物都被称为是不洁净的。

眼光比较大胆了，态度比较镇定了，掩饰了他的担心——但是没有犹太人，当然没有，为什么还要看呢？要是还有一个的话，他们会把他安排在同一张桌子旁的。要是有的话，两个犹太人早就会在现在以前就认识了。得了，是不会有谈话的人了，不过尽管这样，这也不会使他去跟那些人表示友好的；他打算在旅途中应付得尽可能好；惹是生非是没有好处的。他在酒吧间里坐下，附近有一对模样相当正派的中年非犹太人，脚旁有一条白叭喇狗；他想他们要是跟他说话，他可能跟他们谈上半个钟头，算是社交活动吧——比什么都不干好些，而且也只可能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他从来就不喜欢先跟非犹太人说话，你可能遇上任何事情，而他们却不把脑袋朝这儿转过来。喝了两杯啤酒，他觉得累了，准备去睡了。

房舱里只是放着其他乘客的行李，但是没有人。勒温塔尔先生把他的样品箱放在一边，免得挡道，摆出他的简朴的盥洗用品，待在下铺上做祷告，拿不准他会跟哪种人同住一个房舱。也许那个人挺有趣。他毕竟在买卖中至少认识了几个很正派的非犹太人。也许这一个也是。他躺在那儿，开着灯，没法安定下来，等候和注意哪种人会来开门。最后，一听到进来的声音，他就热切地抬起头。“Grtiss Gott，”他几乎在他看那人一眼以前就说。

里贝尔先猛的站住脚。他那张长着塌鼻子的脸上顿时冒出极厌恶的神情；他皱起眉毛，噘出嘴唇。

“晚上好，”他说，一副凶巴巴、冷冰冰、斩钉截铁的水火不相容的气势。

勒温塔尔躺回到他的枕头上，知道情况糟透了，好像他一向知道的那样。“我的上帝，这运气啊，而且航程这么长，”他哀伤

地说。“唉，可不是，没错儿，他看来更像一头猪，而不像一个非犹太人。”不过，他会小心的，他能照顾自己，他会留神不让那个家伙占他的便宜。“让咱们睁大着眼看着，有了这个开头以后，他接下来要干些什么。既然我知道了会遇到什么，我就应该防备着他。他们那些花招我大都有数……他没法乘我不备下手。”

他这样担心和恼火着，身子不断地翻来覆去，压低着叹气声；然而，一会儿后他睡着了；他的眉毛仍然紧皱着，但是里贝尔先生却打着呼噜，睡得很沉而且很舒畅。

九点钟，亮着灯的甲板上空荡荡的；酒吧间和那些书写室里几乎没有人了。看不到人在活动，只是在船长的驾驶台上有些动静，另有几个脸色平静的水手在走动，干他们例行的事情，轮船深处，厨子们在着手揉面，擀面，烘烤早餐的面包；下面更低的地方，轮机房里，那些结实的工人整宿在干力气活儿，浑身汗水淌个不停，保持轮船的固定不断的一小时行驶十二海里的速度。轮船开过墨西哥海湾的湾流[1] 以后，会开得快一些。

船上早已安排好了的只有两天的那种够愉快的单调生活过去了，第三天人们就尝到了再进入海港——哈瓦那——的兴奋滋味。这一回，旅客们没有任何事情要担心，没有一件事情要干，只是尽可能地欣赏风景。各种式样和尺寸的整洁的热带时装出现在眼前。船还没有停稳，人们就纷纷争先恐后地拥向跳板。

---

① 指墨西哥湾暖流，向东穿过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间的佛罗里达海峡，暖流温度比两旁海水的温度高10至20度。

甚至格洛肯先生也独自个儿在码头上不慌不忙地走去；他打着一条打结的地方已经磨损的、颜色鲜艳的领带，像屋檐上的怪兽装饰那样微笑着，他用有经验的快速的行动躲闪一个大胆的女人；她窜上前来，碰碰他的驼背，祈求好运气[①]。

那两个干这一行的女人，是到墨西哥去做买卖的；她们去那里随便得好像进城里去一天买东西似的，现在到家了，穿着露背的白亚麻布连衫裙，戴着精美的宽阔巴拿马草帽走去。威廉·丹尼谨慎地隔着一段距离，下定决心跟着她们，要尽可能地查明这两个高傲的女人在她们的家乡居住在怎么样的房子里。她们对他坚决地表示不是干这一行的态度，顶撞得他心烦和沮丧。

“在我的家乡，卖那玩意儿的女人通常不把那玩意儿撅得老高，”他跟戴维·斯科特说。“现金交易，不伤人感情。”

戴维只是说，他认为那可能多半是件叫人腻烦的事儿。所以丹尼独自个儿出发，下决心跟踪到她们藏身的窝，大胆地自己闯进去。在一条两边都是店铺的、狭窄的街上，那两个女人中有一个出人意料地转过身去，看着一个橱窗，望见了丹尼，用胳膊肘轻轻地推推另一个。她们两人接着往后看，高声发出女孩子的嘲笑的尖叫，飞也似的穿过一家铺子的门洞子，一下子变得无影无踪。丹尼像突然被烫坏了似的，苍白的脸上挤出讥讽的笑意，做给可能目睹这幕情景的人看，嘴里吐出一句短短的粗话，发泄一下他心中的恶气；接着，装出一副好像有自己的计划的模样，从衣兜里掏出一幅给游客用的地图，开始找一家价格低廉的小餐馆。

尽管还只是下午四点钟，那个西班牙歌舞班子中的演员们

---

① 西方的一种迷信习俗，接触驼背，可以有好运气。

却穿着晚上穿的衣服出现;是裁剪大胆、料子经久耐穿的黑长服;男士们的短茄克下束着打褶的红绸宽腰带;女士们呢,潇洒地露出胸脯和肩膀。安帕罗的耳垂比她的天生的长度长出一半,那是因为耳垂上缀着许多仿制的红宝石的重量而被拉长的。他们人不舒服,脾气坏透了,却为了一个晚上职业性的欢乐执拗地出发,一路走,他们穿着不舒服的鞋袜的脚有一点儿一瘸一拐。那两个双胞胎兄妹被留在船上,马上尖叫,大嚷着,围着那个小个子病人像在跳某种魔鬼舞似的绕圈子,直到那个推轮椅的金发的小伙子用德语高声咒骂,把他们撵走为止。他们接着跑到栏杆旁,爬上去,探出身去,拚命尖叫"Jaialai[1],妈妈!妈妈,jaialai!"他们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一听到这声音,四个女人全都很快地转过身去,一个他们管她叫洛拉的女人厉声说:"闭嘴!"

"让咱们这一回做真正的旅游者,"珍妮天使跟戴维宝贝儿说,因为他们当时互相都有这样的想法。"我对旅游者没有一丁点儿偏见——我认为那是一种低级形式的势利,我发疯似的忌妒他们,既有钱可花、又有空闲的幸运儿,全都穿得笔挺,一路逛过去!我总是不得不干活儿。我要是不在那儿干活儿的话,就不会在那儿,不管我在哪儿,都是这样;我在干一份活儿,或者为哪个编辑干什么……哪怕是在巴黎,要是我终于到了那儿的话,我仍然不得不为哪一个人的糟透了的小故事画愚蠢的插图。嗳,戴维宝贝儿,别跟我说,我给自我怜悯折磨得走投无路了……"

"你老说这话,我从来没有说过。"

"得了,你这个撒谎的人,"珍妮温柔地说,"不过,不管怎样,

---

① 巴斯克语,"回力球"。

从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起，我这一辈子中，从来没有只是为了观赏风景而到过什么地方。现在是时候了，让咱们叫一辆福特牌汽车去欣赏那些风光，尽管可能不怎么好看。这是我第四次经过哈瓦那了，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可我从来没有看过海滩和那条大名鼎鼎的大道，它叫什么来着？”

戴维陷入了沉默，珍妮管他这种沉默叫能表明心思的沉默；她从他脸上掠过的表情看出，这个想法吸引着他。他们没有走很远去寻找，因为在第一个街道拐角旁，有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和一辆破旧的福特牌汽车——“一辆真正的福丁戈，要是居然有一辆的话！”珍妮亲切地说——这是对这样一辆汽车在墨西哥的通行叫法——他跟他们一样，也在等候和希望哩。那个黑人的皮肤的颜色像红糖；他的一只眼睛是浅灰色的，另一只是淡棕色的；他自以为说的是英语，编好并背出一套措辞夸张的拉客的措词。他们有礼貌地等着他讲完，才点点头；他马上把他们安排在后面的座位上；车门的铰链啪哒啪哒地响个不停，座位里面的填料一团团地冒出来。随着叫人吃一惊的轰的一响和机器运转的哐啷哐啷声，他立即出发，几乎马上把速度开到吓人的程度，接着开始说另一套固定不变的话；当他们在海边那条壮观的白色道路上飞也似的驶过的时候，用沙哑的高声和低声说的话断断续续地从前面向他们传过来。

“咱们正在经过……纪念碑，”他们很快地经过一堆胡乱堆着的青铜的时候，他喊叫着说，“这是纪念……”他郑重其事地和小心谨慎地说，接着声音低得变成咕哝。接着，“这，”他的声音又高起来了，“……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后来，”他清楚地说，“古巴独立的儿子们建立这个宏伟的纪念碑，给外国人观光。”咕哝，咕哝，咕哝。“我们现在正在经过……”接着，他们猛

的拐了一个很危险的长弯，“这座建筑物叫……给外国人观光建立的……**往左看！**”他提醒地说，接着珍妮和戴维顿时向左边伸出脖子，但是那景观已经远远落在后面了，“你看到……儿子们给外国人观光而建立的一个悲壮的纪念碑。”

他们冷不防放慢速度，晃得人头昏眼花，又猛的一震停住车。那个导游把鸭舌帽推到脑后，指指在一个小公园的一座巨大的、难以形容的建筑物，它围在高高的棕榈树和繁茂的树顶中间闪闪发亮。“那儿，”他用沾沾自喜的挑剔声调说，“是一座大名鼎鼎的赌场，有钱的北美人当着挨饿的穷人的面，每夜输掉千千万万的钱。”

不出他的所料，两个乘客呆呆地望着；接着，戴维跟珍妮悄悄地说：“我觉得咱们的观光不怎么精彩，你呢？”接着用西班牙语跟那个看来好像一直带着几分支配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导游说，“好吧，让咱们从原路回去，车要开得很慢。”

“我完全听得懂英语，”那个导游用西班牙语说。“你们的观光还算不上成功，因为你们还没有看到所有的景致。在这条大道上，有一些极壮观和有感染力的纪念碑，其中有一些比你看到过的那些更豪华、更显赫。你们看一看全部景致是上算的，”他正派地说，“我不想欺骗你们。”

“我认为我们的观光太棒了，”珍妮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让我们全都看一看！”他们像飞奔的袋鼠那样跳跃，让所有的纪念碑在他们的眼前一闪而过，看不清是什么形状；他们饱受风吹日晒后，又下了汽车，坐在一个漂亮的大平台的一些棕榈树底下，平台刚冲洗过，冒着水汽，沿墙挂着一溜儿柳条大鸟笼，院子里有一株香蕉树。服务员端来用大玻璃杯盛的、兑朗姆酒的冰茶。

“我越来越，”戴维说，有这么一阵子他又感觉到了他跟珍妮在

一起时不时地会产生的那种情投意合和安乐的平静的心情——并没有长得足够或者经常得足够产生任何持续不断的幻想——但是只要一有这种心情，就总是美好的——"我越来越深信，为了外国人观光，做任何事情或者制造任何东西，是一个大错误。"

"让咱们始终别犯这种错误，"珍妮说，由于他们沿着海滩愚蠢地胡闹了一阵，所以脸色仍然红润。"让咱们有美妙的私人生活，从咱们的身子里，甚至也许从咱们的心灵里开始，然后延伸开去。"

她踌躇了一下，接着很犹豫地说出了这个词儿"心灵"，因为这是戴维的忌讳之一，还有上帝、精神、精神事务、美德——尤其是这个词儿！——爱情。这些词儿没有一个特别频繁地出现在珍妮的日常谈吐中，不过偶尔感情激动的时候，她看来需要这一个或者另一个词儿；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戴维一听到它的声音，就受不了；这会儿，她看到了那种僵硬、尴尬、恼火的脸色；根据经验，她早已料到只要说出任何一个那种词儿，就免不了看这种脸色。他能把那些词儿转变为淫秽的措辞，用关于性的、追求享受的狂热说出那些词儿；珍妮呢，是像一只训练有素的鹦鹉那样没有恶意地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却反过来被她假正经地称之为"戴维的肮脏的头脑"惹得生气。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钻进了死胡同，出不来了。

戴维阴沉地停顿了一下，小心谨慎地说："可不是，当然喽；那珍贵的私人生活总是在画廊里、杂志内和美术图书中结束的，要是咱们能交上好运的话——难道咱们要继续试着欺骗咱们自己吗？瞧，咱们靠挣钱过日子，是不是？从一份活儿到下一份，所以也许咱们应该把那些纪念碑当作这样的货色来看——每一个是某一个雕塑家的一次订货委托和工作机会。"

"可那是什么雕塑家啊，"珍妮容忍不住说，"这种吓坏人的糟糕货色。只要我揽得到，不管什么零星杂活儿，我都会干的，

可是有的东西你是没法卖的，哪怕你想卖也不行，而且我为这感到高兴！我将为自己作画。”

“我知道，我知道，”戴维说，“还希望有别人喜欢它，喜欢得肯买下它，并且把它带回家去一起生活。拿工作来说，咱们的私生活的理论就简直不对头了。”

“你是在谈论现实生活，”珍妮说。“你在谈论已经挂在墙上的那些东西，而不是它仍然在你的脑子里的时候，对不对？——我想要一点儿都不懂艺术的善良、单纯的人们喜欢我的作品，走上多少里路来看，就像墨西哥城里的印第安人对待那些壁画那样。”

“那确实是一个呱呱叫的出名办法，”戴维说，“你这个善良、单纯的姑娘。那些善良、单纯的印第安人笑得前仰后合，在卡诺瓦[①] 的《保利娜·波拿巴》的复制品上乱涂阴毛——雅致的大理石梦！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这种事儿吗？当时你在哪儿？”

“我当时在那儿，”珍妮说，并不愤恨。“我估计当时我在看和听别的事情——当时我还看到和听到许多别的事情。我真的不责怪那些印第安人。他们毕竟有属于他们的更好的地方。”

“比什么更好？卡诺瓦？好吧。譬如说乔托[②]，或者列奥那多[③] 更好？那不比许多东西好，甚至不比他们自己制作的东西好。现在那已经全变得一塌胡涂——归根结蒂，他们在他们的

---

① 卡诺瓦(Antonio Canova，1753—1822)：意大利杰出的新古典主义雕刻家。《保利娜·波拿巴》或称《保利娜·博尔盖泽》是为拿破仑之妹所作的一座几乎全裸的雕像，是雕刻家的代表作。

② 乔托(Giotto di Bondone，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

③ 列奥那多(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即达·芬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是艺术大师。名著有壁画《最后的晚餐》、肖像画《蒙娜·丽莎》等。

那些被埋葬的城市里发现了他们真正的好货。这我也喜欢啊，而且明摆着他们喜欢要这个，而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注意，珍妮天使，这一切对咱们有什么用呢？咱们得靠自己；咱们别变成冒牌的原始主义[①]者，咱们甚至没法愚弄自己……"

"戴维，就因为我不打底稿，可并不能表明我想当原始主义者……得了，别再说这啦！我喜欢印第安人，我对他们有偏爱，"珍妮说，"我觉得肯定从他们那儿学习到了东西，哪怕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可是他们不爱你，"戴维说，"而且这你也知道。咱们一直一个个地喜欢他们，就像我们互相喜欢那样，可是他们干脆把咱们当作一个整体来恨，把咱们看作是另一种肤色的、是压迫者种族的成员。我对这讨厌透了。去年，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向你要的只是你那辆老得快不行的福丁戈；还有我的打火机和手提唱机。咱们喜爱他们的美丽的草席，因为咱们不必睡在那上面，可他们要我们的弹簧垫。没有什么可责备他们的，可是我讨厌对他们的自作多情的哗啦哗啦的谈论。"

珍妮笑了，因为她感到非常忧郁和沮丧。"我也不在寻找一种新的宗教，"她说。"我想，到眼前为止，你说的都是对的，不过，还有别的……我知道，我实在太单纯了，成不了一个优秀的原始主义者。"

"我倒不认为他们比我们更复杂，"戴维说。"他们打的是另一套结[②]，就是这么回事。"

"不管怎样，不是这么回事，"珍妮说，"这太简单了。"

---

① 一种崇尚和追求上古人或孩子的稚拙风格的艺术流派。

② 原始人以结绳记事，此处戴维暗指印第安人另有一套思考和处世的方法。

戴维听出她话中有刺，不再说什么，但是在思索，不管他试图对珍妮解释他对任何事情的观点，他好像总是会突然离开正题，或者在原地兜圈子，毫无进展，或者被陷在一个他压根儿没有打算进入的地方，好像珍妮的脑子折射他的想法，而不是接受他表明的关于某些事情的含意，甚至感觉——譬如说，印第安人。他从现在起不会跟珍妮谈论印第安人了，也不会谈论她的画了；她对印第安人一往情深；对她的画，态度固执；由她去吧。

他们在看来好像挺舒适的沉默中喝罢第二杯兑朗姆酒的红茶，想要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不得不问那个服务员，因为他们坚持原则，拒绝戴表，把生活弄得复杂化了；接着他们向港口踱回去。

热气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街上的人们节奏迟钝地徘徊着，好像在懒洋洋的梦中；白天的亮光逼得人几乎没处逃遁；汗珠从每个人的每一个毛细孔中钻出来；一条条狗舌头冒着热气；珍妮和戴维穿着看似阴凉的亚麻布衣服，来到码头的时候，已经浑身湿透，淌着一道道汗水，而且直喘着粗气了。他们必须穿过那个长长的遮阳棚才能上船；在遮阳棚的入口处，他们看到一大群挤得密密匝匝的人，还有他们的邋遢的、黑黢黢的脑袋和破破烂烂的衣服。从他们中间，两个人找不到能穿过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一个个裹在麻袋里的包裹用绳拴着，放在地上，捧在他们的怀里，高高地堆在他们的肩膀上。他们是各种年纪的男女，处在各种程度的衰败中，带着高低不同的孩子和抱在怀里的娃娃。他们全都简直叫人难以相信地衣衫破烂，浑身肮脏，弓着背，默不作声，一副凄惨相。他们中有几个看到这两个外国人，一声不吭地互相推推，用胳膊肘碰碰，又碰碰包裹示意，最后清出一条狭窄的走道。

“请走过去，”他们用西班牙语低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珍妮和戴维一边说，一边侧着身子小心谨慎地走过。后来，

人群稍微稀疏一点了，但是他们把整个巨大的遮阳棚挤得满满的。他们坐在地上，挤作一团；他们站着，形状难看地弓着身子；他们疲劳地、弯腰曲背地靠在墙上。

那里的空气简直算不上空气了，而是汗水、垃圾、不新鲜的食物、肮脏的废品、破布烂条和粪便混合形成的热烘烘、散不去的烟雾；贫穷的臭气。这些人并不是身分不明的；他们全都是西班牙人；他们的脑袋有形状，有思想和有教养；他们的长在身上的眼睛在看，知道他们活着。他们的皮肤是挨饿的、又过分工作的人的皮肤，黑黢黢的、肮脏的苍白色，泛着铜绿色，好像他们有好几代人的血液没有足够的更新了。他们赤着的脚上现出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脚很硬，开裂，关节那儿都长着结；他们的手是肿着的拳头。显然，他们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或者按照自己的计划才待在这儿的，而是完全处在受奴役的无能为力、低首下心的状态中，他们在等候接下来他们会遇到的、任何对付他们的事情。女人们在给她们的挨饿的娃娃喂奶；男人们坐着，在他们的破烂得可怜的财物间摸索，把它们捆得更结实一些；他们挖脚，或者搔头发，或者不自在地、懒洋洋地坐着，一动不动，只是盯着看。苍白、焦急的孩子们可怜巴巴地，乖乖地坐在他们的母亲们身旁，盯着看她们，可是不提出什么要求。

几个看来像是非官方人员的人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用手指头点他们的人数，在每个人的前面写下什么，互相商量；他们在摸索着穿过人们的身体的时候，用一只手按在最近的一个人的脑袋上，稳住自己的身子，好像那是一个楼梯中柱，或者是球形门把似的。最奇怪的寂静笼罩着整个场面——真奇怪，珍妮想，因为他们的处境是这么大的悲惨局面，而他们正在遭到极为可怕的事情，你可能会以为，他们会嚎叫，哭喊，争相逃走嘛。

“戴维，那可能是什么事儿？”她问，但是他摇摇头。他们走出遮阳棚，来到露天的地方；那艘轮船高高耸立着，跳板已经放下了。

船上的人几乎全都暂时忘记摆出矜持的姿态；互不相识的人互相提出问题，得到的回答充满了谣言和互相冲突的推测。年轻的船员们发现他们遭到连珠炮似的好奇的追问，码头上的那些要饭的是什么回事儿，眼下那些人看来好像要登上“真理号”这艘船了。那些年轻的船员只能摇摇头。他们很抱歉，但是他们想不出这些统舱乘客是什么人，也说不上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也不知道他们的确切的情况，唯一可说的是任何人看得出他们属于最低的阶层。没错儿，到时候，一切都会知道的。

这个回答到处引起更大的好奇心。胡滕教授和太太软哄硬逼，把他们的晕船的叭喇狗贝贝带上岸去透透空气，听一个城里人说，那些陌生人是政治上的不满分子，被作为危险分子和颠覆分子驱逐出境的。胡滕教授仔细地打量这些人，发表意见说他们尽管是不幸的人，看来倒好像是无害的。吕茨先生，那个旅馆老板，告诉教授，他听说这些人都是回西班牙，因为那个国家里突然对劳工有新需要；既然西班牙人已经撵走了国王，听说西班牙在争取进步，赶上现代世界。“老一套，”吕茨先生说，“在另一个牧场上，草看上去更绿，你到了那儿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是我第一回听说西班牙繁荣了。”

里贝尔先生和利齐·斯波肯基克神气活现地走上甲板，接着利齐对小个子的奥托·施米特太太尖叫着说：“啊，你对这个可怕的人有什么想法？你能猜到他刚才说的话吗？刚才我在说：‘啊，这些可怜的人，能为他们干些什么呢？’可这个恶魔——”她发出一声表示介于歇斯底里和愤怒之间的喊叫——“他说，‘我会为他们这么干：我会把他们放在一个大烤箱里，开

上煤气。'啊，"她笑得弯下身去，软弱无力地说，"难道这不是你听到过的最别出心裁的主意吗？"

里贝尔先生站在一旁，直率地微笑着，对他自己挺满意。施米特太太的脸色有点儿苍白，她用做母亲的、严厉的声调说："也许这种想法别出心裁得过了头——真不害臊，我不以为这话有趣！"里贝尔先生的脸沉下来了，他噘起了嘴。

利齐说："啊，不用说，他没有什么恶意的，不过是给他们烟熏消毒罢了，不是这样吗？"

"不是，我不是指烟熏消毒，"里贝尔先生固执地说。

"这么说，那你就不怎么好了，"利齐说，声调显得那么从容，确实超过了宽容的范围，他马上又劲头十足了；她向他微笑，他用微笑回答；接着，他们撇下施米特太太的在道德上不赞成的气氛，向无拘无束的酒吧间走去。

下午的报纸终于出现在甲板上了；报上直截了当地报道了全部事实，再说，说到底，也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情况。这事跟世界市场的糖价有关。看来已经跌进最低价了。古巴食糖，由于国际竞争，一直跌价，直跌得甘蔗种植者们负担不起把他们的作物收起来，上市去卖。由于工人中间有外国工会鼓动者，在这危急关头，也总是会出现一些罢工、动乱，提高工资的要求。种植者们在地里烧他们的收成；他们自然已经把几千个种植园里的和制糖厂里的工人解雇了。这些人大多数是西班牙人，多半来自加那利群岛[①]、安达卢西亚[②]、阿斯图里亚斯[③]，他们都是古

---

① 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北大西洋东部西班牙领土。

②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西班牙南部一地区。

③ 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西班牙西北部一地区。

巴的糖业兴旺的时候移民进来的。

这种移民进口的政策，一开头就受到当地反对，后来显得是有远见的，因为要是这些劳工是古巴人的话，除了让他们依靠施舍，要饭，或者把他们安置在公家的监狱和医院里以外，他们的命运还可能是什么呢？既然他们是外国人，政府就采用迅速而明智的措施，抢先把这么许多无事可做的外国人赶出这个岛去，解决了这件困扰人的事情。作出了把他们遣送回他们的祖国的安排；他们的盘费是靠公众捐款筹措的；一切都给他们办理得舒舒服服，而且第一批，确切的人数是八百七十六口，已经安全地在途中了。因此，新闻报道和社论都表示一致的看法，古巴在处理它的劳工问题方面以最人道的、然而实际的态度，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范例。

八百七十六个人形成一支零乱的队伍，走过跳板，向统舱走去，这时候，十一二个或者多一些头等舱乘客在上面站成一溜儿，望着他们。这些人被水手和刚才在点数的非官方人员在两边小心地看管着，一路走来，有点歇斯底里地推推搡搡，发出噔噔噔的脚步声，显得犹豫，这时候整个人群塞住在一个地方，激动起来，接着经过疏导，他们向前走了。在那些观看的人中间，升起一种新的不安的情绪；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第一个说出口。

"在这批人中间，有很大的生传染病的危险，"她跟在她身旁的鲍姆格特纳先生说。"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去向船长提意见？我们毕竟没有同意过乘坐运牲口的船旅行嘛。"

鲍姆格特纳先生的痛苦的脸上突然出现新的焦急的皱纹。"我的上帝啊，"他说，"我也想到这一点了。我想你几乎能在他们中间闻到疾病的气味。不行，这不对头。我们应该事先知道这事儿的。"

胡滕教授跟他妻子说："那个事务长告诉过我，统舱里的设施只容纳得下三百五十人，可是瞧，他们仍然在来。我倒有兴趣

看看，可能用来容纳这么许多人的是什么设施。还有娃娃呐，”他说，不满地咂咂舌头。他妻子叹了口气，摇摇头，又一次接受这个叫人悲伤的事实，没有解决人生麻烦的好办法，哪儿都没有太平和安静。她的舒坦的肥肉颤抖着，微微暗示她的痛苦，但是她受不了去想这事。“喂，”她说，“我们别在暗底里监视他们。没准儿他们会抬起头看，发现我们在盯着他们看吧？”她走开去，她的脸色温和而空虚。贝贝呢，精神稍微好了一些，由一根宽松的皮带拴着，跟在后面。

威廉·丹尼刚才安全地去过一家价格低廉的小餐馆了，很快地灌了几杯代基里鸡尾酒[1]，情绪变得越来越沮丧，这会儿靠在栏杆上，用响亮而愤怒的声音胡乱地讲话。“可怜的人儿，他们不该遭到这么对待，”他说，几乎是眼泪汪汪地。“说到底，他们干吗应该被赐出去呢？他们不是糟糕的赤色分子，报上这么说的。”

特雷德韦尔太太发现自己跟这个年轻人随便交谈过一两回；她认为他讨厌极了，这时候正好几乎站在他身旁；她知道得很清楚，不管他想些什么，或者感觉些什么，那压根儿跟她不相干，但是一时冲动，还是开了口；这她也知道得很清楚，不是她的作风，而且总是使她陷入某种困境。

“请问，干吗总是‘糟糕’呢，”她用轻松愉快的声音说，“又干吗总是‘赤色分子’呢，你真的知道和关心那是什么吗？”

丹尼的脑袋稍微转动了一下；他盯着她看，好像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似的。“你是个赤色分子吗？”他问。他的交叉着的胳膊并没有从栏杆上移开，他向她斜过去，侧转身子打量着她，好像她是一匹他想要买的马似的。他的盯着看的眼光好像一只手

---

① 一种用产于古巴代基里的朗姆酒兑上酸橙汁或者柠檬汁和糖的鸡尾酒。

在抚摸她的耳朵、她的脖子、她的乳房，往下抚摸她的大腿，不过他的嘴紧紧闭着，好像他不喜欢他看到的东西，但是控制不住眼睛的移动。特雷德韦尔太太下定决心，使劲用她的凝视迎着和紧盯着他的凝视，但是他不看她的脸，那儿，那张中年妇女的脸像一张面具，在它下面，脸上还保留着相当大女孩子气的俊俏。

"你知道这个词儿的意思吗?"她冷冷地追问，他挨过来的时候，她从他靠在栏杆上的身旁挪开去。她这会儿懊悔，她刚才跟威廉·弗赖塔格一起在哈瓦那喝了那三杯种植园主潘趣酒[1]；因为老实说，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词儿的意思——只是她恨这个蠢货丹尼恨得可以从刮他耳括子中得到乐趣。她从来不认识一个赤色分子，也始终没有指望过认识一个。

"我要是掌管政府的话，我知道我会怎么对付他们的，"他暴跳如雷地说，盯着她的衬衫前襟里面看进去。特雷德韦尔太太下定决心，镇定下来。多么少见——她来到这儿，跟一个喝醉了酒的陌生人，而且是一个这种类型的人，为了一个他们两人都完全不懂、而且她压根儿一点儿不想懂的题目差一点没吵起来。她把脸转到一边，猛的掉转身子，走开去，对着天空微笑，尽量不显得匆忙。

这艘船弥漫着海港的臭味，处处飞着成群的蚊子，在那天黄昏很晚的时候启航了。头等舱里增加了相当数目的新乘客；他们起先有点儿被那些最初的乘客当作闯入者。老乘客已经摆出主人的身分关心这艘船了。六、七个吵吵嚷嚷、模样像混血儿的古巴学生直到很晚的时候，还一直引人注目。几对结了婚的男

---

[1] 一种鸡尾酒名。种植园主潘趣酒有多种，但都以朗姆酒为底酒，只是调合的果汁和副酒不同。

女带着形形色色的、按照惯例是叫人头痛的孩子。晚餐以后，学生们排成一溜儿；绕过那些帆布躺椅；椅子上坐着那些没有喝得大醉的人，他们只希望清静地坐着，不受打扰；学生们穿过船上那些在看书或者打牌的人，在打算睡觉的乘客们的窗外转了十几圈，大声背着一节又一节关于 *La Cucaracha*[①] 的诗，那只可怜的小蟑螂哪儿都去不了，因为它没有大麻烟吸；其次，因为它没有钱去买；第三，它反正也没有脚；第四，因为没有人爱它；那些学生一只手搭在另一个的肩膀上，排成一溜儿，重重地踩着步子，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唱它的不幸。他们按身高排列着，从矮到高，不过全都瘦削得很。他们都穿着裤腿很肥的牛津裤[②]，膝盖下面鼓出着，裁剪式样相同、但是料子花样五花八门，叫人眼花缭乱：格子的、条子的、花样对称的、缝出齿印痕迹的、颜色奇奇怪怪的粗毛呢。他们穿着网球衫和短袖圆领衫。他们偶尔使排列的队伍蜿蜒扭动，模仿蟒蛇。他们又按节奏在队伍的一头依次跳跃，又向前弯下或者向后仰倒，像海浪的起伏。

威廉·弗赖塔格向他们的滑稽动作看了一会儿，断定他们在整个航程中毫无疑问是十足地道的讨厌的一伙，而且想不起他从前是不是这么孩子气、这么幼稚、这么荒唐。他眼下三十岁了，结婚五年了，而且生活正在变成代价很沉重的东西，比他预料的要代价沉重得多；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他毕竟从来没有寻找过廉价商品啊。但是，他从前可能是这么一个蠢货，就像是这伙人中间的哪一个吗？他记得很清楚，他以前确实是的；但是他的年纪还没有老得伤感地回忆年轻的时候那些愚蠢的行为的地步

---

① 西班牙语，《蟑螂》。

② 一种风行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踝部都特别宽大的裤子。

嘛;他这会儿正在进入他一想起就不寒而栗的往事。事实上,他现在是在不寒而栗,稍微弓着背,好像一个面对着暴风雪的人。

他在回去睡觉的途中站住脚,向那个朦朦胧胧的、洞穴似的统舱瞟了一眼。甲板上密密匝匝地躺满着蜷曲的人影,他们的脑袋搁在包裹上,他们的身体下面就是地板。有几个男人躺在吊床上;有几个女人靠在帆布躺椅上,让小娃娃睡在她们的肚子上。其余的睡着的人互相叠在一起,像被扔到垃圾堆上的破布烂条。他站着,沉思着贫穷这个无法打破的谜,它像一种发展缓慢、然而无法治愈的疾病;在他的脑子里、他的经历中或者他的禀赋里,甚至都没法想象出一个能医治这病的良方。他这一辈子按照他的中产阶级的标准是舒适的;对这个阶级来说,尽管他们向各行各业提供了大量人才,并且热情地尊重他;无可争辩地,赚钱才是他们的谋生之道,对他们来说,才是一个受良好的教养和训练的年轻人的一切职业中最可取的职业。他还没有发财,然而直到最近为止,他还没有想到有什么障碍阻挡得了他喜爱的发财。这应该非常正确地——在理所应当地感谢他的父母让他受教育之后——应该非常正确地完全归功于他自己的努力;要是他发不了财的话,那是因为他事前没有察觉自己身上的缺点。他对穷困有一种正常的厌恶,对像在脏东西中繁殖的蛆虫那样拥挤在一起活动的、把周围弄得臭烘烘的穷人有一种出于本能的轻蔑和不信任。然而,他想,带着一丝不大情愿的同情想开去,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他们有他们的用处;我们将怎么办? 他们来到这儿,从一个不需要的地方被遣送到他们不可能受欢迎的地方去;他们本来在一个干着苦力活儿、填不饱肚子的地方,被打发到一个没有活儿干和挨饿的地方去,从穷苦到穷苦——除了低级动物以外,有哪一种生物受得了这样对待呢? 他撇开他讨厌的同情,念头回到他

自己的进退两难的境况上，而且意识到，这些悲惨的人的景象引起的不寒而栗的恐怖是为他自己的；他为自己感到恐惧，这种想法可怕地出现在他的想象中。他，一个出身于虔诚、体面的路德会信徒的家庭，呱呱叫的基督徒，却可怕地不顾双方的家人的反对，不顾他自己的比较明智的判断，不顾一切通情达理的见识和理性，娶了一个有美丽的外国名字，玛丽·尚帕[1] 的犹太姑娘。她这家子是来自中世纪犹太人从那儿来的一个地方，生下了亚伯拉罕·本·约瑟，或者不管叫什么的人，用地名作他们的名字，已经定居了几百年。他们有些人变成了天主教徒，或者跟非犹太人结了婚，被撵了出去，又一次改换姓名，成为真正的法国人；但是玛丽这一支是死硬派，他们又迁徙流浪，从阿尔萨斯[2] 进入德国，天知道为什么。在他看来，是判断严重失误。但是他们保持着他们为自己挑选的法国姓。并且他们全都打定主意心胸开阔和处事公允，跟非犹太人们一起过着社会生活，要是那些非犹太人属于正当的阶层，而且仍然接待他们的话。然而，他和玛丽互相爱上了，而且是这么纯真和这么一往情深地爱上了，这就像捅了一个蚂蜂窝。他们耐心地既同她的也同他的一家人和亲戚战斗到底；结果，他们在一座路德会的教堂里结了婚，在主要走道的左侧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小的人群里传来啊伊、啊伊、啊伊的哭哭啼啼和抽抽噎噎的哭声……当他公布他将要去墨西哥的时候，他的父母掩饰不住他们松了一口气的神情；他们清楚地表明，这种糟糕透顶的情况就此这么简单地解决，真是谢天谢地。玛丽的母亲是个寡妇，压根儿不认为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了，也许只有在法律上

① 尚帕(Champagne)：同香槟酒是一个字。是个法国字。

② 阿尔萨斯(Alsace)：法国东北部一地区。

除外;不过,她是个相当世俗的、开心的女人,在宗教上并不特别虔诚;有时候,只要她认为对她处身其间的场合适合,并不非表明自己是犹太人不可。别人不知道,对我不会有什么损害,她振振有词地说;我是怎么样的人,这是我的事儿,跟别人有什么相干呢? 她害怕的是,在这场婚姻中,她的家里人和朋友们会对她诽谤和排斥,这两种气她都受够了,可怜的女人。结果,她来到她的女儿和女婿面前,把她的命运和他们的放在一起,准备跟他们一起生活和死亡——愿上帝保佑她吧! 他感激地想着,这颗心多好啊。他们一共三个人,都已经开始为他们自己和互相感到骄傲,因为能扔掉愚蠢的偏见,而且生活得像自由的人们,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上为他们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啊,上帝,"威廉·弗赖塔格说,几乎说出声来。接着,他对自己稍微阴森森地笑笑。"以色列的上帝,"他补了一句,"你在哪儿啊?"接着转过身子,走进通往他的房舱的过道。

珍妮·布朗和埃尔莎·吕茨,在她们拥挤的小房舱里,两人都在刷头发,准备在亲切的寂静中睡觉。她们一直相处得很融洽,闲谈船上的生活,温和地聊天,发表些不伤人的看法。埃尔莎尽管受到她母亲的提醒,很快被她同房舱的乘客的温柔而相当有条理的态度打消了她的提防之心;在珍妮一次次用种种香水和一层层像掼奶油似的油膏打扮她的脸的时候,她坐在一旁,着迷了。那群学生在甲板上的吼叫声和顿足声第三次在她们的头顶上经过,还有从海面上升起的闹声和机器声,传进舷窗。埃尔莎抬起头来听,脸上流露出注意的神情。

"船上现在住满男孩子了,"她几乎带着希望地说。

"可不是,"珍妮说。"他们要是不止只会唱一支歌的话,那

就好了。”

她们被过道里，就在她们的舱门外面，传进来的响声吓了一跳；她们互相盯着看，听着激烈的、凌乱的奔跑和磕磕绊绊的走动的声音，那声音像是在进行一场某种方式的争斗，最后是沉甸甸的、柔软的碰撞声，好像一个沙袋被扔在护墙板上。两个人的声音，一男一女，是她们认识的西班牙歌舞班子里的人，正吵得很凶。是为了钱在争吵。他们在为了钱恶狠狠地尖叫，刺耳地对骂，互相指名道姓地干着：孔查和马诺洛。马诺洛要——他马上就要，不想再说什么——他知道那天黄昏孔查到手了的那七个古巴比索。他看到那个男人在付了酒吧间里的账以后，把找头给了她。孔查老着脸皮死不承认，她态度泼辣，一点不怕。珍妮捉摸着他们吵架的对白，发现孔查一次也没有质问马诺洛，即使她接受了这份给她的钱，他有什么权利要呢。她采用了看来好像最容易解决的办法，不承认受了钱。看来这个办法并不容易。

“我看到的，”马诺洛恶狠狠地说。“把钱给我，要不，我会把你撒谎的舌头挖掉。”

孔查尖叫着说，他要是高兴的话，把她的肠子挖掉也行，可他不会找到钱的。他们的声音又吵得难解难分，像砸破陶器那样相撞，接着传来一下响亮的打耳光的声音，吵声突然寂静；短短的停顿了一下；孔查开始哭了，无奈地、温柔地、顺从地，好像这是她一直在等待似的，接着马诺洛的声音柔和得像猫在咕噜咕噜叫，好像他一直在求爱似的：“喂，给不给我钱，还是要我——”

珍妮不自在地瞟了埃尔莎一眼，看她对马诺洛的威胁懂得多少。说话声音在附近的角落里低下去，渐渐移到主要过道里去了。

“嗐，你遇到过这种事儿吗？”埃尔莎用英语说。她的孩子气的大嘴、眼睛和鼻子眼都张得老大。“嘿，那是个怎么样的女人。

照我听起来，他不像是她的丈夫嘛。”

“他们住在同一个房舱里，你知道，”珍妮说。

“可你不跟你的丈夫住在同一个房舱里，”埃尔莎说，“所以真是叫人从何说起呢?”

“我们还没有结婚，”珍妮说，开始用指甲锉修指甲。

埃尔莎渴望地等候下文。没有下文。她的同房舱的乘客讨人喜欢地向她微笑，继续锉指甲。

“嘿，”埃尔莎失望地说。“我不懂一个女人居然会让一个男人这么对待她。她一定来自最低下的阶层。不能指望一个女人会容忍这种事情。”

“这是她的事儿，”珍妮说，打了个呵欠。“你准备好了吗，要熄灯吗?”

“她的事儿?”珍妮看到埃尔莎的确震惊了，感到困惑，甚至痛苦。

“别摆在心上，”她不安地说。“我是瞎说的。我猜想他们是两口子，为了钱在争吵。他们经常这么干的，你知道的。”

“啊，可不是，我确实知道，”埃尔莎说。

在黑暗中，珍妮已经迷迷糊糊，快要睡着了，埃尔莎躺在舷窗下面她那张长沙发上，说出重要的心腹话。“我父亲在我这辈子，总是告诉我，要信任爱情，而且要充满爱情；爱情会使我幸福；可是我母亲说，这些话都是虚伪的。有时候，我希望我知道——我爱我母亲，不过我好像觉得我父亲懂得多一些。”

“他很可能确实是这样，”珍妮说，清醒了一些。“明天见。”

“明天见，”埃尔莎说。“我父亲天性是个快活人，他喜欢找乐子。可是我母亲不笑，她说只有蠢货才笑，说生活不是一件让任何人取笑的东西……有一次，那时候我还小，我记得许多以前

的事情;不过,那一回,我跟我父亲和母亲去参加一个舞会——在瑞士,在那个国家里,人们经常把他们所有的孩子,甚至是小娃娃都带到舞会上去——我母亲不愿跟我父亲跳第一支舞,这样,我父亲当然没法跟任何别人跳舞了。所以他跟她说:'你很好啊,好吧,我会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舞伴的,'他拿了一把扫帚,搂着它跳舞;除了我母亲外,人人都觉得很有趣。在那天黄昏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母亲不愿跟他说话。所以我父亲喝了太多的啤酒,显得愉快极了;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跟我母亲说:'现在你要跳舞了,'接着,他搂住她的腰,转了一圈又一圈,直转到她站不稳脚,头昏眼花;她哭了。我弄不懂我母亲。这真的没有一点儿害处,这挺有趣。可是我母亲哭了,所以我也哭了;我可怜的父亲跟我们一起走去,一声不吭。我现在想,他也巴不得哭出来。她听我父亲说笑话,没有一个逗得她发笑,然而他还是不断地说。有些笑话是糟糕的,别以为我不知道。啊,"埃尔莎说,她的声音在黑夜中缓慢而带着悲痛而想不通的成分,"我怕我像我母亲,我没法显得有趣和逗人高兴。去引起别人对我注意,我会感到害臊;可是有时候,干坐着就挺难受;我想,我一定有什么不对头,要不,小伙子们会请我跳舞了。"

"船上几乎没有一个你要跟他跳舞的人,"珍妮说。"你要是在家乡的话,你不会向他们瞧一眼的。"

"可我不是在家乡,"埃尔莎说,"再说,我也从来没有像在家乡那样无拘无束,因为在墨西哥,那儿的小伙子们,那些我被允许跟他们一起出去的,不喜欢我的派头……我母亲跟你说得一样:'别担心,埃尔莎,在瑞士你恰恰是对路子的姑娘,一个真正的瑞士姑娘,是那儿他们喜欢的那种,别担心,我们回国后,一切都会顺当的。'她认为爱情全是胡扯,可是她要我嫁人。她说那

才是做女人的被指望干的事儿。可是，我还没有到瑞士；再说，我几乎记不得它了，尽管在我九岁那一年，我母亲带我回去了一回。不过，啊，它看来是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将会像外国人那样说瑞士德语，因为我在墨西哥主要说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我从来没有觉得墨西哥是我的家乡，可是我现在也许不会觉得瑞士是我的家乡。啊，我正在上那儿去，感到真悲伤……”这次小小的悲诉像午夜的雨那样下个不停；珍妮倾听着，被感动了，专心地听着。她想，她听了以后，知道了真正的烦恼。

“我母亲老是说，这对埃尔莎不公平，我们应该及时地带她回国，她才可以嫁一个瑞士人，这儿对一个瑞士姑娘来说是不行的。我希望她的话是对的，我希望他们在瑞士喜欢我。”

“当然喽，他们会喜欢你的，你会成为一个人人感兴趣的新人，从一个遥远的国家来的姑娘，”珍妮跟她说，她感觉到心里有一股柔情，也感到焦急，好像有人向她求助，她却无能为力似的。这张长着双下巴的、沮丧的年轻的脸，在喉咙底部胖得像甲状腺肿的皱纹，油腻的皮肤，没有灵活的眼神的淡灰色眼睛，没有亮光的浓头发，肥厚的屁股，臃肿的脚踝，她有什么希望呢？鼻子长得好，嘴长得好，额头还不错，这就是一切优点；这么一堆不怎么诱人的肉，一点儿都没有光彩，没有吸引人的魅力。然而，在内心里，年轻、天真、渴望、痛苦、困惑、狭窄的心灵，隐蔽的本能像蜗牛那样弯弯曲曲地爬行着，在盲目地摸索。

珍妮说：“这一回，我觉得你母亲的话是对的。让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有哪个想要结婚的姑娘结不成婚的，只是迟些或者早些。”

“啊，我知道，”埃尔莎说，现出沉痛的骄傲和诚实的表情拒绝接受这种半真半假的说法和这种说法提供给她的同情。“我

知道……有时候,我想,我要是有不同的衣服,"她说,"或者,我也许有一头永远不变的波浪型头发的话。也许有其中一样的话。可是我母亲说年轻的姑娘们一定要在各方面都完全自然和纯真。甚至卷发都不行。她们一定要等到结婚后,才能有这一切,连搽香水也包括在内……不过,我要是始终不结婚的话,那怎么办?"

珍妮说:"要婚姻顺当,你,你自己,一定首先要产生爱情。你从来没有爱过吗?"

"唷,没有,"埃尔莎用吃惊的声音说。"从来没有。可是我母亲说,我一定要等到一个男人先对我感兴趣。"

"兴趣!"珍妮说,稍微兴奋一点儿。"听着,"她尽量用听起来考虑得非常周到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声调说,因为她撑不下去了,要睡着了,"我累坏了,你不累吗? 谁先爱上,这压根儿算不上一回事,不过首先一定要爱上,然后婚姻关系会维持下去的。"

"不过,要是我始终没有产生爱情的话,"埃尔莎耐心地坚持着说,"会怎么样呢?"

"那好吧,只要发疯似的希望有人会爱上你,"珍妮说,觉得在一个慢腾腾地转动的旋转木马上。"你不明白吗? 这真的全都这么简单,埃尔莎!"

"不过,要是,"埃尔莎说,"没有人爱上我的话,会怎么样呢?"

"什么都没有,我猜想,"珍妮最后承认,被逼得走投无路,无处腾挪了。

"就是这话,"埃尔莎说,声调里有一种绝望的满足;她不再说话了。

第 二 部

公 海

没有房子，没有家……

（勒拉姆斯的歌）



里克和拉克，洛拉的两个双胞胎兄妹，一大清早就起来了，悄没声儿地穿上衣服；洛拉和蒂托还没有醒；他们的纽扣扣得歪歪斜斜，头发邋里邋遢；他们的带着戒备的黑眼睛使他们的淡黄的、轮廓分明的脸上现出一种冷酷、早熟、经验丰富的神情；一醒过来，他们就调皮捣蛋；一睡着，他们做梦也在调皮捣蛋。他们在演出中，穿着斗牛士和嘉尔曼[①]的服装表演一段歌舞；下场后，他们在化妆室中出于对彩声的忌妒或者完全是出于兴奋，互相扯头发。要不，他们志趣相投，想法一致，一鼻孔出气地处在同成人世界——或者倒不如说，整个世界，因为他们也不喜欢其他儿童，或者动物——进行剧烈的不宣而战的状态中。

他们的教名叫阿曼多和多洛雷斯，但是他们都为他们自己按照墨西哥的一家报纸上的滑稽卡通画中的主人公重新起了名字：里克和拉克，那是两条无法无天的粗毛㹴狗——他们一天又一天热情而忌妒地跟着两条㹴狗历险——当然喽，不是出色的狗，但是在它们的崇拜者看来，是他们希望成为的出色的魔鬼——在每一个境况中捉弄甚至是最聪明的人，把每个接近它们的人的生活变成使人死去活来的苦难，靠着它们的捣蛋的花招总是随心所欲，无往不利，而且始终安全脱身，不受打击。总之，它们是尽善尽美的典型，是孩子们首先钦佩和渴望模仿的典型。

甲板仍然是潮湿的，在清晨的太阳下，微微冒着水汽；只有几个水手在慢慢走动。里克和拉克走进一间书写室，里克在那儿默默无声地，好像事先计划好似的，拔掉一个墨水瓶上的塞子，把瓶子侧过来。过一会儿，他们看到墨水流出来，流到干净的吸墨水纸上，流到地毯上；接着，他们默不作声地走出去，来到轮船的另一边；拉克在那儿看到一个羽绒小枕头，那是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留在她的帆布躺椅上的；她一声不吭地拿起枕头，扔进海去。他们神情严肃地望着它在波浪上跳跃，想不通它在水面怎么会浮这么久。一个水手正好在他们背后出现；他们带着明显的干坏事的迹象飞也似的逃跑；他皱紧眉头，仔细地看看周围，想发现他们刚才在干什么，什么都没有看到，摇摇头，去干他的事儿了，这时候，那件罪证慢腾腾地在船尾沉进水中。

里克和拉克爬上竖在统舱甲板上面的船尾栏杆，向下盯着看一幅迷人的景象。几百人，男男女女，在甲板上打滚，在生病；水手们用喷水的水龙软管冲洗他们；他们躺在薄雾似的水中，只是时不时地抬起脑袋，或者试着滚到比较靠近栏杆的地方去。有个人坐起来，向一个离他最近的水手伸出手去；那个水手把水龙软管喷出的水减小到濛濛细雨，冲洗那个人的脸和头，然后加大喷水量，冲洗他的衣服，衣服仍然穿在他的身上，水龙头照冲不误。

另一个男人趴着，发出哼哼唧唧、咯嘟咯嘟的声音，好像他快要淹死似的。两个水手把他的有病的身子扶起来，把他带到通往黑沉沉的统舱区的楼梯的最低一级，在那儿把他放下。他

---

① 法国小说家梅里美所著小说《嘉尔曼》中的主人公，是个吉卜赛姑娘，后该小说被法国作曲家比才改编为歌剧，闻名世界。

马上侧身倒下去。“我们来叫他站起来，”里克，那个双胞胎兄妹中的哥哥一边说，一边脱掉他的一只宽松、沉重的棕色凉鞋，他抓住鞋尖扔出去。鞋没有打中他，打在一个坐在他附近、怀里抱着一个娃娃的女人身上。她的裙子湿得直淌水；她那双赤着的脚被脏水弄得黑糊糊。她抬头向他们看，握紧拳头，向他们高声叫出一连串精彩的脏话——这他们懂得——接着又加上几句他们没有听清、但是他们懂得意思的脏话。他们带着发现了什么的表情，第一次相对微笑，然后聚精会神地听着，望着她那张挂着一条条污垢的脸；脸在抽搐和扭曲，带着憎恨和无可奈何的愤怒神情。

一个在下边甲板上的水手捡起那只凉鞋，扔回去，他扔得那么准确，打中了里克的胸膛；几乎是同时，这对双胞胎兄妹各自被人从背后抓住一条胳膊；一个有绝对权威的严肃的声音说："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他们被那么有力地拖下去，连挺直脊背都来不及，但是他们拒绝针对那个年轻的船员的冷冷的眼光。他着实粗暴地摇着他们，说："你们要是再干这种事儿的话，在剩下的航程中，将会被关起来。听着，要记住!"他轻轻地推了他们一下；他们默不作声地跑去，一脸无赖的神情。

一个高个子、满脸怒容的小伙子推着一辆轮椅一路走来，轮椅上坐着一个快要死的男人，像童车里的娃娃。他们差一点没撞着那个男人。“滚开，”那个小伙子用西班牙语吼叫；他们从他身旁躲开，伸了伸舌头。

坐在轮椅上的那个男人周围都是枕头，在咳嗽，他白天黑夜几乎都在咳嗽，他的柔软无力的小胡子在颤抖，他的眼球黄得像芥末。

“停在这儿，”他跟那个小伙子说；他们随即停住；他衰弱地

伸出脖子看着下面甲板上的人们,面对这么重大的苦难,他的脸上现出病态的同情。这时候,有几个男人已经站起来了;他们沿着船的墙壁以及在栏杆前站着,挤在一起,而水手们继续在用水龙软管把他们的致病的污垢冲洗进海去。随后,他们互相拥挤,倒在潮湿的帆布躺椅上,身上穿着潮湿的衣服;在热得吓人的空气中,在他们的身上,升起一股奇怪的、腐败的蔬菜和动物混合在一起的臭气。

格拉夫先生低声说,好像在对他自己说话似的:"我只能想着这些有罪的人被允许去死以前还免不了要受多大的苦。我们所有的人都免不了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幸运地获得死亡,约翰。"一听到他的名字,约翰的嘴就愤怒和厌恶地颤抖。他没有回答。那个快要死的人向统舱区的方向伸出一只手,作出祝福的手势。"愿上帝治愈他们,给他们健康、美德和欢乐……我要是能抚摸他们,那有多好啊,"他用衰弱而自然的声音跟那个小伙子他的外甥说,"你一定要帮我到下面他们中间去,去抚摸那些病人中的几个;他们一定要被减轻痛苦,让他们受苦是不对的。"

约翰的本来就绷着的嘴恼火地扭曲起来,他的两只扶在轮椅上的手猛的一动:"你知道你是不允许到下面那儿去的。你干吗老是胡说八道?"

在沉默中,他们继续向前走去;轮椅发出轻微的吱吱嘎嘎的声音。"我宽恕你,约翰外甥,我宽恕你的狠心和恶意。不管怎样,你是伤害不了我的,不过,我可以帮助你,要是你让我干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办法帮助我,就是马上咽气,让我自由,"约翰用颤抖的低声说,把轮椅猛的一转。"你可以死,让我回家!"

他舅舅把这话考虑了一会儿,接着用合乎情理的声调说,好

像是在平时谈话似的："我答应过，我会留给你钱，约翰，要是你跟我一起来，照顾我安全地再到德国，看上最后一眼的话。难道这不值得考虑吗？"

"什么时候，"约翰疲惫地问，"什么时候？"接着，轮椅稍微嘎的响了一下。

"肯定不会久的，约翰，你指望我为你定下确切的日期吗？不过，我在一开始就跟你说过，你要是跟我一起来——"

"别拿道理说服我，"约翰说，"这些我全都知道。"

"而且你的母亲，我可怜的姐姐，她高兴你有这个机会。我在遗嘱中重新允诺把我的一切留给你，尽管你不配，因为你答应过要做人宽厚和仁慈，这是一部分条件。不过，把这一切都撇开不谈，你可以在德国完成你的学业，你压根儿用不着回墨西哥，我希望不用。"

"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他痛恨地说。"我母亲怎么会关心我的遭遇呢？她只要钱。"

"也许这话是说对了，我的亲外甥，"格拉夫先生说，话哽住了，又开始咳嗽。"然而，事实上，钱会归你，而不是归她。"他从他的薄毯子底下取出一个折叠的纸盒，把一口痰吐进纸盒。"我可以看出你是我姐姐的亲生孩子。她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们其余的人。她天性冷酷，心肠狠，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是我去吩咐他们给你备早饭的时候了，"约翰说。他突然喊叫，好像他要掉眼泪了。"干吗我不能跟其他人一起在餐厅里进餐呢？老是跟你在一起，在那个肮脏的房舱里吃东西，叫我恶心。干吗你不能独自个儿坐在这儿甲板上，待上一个钟头，让我去透透气。你是个自私的畜生，舅舅。我是当着你的面这么说的。就这样。"

格拉夫先生呻吟了一声，双手捂住了他的脸。“我的上帝，”他说，“去，去，把我留下。对，别管我。上帝会照管我的。他不会因为你这么狠心而让我受苦的。你爱待多久，就待多久。可是记住，我已经修订了遗嘱，使你获得好处；你将继承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其余的就是你和你的良心间的事儿了。”

约翰狠狠地大声叹了一口气，很快地推着轮椅。他已经饿坏了，啊，他要坐在明亮可爱的餐厅里那些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中间，也许会跟一个标致的姑娘交谈。他会摆脱一个钟头死亡、那种气味、祈祷、在喉咙里咯咯咯的痰、老年人的闷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气氛、疾病、嘀咕，还有抓住了不放……

“你会挺好的；我会把一切安排好的，你可以看一会儿书，”他说，他觉得自己冷静和坚决。不行，不管有多少钱也不行，不让他松一口气，不让他有一点儿自由，不让他独自个儿在甲板上转几个圈，哪怕再容忍一天也不行了，他会失去控制，砸烂东西。不行，不管有多少钱也不行。他用异乎寻常的轻手轻脚的动作缓缓地把轮椅推下去，熟练地拐进房舱门，打开舷窗，感到他的几乎要昏迷的舅舅的盯着他看的眼光中的无声的谴责沉甸甸地落在他的身上；他又跳出房舱去。走了六、七步，他愉快地吹起口哨，吹一支悲伤的小调：“Das gibt's nur einmal, das kommt nicht wieder[1]，”好像他高兴得要心碎似的。

戴维·斯科特睡在那张狭窄的、靠墙的铺位上；丹尼从上铺爬出来的时候，把他弄醒了。戴维很快地看了他一眼，假装睡着了。丹尼看来没有大的不对头，只是叫人厌烦。他的脑子里老

---

① 德语，“只有一回，不会再有”。

是单调地在打女人主意，确切地说，只想着性、钱，更确切地说，只想着他的不被任何人欺骗的决心，还有他的健康。

他一大清早起床，服一定剂量的冒泡沫的泻盐，服后，现出一副要呕吐的怪相。接着，在刮胡子的时候，他吃一块酵母、一小口一小口地嚼。他会把凉水泼在脸上，害怕地察看他的眼白。他的脖子和一边脸颊上有小脓疱，像是个十四岁的男孩。他通过他父亲的德国朋友们作了一个漫长而迂回的安排，在柏林的一家大化工企业里找到了一个工作机会；他时不时地含含糊糊地提到他作为化学工程师的未来。但是，戴维显示出不但对这话题一无所知，而且也完全漠不关心——丹尼想，戴维自称是画家的时候，有心思谈的是广告牌和房子——他们的话题狭窄得几乎一无可谈，除非念念不忘地盘踞在丹尼脑子里的三件事儿可以称为话题的话。

格洛肯先生几乎不说话，不过休息了几天以后，他看来身子倒还可以，在房舱里友好的男性气氛中，开始时不时地显示出是个性子相当好、眼睛闪亮的小个子男人，跟他在一起，那两个小伙子看来始终没有察觉他的脊背跟他们的不一样。有时候，他们一起讲德语，闲聊船上的种种事情；两个年轻人从来没有让格洛肯先生感觉到他们的一般生活经历跟他自己的大不相同。格洛肯先生一点儿不拘束。他睡得好，而且早晨一直让帘子拉下着，直到他可以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出现为止，免得他们看到他在作出最好的化装前那个难看的身躯。

在那个时候，在他的帘子后面，没有行动的痕迹。戴维一动也不动，但是怒火中烧地看到丹尼脱光衣服，在公用的洗脸盆里洗了一个海绵擦身澡。但是，我得在这个盆里洗脸啊，他想；他震惊和厌恶地仔细看着另一个人的赤露着的棕色肉体，好像硝

得很差的皮革，皮肤上长满着稀稀拉拉的鬈毛，一些毛脱落在沾着肥皂泡沫的布上和粘在有着淡淡浮垢的脸盆周围。他要是再这么干的话，我会把他从舷窗口塞出去的，戴维下定决心，火透了。然而，他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而且认识到他可能永远不会说。他会等到那个家伙走掉后，用消毒剂擦洗那个脸盆。他又热又紧张，坐起身来，用他的扭动着的脚趾头找他那双草拖鞋。

"你好，"丹尼用小心谨慎的声音说，"我他妈的马上就走。这儿太狭小，转不过身子。"

戴维觉得，对他来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不得不把他的皮鞋摆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或者在喝咖啡以前，除了珍妮以外，他得跟任何人说话，就会有压抑感；他说："我会想法去洗淋浴的，你不用忙。"

格洛肯先生从两道长帘子后面出来；他的稀稀拉拉、乱蓬蓬的头发都竖直着。他那张长着假哈布斯堡王室人员的下巴的长脸上布满着像网那样密的细皱纹。"早上好，"他说，声音像在发牢骚，不过并没有不快活。"劳驾你递给我那个小瓶，好不？"他指指那个摆在他喝水的玻璃杯旁的那个瓶。"方便的话，再请给我一点水。"

戴维把瓶和水都给了他，注意到瓶上标明着"每三小时服一次，或者按需服"，使他想起了格洛肯先生恐怕没有完全不痛的时候的。格洛肯先生伸出手来，把帘子分开得比他打算分开的多了一些，所以戴维注意到他穿着鲜艳的红色睡衣。凡是颜色浓艳的东西都惹戴维反感——不但是惹他的眼睛不快——他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不信任浓艳的颜色的，而且没有比服装的颜色他更计较的了。他自己的领带是从马路上的小贩那儿一买就是半打的那种黑色的打结的带子；他的袜子是黑纱的；他的一套

套衣服，除了夏天穿洁白的亚麻布和帆布的外，都是斑斑驳驳的灰色的、深灰的、浅灰的、牛津灰[1] 的和蓝灰的。他喜欢的颜色组合是各种灰色、棕色、赭色和深蓝色同大量的白色的混合，而他喜欢的、虽然不是他首创的理论是，那些穿色彩浓艳的衣服来"表现他们自己"的人，只是试图弥补他们自己性格中的缺陷，增加一个蒙骗不了任何人的门面。

他知道这个想法主要是冲着珍妮的，他刚爱上她的时候，她衣着鲜艳，好像一只金刚鹦鹉，为了让她自己高兴穿着浓艳的、色调火辣辣的衣服，在小小的画布上毫无顾忌地用原色挥洒像断裂的彩虹的几何图案。她原来对这样画好像也十分认真的。他渐渐成功地在暗中破坏了她对这种胡闹的画法的信心。她的调色板上的色调变弱了；她也开始穿不显眼的黑色和白色，只是时不时地围上一条深红的或者橙黄的围巾，而且她油画也画得少了，几乎完全用木炭或者墨汁作画。

他深深地希望她会完全放弃油画——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伟大的女画家，不过是一个伟大的男人的一个比较高明的门徒罢了；看到一个女人这么不循规蹈矩，他心里不安，他一会儿也没有信任过她的才能。他所能表示的最大的希望是做一个好的插图画家，而她却不屑做。但是，在她的整个性格中有种东西阻止他自己的活动：在她作画的时候，他就没法画；就像她在情意绵绵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自己在开始冷淡下来，不愿接近她，拒绝她。

珍妮在情意热切的时候，像一只猫，让人接近、抚摸、接触、拥抱，强烈地散发出一种充满情欲的神情，越来越强烈，结果适

---

① 一种深灰色。

得其反，反而几乎使热情变得冷淡了，因为她跟他不一样，几乎从来不想要直截了当地作爱，突然地、剧烈地、不顾死活地，干罢了事。她会从他的杯子里喝东西，跟他分食一个水果，一口一口地吃；她喜欢告诉他，她是多么爱他，尽管对那事儿她是去硬着头皮干的；不过，她跟他在一起，没有快活过；他们睡在一起的时候，就争吵。戴维看到格洛肯先生的红睡衣引起了一阵反感，使他一时间强烈地憎恨起珍妮来，他经常这样，而且越来越经常了。至于格洛肯先生——白天，在甲板上，除了他那条傻乎乎的颜色鲜艳的领带外，他的衣着寒碜、颜色暗淡，皮鞋已经破了。几乎人人避开他。他把人们吓走了；他的境况是这么明显的走投无路，他们害怕会沾上一些晦气。夜晚，在帘子后面，在黑暗中，裹在红绸睡衣里，他在梦想一些他自己的什么事呢？

丹尼在套上裤子，他的脸上展现沉思的神情。"唷，"他突然跟戴维说，"你知道吗，那个裙子上有红褶子的小妞他们管她叫帕斯托拉哩？嘿，在我看来，她热情奔放，像个爆竹。她时不时地向我飞眼风。你以为，这要花什么代价？"

戴维说："我想只要目前情况许可。"

"嗐，拿我来说，眼下交通堵塞[1]，没法交往啊。不过，我想我的前景会好一点儿。咱们在这艘船上要将近一个月，你知道。这可是一段挺长的时间嘛。我在担心未来了。"

戴维说："你还是试着把事情搁在一边，直到你到了柏林，她们在那儿要受到政府检查，要不，你可能在抵达不来梅港以前，就不得不去找舒曼医生了。"

---

① 上一句戴维所说的"只要目前情况许可"是一句成语，原文中有"traffic（交通）"一字，所以丹尼会说到"交通堵塞"。

“我知道，”丹尼说，脸色有一点儿苍白，“这我想到过。不过，各种事情你都能——得了，我想我能照顾自己的。”

“事情可能办得到，也可能办不到，”戴维说。“她们爱说什么，都说得出口，什么都说不准。”

“上帝，”丹尼真挚地说。他站起身来，在镜子里看他自己，用刷子狠狠地给了他的头发最后一刷。“可是，她看起来当然挺不错的，健康，而且样样都很好嘛。”

“你永远拿不准的，”戴维不怀好意地说。

“得了，”丹尼说，“我们还没到这一步哩。我要是能把她从那伙人中间单独引出来的话，”他说。“他们这么紧密地在一起活动，你没法在他们中间插一句话进去。”

贝贝，胡滕太太断定，在恢复。她进罢早餐，给它带回食物，跟她丈夫商量以后，就喂贝贝吃了，她安排了美美的一餐。“这幸运的小宝贝，”胡滕太太说，高兴地看着它吃，“它的本能和感觉是这么好，吃东西的时候跟任何动物一样，谦逊地脸向下，真是个莫大的遗憾。真是委屈它了。”

“它一点也不在乎的，凯特，”她丈夫说。“由于它的骨骼的构造，这个姿势使它更舒服一些。它坐起身子吃东西，是不自然的，或者说不对头的。我看到过孩子们出于无心的残酷，试着训练他们的宠物在桌子前就餐，那些动物吃苦头且不说，都是白费心机一场空。不错，我以为我们的好贝贝干得很好，并没有损失它应该有的什么。”

胡滕太太听了她丈夫的话以后，总是恢复信心，而且心情舒畅，给贝贝拴上皮带，接着他们仨去畅畅快快地散步了。在甲板上兜了七圈，胡滕教授计算出，是一次适当的保健活动正巧需要

的距离。但是，贝贝，它在开始的时候倒挺活泼的，在第三圈上它落后了，第四圈走了一半，它停住了脚，它的经常发作的痉挛发作了，当场丢丑，吓人地呕吐起来。胡滕教授跪下，扶起它的头；胡滕太太去找一个能舀一桶水来的水手。

几英尺外，她听到一阵笑声，一阵不表示欢乐的、喧闹的笑声，接着打了个冷战，辨认出那是西班牙喜剧歌舞班子人员的声音。他们有坐在一起的习惯，并没有会可怕地大笑的征象，脸上没有笑意，然而他们总是嘲笑人。他们直勾勾地望着你，哈哈大笑，好像你是个没法叫人相信的滑稽角色，然而他们的眼光是冷冰冰的；他们也不觉得快活，哪怕是损害了你。胡滕太太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他们；她害怕他们。

她没有看，就感觉到他们已经看到她丈夫和她的可怜的贝贝；她的感觉是对的。他们挤成一团，走过来，一阵风似的绕过那个天可怜见的场面；在经过她身旁的时候，他们的不友好的眼光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她。他们露出牙齿，发出讨厌的开心的声音。她感觉到自己的肥胖、自己的年纪、自己的粗大的脚踝子；西班牙人的苗条的身材和青春仿佛用尖刻、嘲讽的眼光瞟了她一眼，把轻蔑投在她身上和她这个人的一切上。

她找到一个水手，一个挺好的大男孩，长着一张端正的脸，他对晕船是熟悉的。他提来水，洗清了贝贝和地上，才走掉。胡滕两口子把贝贝放在他们的帆布躺椅旁，把折叠的浴巾垫在它的脑袋下面，一起坐着，两个庞然大物，一声不吭，觉得在那些人格亏损的人的眼睛里他们是被嘲笑的对象；那些人是真正的恶棍，根本不应该被允许坐头等舱。胡滕太太完全相信，在统舱里，有许多更配坐头等舱的好人。

在墨西哥，他们多年来处在那个有充分教养的德国人阶层

中间，已经习惯于无拘无束的气氛；这个阶层的德国人生活充裕，并且受到相应的墨西哥人阶层的极为尊重地对待。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外形，或者习惯，受到讥笑。不过，至于那些*Gachupines*[①]，那些下等的西班牙人，墨西哥人懂得怎么对付他们！胡滕两口子记得一个墨西哥人说过，在墨西哥的德国人从不厌烦地重复说：墨西哥人憎恨美国人，瞧不起犹太人，讨厌西班牙人，不信任英国人，欣赏法国人和德国人。一位无限聪明的墨西哥绅士在一个晚宴上编造了这段说话，它就像野火那样在他们的小圈子里传开去。是这种事情才使人在一个种族杂居而且风俗相当野蛮的外国里几乎安心居住下来。

教授先生多年来是墨西哥那所最好的德国学校的校长，那儿的小男孩把书包背在脊背上，戴着圆校帽；小女孩呢，在她们的素色的连衫裙上罩着黑围裙，头发都梳成闪闪发亮的、光滑的金色辫子。胡滕教授时不时地站在学校里教室的窗口——学校是德国移民买的一幢墨西哥—法国混合式大房子，被改建成像模像样的德国风格——望着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安详而精力充沛地走着，他们的脸和他们的简单的衣着显得这么纯洁；他端详着德国年轻人的驯顺的神情和良好的仪表，听着他们讲的重音正确、措词纯正的祖国语言，他可能自以为是在德国。啊，整个世界的人可能会变得这么秩序井然，安排得这么好，在基本原则上这么正直。他偶尔会产生的这个希望，使他觉得他是一个促使人类变得更好的伟大的全世界的运动的一部分，他向他妻子承认，这希望支撑他活下去。但是，他们有隐蔽的痛苦，个人的缺陷。他们没有孩子，而且永远不会有了。

---

① 美国方言，西班牙佬。

那条白叭喇狗贝贝已经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九年了，分享着他们的生活。它坐在桌子旁的地板上，吃着他们的手递给它的东西。它还是一只害怕黑暗、惦记妈妈的甜美的奶水、什么事儿都一点办法没有的、汪汪叫的小狗那会儿，就睡在他们脚旁。胡滕教授在心里承认他喜欢贝贝；事实上，尽管贝贝给他们带来麻烦，他和他妻子热烈、温柔和始终如一地爱着它。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感情一点也不荒唐；贝贝，它的性格高尚公正，值得他们关心，而且它用忠心回报他们。他可以从他妻子的脸上看出，她被船上那伙下流到了极点的西班牙人的讥讽和哄笑刺得伤透了心。胡滕教授分享着她的痛苦，混合着愤怒，还有一点儿害臊。他倒并不感到，托起贝贝的脑袋不是男子汉的行为，而是他没有适当地照顾仪表，在那些性情粗鲁的人面前显得可笑，是他的疏忽。想起贝贝是条品种第一流的叭喇狗，祖上哪怕不能说是毫无缺点，也算得上大名鼎鼎，这倒是一个安慰；它在体面的名狗展览会上得到过多得数不清的蓝绶带和紫绶带[①]。眼下，它也许上了一些年纪，而且又缺乏训练，可是它仍然有能力而且愿意保卫它的男主人和女主人，顺便提一声，还有它自己，抵抗一切攻击。贝贝要是听到一声令下的话，它仍然能像闪电似的跳起来，抓住那些在讥讽的黑黝黝的小个子中的一个的喉咙，没有它的主人的命令，绝不会放开。胡滕教授向瞌睡迷糊的贝贝探出身子，用低沉、急促的声音说："进攻，贝贝，进攻！"

贝贝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四脚爬动，稳住身子，它的眼睛骨碌碌转动着，它发出一声低沉、不祥的吼叫，踉踉跄跄，抬起扁鼻

① 此处"蓝绶带"指一等奖，"紫绶带"指二等奖，源出英国嘉德勋章用蓝绶带，巴思勋章用紫红绶带。

子，弓着背，伸展着身子。“你在干什么?”胡滕太太惊奇地问。“咱们要是不让它安静的话，它又会犯病的。”

“我忽然想到测验一下它是不是还记得它的训练，”教授带着满意的神情说。“没忘，它什么也没有忘。嗳，凯特，血统和训练对性格的形成和持续多管用。瞧这头好动物：它永远不会让咱们失望的。”

胡滕太太说：“它多么让我想起过去，想起咱们的生活。现在咱们又要回家了。”她温情脉脉地盯着贝贝看，但是她的思想被回顾和前瞻所打扰，因为没有一件过去的事情好像同未来有恰当的关联。她几乎害怕希望，因为祖国的种种事物一定变化很大；在许多方面，她没法准备好对付的办法。她把这些话都跟她丈夫说了。

“咱们正在去的地方，”他温和地劝她放心，“人、事情和办法变化很慢。咱们将生活在那些跟咱们差不多年纪、跟咱们的思想和感受方式一样的人中间。咱们将生活在咱们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朋友们中间，他们在眼下不可能变成咱们的陌生人的嘛——要不的话，咱们就只可能希望了，”他勇敢地加上一句。

胡滕太太默不作声，记起了在墨西哥城所有的德国移民都到电影院去看凯瑟琳·奥古斯塔·维多利亚[①] 的丧礼的电影。当宏伟的灵车由戴着钢盔的士兵组成的骑马的卫队包围着出现的时候，他们都默不作声地站起身来。像重聚在母亲墓旁的兄弟姐妹那样，他们全都一起哭了，每人转过身抱住离他最近的那个人。他们都一起出声啼哭，断断续续地抽噎和吞咽，最后电影

① 凯瑟琳·奥古斯塔·维多利亚(Kaiserin Augusta Viktoria, 1854—1921)：德国皇后，威廉二世之妻。

院里一片哀悼的哭声，充满怀乡的、安抚心灵的悲痛。他们全都唱《一座强大的城堡》、《啊，冷杉》和《守望莱茵河》，脸上还挂着眼泪。那时候，他们离祖国好像是那么近，但是永远不可能那么近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位善良、温和、长期受苦的皇后，她原来是他们在国内和家庭生活中尊敬的一切的象征，就像那个聚集着他们的最美好的回忆的、充满着人情味的壁炉。

"我在想，眼下它会是什么模样呢?"她要再问她丈夫，但是她知道，他回答不出，只能说些希望；她不想打搅他。

胡滕教授也陷入了沉思，在想这些年来，他是怎么工作的，毫无道理地希望，他光荣退休的那一天的来到，带着储蓄金和退休金，在想上帝会仁慈地让他再看到黑森林[1] 的托德莫斯乡他出生其间的那所房子；这一天已经来了，他却忧心重重。那会是什么光景呢？他用双手捂住脸，在帆布躺椅上探出身去；几乎他的胃里顿时泛起一阵晕船的恶心；胃里的东西直涌上来；最糟糕的想要呕吐的感觉撵走了他的舒适的虔诚。他抬起头，浑身直淌汗。"凯特，"他用绝望的低声说："帮帮我。看在上帝份上，快，别让人看见。"

恰巧让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看见了。不过，她太专心地在找她的鹅绒枕头，纯白的鹅绒外面是奶白和粉红色条纹的塔夫绸套，这是她去世了的亲爱的丈夫的亲爱的母亲专门从德国寄到墨西哥来的圣诞节礼物。她怎么可能摆错地方呢，她怎么可能一时忘在哪儿呢，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没法向她自己解释明白。甲板上的帆布躺椅太硬了，或者似乎可以这么说，这艘船上的样

① 黑森林（Black Forest）：德国巴登一符腾堡州一山区，其东、北坡森林繁盛。

样东西，不管什么，都无可置疑地更接近于二等货，所以这个枕头对她的舒适是不可缺少的。不管怎样，既然她是毫无疑问把枕头留在她的躺椅上的，这明摆着是某个人——尤其该找甲板服务员——的责任该把它抢救起来，送回她那个豪华的房舱。

她坚决地，不过亲切地向那个服务员迎上去。他是个说话有礼貌，而且专心听话的人，带着奥地利口音……管她叫"*meine Dame*[①]"，她倒更情愿听到更通俗的被称为太太。"它不可能丢失的，只是一时摆错罢了；我会去把它找来，还给你的。这毕竟是一艘小船；枕头不可能自己掉进海去！所以请别着急，亲爱的夫人，我不一会儿就会送来给你的。"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很仔细地把她的绿面纱围过头，在一只耳朵上面打一个结，注意到那两个可怕的西班牙孩子站在几英尺外，带着动物的好奇心只是盯着她看。她眯着眼，摆出一副打算惩戒的脸色，回答他们的注意；她在英国一个乡间的家庭当家庭女教师的时候，用这个办法对付她那些英国学生总是万试万灵。

"你丢失什么东西吗？"那个小女孩大胆地扯着嗓子问。

"不错，是你们偷的吗？"里特斯多尔夫太太严厉地追问。

一听到这话，他们看来好像奇怪地激动了；他们微微扭动身子，交换了一下邪恶的眼神；那个小男孩说："谁知道啊？"接着，他们两人格格地笑起来——那不是孩子的笑声——跑掉了。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正好在考虑，他们要是归她管教的话，她会拿他们怎么办；她走到甲板的栏杆旁那对年轻人附近，显然是美国人——到底是什么使美国人这么明显地让人一看就认出就是这

---

① 德语，"我的大人。"

个模样儿？一批批从欧洲坐统舱去的下等人和黑人的混合，使那个叫人沮丧的国家的血统渐渐混杂，结果只能使人的外形和智力平庸得难以叙述！——然而，她感到奇怪他们能找到些什么话，居然能这么谈个没完没了，他们至少有一半时间在相互交谈嘛；有人可能会想他们最后会把话题谈到无话可谈的地步。他们互相亲切地靠在一起，两双眼睛注视着闪闪发亮的水域，懒洋洋地谈着，谈话中出现短短的停顿。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并不指望无意中听到很多话，因为她稍微有点耳背，也不指望看到细节，除非是短距离的，因为她近视得很厉害。然而，考虑到这些不利的因素，她在适当的距离，靠在那个年轻人身旁的栏杆上，迅速地让她的眼睛把他看清楚，确定他比她想的更年轻。他的淡颜色的头发剪得很整齐，他长着一个好看的薄薄的高鼻子，一张样式挺好的嘴，流露出一般的，不过无疑是会使人上当的受过好教养的神情。他的浅淡的衬衫是刚穿上身的，但是他的白亚麻布上衣却需要洗了。

那个年轻的女人穿着一件短袖的、有腰带的、没有染色的连衫裙，那看起来好像是粗黄的麻袋布做成的。她的脸色苍白，脸太瘦了，高颧骨、尖下巴，显出一副泼妇的神情。她长着一双相当标致的浅色眼睛，黑头发朴素地从中间平分——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圈子里一个先进而解放的年轻女人，没错儿。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注意到，在安静的时候，他的脸色是阴沉的；她的呢，显得不耐烦。突然，他们两人一起抬起头来，哈哈大笑；他们的脸顿时眉开眼笑，露出开心的而且有一点儿不顾一切的神情。一听到这阵清脆悦耳的、表示青春幸福的笑声，她不由自主地微笑了；他们两人都看到她在微笑。他们的表情变得含蓄和冷淡一点；他们把脸转过去。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看到的足以使她相信，这是一对古怪的外国人；他们有些东西是她不了解的，也是一点儿都不喜欢的。他们不是她有心结交的、可以当旅行伴侣的那种人。她回到她的躺椅上，留意地整理她大腿上的裙子，向后靠去，惦记着她的枕头，取出她的记事本。

她的记忆力很差，但是她喜爱记录她每天生活的每一个最微小的细节——甚至记下在什么时候，她舀了太烫的汤，或者忘了在一封信上贴邮票——同哲学、观感、回忆和沉思的片断记在一起。多少年来，她用尖尖的、细小秀丽的笔迹，记下一段段简短的笔记，记满了一本本记事本；一本本记事本记满后，她就整齐地把它们放开，再也不看它们。她摇动着她那支用金带拴着的自来水笔，用英语写着：

"这两个年轻的美国人装模作样，总是互相连名带姓地称呼，也许是他们间唯一维持着的礼节，是一种非常缺乏社交经验的行为，也许只是希望让他们在公众中成为知名的人。在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衣着中，有一种轻微的道德松弛的气息——我没法确切地说明或者叙述。那不仅是气味。那两个名字是富有音乐性的，尽管稍微带点感情色彩：珍妮天使[①]——真名字，我想，是简，在德语中是约翰娜·恩格尔，而且要好得多——和戴维宝贝儿。后一个不但在美国人中间是一个通常用的爱称，而且是一个普通的姓，我想；在冷冰冰的英语中自然用得少得多，尽管它看起来好像是亲爱的这个词儿的讹误，迪林，是爱称，这

① 珍妮姓布朗，天使(Angel)是戴维对她的爱称；戴维姓斯科特，宝贝儿(Darling)是珍妮对他的爱称。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误把两个爱称当作他们的姓，引出下面一段缠夹不清的文字，因为"宝贝儿"同达林这个姓的拼法和读音一模一样，"亲爱的"、达林、迪林音又相近。

听起来好像发音是达林，因为英国人有把有些字的发音说得马马虎虎的习惯，坦白地说，我在那个国家漫长的、苦修似的七年里始终没有习惯过。我自然在慕尼黑的学校里把英语学得棒极了，而且一直听到说得很好的英语；在那以后，英国人的说话方式在我看来好像挺粗鲁的。唉，那些年痛苦的背井离乡！唉，那些可怕而滑头的英国孩子，她再怎么也得不到他们的爱，而他们不管怎样都始终学不会德语。*Deyaling*[1]，英国人最后会这么说；而美国人呢——看来他们好像是用语音学，或者按他们所说的那样，凭听觉，学习他们的语言的，因为他们不喜欢读书——会加上一个R的声音，他们似乎喜欢过分地应用这个字母的声音。在有限的范围内，这倒是非常有趣的。"

她把这段文字读了一遍，断定写得很妙，就此埋没，未免可惜，倒不如写在一封信上，寄给她最亲密的朋友和好久以前的同学索非·俾斯麦，她同上层人士关系密切，婚姻不幸，在慕尼黑过着豪华的生活。蠢头蠢脑的小索非试着跟踪她那个才华横溢的同学的思路，总是闹得晕头转向。她在本子边上注了一笔，"*Für liebe Sophie*[2]，万一她已经忘掉她的英语，那就得翻译"，接着她把记事本放进她那个扁平的大手提包，站起身来，去散步，在甲板上兜九圈。锻炼防止晕船，压制肝气上升，增强胃口；确实，流传着它对样样毛病都有好处的说法，尽管锻炼也许乏味；再说汪洋大海的无边无际的滚滚波涛激发起了不起的思想。

她的亲爱的丈夫过去教她这一切。他原是个不断活动的人，而且坚决相信——他的想法是多么正确——良好的健康是

---

① 此处是指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讥笑英国人对darling一字的发音。

② 德语，"为亲爱的索非"。

良好的道德所不可缺乏的。在他们几次横渡海峡[1] 中，他竟然拉着她上上下下，哪怕是在最恶劣的天气——他的确欢迎最恶劣的天气，认为那是对勇气的最叫人高兴的测验——当他们不得不紧紧抓住他能抓到的任何支持，阵阵波浪打在他们身上，好像他们快要淹死的时候。她觉得在平静的蓝色天空上什么地方，她的正当精力充沛和美貌的时候就在伊普雷[2] 的战斗中牺牲的亲爱的奥托，在赞赏地俯视他的美好、听话的南内尔在行走——可不是，独自个儿，奥托，独自个儿——就像他会要她做的那样，为了她的健康，在甲板上一圈又一圈地行走。

在第七圈上，她感到她的两只脚板在三英寸高的高跟鞋里支撑不住她了，暂时靠在她的躺椅扶手上，又拿出记事本来："要是那两个美国人还没有结婚的话，他们应该去结。不过，在那个荒谬绝伦的国家里，生活中的一切关系是那么反常，尤其是两性关系更是这样，几乎不可能用任何真正的文明标准来判断他们。"

把上面写的看了一遍后，她断定她犯不上写这些。她刚才的思想一直在哪儿转悠？她把这一段整个划去，在黑色的粗线上面写上："天气棒极了，只是太暖和了一点，惬意的散步，纯净的海风吹在我的脸上，思念着我亲爱的奥托和我们的幸福的然而实在太短促的婚姻这件喜事。愿他安息吧。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她继续散步，诚心诚意地走完两圈——同忠于奥托的幸福感一比，脚板下陷算得了什么呢？——双手拿着那个记事本，

---

① 指英吉利海峡。

② 伊普雷(Ypres)：比利时西佛兰德省一镇，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处曾数度激战。

好像那是本祈祷书似的。她遇见那对新娘和新郎也在散步，他们互相握着的手轻轻地摇摆着，两人都浑身穿着白衣服，模样很美；考虑到他们新近度蜜月，看起来好像太神清气爽和无所谓了。他们走近了，她看出那个新娘虽然神情安详，却脸色相当苍白，眼睛底下有黑晕，甚至有一点儿病容，也许？很正常嘛，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带着已婚妇女的赞同态度回答她自己。对那些在婚后外貌和举止保持不变的新娘，人就有充分的证据表示怀疑。哪怕有新婚的一切快活，人也没法从处女期进入紧张而有压力的婚姻生活而不留下看得见的痕迹。不管你怎么说，并不可能是遍地玫瑰[1]！她把这个想法考虑了一会儿，断定这是把她的思想引人禁区："甚至在她丈夫的最热烈的拥抱中，一个纯洁的女人再怎么也不允许她自已有不洁的想法，"奥托不止一次地教导过她；严厉的话，但是无疑是正确的。她坚决地把她的思想转到比较高尚的事情上去，再一次把对奥托的回忆放回到那个珍藏神圣的旧情往事的芳香的干花瓣罐里去。

珍妮一大早就出现在甲板上，待在大海和天空之间的淡蓝色的阴凉的早晨中，喝咖啡，开始用自来水笔速写；帆布的通风管道像一个传统式样的幽灵那样在统舱区就餐的地方的栅栏深渊上面伸开着一条条胳膊；贝贝，那条白叭喇狗好像刚从晕船中恢复过来，伸开四脚，沉甸甸地趴在地上。埃尔莎，她的同房舱的乘客，在她的记忆中，举着两条粗大的胳膊，在做头发；一个水手提着桶经过；格洛肯先生向周围很快地瞟了

① 指新娘要吃些苦头。

一眼，他的和谐的、有趣的畸形的身影鬼头鬼脑匆匆一闪而过。珍妮自己的身材小巧、匀称、标致，除了对爱情的饥渴外，它不会给她什么麻烦；她自在地坐着，有点懒洋洋地在纳闷，生活在格洛肯先生这样一个可怕的外形里，那可能是什么情况。这个想法着实吓了她一大跳，吓得笔都从手里掉到了地上，吓得她一刹那间眼前发黑，透不过气来，那就像一个小女孩又被锁在她奶奶的窄得像棺材的衣柜里。她把眼睛闭得那么紧，等她睁开来，她看到威廉·弗赖塔格先生穿过一团叫人眼花缭乱的彩虹似的光芒，迈着大步在向她走来，正把她那支自来水笔递给她。

他在她面前站住脚，接受她的感谢，看起来满面春风，和颜悦色，等待着被邀请跟她坐在一起。她把两条腿挪开些，在她的躺椅搁脚部位腾出地方给他。

“不过，你要是在干活儿的话……？”他说。

“那不过是闲得没事干，”珍妮跟他说。“单人游戏的一种形式罢了。我倒格外愿意稍微聊聊。”她向他探出身去，又感觉到她独自个儿的时候惯常有的怨恨的情绪、她心里的越来越厉害的痛苦和忧郁，一听到别人的说话声音和一有别人接近，就可能这么快地烟消云散；哪怕说话的声音不是冲着她的，在场的人是跟她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也照样管用。这家伙叫女人们惯坏了，她想：他对自己的魅力也许有一点过于自信，接着考虑到在跟戴维发展下去引起了许多气恼以后，跟一个没有他自己的麻烦的人交往，对她来说，也许倒是一场休息。

弗赖塔格愉快地准备闲聊，高兴地告诉她，船上有一个神秘的外国人，一个真正的政治犯，听说是从古巴被驱逐出来

的，跟造成大学关闭的学生闹事有关——在整个航程中都会被禁闭在房舱里，最后在特纳里夫岛[1] 的圣克鲁斯市被押下船。

“戴着手铐，我想，”珍妮说，“他是干什么的？”

“是个女的。”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希望不一样，”弗赖塔格说。“不过，除此以外，她是一位西班牙女伯爵；对船长来说，单这一点，就可能使事情完全不一样了。他向全船下命令，她得受到最周到的相待，还亲自派人去问她，她要什么。可不是，咱们的犯人不会受苦的。她在A甲板上独自个儿住一套贵宾舱——比我所能得到的待遇更好哩！”

“这样的话，我也愿意做犯人了，”珍妮说。

“可不是，那还用说。我最喜欢有空间了，比什么都喜欢，可是我跟那个七英尺高的瑞典人汉森同住一个房舱，他住上铺，两只脚伸在床外；每天早晨，我的脑袋老撞在他的脚上。”

“我那个同房舱的乘客也比较高大，不过是个很好的姑娘；我们没有什么磕磕碰碰的事儿。”

“嗨，我原以为你跟你丈夫住在一起哩，”弗赖塔格说；他的眼睛里闪耀出好奇的光芒，是这么快、这么露骨，几乎是在吸引人。

“我们还没有结婚，”珍妮说。她在那幅通风管道画上划了几条线条，然而坚决地不再增添一笔。“我们只是碰巧乘一艘船

---

① 特纳里夫岛是加那里群岛中的一个岛，是西班牙的一个省，圣克鲁斯是它的一个港市。

的朋友。"你竟然能这么低三下四吗？不，有个限度。她认为，她仍然知道有些限度在哪儿。从弗赖塔格先生那方面来说，这不完全是一个天真的问题。她仔细而慎重地看了他一眼。也许一点儿也不是天真，而是犯了一个错误，这他也知道。他的脸紧张而尴尬地抽搐了一下吗？要不，难道她在过分赞赏他的感情吗？他拿起她的画，一张张翻过去看；她从他的表情看，他压根儿不关心那些画。他拿着格洛肯先生那幅速写像停住了，最后说："太像了。我想不出他看了会怎么想。"

"他永远看不到的，"珍妮说，把那些画拿回来，放进画夹子。弗赖塔格说："我以前不知道你是位艺术家。"珍妮用惯常的话回答他："我不是，不过，有一天，我可能是。"

这个不祥的时刻过去了；但是，从现在起，将会有一连串这种不祥的时刻出现，不管它们会延伸到哪儿。她开始看得太清楚了，她既然跟戴维有了亲密的交往，她已经让她自己陷入了怎样的处境。在这一点上，她对整个人生正在丧失信心，好像生活中的每一步仅仅是从一个错误走到另一个错误而已，她想，可以回溯到从她出生的那一天算起——不，这太糟啦！我不会让这事儿把我完全抛离正轨的。那个可怜的埃尔莎以为她有什么不对头；要是她能知道我的情况的话，她的感觉会好些。然而，我要生活在洁净的氛围中，是就说是，不就说不，说出我的真话，而且要让人听明白，决不胡说八道。我讨厌半半拉拉的事情，半心半意，愚蠢、虚假的情况，虚构的感情，充气的爱情和装点的憎恨。我讨厌对着镜子盯着看自己和微笑的人。我要事情显得直截了当和清清楚楚，或者至少我要能看到什么时候它们变得扭曲和混乱了。其他任何东西都是糟糕透顶的，所以我的生活也是糟糕透顶的，我真害臊。我的脖子上围着一

只信天翁，我甚至没有向它开过枪[1]。我简直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儿的。

弗赖塔格递给她一支烟卷。"你喜欢散一会儿步吗?"

"啊，好吧，我想，开始踩着甲板转悠和跟每个人说'您好'的时候到了。"

"这是可爱的基督徒的问候[2]，"弗赖塔格和颜悦色地说。"可是我更喜欢乡下的印第安人'*Adios*[3]'的说法。不过，"他说，一边向一群正在迈着大步走过去的西班牙歌舞演员稍微点点头。"我怕对那些人是不适用的。"

"他们确实硬邦邦，对不对? 一声 *Adios* 会像人行道上的一个橡皮球从他们身旁跳开。"

"不过，他们长得挺俊，"弗赖塔格说，"也有一点儿危险。"

"我们允许他们有多危险，他们就会有多危险，不多也不少，"珍妮说;"干吗给他们说好话? 咱们确实需要干的是注意咱们的钱包。要不的话，一切都叫人腻烦透顶，我想——这一切暗淡的景色。这样的天气，"她发表意见，"不是挺愉快吗?"说罢，向上盯着看，一脸优伤。

他们慢腾腾地走着，跟形形色色经过的人点头；见了五十来次面，现在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点认识了。他们看到阿尔内·汉森跟大个子埃尔莎走在一起的时候，交换了感到有趣的眼色。她的身材矮小的父母跟在后面，隔开六七步，脚步机灵，脸色安详。埃尔莎戴着一顶小得很多的可笑的贝雷帽，因

---

① 典出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一舟子射死一信天翁，将其尸体围于颈间赎罪。

② 原文 Grüss Gott 照字面是"向上帝致意"，故弗赖塔格有这个说法。

③ 西班牙用语，和美国西南部用语，"再见"。

为害臊，浑身直挺挺的。汉森默不作声，眼睛笔直盯着前面看。

珍妮和弗赖塔格带着并不指望互相有更深的了解的旅客的轻松神情，用将信将疑的态度谈论起他们自己；那种貌似坦白的表情是出于考虑到将来可能毫无牵连。他告诉她，他虽然是个德国人，然而他身上有大量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血统，还有匈牙利血统，在他的奥地利奶奶那方面。这个家族的这一支找起配偶来，都是毫无顾忌的；那口子越是天南地北，来路不明，越好。除了这以外，天知道是怎么回事——看来还是别问的好。珍妮也说出了她感到相当骄傲的、血统混杂的祖先："西部精英，"她说。"没有鞑靼人、没有犹太人、没有中国人、没有班图[①]人，都是旧家的混合：荷兰人、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威尔士人、法兰西人，有一个高祖母的姓是西班牙人的——她偏偏有一半爱尔兰人血统——甚至没有匈牙利人的血统，"她告诉他，"尤其是没有德国人的。压根儿没有德国人的。"

他想要知道，有这么许多民族，他们都是有血统关系的亲戚，她怎么能这么肯定——难道她不喜欢德国人吗？难道是因为那场可恶的战争？那可是人人的过错，人人都吃了苦头的，德国人吃得最多；要是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站在德国人一边的话，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好！他的眼睛发亮了，他变得雄辩了。珍妮微微一笑：不管是谁的过错，她为她的国家不跟德国人混在一起而感到高兴。但是她马上感到一阵良心的刺痛，接着说："不，甚至不是战争。"她告诉他，她没有任何一种偏见。她有些年头是由祖父母，他父亲的父母抚养的，因为她母亲死得早；这些祖

① 居住在非洲中部和南部的一种黑人。

父母辈的人都是老式的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完全是狄德罗[1]和达朗伯[2]的单纯的后代，她祖父经常这么说；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比以国籍或者宗教为理由，对任何事情或者任何人表示哪怕一丁点儿的反对，可能更粗俗和不文明的了。这些全都是同道德有关的行为。“黑人从后门进出，那是当然的，”珍妮说，“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红印第安人，或者甚至一个印度人在我们的饭桌旁；各种各样的人被用这个和那个理由，多数是被用他们粗鲁或者讨厌为借口，排斥在外；不过，这仅仅是遵守当地风俗罢了，他们告诉我，或者说他们在运用他们的天赋的权利，选择他们交往人士——这两种做法都是教养良好的一个重要部分。啊，”珍妮说，“这活脱脱是珍藏在博物馆里的好教养啊！然而我喜欢它，我相信它的每一个字，我仍然相信……所以我始终没有被我的同代人赶上。我被陷在一整套理想的格言中，无从实行！我的激进分子朋友们把我看作年轻的化石。他们能把‘女士’这个词儿发音发得好像一个有伤风化的词儿；而他们当中有一个说：‘听他用那样的发音念“尚蒂伊[3]”——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会交上激进分子朋友的？”弗赖塔格问。“我看到过的那些都是手指甲很脏，而且都需要理发；不管遇到什么人，他们都伸手讨烟卷，然后把烟卷掐灭在他们的咖啡杯里。你那些

---

①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文学家、哲学家、《百科全书》主编。

② 达朗伯(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3—1783)：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哲学上崇尚理性。

③ 尚蒂伊(Chantilly)：法国的一个地名，该地出的瓷器即以地名为名。该地还产花边，也以地名为名，后镶有该花边的面罩、披巾等也以此为名。此处当指镶该花边的女子服饰。

激进分子朋友的行为是这样的吗?”

“他们有些人是这样的,”珍妮相当勉强地说,“可是,他们有些人的思想很有意思。”

“他们还是有思想的好,”弗赖塔格说。“你的朋友斯科特先生是个激进分子吗?”

“有时候是,”珍妮说,“为了争论。这完全取决于另一个人站在什么立场。”

弗赖塔格听了这话,笑出声来;珍妮附和着也笑了几声。静默了一会儿,他谈起他的妻子,不管跟哪个人交谈,他早晚总是要谈的。他叙述她的外貌,按他的爱好来看,很可爱:淡金黄色头发、红润的脸蛋、那种真正的莱茵少女,又一再透露她的迷人的姓名。“玛丽·尚帕尼,”他一往情深地说。“我想当年我是首先爱上她的名字,”他说。这一回,结果是她给他挑选的衣服,挑得比他自己挑的还要好,他认为;他看起来对他自己满意到极点了。在另一种人身上,她断定,这一切可能是叫人极讨厌的沾沾自喜。她告诉他,一个做女人的对为一个男人挑领带有一种特殊的自信心。她自己却从来不敢。他以为那完全取决于那个男人。

“我对我妻子对每种东西的爱好和评价有一种叫人难以相信的重视,或者说,近于这样,”他说。珍妮在想着戴维的那些单调的编织的黑色狭领带的那会儿,出现了一段空白的停顿。戴维的那种自负比弗赖塔格的那种糟得多;弗赖塔格的那种中有一点儿热情和豪爽的气概;可怜的戴维啊,独自个儿坐在山洞里,像个隐士似的向外凝视,打定主意,他剪下来的指甲也不跟任何人分享。

“我妻子在曼海姆看她母亲,”弗赖塔格说,“我去把她们接

娃被那个狡猾而报复心切的老上帝逐出之间的那短促的间隙，”他说。“不管什么人，一辈子一回都没有遇上这事儿，不管怎么说仅仅一回——也许它只发生一回——是不幸的，不管他遇上其他什么好事。”

“我想是这样，”珍妮干巴巴地说。

“你会管它叫德国人的多情，”他说，接着微笑起来，好像他想起了一件他知道的、使他高兴的事儿，一件他用不着告诉任何人的事儿，在对自己微笑。

“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珍妮说。“不过这听起来挺逗。”她的语气比不上她的话那么亲切；她回答的声调好像有一种小小的坚硬的锋棱，使他不愉快。他又感到他初次见到她、在他们甚至还没有交谈的那会儿感到的那种叫人痉挛的对她讨厌的感觉。他跨出一步，扩大了他们中间距离，默不作声。

珍妮看到这情况，奇怪地感到寒心。你也许有意用这些轻松的关于堕落的谈话使你自己变得非常吸引人，好像你知道有件你可以教我、而我很需要学会的事儿。按照我爱上人的情况，也许我会爱上你，也许我已经爱上了你；总是爱上完全陌生的人，好像我在沉人水下似的，接着我会再摔落，好像从悬崖上摔下。我真高兴，我对你什么也不知道，除了你长着那种我喜欢的面貌外——不管怎样，就是那一种——还有你已经结婚，而且急于让我明白你爱你的妻子。别强调了——我乐于相信你的话。我要是对你知道得更清楚的话，那我可能压根儿不喜欢你了——实际上，我甚至现在就不喜欢你了。我现在就能告诉你，你怎么也不会喜欢我的——实际上，你会恨我。在整个事情中，会有些事情我是绝对容忍不了的。那可能是什么，倒无关紧要；我甚至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我们要是能没有太多麻烦，就睡

在一起,忘掉我们自己一会儿的话,我会再次感到轻松的。我就能看得更清楚些。这只是——这是怎么发生的啊?我只是充满了渴望,可受到了冷落;我的男人不愿跟我共同享受快活,他样样都要独自个儿享受。那个西班牙人说什么来着——"是这面包好呢,还是我饿了?"还说了什么——"什么狗会拒绝扔给它的肉呢?"不过,这一句当然是针对你说的。

他们又转到她的躺椅前了。"我在这儿歇歇,不走了,"她跟他说,不再费心装出对她的同伴有兴趣的样子。他被她这么简慢地打发走,咽不下这口气。

"也许你乐意早晨去喝一杯啤酒,"他提议。"我早就想去喝了。"她摇摇头,微微扮了一个表示不赞成的鬼脸,没有看他。他马上转过身去,走了三步,跟胡滕两口子和贝贝在一起了,看来他们三个一伙都挺高兴见到他。珍妮知道,他们会舒适地坐在一起,面前摆着大啤酒杯,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说明或者隐瞒的事儿;个个都靠着他们的特殊的食物,养得营养充足,自己感到挺满足。他们会懒洋洋地靠着,身上凉飕飕,心里自由自在,身旁没有挨饿的牲畜;那牲畜或者坐着,靠虚无飘渺的白日梦支撑,而且脑子里受着怨屈的独白无声无息地折磨,或者,突然出声,叫的也不知是什么名堂——一个陌生人,一个裹在看起来像活人的血肉之躯中的真正的死神,在盯着他们看。

她拿起她的画,继续画下去。她把手伸到图画纸上打算落笔的时候,她的注意力就像火光似的闪闪烁烁地暗下去了,这时候,她陷入单调的困惑和犹豫中,担心起欧洲,担心起戴维来了,注意力也越来越差劲了——多糟糕的比例感!一个男人和一片大陆不可能同样重要,或者说不属于同一种类,或者说它们不应该属于同一种类——这是完全把不同种类的东西错误地混在一

起了，她断定，尽管她被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个观念控制着，被她希望的她能把生活按照她所希望的那样塑造、指引和处理这个观念所控制；要是她让戴维为她把欧洲毁了的话，那她一定甚至是比她过去所害怕的更蠢的蠢货。她靠在躺椅上，把那些画放在膝盖上，盯着看天空中那种适合于天使欢乐的纯净的蓝色亮光，默默地、心灰意懒地认命了，绝望了。

她自己很难承认是个蠢货，但是每一件符合情理的事物都指向这个事实。是穿上刚毛衬衫[1] 的时候了，是作祈祷的时候了。别变成一个迷失的灵魂，真是蠢极了，一种这么乏味的生活。珍妮回答她自己，因为她跟那另一个自我竟然用真实的语言而且面对面的方式谈话了：我没有迷失，我从来没有迷失过，而且将来也绝不会，除非眼下在这儿我是正在迷失。没有，我没有迷失；我是没法那么容易地摆脱出来。我只是不知道，我怎么来到这儿，或者我将怎么再摆脱出来罢了，可是我确实知道我的处境！为将来用最大的劲儿吹汽泡进行排练！这完全是个错误的地方，我从来没有打算过上这儿来，而且我原以为我是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去的旅途中——也许永远哪儿也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或者说不管怎样，我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别担心，我的姑娘，打起精神来——我们不会待在这儿的。

她仔细打量她刚才画的那些画——很差，没有完成，草率，观察粗疏，没有一点儿受到感受的气息。她的一切感觉都变成自我放纵、自我怜悯。她什么也没有干，只是画了一些呆板、生硬的线条，其中包含的纯粹是空虚。真是胡闹！她不老实地对弗赖塔格说过，她的绘画是一种单人游戏；这话冷不防向她出

---

① 一种苦行者或忏悔者贴肉穿的马鬃衬衫。此处珍妮只是譬喻而已。

击，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下子变成了现实。

在自卫中，她尽情把愤怒和憎恨发泄在戴维身上。她把那些画狠心地抓在两只手里捏皱，好像它们是有生命的东西似的；她能够听到它们在尖叫，快速地走到栏杆前，使劲把它们扔进海去，转过身去，不再瞟上一眼。黑和白——她不再需要它们。她会直截了当地用画笔和油画颜料画在画布上，像她从前所做的那样；去他妈的戴维的主意。我从前委屈自己，为了贪图眼前的利益，可那我也没有得到啊。得了，善良的上帝，你能想象吗？我一直在让那个家伙告诉我怎样画画。不过，不会久的，记住了。

她在躺椅上伸直身子，把她的深蓝色围巾拉到眼睛上面，挡住白天讨厌的亮光，但是有好一会儿，她的不愉快的、自知有过错的那部分脑子在跟另一部分进行对话。她尽可能向她心中的敌人解释她的过错、她的无可挽回的错误，并且为之辩护。敌人总是用同样的冷冰冰的不信任、同样的决定性的态度回答她，不断地说，不行，这样也完全不行。你知道，你是在干什么；你知道，这会怎么样的，它一定会有怎样的结果——一个怎样的结局，你干吗偏偏挑中这种没有出息的胡闹的事儿呢？大声说吧，女人，让我们这一回弄明事实真相，你要是认为你最后能承认就是这么一回事儿的话……那个像傻子和魔鬼合为一体的人的唠唠叨叨的声音说个没完，直到最后，珍妮被自我折磨弄得精疲力竭，侧过脸去睡着了，睡得很沉；在围巾被风微微吹动的时候，她的苍白的眼睑在围巾下面抽动；她的恐怖在她的睡眠中跟踪着她，使她做恶梦，什么也不宽恕她，不让她休息一会儿。

利齐·斯波肯基克好像被人追赶似的，奔跑着，还回头去

看;她整个儿斜冲在蒂勒船长的怀里;他挑中那天早晨在甲板上露面。哪怕完全只在陆上活动的人的眼里也不可能弄错,他是船长。他穿着一身笔挺的、没有丝毫缺点的白制服,制服上滚着金边,在他的胸前、领口和肩膀上缀着显示身分的金色纹章;他显得举止僵硬;他的脸上的神情活像一个神气活现然而身分较次的神祇:一个在努力维持他的权威方而变得性子有点暴躁、动不动就要冒火的神祇。他脸上的每一个部分都显示他爱发脾气,从他狭窄的额头,隔得很近的、表情狡猾的小眼睛到长长的、把阴影投在紧闭的嘴巴和固执的下巴上的尖鼻子。好像他自己的性格形成了同他性格相配的脸;他在那儿走着,独自个儿,一边带着不愿意的神情,生硬地点点头,回答乘客们对他尊敬的招呼,头上戴着一顶有纪念碑似的装饰华丽的帽子,白得像石膏。

利齐这一冲,几乎把他撞倒,她脚一滑,要不是船长应变迅速,冷静地稳住身子的话,她就会摔倒。他伸出一条胳膊生硬地搂住他,气得脸红里泛紫;利齐臊红了脸,呼哧呼哧地喘气,叽叽呱呱地说,拉着他站直她的身子,发疯似的搂住他的脖子,好像她要淹死似的。接着,她放开手,退后去,尖叫着说:“蒂勒船长,我多害怕啊——啊,我求你——天啊,我怎么可能这么笨手笨脚?”

船长气呼呼地瞪眼看着她,说:“没事儿,亲爱的小姐,没事儿。”接着神态庄严地往前走去,窝着一肚子火,咬着他的下嘴唇。当勒温塔尔先生相当神经质地冒昧招呼他的时候,船长眼光笔直地看着他,仿佛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勒温塔尔认为自己受到了冷淡,被刺得痛到骨子里,他的心碎了,他的臼齿的神经开始痛了,痛了几个钟头。他走到船尾,把头靠在两条胳膊上,默不作声地俯视海水,恨不得死去,或者自以为有这个愿望。他退进了黑暗而不通风的他灵魂中的犹太人居住区,跟他在那儿

找到的一切悲痛、啼哭的人一起伤心，因为他从来没有独自个儿在那儿过。他坐在那儿，双手捂着脸，跟他那些注定要毁灭的人一起，异口同声地哀悼，他无言地悲叹他们的无法诉说的、永生永世的罪过和伤心事；后来，心情稍微宽舒一点了，他的生命的核心部分开始寻找他的古老的辩解理由和报复手段。不过，这应该缓慢和秘密地来办。

当一片黑影笼罩着他的肩膀的时候，他挪了一下身子，没有转过身去，不希望遇上一双没有表情的、敌对的眼睛。一个发音含糊的美国人的声音用普通的语调说："你这是第一回乘横渡大洋的船吗？"勒温塔尔几乎马上心情愉快了，骄傲地说，"十年来，我每两年横渡一回；我有个小小的国际买卖。我到处走走。"那个美国人是丹尼先生。他凑过身来，看来十分友好，没有一点儿伤害人的意思。

"天啊，"丹尼说，看起来他真的感兴趣，"是吗？"

"南美啊，"勒温塔尔说，"整个欧洲啊，西班牙啊，还有不用说，墨西哥。墨西哥是总部：税率低，劳动力比较便宜，租金比较便宜，各方面的开支都比较低，材料比较便宜；那些印第安人劳工啊，他们几乎不花什么原料就能做出上等货，所以你应该看到，你给了他们好材料加工以后，他们能做出什么来。哪儿都有一座天主教教堂，"勒温塔尔说，"我能挣钱。念玫瑰经的念珠啊、石膏和木制的圣像啊，其中有些涂上颜料和装饰着真正的金银；各种各样的圣坛用品。这些都是挣钱的货。那些饭也吃不饱的印第安人会买一个圣像！我乐于让你看看我的样品；单说念珠，"他说，"我有各种档次的，从极普通的木制品，一直到手工制作的银念珠。有一些是我亲手设计的；那些已经是真的珍宝了，有蛋白石的、琥珀的，甚至还有那种墨西哥玉的。我甚至尝

试过用那种黑曜石做,不过用这种材料做不上算——太硬了。可是这些货都有市场,始终不滞销。”

他停住嘴,因为丹尼的脸现出不愉快的、表示偏见的神情。勒温塔尔看到这种神情越来越显眼,心里不安起来,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接着,丹尼说:“在这个地球上,如果有一种我瞧不起的宗教的话,就是那些天主教徒。他们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喜欢。在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只有档次最低的人,墨西哥佬啊、意大利佬啊、波兰佬啊,才是天主教徒;我说让他们信就是了——这对他们可够好的啦。”

勒温塔尔微笑了,他的扭曲的厚嘴唇和眼睑沉沉地耷拉着的眼睛形成一副龇牙咧嘴的笑容;这笑容把他的五官都牵扯到脸中央了。他松了一口气,他利用他们两人中间的共同的看法,花了几分钟有利的时间,确定了天主教的地位。修士们在听忏悔的时候对年轻的女人的行为啊、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中的种种秘密啊,出售为死人做的弥撒啊、崇拜偶像啊,一切弊端都又被纷纷揭露,而且遭到彻头彻尾的谴责。勒温塔尔甚至扩大他的话题范围,诉说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来自克拉科夫[①]的可爱的老祖母——“我看到过的女人中最出色的,”他说,“最好的”——提醒过他许多回,千万不要在午夜的时候经过一座天主教教堂门前,因为那时候门会打开,那一年死亡的所有会众的鬼魂都会变成猪涌出来,他们会吃掉你,在当时和当场。多少年来,他经过一座天主教教堂的时候,会吓得毛发直竖,哪怕是在白天。他记得他那位受到尊敬的祖母的确切的话:“那些肮脏的吃人野兽,非犹太人——他们甚至吃他们的兄弟——那些猪!

① 克拉科夫(Crakow):波兰南部城市,克拉科夫省省会。

于是，他们死后就变成猪，吃犹太小男孩!”

丹尼听了这话，皱起眉头，乜斜着眼看看勒温塔尔，好像从他的脑子深处突然记起了一件事情，接着用有一点儿带着挑剔意味的声调说：“我真不明白，你要是对他们是这样的看法的话，那你干吗干这个买卖呢。我认为，一种宗教不应该拿另一种开玩笑。我什么宗教也不信，所以我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碰巧特别不喜欢天主教，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也不想要摆弄他们的东西。”

勒温塔尔激动了，猛地把两只手掌向上一扬，说：“按照我的看法，这是一种买卖。这事儿丝毫不涉及个人问题。按照我的看法，既然有这么一种买卖，那么我要是不卖那些宗教用品的话，别人就会卖的。所以我干吗不卖呢？这跟宗教毫不相干，不管怎样，从我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嘛。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不是宗教。我的说法是，可不是，这不过是不折不扣的买卖罢了。这里丝毫不涉及个人的问题。”

丹尼挪动了一下，好像他要走开似的，勉强表示同意：“啊，可不是，这我能明白。买卖是买卖。不过，拿我自己来说，我不喜欢这事儿。”

勒温塔尔看着他走掉，感到这场谈话归根结蒂是失败的；也许他说错了什么，要不，也许这家伙不喜欢他的面貌——勒温塔尔也不怎么喜欢丹尼的嘛，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他一直觉得沮丧和痛苦；他跟丹尼交往并没有得到乐趣，然而还是认为他们本来是可以交往下去，一起喝一杯的。也许他的过错是没有邀请他喝一杯……得了，下一次吧，也许运气好些。

他对船长的感觉又来了，但是这次是以愤怒的形式出现。那头猪。那个服务员安排他一个人一张餐桌。而且他们给他端

来的是不洁净的食物——他只得靠鸡蛋、水果和烤鲱鱼过日子。在许多船上，他能吃到洁净的食物。啊，他需要比现在更小心和聪明——有时候，他遭受一阵阵恐惧的浪潮的折磨，因为他害怕不够聪明，有一天他们会捉弄他，而他呢，等到发现他们在捉弄，已经太迟。他常常想起他是生活在一个这么危险的世界上，他想不通他夜晚居然敢睡觉。但是，眼下他瞌睡蒙眬了。他摇摇摆摆、晃晃悠悠地迈稳两条腿，两只脚向外，轻轻地拍打着甲板，来到他的躺椅前，坐下身去，叹了一口气，充满着莫名的忧伤，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卷成很紧的波浪、头顶上突起一道脊的头发。他会睡到忘掉他的种种麻烦。他会睡到午餐时间，接着就会有鸡蛋或者鱼，有时候是从铁皮罐里取出来的。他极想望杜塞尔多夫和他表妹萨拉的宽畅、舒适的房子和上好、结实、清洁的伙食。

埃尔莎的母亲在一大清早，早饭前以母亲的身分给了她一场坚决而仁慈的谈话；她跟女儿说，她对男人们的行为用不着太拘谨。不用说，她并不被指望哪怕向那些糟透了的西班牙人或者那些疯疯癫癫的古巴学生瞟上一眼，但是船上毕竟有几个好男人嘛。弗赖塔格先生即使已经结了婚，舞跳得可很好；跟一个好舞伴有分寸地稍微跳跳舞，不管他结了婚没有，倒没有害处；丹尼先生嘛，尽管是美国人，可能挺不错；至少她可以试一回啊。再说，还有汉森先生，不管从他的哪一方而说，可没有叫人不满意的地方。“我跟你说过，要端庄，要有礼貌，这我并不是说你得坐着，一句话不说，或者不向周围看上一眼，埃尔莎；再说，汉森先生是个我信得过的人。他那种人，在任何情况下，是一个女孩子可以信赖的绅士。”

埃尔莎用叫人吃惊的态度说："我不喜欢他的相貌，他太容易发脾气了。"

"我绝不会看相貌挑一个男人，"她母亲说。"相貌俊的男人往往不老实。当你想到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一个性格稳定、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可以成为一家之主的人。一个靠得住的、真正的男人。我不认为汉森先生爱发脾气，他只是生性严肃罢了。说到在这艘船上大多数其他的人，我想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伙更下等的人了——所以那些男歌舞演员，拉－德－达－德达！还有所有那些放荡的女歌舞演员——真是丢丑。"

"汉森先生老是把眼睛盯着一个他们管她叫安帕罗的看，一刹那也不移开，"埃尔莎不存希望地说。"他要是喜欢她的话，妈妈，你知道他就永远不可能喜欢我。今天早晨，我看到他们站在一起，挨得很近；他在给她钱；我敢肯定。"

"埃尔莎，"她母亲说。震惊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话吗？你是不应该看这种事情的！"

"我没有办法，"埃尔莎说，哭丧着脸。"我恰巧从我的房舱里出来；他们在那儿，在过道里，离我十英尺不到。我不得不走过他们身旁。他们一点也没有注意。可是我没法相信汉森先生会喜欢我。"

"你别想不开，我亲爱的小姑娘，"她母亲说。"你有你自己的优点和品质，永远不要怕坏女人。男人最后总是回到好女人身旁。有一天，你会有一个称心的好丈夫，而她会沦落到待在沟里。你别担心。"

这次谈话没有使埃尔莎的心情好转，反而使她们两人都完全垂头丧气了。在安帕罗之后去得到汉森先生的钟爱，这个前景，不知怎么着，并不吸引人。她神情沮丧，交叉着双手放在膝

盖上。她母亲悲伤地稍微停顿了一下说:“瞧,要是那样能使你高兴些的话,我们到家后,我给你买一盒香粉。既然我们将又要跟我们同样身分的人待在一起了,也许是让你做一位真正的小姐的时候了。可不是,你应该有香粉了,你要哪种颜色的都行。”

“这儿的理发店里就有得卖,”埃尔莎怯头怯脑地说,“各种各样的都有,有一种有铃兰的香味。那是拉谢尔一号,正是完全适合我的颜色。我去洗头发的时候,恰巧注意到它……我……”她没有勇气说下去了,声音越来越低。

“多少钱一盒?”她母亲说,一边打开她的钱包。

“四马克,”埃尔莎说,拉着她站起身来,惊奇和高兴得说话结结巴巴了。“啊,姆-姆-妈妈,难-难道你是说-说我真的去买吗?”

“难道我没有这么说吗?”她母亲问,把钱放在她的手里。“现在去打扮得漂漂亮亮后再来吃早饭。”

埃尔莎把两条粗大的胳膊搂住她的丰满的母亲,紧紧拥抱着她,把她挤啊绞的。“别,别,喂,够了,”她母亲说,“别显得像个大孩子。”

埃尔莎一路向理发店走去,克制着不让她的眼泪淌下来。她出来吃早餐的时候,戴着一顶儿童尺寸的白贝雷帽,头发蓬出在帽子下;她的脸、脖子、胳膊和手上都均匀地抹着厚厚一层肉色香粉。她还大着胆子用珍妮的一支唇膏在她的嘴唇上稍稍弯弯地抹了一下。她母亲挑剔地说。“我没有说过要化妆啊,埃尔莎——这可做得有点太过分了——不过,现在由它去吧。”

埃尔莎脸涨红了;她父亲说:“啊,原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埃尔莎今天早晨看来这么漂亮的原因。嗜,只差把你的头发绕在

卷发筒上了，你知道下一件事情就是——”他微笑了，伸出一个手指头向她摇摇。“啊啊，嘿，要小心！”埃尔莎在默默的大喜悦中微笑，吃了一餐美好的早饭。

阿尔内·汉森不知道怎么会形成这个局面，但是他在走出餐厅的时候，吕茨两口子跟他在一起；他走在埃尔莎身旁；吕茨太太说，在早晨的微风中，到甲板上去短短地转一转，倒是挺愉快——他跟他们一起去吗？他回头向安帕罗瞟了一眼，像一个预料到要遇上最糟糕的事儿的人那样。她把两个胳膊肘撑在桌子上，用极快的速度做出一场生动的哑剧：对他或者是他的愚蠢表示怜悯，对吕茨两口子表示轻蔑，警告，侮辱，虚假的同情，最后是直截了当的嘲笑。

他转过身子，向前冲去。那个相貌平常的大个子姑娘在他身旁，低着头，眼光向下，看来她好像睡着了似的。这支小小的兴冲冲的队伍往前走着，但是约摸走了一圈以后，吕茨先生走上前来，跟汉森先生肩并肩了；吕茨太太呢，走在她女儿身旁；事情挺清楚，两个年轻人不会在谈话上有什么进展。

吕茨先生的脑子不在运作他特殊的幽默方式的时候，可以说是一贯坚持考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对任何陌生人的谈话总是首先问他干什么营生。谋生的手段越是朴实和直接，那个陌生人越是快赢得吕茨先生的尊重。他高兴地听到汉森先生在墨西哥是干开牧场这一行的。“啊哈，”他叫嚷起来，“我们挺合得来。我经营面包，你经营黄油。我在查帕拉湖[1]附近开过一家客店，可你瞧，我们经过仔细考虑后，放弃了这买卖。你对墨

---

① 查帕拉湖(Lake Chapala)：位于墨西哥中部瓜达拉哈拉省东南部。墨西哥最大之湖，为游览胜地，风景怡人，湖中有许多小岛和垂钓佳处。

西哥的牧场买卖觉得怎样?"

"我觉得没有出息,"汉森说。"我把它给卖了,我在回瑞典去。不管怎样,我挣够了在家乡重新开始的钱;在那儿,我将懂得要种种花招,而且懂得怎么提防。在墨西哥,他们天天改变规则。"

"啊,处处都只有一条规则,"吕茨先生说,来劲头了,好像他在吐露一条叫人愉快的消息。"大鱼吃小鱼,也许小鱼吃海藻。"

"可不,这我懂得,"汉森先生说,用有节制的笑声附和吕茨先生。

"你听我说,"汉森说,他被这个年轻人的出色的幽默感逗得兴奋起来了,"我们到酒吧间去再喝一小杯咖啡,或者,也许埃尔莎会喜欢来一杯啤酒,呃?"他俏皮地挑逗说。吕茨太太皱起了眉头,埃尔莎的抹着粉的脸涨得红里泛紫;汉森紧接着很快地说:"不,请让我邀请你。"

他们一路上小小地争论着谁请客这件事儿,直争到餐桌前,最后,吕茨一家三人作为汉森先生的客人,坐下来喝早晨的啤酒。

"你是丹麦人,"吕茨先生在最初的开怀畅饮后,亲切地说,"自然你会干上牧场买卖喽。"

"我是瑞典人,"汉森先生耐心地说,对于外国人没法一一分清丹麦人、瑞典人或者挪威人这件一辈子让人扫兴的事感到厌倦了。"稍微有一点儿不一样。"

"是这样吗?好吧,我自己是瑞士人,自然干开客店的买卖。从我曾祖父起直到我,我们在圣加仑开着同一家客店。可是我生性好动,生活优裕我觉得还不够,我一定要在瑞士以外的别处经营一家客店。瑞士,对我来说,太平静了。啊,就像旅游书上

说的那样，美丽、景色怡人、平静的瑞士。这是说得相当真实的。可是几乎每个礼拜，我收到墨西哥寄来的游览指南和小册子邀请殷实、务实的外国人到墨西哥去，去投资，发财。”

“我也是这样来的，”汉森说，“这话有点道理。”

“不过，不够全面，”吕茨先生说。“没有一个字说到政治，没有一句悄悄话说到革命。说的尽是美丽的景色、美丽的天气、美丽的钱快要把衣兜撑破的美丽的游客。听着，”他有点惊奇地说，“难道你不以为，我，一个早就相信这些东西的人，会对自己说，唷，这一切我们这儿已经都有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不对头嘛；瑞士是有许多游客，可是也有许多，许多，太多的客店。旅游买卖并不总是红火的。我们有淡季。有一些时候，我们都准备好，不惜无微不至地热诚迎客，可是没有人来。在墨西哥，那些小册子说——认真，由官方经办，出于专门的政府部门——一切都比较好。没有淡季旺季之分，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一年到头拥来，没有个完。便宜的食物、便宜的劳动力、便宜的房租、便宜的税金，样样便宜，只有游客除外。他们几乎全部是美国人。你可以按照他们通常在国内的花销，或者甚至多一点，收费。你几乎给他们什么都行，他们不会知道有什么不一样的……不用说，小册子不会用很多粗俗的话来说这种事儿，不过我是个好的客店主人，能从字里行间读懂意思。即使现在，它听起来还像人间天堂——得了，我们都知道没有那样的地方。在瑞士，来的是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中欧犹太人；啊，我的上帝，从前，还有俄国人，他们把我们逼得活不下去。还有各地来的政治避难者，他们看起来挺有钱，衣兜里却没有一个法郎[1]，老是

---

[1] 指瑞士法郎。

盼望明天有巨款到手……所以我们出国了，我妻子和我，还带着在这儿的埃尔莎，一九二九年那会儿，她还是这么高的一个小东西——"

埃尔莎忐忑不安，紧紧抓住啤酒杯。汉森向她短短地瞟了一眼，好像她是一件丝毫不让人感兴趣的、死气沉沉的东西，接着移开眼光。她母亲焦急地试着截住她父亲的眼光，但是没有截成。吕茨先生完全被他自己的故事控制住了，只跟汉森说话。

"当初我们告诉亲戚们，我们回来的时候，会成为百万富翁；他们相信我们的话。我们答应在这段时间里寄钱回来，让人人发财。事实是我们始终一个生丁也没有寄。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才开张，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跟政府安排妥当种种事情，这儿那儿行贿，跟本地的劳工斗争——故事太长，没法细说；不管怎样，这一切你也知道。不过，我们总算把一家像样的小客店开出来了；可不是，说真的，游客们倒是源源不绝而来，而且样样东西都出很好的价钱。一九二〇年，爆发了革命。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同样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一九二三年和二四年发生了反革命；后来，又是革命，一直不断，直到现在。最后，我们决定回转平静的瑞士。说到这儿，你都知道了吧？喃，也许咱们能谈一笔小小的买卖。从你们的国家里给我送来游客；我呢，会向你买几磅你的最好的黄油。我们也有黄油——我们在瑞士什么都有，可是不怎么够……"

汉森先生接着反过来热心地谈了一点出口黄油和奶酪，还有鸡蛋和烟熏咸肉的买卖，严格和详细地从估计会遇到的风险和会获得的利润这个观点谈起。埃尔莎泄气了；她敢肯定汉森没有跟安帕罗谈黄油买卖。得了，他倒真的干了一件好事儿，让人看到他性子别扭，难以相处。而且听他说话就像她父亲的一

样叫人厌烦。她为自己不喜欢他感到高兴，再怎么也不喜欢；她也不想要他喜欢她，然而她被他的怠慢深深地伤害，这看来好像他是有心侮辱她似的。不管怎样，他年纪太大了——至少二十八岁了。

她厌倦地深深吸了一口气，伸直身子，转过眼去看到晨光闪闪烁烁地跳跃在海面上。她默不作声地在脑子里涌起一股对他、对他的不礼貌、对他的笨拙的长腿、大脚和柔软的淡眉毛狠狠的怨恨。不行，她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男人。现在她母亲当然能看到汉森先生，即使没有安帕罗，再怎么也不是合适的人了。甚至在一艘船上作舞伴也不合适。不，她再怎么也不会跟他一起跳舞，哪怕他请她跳也不行。不过，当然喽，他再怎么也不会请的……

有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年轻的瘦学生，流露着危险的眼光，好像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也没有一个人是他害怕的，他在队伍的头上发疯似的在甲板上边打转，边跳，大声叫着西班牙词句——是一种俚语，她听不懂。有一次，他们经过的时候，他望着她，向她探出身去，他的半边脸上泛出微笑，好像他们两人有个秘密似的。他的一瞟像利箭似的射进她的眼睛，接着他继续边跳边唱。这一个才对她合适。她把脸靠在她的一只手上，生怕她的脸会泄露倾注进她心里的温暖和甜蜜。

"埃尔莎，"她母亲焦急地问，"怎么啦？你觉得不舒服吗？"

"不，不，妈妈，谢谢你，"埃尔莎说，没有从她的脸上移开双手，"亮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那个学生，好像埃尔莎已经用魔法迷住了他似的，出现在酒吧间里；他不跳也不叫，只是跟他其他两个同伙一起懒洋洋地走着，不过他在说话；他的声音传到她的嗡嗡叫的耳朵里。"*La*

Cucaracha Mystica[①],"他在说,用的是抑扬顿挫的戏剧腔,"就是这只神秘的蟑螂,昆虫的王后,在这艘船上,如火如荼的理想主义的象征。我看到了她。她在这儿,戴着珍珠,还有别的,一个囚犯。"

"蟑螂,蟑螂,"另外两人合唱,像猴子那样出于本能地捉弄人。第一节歌词他们才唱了一半,身子互相靠在一起,唱出糟透了的和声,这时候,通知第二批进早餐的号声响了。他们带着被饥饿所折磨的滑稽的神情,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向餐厅冲去。到了那时候,船上的每个人都巴不得吃东西了,楼梯顶上经常有一伙人挤在那儿打转;他们变得越来越少,渐渐变成一溜儿队伍。

进午餐的时候,船长坐在餐桌一头的主位上,餐巾的一角塞在他的领子里,整洁地铺在他直挺挺的胸膛上 。舒曼医生坐在对面另一头,心不在焉地在转动他的玻璃杯。一看到来进餐的女士们进来,他们两人都站起身来。船长抽掉他的餐巾,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又坐下,把餐巾塞在他的下巴下面。

利齐·斯波肯基克坐在他左面,格格地笑着,涨红了脸,带着害臊的亲热神情看他。"亲爱的船长,今天早晨咱们见过,我想!"她不得体地说。

"我们的确见过,我亲爱的小姐,"船长回答,摆出一副完全按照礼节的派头。在他右面,里特斯多尔夫太太以警告和指责失礼的神态监视地向她看了一眼,接着转过身去,向船长流露出她最迷人的微笑。船长的反应是露了一露他的两颗门牙和微微

---

① 西班牙语,"神秘的蟑螂"。

向上掀了掀嘴角。其他的人排在他身旁，向他垂着头，就像向日葵对着太阳，等候着跟他谈话。

"我在航行途中并不经常这么早就出现在餐桌旁，"船长说，好像他在念一篇演讲稿，"因为我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一定要奉献给我的船上的事务。可是我能高兴地说，尽管遇上了上千种困难和麻烦，这些加在一起就成为紧急状态，我从来没这么快、这么有效地排除它们过。在一艘船上，没有一个细节是无关紧要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候，最细小的疏忽也许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为了这个原因，"他说，"我通常不得不时时地剥夺自己跟你们愉快地同桌进餐的乐趣。不过，这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和舒适，我才剥夺自己的乐趣的，"他告诉他们，使他们永远欠他这份情。

娇小的施米特太太为她自己的大胆的行为臊红了脸，终于挤出了一句细声细气的话："哪怕是为了我们自己好，我们也被剥夺了乐趣。"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一听这话，恼火了；这话是应该说的，可是要用文雅得多的措辞说，要说得更有礼貌，而且不应该由施米特太太说，她绝不是餐桌上的上宾。然而，船长看来挺高兴。他文雅地向施米特太太鞠了一个躬。"你很友好，"他赞赏地说。

胡滕教授先生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谈话题目：船长的出场和他的权威；他用一般的措词谈论航海科学的重要性，把着重点从女性领域转移到男性领域："对这一行，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我一窍不通，"他现出一个知道在自己的领域里是权威的人的那种大方的态度，"然而，我带着始终不减退的兴趣观察，一切科学，就像一切技术，是怎样坚定地、不可动摇地以数学为基础的。没

有数学，我们哪儿有音乐、建筑学、化学、天文学，尤其是科学的航行技术，航海和航空两门？人们可以有把握把这看作一条规律，越是高明的数学家，就越是高明的航海或航空专家，越是高明的作曲家。我亲爱的船长，你自己从实际经验出发，同意这条规律吗？”

船长带着近乎谦逊的态度承认，他的擅长高等数学的天赋对作为海员的他始终有巨大的价值。胡滕教授接着把他的看法从纯哲学的观点微微扩大开去，这时候，其他的人，尤其是女士们，恭敬地、默不作声地听着，只有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除外，她已经在一会儿前失去了谈话的思路。

传来了一个轻微的但是受欢迎的打断声，人们又听到威廉·弗赖塔格跟往常一样拒绝接受美味的威斯特伐利亚烟熏火腿[①]作他的开胃菜。“那么，辣味蛋怎么样，先生？”那个服务员问，“要不，猪肝酱？”

“酸奶鲱鱼，”弗赖塔格说。“我想要。”

“啊，弗赖塔格先生，你是个素食者吗？”利齐问。“多有趣！你怎么能在进早餐的时候放弃那些美味的红肠和咸肉，还有这美味的火腿。有时候，你一定要试一试火腿和甜瓜一起吃。这才叫美哩！”

弗赖塔格舀了满满一堆新鲜豌豆，相当干脆地说：“啊，不，我从来不吃猪肉。”一听这话，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先跟船长，接着跟胡滕太太，然后跟里贝尔先生互相扬了扬眉毛；她的飞快的思想在他们三人的眼睛的快速的闪光中得到了回应。里贝尔先生不礼貌地微笑，向弗赖塔格伸出一个手指头摇摇，说：“啊哈！遵

---

① 最早产于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的一种以松柏枝烟熏有特殊香味的火腿。

照饮食的规定，我想是这样吧！”听到这个荒谬的想法——难道不是吗？——人人都尽情大笑、满脸堆笑地望着弗赖塔格先生，把他当作开得起友好的玩笑的人。然后，他们对犹太人和他们的无法理解的生活习惯作了几句交谈，小小地改变一下意见，就使他们成为同样类型的人，没有一点儿不可调和的不同；他们已经全都轻松地平静下来，准备换个话题；但是他们的注意力被学生桌上一阵相当明显的骚乱吸引了过去。

小伙子们纷纷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楼梯方向鞠躬，他们当中有一个像爆炸似的喊叫："Viva[①]！"进来的那个女人合乎礼节地微微向他们鞠了一个躬，非常老派，精通礼数，然后跟在一个服务员后面，来到一张小桌旁，她独自个儿坐下，背对着那些学生。他们又坐下，互相神情古怪而不怀好意地交换眼色，煞费苦心地用餐巾抹去他们的微笑。

她约摸五十岁光景，不久以前还是个出色的美人。她的脸光滑，是蜡色的；她的小小的丰满的嘴涂成鲜红色；小小的、聪明的眼睛周围抹着深蓝色，使眼睛变长了；她的淡淡地染过的泛红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卷曲在额头上和两耳旁。她身材苗条，只是小腹有点松弛；她的衣着尽管已经旧了，却看来非常高贵；拿她现在的情况来说，还实在太雅致了。她的耳朵上、脖子上、左手的两个手指头上都戴着巨大的珍珠。在她的右手上，她戴着一个似乎是颜色淡、瑕疵多的翡翠戒指，大小像一枚知更鸟蛋，周围镶着小钻。一双手，很窄，显得雅致，布满青筋，显出老相，一直在动。大拇指微微向手掌弯着，两只手没有目的地从餐桌边上移到膝盖上，不断地握紧又松开，平摊在空中，又弯起来，微微

① 西班牙语，"万岁！"

摇晃，伸到她的头发上，她的长袍的胸前，好像两只手另受各自的生命操纵，不受那个女人本人的意志控制似的；她倒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相貌有一点儿严厉，弯着身子在看摆在她的盘子旁的菜单。

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转过身去，盯着她看。

"她到底是，"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问船长，"从哪儿，哪儿来的？没有人看到她上船，在这以前也没有人在市里看到过她，"她说，疑惑地向餐桌周围看看，"至少，我们一个也没有看到过她。"

"这也难怪，"船长神气活现地说。"那位夫人——她是位西班牙女伯爵——是几个钟头以前，在别的乘客上船前，由两名警察悄悄地送上船的，他们原来打算把她押到统舱里去的；我想到，我在航行途中，将免不了把她铐起来，或者至少要把她关在一个房舱里。我不能对一位夫人这么做，不管她干了什么事儿，"船长说，他的眼光温和地停留在他的这位乘客上；他的眼光确实在这位贵宾身上获得享受，她是一位真正的贵族，看来在他的并不显赫的甲板上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品种。"不管怎样，我将设法像模像样地款待她；幸亏她的朋友们听到她将乘这艘船航行后，发电报到墨西哥去，给她订了个贵宾舱。"

"她的手！"利齐嚷叫起来。"她在用它们干什么？"

"她眼下处于高度发作的神经紧张的状态中，"舒曼医生说。"她的处境既然是这样，也许这是可以原谅的。不久以后，她会感到好一些。"他的声调和眼神都是干巴巴的、职业化的。

"有一点儿衰老了，"里贝尔先生说，接着顿时后悔他说话不得体，这时候，七双眼睛紧盯着他看，表示谴责。

"的确，她不年轻了，"舒曼医生说，"而她的麻烦是相当复杂

的——也许全都是完全不必要的，可是仍然……”

“这些拉丁美洲的政治犯我都要认真对待的话，”船长说，眼光尖锐地一张张脸瞟过去，“那我岂不是成了傻瓜了？我被告知，她是个危险的革命者，一个国际间谍，把带有煽动性的信息从一个骚乱和叛乱的温床传递到另一个，她煽动暴乱——你难以相信所有这种胡说八道。我个人的意见是，她是那些悠闲、有钱可是爱好刺激的贵妇人中的一位，她们陷进了恶作剧当中，还变本加厉地干了一些恶作剧的事儿，却一点也不懂得她们干了些什么——不管投身于哪一种政治的女人，千真万确，都是这种情况！——她因为多管闲事，已经大吃苦头。得了，”他的声音变得温和了，“这对她会是一次教训，咱们不用去加重她的惩罚了。反正她只到特纳里夫岛[①]。这倒不怎么糟；在这段时间里，我希望她旅途愉快。”

“那些带着明显的尊敬态度招呼她的学生，”胡滕教授先生思索地说，“跟我在墨西哥已经认得出的那种革命类型的学生很少相似的地方。照我的想法，这些孩子是被有钱的父母——他们没有认真地尽到做父母的责任——的过分的溺爱可悲地宠坏了的儿子。在墨西哥，说真的，在整个美洲[②]，这种人到处都是。我们的最需要坚持不变的问题之一，”他说，“是在我们的那些学校里保护我们的德国青年，避免受他们的影响。我高兴地说，依赖我们一向依赖的万无一失的德国品质和德国纪律相结合的训练方法，我们总算获得了勉强过得去的成绩。”

“在瓜达拉哈拉也是这样，”施米特太太附和着说，“我是多

---

① 特纳里夫岛(Tenerife)：北大西洋东部加那利群岛中最大的岛。

② 指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

么经常地听我亲爱的丈夫悲叹咱们的美丽的德国儿童被有害的外国风俗侵蚀。”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革命者戴这样的珍珠，”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她在按照她的思路想着，“那到底是不是的确是真的，真是可疑。”

“戴珍珠的既然是这么一位夫人，”娇小的施米特太太恭敬地说，“咱们可以相信是真的。”

“那些学生，”船长对胡滕教授先生说，截断女士们把话题向危险的方向转移，“由于最近的骚乱，古巴的那座大学已经不管他们的学业停课关门了，他们在乘船到蒙彼利埃[1] 去完成学业。那自然完全是最没有理智的那种混乱，好久以前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用一切必需的严厉手段镇压了。至于革命者，他们是一种我不熟悉的动物。我高兴把他们留给那些职责就是对付他们的人。”他把脑袋低低地垂到他的盘子上面，上上下下地摆动，开始狼吞虎咽进餐。

这个话题看来好像按照完全对头的调子令人满意地结束了，或者说搁起来了。

珍妮打了个盹后，尽管做了叫人忐忑不安的恶梦，觉得精神恢复了，心情也好了；她告诉了戴维她听到的关于那位女伯爵的事情，惊奇地看到他望着那位夫人的时候现出强烈的钦佩的神情；那位夫人倒已经比较平静了，把她那双近视眼凑近她的色拉盯住了看。“谁告诉你这一切的？”他问，不情愿相信珍妮说的任何事情，不管它可能多么有趣。

[1] 蒙彼利埃(Montpellier)：法国南部一城市。

“威廉·弗赖塔格，今天早晨我们在甲板上转悠的那会儿，”珍妮说。

“现在，这已经变成习惯了？”戴维问。

“这仅仅是第二回，”珍妮说。“我倒希望你看看西班牙滑稽歌舞班子。他们不是怪到极点了吗？她出于某种理由不承认那个西班牙歌舞班子里有活人在演出。他们看来好像是靠提线操纵的真人大小的木偶，用不断地重复优雅的动作演出一场感情粗俗的舞剧。他们的皱着眉头的脸，他们用动作来表示愤怒、发脾气、嘲笑和轻蔑，那一切看来都太不自然和显得过火，简直是不太可能；她不相信这一切竟然是活生生的人的表演。

那位女伯爵一出现，那些西班牙人几乎都把眼光盯着她看，简直再也移不开了；他们凝视的眼光中充满了彻骨的憎恨。他们互相用胳膊肘碰碰身子，低声说话，他们的嘴紧闭着，窝着火；他们吃东西，或者转动脑袋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也转动，保持着盯着看的眼光。

“他们要是打算抢劫她的话，”珍妮说，“在动手以前早就露馅了。那个他们管他叫佩佩的家伙的眼光一直盯着她的珍珠看，一回也挪不开。可我真的不责怪他——瞧，戴维宝贝儿，那些珍珠不是挺可爱？”

“它们看来是不错，”戴维说，“可是它们可能是从一毛商店里买来的珍珠，我也不知道啊。我从来没有隔得很近看到过一颗真珍珠。”

“宝贝儿，从你的话听来，你似乎有一个悲惨的童年。是这样吗？”

“可不是，我的童年他妈的的确是这样。”

“得了，你至少可以承认它们很美嘛。”

"我不敢肯定,我是这么想的,"戴维说,"我对那些买得起珍珠的人有偏见,所以看不出它们美不美了。也许它们美极了。我不在意。"

"你能这么坦率地承认,是好样的,"珍妮说,"真是好样的。"

"我要是知道它们不是真的,也许倒会更喜欢,"戴维懒洋洋地说,不感兴趣。

"可不是,宝贝儿,"珍妮说,突然高兴起来。"我知道,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不过,你会喜欢一个用锯末填塞的女人,而不是一个有五脏六腑的活生生的女人吗?真奇怪,"她说,"不过,我可以爱你,也爱真正的珍珠——嗜,这怎么可能呢?"

她对他微笑,他看到微笑使她的脸,总的来说,变得好看了,也用亲切的微笑回答她。他们互相觉得挺美。"你是说你是假的吗?"戴维问。珍妮说:"再说,珍珠也许压根儿不是她买的。也许她是继承的,也许是一个情人送给她的。"

"也许是吧,"戴维说,接着一阵愉快的沉默停留在他们中间。

在船长的餐桌上,胡滕太太看到她的丈夫吃得不好;实际上,他有气无力地摆弄着他的刀子,时不时地勉强举起他的叉着食物的叉子,只是装装样子罢了。他的脸板着,脸色苍白,额头上渗出一层细汗珠。没有什么目标的谈话转到教授那儿,却没有下文地停顿住了,由另一方面接过去。胡滕太太在享用她自己的午餐,吃到一半,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对她的丈夫恼火了——在涉及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是一个多么有理智的人;在抽象的概念方面,是多么聪明和面面俱到;可是遇到有关他自己的利益的问题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两个钟头前,

她扶他回到他们的房舱里,他让她帮助他躺平,把冷手巾放在他的头上;在他暂时的软弱中,他答应他会安静的并且让她护理他,直到他恢复健康为止。

后来,他事前一点迹象也没有,扔掉毛巾,坐起身来,用响亮、威武的声音说:"不,凯特,这是一个我不得不感到害臊的毛病……它只要靠小小的意志的努力,就会被治服的……"

胡滕太太看到他的老毛病马上就要顽固地发作,试图阻止他,好像它是一头在逃走的动物似的。"啊,别!"她斩钉截铁地说。"喂,意志对你没有用。让你的意志歇一会儿吧,放松你自己。这不是运用比较高级的官能的时候。"

她丈夫甚至不屑回答这种邪门的说法。他站起身来,挺起胸膛,两条眉毛紧皱在鼻子上面,一听到号角声,坚决地把她的胳膊夹在他的胳膊底下。

"向前走,"他说,"让咱们去呼吸新鲜空气,而且跟往常一样,吃咱们的午餐,把这一切晕船的胡说八道留给咱们的好贝贝,它没有智力可言——*il est chien de coeur*[①],"他俏皮地说;接着他们两人快活地笑起来,边走边笑,胜利地来到餐桌旁。

嗐,除非他们很快跑掉,天知道可能发生什么事儿。她突然丧失了胃口,胃里留下了一大片空白,却马上被恶心填补了;她做了唯一的不得不做的事情,骗她的丈夫和说服他离开餐桌。"对不起,"她说,站起身来,不看任何人,向桌子周围的人稍微点点头。"我亲爱的,"她向教授求助,"请你陪我出去,我觉得有点儿不舒服。"

胡滕教授先生马上站起身来,直撅撅地从他站着的地方向

① 法语,"它是条惹人爱的狗"。

后退，碰翻了他的椅子，他也几乎没有注意到。胡滕太太使出浑身的劲儿，支撑他那条来扶她的胳膊的分量。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了，只有尽可能快地走，不再说一句话。等到他们的房舱门安全地在他们的身子后面一关上，胡滕先生才发出一声响亮而空洞的呻吟。他趴在长沙发上干哕。贝贝从它待的角落里向他爬过去，舔他下垂着的手，与其说它是出于高兴，倒不如说它在尽它的职责；胡滕太太看到这个糟糕透顶的景象，简直要支撑不住了，脊背上感到一阵透骨的凉意。她也倒在床上，闭上眼睛。

"凯特，"她丈夫嗓音沙嗄地说，"凯特，帮帮我。"

"别烦我，"她用绷紧的嘴唇粗声粗气地说。她凭着一个缓慢的翻身，转过身子，伸出手去按电铃，她一直按着不放，直到门打开为止，接着她听到房间里响起救援的声音。良心、职责、关心、顺从——她的婚姻的一切花岗岩般牢固的基础，她的做妻子的经历从她身子底下无声无息地消逝了，她陷入可怕的道德崩溃的放纵中。换一换也好，让别人去殷勤地伺候他吧。让他为他自己干点事儿。甚至让别人这一次为她干点事儿吧！她对这个世界感到厌烦……她对人厌烦到要命……她用沙嗄、哽塞的声音要求女服务员照顾。那个女人的脸上本来相当和气的一副心不在焉的蠢相，一下子变得冷冰冰、恶狠狠；她把一茶匙一茶匙碎冰舀进胡滕太太的张开着的嘴；那只舀冰的手一点也不温柔。

舒曼医生午餐后在甲板上散步；他站住脚，向自从离开维拉克鲁斯以来第一次安排的马赛瞟上一眼；当他看到，尽管他已经明确地吩咐过，那个长着游动肾的男孩又被安排骑在跑道上的活动玩具马上参赛的时候，不由得发火了。少数乘客舒适地坐在周

围，他们的脸色平静自在，太阳眼镜下面的眼睑无拘无束，享受着阳光和海上的微风；但是那个孩子弯倒和直起身子，慢腾腾挺直他的有毛病的脊背，再弯倒；他的淡灰色的嘴的周围都是深色的纹路，他的嘴紧绷着。其他的男孩都强壮和干得了这活儿，但是他一直眼光向下，好像他对这份孩子气的活儿感到害臊。

再往那边一点儿，舒曼医生看到那个高个子、尖嗓门的女人和那个矮个子的胖男人，他们似乎是形影不离的，在动作激烈地打乒乓球；有几个人在那个设在比较低的甲板上、用帆布围起的小游泳池里水花四溅地戏水。在左舷，舒曼医生小心地绕过打圆盘游戏的场地，没有仔细打量那些打球的人，只是向他们那个方向点点头，算是问好；同时，他几乎没有看，却看到了里克和拉克，那两个西班牙孩子在引诱船上的那只猫，那只漂亮的老虎纹的公猫上当；他们摸摸它的背，在它的下巴下面挠挠痒。那只猫弓起了背，一脸被迷惑了的快活相，它允许他们在它左右把它抱起来。

它听凭摆布，毫不抵抗，显得沉甸甸、软绵绵、傻乎乎的；在它的恍恍惚惚的入迷状态中，它没有领会他们对它有什么意图，等到察觉，几乎来不及了。里克和拉克，脸色凶狠，手里加把劲，把它举过栏杆，试图把它推进海去。它把身子一挺，两只前爪拚死抓住栏杆，用后爪凶猛地乱撑乱抓；它的背弯成一张弓，它的尾巴好像变成了野生动物的长尾巴。它并不叫，却拚命用它的一切武器搏斗。

舒曼医生不由得向前跳去，把两个孩子从栏杆旁抓回来。他们带着那只猫飞快跑去；它从他们的紧紧抓着的手中挣脱出来，发疯似的径直从打圆盘游戏的场地穿过甲板——它通常不会这么干，因为它是一只有礼貌的猫。两个孩子抬起头盯着舒

曼医生看，他们的光着的胳膊上有一条条长长的被抓伤、在流血的痕迹；他们被他一手一个抓着，突然起步，一瘸一拐地走去。

他牢牢抓着他们，但是由于职业的训练，抓得很柔和，察看了一会儿他们的眼睛深处，对他们的盲目的然而毫不动摇的恶意，他们的冷酷的狡诈表示惊恐——不过，那不是野兽的，而是人的灵魂的。啊，可不是，是人，更是可怜，医生想，松开了两只手。

他们顿时自由自在了，他们的凶狠的小脸，除了神秘的性别特征不同外，几乎一模一样；出于本能的同谋关系，他们互相转身相对着，然后他们奔跑了，他们的膝盖凸出着，他们的乱蓬蓬的头发飘动着。他认为，按照惯例，他们至少应该在伤痕上抹几滴碘酒，但是他觉得他们不抹可能同样也行。

他在他遇上的第一张椅子上小心地坐下，尽可能轻松和从容地呼吸，下决心保持静止状态使自己心平气和。他患着一种非常普通的心脏病，可能随时突然死亡。他用两个手指头轻轻地号脉，但是他已经知道他的心跳是多少；他确切无误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遇上一次最微小的震惊或者突然的动作，就免不了会，或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一直受着这个经常发作的、症状相当不明显的疾病折磨，已经没有什么新的说法和想法了，尤其是，唉，没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了。

他一直尽量避免为自己诊断和治疗；他习惯于请教一些他认为比他医术高明的医生，希望相信他们为他治疗的办法，但是他用不着别人告诉他生的是什么病。结果，他尽管知道自己是个医生，有医学的专业，也感觉到自己是个随时随刻有生命危险的病人，在他的脑子里，已经不再去想医学科学上跟他的疾病有关的治疗方法 了。他坐着，像一个在暴风雷雨中坐在空旷的露

天场所的男人那样，带着命运已经注定的平静心态在一架他知道是神秘莫测的机遇的天平上计算。最后，他把手伸进里面的衣兜摸索，取出一小瓶去氧麻黄碱滴剂。

……在这场风波中，有件事情他再怎么也不可能对自己解释清楚：他明知道自己害病这个一清二楚的事实，已经排下有条有理的计划，要不惜任何条件跟疾病妥协，尽可能延长自己的生命，却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一只猫，一种他本性不喜欢的动物；狗才是他的忠诚的朋友。要是有时间考虑一下的话，他会跳过去，冒心脏停止跳动的危险，去救——甚至他的妻子吗？他从来没有被要求面对这种紧急的场面过，不用说，这个想法是荒唐的——不用说，回答是明确的，这个问题在好久以前已经解决了，或者他希望已经解决了。一想到那只猫，他在内心里微笑了，脸色安详，猫被认为是一切动物中最精明和最沉着的，它被挠挠它的神经末梢，被它自己的沿着脊背上的皮毛上迸发的愉快的兴奋引逗得险些儿送掉性命。在它著名的本能中，没有一点儿东西提醒它：那两只抚摸它的手乐意给它隐蔽的愉快，是为了他们可以更容易地抓住它的颈背，满足他们的心愿。

也许这不该叫人惊奇。除了猫以外，其他生物也有这种情况。爱！医生说；对于这个字竟然会一下子闯进他的思想感到惊奇。他对这个字的真正意义表示恰当的尊重，马上又把它撵出思想。他已经度过他一生中最好的年代——毕竟，在那之前他已作好了准备，他可能用别的方式度过吗？——扮演过种种角色：受骗的啊，鲁莽的啊，固执盲目的啊，以及受苦受难的情人；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在扮演那种角色时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会对他自己造成什么后果，然而在他喜爱的欲念的强烈的刺激下无论如何抑制不住又一次奋不顾身的追逐——美酒、吸毒、性

爱、美食——不管那欲念是什么，哪怕可能送掉他自己的性命。

送掉他自己的性命，或者我自己的性命，我知道，这无关紧要，舒曼医生说，尤其是我自己的，要是我跟性命和解了的话；他又把两个手指头按在他的手腕上，等着。他深深地巴望活下去，哪怕只能呼吸也行，在他熟悉的躯壳内活动，安全地待在自己的身子里，一个他知道是家的所在，他没法控制在他浑身奔流的、热烈的、兴奋的浪潮，好像他已经喝了他的芳香扑鼻的烈酒似的。“我的上帝啊，”他说，眼睛聚精会神地盯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波浪没有思想、没有感觉地服从一股在和谐的宇宙中的力量，一个接一个地后浪赶前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

舒曼医生信奉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最后还信奉圣母马利亚，是按照特别直截了当的巴伐利亚天主教派的方式；他向包括其他一切神明的上帝呼吁，闭上眼睛，把自己交托给仁慈的上帝，感到安慰和平静。他从容地从脉搏上移开手指头，不理睬震动他鼓膜的心跳；有几秒钟，他整个人几乎完全顺从这个死亡的前景，短暂地但是满意地轻视肉体的怯懦。他接着认识到滴剂在起作用，就像它们以前起过作用那样，就像它们再三起作用那样，认识到这次发病，一次轻微的发作，正在过去；他又一次逃过了死亡。他睁开了眼睛，不引人注目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同时注意到约摸二十英尺光景外一幅叫人难忘的情景。

那个女伯爵在跟年轻的水手讲话。他是个相貌长得挺俊的人，肩膀和胳膊都现出健美的男性肌肉，一张阔嘴，鼻子稍微有点儿扁。他笔挺地站着，双手贴在左右两侧，但是他的头斜开着，他的眼光偶尔很快地掠过女伯爵，不自在地向她瞟上一眼。他的脊背对着栏杆，他几乎碰到它了；女伯爵站在他面前，谈得非常热切，但是慢腾腾地伸开两条胳膊，好像她要挡他的道似

的。她的两只大拇指弯在她的平摊着的手掌里,手掌单调地打着拍子;她的眼睛像玛瑙,她伸出脖子,身子左右摇晃,试图强迫那个孩子看着她的脸。他的头避开,远远地避到一边去,然后慢慢地又转回来,不停地微微点着,好像在恭敬地表示同意,但是满脸害臊和局促不安的神情。女伯爵拍拍他的胳膊;他的胳膊一被碰到,他猛地一跳,好像他被一根通电的电线的一头触着了似的。他的一只手飞快地碰了一下帽檐敬礼,像个自动装置似的,他从她身旁走过,一把抢过他的水桶和刷子,迈开大步走过去,他的耳朵都红得泛紫了,撇下女伯爵站着。过了一会儿,她向同一个方向走去。她的脖子和脊背挺得笔直,她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贴在两侧。

舒曼医生发现自己在这件事儿上有过三个念头,那就是,被这种奇特的行为勾起了单纯的人类好奇心,对那个给他留下美得异乎寻常的印象的女人产生的一种不情愿的赞赏的心情,和那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的职业兴趣被引发了,他远远地跟着她,装出一副随便转悠的模样。

在下一个钟头里,医生看到够多的事情,使他深思。不管她在哪儿看到一个单身的男人,不管是哪一种男人,只要他年轻就行,医生看到了不管是水手,还是高级船员,或者是乘客,她就把他逼到角落里,或者贴在墙上或者栏杆上,或者想方设法地使他站着不动,总是用那种亲密的方式说话,好像她在向他倾诉一个他们会不得不表示同情的、叫人痛苦的秘密似的,这使医生对她的道德大加非难。

这种倾诉对几个不同的年轻人产生的效果却惊人的相似。开始的时候,他们都现出彬彬有礼在听的神态,很快就现出越来越吃惊的表情,接下来都露出一副痛苦的尴尬相,然后是完全心

慌意乱了。他们脸上的古怪的微笑僵住了;他们的眼光开始东张西望,在寻找脱身的道路。最后,他们会在她滔滔不绝的叫人不安的说话的一次停顿中,或者像受到远处的示意,突然不顾一切地硬冲出去。

舒曼医生始终没有走得近得可以听到她在说些什么的地方,但是她的动作深深地使他震惊,尽管他是个不容易大惊小怪的人。她抚摸自己的乳房和大腿,拍拍听她说话的人的脸,把手按在他的心口。然而,她脸上的表情是万分痛苦的,她的话好像是严肃和绝望的。"也许我不够年轻,没法吸引她看上我了,"舒曼医生有点儿辛酸地想,"我明摆着压根儿不是缓和她痛苦的料,"但是他慎重地决定要阻止她的行径。他强烈地感觉到时间和它对人的机体的作用,他还感觉到人多亏他自身的尊严,才能泰然自若地生活在世界上他自己的时间限度内。

撇开其他一切考虑,他沉思着,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女人,总是要出丑和反常的,在他们最正常的时刻显示出叫人不安的天生的反常迹象,为了满足性欲退回到青春时期;反常的父母吞噬他们自己的儿女——用严厉的措辞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乱伦……好吧,他会弄明白的。显而易见,这个女人害着严重的神经错乱的毛病;她不该独自个儿旅行,她的囚犯的处境证明她的不负责任,而且她一定确实没有朋友。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神经崩溃"——丧失人的爱和同情,彻底地疏远跟同类的共同生活——所造成的最初的、最可怕的效果。疯狂始终没有使他认为只属于他的医学科学实践范围,而同他的神学信念无关;疯狂,他考虑着,是恶在人的灵魂中暂时的胜利;他看到的痴子无一不显示出乖露丑的形象。让科学干它可能干的事儿吧,在人的命运中却有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团,除非有神的启示才能

分晓；就在生命的底层，有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就在那儿，舒曼医生作出结论，他的柔和的眼光打量着女伯爵，在人力达不到的地方，上帝开始有所作为了。

女伯爵走得相当快，在甲板的北端不见了，舒曼医生随即转身穿过酒吧间，在对面出现，打算慢腾腾地向她迎面走去。但是，一看到她，三个古巴学生离开打圆盘游戏，拥到她周围。她为他们现出一副新的神情，温柔、优雅、宽容。他们跟她一起，也互相迈着整齐的步子，而且对她必恭必敬，殷勤备至，简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经过舒曼医生身旁的时候，她在说话，所以他听到了几句她用虚弱、抱怨的声音说的话："像野兽那样被追捕，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我的宝贝儿；他们逃到树林子里去睡……所以我只能等着，受着痛苦；受着痛苦，等着——我没法为他们出手，尽一丁点儿力——"她猛地举起双手，在她的头顶上画了个圈。"不过，他们造反是对的，他们是对的，我的孩子们，哪怕他们为此丧命，或者我得丧命，或者流放……"

那几个学生装出一副夸张的忧伤的神情。她皱起眉头，视而不见地向他们微笑。一个学生后退了一两步，冒冒失失、极不礼貌地对舒曼医生眨眨眼，然后迅速地用食指轻轻点点自己的额头。他得到的回答是严峻的、毫无表情的、狠狠的盯视，甚至使他感到窘困；他随即急忙追上他那一伙。舒曼医生看看他的表，小心地、慢腾腾地抽了一口气，觉得肉体和精神都受到压迫，决定在下午其余的时间里安静地睡觉。

利齐·斯波肯基克和里贝尔先生很快地打了一局乒乓球；开始的时候，打得倒挺轻松，但是马上变成一场决斗。他们把那个小球来来往往地击过网去，啪扑扑啪，他们的抽球越来越短，

越来越快，他们的脸渐渐红得发紫，他们恶狠狠、不出声地直打得像两个机器装置似的。最重要的是非胜不可；他们不再脸带微笑了。女伯爵和跟她在一起的那三个在唱《蟑螂》的学生，突然向他们冲过去，来到利齐背后，接着从她身旁走过去，没有停顿，也没有瞟上一眼；但是利齐犹豫了一下，她的眼光向旁边看了一下；最后，里贝尔先生胜了。

"啊，真不像话！"利齐尖叫，从乒乓桌旁迈着大步奔过去，用她的小小的球拍拍打那位得意扬扬的里贝尔先生的秃头。"要不是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和那些蠢头蠢脑的学生的话——他们——他们——啊，我干吗总是免不了遇上这样的事儿？"

里贝尔先低头避开；他宽容地安慰她："嗐，得了，哪怕咱们当中最好的有时候也免不了要输。咱们别这么计较吧。别忘了，打球才是重要的，赢球算不了什么。"

"你倒挺会说话，"利齐叫着说，又举起她的球拍。他灵巧地抓住她的手腕子，把她的手拉到他的嘴边，使劲在她手上美美地吻了一下。"唷，"他说，"这是一只多漂亮的快手；下一回，它更会快得多。别因为没赢我不高兴。我是迄今连续三年的墨西哥城 *Sportsverein*[①] 的乒乓球冠军。"

"这话我倒能相信，"利齐说，心情平静了一点儿。"我难得在这种游戏上输掉。"

里贝尔先生的眼睛顿时意味深长地闪闪发亮。"那么，你在什么游戏上确实输了呢？"

利齐猛烈地摇摇胳膊肘。"你要是这样说话的话，那我就离开你，"她威胁着说，头向上一甩，像一匹不驯服的牝马。"不行，

---

① 德语，"体育会"，此处是指墨西哥城的德侨体育会。

我可不愿听这种话，也不愿回答。”

“聪明的姑娘，”里贝尔先生嚷着说，“没有什么可以逃过你的注意。我说，我们去稍微游一会儿泳，凉爽凉爽身子吧，除非，不用说，你又要打败我，”他无限淘气地说，“玩乒乓球，或者玩任何游戏——任何游戏，你挑就是？”他那么热烈地紧紧抓住她的胳膊，利齐的脸都涨红了。

“行，行，我们去游泳，”她说，她的声音提高了，“啊，我们得赛赛。”

六点钟，一个服务员给舒曼医生带来了女伯爵的信息，她说她病了，得马上请他去。一个女服务员等在女伯爵房舱外，她看到医生在走过来，就相当响地敲敲门，动了一下，好像要跟他进去似的。

“你可以走了，谢谢，”女伯爵对那个女服务员说；她说话的声音是一种相当遥远的、生硬得像金属的声音，这表明她是一个善于对付她憎恨的佣人，而他们也憎恨她的女人；她向那个女服务员的右面稍微看了看，好像她已经不在那儿似的。那个女人，好像是同一个师父调教出来的，马上退出去，眼光盯着看约摸跟洗脸盆一样高下的空中某一点。

房舱的空气里弥漫着土耳其烟卷的烟雾、混合在一起的各种冲鼻的气味，和醚的味儿。式样豪华、使用得很旧的行李处处摊开着，还有鞋啊、晚会用的披肩啊、奇形怪状的帽子啊、皱巴巴的精致的脏手套啊，还有倒翻出来、撒得四面都是的灰色的人造花，那些都已经变成绸缎的粉末和天鹅绒的碎屑了，真是一片混乱，不堪收拾。女伯爵躺在床上，一件退了色的粉红睡袍褪在她的雪白的双肩下面，肩上只穿着紫罗兰色的薄纱睡衣。她坐起来，瞪着眼看，张开嘴，不说话，她抓紧着的双手一下分开，向后

一甩，又向前，又向后一甩，最后，她直喘粗气："你一定要救我，我想我快死了！"

舒曼医生打起精神，装出最平静和最镇定的神情，把他的一只手掌按在她的额头上，好像她是一个孩子似的，接着说："我可不这么想，至少现在还不会。"

她把头垂到蜷起的膝盖上，突然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一阵阵充满着断断续续的话的、诉苦的哭声，但是舒曼医生看到没有眼泪。他坐在她身旁，开始从他带来的那个黑色诊疗工具箱里把各种不同的器械一件件拿出来。她停止哭泣，马上好奇地盯着看那个箱子的深处。他利用她默不作声这个机会，问了她几个有关于她身体功能的、简单明了、不得不问的问题。她回答得清楚而得体。然而，他要她脱掉睡袍，拉低肩膀上和背后的睡衣的时候，她只是坐着，望着他，黑眼睛里闪烁着挑逗的光芒，接着开始显出淘气的喜悦微笑；她坐着，一动也不动，这样微笑着，这时候，他自己动手卸她的衣服。她抬起两条胳膊以方便他脱衣袖，不过，她只干了这件事儿。

他数她的脉搏跳动的次数，听她的心脏和呼吸，把他的耳朵牢牢地贴在她的胸脯和肩胛骨上，注意到她的细细长长、形状纤巧的骨头。他用小电筒照她的双眼，给她量血压。他吩咐她做深呼吸，说了几次啊和哈，同时又用小电筒的光照着仔细看她的咽喉深处。他用两个手指头相当使劲地敲着她前胸和后背的肋骨，按摩她的肚子，小心地探查，使她微微叹了一口气。"请握紧你的拳头，"他跟她说，从她的胳膊内侧细细的青色血管里抽了一些血，放进一个小小的玻璃管。她的睁大了的眼睛渐渐变得越来越平静；最后，她躺回去，手和肩膀都平摊着，一动也不动，盯着他看，好像她相当舒适地被催眠了似的，用完全改变了的声

音说："这一切检查好像有魔法使我舒服得想睡觉了，亲爱的医生。也许我在遭到那一切盘问和那些官兵的押送以后，唯一的需要是富有人情味的关照。他们的行为是非常粗暴的。"

她张开嘴，轻轻呼出一口气，她呼出的气中醚的气味是很冲的。医生凑近她去说话，掩饰在会见的时候的最初几秒内他的发现所引起的对她道德上的厌恶。

"你用不着服兴奋剂，"他神情严肃地说，一边抓住她的一个手腕，轻轻地握着，"也用不着毒品。不管你可能需要的是什么，"他说，渐渐皱起额头，"决不是醚。对你这样一位女士来说，这是个多失身分的习惯！你干吗浪费我的时间，派人通知我来？在我看来，你压根儿没有病，"他严厉地告诉她，"你的健康状况好得足以叫人羡慕，各个器官都挺健全。你几岁了？"

"你可以看到，够老的了，"她说。"老得不像样了。"

"也许有五十了吧？"

"既然你一猜就中，"她说，"就应该告诉你，你猜对了。是五十。"

"现在，在我听来，这也不是一个很老的年纪，"舒曼医生说。"我要是再一次五十岁的话，也就够高兴了。"

"啊，不管怎样，哪怕年轻一天，我也不愿。相信我的话，在我的可怕的生活中，没有一天是我愿意重新过的……或者说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我将会干些什么？我将到哪儿去？我会有什么遭遇？我被流放了，"她又坐起来，身子开始摇晃、摆动，"我的丈夫死了……我的丈夫，感谢上帝，死了。"她没有变化地重复着说，"可是我的两个儿子，我的孩子，他们是逃亡者，不知道在哪儿——现在，我们在这儿舒适地说话的时候，在这艘寒碜的船上，可以避免日晒雨淋，到底可以避免日晒雨淋啊！我的儿子

可……他们晚上睡在哪儿啊，谁帮助他们呢，谁给他们吃的，他们在哪儿——我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他们？我的房子也烧掉了，”她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下去，好像她在出声念一篇乏味的文章似的，“我那些没良心的佣人都跑掉了，走的时候抢走了一切——钱啊、银器啊、衣服啊、裘皮啊，凡是他们想要的，一古脑儿拿走了；他们纷纷从大门里分散出去，简直像是一拨牲口。当时我看到的每一张脸简直是不再把我当作人的脸……”她的双手乱挥，她的嘴唇紧绷在牙齿上，她挣扎着从床上起身，把那个诊疗器械箱一下子推到地板上。

“等一等，”舒曼医生说。他站起身来，拣起箱子，开始准备一枚皮下注射器。她马上变得默不作声了，带着容易分心的注意神情望着他。“这是今夜的，”他说明用意，“只是今夜的。你千万不可再服用醚。你把它藏在哪儿？我要把它带走。”

她把脑袋向一件摊开着的行李扬了扬。“全都藏在那儿。”

他提起她胳膊上的肌肉，把针轻轻地刺进去，她打了个冷战，说：“啊，多舒服啊。我多么喜爱麻醉品啊，任何一种麻醉品，让我醒过来，要不，就让我睡觉。不管醒着还是睡着，我都喜欢。你该称赞我两句，因为我并不一直服用一切我喜欢的麻醉品的。这是多么容易，多么容易……”

她靠到枕头上去；舒曼医生小心地在那个乱糟糟的手提箱里搜索，翻出一扁瓶醚。

“就这些吗？”他问。“我希望你说实话。”

她拖延着不作声，等着好言好语地哄她，但是他不再说话了。他走到洗脸盆前，倒空扁瓶里的醚。有股气味冲到他的脸上来，他咳嗽了。“这种那种的麻醉品，你已经服得太多了，”他说，“不管你喜欢怎么说。”

"别责备嘛,"她说,"你还没有告诉我,服,我会怎么样;不服,我又会怎么样?"

"你一旦有了良好的健康,"舒曼医生说,"我可以希望你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还可以跟社会的关系变得好一些。你也不会再遭到什么事儿。"

"多么沉闷乏味,"她茫然说。

"对一个趣味这么特别的人来说,"舒曼医生说,"也许是吧。"

"这就是你跟我的不一样了。我不打算自己跟一个我瞧不起的社会搞好关系。不过,我并不打算跟社会闹翻,而是我的两个儿子——我只要瞧不起它,就觉得满意了,是我的儿子逼得我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瞧,我有你说的这么好的健康情况。可是没有一点儿收人。一个在被送往加那利群岛的一座岛上去的囚犯……"

"我并不认为特纳里夫岛的圣克鲁斯太糟!"医生安慰地说。

"你没有被押送到那儿去过,"女伯爵说。"古巴,天知道,乏味透了,可是圣克鲁斯?别说了,别费心安慰我啦……你知道什么?我听起来你这个人好像银行里有钱,又有完全的自由,你想要的一切都有——也许你的健康情况不大好吧?我说得对不对?"

"说得很对,"舒曼医生说,又坐在她的身旁,"其余的醚放在哪儿?"

"你可以看到,你来给我出好主意,是多么不中用,真的多么不管人死活,"她说,一边抚摸着他的手,那只手放在她的身子附近他的膝盖上。"不过,别停止出主意。别走。我喜欢你的好主意,我喜欢听你的责怪,喜欢看你正对着我的眼睛皱眉头,好像你是为了我才这样的——好像你关心我发生的事儿似的。我愿意过上短短一阵子沉闷乏味的日子。我答应停止服用醚,至少

在这次航行中。我为你这么做,不是为我自己。我知道,以后我还会重新服的。我试过一切东西,什么都试过,结果,看来好像醚最好,尽管在你看来,这是不像话的!一种没有痛苦的美妙的兴奋。你服用过吗?"

"没有。"

"有一天,你一定要试一试,"她用压低了的声音说。"另一个扁瓶子在那个红皮梳妆箱里。"

"是你该睡觉的时候了,"舒曼医生说,把她的手放回到她身旁。"我现在会去吩咐那个女服务员来;明天我会再来看你的。"

"我现在用的这个妙极了的麻醉品是什么?"女伯爵问,一边慢腾腾地闭上眼睛。"我不认识它;是新产品吗?"

舒曼医生短短地笑了笑;一听到笑声,她睁开闪着喜悦的光的眼睛望着他。"你指望我告诉你吗?"他问,好像他在跟一个固执的孩子说话似的。

"你笑,"她温柔地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你笑过!不过,没关系,我会试着猜这种麻醉品的,或者你也许会再给我的……我喜欢你,"她说,"你是这么个怪里怪气、道德好、叫人乏味的可笑的人儿,可是挺吸引人,挺吸引人!"

她的眼睛又闭上了;她举起双手,慢腾腾地向上抚摸她的小小的乳房;她的表情,尤其是她的嘴边的表情,着实把舒曼医生吓了一大跳。他小心地使劲摇摇她的肩膀。"对我看,"他脸色严厉地说,"停止这无聊的动作!"她的双手垂下去,脸转向一边。他站着,几乎屏住了呼吸,瞧她陷入睡乡,好像陷入无底坑似的——他轻轻地给她号脉,几乎不敢离开她。他拾掇好他的黑诊疗器械箱,下决心转身走开去,没有说"再见",打开房门。

刚才房舱里的十分难闻的芳香和腐败的气息熏得他好不难

受,这时过道里潮湿的空气像清新的微风向他扑面而来。他向那个等着的女服务员作了指示,回到他自己的地方,感到筋疲力尽,人不舒服,这时才担心起自己的健康情况来。他躺下去,手指头在数念珠,开始盼望睡眠、黑暗、沉默的来到,这些是上帝在生和死之间安排的小小的休战;他把那个无可救药、丧失灵魂的人的话从脑子里赶出去,存心蓄意地要永远忘掉它们;似荨麻、毒刺、鱼钩,她的那些话,带着魔鬼附身、与同类隔离了的人的恶毒用意,紧紧抓着他的脑子。

轮船还要走二十多天,离开哈瓦那的第二天黄昏,船上管生活的船员开始安排一些规模不大的娱乐和消遣来打发航行时间,试图使船上的生活像一个永远不终止的陆上儿童游乐会。正像进餐卡上所写的那样,晚餐是"盛会";张张桌子上摆着鲜花。每一个盆子旁给每人摆着小小的镀金的纸折成的音盒,里面装着能发出声音的机械装置,还有形状滑稽的纸帽。有几个女人穿着礼服;啤酒在大啤酒杯里冒着泡沫;服务员们纷纷用花哨的手势在冰桶里旋转莱茵干白葡萄酒。

格洛肯先生和威廉·丹尼坐在一起,首先戴上他们的小丑戴的帽子,糊里糊涂地向周围龇牙咧嘴地笑笑,得到一两个人糊里糊涂地龇牙咧嘴地笑笑的反应。帽子随即在许多人的头上突然花里胡哨地出现;五颜六色的小汽球飘浮在餐桌上空,飘飘荡荡地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时不时地在拨浪鼓和六孔哨的响声中发出爆裂的声音。乐队开始奏起《维也纳森林的故事》①,

---

① 这是奥地利作曲家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1825—1899)作的华尔兹舞曲。施特劳斯善作华尔兹舞曲,又名圆舞曲,有"华尔兹之王"之称。

而且一直奏着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直到终场。晚宴组织得几乎像一场社交活动，所以乘客们看来都表示赞同，哪怕是最暂时性的吧。一桌桌之间，笑声和祝酒声此起彼落，热闹非凡；那个西班牙歌舞班子的人员都探出身子，向船长举起酒杯，而船长的回答却是铁板着脸，姿势优美地鞠了一个躬，举起他自己的酒杯表示感谢，接着又把酒杯放下，似乎把这件事儿整个忘得干干净净。

鲍姆格特纳先生已经戴上一把假胡子，配他的帽子；他已经用把假胡子像山羊胡子那样上下甩动这个花招逗得邻桌的两个小孩一阵阵地欢笑。两个小孩，男的五岁，女的三岁，一直斯文地跟他们的父母坐在一起等着上菜；他们的父母是古巴人，在哈瓦那上船的。鲍姆格特纳夫妇那腼腆的孩子汉斯被这兄妹两人迷住了；他们跟里克和拉克是那么不同；那一对兄妹啊，只有对他瞟上一眼，就能吓得他心惊肉跳。他一直怯头怯脑地在那两个新乘客身旁转悠，不敢说话，但是这会儿，他靠着在逗人的父亲，发现跟他们做朋友的机会了。

鲍姆格特纳先生超常地发挥水平，使出种种叫人着迷的花招，那两个孩子长声尖叫，发出格格的笑声，而且以最讨人欢喜的表情从手指头缝里偷看。汉斯把笑声提得越来越高，超过他想发出的声音，让他自己引起他们的注意。“可得吃晚饭啊，汉斯，”过了一会儿，他母亲说，“稍后，咱们还会玩一些游戏的。”

他丈夫不理睬她的暗示。他把假胡子推到额头中间，把它像帷幕似的分开，说：“嘘！”孩子们高兴得尖叫；做父母的宽容地微笑。鲍姆格特纳先生把假胡子拉到下巴底下，把他的帽子远远推到脑袋后面。孩子们仍然在笑。鲍姆格特纳太太取了一点儿菜肴，着手切割汉斯盆子里的烤鸭。她对他在公开场合对付

这种菜肴的就餐礼仪不大放心。将近八岁了，使用刀叉还那么笨——这使她觉得她不是个好母亲。“乘热吃吧，”她跟他说。不自在地望着她丈夫，她思量着，缺乏适度感或者说事情的限度感是她丈夫的大缺点。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饮酒啊，扮鬼脸啊，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她看到，这当儿，在这一刹那，他会干过头，她的心沉下去了；他的确出岔子了。他把假胡子推到眼睛下面，把他的头发拉到前面，猛烈甩动头发，像狮子也许或者说像熊那样吼叫；这太过分了。汉斯半张着嘴，在接受食物，停住了，心中无数地微笑着；另一个小男孩用颤抖的声调发出假装出来的笑声，但是那个还是娃娃的女孩太小了，还不懂得假装；她越来越害怕地盯着看，终于突然哇地哭出声来。她悲伤地“唉，唉，唉”地哭着，她那双不断淌着眼泪的眼睛盯着看刚才还是那么叫人高兴的景象，没有一点儿预兆，一下子变得这么可怕，简直没法相信。那个年轻的母亲迅速向鲍姆格特纳先生尖叫一声，把女儿抱在怀里，把她的皱眉蹙额的脸紧贴在胸脯上；那个年轻的父亲探出身去，把一只温柔的手按在他的吓坏了的小女儿身上。

鲍姆格特纳太太说：“啊，我真对不起。”她的声调、她的态度是把她丈夫排斥在外的。她的眼睛向另一个女人示意，你瞧出了这种事儿，请别责怪我……作为女人对女人，作为一个知道这一切可能会发生的母亲，我求你……

那个年轻的母亲回应她的是冷漠的陌生人的戒备的神情，表示拒绝推心置腹地交谈，不接受暗示的亲密的感情，勉强挤出一丝不以为然的微笑，点点头，好像在说，这没什么——并且完全清楚地认为，只是有一点儿蠢，而且你们给我们惹了多大的麻烦。

鲍姆格特纳先生一把扯下他的帽子和假胡子，毫不迟疑地撂在地板上，好像在演戏似的，他的脸上流露出被悔恨折磨的神情。“啊，亲爱的先生！”他用德语向那个做父亲的说，“我只是想逗这些小孩乐。”年轻的父亲点点头，微微做了一个表示把一切误会打发掉的手势，接着跟他妻子交换了一个困扰的眼色，因为他们不懂德语。鲍姆格特纳先生本来会用西班牙语坚持表明他的意思的，但是他的妻子阻止他这么做。“别，”她说，“别。你的话和行为已经足够了。他们完全懂得；要是他们宁愿假装不懂的话，那请至少保持你的尊严。”

这把鲍姆格特纳先生剩下的一点儿自尊心毁得干干净净。“啊，善良的上帝啊，”他说，“难道我已经落到这个地步，跟一个小孩玩耍都没法不吓着她不成？汉斯，你没有吓着吧，是不？你可怜的爸爸只希望听到你笑！”

“我笑来着，”汉斯说，摆出男子汉的气概，安慰他父亲。他母亲说：“你当然笑来着，因为那挺有趣嘛。小娃娃总是遇着什么事情都哭。你在小娃娃的时候，也哭，”她跟他说，说得叫人没法不信，汉斯一时忘掉了从那以后的他的一切啼哭。

他父亲默不作声地吃着，好像对他来说他的菜肴是苦药似的；他们三人都陷入沉默。汉斯觉得他母亲在变得特别温和，她对他的微笑太温和、也太频繁了。他不得不每一回用微笑回答，这使他担心起来，因为他觉得他在支持她反对他的父亲，而他不想支持哪一方。他父亲也这么亲切地一直望着他，一副熟悉的悲伤的神情，可怜的好爸爸，直到汉斯再也受不了这种情形，转过头去，不看他们两人，心情忧伤、寂寞和迷茫。邻桌的两个孩子已经把这件事整个儿忘了，在玩他们的汽球、哨子和帽子，而他们的父母用调羹和叉子在喂他们吃，给他们的面包抹黄油；他

们没有一个人再看汉斯一眼，或者想起他。那个哇哇哭的小女孩这时候开心极了。

欢度节日的兴致显得越来越高。进餐的人们随着乐队来到甲板上；在那儿，闪烁着星星的天空笼罩着发出汹涌澎湃的声音的波涛，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对着星空在演奏。轮船轻轻地摇晃着；一阵阵呼呼吹来的阴凉的海风把裙子和披肩吹得四下飘扬，头发吹乱了，但是一张张脸变得比较柔和；从船边上折回去的巨浪带着缓缓闪烁的、绿幽幽的磷火，散发出活跃的气息。新月仿佛蒙着薄纱似的在迅速地向下落去。

"真是美极了，戴维，"珍妮说。"我多么希望你会跳舞。"

但是戴维不会跳舞，而且有个一点儿不美的有关跳舞的名声，一个叫珍妮生气的丢丑的外号；她跳舞跳过的里数已经超过绕地球两周的路程。"我的脑子从来没有比当时更清醒，"她告诉他；"我希望我当时脚踝上戴着一种计数器——那么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在我最快活的那会儿，我跳了多少英里！"

他们享受着缀满星星的天空的亮光和海藻色甲板上的灯光；他们吸进美妙、湿润的空气，但是珍妮静不下来，她要跳舞，所以戴维沉着脸，神情固执地离开她，到酒吧间去了。几分钟后，他向室外看去；果然不出他所料，她在跟弗赖塔格跳舞。

整个场面充满着旋转的人影，像愉快的狂舞的托钵僧[①] 那样按照维也纳方式转圆圈。特雷德韦尔太太穿着用极薄的黄料子做的衣服，在跟一个年轻的船员跳舞。阿尔内·汉森跟一个他们管她叫安帕罗的歌舞女演员在跳。模样逗人的里贝尔先生

---

① 指伊斯兰教苏非派教的高级人员，沿门托钵乞讨，靠施舍过活，有时旋转狂舞。

照常搂着高个子、笨手笨脚、面貌丑陋的利齐;他站着的身子灵活得像一个橡皮球,像陀螺那样保持着平衡回旋,打转,引导着利齐绕着其他人转圈。那些其他人大都是两口子,不过吕茨和鲍姆格特纳那两对夫妇坐了一黄昏,没有跳。两个古巴学生跟帕斯托拉和洛拉跳,面那些西班牙男歌舞演员都坐在酒吧间里,始终没有露面。

戴维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不跳舞人的身上;那些天生的局外人、那些永远不会受到邀请的人、那些没人要的人,还有那些跟他自己一样,不管理由多么站不住脚,却拒绝参加的人。他把自己摆在他们大伙儿一起;他们跟他属于同一类,他一看就认得出他们。譬如说,那个大个子埃尔莎就是,她跟她父母坐在一起,搭拉着脑袋,没法掩饰她的渴望、她的失望、她唯恐被冷落的担心。"我会跟你跳的,"他曾告诉过她,但是她永远不会听到他说这话。格洛肯先生在乐队附近的一张帆布躺椅的一头,蜷缩成一团,脸捂在两只手里,他的纸帽盖在一条眉毛上,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在听,但是不在看。

那个躺在轮椅里的、快要咽气的人,被送到栏杆旁,他裹在披巾和毯子里,一直盖到喉咙,也许睡着了;那个男孩约翰,那个照料他的外甥,两条胳膊搁在车把上,眼神像一条被遗弃的狗那样既盼望又绝望。戴维觉得他对他们都很熟悉。对他自己来说,他拒绝参加进去,置身其间,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那里没有他容身的地方,没有他要的任何东西——要那样的代价不行,他说;他憎恨在窗外转过去的那一群转圈子的人。

他注意到,那对墨西哥新婚夫妇没有跳舞。他们在一起散步,看到了这个场面,在那儿站住脚,态度和气、疏远,像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被魔法迷住的来访者。他们不跳舞,也不戴纸帽,

不喝酒，不玩纸牌，或者对别人龇牙咧嘴地笑。他们甚至互相说话也不多；但是，他们是一对，这是明摆着的。这样的沉默，这样的不同别人来往，这样的不顾礼节，对一切毫不注意，互相只被他们的爱情和最初的经验所吸引，在戴维看来是自然的、正确的、了不起的。他推测他们生性庄重和严肃；在他们美丽的外表下面，早晚举止可能会变得干巴巴和拘泥于形式，但是他们的婚姻会维持下去，他们会永不分离。他在想象他们的性格和他们的婚姻的性质的时候，他认为这正是他自己需要的那种婚姻，在跳舞的珍妮跟弗赖塔格又在他身旁转过去了。他们轻快地旋转着，好像是一个身子，但是他们的脸只是两个不真实的面具。戴维认为两性间的忌妒是他不值一顾的无稽之谈，又感觉到那一阵厌恶珍妮的热浪，厌恶她缺乏分辨能力，她的无可救药的爱跟人来往，她的总是随时随地准备跟任何人说话，参加无论哪种聚会，一受到邀请哪儿都去，跟种种叫人讨厌的无赖、二流子、恶棍、酒鬼、性欲反常的人和像这个弗赖塔格那样男模特儿类型的人混在一起。“真是活见鬼！”戴维出声说，觉得窝着一肚子闷气，比往常憋得更痛苦。

他回进酒吧间，干了一杯纯威士忌，紧接着又干了一杯。丹尼在那儿；戴维看到他不自在地也置身于一切活动之外；不过，他不可能跟丹尼意气相投。不行，丹尼是由于错误的原因才置身局外的。他的目光会跟着那些西班牙跳舞姑娘，——或者不如说，跟着帕斯托拉，乜斜着眼向她们挑逗——但是她们没有一个人会要他。她们已经查清他的为人。他不会给她们买饮料，他不会答应给她们任何好处——他要不花一个子儿寻欢作乐，这种人应该挨蝎尾鞭的鞭打，生来就该给整治得死去活来。他想念和追求，这是明显的，但是没有付过酒吧间里五块钱的账，这样做可能什

么事也办不成，也可能到头来会花更多的钱。姑娘们已经养成习惯，在他身旁经过的时候，迅速用轻蔑的眼光扫他一眼；再进一步的话，她们会对着他一下子撩起身后的裙子；她们非常瞧不起他。她们还全都打定主意，她们当中的一个人，不管是哪一个，当然要在航程结束以前，把他的每个衣兜都掏空。

丹尼已经打定坚定的主意，喝个没完。"我要在眼下这个夜晚过去以前，喝一个酩酊大醉，"他庄严地许愿。"来啊，一起来喝个痛快吧。"

"反正都一样，"戴维说；确实，跟丹尼一起喝个烂醉，倒是挑对了人。不用装腔作势，不用哄弄，不用闲磕牙，只要按照预先的打算，慢腾腾地、从容不迫地灌到滚倒为止。妙，这可真妙。戴维灌下了第三杯威士忌；就在他的前肋骨中间的那个空洞洞的饥饿部位里面，虽然不大痛，却不断像针刺似的、叫人难受的感觉稍微缓和了一点儿。他打算喝得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明天早晨他一件也记不得。

阿尔内·汉森和安帕罗停止跳舞，这是一场适应汉森的笨拙的舞步的相当单调的旋转；他们停在离埃尔莎伸出胳膊就可以碰到的地方；埃尔莎从流露出迷惑的神情的眉毛底下盯着看安帕罗，尝试着找出秘密。埃尔莎不能看出或者确认有什么秘密；安帕罗长得虽然俊俏，却邋里邋遢，皮肤漆黑，而且她一点儿也不打算讨人欢喜；她的脸老沉着，没有一丝笑意，她几乎不说话，看来甚至有一点儿表示厌烦和在发脾气。汉森，埃尔莎满意地看到，跳起舞来像一只熊。他一直一丝不懈地注意着安帕罗，好像他的眼睛稍微看看旁边，她就会失踪似的。安帕罗带着一把黑抽纱扇，扇上破损的地方缀着一朵布制的红玫瑰，她大模大

样地扇着。任何脑袋上长着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出于吗那儿缀着玫瑰——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安帕罗摇摆着屁股走过去，跟帕斯托拉说了几句话，帕斯托拉离开甲板，走进酒吧间，向佩佩传递信息。接着，安帕罗慢腾腾地走开去，一次也不回头看；汉森跟在她后面迈着大步走去。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刚跟船上的事务长，一个像慈祥的爸爸模样、脸圆得像汤团、留着海象胡子的大胖子，跳了一只舞，发现自己站在特雷德韦尔太太附近。她向那两个正在向远处走去的人影点点头，她的嘴角泛出庄重的表情。汉森赶上了安帕罗，抓住她的胳膊；他们一起匆匆忙忙地离开。

“我认为这不是很文雅的现象，”她说。特雷德韦尔太太向她转过脸来，现出一副天真得过头的表情，问：“干吗不是啊？我认为他们在一起看来挺好嘛！”

佩佩独自个儿坐得很晚，面对着半瓶红酒。里克和拉克、蒂托、潘乔、马诺洛、孔查和洛拉终于都撇下了他。乐队已经停止演奏；跳舞的人都散了；交谊厅里和甲板上的灯光暗下来了；水手们提着桶，拿着刷子纷纷出来；酒吧间那个人显然在挨过夜晚的时间。他面前的烟灰缸里烟蒂堆得高高的，尽管服务员已经倒了两回了。喝干了他的最后一口酒，佩佩又点了一支烟，踱到外面，兜了一圈，然后小心谨慎地，像一只猫那样，走到下面轮船深处。逗留在那儿，巡查着走廊，最后他看到阿尔内·汉森走出来，看来他是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似的，几乎是奔跑着走进一条过道，消失在远处一个角落里，好像有警察在追他似的。

佩佩随即轻手轻脚地向前走去，打开房舱门，发现不出他所料安帕罗穿着睡衣，在数钱，看来像纸张坚固的美钞，而且有相当多一叠哩。他把自己右手掌向上，大拇指和食指滑稽地按在

一起擦擦，好像这是他们间一个开惯了的玩笑。她没有像惯常做的那样把钞票给他，而是扔进了洗脸盆，所以他不得不为他自己从盆里把钱捡起来。

戴维·斯科特和威廉·丹尼从烂醉中醒过来，头痛得像要裂开来，眼睛花得看不清东西，胃下垂着。格洛肯先生用抖抖嗦嗦的声音在要求人给他拿药和水，好像他叫叫停停已经有好一会儿了。丹尼大声呻吟，在上铺使劲地翻来翻去。戴维从长沙发上翻下来，照顾格洛肯先生，他的手握住玻璃杯的时候，颤抖着。他马上把药吞了下去，向戴维歪着嘴骄傲地微笑了一下。"我喝得太多了，"他说，退回到帘子后面去了。

戴维在刷头发，带着叫人厌恶的担心注意到他的额头顶上的光滑的皮肤上那条浅浅的纹路，他才二十六岁，他的头发轮廓线缓慢地但是不幸地看得出在后退。可能在这事儿无可挽回地发生以前，还要经过多年，但是总有一天，可怕极了的一天，他的脑袋秃顶了，就像在他前面的他父亲、他祖父和他曾祖父们。人世间没有力量阻止得了。他知道，因为他试尽种种办法。他买过各种生发水、护发膏和高级洗发液和任何理发师希望向他兜售的按摩器械，自己犯的罪孽一直于心不安。大大损害他的宾夕法尼亚州贵格会[①] 教徒的良心的是，他已经井井有条地犯了两桩可能是罪孽了（或者说，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从训诫和实例中知道是罪孽）；他已经把本来准备派更好的用处的钱花在无聊的事情上

① 公谊会的别称。"贵格"为英语 Quaker 的音译，意为"颤抖者"。会名来源说法不一。一说在初期宗教聚会中常有教徒全身颤抖；一说因创始人乔治·福克斯曾劝人："在神的话语前，震惊颤抖，"故有此别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中有许多是该会会员。

和尽量满足肉体的虚荣。他一直肯定地对自己说,他并不在乎,只不过是那些嘴巴守得紧、手头抠得紧、灵魂也绷得紧的乡下老头儿在他的血液里留下了一种毒素,使他始终没法真正享受生活,除此以外,他将会秃顶。不过,他觉得自己是那样一个傻瓜,竟然认为,譬如说,靠一把电动的头发刷将会破坏所有那些秃顶的祖先们的基因,想到此事,就好不害臊。后来,他把他将来不可避免地要秃头这股怨气记在他母亲身上,她当然从来没有显示过一点儿做母亲的应该有的判断力,最不行的是在选择她的孩子们的父亲这件事情上。他父亲不但过早地秃顶,而且异想天开,不负责任,行为卑劣,不守信用,甚至对任何事情和任何人都没有最低级形式的忠诚。他有赏格会教友数铜子的倾向,不过就是这么回事。最后,他跟一个只有他一半年纪的姑娘一起开溜了;没有哪个赶上他,甚至始终没有再听到过他。

不过,他留给他妻子一封信,说这次新的爱情跟他的婚姻和以前的许多次私情的情况不同,不只是以肉体的吸引为基础,而且也是一件受深刻的心灵和智力影响的事情,是一件太高尚和美丽的事情,以致他妻子无法懂得。他并不指望她懂得,而且不会设法另作解释。就这样别了,祝好运!

当时,戴维九岁,已经常常在想,要是他父亲不是老在眼前转悠的话,那生活有多愉快啊。嘿,在戴维看来,他的失踪简直是神圣的上帝安排的,他被告知,那是一切幸福的来源。他的母亲对整个事情的态度却不同。“心灵的!”她气势汹汹地说,好像那是一个不干净的词儿似的。她随即跟戴维说:“你有的就是这种爸爸。”接着,她扯着紧张的嗓门念信给他听;她站在房间中间,仰着下巴,闭着眼睛,眼泪直淌着,哈哈大笑,几乎笑得透不过气来。后来,她坐下,一把抓住他,一个皮包骨头的、瘦长的男

孩，使他简直尴尬得没命，接着把他拉到她的怀里，摇着他，好像他是个小娃娃，一边抽抽搭搭地哭，一边前后摇着他，好像她永远不会停止似的。这一切动作摆布得他很难受，他呕吐掉了他的晚饭；后来，他很瞌睡，但是在夜间醒来，怀着最恐怖的、彻骨的凄凉感。他也不出声地、悄悄地、沉痛地哭着，躺在那个被泪水沾湿的、散发着陈旧羽毛气味的枕头上，哭到又睡着为止。

在刷头发的过程中，戴维突然对着洗脸盆呕吐起来。他带着害臊的心情偷偷摸摸地擦洗盆子，认为他的生发水跟丹尼的那些成药、轻泻剂和安眠药丸一样糟。他转过脸去，不看镜子里他自己那一副卑下的脸相；道德上的自我谴责——珍妮管它叫公谊会教徒的后遗症——所造成的糟糕透顶的、糊里糊涂的感觉并非第一次地紧紧地控制了他的五脏六腑。

昨夜，他干了一件荒唐事儿，那是什么来着？他在黄昏的时候记得珍妮的脸在某个地方；她的眼光明亮而冷冰冰；她对着他的脸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什么门，在哪儿，为什么？他先跟丹尼一起在酒吧间里最后接连喝了那些杯酒，后来他看到珍妮在正在关的门口的闪闪发亮的眼神，在这两个场面中间，在他的脑子里，存在着一片巨大的、发出轰隆隆的响声的、黑暗的缺口。但是，她会记得的，她会乐于给他一个详尽的叙述。他只是不得不等到他们在吃早饭的时候或者在甲板上遇见后才行。她会告诉他一个故事，一半是编造的，来讨他喜欢，一半是真的，他永远不会知道哪一部分多些；她当然会加上一些这样的话："别为这感到难受，宝贝儿。我可能在把一切说得听起来比真实情况要蠢得多。别忘了，我当时也不大清醒。"她会装得不落丝毫痕迹地说，因为珍妮是个清醒的小妞儿，她再怎么也不会依靠酒的。这时候想到珍妮这个人，光是这个念头已经是对他一个新的谴责。他应

该跟她结婚，或者不管怎样，应该建议跟她结婚；他们在离开墨西哥以前，应该结婚——目前这情况，样样事情显然都会变得一塌胡涂。但是要是他想要一个妻子的话，珍妮也不是他想要的妻子；他当然眼下也不要；事实上，他冷静地面对这个情况，他再怎么也不会跟珍妮结婚的，他压根儿不打算结婚；结婚是件坏事儿，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使。他得出了这个坦率的结论，情绪多少好了一点儿；他觉得能按照珍妮自己的条件面对她了。

胡滕教授先生和太太睁开眼睛，试验性地摇摇头，像二重唱似地问："你觉得怎么样，我亲爱的？"交换意见以后，他们断定晕船已经好了，他们得起身，面对白天。贝贝看到他们动了，受到鼓舞，神态亲密地走来走去；胡滕太太亲它鼻子的时候，它在她的下巴上亲热地回舔了一下。

那个印第安人保姆轻轻地叫醒奥尔特加夫人，把婴儿塞到她的胸前，让她清晨喂奶。那个做母亲的本来迷迷糊糊，美妙地醒过来了；她感到那张饿极了的嘴在使劲温暖而稳定地咂吸，轮船在掀起滚滚前进的漫长的波涛，引擎在发出催人瞌睡的隆隆声。她的辛劳和疲倦最后消失了。母亲和婴儿蜷缩在一起，像一个人那样睡着，处在温柔的、动物的自在状态中，散发出香喷喷的动物气息，两个人抱在一起，好像尚未出生的人在他们的漫长、黑暗的梦中。那个印第安女人是穿着白色无袖宽内衣和白色宽下摆的衬裙睡觉的，两个手掌里盛满了凉水，洗她的眼睛，和捋平头发，穿上绣花的羊毛裙，戴上耳环和项链，又躺下去，她的赤露着的柔和的双脚，尖尖的，挺纤巧，并在一起，打起盹来。她时不时地稍微抽动，睁开一只眼。一个她听不出是谁的、但是

被认为是她已经去世的母亲的声音，在她睡着的时候，经常用提醒的声调叫她的名字："尼古拉莎。"这声音说得非常温柔，好像她又是小孩似的。但是它总是给她传递找她干事的坏消息，她不得不中断夜晚的休息，她不得不一整天默不作声地准备干不管什么需要她干的活儿。她经常在睡着的时候哭，因为她一辈子生活在只知道她的教名的陌生人中间；他们一个字也不懂得她的语言，也从来没有问过她一回她有什么想法。"尼古拉莎，"那个温柔的声音催促着。她坐起来，叹了一口气，看到她那个可怜的小娃娃熟睡着，那个可怜的母亲也熟睡着，但是也许要是她一直注视着他们的话，他们会更安稳，睡得更久、更沉。她跪在床沿上，对着母亲和孩子模模糊糊地微笑，接着她跪下，从她的兜里取出一串念珠。念珠上缀着一个小饰物，一个盛着干香草的干酪包布[①] 做的小袋；她在吻十字架以前，先吻吻那件小饰物。

威廉·弗赖塔格醒过来了，感到一阵更清新、更阴凉的风吹在他的脸上。通过舷窗所看见的圆圆的一点儿海天相交处的界线不很清楚，只是阴沉沉、雾蒙蒙的蓝色。船航行六天了，可不是，今天是星期天；船已经适应它的航速，稳定地航行着，已经简直是在笔直地穿过海洋了，他伸出头去，注意到海面上有一点儿风浪。这是真正的海风，密匝匝，然而美妙而温和；一道道被烟煤污染的烟雾尾随着一个个深蓝色的蕴藏着劈雷的云堆向东摇曳而去。看来时间挺迟了；也许他已经错过了早餐。轮船上的钟声哨哨地响了。八点钟，他要是稍微动作快一点儿，还来得及。不过，汉森要来不及了。帷幕后面传来睡得极沉的呼吸声；

① 一种薄纱织物，原作包干酪、黄油之用；现也用以制衣服、窗帘等用。

汉森的那双大得出奇的脚，脚底光滑、发亮，巨大的脚趾头一个个互相分开着，跟往常一样伸出在上铺外面。弗赖塔格想不出他在大冷的时候是怎么对付的，记起了汉森爬上床去睡觉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似醒非醒，那时候一定很迟了……他一开始就盯着那个西班牙女人，可能跟她不干好事。

他一边刮脸，一边翻着他的领带，挑中了一条，心里在想船上的人们大多数的举止行为跟他们在陆地上一个样，但是船上却完全没有那么大的空间让他们施展。每一个最细微的行为显得更清晰，看起来更糟糕，因为它已经失去它的背景。造成和说明某种行为的种种情况却并不存在；你没法追查它的原因，把它重新摆在恰当的规模和地位中。你要是不惜花费时间和心思的话，可能知道一两个人的一些事情，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也犯不上费心思；甚至那个美国姑娘珍妮·布朗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让他去作更深入的了解。拿她个人来说，是个相当好的人，他想；舞跳得很好，谈起话来充满热情和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幽默，当时使你感到有趣，但是过后你却一点儿记不得。不过，那个跟她一起旅行的怪里怪气的年轻人给她自己的人品抹上暧昧的色彩，譬如说，他昨夜的那个古怪的举动，他和珍妮·布朗在跳一支华尔兹的时候，他粗暴无礼地闯到他们中间，抓住她的胳膊肘，把她一把抢走，跟她一起跳了几步那种只有在那些最低级的舞厅里才经常看到的舞步。珍妮·布朗试着摆脱了他的抓住，有一会儿成功了，转过身来，跟弗赖塔格摇摇手，表示再见；接着，戴维·斯科特抓住她的胳膊，她不再挣扎，跟他一起走了。从弗赖塔格的观点看，这一切简直低级和愚蠢极了，这表明纠缠在陌生人和他们的一团糟的处境中是危险的。

他，弗赖塔格，情愿从陌生人那儿得到一种淡淡的友好关

系，一种浅浅的喜悦。在任何航行中，在任何陌生人中间的晚会上，这足够了，但是就是这些事情有太多的人不懂得，他说，这时候，他开始跟他不在场的妻子，玛丽，进行一场不出声的、内心的谈话。同在一艘船上的人们啊，玛丽，看来好像不是神态生硬、不信任和完全抵制别人，就是怀着一种侵犯人、折磨人的好奇心，看来他们在两者之间找不到一片中间地带。有时候，那是一种相当友好的好奇心；有时候，是狡猾和不怀好意的，但是你感到好像你在活生生被鱼吃掉似的。别忘了，我从来没有乘过船，在他的脑子里，玛丽说。啊，你很快就会乘的，你会的。那时候，你自己就会看到了。难道你不相信吗，我跟一个姑娘跳舞，她叫珍妮，大约是这个名字吧，记不清楚了，也跟她喝过酒，还有跟她一起旅行的那个小伙子，一个档次相当低的家伙，我想他一定是的，他莫名其妙，大出洋相。一起旅行？他马上发觉这样一个插曲是他不能告诉玛丽的那种事情。它毫无意义，毫不重要，它完全不在他们的生活范围以内。从他再见到她那会儿起，就要把它忘掉。再说，玛丽要是听了这样的故事，可能会淘气地说——以前他告诉她旅行经历后她就那样说过，——往往说得相当逗人，他想："又不是犹太人吧，我猜想？"他总是不得不说："可不是。"她会发表意见："真奇怪，你独自个儿旅行的时候，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犹太人！"有一回，他试图向她说明，他为什么觉得她这么说是一件多么叫人受不了的事情，他们几乎吵起来；在这样的时候，她不愿承认一个她知道得很清楚的事实：是犹太人划清了界线，拒绝一切交往和友情。但是这个话题是他们中间的危险地带；他已经学会避免它。他在心里感觉到他自己的生活欣欣向荣和安全可靠，好像它有一个光滑而很坚硬的表层，那些鱼是没法把牙齿咬进去的。他会一直避开珍妮·布朗和她的私生

活，不管是什么生活。她明摆着闲得发慌，准备找一点儿刺激。她谈话的方式太亲密了，太有关个人了；她提各种问题；她希望推心置腹地吐露和说明她自己。她的虚荣心使她自以为有趣；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除了向玛丽以外，他不希望向任何人推心置腹地吐露和说明任何事情。他只是很简单地运输他自己，像一件在运输中的、藏在货舱里的、没有生命的东西，从他已经租用的、开始为玛丽准备的、在墨西哥城的那所房子里出发，直到他把自己卸在曼海姆玛丽在那儿等他的那所房子里为止。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事情跟他有关，他跟陌生人毫不相干。他们一起乘船回来的时候，船和乘客仍然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那将是他们关系到他们的一辈子的航行。要不是出现奇迹的话，他们永远不会再见到德国了。玛丽一定会成为他的故土；他也一定会成为她的；他们不管上哪儿去，会把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一起带去；他们一定会把那个环境称作家乡，而想尽办法忘掉它的真正的名称——流亡。在他的记忆中，形成一个玛丽在钢琴前弹奏和唱歌的幻象；他跟着她唱的歌吹口哨："*Kein Haus, Keine Heimat*[①]..."

这将会是将来的情况。心里老是藏着这个情况，怀着这个像负罪的秘密的情况：他们不是出于自己自由而愉快的选择来到任何特定的地方，而是被驱逐到那儿去的，他们是在逃跑，被撵得越过一道又一道国境线，没有权挑选他们落脚的地方，或者拒绝任何提供给他们的庇护的场所，那将是什么滋味呢？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对任何人来说，这是多么可耻的生存；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这是多么加倍可耻的生存！不管他出于礼貌可

① 德语，"没有房子，没有家……"

能会为他的混合了的种族说些什么，他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强有力的德国血缘的正统的子孙，这种血缘足以摧毁他自己的血管里一切外来的血液，使血液再一次变得完全纯净和完全是德国人的，对他来说，整个世界一向只是一片猎场，一片可以任意掠夺的地方，一个可以暂时逗留、有利可图的地区，等时机一到，他就回归在他心中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的故土，永不分离。不管他以前在哪儿，他总是觉得脚底下是德国人的土地，头顶上是德国人的天空；他是没有其他的国家的；这是怎样从我们这儿被抢走的呢，玛丽？你不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个德国人的妻子嘛；我们的孩子们的血液会像我的血液那样纯净地流动着；你的被玷污的血液将会在他们的德国人的血管里被净化——

弗赖塔格猛地翻了一个身，站起身来，抹了抹他的淌着汗的脸。他的出神的沉思变成了痛苦的狂想，一场可怕的白日梦缠住了他；甚至坚实的土地在他脚底下滑动、房子在他的头顶上摇摆、漫长的出逃正在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疯言疯语；他甚至没法想象那像是什么结局。未来是一个巨大、空虚的领域，奇怪地没有声音，没有人居住，什么小事情也不在发生；然而你知道，可以看得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没有一点儿变化；也许事情会变化得很慢，他可能不察觉变化，直到有一天，已经太晚了。毫无疑问，他会继续在那家德国石油公司当副经理，直到有一天，人们在一个没有人在乎他娶了一个犹太姑娘的企业注意寻找别的什么事情。他害怕把玛丽介绍给他在墨西哥城的社交圈——他们再怎么也不会被她的金头发和小小的翘鼻尖的鼻子所蒙蔽。他倒是被蒙蔽过，不过当时他第一眼瞧见她就爱上她了，确确实实；她几乎马上告诉了他，但是他不在乎，而且他也看不出她身

上有犹太人的迹象——但是墨西哥城的那些居住在殖民地的德国人啊，他们只要能瞧见她，一下子就会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人。他在德国看到发生过这种情况，在各种各样的地方，餐馆啊、戏院啊、各种公司里啊——唉，情况就是这样，叫人难以置信，无法改变；他只能希望，等到别人逮住他们的时候，他会在别的地方找到另一个同样好或者更好的职业。他也许能为自己做买卖，在墨西哥或者南美洲，也许甚至在纽约，不过只是把它作为最后一招。

面对这个他确实在面对的永久性的问题，他的脑子变得冷静和讲究实际了。他没法觉得命运已经决定，注定要灾祸临头；他确实没法想象自己会被撵出一个地方，或者他的生活会遭到危险；他和玛丽肯定永远不会被押到一艘船上，一个子儿也没有，沦为囚犯，被强行安插在另一个仍然也不要他们的国家里的——就像那个有着无法无天的恐怖身世的精神错乱的西班牙女伯爵犯人那样。可怜的女人，他发现自己带着不含个人色彩的同情在想，但是他自己是那么担忧，没法深切地关心她的命运。靠在栏杆上，他又向统舱甲板仔细观察。

舒曼医生在附近，脸上带着关心的神情也在看统舱的乘客。他态度温和地招呼弗赖塔格，摇摇头。

“今天早晨，他们看起来好像比较舒服了，”弗赖塔格说。那些人在有气无力地移动，不过是在移动，两只手还挺忙乎哩，在整理他们的东西和提供给他们的生活用品。有几个男人在抽烟；那个穿樱桃红衬衫、在船离开维拉克鲁斯的时候唱歌的大胖子，站在他们中间，两条腿叉开着，在扯着嗓门唱另一支歌，有几个零零落落的字从风中飘来。另外的人在卷起包裹，打开帆布躺椅，时不时地停下来，毫不拘谨地微笑着，参加唱上一两句。

女人们已经在对付着洗东西了：一些外衣、褪色的衬衫和娃娃的破衣烂衫；长长的一溜儿衣服晾在一条细绳上飘动着，绳子拉得那么低，凡是要穿过甲板的人个个都得从那下面钻过去。看来好像地方变得大了一些，而且没有人正在害病。

"咱们要是不遇上狂风暴雨的话，他们会凑合着对付过去的，"舒曼医生说。"折断胳膊和大腿，砸烂脑袋，也许是脖子，"他说，俯视着他们。"他们找不到可以使他们安全的地方——他们人太多了——这真叫这艘船丢丑。我一直希望，至少在到达比斯开湾[1]以前，不要有狂风暴雨，到时候，这些人中有一大半要留在特纳里夫岛的圣克鲁斯。"

"比斯开湾里总是风雨交加，波涛险恶，"弗赖塔格说，"嘿，至少这些人有一件事儿是幸运的——他们都在回家。"

"是这样，"舒曼医生说。"我只希望，我们能把他们送到那儿，别让他们再吃苦。"他看来好像相当闷闷不乐，好像露宿的是他自己，弗赖塔格走开的时候，他只是点了点头。

在通往餐厅的过道里，布告牌前是早晨集合的地方。戴维看到珍妮，她显得容貌很光洁，而且神清气爽，跟特雷德韦尔太太一起站在牌子前面。他径直走过去，跟她们待在一起，打算把珍妮带走，跟她争论出一个结果。

"唷，你好，戴维宝贝儿，"珍妮自在地说，把她的胳膊钩住他的。他稍微使力气按了按她的胳膊，同时推开她。她马上松开，从她身旁移开一步。特雷德韦尔太太点点头打招呼，接着他们一

[1] 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位于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布列塔尼半岛之间。

起看着稀稀拉拉的几行娱乐通知，对节目的重复已经稍微有点儿恼火了；宗教仪式安排在早晨，是个改变，因为今天是礼拜天；赛马在两点钟，全天提供游泳服务，音乐欣赏五点在甲板上，喝茶在酒吧间里，晚餐后举行乐队演奏的音乐会，接下来是甲板舞会。

地图上用针插着一面面小旗，表明轮船的进程，正在以弧线形穿过广袤的蓝色大西洋前进。“咱们的确航行了好一程了，”特雷德韦尔太太对戴维说。“用我的功率最大的望远镜看，我在哪儿也看不到陆地。”从加勒比海到加那利群岛，船要开十四天；从加那利群岛到比戈，到希洪[1]，到南安普敦[2]，到不来梅港，还要开八天，也许十天。“咱们能开始展望航程的终点了，”戴维说。新闻报道跟这次航行配合得相当密切；那些只习惯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对船只的移动一无所知，所以这样报道一下被认为是值得的；报道还顺便说到旧金山、纽约、里斯本、希洪的码头工人几乎同时在罢工。乘客们用一张张图钉钉出他们用小纸条写的公告，表明他们遗失或者拾到镶嵌珠宝的木梳、羽绒枕头、烟丝袋、小照相机、小镜子、念珠。落袋弹子戏桌旁还写着昨天赢家的名字。

特雷德韦尔太太用一片涂着红指甲油的亮晃晃的手指甲跟踪着蓝色的地图上的这艘轮船的航线。她说话了，也许是对戴维吧。“真的，”她说，“我们不在布伦[3]停靠。”她的脸上的神情和蔼、腼腆，形成微笑。他望着她的亮闪闪的手指甲滑进海港，滑进布伦。“而那偏偏是我唯一希望去的地方，”她跟他说，对着

---

① 希洪(Gijón)：西班牙西北部港市。

② 南安普敦(Southampton)：英国英格兰南部港市。

③ 布伦(Boulogne)：法国北部港市，即滨海布洛涅。

空中说话。

“那你干吗乘这艘船呢?”戴维问。他等候着某种荒谬绝伦的女人的解释。她毫无疑问是一个遗失钥匙,错过火车,忘记约会,把写给朋友们的充满不得体的闲谈的信套在错误的信封里寄出去的女人。但是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她的回答是合情合理的。

“墨西哥城的劳埃德德国北方公司里那个人卖给我一张到布伦的船票,说船在那儿停靠,”她仔细地说,既不发火,又不埋怨。她加了一句,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或者值得大惊小怪的。船票代理商常干这种事儿。“我的船票上写着……”

她打开手提袋,用食指态度文雅地搜寻袋里的东西。戴维从她的胳膊上瞟到一堆零乱的贵重小玩意儿,有金的、银的、皮革的、玳瑁壳的。特雷德韦尔太太揭开一个镶金边的红鸵鸟皮的盒盖,那是她的护照盒。“应该在这里面,”她说,并不带着巴望。“东西到底放到哪儿去了?”她出声问自己。“不管怎样,那上面写着布伦,清清楚楚的。”

“你没有遗失你的船票吧?”珍妮惊慌地问。

“我没有随身带着,可是它就在什么地方。我不是唯一的去布伦的乘客。那些古巴医科学生……”

“去蒙彼利埃[1],可不是,我知道,”戴维说。

“我想不通,他们打算在那儿干什么,可能是什么呢?”特雷德韦尔太太问。“当然不是去读医科吧?”

“可怜的古巴!”珍妮无话找话地说。

戴维问,他们到底怎样才能到那儿去。特雷德韦尔太太猜

① 蒙彼利埃(Montpelier):法国南部城市。

想，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和她自己，会被卸在南安普敦，从那儿……

“那才好哩，”珍妮发表意见说，“要是船长竟然会把他们卸在一艘漏水的救生船上，也许加上两把桨、一小桶里面有蝌蚪的清水和一些长满象鼻虫的饼干，我倒巴不得看到他们出发，而且我愿跟你打赌，拿什么都行，他们会到达那儿的。”

“可我怎么办呢？我也要去布伦啊；我从那儿出发去巴黎路最近。”

“啊，这么说，我也是要上巴黎去的，”珍妮说。“我越想它，越讨厌到德国去。墨西哥城的那同一个人跟我说，我们要是改变去德国的主意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比戈的法国领事那儿去签证，这是我现在的唯一的希望啦。”

特雷德韦尔太太微笑着向戴维转过身去，惊奇地看到他的脸色苍白，而且沉着脸，看来他好像在默不作声地发火。“多好啊，”她跟他说，她在看到他的脸色以前，她打算说的话就脱口而出了。

“一点不好，”他说。“我要去西班牙。”

“我可要去巴黎，”珍妮尖声说。

特雷德韦尔太太冷不防感到，她正站在两个互相指责的人中间。她神情僵硬，勉强装出笑脸，几乎躲躲闪闪地开始挨着他们走开，一边零乱地说些早晨挺美这类话和提到要去进早餐，来掩饰她的撤退。难道他们在那儿，当着她的面争吵是可能的吗？这个念头使她心中充满了尴尬和恐慌。她匆匆忙忙地一路走去，脸上一定还挂着微笑，所以弗赖塔格问她：这么一大清早，她为什么这样眉开眼笑？她告诉他，她也说不上，接着把她的眼光盯在珍妮和戴维身上，不再移开；他们晃

晃悠悠地走过去；在明媚的亮光中，两个人的脸色都有一点儿苍白和紧张；他们互相匆匆地点点头。弗赖塔格心里还记得昨夜那件愚蠢的事情，在他的想法中觉得有点轻微的恶意的满足。他知道，不管——可以压根儿不管——他们挑选保持哪一种外表，这一对合不来；他们在一起一点儿也不快活，而且永远不会；不可能继续下去。他转过头去，好像要对那两个越走越远的人影看上最后一眼，给自己在脑子里留下一个固定的形象，哪怕当时那个印象在渐渐变化和消失；在他能制止和控制这个形象以前，甚至在他察觉到他已经想到那个可怕的想法以前，那个形象已经在他的脑子里变成叫人震惊的确确实实的语言："要是那是玛丽在走到那边去的话，哪怕隔着那么远，任何人，甚至是我！第一眼——任何人就会认出她是犹太人的……我已经为咱们俩干了些什么啊，玛丽，玛丽……我现在要干些什么?"

这完全是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他的整个生活的形象四分五裂了。他向脸色惊奇的特雷德韦尔太太转过身去，用稍微提高了一点儿的声音提议，他们一起在甲板上进早餐。"那敢情好，"她想了想，说。他们坐下，叫住了服务员。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波浪闪闪发光。咖啡端上来了，一盆盆烟熏烤羊排、蜂蜜、热乎乎的小圆面包和黄油。雪白的大餐巾把柔和的亮光反射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的暂时的安乐给这个本来没有可指望的一天投下了短短的、愉快的光辉。

他们的同船的乘客走过的时候，特雷德韦尔太太注意到，至少他们有一半人没有互相问好，倒并不是出于讨厌，而是出于冷漠；她跟弗赖塔格说，昨夜的舞会看来好像没有改变多大的情况。弗赖塔格说，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几件小事情，到头来可

能产生一些变化；在特雷德韦尔太太听来，这是一句很精彩的幽默话。特雷德韦尔太太暗自细想那几件她看到的小事情，断定，最好也许是跟往常一样，默不作声。

吕茨先生，独自个儿，从容自在，停止进早餐，低头望着他那几个盆子。“哈，”他对盆子摇摇头，“又吃了，是不？要是我们幸运的话，一天三餐吃上一百年，怎么样？”

特雷德韦尔太太的那个盘子，在她看来，好像一下子太满了，菜稍微粗糙了一点儿；这不是她第一次觉得，有吕茨先生在场，他周围的一切都会变得粗糙。弗赖塔格在他的半个小圆面包上厚厚地抹上蜂蜜和黄油。“说得真对，”他愉快地说，接着美美地吞下一口。在那种不对头的德国作风中真算得上太漂亮了，特雷德韦尔太太断定，穿着太仔细，身体实在太健康，脑子里没有一个念头；这真是个糟透了的事实：最有教养的德国人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了。多少世纪以来，旅行者们都注意到和提起这事情；她自己就没有认识过一个不是饕餮之徒的德国人。弗赖塔格傻乎乎地转过头来，嘴里塞满了东西，享用着他的早餐，第一次遇上那两道盯着他看的温和的眼光；两条细细的黑眉毛微微扬起，头侧在一边，神情并不特别表明什么，但是使他心慌了一会儿。他转过脸去，费劲地咽着食物。他再看她的时候，她的脸朝着海。

“我最喜欢早餐，”他告诉她。“在家里，我们经常吃英国式早餐，有各种热菜，肉排啊、溜黄蛋啊、烤蘑菇啊、小红肠啊、松饼啊，放在餐具柜上面，你自己去取，还有一大壶热气腾腾的咖啡。我妻子……”

不用说，早餐要英国式的；晚餐呢，要法国式的；其他的活动采用从外国引进的其他款式，也时不时地重新舒适地享用一次

本国的 Eisbein mit Sauerkohl[①] 和啤酒。“真是个多么不懈地努力干的民族，”特雷德韦尔太太想，“他们的一切款式，不管是他们自己的，还是从外国引进的，结果同样是规模巨大的。‘*Ich bin die fesche Lola*[②]’，”她哼着，模仿马林·迪德里希[③] 的最粗俗、低级的风格。弗赖塔格愉快地哈哈大笑，跟她一起唱起这行关于自动钢琴的歌词。

“这你从哪儿学来的？”他问。“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了。”

“在柏林，我上一回在那儿的时候，”特雷德韦尔太太说。“她出色地用粗嗓门唱女低音而显得滑稽的时候，我最喜欢了。她不在电影里演浪漫的女主人公的时候，不知要好多少。”

他表示同意，点点头，“我妻子收藏那种唱片，我们有几百张，一切国家的，一切处在低层的快活人的。”他还接着说，他妻子真有办法，把她周围的每一个人哄得既舒服，又开心。“事实上，”他说，“凡是有她在的地方，生活就总是更好。”他听到了自己说的话，放心了一会儿。他的想象力拣起了他的砸烂了的印象的碎片，又把它拼在一起；它看起来确实几乎一模一样。它是真实的，或者曾经是真实的——但是它仍然可以是真实的。是玛丽亲自使他的整个生活变得不一样的，她的品质没有变，是什么迷住了他的心窍，使他竟然落得对他们的未来这么恐慌？世

---

① 德语，“腌猪蹄加酸白菜”。

② 德语，“我是漂亮的洛拉”。

③ 马林·迪德里希（Marlene Dietrich，1901—1992）：或诺黛德丽，德国话剧演员和电影明星，以滑稽歌舞剧开始卖艺生涯，1930 年在以亨利希·曼的小说《垃圾教授》改编的电影中演女主人公，一举成名，蜚声世界。1937 年入美国籍。

界上的其它地方跟德国一样没有问题，也许没有那么糟。他陷在害臊和懊悔中，因为他的想法卑鄙透顶、大逆不道；他一定要小心谨慎，不把他怀疑的任何事情向玛丽透露，她尽管生性乐观和处世精明，却挺容易心烦意乱和神经紧张；她在梦魇中醒过来的时候尖叫，紧紧地缠住他，把她的脸贴在他的胳膊底下，好像她在尽力躲进他的体内似的；但是她始终没法告诉他，是什么使她在睡梦中吓得心惊胆颤的。还有不少次，她从他身旁，从生活本身面前，后退，会呆若木鸡和情绪沮丧地坐上一整天，两只手捂着脸。“别来烦我，”她会声音平板地说，“我得挨过这一阵。等一会儿。”他也学会等待了。

特雷德韦尔太太试着不带多大的兴趣去想象他的生活，毫无疑问，那是一场在四堵墙中间一个时刻又一个时刻打发掉的日日夜夜的经历，在羽绒被下面痛快地作爱，吃掉大量的食物；有一个皮肤细嫩红润、性子安静的身材庞大的妻子；她倾注出的舒适和乐趣，就像倒在一个个碗内的起皮的浓汤；她的浅色的头发梳成辫子，盘在头顶上。偶尔去一次歌剧院或者剧院；经常到有歌舞表演的酒馆和杂耍场里去听最近冒出来的滑稽演员和唱淫词艳曲的歌手的表演。次次都大喝红酒和啤酒；对生日和结婚纪念日有非常特殊的庆祝方式。她思索着他那种明显的满意的神态，这毫无疑问是建筑在缺乏想象力和一家人大吃英国式早餐的习惯这种基础上的；接着，她轻轻地啃着羊排，发现滋味鲜美。

尽管她花掉了钱，她买了东西，她参观了那些地方，她几乎记不起有过舒适的生活。那些要饭的拧她，她提醒了自己，而且她不管花多少钱，却再怎么也买不到一张会把她送到她希望去的地方的船票。也许那个地方并不存在，或者要是它确实存在

的话，上那儿去，也着实太迟了。我丈夫情愿跟任何偶然遇上的骚货睡觉，而不是跟她，尽管我用尽一切办法显得风骚，来讨他喜欢——他白天黑夜地说他多么爱我哪！尤其是他把这事儿告诉别人。要是这艘船上有一个乏味的男人的话，我肯定会开始跟他谈话的。然而，这一个在珍妮·布朗注意听他说话的时候，看起来是想当有一套的。

弗赖塔格当时正在说什么，而她呢，从温暖的自我怜悯的浴池中冒出来，及时零零碎碎地听到他的话："……我妻子是犹太人，你知道……我们将要永远离开德国，不再回去……"

"可是，为什么呢？"特雷德韦尔太太问。

"我想确实还不用匆忙，"弗赖塔格几乎在认错似的说，"不过，我情愿作好自己的安排，等时候一到就离开。"

"时候？"特雷德韦尔太太问，她没有想。"要出什么事儿？"接着，她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因为她已经知道回答的话，而她不想听到这些话说出来。

"啊，同样的、老一套的迹象和征兆，"弗赖塔格说，已经在懊悔他说的话了，因为他身旁这个模样聪明、迷人的女人看来好像非常迟钝和冷淡。"这样那样的预兆。没有太严重的事情，我想，但是我们"（我们？他问自己）"有观察处境的习惯，"他结束了说话；他想不通自己的缺点，竟然这么轻率地跟这个陌生人说话。

"啊，你用不着告诉我的嘛，"特雷德韦尔太太匆忙地说。"有一回，我认识了一个俄罗斯犹太人；他记得他小孩子的时候遇上的一次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六岁，"她用轻轻的、温和的声音跟他说，"而他完完全全地记得每一件事情——他叙述了可怕的细节——每一件事情的，只有他

怎样逃生除外。这件事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不是挺奇怪吗？他被几个在大屠杀以前他从未见过的人搭救、收养和带到纽约，而他对那些事儿一点不知道。他是个非常稳健、亲切和有学问的人，一个语言教师，各种各样的；他看起来好像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上过什么麻烦似的。你不认为这故事很美吗？"

弗赖塔格沉默得这么久，她转过脸去，向他微笑，比平时的微笑稍微明媚一些。他在剔大拇指的指甲，看起来好像他的脑袋挨了一下打击似的。"我是不应该心血来潮谈这事儿的，"他说，带着隐藏着的憎恨。"我是永远不应该谈起这事儿的，哪怕一丝半点。"

"也许你是对的，"特雷德韦尔太太说，一边在想，你能指望我干些什么呢？我能干些什么呢？她移动身子要把她的盘子摆在一边。他从她手里接过盘子，摆在甲板上，他的盘子旁。

"在这儿进早餐真好，"她跟他说，"你想到这个主意真妙。"

"真高兴，真的，"弗赖塔格摆出相当做作的姿态说。特雷德韦尔太太感受到两人的接近，身子挨着的威胁，又移开去，她知道她会渐渐变得心软，她会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也许结果会支持这另一个，接受他的不幸和委屈，最后会感到内疚，好像她自己是造成这些灾难的罪魁祸首似的；可不是，而且他也会这么认为的，会毫无顾忌地责怪她。这种事儿发生得实在太经常了，难道她最终可能不知道吗？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不管是对吐露心事的人，还是对听的人都没有用。没有医治的办法，没有叫人舒适的措施，眼泪改变不了一点儿处境，说话也不能得到真理。别说了，别再告诉你自己的情况，我不在听，你不能强迫我的注意力。我不想要了解你，我不愿了解你。别试图更接近我。

虽然戴维两眼模糊，情绪低落，可是在他看来，珍妮·布朗

早餐前站在布告牌前那会儿，是那么神清气爽，模样漂亮；她对他的态度是那么迷惑人地亲密，把他对她的怒气又开始慢慢地惹冒起来了；昨夜发生了那件事儿，竟然发生了那件事儿以后，她这样的神态和行为是不合适的。拿珍妮来说，她是心境很好，而且有奇怪的原因。她一大早就从梦魇中醒来，甚至在睁开双眼以后，还恐怖地捧住胸脯，害怕把双手拿开，因为手上有血。后来，她的脑子清楚了，幻象像烟雾似的消散了，她能完全合乎逻辑地把她梦中的情况的来龙去脉和一个个衔接的环节原原本本地解释清楚。不用说。上一夜，戴维待在酒吧间里喝得两眼呆滞，醉貌咕咚，后来在她和弗赖塔格后面跟来跟去，贼头贼脑地走着，很像一个为起疑的丈夫收集证据的私家侦探。弗赖塔格早就看到这情况，但是假装没有察觉。他们再跳舞，希望溜掉，但是戴维闯过去，插在他们中间，抓住她的胳膊，脸上露出傻乎乎的、讨厌的神情。她试着挣开胳膊，没挣脱，只得让步，跟戴维走去；他一直紧紧抓着她的胳膊不放。她早在远处看到，他已经喝得烂醉了；他会变得固执、沉默、没法控制，事实上是个疯子；在这样的时候，她怕他；最好是跟他一起走，哄得他向他的房舱走去，她在那儿可以想法从他身旁脱身。她很快就发觉，他另有意图。他靠在她的肩膀上，用迷迷糊糊、恍恍惚惚但是充满情欲的眼光盯着她看；他们是在向她的房舱走去，而不是他的。她又气又恨，浑身冰冷；在门前，她把她的胳膊猛的一转挣开，乘他冷不防，打开门侧身进去，马上转过身来对着他的脸关门。他用肩膀顶着门心板；她在另一方使出全身力气推。埃尔莎已经被吓得突然跳起来，喊叫："哪一个？你在这儿干什么？"这时候，他马上停手。接着，门关上了；珍妮急忙插上插销。

"别紧张，"她说，她的声音在颤抖。"他只是喝醉了，有一点

儿稀里糊涂。他忘了你在这儿。"

说也奇怪，珍妮想，埃尔莎不知怎么着把这个叫人恶心的小插曲跟爱情扯在一起了。她要谈谈爱情。她承认，她恐怕可能爱上了——她有点儿过分动情地说这个词儿，珍妮注意到，这也许是正确的方式——爱上了那个错误的男人，那个美丽的古巴学生，那个唱歌和跳舞都那么好的高个子。

"可是我不敢让我妈起疑心，"埃尔莎说，在她的声调里带有一点儿愉快的颤抖。"你想象得出她会怎么说吗？"

"啊，行，我能，"珍妮说，"你还是小心点儿的好。那个古巴人除了麻烦外，什么也不会给你的。"

埃尔莎对这话想了一会儿，然后大着胆子说："可是我已经听人说过，爱情带来麻烦——事情就是这样嘛。麻烦。"她深深地吸了一口颤抖而愉快的气。"我才不在乎哩！"然后，她相当腼腆地大着胆子说："我想有一个非常爱你的男人，一定是妙极了。你一定要把他关在门外，在我看来，是那么叫人遗憾。"

"遗憾？"珍妮说，对她的强烈的感情感到惊奇。"不对，这个词儿用得不确切。"

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躺了好长时间，听埃尔莎翻身和叹气，珍妮睡着了，在睡梦中又经历了她在白天看到过的一件事儿，但是结果却不一样，好像她的记忆力已经把两三个零星碎片拼在一起，为整个事情制造出一个那些个别的碎片所缺乏的意义。在她跟戴维开始生活在一起后的第一个月期间，她已经坐公共汽车从墨西哥城到塔斯科[1]去过了，去那儿看一所房子。在中午火辣辣的白天的亮光中，他们在穿过一个印第安人住的村子

---

[1] 塔斯科(Taxco)：墨西哥西南部一城市，位于格雷罗州。

的时候,车子慢下来了;那个村子里沿路坐落着一所所墙很厚、没有窗子的小房子,光秃秃的泥土在每一家门口延伸出去。灰尘呛得人受不了;天气热得她指望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睡觉。

六七个印第安人,有男有女,一起默不作声地站在一所小房子附近一片光秃秃的土地上;他们非常认真地在看什么。汽车开过的时候,珍妮看到,跟那伙人远远地隔开,一男一女扭在一起,在拚一个你死我活。他们用奇怪的姿势搂在一起,摇摇晃晃,磕磕绊绊,好像他们在互相支持似的;但是在那个男人举着的手中拿着一把长刀子;那个女人的胸脯和肚子都被刺透了。鲜血从她的身子和她的大腿上直淌下来;她的裙子被她自己的血粘在腿上。她用一块有尖角的石头砸他的脑袋;他的五官上盖满了一道道鲜血。他们默不作声;他们的脸上呈现像圣人似的忍受痛苦的耐心,神情冷漠,愤怒和憎恨都已经被净化,他们只剩下一个神圣的、不惜献出生命的目的:杀死对方。他们的肉体一起摇晃,紧紧贴在一起,他们的左胳膊都搂着对方的身子,好像在相爱。他们的武器又举起来了,但是他们的脑袋渐渐地低下去,直到那个女的把脑袋贴在他的胸膛上;他的脑袋呢,靠在她的肩膀上;保持着这样的姿势,他们又打了。

这不过是一眨眼就过去的景象,但是在珍妮的记忆中,这是内容丰富、永远难忘的一天,而这个景象在这一天中是不可磨灭的;这一天,照耀着毒辣的阳光;公共汽车整天欢乐而毫无意义地奔驰着;苍穹是明亮的、深远的;群山的一大片、一大片流紫蓝色的阴影笼罩着山谷;她口渴;她身旁那个印第安小伙子的膝盖上放着的篮子里,那些新孵出壳的小鸡在温和地张望。她本来是不知道她吓得有多厉害的;后来,这景象开始重复出现在她的梦中,总是有一些她没法理解的希奇古怪的变化。但是最近的

一次，她处在一些观看的人中间，好像她在玩耍；那两个狭窄的、穿白衣服的人影，不像是真人，倒好像是乡村教堂里圣坛上的小雕像。接下来，她恐怖地看到他们的面貌在变，完全变了——两张脸变成了是戴维的和她自己的了；她在那儿抬起头看着戴维的淌着鲜血的脸，她手里拿着一块沾着鲜血的石头，而戴维的刀子举起着，顶着她被刺透了的、淌着鲜血的胸脯……

她醒过来，感到宽心，但是，在那时候，她记得以前对戴维迷得神魂颠倒，相信他们的爱情，所以郁郁不乐，几乎要哭了。眼泪直涌在她的眼眶里。她仍然相信她是爱戴维的，但是他到底对爱是怎样理解，对她是一个谜。她相信，她认为爱是温柔、忠诚、欢乐和对被爱者的真正的好心；她要戴维舒适，她希望内心安逸；尽管戴维看来好像冷冰冰地吞没一切，然而他好像是孤独的，他不会向她推心置腹，也不会有一丁点儿回报。她作画的时候，他情绪低落，没法干他自己的工作，只是漫无目的地转悠。他不喜欢朋友，而且自己一个也不交。他不跟她一起听音乐，他不跳舞，他不关心她的喜怒哀乐，也不容许她关心他的，也不经营一种他自己的、她可能分享的生活，要是他不能分享她的生活的话。他像一个固执的禁锢自己的心灵的囚犯，他不让自己的心扉打开。

她躺在那儿，两条胳膊垫在头底下，可以指责的毛病越来越多。他们一开头就约定不结婚，因为他们一定要自由，婚姻是一种使文明人感到束缚和羞辱的结合；然而，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正是婚姻吗，而且是最坏的那种婚姻，有一切约束、忌妒和负担，但没有一点儿婚姻的尊严，没有婚姻的温暖和保障，对于忠诚和意图没有诚实的承认。是到了应该想想的关键时刻了。她轻率地爱上了他，一见钟情（为什么？），她迫不及待地促成了

这事儿,她不敢犹豫,不敢想任何事情。他们一旦结合,她不再觉得轻率,只觉得快活,称心,而且说也奇怪,跟戴维难舍难分。她也认为他有同样的感受,因为至少有一年,她肯定这次结合是真心诚意的,而且是牢固的。他们将在一起创造辉煌的生活。

她渐渐地感到沮丧,因为他顽固地抵制爱,好像他们两人身外的一股邪恶势力,而不是他们两人拥有的而且互相交换的一股生命力,还因为他拒绝参加任何要他在最近的未来花力气的计划。她认为,他的一再发作的长时间的沉默是力量和性格的储备力量的证据;但是,他喝醉后,是粗野和愚蠢的,好像束缚他的性格的带子被割断了,他散了架似的。她原先认为,他轻蔑地不跟她的一切朋友来往,是表明他有比她高明的鉴赏力和判断力。现在,在她看来,戴维这么褊狭地注视和倾听,专找别人的谬误、偏见和细小然而确实的弱点和粗俗的言行,是因为发现那些缺点能安抚他自己的恐惧,平息他对自己的品质心中无数的不安。她想要叫出声:“啊,戴维宝贝儿,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只有这个世界!让咱们别对它不满意!”是他一向这样的呢,还是这是他的一种防御她的手法?那么,他干吗要防御她呢?难道他一向是这样的吗,她过去看不见是因为她爱得那么深吗?那么,他这个人有什么值得爱呢?她怎么可能爱上他呢?

她带着兴高采烈的心情开始洗脸和换衣服。长时间的斗争过去了,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它带来了它自己的答案——不是她早先指望的答案——那么,她指望的是什么呢?——不过,那是一个答案,所以她是会接受的。我们会维持一段时间关系,但是关系会越来越糟;我们的说话和举止会互相越来越粗暴;有一天,我们会给予最后的致命的一击。没有去处可退,然后重新开始这场……没有可退的地方。过去决不是你以为你离开了它

的那个地方；你不是你昨天的那个人——啊，戴维上哪儿去了，我纳闷。你朝着它走去的那个地方还不存在，必须等到你走到正确的地点以后去营造它。啊，上帝，别再让我忘掉确实发生过在我身上的事。别让我忘掉。请救救我！

珍妮几分钟后在布告牌前看到戴维的时候，由于对他的憎恨已经消除，所以对他倒情意真切。她要是可能帮助他的话，就不会再跟他吵架了。她将要在不来梅港的码头上跟他分手，径直去巴黎，而他可以按照他的愿望去马德里，在此期间……

她跟他说的最初几句话充满了挑衅；她能听得出那些话，在戴维听来，一定懂得是什么意思。她没法克制自己。她倒咖啡的时候，向餐厅周围瞟了一圈，几乎跟每一个进来的人打招呼。"我看到所有的醉鬼和晕船的人都撑起来了，在磕磕绊绊地走来走去，"她说，"甚至跟你同一个房舱的乘客也在。你在那儿到底寂寞吗，宝贝儿？居然想要进我房舱跟埃尔莎和我一起过夜吗？"

戴维的脸色变得绿里泛白，他强打起精神。"是那样吗？"他问。"我知道那是一件好事儿。说啊，告诉我吧。"

"就是这么一回事，"珍妮说，"除非你能记得起一件别的事情——一件我不在那儿的时候你所干的有趣的事情。你从来不记得，你喝醉了以后，发生过什么事儿，对不？我想，这一定便利得很啊。"

他盯着他的盘子看，一言不发。她仔细打量着他那双眼睛的外角呈现的漂亮、清晰的立体感和眼睑上有青色的微血管的动人的内角。鼻子特别漂亮。那对耳朵。整个脑袋，长而窄。她给他的脑袋画过十几张速写，尽力把她见到的形象正确地捕捉住，但是始终没有一张够让她高兴的；也许她可以用彩色来描

绘。这张脸是古怪地反应着不同的敏感的混合体——有些反应是很强硬的,另一些是微细的——也许特征是在嘴那儿。戴维吃起东西来,好像压根儿没有上帝,好像他从来没有吃过一盎司[①]东西似的;他有一副饥饿相。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能像戴维那么睡觉的,像是个死人;有时候,这副睡相真吓坏人。她会踮着脚走回去,再看看他,听听他呼吸的声音。礼拜天和休假的日子,他会一口气睡十六个钟头。他醒过来的时候总是一脸疲劳相,好像他永远不希望把觉睡个够。他始终没有学会游泳,却喜欢懒洋洋地呆在水里,懒得像条狗。他喝威士忌的时候,不慌不忙地喝个没完,直到他不省人事为止。他有一种有条有理的、跟别人不沟通的、冷冰冰的然而不乏肉体上的乐趣的狂热;在这种狂热中,他干种种过分的事情。他作爱的时候,珍妮知道,他忘掉她是谁。然而,在大斋节[②]期间,想方设法地装出他像一个清白的修士。有一回,他告诉她,他母亲在被他父亲遗弃以后,没有能力养活他——他有一个叫人伤脑筋的害哮喘病的弟弟,这病成了他母亲的心病,把她注意力一古脑儿吸引过去了——于是,她把他交给三个可怕的、浑身酸臭的老姨婆去抚养,她们从来不给他吃够。饥饿在他的骨头里,灵魂里。珍妮心中涌起那种她讨厌的模模糊糊的母性的感情。

"戴维,"她用柔和、含糊的声音说;他惊奇地又看到她的脸色现在起了熟悉的变化,刚才她的情绪还是那么别扭、乖张,现在神情温和,毫无主张、低声下气地一往情深,叫人没法理解,然

① 一磅的十六分之一。

② 大斋节(Lent):复活节前为期40天的斋戒和忏悔,纪念耶稣在荒野中的禁食。

而这会儿是真实的，动人而且可信。

“怎么啦，珍妮天使？”他非常温和地问，等着她对什么事情表示后悔，对他没有向她提出过的要求表示让步；过一会儿，在她的情绪改变，心肠又变硬以后，她会收回这种让步，并且否认。他对费心思去试着理解她这事儿感到厌烦了，而且他眼下知道，他没有一件事能相信她。

“你决定到西班牙去，我真高兴，”她说。（撒谎，戴维想，你再怎么也不会高兴的！）“让我们先去那儿。我总是想要到法国去，我总是想要去。任何时候都行。有一天，我会去的。它永远在那儿。我有的是时间。可是你现在要到西班牙去。那我们就去。我但愿我们从来没有为去哪儿抽过签。”

“这是你出的主意，”戴维不讲情面地说。“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归根结蒂会在法国上岸的。”

“啊，不！”珍妮喊叫，尽管她仅仅听到这句话，眼睛就亮了。“不！我们正在去德国。愿上帝保佑我们，除非我们在比戈弄到签证，而且归根结蒂，还要船在布伦停靠。那些古巴学生在说，有一条古老的海商法：船长必须在你买了船票要抵达的港口放你上岸。但是那个事务长告诉特雷德韦尔太太，过了希洪，一路上去每个港口的船票费是相同的，所以船长不必把船停靠在希洪和不来梅港中间他不喜欢的任何地方。而且船长明确地说，他不喜欢在布伦停靠。所以宝贝儿——等我们到了不来梅港，让我们来扔硬币，扔一回，硬币正面是去西班牙，反面是去法国；然后我们在没发生别的事儿以前，就当时在那儿买票，向另一个航向出发。”她为已经有眉目解决一个问题，变得非常愉快。“啊，戴维，我们就这么办，结束这场烦恼。只要知道我们在上哪儿去，这就会成为一次出色的航行！”

戴维没法或者不愿作出决定。“让我们等吧，”他不自在地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说。“我还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

他对情况不受他控制相当恼火；他原来打算为她跟那个荒谬的弗赖塔格调情吵上一架；这一回，他要她干脆认错服输。她原来打算狠狠地惩治他一番，把他昨夜的行为作一次滑稽而刻薄的描述。但是，无从着手，没有共同的基础——他们的隔阂已经开始，他们中间的距离没有一点儿预兆就越来越大。没有一会儿平静，戴维想，除了在希望的那一刹那，甚至在相信的那一刹那以外，但是现在，现在，你有了。我们要是一起过下去的话，她会对我不忠实的，她会跟别人“有一手”的，以前不是已经有过了吗。干吗跟她一起去西班牙？干吗咱们要一起去任何地方呢？她的生活，或者说她处理生活的方式，对他来说，是一个把一些互相不连贯的事情，把一些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游荡，拼凑在一起的杂乱无章的经历。“啊，这话不对，”珍妮会反对，“对我来说，我过去的生活是精彩极了。”但是，精彩在什么地方，她却从来没有说过。她再怎么也没法解释她逗留在某些地方的真正原因，或者她在那儿干些什么？“嗨，我过去一直在作画，戴维。我不再有家了。我的爷爷、奶奶去世了；房子卖了；他们几乎没有留给我什么——我得养活自己，对不？我过去干得不大行——我现在仍然干得不行，可是我确实在努力！我有一个职业嘛。”看来好像老是有一个男人，或是一些男人，藏在背景里。“天啊，戴维，男人嘛，当然是有一些的喽。你干吗跟我待在一起呢？”……“嗨，不，戴维，我当然决不会跟任何人结婚的，我干吗要结婚呢？”

她永远不会承认，除了戴维外，她爱过任何男人，而且说来更奇怪，她永远不会承认有任何男人曾经爱过她，也许戴维除外，她会等着瞧的。“没有一件说得上有一点儿认真的意思，戴

维宝贝儿，"她一再热切而坦率地向他保证，"没有一件是长久的。只是为了找刺激罢了，戴维。那不是爱，那是逢场作戏[1]。"她始终没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对他来说，这种事儿的不对头，正好完全在这儿。应该有爱情嘛；没有爱情，这是她的耻辱；他痛苦地告诉他自己，我想又是没有爱情。也许永远什么都不会有，只有逢场作戏。

这到底是礼拜天早晨，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被一个景象提醒：那是一张张显示礼拜天的虔诚的神情，人人都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礼拜。六点钟，卡里洛神父来到下面的统舱甲板上，在一个可以移动的圣坛上做弥撒，坛上装饰着点亮的小蜡烛和蔫儿不唧的红纸花。人们跪下，站起，又跪下，挤在一起，肩挨着肩，耷拉着脑袋，嘴皮在动，他们的手不断地挥动，画出一连串复杂的十字架形象。在他们所有的人中间，只有六个女人在做感恩祷告。她们跪着往前爬去，她们的头裹在黑披巾里，去领圣餐。她们仰起下巴，闭上眼睛，张大嘴，没有血色的舌头长得过度地向前伸出着，准备领受圣餐面包。那个神父严肃而匆忙地主持着这个仪式，熟练地把一片片圣饼[2] 放在伸出的舌头上，然后猛地抽回手。他按照适当的仪式结束弥撒，但是用的是最快速度，几乎是立刻收起他的圣坛，好像他在把它从一个瘟疫流行的地方挪走似的。

在离圣坛最远的那一头甲板上，有相当多的一群男人；在这场宗教仪式的整个过程中，他们背对着神父，这会儿转过身来

---

① 此处原文是 fox fire，意思是磷火，只能发光，并不是真的火。珍妮暗指她的那些事没有真的爱情。

② 指领餐时发给信徒用的未发酵的圆面包片。按天主教的说法，圣饼是耶稣圣体的象征。

了，开始散开去。他们默不作声，没有任何其他表示，交换着轻蔑、嘲讽的微笑。那个穿樱桃红衬衫的胖子看来好像是闹事的头子。他不慌不忙地向一个仍然跪在地上、手里拿着一顶旧帽子的男人走去，几乎把他撞倒。那个男人站起身子，把帽子低低地扣在头上，面对另一个摆好架势；那一个突然站住脚，脸上泛出夸张的轻视的神情，眼睛向下，一点儿不把他放在眼里。

"在圣体面前，把你的下流的表情抹掉，"那个男人说，他刚被撞了一下，凶得像个煞神。

"在什么面前，"那个胖子问。"我看到一个太监，他有一颗面包做的睾丸[①]。"

他们几乎同一刹那揍对方的嘴；那个身子比较小的人迅速进攻，绊倒那个胖子；他们一起砰的一声摔倒在甲板上，怒火直冒，扭打了几秒钟；这时候，有六七个人使劲抓住他们，硬把他们分开，坚决地拦住他们，而那些女人纷纷逃散，喊叫，磕磕绊绊地越过椅子和包裹。

卡里洛神父拿起他的圣坛，向楼梯走去，对那场不体面的骚乱甚至不瞟上一眼。那两个打架的人被放开了，站着，脸上在流血，衣服撕破了。他们的眼光显得杀气腾腾，心存警惕，盯着看了一刹那，流露出这事儿还没有完的表情；然后，他们默不作声地分开走去，各自用一块肮脏的破布擦他们的脸，各自被他自己的一些朋友或者保镖围着；事实上，他们已经是保镖了。

七点钟，在大交谊厅旁的小图书室里，加尔萨神父在做弥撒，望弥撒的有那伙跳舞的西班牙男女、那对新婚夫妇、舒曼医生、奥托·施米特太太和奥尔特加夫人。她一大清早就面色苍

---

① 这是对圣饼的侮辱。

白，皮肤上斑斑点点；她靠在她那个印第安保姆的肩膀上。大伙儿跪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想念着他们的有软垫的跪凳；温和的热风吹得他们额头上直冒汗。那些西班牙人紧挨着跪在一起，他们的坚定的脸沾沾自喜地沉着；他们的黑黢黢的、苗条的手捻着念珠。

施米特太太注意到那对新郎和新娘隔开适当的距离跪着，而且甚至一次也没有互相瞟上一眼；她赞赏他们举止得当。然后，她用双手捂住脸，不再看一切分心的事情，一心一意地陶醉在她的温柔的感情中，记起了混合着爱和祷告的狂喜，一种神圣的喜悦形成的、即将来到的、沁人心脾的、美妙的、永恒的显灵。神的羔羊[①]免去世上的一切罪孽，我的灵魂只有在你赦免下才能得到拯救。圣母马利亚，圣母马利亚，现在和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为我们祈祷吧。

在她近旁的安帕罗动了一下，裙子窸窸窣窣地、念珠嗒嗒地响着，她的压在喉咙里的祈祷词带着嘶嘶的嘲笑的声音，她每一个毛孔里都散发出鲸脑油的气味，其中混合着那种最低级的女人才会用的香水味。施米特太太被那些声音和气味，加上从四面八方逼来的人体的气味和时间太久已经变质的生发油味所困扰，跪着移开了几步，然后停住，觉得真愚蠢。她的愉快的情绪给毁了。她坐在她的脚跟上，逆来顺受，没精打采，睁开她的眼睛，看加尔萨神父在低声讲道的时候的固定的手势。她心里早就知道这一切了，但是觉得她的狂喜给骗走了，她时不时地偷偷地向那些西班牙人瞟上一眼，是他们欺骗了她。

她对他们特别反感；什么人能称这么黑的人美呢？舒曼医

① 指基督。

生，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在场使她安心。她感到她对他很熟悉，啊，他是那种她了解的人，他也了解她。她心中涌起她在萨尔茨堡[①] 度蜜月那段温柔、愉快的回忆，好像一幅装在金色画框里的小画——她的新婚的、出色的、永远出色的丈夫跟她一起在圣沃尔夫冈街上白马旅馆里他们的第一个房间里；处处是可爱的夏天的绿色亮光；那艘旅行用的白色小轮船在湖面上一路开来；人人都在走到一个跟学校讲台差不多大小的码头上去迎接船靠岸，好像它是越洋轮船似的……那些小小的镀金球在黑尔布鲁恩宫[②] 的喷泉的水花里跳跃；那些可爱的上了釉的彩色陶器的小矮子和土地神从树篱和花坛里在向外张望！啊，那些脸色凶狠、眼光里显示仇恨的西班牙人啊，只要他们看到黑尔布鲁恩宫里的殉难的伊丽莎白皇后[③] 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就会懂得什么叫美……这是一次悲伤的航行，也许她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后一次了；真煞风景的是，她周围大多数人是这么不讨人欢喜。她连骨头里都感到孤独，老是想念她丈夫；有一夜，她已经睡在床上，想象着她可能起床，走到下面底舱去，在黑暗中，就坐在那具棺材旁，跟它亲密地作伴。后来，她在睡梦中到下面去了；在那儿门前，她的丈夫站着，像海上的月光那样闪闪发亮，一边说，一边摇着手："回去，回去，回去，"就说这些，没有别的话，说了三回，接着不见了。她吓醒了，开亮她的床头灯，开始念玫瑰经；唉，她只得顺从天命，不再在这个可怜的世界上跟它见面了，也只得顺从天命，不让自己硬起心肠，反对那些可怜人和不幸的人——当

① 萨尔茨堡(Salzburg)：奥地利萨尔茨堡州首府。

② 黑尔布鲁恩宫(Hellbrunn)：萨尔茨堡一游览景点，原先是王宫，建筑为巴罗洛风格，有一布置精美的花园。

③ 奥地利皇后，在访问瑞士期间被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

然喽，那些糟透了的西班牙人就是这两种人。她总是深深地相信，人只希望按照各人自己的方式安静和快活，但是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个邪恶的精灵使他们不得平静。一个人的欲望总是不得不排挤掉另一个人的；一个人总是不得不牺牲别人来获得他自己的利益。或者看来情况就是这样。愿上帝宽恕我们大家。

勒温塔尔先生戴上经文护符匣[①]，做罢晨祷后，独自个儿心情沮丧地转悠，绝望地思索着里贝尔先生对待他的态度。这不是个说话粗暴的问题，因为里贝尔先生难得跟他说话；要是勒温塔尔先生有礼貌地问一个问题，他只得到一声咕哝，就算是回答了；麻烦的是里贝尔先生行为好像他是独自个儿生活在房舱里，享有那儿的一切权利和空间。他推开勒温塔尔先生周围的一切行李，好像那都不过是挡他的道的垃圾似的。有一回，他故意把勒温塔尔先生的盥洗用品一古脑儿从架上一下子抹到地上，打碎了满满一瓶修面香液；他甚至没有一点儿礼貌，假装是无心的。

要是勒温塔尔先生把睡衣睡裤挂在小贮衣橱里里贝尔先生的衣服附近的话，里贝尔先生装出一副厌恶、挑剔的神情，用大拇指和食指提着那套睡衣睡裤移动，让衣裤掉在地板上。这一切，请注意，都是带着最强凶霸道、蛮不讲理的态度干的，好像他知道他可以有恃无恐地为所欲为，而不必担心后果。

勒温塔尔先生对这一切完全接受，从不当场提出抗议，痛苦

---

① 除安息日和节日外，犹太男子晨祷时额上和左臂上要各戴一皮方盒。盒中藏有羊皮，上写《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13章第1节至第16节和《申命记》第6章第4节至第9节、第13章第22节。典出《出埃及记》第13章第9节："这要在你手上作记号，在你额上作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

地打定主意，默默地忍受，尽可能耐心地等待这个欺人太甚的情况结束，花大量时间试着找到一个他自己的地方，用来贮藏他的、而里贝尔先生不可能声称是他的财物。他重新整理好他的手提箱和样品盒，把他的新提供的盥洗用品放在一个袋子里，把这一切都放在铺位对面的角落里，在长沙发脚旁和底下。有一回，他发现那些东西都又在地板中央了；又有一回，它们都胡乱堆在下铺上。明摆着，这事儿没有个完。勒温塔尔先生不由得带着苦中作乐的幽默感，开始想到里贝尔先生是那个德国寓言中在家庭中恶作剧的精灵，那个淘气鬼。哪个淘气鬼在跟人捣乱方面都比不上像他那样没完没了。反正这很快就会过去的，在他们抵达不来梅港以前，淘气鬼先生不会想到什么使他自己感到厌烦吗？

脑子里想着这个叫人闷闷不乐的问题，勒温塔尔先生在甲板上从窗外向小图书室里瞟了一眼，看到在做弥撒。他抑制住想吐唾沫的冲动，直到他走到看不见那一溜儿做礼拜的人的地方为止；接着，他由于厌恶，嘴里尽是口水，走到栏杆前，像一个没有出过海的人那样把唾沫吐在风中；风吹过来，把唾沫吹回到他的脸上。他的诅咒被这样送回到他的牙齿上，使他浑身充满迷信的恐惧；这种恐惧像一群老鼠在他的血液里乱窜，从头到脚地冲击他的神经。"但愿上帝不让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出声说，怀着真诚的虔敬的心情，一下子坐在最近的帆布躺椅上，浑身直打哆嗦。

几分钟以后，加尔萨神父出来了，在完成了他的宗教职务后，看来精神很好、神情也很可亲，撩起他的黑色法衣下摆，把一只方方正正、瘦骨嶙嶙的手伸进裤兜，掏出一盒烟卷。卡里洛神父跟他一起抽烟。他们两人都亲切地对着勒温塔尔先生满脸堆

笑;他的眼光盯着他们看,但是视而不见。"早上好,"两个神父友好地用蹩脚德语说;加尔萨还加了一句:"我们遇上了好天气。"他们慢腾腾地走过去;勒温塔尔先生正陷在极度痛苦中,甚至没有听到他们的话,直到他们走掉,他才费劲地站起身子。"早上好,"他可怜巴巴地向空气和波涛汹涌的大海说。

船上没有路德宗的牧师,船长担承主持这天该举行的宗教仪式。十一点,船长餐桌上所有的客人,除了舒曼医生和施米特太太以外,都聚集在大交谊厅里;维利巴尔德·格拉夫先生和他的外甥、格洛肯先生和吕茨一家子、鲍姆格特纳两口子和他们的儿子汉斯,都在那儿跟他们会合。甚至还有威廉·弗赖塔格,他恰巧已经来了,就留下来做礼拜。船长用他的最威严的发号施令的声音念了几节《圣经》,背了恰当的祈祷词;他的会众必恭必敬地听着,垂着脑袋。人人都参加唱了几首优美、欢乐的赞美诗;他们的坚决、热烈的歌声传遍全舱,甚至传到外面酒吧间里;那儿的那个招待员站着,出神地倾听,脸上显出高兴的神情,合着拍子点头,压低了声音在哼。

胡滕太太、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和施米特太太退到甲板上背阴的一边,准备坐在那儿打发礼拜天的无聊,等候吃饭。隔开不远的地方,胡滕教授先生跟船长和舒曼医生在谈话。他们的声音很低;他们的神态热烈,所以那几个女人也不打算去听他们的谈话了。胡滕太太望着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东西,一直知趣地默不作声,心不在焉地胡乱抚摸贝贝的剪短了耳尖的耳朵。

"看来那两个年轻的美国人的姓,"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整洁地写着"归根结蒂都很平常,斯科特和布朗。没错儿,布朗就是布劳恩,也许那个年轻的女人祖上是德国人,尽管我讨厌这么

想。难以想象有一个人在每一个方面更不像德国人了。天使和宝贝儿是他们相互的爱称。当然喽，趣味相当低级，再说也太夸张，因为他们两人中没有一个有一点儿吸引力嘛。她跟太多的美国女人一样是一个干枯的人——哪怕是长得美的美国女人也没有真正的水灵味儿，看来不是像一段上了漆的五彩的木头，就是快要蔫了。我听到有足够证据的权威人士说，原因是她们一到发身期，甚至更早些，就失去童贞，这几乎已成为普遍的风俗；从此以后，她们过的是毫无顾忌的人尽可夫的生活。但是，这个女人长得一点儿不美；我想她本来在任何年纪都可能遇上破身的困难。至于那个年轻的男人，我以为他能为他自己配上她，是配上了最好的了，而且说真的，她这个人是完全应该属于他的。”她把笔插进记事本中间那个袋子里，愉快地向后靠去，想着她已经狠狠报复了这一对男女最初使她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她转过脸去，跟胡滕太太说话，这时候，她的注意力被里贝尔先生和斯波肯基克小姐的古怪的行为吸引住了，他们在栏杆前扭在一起，实在太不像话了。里贝尔先生的脖子上围着那位小姐的绿白两色的围巾，而她拉着围巾的两头在把他拉来拉去。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猛地把她的长柄眼镜举起了一会儿。可不是，那个姑娘假装在里贝尔先生的下巴下面打一个结，但是她确实在抽紧那根套在他气管上的绞索，勒得他拚命吸气；他的眉开眼笑的表情几乎已经不见踪影，膨胀的血管在脸上现出青紫。她然后松开了那个结；那个好性子的殉难者演出了一场复活的哑剧，神情感激。

他的整个态度使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感到讨厌。一个男人这么屈从于任何女人的打情骂俏的虐待，不管她的魅力是多么无法抗拒，都是不合适的。倒过来才更恰当，因为女人的天性的巅

峰就是为了爱情经受痛苦。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试着想象要是她竟然，尽管完全是出于开玩笑，试图勒死她的奥托的话，那会怎么样呢，这时候，她浑身传遍了一阵强烈的肉欲的兴奋。

"我们去喝点啤酒吧，"里贝尔先生兴高采烈地喊叫，把围巾塞进他的衣兜，围巾像条尾巴似的垂在兜外；那一对不识羞的男女跑过去，后面跟着一溜儿不以为然的眼光。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用悦耳、宽容的声音跟胡滕太太说："人要是总是凭外表作判断的话，就不得不经常往最坏处想。"

胡滕太太懒洋洋地挪了挪身子，好生想了想，宽容地回答："啊，得了，看来好像他们俩都还没有结婚哩。谁知道啊，可能是未婚夫妻呗。"

小个子的奥托·施米特太太大着胆子说："说也奇怪，他们看起来倒也相配。我一向是喜欢看到男人比女人高的。"

三个女人然后注意到蒂勒船长、胡滕教授先生和舒曼医生仍然在安全的距离外全神贯注地谈话。她们毫无顾忌地说着她们女人间的话，用不着担心被男人们无意中听到；在男人看来，她们的谈话是琐碎的、没有价值的，而且是只配给他们男人拿来作取笑的话柄。

"斯波肯基克小姐是个离婚的女人，我听人这么说过，"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有人告诉我，她是个从事买卖的女人——形形色色的女内衣买卖，她有三家店铺，她在任何情况下都用娘家的姓。怪不得她不再有丈夫。这可能是她的生活作风或者说是她的违背世俗的生活作风所造成的。"

"我在结婚以后，希望继续教书，"胡滕太太带着做妻子的骄傲说，"可是我丈夫压根儿听不进这想法。做丈夫的维持一家子的生活，他告诉我；做妻子的呢，为他们俩营造一个幸福的家。

这是她的神圣的任务，他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止她放弃这个任务。事情就是这样。从那一天起直到今天。除了担任我丈夫的秘书以外，我一直只干家务。”

施米特太太涨红了脸。“我教过几年书，”她说，“在我丈夫的同一个学校里，他身子虚弱，在战争后几乎是伤残者了。他没法教满一个教授的课；不要负担太重，对他是重要的。我们没有孩子；我还要干些什么呢？在我那所小房子里，没有足够的活儿好使我的时间都排满。有空闲，我就乐于帮助我丈夫。我们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她的声调带着温和的为自己辩护的意味和沾沾自喜。

“说到底，咱们不能订出固定不变的规则；它总是取决于咱们的丈夫的希望，”胡滕太太说。“拿我来说，我活着只是使我丈夫欢喜。好啦，不管在那个野蛮的外国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咱们大伙儿终于都在回家了。不过，没有事情可能是一样的，”她跟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没有事情可能是一样的。我们在一九一二年来到墨西哥，一点儿没有预见到那场将会侵袭我们亲爱的祖国的灾祸。幸运的是，教授的近视眼度数很深，而且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是足弓下陷；所以从来没有参战的问题……”

“幸运？”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重复着说，她的弯弯的眉毛抬起来了。“幸运的是，我丈夫生前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十全十美的体格强健的男人的活标本，一个上尉，他在前线打过三年仗，我可以说，是在战争打得最激烈的那些日子里。他在战斗中表现出超人的英勇，得到铁十字勋章[1]；后来，他被杀死在战场上……这不是挺奇怪吗，战争毁掉的是这样的人，勇敢的人、思想

[1] 德国奖给有战功的官兵的一种勋章。

崇高的人、体格健全的人，那些非常宝贵的父亲，而偏偏留下那些有缺陷的人传宗接代？啊，这些年来，剩下我独自个儿以后，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许多回，可是我找不到答案！”

“这个世界除了需要士兵以外，还要学者和思想家，”胡滕太太温和地说。她是那种钦佩脑力劳动者的成就和敬仰高尚的道德的女人，绝不会被这种说法所迷惑。“不过，在这件事儿上，我非常理解你的感情。”

“我丈夫，”施米特太太说，“是个勇敢的战士，又是个学者。两种品质并不是不能相容的。我丈夫……”

她停住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在往回吸的时候，带来了眼泪，好像唧筒从井里抽出了水。她的脸在颤抖，她在胡乱地摸她的手绢。“这么些年了，简直跟死人没有不一样，”她抽抽搭搭地说，“简直跟死人没有不一样。”

那两个女人沉着地而且也许有一点儿满意地看着她流露感情。女人免不了要哭，每个人自己的眼泪是为她自己的苦恼，在她自己空闲的时候流的。她们自己这会儿没有眼泪；她们的脸上还带着一丝不赞成的表情。施米特太太看来显得相当悲痛，然而她们还是带着非难的态度不可避免地看到，尽管她佩着守寡的黑纱，她戴着一条沉甸甸的金项链，链子上挂着一个藏纪念品的大盒子——至少可以说，这不妥当。施米特太太看到她们的眼光在她的脖子和喉咙上瞟来瞟去；她也是女人嘛，猜到了她们的想法。她把手按在盒子上：“我丈夫的肖像，”她说。“我已经带在身上好久了。我不能没有它！”

在拖长了的沉默中蕴藏着讥刺；施米特太太站起身来，她的小鼻子和眼皮都通红。“对不起，失陪了，”她说。她用穿着圆头浅口皮鞋的双脚站稳身子，挨着走过她们身旁，摇摇晃晃地向门

那儿继续走去。她在那儿站住脚，站在一边，让一个坐轮椅的害病老人经过。在那颗像染黄的羊皮纸似的脑壳上方，呈现着那个小伙子的明亮、愤怒的脸；他粗鲁地试图挤出门口，施米特太太差一点被他撞上。

"停住，"那个病人用空洞的声音说，一边举起手，用大拇指和食指抓住施米特太太的衣衫。她浑身直打哆嗦，不敢移动，好像是有个鬼用手抓住了她似的。"你在苦恼吗，我的孩子？"他问她。"让我来帮你。来吧，走在我身旁，把你的麻烦告诉我。"

"啊，没有，没有，"施米特太太匆匆忙忙地低声说。"没有什么。谢谢你，非常感谢你。你真好。"

"上帝是仁慈地通过我的，我是他的工具，他的仆人，"那个病人说。"我，维利巴尔德·格拉夫，能凭着上帝的仁慈治愈你的种种不幸，只要你相信……"

"舅舅，"那个小伙子说，恼火得声音都嘶哑了，"我们堵着门洞子哩。"他把轮椅猛地往前一推；格拉夫先生抓着施米特太太的袖子的手指头松开了。"啊，不，"她说，急忙走过去，她逃跑起来姿态笨拙，"谢谢你！"她被这个亵渎上帝的建议震惊得眼泪都干了；她不再悲伤，心头燃起出于宗教信仰的怒火；几分钟后，她在跟鲍姆格特纳夫妇说话了；他们坐在大交谊厅里那种阴郁的、跟外界隔绝的家庭氛围中。鲍姆格特纳先生在打天天打的那一仗，抵制在饭前喝一杯白兰地苏打的想望；那是短短的一仗，他马上要输了；他妻子冷淡地等候着他承认失败的时刻来到。汉斯跪在窗口的一张椅子上，望着大海，等着他那杯覆盆子汁。他母亲那时会坐在他和他父亲中间，她的头由她的手支撑着；要是她办得到的话，就不会让他们两人中哪一个有一分钟不在她的视线内。汉斯看到里克和拉克爬到栏杆顶上，把身子远远地探

出在水面上，互相任性和毫无顾忌地喊叫，扭动了一下身子，叹了一口气。他们看到了他，向他伸了伸舌头。拉克转过她的背去，猛地撩起她的裙子，对他露出她的穿着短裤的屁股。他看到这个举动，在靠背椅后面稍微缩了一下，感到震惊，但是并没有不高兴。他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女孩做出这种事儿来。

施米特太太跟鲍姆格特纳太太说："想想看，一个一只脚已经跨进坟墓的男人……"但是鲍姆格特纳太太几乎是羞怯怯地说，她自己认识一些人，他们自己的健康情况倒不是顶好，却有治愈病的力量。说真的，有时候好像是他们把自己的健康给了别人，这样他们就没有健康留给他们自己了。

施米特太太摇摇头。"他的脸不和善。他用他的眼神吓唬我。"

鲍姆格特纳太太痛苦地皱起眉头，轻轻地呻吟，接着说："从前，当真有一些不但能治好灵魂，而且能治好病的圣人。"

"他是个路德宗信徒，"施米特太太冲动地说，"他怎么可能是圣人？"

鲍姆格特纳太太的身子稍微有一点僵硬，她的声调和态度变得完全冷冰冰了。"我们是路德宗信徒，"她说。"我们也有我们的圣徒。"

"啊，亲爱的，"施米特太太说，"请相信我的话，我是永远不会有意冒犯任何人的宗教感情的——啊，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我确实没有把话说清楚……"

"我怕你确实已经把你的话说得很清楚了，"鲍姆格特纳太太说，一丝不让。"每个教会里都有圣人。可是我想你们天主教徒认为，除了你们自己以外，没有别人被上帝看到——我想你不可能承认，我跟你一样是上帝的孩子……"

"啊，请别说了，鲍姆格特纳太太，"小个子的施米特太太喊叫，她这会儿看起来随时都会晕过去。"可不是，咱们大伙儿都是上帝的亲爱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过别的想法。我竟然说你们的教会里没有圣人，这是我无知——我不知道你们有圣人；没有人告诉过我！我以为只有天主教才有圣人——请原谅！"她伸出扭在一起的双手。"他们是谁？"

"什么是谁？"鲍姆格特纳太太问，她被她丈夫的脸上的表情分了心，那是表明他将要来一杯白兰地苏打的表情。

"你们的圣人？"施米特太太问，热切地想知道。

"啊，天啊，怎么问这样的问题，"鲍姆格特纳太太说，坚决地结束这个局面。"我决不跟任何人讨论宗教。汉斯，来，"她叫她儿子，"我们要去喝覆盆子汁了。"她转过脸去，最后和永远地把施米特太太冷冷地撂下，让她坐在那儿，感觉她受到了深深的、不公正的损害，哪怕她是怀着世上最好的意愿，只有一片好心而没有别的念头。施米特太太第一千次重新发觉，在一个看来没有一个人了解和同情另一个人的世界上，要做个好心、清白、友好、单纯的人，有多么困难；看来有太多的人真的不希望做人稍微宽厚一点。

蒂勒船长在跟胡滕教授先生和舒曼医生谈话中，提到今天早晨统舱里出的乱子。他的语调是一个他的权威不容争论的人的从容的语调；他用这种语调表示意见，要是那伙下三滥还要兴风作浪的话，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就会把那些闹事的人在其余的航程中戴上镣铐。他喜欢他那间小小的囚室里有人住，现在它空着哩。舒曼医生说，他听说有一个男人鼻子给打破了，另一个下巴割了一条口子。他独自个儿下去看，发现他们两人情况

很好；他在鼻子上贴上橡皮膏，另一个在下巴上缝了两针。胡滕教授先生悲痛地听到，那一架是为了宗教才打起来的。

"宗教？"船长傲气凌人地说。"他们懂得什么宗教？"接着，他们撇开了这件事情。但是胡滕教授认为它相当有趣，告诉了他妻子和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在甲板上遇见阿尔内·汉森，冒昧地问他统舱里的那场骚乱有什么下文。汉森刚醒不久，什么也没有听到，但是他问一个经过的水手；那个水手告诉他，虽然时间不长，那一架打得好不火爆。他错过了热闹，但是他听说他们动了刀子。

胡滕太太带贝贝出来遛一遛，遇上吕茨一家子，有点儿激动地告诉他们她从她丈夫那儿听来的消息；吕茨一家人得到的印象是，刚才那些隐藏在下面的危险的罪犯打了一场人人参加、个个有份的群架，流了不少血。

格洛肯先生摇晃着他的长胳膊在散步，一边吹着口哨，把一支曲子吹得不合曲调；吕茨先生问他，有没有听到统舱里的扭打声，加上一句，他希望他们的怨气已经满意地消除了。"要不，他们会上这儿来割断咱们大家的喉咙，"他说，只是说得有点儿吞吞吐吐。吕茨太太一听这种轻率的骇人听闻的话，脸色煞白，而作为她个人的意见，补充说可能是食物引起了骚乱。"我们自己的也没有改进，你们可能也注意到，"她发表意见。

格洛肯先生高兴地发现威廉·弗赖塔格对这场风波一无所知。"真怪，"弗赖塔格说，"几分钟前，我刚见到舒曼医生；他可压根儿没说这种事儿。"但是，他表示高兴。"原来他们在下面已经打起来了？好，"他说，"好。为什么？"

格洛肯先生不知道。意见分歧了。人们拥进酒吧间去。可以听到阿尔内·汉森在用英语发出洪亮的、不容不听的声音对

着那伙一溜儿坐在高脚凳上的人说："他们全都饿着肚子，穿得破破烂烂，像牲口那样被装运，还得不到跟牲口一样的照顾，你们能猜到他们为什么打架吗？宗教。我的上帝。他们互相打得头破血流，因为一个人跪，而另一个人不跪。"

"也许只有对宗教这个题目他们才有意见，"特雷德韦尔太太说，一边轻轻地旋转她的啤酒杯，让泡沫再升起来。

"啊唷，"坐在她旁边的那个事务长苦恼地说，"请别旋转你的啤酒。你会破坏它的滋味的。"

"真不好意思，"特雷德韦尔太太说，对他笑了笑，放下她的啤酒杯。

汉森探出身去，眉毛皱着，瞪出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意见？什么意见？他们懂得什么，怎么会有意见呢？只有那个胖子才有意见；船长说他要给戴上镣铐……那些人提意见的权利就到此为止了。"

"对不起，先生，"那个事务长说，"船长刚才只是说，要是那个胖子再惹麻烦的话，他就会……"

"由谁来判断什么叫惹麻烦？"汉森吼叫。

"嗨，当然是船长喽，"事务长说，回答得挺爽快，但是有一点儿不自在，好像他在对付一个疯子似的。汉森点点头。"是这样，"他憋着一肚子火表示同意。

"怎么可能有哪一个人对宗教表示公正的意见呢？"戴维插嘴说；珍妮注意到他的说话带有一丁点儿西班牙口音，这是他更叫人恼火的习惯之一；她管这叫十足地道的做作，尽管戴维赌咒发誓地否认，一口咬定说，他几乎有八年天天说西班牙语，这是自然形成的结果。"一切主张无非是用偏见反对偏见；为争取有利地位而进行的是非不明的斗争……人们喜欢道德认可的互相

憎恨的权利。宗教问题的真正基础是政治……”

“正是这样，”汉森吼叫。“一切都是政治，有谁不这么说呢？要不是宗教是政治的一部分，有谁会对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有一丁点儿注意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将坐牢呢？那个反对宗教的人。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个教会，而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扰乱政府。教会和政府就是这样子的！”汉森举起两个紧紧并在一起的手指头。“他可以整天把一个个圣坛拆掉，谁会在乎呢？要是只是宗教问题，没有人，”他皱着眉头转向弗赖塔格，好像是在跟一个他认识的人说话似的。“是这样吗？”

弗赖塔格用平静、讲理的语调说：“也许那个圣坛被拆掉的人可能纯粹为宗教理由斗争。他的行动可能对一个政党有用，可是他自己的想法压根儿没有政治意义……我认为那些家伙都不可能对为什么他们互相扭打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拿我来说，至少我愿意认为这比政治要好些。”（“嗨，我真的喜欢你啊！”珍妮对她自己说，把她的高兴的脸遮在斜拿着的啤酒杯后面。）

“好一些？”汉森问，现出责怪和悲痛的神情。“你认为，宗教把那些可怜的人变成傻子，使他们不一起打敌人，而是互相扭打，这倒反而好一些？”

他的悲痛和愤怒是真的，但是那些在听他说话的人对他的悲痛和愤怒的原因都摸不着头绪，所以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的话，那个事务长只是把舌头顶着他的牙齿嗒嗒地咂了几下，伸出一个手指头对他摇摇，摆出像父亲似的庄重神情摇摇他那颗大脑袋。汉森不睬他。

鲍姆格特纳先生从他的桌旁用感情深切的声音响亮地说话。“我是一个迷失的灵魂，”他说，“可是我绝不会否认真正的

宗教的力量。它是我们的文明的精神源泉,我们对来生的唯一希望。尽管现在我们都可能是可怜的,没有它,我们会变成怎么样呢?"

汉森猛地转过身去,两条灰眉毛下面的眼睛瞪出着看鲍姆格特纳先生。"哪种真正的宗教?"

"它们全都是真正的,"鲍姆格特纳先生响亮地说,针锋相对。

"啊,"他妻子发出一声细细的延长的尖叫,"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汉森不注意鲍姆格特纳太太。"文明,"他说,表示露骨的轻蔑。"让我来告诉你,那是什么?首先是士兵,然后是商人,然后是教士,然后是律师。商人雇用士兵和教士为他征服那个国家。首先是士兵,他是杀人者;然后是教士,他是撒谎者,然后是商人,他是贼;他们大家带来律师,制订法律,保卫他们的成就,那样,你就有了你的文明!"

鲍姆格特纳先生退缩了一下,闭上眼睛,看来好像马上要回答了;他的妻子紧闭嘴唇,用脚尖碰碰他;他保持沉默。

"艺术家怎么样呢?"珍妮问,撺掇他。"他怎么样呢?"

"他最后来,他声称样样东西都不是真的那样子的,他是个骗子,"汉森干脆地说,不向她看。丹尼坐在勒温塔尔身旁,勒温塔尔一直压低了声音不断地说:"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丹尼在汉森这样表明他的观点的那段时间里,一直脸色很阴郁,这会儿突然发出响亮的笑声。没有人跟他一起笑。他脸涨得通红,一副困窘相。"骗子,哈,说得对。"他胡乱地说。"骗子!"

"我愿意看到正在进行的事情的真相,"珍妮跟弗赖塔格说,他一直盯着看她的脸。"我认为那个胖子要是关在禁闭室里的

话，我们应该设立岗哨保卫船长，带上旗子，开一个盛大的庆祝会……”

弗赖塔格注意地听她说话；他们对统舱里的人们望了一会儿，但是没有发生什么不正常的事情。男人在甲板上懒洋洋地转悠和打纸牌；女人在给她们的娃娃喂奶，要不，在洗衣服。火热的阳光照在她们身上；看不到一点儿叫人担心的迹象。

在船的另一头，他们发现吕茨一家子、胡滕两口子、那些古巴学生一溜儿往下看那片深渊似的空间；那儿，帆布幔已经从格栅上撤去，好让这片供统舱客吃饭的地方亮一些，透气一些。第一张餐桌已经摆好，一派叫人放心的景象。密密匝匝的人们像苍蝇似的挤在大块大块的烤牛胸肉、大量的饺子、一碗碗糖水杏儿、一堆堆新鲜的绿葱头周围。他们全心全意、默不作声地在填肚子，伸出长胳膊去取东一摞、西一摞放在白油布上的厚面包片。他们用胳膊肘支撑着探出的上身，吃着，觉得又有精力了，觉得他们的骨头和血液复原了，他们重又有希望了，他们的生活的欲望又觉醒了。那六个学生排好队，用听不懂的隐语喊叫着友好而粗声粗气的话；有几个男人抬起脸，嘴里塞满了吃的，腮帮子鼓出着，向他们倏地手一挥，神情和善。他们凹陷的脸紧紧地板着，但是他们的眼睛是终于睡上觉、吃上饭的疲劳的人的眼睛。

看热闹的人走过去，有一点腻烦地松了口气；他们的稍微有一点儿直愣愣的表情反映了他们的平静了的心情。吕茨一家子、胡滕两口子和格洛肯先生这伙人在低声说话，像一群鸽子，看来好像含含糊糊地同意虐待穷人是不对的，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他们会首先这样说。所以他们为用不着担当这个不愉快的责任、他们的担心被打消、他们的宽容得到安慰而感到高兴。那

些陌生的外国人看模样似乎并不危险;他们显然一点也不在受虐待;恰恰相反,他们在享用一顿呱呱叫的饭菜;再说,要是下边那儿有捣乱分子的话,谁也不用担心——船长懂得怎样镇压他们。

珍妮和弗赖塔格逗留着,隔开一点距离,后来走近些,站在一起了,他们的手几乎在栏杆上接触。他们都没有忘掉上一夜那场荒唐的大吵,而且戴维·斯科特随时可能像鬼魂那样回来,在他们背后出现,证实他最初对他们的行为不轨的怀疑,或者至少是有不轨的意图吧。弗赖塔格对他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信心化成了对珍妮的一种模糊的憎恨:她干吗容许那个家伙像个无赖那样吵吵嚷嚷地胡搅蛮缠,不是明摆着他无权干涉她的吗,除非她乐于容许? 弗赖塔格在他的思想深处本能地只相信权利;婚姻不言而喻地给予一个男人虐待他妻子到一定程度的权利,所以弗赖塔格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做妻子的在宣誓同意结婚的时候,已经同意这个情况了。这一切想法无形地在他的脑子里活动,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是清楚的:一个女人容许一个没有合法权利虐待她的男人这样对待她,是傻瓜,或者更糟。他对珍妮的看法虽然不怎么样,几分钟后却缓和和冷静下来了。难道她爱上了那个家伙不成? 看来这是最不可能的嘛。

珍妮把身子探出老远,在黑影憧憧的那片装着格栅的深渊似的地方的群众中间搜寻。“可不是,他在那儿哩,”她说,一边指出那个胖子;他换上了一件草绿色衬衫,“在美美地吃。压根儿没关禁闭室。这么说,我们的检阅结束了,真可惜。没有公正的处理,这不是太遗憾了吗?”她的态度是完全坦率的,她的眼光明亮,而且显得快活。

"没错儿，存在着不公正，"弗赖塔格说，"不过，在深层里，在身体深处，在我们的气质里，无药可救——瞧，"他热切地说，"要不是有不公正，我们怎么可能居然有公正这个观念呢？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认识一位老讲师经常说：'我们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派岗哨保卫船长不会有任何好处。"

"啊，不会有吗？"珍妮喊叫起来。她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她认为他只是坐着，让种种事情在他的身上匆匆经过。没有东西是无药可救的，甚至人性也不是。可要是你等着要抓住事物的根本的话，你将永远什么也找不到。表层就足够使任何人忙乎的啦！你要是想事情有所改变的话——当然喽，要改变得好些！——你只要踢翻最近的那辆手推苹果车，撒掉手边的第一袋豆子[①]就行。她热烈和兴奋地相信罢工，她参加过许多回罢工，它们起作用；没有什么比它们更刺激和美妙了，它们使你自己觉得是正在推动事物的改善的活动中的一部分——为人们争取像样的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较短的工时——为什么事情倒没多大关系。她跟任何正好需要设立纠察线的罢工的工人一起担任过十几回纠察；她有几回被关进监狱；说真的，那不过是一场游戏罢了！不管怎样，她在牢里待得不久。总是有人从神秘的总部带着许多钱前来，把每个人保释出来，回转队伍。她从来不同意那些性子暴躁的人的主张；他们撺掇她咬警察，踢警察的小腿。她听到过那些描述警察怎样用种种野蛮手段对付那些确实参加罢工、纠察线和被关在狱中的女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她知道她在对人们做什么事儿，是可以相信这些话的。但是，她喜欢说，她跟她接触的警察，他们大伙儿，相处得很和睦。

---

① 这是一句俚语，意为破坏周围的事物。

她总是跟他们谈话，试图改变他们到警察所去的路线，而他们总是很有礼貌，或者至少作风是过得去的，而且是不受她的影响的。他们也知道他们知道的事情和他们相信的事情；要是这种布置纠察线的事情不犯法的话，是应该干的。"然而，"她说，"他们有些人是很好的！"

她本来也可以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在谈论她首次进入社交界时期所举行的那些欢乐的宴会。弗赖塔格是不能把她的话当真的。她没有说那些事儿发生在哪儿，在什么时间，也没有确切地说她是怎样纠缠在这些事情中的——一个明摆着受过良好教养的姑娘在哪儿交上了这种伴儿？——也没有说引导她干出这种行为来的信念是什么。她的轻松愉快的、滔滔不绝的说话中充满着省略和暂停；看来她好像希望他把他自己对这一类事件的经历填进去。他除了从远处看到过外，对这一类事情一无所知：他在墨西哥看到过警察冲碎纸烟厂前的纠察线，而且完全赞同这种举动，等候着直到人行道被打扫干净为止，才去干他自己的事儿。

当时，他并不注意地在听她正在说的话，因为那些话听起来像孩子的胡说八道，或者他是叫人反感地心情强硬，满不在乎，他没法断定是哪一种情况；但是，她的娇小的身子内充满女性的温柔，身段匀称，体态妩媚。他觉察到，在他看来，她长得很美，他的心里慌乱极了；他还记得他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当然没有使他感到她有丝毫不寻常的地方。从他的过去的岁月中，从他的忐忑不安的心情中，他找寻着在他认识玛丽以前的那个多情的青春时期，从那儿涌出了几张叫人心烦意乱的、模模糊糊的、几乎已经被遗忘的脸；在他爱上她们以前，没有一张脸是美的，以后也没有一张是美的，甚至有几张叫人讨厌，但是在他热

烈地一个个追求她们的那个短短的时期中，张张脸都叫人难以相信地风姿迷人，被幻觉迷住了心窍，变得盲目了。次次都是真诚的爱情，次次都是天长地久的爱情……

他突然从她身旁走开去，微微皱了皱眉头，身子以交叉起来的胳膊靠在栏杆上，让眼光停留在下面的人们身上。他们在胡乱地转来转去，互相交换着餐桌旁的地方。一大摞一大摞脏盘子正在被拿走；大盘大盘的热菜被沉甸甸地放在油布上。珍妮由于忧郁，脸上的表情有一点儿呆滞；冷不防地她的情绪变了，弗赖塔格压根儿猜不出这是什么原因。安帕罗和佩佩带着睡意，脸色阴沉；他们站停了一下，向那个深渊似的地方瞟了一眼，又用顶撞的眼神向珍妮和弗赖塔格瞟了一眼，走过去；他们的狭窄的、高度专业化的屁股美观地摇晃着。

"汉森刚才在酒吧间用他那可怜的、歪门邪道的思想试图改善公正问题，不是挺逗吗?"珍妮问。"一切动物作爱以后都觉得沮丧。"

"女人和牝马除外，"弗赖塔格说。

"牝马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珍妮说，"不过，看来这事儿叫汉森发火。"

"他是个有极端性格的人，"弗赖塔格说，"有事情在困扰他。他在夜晚呻吟，喊叫，砰砰地翻来覆去，而且跟某个在上铺攻击他的敌人可怕地扭打。"

"一个政治上的敌人，没错儿，"珍妮说。她欣赏弗赖塔格相貌端正；在她看来，他是个挺可爱的人。她喜欢他的没有害处的花花公子派头；她喜欢过的每个人，戴维除外，都长得极美，而且极自负。她断定，这是她的祸根，这个抵制不住漂亮男人的弱点。要是一个男人长得够俊的话，她毫不犹豫地承认他有一切

可爱的品质。弗赖塔格几乎太符合传统样式的美，所以反而缺乏吸引力了——戴维长一张有趣得多的脸，真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她的眼光里出现冷静追索的表情。她要看到他的骨子里。

“你到底在看什么？”弗赖塔格不自在地问，好不容易才没有捋他自己的头发，抽他自己的领带。他并不是第一个被珍妮的专注的而不是奉承的凝视打动的男人。

“看你的头，我喜欢你的头，”珍妮说。“我巴不得能看到脑髓……”

“啊，上帝，多怪的念头啊！”

“脑子是设计得最美的东西，”珍妮摆出一副神气的姿态说。“也许你愿意让我给你画几张画吧？”可能这话的意思是指在甲板上愉快地坐上几个钟头；她乐意看到戴维要试着为这事儿大吵一场哩。

“当然喽，我愿意，”弗赖塔格说，“可是……”

“不会发生什么事儿的，”她愉快地说。然后，她大胆采取行动了。“我一点儿不了解戴维，”她跟他说。“我从来不假装了解他，而他总是隐隐约约地显露一些真面目，使我感到意外。几乎总是在他喝醉了酒的时候。在喝得醉醺醺的状态中就会流露出一定的真面目。我知道，我在喝醉后干的事、说的话跟我在清醒的时候干的另外一些不一样的事、说的另外一些不一样的话是同样真实的；是我的另一面出来亮相啦！”

“你也会喝醉吗？”弗赖塔格问。“真叫人吃惊。在我看来，你是个不会容许自己喝醉、总是保持清醒的人。”

“我甚至在喝醉后，也保持清醒，”她急切地说。“那都是出于意外和为了好玩。可是我往往会忍不住说出一些事情，那些

事儿我在其他的时候是不会胡里胡涂地吐露的。我知道戴维干的是同样的事情……"

戴维充分暴露了他自己，她想。这就是我眼下在说的话，冷静而清醒。下一步是为他赔不是。解释他确实不是那种人——或者说，不是经常这样的。那根本不是他经常干的事儿。他比你看到他的行为后可能会以为的要着实好得多。他一向生活艰苦；为了保持收支平衡他不得不比大多数人更卖力地干活。你在能清楚地看到他真正的品质以前，对他必须有很好的了解。我确实对他很熟悉；那是因为昨夜发生了那事，我为他和为我感到害臊，我才说我不了解他的。那事儿是戴维的最不重要的那部分干的。我对他还知道许多别的方面，我知道一些可爱的事情，我爱他。真丢脸，真丢脸。下一步就会出现那件真的使她痛心的事情；昨夜那场不给她丝毫回旋的余地，只得逃走的噩梦……

"你在恋爱的时候，"她尽管心里想着那些叽叽喳喳的话，嘴上却不由自主地出声说，"几乎是不可能使自己有正确的看法的，对不?"

"恐怕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弗赖塔格说。"爱情，"他深思熟虑地说，用很大的分量说了这个词儿，随后就没有其他的话了。她转过头去的时候，他的颈窝很白，暴露得很清楚，但是他谈论爱情的时候，也许有一点儿夸张，她注意地听着。

他告诉她，好像并不是在着重表明一个论点似的，他相信爱情是以忠心为基础的，彻头彻尾的忠贞是它的第一属性。真正的爱情决不是盲目的，它也许帮助人们在第一次就看清楚了。任何对被爱者的最微细的不忠诚，不管这种行为发生得早还是迟，是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忠诚了；它不但毁掉了未来，而且连过

去也毁了，因为天天的互相信任的生活就变成一直是虚情假意了，而一片真心就变成了痴愚。哪怕只有一次不忠诚，那么就是从来没有忠诚过……

“不对，”珍妮说，“一次不忠就是一次不忠诚，你可以忏悔前非，重回正道，就像一个老派的循道宗[①]信徒那样。我过去有过一个情人，”她清楚地说，但是并不显示敢作敢为的模样，“他老是对我说，只有在对我不忠的时候他才体会到他是多么爱我。这个说法有毛病，”她说，开始有点刺耳地笑起来，“可是我始终没能说服他。”

弗赖塔格跟着她笑了，同意男人两面讨好的手法有可笑的一面。接着，他继续轻轻地说，好像他在跟自己说话似的：爱情，他说，是一种仁慈的激情，充满耐心的宽容和照料的温情，不是有所挑选，也不是有所计划，而是出于本性的忠诚，坚固而持久，充满勇气；美丽的辞藻像鲜花那样悄悄地出现在他的句子中；生、死，甚至永恒都被提到；面包和酒，还有一再出现的、没有不幸的回忆的、也没有悔恨的、充满希望的早晨。

珍妮专心听着，好像被催眠了似的。梦一般恍惚的说话声音像摇篮曲似的催人入梦，那是一支她自己的在想望的、受哄骗的心唱给它自己听的歌曲。它混合着在水面上柔和地跳跃的亮光和在脸上吹拂的清新的风。她听到一种奇特的说话声音，这会儿声音中带着最微细的德语音调的抑扬变化的痕迹，它不是她脑子里愤世嫉俗的想法的而是她的感情的回声；那个声音似乎意气消沉、多愁善感，在诱人上当。听到最后一个字音，她突

① 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的别宗，该宗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提倡遵循种种道德规矩，成员乃得“循规蹈矩者”别称。

然睁开双眼，眼光闪闪发亮；她从那些胡说八道中突围而出。

“我认为这是一个傻瓜的陷阱，”她说，使的劲儿是那么大，使她浑身哆嗦。“我讨厌它，我一直讨厌它。它使人人都成为下流的撒谎者。可是尽管这样，我还是一直掉进去。”

“跟一切不对头的人一起，”他平淡地说，但是暗暗带着胜利的声调，这马上使她恼火了，“而你掉进去的并不是爱情。”

“我知道，我知道，”珍妮不耐烦地说，“那不过是性罢了，接下来你就会跟我说了。你怎么设法成功地把真诚的爱情和性分开？”

“啊呀，我可没有啊，”弗赖塔格说，惊奇和愤怒，“我一丁点儿没有这个意思，当然没有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是可能的！”

“那么，我不知道我掉进在什么里而，”珍妮说，她的而色苍白，悲伤，没有一点儿光彩和生气，“只知道它不管用，以及它可能是爱情。”这个词儿柔和地落在他们中间，而且插在他们两人身内。

“这有可能，”弗赖塔格等了一下，轻轻地表示同意。“也许我们得到了我们在寻找的那种爱情。”

珍妮猛地向他转过身去。“别把样样东西都用你那些小小的、灵巧的蝴蝶结包扎起来[①]！”她气势汹汹地说，“这不过是你给别人造成了麻烦后逃避责任的手段罢了。‘是她要求的，’你可以永远这么说，‘我只是给了她她所需要的！’……这不过是道德上的低能罢了，这你知道！”

“啊，别激动，珍妮，”他用支配人的口气说，第一次叫她的名

① 意为“别把话说得这么官冕堂皇”。

字，完全拿得准这会儿她的看法，“你在胡扯。我不愿听这话。我们决不该争吵，压根儿不该。难道我们不能成为朋友吗，难道我们不能成为忠实的好朋友，反应灵敏地谈论种种微妙的事情吗？难道除了爱情以外，没有别的了吗？”

啊，上帝，珍妮想，这是又一步精心策划的妙着。

“啊，可不是，当然喽，而且作为一条规则，要好得多，”她说，决定结束这场谈话；他们沉默地站在一起，心里憋得慌。说到忠诚，珍妮想，你就不该对在轮船上遇见的一个陌生女人谈什么爱情，我也不该跟一个陌生男人谈。这个小小的开端可能引出大事情来。你的妻子会憎恨的，戴维也会的，而他们完全对。戴维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决不会跟任何另一个女人胡扯什么爱情，用这种方式来混日子。他甚至不会跟我谈这些。戴维甚至比我更讨厌爱情。有人用转动的眼光看你，接下来就会乜斜着眼看你了。你要是属于我的话，我对你的信任程度就跟我会随时扯着你的耳朵把你扔出去的程度一样。我能永远信任戴维。戴维将会变得脾气别扭、强横、固执和到死不变心。我们不会弄到互相要出人命的地步，因为在出现这种情况以前，我打算脱身。但是我们会互相留下影响。我跟戴维了结以后，他会知道我跟另一个女人不一样，而我会带着戴维像一个僵化了的胎儿那样，度过我的余生。她感到空虚、难受，累得直想躺下。

“爱情，”她说，皱起鼻子，“这艘船上充满着爱情。我敢肯定都是真正的爱情。我一定要远走高飞，”她说。“埃尔莎也在爱；我答应过她，帮她的头发梳一个新式样。”

弗赖塔格独自个儿在懊悔他跟她说的那些话，或者是他的大部分话；她不止一次地相当直率地嘲笑他。毫无疑问，她认为他有一点儿蠢头蠢脑。她在今后的生活中会学得懂事些。

她在被她的放荡的生活、她的错误的爱情观念和她对自己的女人姿质肆无忌惮的糟蹋所戕害，因而走上邪道以前，原本可能是挺可爱的。他以前在几个国家里认识过像她那样的姑娘——野里野气、糊里糊涂和生性孤独，充满不信任，她们眼睛里带着警惕的神情让他走得近些，好像他要是试图碰碰她们的话，她们就会拔脚跑掉。她们在生活中没有方向，没有家，没有顾忌，使他对她们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她们对他没有一点儿要求，最后留给他自由自在享受对她们的充满同情和温情的回忆。

不过，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珍妮可能会使他干出一些蠢事；那种蠢事属于另一种生活；在那种生活里，充满着幻影似的人物和愚蠢的梦；同他的坚固而现实的婚姻相比，他知道它们的代价是什么。他敢肯定地说，他生性是最真诚和忠心的男人，他只需要找到他的玛丽，他的爱人，他已经找到了她。哦，他已经跟她分开将近三个月了；他的肉体不自在，充满欲望；他睡得很糟，就像他是单身汉那会儿那样，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试图找到摆脱性欲的折磨的方法，而且他打了个冷战记起了经常接受一些糟糕透顶的方式。他在一个不幸的时刻，偶然遇见了第一个可能得到的女人，她至少不是个干皮肉生涯的；他居然开始对她动了情，这可是个很坏的迹象。

他在想些什么呀？他突然截断思路，浑身感到一阵不舒服的刺痛——这可能有罪吗？——几乎是一阵神经质的颤栗。这种有罪的颤栗和开始性欲骚动是很难区分的。他在不知不觉中把他的思想从珍妮转到那些可能得到的西班牙舞女中的一个身上——他挑的是洛拉，她是那一拨人中模样最下贱的。是个标致、邋遢、火辣辣的人儿——这准行。他紧紧抓住栏杆，站在那

儿，下定决心不让自己胡思乱想，尽力重新控制住他的冲动。他的第一个神志恢复正常的迹象是，他口没遮拦地咒骂珍妮是哄弄人的母狗，狂热地念着他妻子的名字，祈求保佑，打定主意吃罢饭要写一封长信给她，还要在睡觉前重读她所有的甜蜜、热情和充满妻子之情的来信。

那些到蒙彼利埃去的古巴学生越发像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团伙，有规定的招呼暗号、隐蔽的握手方式——这种握手方式的正确运用会扭得刚参加团伙的人用开玩笑的、痛苦的嚷叫来回答——和一种非常晦涩难懂的切口，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总是要査看一些打印着密码的小纸片。他们从事着似乎是冗长的学术争论，在他们可能被人看到的地方总是摆出一副滑稽的庄严神情，但是说话的声音是那么低，他们的有点厌烦的听众并不存在着分享他们的秘密的危险。

然而，人们还是知道了他们自称为“蟑螂报童”，他们在船上的印刷所里印一份每天早晨出版的微型报纸，用显眼的铅字标出《大兵日报》。他们经常被人看到在上午十点左右走进女伯爵的贵宾舱，过一会儿走出来，大伙儿有一点儿嚷嚷咧咧；有一天，他们在酒吧间旁的小书写室里开了一个会，选举女伯爵当头儿，或者叫“特别蟑螂”。

舒曼医生当时坐在窗外，没法不让他们的话传进他的耳中，而且事实上也不打算避而不听；他听到那些学生用那么下流和不敬的措辞谈论她，火透了。他们认为她是疯子，那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他们找准了的任意嘲笑的目标，但是他们干吗挑中她，把一切男孩的脏话都用在她的身上，舒曼医生却不明白。首先，她不是个蠢货，而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而且处世手腕精明；

她怎么会让自己被这些特别粗俗的小伙子当作笑柄呢?

女伯爵出现在餐厅里的时候,舒曼医生又看到她似乎完全信任她那伙年轻的倾慕者,而且对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他们一致整齐地站起身来,深深地鞠躬,把她护送到他们自己的桌子旁。她的椅子搬来了;她态度娴雅地坐在他们中间,还带着舒曼医生以为稍微有点儿心不在焉的微笑。她在看他们那份显然内容可怕的小报的时候,他继续注视着她;她极为有失体统地哈哈大笑,显露出口腔深处的几颗金牙。她先用手抓住她右边的学生的头,接着用另一只手抓住她左边的学生的头,凑着他们的耳朵悄悄说话,这引发出喝彩的叫声,引得别人纷纷热切地发问。接着,她把双手冷不防按在乳房上,上下揉着,她的脸上现出痛苦和深思的神情。没错儿,她给自己留下了第三小瓶醚,也许还有第四瓶,舒曼无可奈何地作出结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几乎忍不住要放弃她、不再采取帮助她的措施了。

蒂勒船长的行为高尚的准则跟天文学数字一样高,他打量着他的大名鼎鼎的囚犯的轻浮的行为,紧闭着嘴,眼睛亮晶晶。她向他那个方向瞟了一眼,向他和舒曼医生摇摇手指头;他们两人都庄重地向他回礼。

蒂勒船长在害消化不良病,这是由于他天生的权威感,且不说他这个船长的正式身分,受到了挫折。听到统舱里发生骚乱后,他的第一个冲动是下令把所有的参予者都监禁起来,直到航行结束为止。他已经把被驱逐出境的工人当作同样数目的牲口接受下来了,而从航行一开始就发现他们竟敢摆出明目张胆的蛮横态度要威风,对这他是一时半刻也不会容忍的。

卡里洛神父用蹩脚透顶的德语跟他说过,好像那场打斗不只是下等人的叫骂引起似的;他几次提到了这样的词儿,譬如

说，工团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共和主义啊、共产主义啊，还有无神论，首先是无神论，它是诸如此类有害的理论的共同根源；他看来好像对存在于下面甲板上的暴民中间的种种问题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辨析入芒，受过详尽的指点。按照卡里洛神父的说法，下等阶层正在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上千种邪恶势力引入歧途，而统舱甲板上有许许多多危险的、起颠覆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应该受到小心地监视，不只是为了头等舱的乘客、船员和轮船本身，而且是为了保护下面无辜的穷人，那些善良而无害的人，他们只希望被允许和平地遵守法律，和信奉他们的宗教。

特纳里夫岛人，譬如说，是最正派、最虔诚的人。麻烦的来源将会在奥地利人和安达卢西亚人中找到；从最轻的方面来说，在他们中间存在着宿怨，而他，卡里洛神父，对在几乎全部奥地利人和一小部分巴斯克人中间发现反宗教的内讧，并不感到惊奇……这会儿，这些人应该受到监视。至于那个胖子，他推了那个还跪着在祷告的男人，他是最低级的教唆暴民的人和最次的带头人，一个去西班牙的墨西哥人，唯一的目的是在那儿制造动乱和把墨西哥劳工的骚乱跟西班牙的串在一起。用不着担心他——他一踏上西班牙的土地，马上就会被捕。

船长发现他自己的思想被分成许多头绪：他坚持原则讨厌天主教徒（他相信教士们无一例外利用听忏悔的隐私权勾引他们的比较逗人的女忏悔者），他对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有强烈的偏见，他还感到接受一个教士的意见，而且承认统舱里的暴民的行为居然关系到人类的意图或者人类的要求，有失他的尊严。他生硬地感谢卡里洛神父提供信息，答应下令全面加强纪律，用他喜欢的措辞说，下一个破坏和平的人将被监禁；在那场谈话不久以后，他的早餐就在他的肚子里折腾开了。

他的真正的麻烦是，在轮船大大地超载的情况下，没有地方囚禁那些作乱的人，尤其是如果他们人数是那么多，而且是像卡里洛神父似乎认为的那样，是那么狡猾地伺机而动的话。万一发生明目张胆的暴动，可能船员人数不够，控制不了他们。要是他们把船上掌握的那些轻武器抢到了手，那怎么办呢？

船长除了在间歇的战争期间以外，从前一直是在相对平静的商业性的客轮——那些航行路线冗长、沉闷的小船——上担任职务的，却对骚乱和暴力活动想象力丰富；这会儿，他被这种想象力控制着。他幻想着银幕上的一个短短的关键时刻：漆黑一团，空手肉搏，一道道闪光和阵阵像打雷似的爆炸声，打烂了的脑袋和血肉模糊的胳膊和大腿，还有一汪汪鲜血，尖叫和嚎叫，火焰照亮了天空，一条条救生艇正在放进波涛起伏的海洋，而他自己仍然在驾驶台上，以某种方法完全控制着局势，而且十分镇静。

然而，在眼下这个和平日子的晴朗的白天里，他在真正离开驾驶台以前，匆忙地下了一道命令，统舱里的男人——他第二个念头是，还有女人——个个都要受到搜查，搜查他们有没有不管多么无足轻重的武器；在此次航行期间，一切武器都得没收。

干罢这事儿，他觉得稍微精神好了一点儿；尽管他的肚子里还在咕咕地作气，胀得难受，总算能用不失身分的随意的口气跟胡滕教授先生和舒曼医生谈起今天早晨的那个事件。他们看他说得轻描淡写，也就信以为真，看来好像认为那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事件，叫他好不失望。

船长对女伯爵的不满情绪有所转移。她到底不应该受到这么多的责怪，因为她是一位身子骨脆弱的贵妇人，而且处在跟她的社会地位很不相称的情况中；然而，她出现在船上这样的环境

中，是世界上处处混乱的一个严重的征象。她的行为跟统舱乘客的大吵大嚷一样隐隐约约地在他的权威上笼罩了阴影。他不只是在想到他自己——每一天的每一刻都在他的发号施令的范围内，对日常工作的一次偏离、对订立了的规则的一个威胁，都不只是个人的事情。作为船长，他必须实现更大的计划，他作为法律的比较高的代表，在指定的地位上完成他命中注定的种种事情；要是他完不成他的责任的话——而他的责任的基础就是用强硬的手段从船上的人那儿获得百依百顺的服从，没有一个例外——啧，那么建筑在神圣的法律上的整个社会结构会被大大削弱。他没法面对这样一场道德灾难，他不必去面对。他不会的。

他恼火地盯着聚集在船上的那些人一张张叫人生气的脸看，下嘴唇撅出着。弗赖塔格先生——他是谁？这个人只是把一艘船看作把他安全而舒适地从一个港口运到另一个港口的公共交通工具。里贝尔先生，也是这样的人。胡滕教授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但是一个教授怎么能知道海面上严峻的现实情况呢？尽管他对舒曼医生深表敬意，他不止一次地感到医生对船上必需要有纪律缺乏真正的了解，对级别没有真诚的尊重。他不得不一再巧妙地提醒他，别惯坏了那些病得动不了的水手，好像他们是他在国内的病人似的。甚至有几回，医生看来好像生活得挺愉快，简直好像他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才参加航行似的。说真的，要不是他有心脏病的话，再怎么也不会在船上当医生的；不过，医生今天早晨从统舱回来的时候，对弥撒结束那会儿发生的骚乱几乎毫不在乎，而是谈起在夜晚有两个女人在露天的甲板上生下了孩子；他设法在同一个房舱里为她们安排了铺位，至少可以凑合三四天。这表明他的脑子分不清轻重缓急，船

长断定，是对真正严重的事情漠不关心。

船长对那些女人倒不指望什么，可是在她们中间传来的压低了声音的唠唠叨叨的说话叫他恼火。小个子的施米特太太探出着身子，在跟利齐小姐谈话，中间隔着个里贝尔先生，而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和胡滕太太从她们的桌子边上向她探过身来。胡滕太太在悲伤地摇头。船长假装在狼吞虎咽地大吃他的早餐，但是他恼火极了，而他的五脏六腑在狠狠地折磨他。

施米特太太跟格拉夫先生打了那场交道，又不幸地遇上了鲍姆格特纳那两口子以后，她的悲伤倒稍微减轻了一些；她在甲板上闲逛，后来懒洋洋地站住脚，像那天每个人早晚都会干的那样，像在笼子的栅栏旁注视着统舱里正在展示的奇怪的生活。她发觉自己跟那个模样拘谨的、年轻的美国人戴维·斯科特先生隔得很近，他也以他的胳膊肘靠在栏杆上，衣领翻起在他的耳朵旁。她的目光被一个悲伤的景象吸引着。一个瘦得皮包骨头、衣服破破烂烂、模样憔悴的男人坐着，也许年纪还轻吧，这可谁也说不准，他的乱蓬蓬的头发竖起着，他背对着栏杆，两个膝盖蜷起着，他悲伤地弯曲和伸直那些光着的脚趾头；他像个孩子似的毫不遮掩地在大声地哭。他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擦眼睛，他的嘴被扭曲得像一条在嚎叫的狗；在他的脚旁，有几件小东西，施米特太太认不清那是些什么。其他的人都不注意他；他们坐在他附近，脸上的表情冷冰冰的，毫不关心；男人们一群群站在他周围，背对着他；女人们几乎踩着他走过，去忙她们自己的事情。他看来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孤立的；施米特太太想，没有什么像苦恼那样把别人的心跟你分开了，她自己的心里又辛酸地涌起了眼泪，但是这一回比较和缓和温柔，因为是为别人的悲伤掉泪。

她轻轻地跟那些在听的女人说话。

“所以我跟那个年轻人说，啊，难道你不认为至少他们当中某个人该去跟他说话吗？他们可以问问他出了什么事儿。那个年轻的美国人随即跟我说，他们已经知道什么事了；他们干吗还要去问呢？接下来，好像来了一道命令，谁发的我可不知道；船上的人员在所有的人中间走动，取走他们的小刀和种种他们带着的有锋的小工具，而这个可怜人呢，是个干木雕的。”

施米特太太讲故事讲得很投入，稍微提高了一点儿说话声音，看着她周围那些人脸上的感兴趣的神情，忘了她生性腼腆；船长警觉地坐着听她说，眉头越来越皱，施米特太太却没有注意到。

“唷，戴维·斯科特先生接着告诉我，那个男人随身的包裹里带着一些小块的、他用来雕小动物的木头，希望现雕现卖，把它们卖给头等舱里的乘客。斯科特先生有六七个在他的衣兜里，把它们给我看；它们很美，而且富有稚拙味；斯科特先生说，他是个优秀的艺术家。不过，你们知道，这些美国人是怎么样的——他们崇拜原始的东西，因为他们见识有限。不用说，他们被黑人腐蚀了——我们能指望什么呢？我向他微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可是那个统舱里的可怜人遇上了麻烦！那个船员向他要那把刀的时候，他莫名其妙地以为他是借给他的，亏他想得出，还以为几分钟后就会还给他的。想想看。那个年轻人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他看到，也听到了。他火得很，神情冷冰冰的，脸色苍白，好像他失血了似的。那个可怜人的希望就此永远完啦，他的快活的行当和他的小刀子也永远完了，所以他哭了，像个孩子那样哭了。”

施米特太太几乎又被她的感情完全控制住了。她往后坐

去，用餐巾按按嘴。

胡滕太太发出温和的、不赞成的啧啧的声音。利齐用孩子气的高声说："啊，我认为这不大好，把这个可怜人的东西从他身上取走！请他们还给他吧，船长，怎么样？"她的长胳膊刷地向前一甩，轻轻地用她的扇子敲了一下他的衣袖。船长没有像她预料的那样因为她的举动富于魅力而潇洒地回答。他下巴上垂下的肉涨红了，他抬起头，让他垂下的下巴肉重新回进衣领，接着他瞪出了眼，确实狠狠地瞪了她一下。他憋着一肚子火，这个绝妙的出气筒落到他的手中，他开始拿她做杀鸡儆猴的例子。

"我极为遗憾，女士们，"他用沉痛而有礼貌的声音开始说，对她们都瞟了一眼，把她们的混乱的感情、浅薄而顽固的思想、不可救药的轻信、对男人的发号施令和维持生活规则的一切努力出于天性的反对，尽收眼底。"啊，的确很遗憾，女士们，使你们的仁慈的心受到了苦恼，可是让我承认，是我自己下令没收那些被驱逐出境者的武器的。我希望，当我说我不是出于感情的考虑，而是根据我知道的真实情况而采取我的一切行动的时候，我可以信赖你们会相信我。归根结蒂，我不但要负责你们的安全，而且还有这一船人的生命，所以请容许我告诉你们，我由于职责所在，出于最严肃的动机，才采取这个行动的。这是一个小小的为谨慎起见的措施，请听我说，亲爱的女士们，"他神情严厉地针对施米特太太加了一句，"至少别给我们添麻烦，去听信外国人的流言蜚语和充满偏见的话，他们生来就急于给一个德国人干的不管什么事儿说坏话。或者要是你非听那些胡说八道不可的话，最要紧的是，别向任何人去重复说！"

这个恼人的早晨最后出人意料地出现了这个高潮，把施米特太太整垮了。她耷拉着脑袋，垂下着肩膀，害臊的心情使她的

脖子痛苦地、慢腾腾地涨红，一直红到额头上，她的双手搁在盘子两旁，看来好像她举不起它们似的。从她的眉毛底下，她看到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的甜美的、满意的微笑，可不是，就像一只猫的。施米特太太知道她当天黄昏在房舱里以及在以后的许多天里还会再看到那种微笑，心里真不是滋味。

今天是礼拜天，船上的乐队在早晨不演奏，但是吃罢早餐交谊厅中就充满了瓦格纳[1] 和舒伯特[2] 的嘹亮的曲调，那儿鲍姆格特纳一家子、吕茨一家子、胡滕两口子，一句话，那些比较体面的人，安顿下来，借打纸牌、玩多米诺骨牌和下国际象棋消遣散心。女伯爵不见了，后来听到那些学生先在打圆盘游戏场地附近，后来在游泳池里喊叫。一阵比较粗糙的音乐声跟乐队演奏的乐曲混在一起。那个西班牙小歌舞班子把一个留声机带到了甲板上；一阵尖利的女高音歌声在希奇古怪的乐器的噼噼啪啪和渐渐诱人人迷的伴奏声中，带着叫人着迷的、咄咄逼人的哀怨升起来了。他们在一起跳舞，脚跟和手指头发出啪啪的响声，在一场相配的舞蹈中像鸟儿那样互相翩翩旋转，但是呈现出一副冷冰冰的职业的面貌。

他们把音乐停了几分钟，在一起说话，后来又开始了，互相机警地注视着。里克和拉克参加进来了，互相面对着，眯着眼，露出牙，他们的小小的股骨奇怪地摇动着。他们每隔一会儿就跺脚，互相指责，但是并不打断舞蹈的节奏，他们的脸几乎是叫

---

① 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毕生致力于歌剧，作品有《尼布龙根的指环》等。

② 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以歌曲创作为主。

人感动的。他们的大人望着他们，不干预，也不提意见。接着，除了洛拉以外，所有的人都蹲在甲板上，组成一个美丽的图案；洛拉这颗明星开始跳起一支缓慢、雅致、热情的舞蹈。

"Olé，olé，vivatumadre[1]！"当洛拉的裙子像波浪起伏似的几乎在他们的头上飘过的时候，他们配合着音乐的拍子喊叫，带着微妙的节奏变化拍着手。那些古巴学生从游泳池中上来了；那些德国人勉强离开了他们的游戏；水手们呢，出现在那儿，装出一副在上班的模样；所有的人都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到这个迷人的场面来。弗赖塔格发现他自己站在汉森先生身旁，带着真正吃惊的神情说："嗐，她是一个了不起的舞蹈家！"汉森先生转过头来，好像一个刚从被催眠的昏迷境界中清醒过来的人似的。"什么？你说什么来着？她真伟大——她是一个伟大的舞蹈家。"也许还差一点儿吧，弗赖塔格想，走过去，对他近来为了洛拉心神不宁仍然感到有点儿害臊。他觉得对这么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人有一点儿居高临下的心情，这人为了那个野兽似的安帕罗得爱上整个歌舞班子和它的未来哩。

洛拉堂皇而严肃地跳着，她的面貌上始终呈现着古典的皱眉蹙额的色情的微笑，这引得那些为她助演的人中的男人发出表示性爱的呻吟。在她最后一次用脚跟敲出啪啪声的华彩的时候，其他人都跳起身来。预演结束了，他们一对对跳着舞，好像在寻欢作乐似的，但是他们的脸上没有欢乐的神情，而且他们毫不理睬他们的观众，流露出久经训练的轻蔑。

埃尔莎把头发梳成一个髻，堆在头顶上，这是珍妮帮她梳的，使她显得老相，而且脸颊也更阔了；她突然转移眼光，身子后

---

[1] 西班牙语，"好啊，好啊，你的母亲万岁！"

退，好像她要躲在她父母的后面似的。她被舞蹈激动了，脸上忍不住现出空虚、快活的微笑。然后，天啊，她看到她喜欢的那个学生只穿着一条黑羊毛游泳裤遮住他的赤条条的身子，搂着一个西班牙姑娘的腰肢，开始跟她跳起舞来。埃尔莎的腼腆的性情受到震惊，这使她身子的中心感到真正的痛苦；这种痛苦像阵阵热浪，一直扩散到她的手指尖。她闭上眼，在一团漆黑中看到她拒绝在大白天看的情景——他背部的收缩的肌肉，他的扁扁的、漂亮的胸膛，他的细长的大腿和像男孩子的脚踝，最要命的是，那两条搂着那个姑娘的两条长着挺帅的肌肉的长胳膊；他们管那姑娘叫孔查，她的身子贴着他的赤裸裸的胸膛，柔软地摆动着。不行，她受不了。"妈妈，"她带着哭音说，"妈妈，请听我说，我们进去吧。"

"你生病了吗，埃尔莎？"她母亲问。"你有什么不对头吗？"

"没有，没有，请放心，"埃尔莎用压制着的、忍耐的声音说。"太阳光太热了。"

"我让你在明天，"她母亲坚决地说，"在明天有比较好的心情，然后我要让你痛痛快快地清一清肠子。毫无疑问，这正是你需要的。在这儿这艘船上，缺乏锻炼，食物又不消化——可不是，我自己也容易害头痛。痛痛快快地清一清肠子，这正是你需要的。不过，眼下，克制一下，去跟你爸爸打完那场多米诺骨牌。至于你的头发，埃尔莎，我不喜欢这个式样。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恢复以前的式样。没问过我，千万别再改换式样。"

"是，妈妈，"她温顺地说，又坐到她父亲一起。跟父亲玩多米诺骨牌和跳棋，在她妈妈不断的劝告、指导和责怪下干她讨厌的家务，甚至她的头发也从来不能算是她自己的，最后变成一个被耽搁了的老处女，可不是，这将是她的命运，她内心里能深深

地感到这情况。她的心在身内沉下去，接着又升起来，开始拚命地撞她的肋骨，好像一个囚徒敲打铁栅栏那样，好像那不是她的一部分，而像是一个被吓坏了的陌生人被锁在她的身子内，叫啊，叫啊，叫喊："放我出去！"

他父亲注意到她的愁眉苦脸的神情，轻轻地捏着他自己的脸颊，心情愉快地说："也许我们的埃尔莎爱上了哪一个——也许是那个神情严肃的大个子瑞典人汉森。不对吗，埃尔莎，我的宝贝儿？告诉你的爸爸和妈妈。我们是最高明的老师嘛。"

埃尔莎犹豫了好久，出了一对"六"，一边甚至更温顺地说："不，不，不是这么回事。"

吕茨太太从她的编结活儿上抬头瞟了一眼，看到在门框外而地平线前面有一个景象；她看了一会儿，这景象使她皱起眉头，提醒她的丈夫，他还是像一向那样大大咧咧，像往常那样没有脑筋。阿尔内·汉森在跟安帕罗跳舞。她看来好像在教他她的奥妙的家乡舞蹈。他们在门洞子外经过，又经过，汉森跟随着，笨拙得像一头在跳舞的熊，而安帕罗真的把他当一头熊那样对待；她呢，是驯兽师。她看来在数落和嘲笑他；他们会停止摇摆，她会抓住他的胳膊肘，摇晃他。他会完全认真地重新开始，他的大手和大脚处处碍事，他的潮湿的衬衫黏在他的粉红色的皮肤上。他像一个被魔法迷住的人，完全不顾他在众人面前扮演的那个出乖露丑的形象。

吕茨太太一向自以为是个评判男人的专家，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败涂地的例子，感到惊奇，接着注意到她女儿转过背去，对着那个丢丑的场面，心里高兴起来。她白天黑夜从来没有停止过担心，一个做母亲的要花费多少叫人难以相信的苦心，才能保全她女儿的清白。不管你转向哪儿，处处都是丑恶的景象、伤

风败俗的情况、声名狼藉的人、不顾廉耻的行为，那种行为甚至是那些你有理由对他抱有一点儿希望的人干的。男人啊！

她的眼光带着强烈的愁苦的神情盯着她的丈夫。他跟往常一样在跟埃尔莎说蠢话，满不在乎地打着骨牌，跟平时一样一点不懂得深刻的人生问题，一味拿爱情跟埃尔莎开玩笑。她要是不够聪明，有一会儿依靠他给什么事情作主的话，那他们会怎么样呢？啊，她会为埃尔莎找一个大不一样的丈夫，她已经打定主意做这事儿了。

约翰推着他舅舅的轮椅，听到西班牙音乐，走得快一点儿，然后在他来到这个看得见洛拉在旋身子和啪啪敲脚跟的地方的时候，又慢下来。他本来紧绷着的那张皮肤白皙的脸——脸上长着稀稀拉拉的金黄色的亮晃晃的胡子茬儿——眉开眼笑了，神情是那么温和，看上去一下子像个年轻的天使。他把轮椅推到栏杆旁，站住脚看叫人快活的表演。

"走啊，约翰，"他舅舅说，因为轮椅走动起来的轻轻摇晃使他舒服，顶着风前进对他的呼吸有帮助。他的萎缩的肌肉和他那把骨头衰老、疲劳和孤独；它们白天黑夜迫不及待地渴望一点儿怜悯，安慰和舒适。在墨西哥的医院里，护士们给他全身擦香喷喷的金缕梅酊剂[①]；她们的年轻的、结实的手轻轻地按进他的疲劳的、萎缩的肌肉；她们喂他热牛奶和种种凉果汁，什么番木瓜的啊、番石榴的啊、酸橙的啊；他用一根玻璃管吸，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着，好像他又变成一个婴儿似的。夜晚，他呻吟和喊叫的时候，一个戴着高耸的白领圈和蒙着薄面纱的墨西哥修女会来伺候他，她会轻轻摇晃搁在那些灵巧的弹簧上的床垫，好像那

---

① 金缕梅酊剂(witch hazel)：一种消炎、止痛药。

是一个摇篮似的，一边低声念："万福，马利亚……"

这一阵子，在那个糟糕透顶的房舱里，约翰厌恶地、粗暴地对付他，他会递给他一块水淋淋的脏布，恶狠狠地说："洗洗你自己的那张脏脸吧。"他在他身旁放下一盆盆粗糙的、叫人恶心的食物，转身就走，连舀汤的调羹也不给他一把。在漫长的夜里，他急着要方便的时候，往往叫了又叫，叫得他的嗓子眼给堵住，他的胸脯的疼痛辐射到全身，才把约翰叫起来，拿来便盆。即使没有那张冷酷的、居高临下的、眼光厌恶地避开的脸，他那无助的肉体所遭受的屈辱也已经是一种足够的折磨了。

"约翰，"他简直要哭了，"孩子，你是我的希望，你怎么啦？你上哪儿去啊？天啊，同情，总得有一点儿同情心呗。"但是那个孩子没有一丁点儿同情心。他的灵魂比任何凡人的肉体毛病更厉害。格拉夫先生浑身哆嗦地想到在上帝的审判前他的灵魂的命运。

"难道你不能看到没有空间可以过去不成？"约翰问，固执地逗留着。"让我独自个儿待一会儿，别来烦我，行不行？"

"那么，掉头往回走，约翰，"格拉夫先生平静地说，"往回走。"

轮椅呼地急速掉头，把他甩在一边。"别打算要我的命，约翰，"他用发表预言似的声音说。"我的上帝答应我，我会重新看到德国。你要是敢的话，就对抗上帝吧！"

"一直一个子儿不给我，像个要饭的，"约翰的火气爆发出来了。"你答应过我的津贴在哪儿？干吗甚至我去理发都要向你要钱呢？"

"你在船上钱有什么用呢，约翰？这只会是设置在你面前的另一种诱惑。我会给你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的，外甥，可是我不

会助长你的欲望和贪心。你的灵魂太宝贵了，不能这样冒险，约翰。我知道得太清楚了，你在这儿会把钱花在什么上？”他咯咯地长长叹了一口气，血痰涌到他的喉咙里了；他把痰吐在一个纸盒里。

“这就是你老是说个没完的废话，”约翰说，“你这个啬刻的老犹太。”

格拉夫先生望着他的一双手，瘦极了，指关节只剩为一个个圆疙瘩，那些手指头是那么衰弱无力，下垂的时候，平摊着或者弯曲着；他想，不怎么久以前，这双手还有力气，本来真可以掴那个该挨掴的孩子。因为这孩子已经落到这个地步，只有一个治疗方法了——克制肉体的欲望，等到意愿的肿块被摸到和消除为止——啊，这项工作本来他是可以干得很好的，而且他也很高兴干的，拯救这个眼下没法管束的灵魂。但是，上帝正在一点点取走他的生命，有意让他遭受一切痛苦，让他在智力和体力上尽可能地出丑，来同他已经赋予他的灵魂的伟大的才能相抵消。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知道他的肉体开始在认真求死，神的知识像一道清纯的灵光那样照在他身上，作为对他死亡的补偿，上帝给了他治愈别人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中，他的灵魂不再感到恐惧。使他羞耻的是，他现在记起了他从前恐惧死亡，他像一个待决的囚犯看到行刑的斧头那样吓得缩成一团，不顾脸面地求饶，他没完没了地、语无伦次地祈祷，求上帝为了垂怜他维利巴尔德·格拉夫，逆转他的不可改变的规律，行一个奇迹，用其他办法惩罚他的罪孽，不管多么残酷，但是只要让他活下去就行，哪怕就是现在这个情况，痛苦、衰败、绝望——让他活下去。

他，哲学家和哲学老师，在多家大学里当讲师，出现在学术界人士面前，竟然干了这样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什么时候？

在他的另一个世界上,他的另一个生命中。他的一切虚假的智慧像穿旧了的、肮里肮脏的破衣服那样从他身上脱落了。他像一个刚生下不久的婴儿,赤身裸体地站在一道稳定的净化人的亮光中;他听到过的最温柔的声音——他从来没有梦想过声音中充满这样爱——在他的耳朵里说话。"治愈病人,"那声音说,说得那么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是真正的启示的语言。从那天起,他知道了真相,就干开这工作了;只要他能站直身子,他就待在病人们中间,用抚摩给他们治病,向他们提出治疗意见,以上帝的名义医好他们。

这事儿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他的家人和朋友心态不正常,故意作对,对他的举动设置一切障碍。看来几乎好像——这个念头实在可怕,他简直不敢把它放在他的脑子里——他们对那些垂死的人怀有什么恶意或者邪恶的意图,好像他们不希望那些病人被治愈,恢复得像他们自己一样。他妹妹的一个朋友,一个生性固执的女人,居然不让他抚摩她那个肠子在害病的小孩子。"他需要休息,他不应该受到打搅,"她愤怒地说,后来,那孩子死了。不过,他救了他妹妹的女佣人,一个印第安女人,她生孩子,痛了三天还没生下来,直到她的眼睛成了脸上的两个洞;她的嘴唇乌黑、干枯。"一个印第安人让一个男人看她生孩子是丢丑的,"她们跟他说。"一个正经的女人情愿死!"最后,他大胆地走进去,动手把她们推开,对她们坚持了男人的权威;她们在他面前让开了,好像是上帝要她们让开似的。他把双手放在那个变了形的、痛苦的肚子上;那个孩子在肚子里踢啊,推啊,挣扎着要生下来;他祈求上帝允许这个新生的灵魂活下来,最后能进入他的天堂;就在几分钟后,随着三阵巨大的、撕肝裂肺的疼痛,那个孩子安全地生下来了。他曾经偷偷地把气吹进一个害肺炎

的婴儿的嘴，从他自己的坏了的肺里，把生命吹进那个小孩的肺里。

啊，这样的事情多的是哪；在他被送进医院以后，他被迫偷偷摸摸地做好事，因为那些医生都极为忌妒他的力量，用种种规则妨碍他，阻止他忍受着疼痛去看望那些垂死的人，为了要抚摩他们，重新给他们生命。但是，上帝指引他。他从上帝那儿知道，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他可以找到那个最需要他的人，而且没有一个人害怕他，因为他总是马上说："愿上帝保佑你，让你的病好转。"然后，他轻轻地抚摸他们，只用手指尖；接着不等哪个在悄悄走动的护士或者实习医生发现，他就走掉了。他在医院里难得能喜悦地看到那些亲爱的、活过来的人恢复健康和体力——他被那么密切地监视着，没法第二次去看望。但是，有过一回：那个梳着两条辫子的红头发姑娘躺在遮掩死人的屏风后面，眼睛盯着上面，脸色发青，嘴半张着，在他的抚摸下，浑身烫得像烈火。

"上帝会让你好起来的，你相信吗？"他从那张几乎不在动的烧得干枯的嘴里听到，"我相信。"啊，有信仰的孩子有福了。他看到那个姑娘——是从她两条在阳光下挥动和闪闪发亮的、长长的红辫子认出的——不到一个礼拜，跟她快活的一家人离开医院的。"医生们会认为是他们治好的，可是我们一定知道真相，"他跟她说。

这些是他的回忆；这是他的补偿；既然他自己的痛苦对别人有用，那么，那不是神的恩典是什么呢？什么是死亡？他干吗害怕？那儿有一切报酬中最伟大的报酬：遭受痛苦的、迷惑的灵魂获得不朽。不朽。这不是相信的问题，有什么可相信的呢？不管什么人，怎么能以任何无边无际、没有形状的东西为依据形成

一个没有根据的愿望呢？这是一个信仰问题——不，一个希望，始终不变地希望以另一种面貌、另一种名分继续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中；继续存在着，直到一切问题得到解答和一切未结束的事情了结为止。这是个从上帝发出来的、把我们指引到他那儿去的神圣的念头，不是相当靠得住的吗？……然而，这个希望到头来可能只是人们的目前存在的动力，一个关于人们的自我保存的动物本能的理性的概念；人们是这么热切地爱他们自己，他们不可能愿意让他们自己的一个原子湮没。也许这整个想法产生于意志，那个自我疼爱的泉源，面且只是那个念头的变化多端和被欺骗的活动中的又一次活动。那四只脚的动物怎么样呢，那有羽毛的、有鳍的怎么样呢？也许它们身内有一种相应的生命力的泉源；或者情况更好一些，它们甚至不怀疑它们实际上的确不会永远活下去。啊，你是有幸福的，活着是幸运的。

格拉夫先生精神一振，睁开眼睛，浑身痛得颤栗；他刚才一定打过盹儿，做梦了，有个可怕的梦魇在他的记忆的边缘。衰弱和绝望几乎把他压垮了。“约翰，约翰，”他咕哝着，他的舌头转动不灵便，“水，水，”接着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祷告词，不管是什么，停留在他的嘴唇上，没有说出来。他不敢祈祷，他不知道为什么祈祷。人死以后，灵魂可以发现，可以在清晨灿烂的阳光中醒来，处于现在还没法想象的狂喜中，不管它现在的想望是多么神秘，它那时会了解一切。啊，也许天国就是这样的：那个维利巴尔德·格拉夫可能一次也记不起他从前是维利巴尔德·格拉夫，那个可怕的世界上的潦倒、迷失的旅客。那也许是神圣的词儿“宽恕一切罪孽”的意思吗？

“水，水，约翰，我可爱的孩子，”他又说，但是没有回答。他感到轮椅在停顿好久以后又平稳地微微摇晃着转动起来了。在

他们拐弯的时候，他外甥的头和肩膀的黑影斜斜地笼罩着他自己，笼罩在他的两个膝盖上，又在他们前面的甲板上一路伸展过去。沉默也一路伸展过去，直到带着憎恨的压力的沉默被打破。

“你要水？”约翰虚情假意地装出一副关心模样，带着精心酝酿的冷酷心情，模仿着亲切的声调说。他鼓起劲来，吐出了恶毒的咒骂：“好吧，等着给你拿来吧，你这个臭气熏天的老僵尸。”

“真不害臊，约翰，”他舅舅平静地说。“我把你交给上帝了。”

约翰事先没有打招呼，默不作声地把轮椅猛地转过去，推着它飞快地穿过大交谊厅，冲下平台，穿过长长的过道，进入他们那个弥漫着冲鼻的臭气的房舱。在门口，他径直把轮椅硬推过去；它冲到对面墙上，砰的一撞才停住。格拉夫先生没有表示不满，甚至没有回头看。轮椅稍微向一边滑了一下；约翰看到他闭着双眼，下巴下垂，像一个刚断气的死人，一刹那间心里闪现出一个可怕的希望。他随手关上门，撒腿跑回甲板，他的胃被愤怒和恐怖折磨得既往下垂又紧绷绷，他的心怦怦地乱跳，几乎连声音也听不见了，他的眼前一片迷茫，几乎瞎了。然而，他能看到孔查，不过也足够了。他随即站住脚，然后走到栏杆旁，盯着她看；她一动也不动地回看他，用她的眼神招呼他到她那儿去。他没有挪动，他射出火也似热烈的、一动不动的眼光，嘴唇缩进，露出牙齿，活像一头注视着它的猎物的饿虎。孔查经常看到这种神情，从来没有惊慌过。恰恰相反，找到一个充满如火的热情和笨拙的渴望的小伙子她感到高兴，这给她相当沉闷的职业抹上一道光彩。她也年轻，歌舞班子里最年轻的一个，没有变得完全冷酷无情，而且她一点儿也没看错这个不快活的小伙子；他站在那儿，注视着她，好像是躲藏在矮树丛后面的一头动物似的；他

弯着腰，探出身子站着，双手插在兜里，一心想把事情干成，渴望成为一个男子汉。

孔查微笑着向他走过去，在还没有走到够得着的距离，就毫不踌躇向他伸出两条胳膊。约翰向她跳去，伸直胳膊正好搂住她的腰，跟她一起迈开大步，跳起舞来，他脸上的神情仍然像是个被洪水和大火困住的人。孔查把鼻子贴在他敞开着的衬衫里面的胸膛上，深深地、舒适地吸了一口气。他散发着清洁的娃娃似的气味，一个真正的男人的贴肉的气味。她随即把他紧紧地搂住；她的乳房在她的薄薄的、寒碜的黑连衣裙下面高高耸起，她的脖子仰着；她得意扬扬，大摇大摆，像一只鸽子那样咕噜着。头抬着，眼睛向上，闪闪发亮，她带着深深的情意对他微笑着，对他长长地、叫人心慌地看了一眼，然后温柔地闭上眼，站直她的身子靠在他的身上，把她苍白的脸颊贴在他的胸膛上，好像她睡着了。在这段时间里，不管她是不是睡着了，她的均匀地摇晃着的小屁股始终保持着不倦的节奏，她踏着步子，摇摆，旋转，表现出她巧妙、完美的艺术。渐渐地，约翰那张恶狠狠的脸平静了，柔和了；他把他的脸颊靠在她光滑的黑头发上，也闭着眼跳舞。

也许是一套规定的表演，弗赖塔格想。考虑到表演可能引起一切骚乱，乐器少得不可思议，只有一支音色单调的簧管——不过，这妞儿的确有风度。她可以教会他一些他永远不会为此感到遗憾的东西。他可以看出孔查不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玩具娃娃似的表演她的节目，像她跟班子里的人一起排练的时候那样，而是把她的心，或者说把她的心中那份真情，扑在这事儿上，跳得尽善尽美，引人入胜。不难看出，她已经把那个头发闪闪发亮的小伙子——在弗赖塔格看来，哪怕从最好的方面估计，他也绝对算不上是块机智绝伦的料——摆弄得乐不可支，快要落到

如痴如呆的境地了，使他突然陷在他的无比强猛、难以摆脱、部分得到缓解的欲望中；可惜他不知道，这种欲望是那么简单、那么平常，在他的年纪和在他的正巧是青春期的情况中，是那么容易满足。他干吗不能装出一副龇牙咧嘴的笑脸，把兜里的几个硬币抖擞得叮噹响呢？然而，他明摆着处在他舅舅的控制下，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没有钱是他为什么不能装出一副快活的龇牙咧嘴的笑容的主要原因。这也是老生常谈了。弗赖塔格不知怎么着恢复他自己的自我赞赏的心情了，让他们跳着舞，继续往前走去。

珍妮在进餐的时候尽可能地忍受了戴维的一切：他的沉默，他的阴沉的脸色和紧绷着的、沾着奶油的嘴，接着跟他一起度过这一天，不是坐，就是溜达，每一阵微风吹过，他们之间的空气都痛苦地颤栗；在这以后，她就躲进她的房舱去写几封信给她的家里人。不过，不管她怎样告诉他，戴维始终不相信，珍妮在南方中部一个州里有一个小小的但是抱作一团的家族：兄弟、姐妹、姑妈、姨妈、叔叔、舅舅、堂的和表的兄弟姐妹，甚至还有一个小侄女和一个小侄子哩，确确实实是一个符合传统观念的亲属繁多的家族；她喜欢他们，却跟他们分开和疏远。当她开始写“亲爱的……”的时候，她又想起，她把这封信寄给哪一个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都为她筑了一道她称之为“家族态度”的不容通过的防线——由于对她的生活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总是向最坏处怀疑，又由于他们对人性的弱点，对她的品行总是不满。珍妮不可能干什么好事，要不，她就会待在家里，这才是属于她的地方。这就是他们主要的想法，珍妮想，他们要是知道了那些事实的话，那岂不要吓得浑身冰凉？啊，得了，这个家族啊，要是你

胆敢挨近他们的话,他们就可能用小针和解剖刀刺进你的皮肤;你要是不提防的话,他们就用吸管插进你的身子,从每一个毛细孔里抽你的血。但是,这并不会使你不爱他们,也不会使他们不爱你,那种奇怪的渴望、需求、无法消除的柔情和辛酸把他们互相缠绕在活生生的神经网络中。

他们是不是你挑中的、你情愿要的亲人,这压根儿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就是你属于的那个家族,这就是你的,是再怎么也不会改变的,一辈子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没错儿。珍妮一直在并不完全自觉地沉思,她犹豫不决,没有在纸上落笔,这时候,她随手写下了称呼"你"的格式,停止去想措辞,只是在她内心里知道她不能挨近她的家族生活,因为她害怕他们的那些弱点和过错——那些也是她自己的嘛;他们的大多数优点甚至比他们的过错更使她厌恶。她花了多少年,进行战略性的战斗,试图把那些人撵出她的生活,又花了更多的年头,试图不睬他们,忘掉他们,厌恶他们;结果,她还是爱他们,她知道得很清楚,她是出自天性,有意这样做的,而且承认这个事实;这使她的心境无法平静,然而使她有了一片相当结实的立足之地。她最后并不转向他们要求帮助,或者安慰,或者夸赞,或者理解,或者甚至爱,而只是最后爱他们,因为她不能跟他们一刀两断。他们是家族,而她是走失的羊;他们永远不会让她忘掉这个事实,他们的心里装满了他们无法掩饰的恶意和憎恨;他们一起制造种种关于她的谣言进行诽谤,来证明他们指责她"开小差"这个说法是对的。

再说,他们一时半刻也不可能被蒙哄,相信那一套要画画啦,当"艺术家"啦的鬼话。一个好人家出身的年轻女人离开家和故乡,只有一个原因,她打算过不知羞耻的放荡生活;她在异

乡客地，她的亲戚和朋友就没法管束和惩治她了。艺术家，亏她想得出！有什么东西妨碍她在她家中的后花园里画画呢？

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的话确实不是从珍妮的脑子里，而是从她的血管里流出来的，她在写："最亲爱的堂兄或者哥哥，或者可爱的侄子或者姑姑……天气真美，比较凉了……我身体好极了……盼望着去巴黎……请告诉我你的近况……怀着我的爱，你的，你的和你的……"确实是你的，怀着我的爱，我的坏透了的、亲爱的家族！埃尔莎看罢电影进来的时候，她正在拆最后一封信。埃尔莎眼睛里含着泪水，然而心情愉快，很想跟人谈谈。

她坐在她的床边上，开始放下她盘在头顶上的头发。"妈妈不喜欢这个发型，"她腼腆地跟珍妮说。

"说真的，我也不喜欢，"珍妮说，"另一个比较漂亮些。"

船上第一回放电影；珍妮向戴维提议过，他们去看；戴维却说，他想象不出一个理由，竟然要用这么一种愚蠢的方式度过一个黄昏。珍妮马上反驳，她想象不出有什么方式比他现在这样度过黄昏更愚蠢的了。这话解决了他们的问题，结束了他们的谈话；他们分开来度过黄昏；珍妮写信。

结果是，埃尔莎过得挺愉快。两部影片都正巧是她最喜欢的那种；在墨西哥很少能看到这种电影；在那儿，影片老是演强盗们在群山中骑着马开仗和焚烧牧场，下流女人老是追求男人；形形色色的丑恶的人互相耍着恶劣的花招。不，那两部影片可不一样。是德国的，而且挺有意思。她坐着准备睡觉的时候，还原原本本地记得情节。有一部讲一个磨坊主的标致的女儿，她被两个有钱的绅士，真正的领主，爱上了——他们是爷儿俩。她不要那个父亲，他禁止她跟她爱的他儿子成亲。凭着一个恶毒的阴谋，她在磨坊小溪旁采花的时候，被老领主的两个一肚子坏

水的男佣人逮住了，带到猎物看守人的小屋里去；她在那儿被残忍地嫁给那个地位低微的人，他是个鳏夫，有一个跟她同年的女儿；那个老领主站在一旁，用最狠心的态度对一切发号施令！

“那个儿子当时在哪儿呢？”珍妮问，一边在一个个信封上贴邮票。

“他恰巧出门去了，”埃尔莎说。“不过，猎物看管人的女儿想出了一个救她的办法。她借口跟新娘一起到她的房间去卸妆，但是另有安排，把被单扎在一起，从窗口把她放下去；于是那个新娘穿过树林，向家里逃去——啊，那一片月光照在树顶上的景色真美啊——那个恶劣的猎物看管人在她后面追赶；但是他的脚在磨坊小溪的桥上绊了一交——那是上帝干的，你知道——他淹死了。这当儿，那个年轻的领主回家了，知道了一切情况；那个姑娘回到他的身旁，虽然是个寡妇，却仍然是处女！”

“那个老领主怎么啦？”珍妮问。

“他后悔了，同意了他们的婚姻，”埃尔莎说。“最后一场是在一座大教堂里举行婚礼，到处都是鲜花，充满着音乐，接下来是在乡村的草地上举行舞会。我希望他们多放些这样的影片……那姑娘真美，那小伙真俊，他们那么幸福地在一起生活！”

“还有一个大得不得了的结婚蛋糕，那上面尽是糖霜和许多糖做的小鸟和玫瑰花，”珍妮说，“就跟你有一天会有的一个样。”

“啊，我巴不得是这样，”埃尔莎说，但是跟往常一样疑疑惑惑。“第二部影片也好……”

珍妮伸手取了一条薄毯子，盖在膝盖上，坐着等她说完。“要完全掌握可有一点儿困难，因为自始至终情节的头绪很多；不过，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大公，他希望只是为了爱情才结婚，所以他不愿出于依顺他亲爱的父母而跟没有见过面的格雷芬·

冯·霍恩布雷希特结婚;他要称心如意地安排他自己的婚姻——你知道做父母的是怎样的,"埃尔莎,忽然脱口而出,说了一句叫人吃惊的深通人情世故的话,"那些但愿他幸福的可怜的老人跟格雷芬的父母商定了一条计策,用某种方法让他们会面,所以他们两人都得化装,互相把对方当作地道的乡下人。你会了解,格雷芬也是浪漫成性的,也已经拒绝甚至跟大公会面,因为她要只为了爱情结婚。就这样,格雷芬的父母告诉她,是她应该懂得一点儿生活的事情的时候了,她得换上洗衣姑娘的衣服,在洗衣的日子跟女佣人一起到河边去。但是,她什么活儿也不用干,你知道,她只要吩咐旁边的人就行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为大公安排,化装成一个住在树林子里的人,跟他的一些人一起在树林的那一带打猎。他看到了那个标致的姑娘;她也看到了他;他们一见钟情了,当然喽!这就行了;年轻的大公告诉他的父母,他遇到了他这一辈子中真正的爱人,只愿跟那个洗衣姑娘,而不是别人,成亲。接着,这两家人家把这个笑话继续瞒了好久,并且制造种种留难,直到他们完全信得过两人的爱情是真心诚意的,才吐露真相。在这段时间里,大公和格雷芬只要他们能作出安排,就乔装改扮,溜出去在树林里相会。他们这样相会了很长一段日子,直到最后一切都已说明;接下来是一场盛大的婚礼,在大教堂里举行的;后来是在城堡里安排了欢腾的舞会;所有的佣人在城堡里的草地上跳舞。啊,"埃尔莎突然说,"你会认为,我真蠢。我已经知道,生活不是这样的,我并不指望任何这样的事情。然而,"她说,"我不了解那些古巴学生。甚至那个高个子、长相漂亮、歌唱得很好——你记得我喜欢的那一个吗?——嘿,他跟其他人一个样。从头至尾,看到那些爱情场面,甚至悲伤的部分,他们嘲笑,打唿哨,像猫似的尖叫,表演得

那么恶劣，一个服务员不得不要他们安静。他们随即全都站起身来，跟女伯爵，你知道那个犯人，一起出去；她刚才也一直在胡闹。我不了解人们怎么这么狠心——那两部影片充满可爱的场面……”

“那些学生的毛病只是他们还没有生下来，”珍妮严肃地说。“他们只是他们的父母的恶梦罢了。埃尔莎，你应该试着忘掉那个小伙子。”

“我怎么可能忘掉他呢，”埃尔莎问，有一点儿恼火，“我不是天天看到他吗？不过，我妈说女伯爵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不管有没有爵位，所以我决不可以跟她接触，连说话都不行。我怎么可能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讲话呢，除非她先开口嘛？然而，我多么想知道，做一个那样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滋味！”

珍妮微笑着说：“唷，埃尔莎，你真有长进啊，长进得好快。多怪的想法……你母亲会怎么说呢？好吧，告诉我，你看了两部影片，过了一个愉快的黄昏，干吗要掉泪呢？”

“我有时候是那么快活，接下来就伤心了，”埃尔莎干脆地承认；她擦擦眼睛，眼眶里又开始泪汪汪了。

“要是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事儿的话，”珍妮急忙说，“那么，这没什么。我还不困。我要到甲板上去转悠一下，看看月色；明天见。”

“明天见，”埃尔莎用平静的声音说；她一天中的种种困惑化为乌有，她悄悄地安然入梦。

奥托·施米特太太仍然感到有点儿受到最近莫名其妙的遇上的许许多多的男人威胁；她发现在她的多愁善感的新寡的处境中这种莫名其妙的相遇叫她惊恐。她渐渐惊奇地意识到，除了她丈夫外，她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任何男人，也不了解女人，

除了她丈夫的朋友的妻子，或者那些跟她虽然同为女性、却无法情投意合的老处女教师，好像她们属于另一个种类。多年来，除了在跟她丈夫一伙的人在一起以外，她不跟教室里那些年轻的学生作伴的时候，很少看到任何人；说真的，在她结婚后过的生活中，他确实一直在场。他战后的健康情况使他时不时地看来几乎好像是她的孩子；在比较好的时候，有点像个感情深厚的弟弟；然而，归根结蒂，始终是她的丈夫。啊，对于让她过没有了他的生活，他从前给她的准备是多么不足！她能转向哪儿去呢，她能跟哪一个说话而能肯定得到温和的、充满人情味的回答呢？

舒曼医生独自个儿出现在甲板的头上站在栏杆旁的时候，她几乎把这当作对她祈祷的反应。她尽可能地走近他，希望能避免显得是在有意守候他；但是她渴望接近他，只有一会儿也好，因为他安慰她，而且使她对一切正确、善良的意识再产生信心，处处做得得当。

他左边的脸转过来朝着她；她本来可能崇拜那块威风凛凛的决斗的伤疤的。她丈夫那块伤痕跟医生的一样显眼，是她生活中的骄傲。这使她想起种种叫人高兴的事情：他的家庭出身比她优越；他在大学里的决斗活动加强了他的社交地位；他本来完全可以攀一门对他有利的亲，一个有钱人家。但是，他挑中了她，她只有一份小小的嫁妆嘛；她那些兄弟也从来没有摸过花剑；他还告诉她，他一时半刻也没有后悔过；她对此从来没有停止过感激他。医生的伤疤是落在好得不能再好的位置上，因为，要是一个学生身子摇晃、转过脸去，或是低下他的下巴的话，他往往甚至会在额头或者颧骨上挨揍——她看到过太多这种伤疤了——这对他是一个耻辱，除非这可以归咎于对方的剑术的拙劣——而一个人怎样一辈子对这事儿进行解释呢？施米特太太

已经对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吹嘘她丈夫是个大胆的决斗者感到厌烦了，他永远是挑战者，永远是胜利者，他左边脸颊上有四个伤疤，每一个都挺美，每一个裂口都直到牙齿，而相互之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英寸的间距！得了，她时不时地怀疑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的夸张的叙述。除此以外，在好的部位有一块好的伤疤就足够了——说到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活人的肉上作一个记号，是授给被证实了的勇敢行为的另一种奖章。一个绅士得到了这个，于是就可能从事他其他的事情和消遣。

她带着腼腆、爱慕的心情几乎是轻手轻脚地向医生走近去；他转过身来，对她流露出她很欣赏的那种严肃的微笑，看来像要说话了，这时候，吵闹的合唱《蟑螂》在黄昏的微风中响起来了；女伯爵穿着一身飘动的白连衫裙和绿凉鞋，由一大群奇形怪状的献殷勤的人簇拥着从交谊厅里风姿绰约地走出来，手指头随意扭动着，向医生妩媚地微笑，她的步子轻快地走着，裙子飘荡；那些学生按照伦巴舞的拍子，吼叫着唱那支歌。他们中间有一个，一个穿一条像折起的裙子似的紫粗毛呢牛津裤的筋骨结实的瘦小伙子，懒洋洋走在后面，隔着安全的距离，模仿她的衰弱而抱怨的声音说："啊，青春，美丽的青春啊，我可一丁点儿都没有了，谢谢你们。"

他甚至厚颜无耻地、毫无顾忌地对施米特太太眨眨眼；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惊慌地向医生转过脸去，直喘粗气："嘿！……你可遇到过这种事儿吗？"

舒曼医生走近一些，他们在一起站着，打量那些学生——他们跟在举止娴雅的女伯爵后面，走路的姿态像在抽搐，龇牙咧嘴的模样像猩猩，放肆地挥动着双手。她看来好像对她自己和周围的一切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怎么能容忍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

呢？他抑制住一声巨大的叹息，向大海转过脸去，用忧郁的声调对施米特太太说："简直难以相信，年轻人变得邪恶。咱们听到过许多话，不是吗？都是对中年人不满的，而且有很多的不满是有道理的——说咱们毛病越来越多，什么懒散啊、自私啊、自满啊、绝望啊……"

"我希望没有绝望，亲爱的舒曼医生，"施米特太太不自在地说。

"尤其是绝望，"医生斩钉截铁地说。"可是，真正的邪恶，"他说，"倒是在年轻人的心里。咱们有罪，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咱们知道，咱们有罪；咱们有些人努力忏悔，弥补罪过。可是，他们……"他把头向那些学生伸去，"他们有罪，甚至还不知道，还对犯罪感到光荣。他们不知羞耻，狠心和骄傲……他们带着上了年纪的人不了解的——也许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消磨尽的，"他突然产生一个有点幽默感的念头补充说，"热情爱他们自己……不过，他们还是整天犯罪作孽，糟蹋一切存在的东西，从人心到圣灵；当他们犯罪犯得累了的时候，竟然就躺下去睡觉，像刚洗干净的羔羊那样。那一切无知的讥讽和嘲笑，"医生说，"那一切对一位贵妇人的狠心的嘲弄，她可是在受疾病的折磨啊，而且从来也没有伤害过他们！"

施米特太太带着温和的惊奇说："可是医生！这是我第一回听到你这么严厉地说话！"

"我是有意严厉的，"医生平静地说。"我是在旷野里，或者在茫茫大海[1] 上喊出的谴责的声音！我希望我的话是石头，我可以拿它们向那些野蛮人投去，砸烂他们的脑袋。"

---

① "旷野"和"茫茫大海"是暗用《圣经》中耶稣的典故。

“或者他们的心，”施米特太太说。

“不，他们没有心，”医生说。

施米特太太默不作声，感到她被吸引到超过她领会的程度，然而，她是渴望被拉到这样程度的。她悲哀地注视着他盯着看女伯爵身影的眼光，直到她消失为止；她看到了她看到的情景，按照她自己的方式观察，想着她自己的简单的思想。真遗憾，这样一个好人竟然会爱上这样一个女人。而且在他这把年纪上，已经结了婚，等等！啊，这真是太可怕了，这种事情实在太多了。她对医生的信心动摇了，削弱了，又稍微恢复一点儿，但是始终不像从前那么光彩了。她感到又受了伤，又闷闷不乐了，生活在她身旁擦肩而过。她只希望念她的玫瑰经，把她自己交在上帝手里，去睡觉，忘掉一切。在这个世界上，对她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叫人高兴的或者好的事情了。痛苦地过了一会儿以后，她喃喃地说了几句正式的告别话，往前走去。

舒曼医生对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稍微回想了一下他刚才的话，懊悔说得太过分了：这就是说，在那个不恰当的地点、不恰当的时刻，用不恰当的强调措辞说了那番话——说真的，那是压根儿永远不该说的，他断定，那种引起他说这番话的想法是可疑的。在他的脑海深处，他作了短短的忏悔，直挺挺地躺在帆布躺椅上，闭上眼睛。甲板上灯光朦胧，一时没有人，除了叫人昏昏欲睡的波涛声以外，一片寂静。舒曼医生在此以前还不止一次有过再签约干一个航程的念头；在此时此地，他一刹那间明白，这是他最后一次航行了。他的这次航行莫名其妙地被证实是一段特别难挨的时间；如今看到航行有了确凿无疑的终点，医生松了口气，安静地睡着了。

他睁开眼来的时候，女伯爵直挺挺地躺在紧挨在他右侧的

那张躺椅上，一点不拘束，清醒着，带着忧郁的美，打量着已经暗下来的大海，好像她在等候舞台上的幕升起来似的。他是那么吃惊，说话也有点儿结结巴巴了：

“你——你怎样把那些糟糕的学生打发掉的?”

“他们有时会令人生厌，”她平静地跟他说。“他们对胡闹淘气感到厌烦了，后来说要去玩骰子了。你睡得真沉，真叫人羡慕。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舒曼医生坐起来，感到神清气爽，完全健康了。他几乎愉快地说：“那还用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嘛!”

“没错儿，”女伯爵说，“我看得出，你这个人啊，做了亏心事是再怎么也活不下去的。”

“更糟的事儿有的是啊，”医生毫不含糊地说；眼下他知道他非得开始对这位不同寻常的女士更严格一些不可了，她毕竟是他的病人嘛。“告诉我，你难道现在没有可以指责你自己的良心的事儿吗?”

“我对良心一点儿不懂，”女伯爵说。“我只有一点儿最微弱的荣誉感，而这差不多也只是……断断续续地！不过，说到我对你许的诺言，我到现在还一直遵守着——难道你看不出吗？不过，这并不叫我快活；不，它使我痛苦得要命，我血管里像有仙人掌在刺；我干吗要这么干呢？为了你，我告诉你的；你干吗还要问更多的呢?”

“我决不是问那个，”舒曼医生说，“压根儿不是问那个。说真的，我再怎么也不会这么大胆，梦想这样的事儿。”

“我知道，”女伯爵几乎柔情蜜意地说。“我非常需要些什么来帮助我睡眠。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试着再坚持一点时间不吃药，”医生说，“到一定时间，我答

应帮助你。"

"我痛恨一切形式的痛苦的折磨,"女伯爵说。"这对我是这么不合适。我不可能有英勇的表现——我对那种表现甚至更痛恨。然而,瞧——嘿,这两桩事儿我都答应,因为你认为这可能对我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呢,对我的灵魂吗?"

"对你的灵魂也有好处,没错儿,"医生和颜悦色地说。

"难道你指望因为这次奇怪的航行,这么出人意料,这么不像我熟悉的任何经历,我这人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吗?"女伯爵问。"算得上是个奇迹吗?"

医生开始说话;这当儿,他们两人都看到了那相当滑稽的一对,瘦得皮包骨头的利齐和有点儿发胖的里贝尔先生,正在走上安放救生艇的上层甲板;后面,隔开一点儿距离,偷偷摸摸地跟着里克和拉克,那对双胞胎兄妹。女伯爵和医生都没有提到那些幽灵似的人,或者简直没有注意到他们,继续愉快地交谈。

里克和拉克在上层甲板上东躲西藏,一直成功地不让那两个受他们注意的对象看见;那两个人的行为和打算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后来,他们终于听到在第二个大烟囱——那是个相当黑暗和隐蔽的地方——后面传来一阵最能引起人注意的混乱的声音:轻轻地拉扯,皮鞋后跟滑倒,女人发出压低了的、发狂似的责怪和嘶嘶的发威声,一个男人在欢快地格格发笑和欢叫。里克和拉克听不懂那些话,但是他们凭直觉就知道那是通行的打情骂俏的话。像小狐狸那样小心翼翼地走向前去,他们互相阻拦,生怕对方看到第一眼,交换着敏锐的眼光,他们的眼白闪着微光;他们的尖尖的红舌头在他们张着的嘴里转来转去。风在他们的耳边呼呼吹过,把他们的头发吹到他们的脸颊上;他们紧挨

在烟囱上，向那挑逗人心的闹声悄悄走过去的时候，他们的料子稀稀拉拉的衣服贴在他们的瘦削的骨架上。

在充满渴望的寂静无声中，他们看到了意料中的场面。利齐和里贝尔先生背对着烟囱，挤作一团，扭打，发笑，搏斗。他在使劲儿要抚摸她的膝盖，而她呢，用一只手在拉下她的裙子，另一只手在有气没力地推开他。里克和拉克等着看更有趣的情景，但是那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姑娘挣脱了身子，猛地一推，几乎把那个胖子推倒在甲板上。她的女衬衫的前襟分开着，几乎一直到腰带那儿；那两个孩子扫兴地注意到，确实没有什么可看的。那个姑娘把头猛地一转，长长地发出一声尖叫，她那双神情狂热的眼睛突然盯上了里克和拉克。她尖叫一声，跟刚才的尖叫不一样："啊，瞧，啊，瞧，啊……"向他们挥动着两条长长的胳膊。

里贝尔顿时清醒过来了；利齐像把大折刀似地用立即弹开的动作跳起身来直挺挺地站着的时候，他得先蹲一下，才能脚踩地，然后抓住一圈绳索，最后费劲地哼了一声，总算把他的身子拉了起来。里克和拉克仅仅在烟囱旁后退了一步，仍然盯着看，在掂量是不是非撒腿逃跑不可。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你们两个不要脸的畜生？"里贝尔先生用有一点哽住的但是严厉得像父亲的声调问。

"瞧你们，"拉克直截了当地说，伸伸舌头；里克附和着说："继续干啊，别停住。我们会告诉你们的，要是有人来的话。"

里贝尔先生听到这么个小孩居然说出这种尖刻的话，确实感到震惊了，双手准备着，大吼一声，向他们冲过去，但是他们跳过去，不让他碰到。

"滚开！"里贝尔先生大叫，快要气疯了。里克和拉克跳着舞，纯然为了取乐，竟然拍起手来，这时候，里贝尔先生跳来跳

去,不止一次地挥拳出击,却次次打空,反而因为用力过猛,使他自己的身子打转。里克和拉克轻快地跳跃撒野,一边喊叫:"一个比索,一个比索,要不,我们就捅出去——一个比索,要不,我们就捅出去——一个比索——"

"妖怪!"利齐嘶哑地喊叫。"你们两个可怕的小——"

"一个比索,一个比索!"里克和拉克仍然围着里贝尔先生溜来溜去,毫不费力地避开他的打击。里贝尔先生站住脚,直喘粗气,耷拉着脑袋,像斗牛场上的一头公牛。他把手伸进兜里。一个比索哨的一声落在甲板上,滚动着。里克一脚踩在它上面。"给她一个,"他说,"给她一个。"他的脸上显出精明、冷静和提防的神情。里贝尔先生又扔出一个比索。里克把两个都抢到手,紧紧地握在一只手里,向拉克招招手,她马上跟在他后面。

他们跑着,在楼梯头什么地方狠狠地撞了一下;两个人顿时看到了同一样东西,产生了同一个念头。那些救生船中有一艘的帆布罩有一部分没有拴上,它松松地垂着,可以轻易地拉开得大一些。他们试着解得大一些;真叫人吃惊,一解就开。他们揭起罩盖,扭动着身子,爬进船去,里克在前,拉克跟着,一句话不说。

那艘船比他们以为的深得多。他们爬来爬去,爬了好一会儿,才设法使他们的脸向上,对着罩盖口,他们在那儿留神地听了一会儿,脸碰着脸。后来,那个胖男人和那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姑娘从他们身旁经过;她在扣衬衫钮扣;他们两人都是一脸怒火。里克突然身子失去平衡,手忙脚乱地乱抓,一边叫了一声。那个姑娘转过头来,向他们藏身的地方狠狠地盯了一眼,没有看到;接着她在楼梯上绊了一下;那个胖子抓住她的胳膊。"小心,我的美人儿,"他温柔地说。

“别拉，”她恶狠狠地说，从他的手里挣开她的身子。

里克和拉克跌到船里去，在黑暗里缠成一团，格格地笑着。“把我的比索给我，”拉克凶狠地说，一把抓住里克的肋骨，用手指甲掐进去。“把我的比索给我，要不，我会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的。”

“拿啊，”里克用同样的声调说，用拳头捏紧那个硬币。“来吧，拿啊，不妨试试看！”

他们看来在你死我活地扭作一团厮打，滚到船底，打得好不激烈，膝盖顶撞肋骨，手紧抓头发；他们互相造成的痛苦会带来强烈的欢乐。渐渐地，他们平静下来，又开始发出格格的笑声。一个年轻的高级船员经过，站住脚听，他的脸上神情很专注。他走上前去，猛地揭起帆布；看来他看到的船里的情况使他一下子像石头似的愣住了。接着，他扑到船边上，几乎急急忙忙地弯下身去，抓住他们两人，把他们从船里拉出来。他们轻得好像他们的骨头里是空的；他们像破烂的玩具娃娃那样显得软绵绵和晃晃荡荡。

女伯爵和舒曼医生仍然舒适地靠在他们的长躺椅里，望着船上的灯光在黑沉沉的海面上跳跃；医生在说：“一个人没有新的弱点、新的力量，只有发展、加强、减弱，或者原有潜力的滥用。这些可能时不时地发生得这么突然，这么强有力，给人产生了发生根本变化的幻觉，不过只是幻觉罢了。一个人越来越老，就越意识到他的性情中的变动的、不稳定的因素。你可以说，一个人试图记住一切，采取克制的办法。一个人最后简单明了地，也许还带着几分沮丧察觉，一个人在童年被告知的，归根结蒂，都是实话——一个人是不朽的，不过不是肉体。一个人……”他停住

了嘴。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女伯爵轻轻地说。"你在说的这一个人是谁？咱们还是谈谈自己吧——确切地说，就是你跟我。"

"我自己，我有一种很普通的心脏病；所以我按照我经常给别人开的方子，航行一两回，在船上当医生，希望有点休息，你想得到吗。嗨，只要我这条命还能活下去，再有一回看到我妻子拿扫帚一边把那些小鸡从我们在乡下的厨房里撵出去，一边不断地数落，我对这个世界就没有其他要求了。那个可爱的女人到底对我、对其他一切人和一切东西，数落了多少回啊，至少在她结婚后的这些年来，她的那些数落都总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都是对人人都有好处的，因为说真的，她几乎是永远正确的——这又怎么样呢？"

"好啊，"女伯爵口没遮拦地说，"对你来说，至少你有一段短短的日子用不着挨数落了。"

舒曼医生听到这话，只是微微笑了笑，眼光移开去，望着栏杆外的海洋。"想想我吧，一个医生，在安静的海德尔堡[1]过了那么些年头，想着我会在一艘船上的天地里找到休息。我对自己会这么想感到惊奇，我以为现在我也许会学到一些关于我自己或者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人的新东西；可是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一切我以前都见过，见过多少回了，只是以前没有在船上见过罢了。这些人，我以前都见过他们，只是在别的地方，用的是别的姓名。我几乎只要望望他们，就知道他们有什么疾病，而你要是知道一个人害着什么疾病的话，通常就能说出他有什么优点

① 海德尔堡(Heidelberg)：德国西南部城市。

和毛病。”

“那就谈谈我的吧，”女伯爵说，把她长长的双手轻轻地握住他的膝盖，从躺椅的搁腿凳上向前弯起身子。

在甲板的北边一头，出现了一伙奇怪的、在扭打的人。一个年轻的船员，帽子被打歪了，正在跟那两个叫人头痛的西班牙双胞胎兄妹搏斗。然而，尽管这样，那个船员仍然坚决地往前走，想方设法地用歪来歪去的步子向舒曼医生和女伯爵走来，拖着他的两个俘虏；他们试着咬他的手。

“又捣乱了，”舒曼医生说，他的神情不再平静了。“我还不得不让那两个孩子老老实实地待着，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他叫唤那个海员：“出了什么事儿？”

那个年轻的船员听到这个问题，脸涨红了。他站停在医生面前，重新抓紧里克和拉克；他们突然不再挣扎，一动不动地站着，阴沉的眼神什么也不看。那个年轻的船员开始说：“先生，这两个孩子，这两个恶劣得说不出口的……”

里克和拉克采取一致的行动，向相反的方向逃跑，所以他的两条胳膊被拉得一下子向左右分开，但是他没有让他们挣脱。他的脸涨得越来越红，直到他的耳朵看起来红得像在燃烧。他的脑袋左右来回，嘴张开又闭上，一声不吭，无言地向他们两人求助，当着一位女士的面，他没法说下去。

“我是个母亲，”女伯爵鼓励地说，对他流露出最不像母亲的微笑；她的明亮的红嘴唇变得圆润、柔和，她的眉毛扬起。“我能猜想到最糟糕的事儿，可是说真的，我不得不说我并不认为这很糟。你怎么认为，医生？”

“我同意，不管他们干的是什么事儿，他们是小妖怪，”舒曼医生低下头去，不存希望地打量着他们，“而且完全没有受过任

何通常的纪律教育。”

“他们刚才在一艘救生船里，”那个年轻的船员稍微结巴地说。“他们揭开了帆布顶罩的一边，爬进去……”

“他们自己在找乐子吗？”女伯爵问。“嘿，il faut passer la jeunesse[1] ……幼年是个叫人厌烦得要命的累赘，我发觉，首先是自己的，接着是别人的……我那些可怜的孩子一点儿也不像妖怪，恰恰相反，个个正常得叫人尴尬——可是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叫人厌烦的累赘，直到他们十八岁。那时候，他们才成为人们可以跟他们谈谈的风度迷人的小伙子。我不知道这奇迹是怎样发生的。所以，”她加上一句，“我们必须等待和对这样的现象要有耐心。”接着，她妩媚地向那两个孩子微笑；他们瞪着眼回看，眼睛里充满恶意。

“这两个孩子可不会发生这种事儿的，”舒曼医生说，“他们的邪恶根深蒂固地扎在他们的灵魂里。”接着，对那个年轻的船员说：“难道你不能把他们直接交给他们的父母吗？”

“他们的父母，我的上帝啊！”那个年轻的船员说，忍不住爆发出一阵轻蔑和绝望。“难道你没有看见过他们吗，先生？”

“那么，”女伯爵说，“我看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他们放了——要不，”接着她温柔地盯着那两个小罪犯的冒火的眼睛看，“也许我们该给每个人节省一些时间和麻烦，把他们扔进海里去怎么样？”

“是，太太，是个好主意，”那个年轻的海员板着脸说，“可惜不能这么办。”

“啊，你干什么都太认真了，”她说。“他们不过是孩子嘛。”

---

① 法语，“对年轻人的过错不妨宽容些”。

“不过，有魔鬼附在他们身上，”舒曼医生说。女伯爵端详着他那张本来友好、仁慈的脸，这会儿脸上现出军人般严肃的神情。“你是那种多么老派的人啊，”她敬慕地说。

医生的眼睑抖动了一下。“可不是，我知道——没错儿，有一点儿沉闷乏味。”

“可是迷人！”她说，向他的手伸出手去。

那个年轻的船员——他的道德观念正处于特别敏锐和强烈的状态中——感到了震惊，几乎跟刚才看到里克和拉克在船里的情景一样震惊。原来他听到的关于女伯爵的一切流言蜚语都是真实的！他看到他自己跟里克和拉克一起被撇在一边——好极了，他们不比他们的长辈坏嘛！让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他放开他们，好像抛开两条毒蛇似的；他们马上撒开腿，磕磕绊绊地向甲板北面跑去，得跑好长一段距离哩。他随即装模作样地向女伯爵和医生鞠了一个躬，——这是他胆敢向他们表示的最虚伪的敬意——戴正帽子；走过去。

女伯爵在他背后瞟了一眼，声调清朗、愉快地笑起来，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可怜的好小伙子，”她说，“他还太年轻，年轻得记不起他自己的童年。亲爱的医生，我始终不懂得原罪[1]的教义。孩子们在鞭子下被养大以前，只是完全合乎自然规律的小动物——干吗对他们感到震惊呢？”

“在那两个孩子身上不可能发现善，”医生说，“从他们的身上，再怎么也不可能。干吗用希望来欺骗咱们自己呢？他们不

---

① 《圣经·旧约·创世记》中载上帝所创造的人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嘱咐，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成为人类的始祖，所以人生来是有罪的。这种罪，基督教称之为原罪。

会有好下场的。"

"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好,"女伯爵说。她靠下去,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你有的是一个怎样的童年?"

"一个清白的,"舒曼医生说,心情又好极了,"或者说,我喜欢这么认为。"

"啊,你喜欢这么认为;也许这也是真的,"女伯爵嚷着说。"可是难道你没法记起任何一桩有趣的事情吗?难道没有发生过一桩叫你开心的事儿吗?"

舒曼医生沉默了一会儿,开始相当勉强地微笑了笑,决定彻底吐露事实真相。

"清白,"他开始说,"咱们的可以激烈争论的清白……"

"这么说,你确实有一些有趣的回忆,"女伯爵说,把她的丝绸一样柔滑的手放在他的手上,那只手上的蓝色血管像小树的细枝似的竖立着。"好吧,为了鼓励你,老实说,我从来没有清白过,从来没有过。我没有机会,首先是因为我被那些吸引人的表兄弟包围着,那些性格跟我一样的极喜欢冒险的男孩子。我没有要求清白的倾向,尤其是没有这个愿望。我从来没法忍受这样的念头——我被排除在任何秘密或者任何乐趣之外。我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在没有人帮助下猜测,什么都猜。从猜测开始到有经验,只有一步之遥;从有经验到成为习惯,只是时间问题。除了我没有总是充分利用我的机会以外,没有什么可感到遗憾的!"

"我从前是清白的,"舒曼医生说,"是个笨嘴拙舌的小伙子;充满希望和活力,一个无忧无虑的、头脑简单的人,相信教给我的一切事情,一个百依百顺的可爱的孩子……只要吻吻我,我什么事儿都肯干,"他说。"不过,说实话,我五岁上诱奸了三岁的

小表妹，而在六岁上倒过来被一个九岁的一起玩的小姑娘诱奸了，我们干了荒唐的事情——甚至不是拙劣的模仿，”他说。“我的两个玩伴都是很好的妩媚、正经的姑娘，她们都有美满的结果，婚姻幸福，并且为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会把自己的孩子狠狠地骂一顿。然而，听我说，那驱使我们干这事儿的冲动是以原罪为基础的，我相信原罪，就跟我相信真在论[①] 一样……”

“我什么都不相信，”女伯爵说，并不用强调的语气。

“不过，你必须容许我有我的信仰，”医生温和地说。“至于清白，是不是任何人都知道那是什么呢？我记得总是连在一起的罪过和欢乐——它们至今从来没有触及我的那部分生活——还有那些以道德规律为基础的行为，那些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而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或者一场白日梦的行为，以及那些我相信是清白的行为。”

“我将不会尝试听从这番话，”女伯爵说。“咱们不是在谈欢乐吗？谈论神学使我心情沮丧。我从你所说的罪过中得到一切乐趣，并不觉得有罪，“她有点沾沾自喜地说。“不过，你一定曾经是个最可爱的小个子男人。甚至在那时候，我也会喜欢你的。我遗憾地说，我犯的有些罪是属于那种恶劣的、无法想象的那种。我四岁那年，我劝我的一个弟弟喝了用来清洗排水管的碱水，告诉他那是牛奶。他喝了一口，马上吐出来，一边跑，一边尖叫；我受到了惩罚，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除此以外，这件事儿没有引起别的后果。说真的，我并没有恶意——我只是感到好奇，想要看一看这会不会要他的命。可是，年纪大的人不懂得这

---

① 真在论(Real Presence)：天主教神学圣事论学说之一，认为在弥撒中经过祝圣的饼和酒内，耶稣的肉体、血、灵魂和神性，真正存在于其间。

些事情。”

“啊，童年，”舒曼医生说，“嫩蕾未放叶未展的时候。”他们两人愉快地哈哈大笑，靠回到躺椅上去。

“事实上，那时候也不很糟，”女伯爵说。她抬起医生的手，把她自己的手指头悄悄插进他的，连在一起。

“我爱你，”她温柔而出人意料地说。“也许不怎么深，不过你挺好，我爱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喜欢一个男人庄重、严肃，有坚定的原则。我最讨厌不过的是轻浮、胆怯、犹豫不决的男人，连他自己的想法和他自己的心思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从来就不知道一个女人的想法和心思。你有没有对你的妻子不忠实过？”

“喂！”舒曼医生叫起来。“这算什么问题！”

“啊，可不是，我知道，你不得不表示惊讶和震惊了。没错儿，你总是对的。不过，想一下。我不仅仅是因为好奇心和鲁莽，当然，这也是一部分原因，可是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原因，那是有件事情我要你相信……”

舒曼医生从她缠着的手指头中抽出他的手，把她的手握在他的手里，然后轻轻地把他的手指头放在她的脉搏上。

“脉搏跳得怎么样？”她问。“跳得平静吗？”

“跳得很好，”他说，“也许现在比我的脉搏跳得好。不过，我以前告诉过你，”他说，然而没法不再一次提到他的不稳定的心脏。“随时都会出毛病，”他跟她说，随即放掉她的手。

“我觉得，知道你会怎样去世，真叫人羡慕，”她说，“那将是突然的，而且是雅观的。我也希望知道，因为我怕拖得很久，吃尽苦头，毁了容貌。我不愿死后留下一具丑陋的尸体……”

“你简直爱慕虚荣得不可救药，”舒曼医生说；他的声调听起

来倒像是在赞美她。“我知道对一个美人来说,最珍贵不过的是美貌了。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是美的,而离开的时候却变得丑了,这实在不是滋味。美貌像其他天赋或者品质,还是值得拥有的嘛,你得生来就有,没法得到它;你不应该亏待它。”

“可你觉得我现在还美吗?”

“当然喽,”医生说。短短地停顿了一下,他说:“我要老实地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妻子不忠实过。”

“你多可爱啊,”女伯爵体谅地说。“有时候,一定会闷得慌。”

舒曼医生一直自以为是一个含蓄的人,发现自己被一个像魔鬼似的坦率的女人缠上了。“是这样,”他简单地说,“可是她对我忠实;有时候,她可能也会感到有点儿沉闷的。”

“你是真的这么好呢,因为你希望这样,还是因为你的心脏不好?”

“我的心脏一向健全,两年前才不行,”舒曼医生说,有一点儿生气,感到他的推心置腹的行为被辜负了,还感到他也许活该受到这样对待。

“不过,你多少有点儿爱我吧,对不对?”

“不,”舒曼医生说,“一丁点儿也没有。要是我多少懂得一点儿什么叫爱的话,一丁点儿都没有。我知道我应该怎么说;我知道这样做不怎么符合对待女人的潇洒风流的风度,可是我不是个能够说我不打算说的话的男人;你希望听那种话吗?也许这也不是说那种话的时候。”

女伯爵用大拇指和其他手指头托住了他的下巴,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两下。她的圆润的嘴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两个亮晃晃的红印子。舒曼医生看起来很高兴,但是极为平静。

“你真可爱，”她跟他说。“你太好了。我爱你。”她接着加了一句，“让我来擦干净你的脸。她用她的湿漉漉的舌头舔了舔她的抽纱边的手绢，擦掉那两个红印子，说：“要是这会儿有谁看到我们的话，他们会以为我们是一对最恩爱的夫妻。”

“已经有人看到我们了，”舒曼医生说，“在所有的人当中最对这感到乐趣的那一个。”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独自个儿踱过的时候，他们默不作声地坐着，手指交叉着，头向海伸着，脸色宁静。“这样好的天气，在室外坐坐最惬意不过了，”她用清晰的高声跟他们说，声音中充满同情和了解。她站住脚，微微哆嗦了一下，用她的薄围巾裹住她两条露出着的胳膊。“也许人应该当心夜晚的风，尤其是在海面上，”她说，愉快地微笑。她弯下身来，用充满渴望、滴水不漏的追根究底的眼光盯着他们的脸看。他们平静地回看她。踌躇了一下，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慢腾腾地走过去，突然猛地回过头来：“说到底，夜晚的风会引发风湿痛和关节炎；我们只年轻一回。”

“真是个老古董，”女伯爵也用清晰、甜美的高声对准着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的一上一下摇晃的肩胛骨说。

“啊，得了，”舒曼医生温和地说，“就由她去管这种事情吧。”他看来在生气和不舒服。

女伯爵发出一阵刺耳的颤动的笑声。然后，她又沉默了一会儿；她的脸显得悲痛和疲倦。

“我讨厌女人，”她用没精打采、平淡乏味却是诚恳的声调说；医生以前从来没有在她的声音中听到过这种声调。“我恨自己是女人。这是不体面的情况。我总是不甘心。”

“真遗憾，”舒曼医生说，他知道在他的心里完全同意她的说

法。但是,他在行使男人的责任,在安她的心。“你的想法完全不对。也许做个女人是不幸,所以你们许多人好像都有这个想法,不过这压根儿没有一点儿不体面——这是一件必须面对的命中注定的事儿,跟其他事情一样。你是,”他热切地跟她说,“一个不止那种通常地反常的人;改变性别对你不会有一点儿影响。有许多男人有你的性情和习惯;你要是变成男人的话,仍然会是一个调皮捣蛋的人、一个吸毒者、一个勾引异性的人。”

女伯爵轻得像一朵云那样站起身来,张开两条胳膊,好像要拥抱他似的,向躺着的他探出身去,微笑着,兴高采烈。“那还用说!”她高兴地说,“不过,想想看,那有多自由,机会也更多,也用不着被像你那样的发霉的老东西责怪!”

舒曼医生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退后几步,避开她快要按在他两个肩头上的双手。“我不是在责怪,”他说,真的发火了,“你说的话跟任何愚蠢的女人没有两样!”

“你像个丈夫那样说话,”女伯爵在他背后喊叫,因为他已经转过身去,正在离开她,“像任何愚蠢的男人那样!”她的可怕的说话声和颤动的笑声跟随在他后面一阵阵传来,像冷雨从他的领口淌下来;她终于撵上来,走到他身旁,把一条胳膊伸到他的胳膊肘旁,手指头插进他的手指头。“你真可爱;你不能摆脱我。”因为舒曼医生正在试着至少不失尊严的外表抽回他的胳膊。

她随即放开他,走到他面前;他看到她眼睛里的神情像猴子的那样近乎疯狂和充满兽性。“站住,”她说,她还在笑,但是看来快要掉眼泪了。她握住他的双手,把她的头轻轻地在他的肩膀上靠了一下。“啊,难道你看不出吗?我累了,我快疯了。我非睡一觉不可,要不,就没命了……你非得给我打一针不可,剂

量要重，能使我睡上几天的……啊，别离开我，你不能走——你再怎么也不能走，我不会让你走的！……啊，让我安静下来——让我睡觉！”

舒曼医生紧紧抓住她的双手，把她推开一些距离，用敏锐的眼光打量着她的脸，希望能拒绝她的要求；但是他看到的情况使他马上作出决定。“行，”他说，“行。”

她马上转过身去，双手垂在身旁；他们一起穿过甲板，向他的房舱走去。“啊，”她说，在过道里的斑驳的灯光下向他抬起一张受尽岁月摧残的、凄凉的脸，脸变得叫人难以相信，“哎，你真好。啊，千万别以为我是个不懂得感恩的人……现在我可以遵守诺言不再用醚啦！”

“醚，”医生用一种表示职业纪律的严肃性的上升的声调说。“你还有醚。这么说，你藏了一瓶？”

“那还用说，”她马上用一丝轻蔑的不耐烦的声音回答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不在每件事上都信任我呢？”

舒曼医生猛地站住脚，转过身去面对着她。“甚至现在吗？”他问。

“甚至现在，”她大胆地说。他脸对着脸仔细打量了她一下；面对着他脸上的表情，她垂下眼睫毛，眼光移向一边。

“得了，”他最后用干巴巴的、冷淡的声音说，“尽管这样，你还是得打针。独自个儿走吧，”他说，向他自己的房舱转过身去。“几分钟后，我会来看你的。你知道很清楚，你可以信任我，”他说，对他自己这么痛苦感到惊奇。她转过身走去，好像她已经忘掉他似的，好像他的答应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她可以轻描淡写地对待它——这是真的，他带着一点儿幽默感挤眉弄眼地苦笑了笑，向自己承认，或者说，到现在为止，一直是真的。医生在挑选

和安排那次打针用的针剂的时候，开始用他的脑子的有理性的、比较冷静的部分相当清楚地、几乎是有条有理地思考。他想，他作为她的医生的责任还没有失败。然而他没法否认他对她产生了个人的感情，这起了干扰作用，而且帮助制造了一种对他不适合的情况——也对她不适合，他不情愿地承认。但是那一切震惊和心烦意乱——她总是把每一次会面变成吵架，使他们两人都精疲力竭；他的心脏始终存在着另一次发病的危险；她毫无顾忌地不顾门面，很容易会制造那种医生甚至想一想都会不寒而栗的丑闻——啊，得了，一切都必须有个结束。他打定主意，不但要运用他作为船医所保留的权威，而且，要是她不听话的话，还要借助于船长的命令，必须把这种出格的关系马上纳人轨道。她必须受到像一个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歇斯底里的女人那样的对待。她像演情节剧那样的种种愚蠢的表演是可能要了他的命的。胡扯，不可能再发生这种事了。然而，他打算行行好，把她安置在无知无觉的麻醉的天地中；归根结蒂，那是她心目中的天堂。

"啊，"女伯爵说，一看到他，就坐起来；她脸上的忧虑一扫而空，神情轻松，脸色闪闪发亮。"我又见到你了，真高兴！我是多么怕你不来！"

"什么？"舒曼医生说，感到惊奇。"我不是刚跟你说过，让你放心，我不会撇下你不管的吗？"

"啊，"她说，"正是在那时候，人应该开始怀疑！永远的盟誓——这种誓言啊，总是被人毁掉！"

"我没有发过任何这种誓，别忘啦，"舒曼医生说，"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诺言，答应你在这个黄昏来为你干一件事儿。"他抵制着那扰乱他自己的神经系统和激动他的骨髓的恐惧；此时此地，

他要不是手脚麻利，而且决心已定的话，那将是另一幕的开始。

“我现在上这儿来履行我许给你的诺言，”他跟她说，“而且是我许给你的唯一诺言。”他平稳地拿着注射器，走向她的床边的时候，她躺回到枕头上，温柔地、充满信心地瞟了他一眼。他抬起她前臂的时候，他们互相亲切地微笑。

特雷德韦尔太太坐在她狭窄的铺位中央，好像那是一座岛似的，她在用一副微小的纸牌在一个折叠的棋盘上玩一种复杂的单人纸牌戏。她偶尔从一个小玻璃杯里慢腾腾地喝一小口葡萄酒；杯子里空了一半的时候，她会拿起摆在她身旁地板上的勃艮第葡萄酒瓶，在杯子里加上一点儿。

她穿着一件柔滑的白缎睡袍，有扣钮扣的领子和丰满的灯笼袖。她的头发从额头向后梳，用一根白缎带扎着，她在床上的时候从她四五岁时候起就是按照《艾丽斯漫游奇境记》[①] 中的式样打扮的。然而，从外面用不带偏见的眼光看进来，这场面，她断定，是十足地不体面的。没有桌子和托盘来放酒瓶和杯子，在这个情况下，甚至这个瓶子也是不体面的；利齐的衣服一摞摞到处摆着，跟她撇下它们走出去的时候一个模样；折叠着的衣服全都散发出以麝香味打底的、难闻的、陈腐的混合香味；也许最主要的是，她的生活，或者是消遣，提供了一种逼得人透不过气来的女性的凌乱、歇斯底里的孤独和处处荒凉的气氛。

特雷德韦尔太太离开叫人厌烦的上层甲板的时候，希望有一个清静、隐蔽的所在，可以度过一个由她自在地思想的黄昏，

① 19世纪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1832—1898）所著童话。艾丽斯是女主人公。

尽管她那些想法不怎么样，和早早地上床睡觉，她认为这希望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心情高兴而自信。利齐的习惯是相当靠得住的。她通常要跟那个讨厌的小胖子一起在外面待到午夜后才回房舱；他们被人看到躲躲闪闪地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溜到另一个去，总是格格地笑和尖叫，还不太避人眼目地乱摸。随后，利齐进来，激动得直喘粗气，踢到什么东西；她的笨拙的步子在狭窄的空间里来不及调整；她咔嚓一声开灯，现出她的人形和她的像带电的绳子似的头发；她的眼珠子是藏在难看的小虹膜中的猫的眼珠子。她会踩掉她的皮鞋，踢到一个角落里去，踩下她的薄连衫裙，露出她的穿着粉红短裤和肉色长统丝袜的皮包骨头的长大腿。她掉下了她的刷子，又捡起来，不会忘掉用傲慢的口气模仿着说客气话："真对不起。我希望没有吵醒你。"这种声音像锉刀锉金属那样影响特雷德韦尔太太的神经；经过这样的打搅，要假装还没有给吵醒，简直是荒唐了。

特雷德韦尔太太断定，这个女人是她看见过的人当中最最叫人讨厌不过的活宝。一旦脱掉衣服，简直丑得叫人愣住。然而，她坐在脸盆架上那面斑斑点点的小镜子面前，深深地盯着自己的眼睛看，扭曲着嘴角的时候，居然还有这样的神秘的幻觉：自以为是个美人哩。她一天要拍粉点胭脂六七回，像一个准备面对观众的女演员那样小心翼翼、仔细斟酌地把她的脸修饰得像一个假面具。她像受洗礼似的从一个大方瓶里把麝香古龙香水倒在她的额头上，用香水浸透她的胳肢窝，直到香水从她的肋骨上淌下来为止；她的脸上微微闪着自我专注的笑意；她的鼻子眼扭动着，像兔子的。她的一切谈话无非都是香水啊、衣服啊、她的店和男人啊。她管他们叫"朋友们"。"我认识一个汉堡人，一位真正的绅士，很有钱——一个朋友，"她会忸怩地说，竖起长

在有条条青筋的长脖子上的那颗比较小的脑袋。“我差一点儿跟他结婚，可是现在很高兴没有结，”因为后来他的钱都没有了。

然而，那些朋友并不都是那么不幸的，而且他们一直不惜大把花钱，向她献殷勤，送最贵重的礼；她对他们呼来唤去，任意差遣。唯一的困难是他们人太多了。“一个人有时候不得不选择，nichtwahr[①]？一个人不能跟他们都结婚，真遗憾！”不过，真相渐渐泄漏；他们大多数人是有妇之夫，不过这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要是她表示一下的话，他们全都会随时打破家庭安排。但是，她太喜欢自由了，这是她的麻烦。“我离开我丈夫的时候，他指责我上另一个男人那儿去。‘哈，’我告诉他，‘你把我看作什么人？有五个男人哩。’”她会在过道里这样笑得扭动身子，挥舞双手。“哎，不用说，并不真的是五个，只有三四个，没有一个是认真的。不过，相信我的话，我的婚姻生活是结束了。我打算自己找乐子，可是不再结婚！”

特雷德韦尔太太收起她的纸牌，装进盒子。她折叠起那个棋盘，把它放在一边，抹抹平稍微有点皱的床单和薄毯子。空气中有一股新的寒气；她打了个冷战，闭上眼睛。她干吗记不住在这些偏僻的地方和这种极不舒服的小船上旅行是什么滋味呢？她干吗不能明智地一年到头待在巴黎呢——可不是，哪怕在八月里——巴黎的八月是可爱的——在那儿，她是那么安全，尽管遇上她几乎在任何地方总是会遇到的人，却毫无危险？她的同路的乘客——要是可以这么称呼他们的话——的脸和人影，都一片混乱地顶着错误的姓名；一想到他们，她的脑子里就糊里糊涂，有沉重的压迫感。利齐没完没了地拿他们闲磕牙；她带着可

---

① 德语：对不对。

恶的、做作的、高人一等的神气，用她的叽叽嘎嘎的刺耳的声音一直说下去。

"且听我说，想想看，那个西班牙女伯爵，那个囚犯，你认识她吧？——唷，他们说，她跟那些学生挨个儿睡。他们总是待在她的房舱里，有时候有两三个；他们说，那儿发生的事儿真叫人没法想象。他们说，船长对这火透了，可是他到底能干些什么呢？他会派一个间谍去躲在床底下吗？……还有一件妙极了的事儿；你知道那个坐轮椅的小个子病人吧？唷，你要是不小心提防的话，他就会伸出手来碰你、摸你——这就是说，你要是女人的话。他会假装在给你治病，不管你害的是什么病。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在他那把年纪，一只脚已经踩进了坟墓！还有，你知道那个他们错误地把他安排在里贝尔先生一起的那个糟糕的犹太人。听我说，几天前，他问里贝尔先生：'几点钟？我的表停了。'里贝尔先生说：'是该停住一切犹太人的钟表的时候了。'里贝尔先生说得挺巧妙。他说，他脸上的神情会让任何人开心的。"

特雷德韦尔太太撇开那急促而含糊不清的、像复仇女神那样充满狂热的声音，突然甩掉她的长睡袍，走到舷窗口。清纯的凉风吹拂着她的脸；她张开嘴更畅快地呼吸，感到她刚才在房舱里听到的话脏了她的耳朵。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海洋和天空几乎融而为一；就在下面，波浪在船上的灯光映照下滚滚前进，接着拍打着退回去，现出一片浪花。我该怎么办呢，她问自己，我上哪儿去呢？生活、死亡，她带着模模糊糊的恐惧想着，因为她没法面对那些可能不管多么短暂就要求作出决定、行动和了断的那些小小的迫切的情况。就是这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使她害怕，因为生活和死亡，正确地理解，是带有预示性的、可怕的词

儿，而她永远不会了解它们。生活，她在年轻的时候受到的教导是，应该欢愉、痛快、简单的。未来是一片清洁、纯正的银蓝色的空间，像晴朗的日子里巴黎的天空，在较低的空中有轻柔、飘忽的白云在奔驰和翻滚；一切都是干净利索，像蓝拷贝纸，她童年中一切白色的东西用这种纸包裹的，保持那些东西的白色，使它们更白，使它们具有冰蓝的白色。后来，只要她摆脱了保姆和放了学，她一直是快活和自由自在的；总是有没完没了的爱情——没完没了的爱情。

得了，得了，她说，一边在她的脑子里追溯，事实上，生活相当不称心，且不说有时候是寒碜的话。要是有人管我叫太太流浪者的话，我希望我不会觉得感情受到伤害。我经常遇到恶劣的事情；它们个个都是我自己的过错。起先，我自己去撞上了它们，压根儿不知道它们在那儿。后来，当我知道了的时候，我又总是想，不用说这不是真实的。这自然不是生活。这只是一次意外的事故罢了，像被一辆卡车撞倒或者像被关在一所着火的房子里，或者像被拦路抢劫那样，或者甚至可能像被杀害那样——人们通常的命运跟我的不一样。我真的嫁给过一个那么忌妒的男人，他揍得我鼻子流血吗？我不相信。我从来没有认识过这样一个男人——他还没有出生哩。这事儿是我在报上看到的……不过，我要是对任何事情感到挺害怕的话，鼻子还是要流血的。难道杀害看来会是真的吗，我弄不懂？要不，我会只是说，啊，这也没有发生——对我没有发生！

然而，我被关在这儿邋遢的小房舱里，跟一个不久就要进来的粗俗的女人在一起，她会开始谈她的一件件"私情"。她是个我决不会让她踏进我家的女人，除非给我做头发或者缝新上衣，但是我坐在这儿闻她那种熏得人受不了的香水，还要跟她在同

一个房间里睡觉;我已经喝了太多的酒,玩了三十副单人纸牌戏,一副没有赢过。因为,要是不这样的话,生活——这种生活,这就是生活啊,此时此地这种糟糕透顶、琐碎恶劣的事儿——会太沉闷、太讨厌,叫人一时半刻也挨不下去……

她把舷窗罩放下,重新推平,回到床上去,把她的睡袍拉到大腿上,摇晃着使她的衣袖往下垂,让它们漂亮地折成几折,又倒了一杯酒,她的一切动作是那么平静和有条不紊,像一个女修道院中的姑娘。也许她的一切该归咎于她的有极大危害性的童年。多年前,一个医生告诉过她,有时候,对一个孩子来说,年纪太小而受到太多的爱,是灾难性的。一个孩子怎么可能爱得太多,或者受到太多的爱呢?她认为,那个医生是蠢货。整个说来,她的童年对她来说是糟糕的,这毫无疑问,然而挺可爱。回忆似乎一直流动在她的血管里,活灵活现,和她的生命共呼吸。默里山上的那所老房子是一幢挺美的、宽敞的房子,这她后来才发觉;当时,那不过是她的家罢了。在她的血液里还蕴藏着那些年里一切和蔼、温暖和安全的气氛;日子过得从容舒适;那些奢侈的享受,当时她还不懂得这就是奢侈哩;她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过的嘛。天天在她身旁的人都是轻手轻脚、声音柔和的——她的保姆的声音在说:"真奇怪,这孩子简直太温顺了!"接着是她母亲在回答:"不,一点不温顺——只是性子很好。"

后来,她才知道有这么许多女人羡慕她,因为她年年去法国和意大利旅行,还因为她的少女时期是在法国和瑞士学校里度过的。她并不认为那有什么了不起——在她的记忆中,大部分是那些学校里的叫人不舒服的生活:古板地沉着脸的女教师们、凉水、难吃的食物、管头管脚的校规、在学校的附属教堂里的做不完的礼拜、可怕的试卷,还有跟她那个同寝室的同学一起享受

那些家中寄来的信件和小礼物引发的哭泣或者欢笑所造成的奇怪的乐趣。她们两人都可以对着别人的信件和礼物相当自在地哭泣或者欢笑，好像那是她自己的那样。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来着？她的名字，她的同寝室的同学？好像那是挺要紧似的。好像她甚至可以虚构出一种对这种交往的惋惜，而这种交往却跟烟卷的一阵青烟那样轻飘飘，无足轻重。她开了灯，抽出一支烟卷，试图冲出那毫无道理的忧郁的思想迷雾。

她首次参加社交活动那一年的一切五光十色的舞会和宴会、鲜花和舞蹈都已经飞速地闪过，只剩下一条柔和的微光了。难道那些场景真的有点儿像她现在的回忆那么充满欢乐吗？没有战争的梦——没有变化的梦。她对那段生活的回忆——对她的保姆的回忆，她终于成为她的女佣人，而且一直是她亲近的朋友和知心人，这个老保姆对她的了解远远超过她的父母或者亲属——成为在她脑子里移动的一片温暖的、使人安心的雾，一朵展示希望的云；她早就让她自己跟这雾和云一起睡眠了；她在这段回忆中有她盼望的、她被教导去盼望的初恋的幸福。

时间要弄一切，时间是撒谎者和骗子，但是不能触及那次初恋以前的任何事情；那次初恋把她的生活一分为二，把发生在初恋以前的一切事情密封起来，没有一丝变化，而且据她所能看到的和据她所知道的，是真实的。保存这一切，保存这一切，她的心在说，不管是不是真实，这是你的。她的父亲和母亲要是眼下看到了她认不出她的话，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安详地睡眠在她的躯体内，被爱着和在爱，不是记忆中的容貌，也不是摆着静止的动作和姿势，而是像她的血液那样在她的血管里缓缓流动，像她的心跳、她的呼吸。一切都是真实的，都发生过，

都是她的。直到她二十岁为止，生活——生活，这是个什么词儿啊——一直是可以相信的，因为她越是对生活感到好奇，越是能做到相信它；啊，它很快就抛锚了，然而始终在缓慢地浮动，像一艘在港湾里的船。她错误地爱上了一个人，她的父母亲始终不知道有多么错误，因为他们始终没有看到过他，而她以后从来没有回过家——漫长的梦魇已经来了。十年的这种婚姻生活，接着是十年的离婚生活，阴暗、寒碜、孤独、飘忽，跟其他像她那样的飘零的过客一起坐在咖啡馆和旅馆里，船上和火车厢内，剧院和陌生的房子里；她有半辈子，有半辈子是这样过的，没有真正发生过一件事情。在那段时间里，只有真正发生过一件事情——她的父母亲在一次汽车失事中一起丧了命；她也没有回家去看他们下葬。至于其他一切事情，她都不相信，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

没有一句。要是有一句是真实的话，我无法忍受，她说，重新坐起来。我可忍受不了。我什么都记不得了。啊，我的亲人啊，她对她的父母亲说，好像他们在这个房间里似的，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让这事儿发生了。啊，我干吗不回家呢？我干吗不告诉你们呢？

她伸手拿起酒瓶，举起它凑近灯光。还将近剩下半瓶。那也够了，她断定，要是我喝得快的话。她稳稳地把酒倒进玻璃杯，微笑着。归根结蒂，她不久就会在巴黎了。在巴黎，会有一个人——十多个名字和十多张脸在她的脑子里一一闪过——跟她一起坐在弗洛尔咖啡馆[①]，要不，我们会到化妆品王后的丈夫的高雅的赌场去玩轮盘赌。我们可能输钱，那又有什么关系

① 这是巴黎一家著名的咖啡馆，也供应饭菜。

呢，等到时候一到，就到巴黎中央菜场去喝葱头汤。我们可能在午夜坐着马车穿过巴黎——橐橐的马蹄声在一所所幽暗的房子里引起回声——看装运着蔬菜的、像孩子的玩具似的、老式的小火车笔直地穿过市镇。我们会一再到一个个花摊上去找一种形状极难看的花，它叫什么名字来着？像一个血淋淋的舌头刺在长矛上；然后，他们又坐马车回家；这时候，太阳正把天空染成乳白色，云团和房子都是灰色和玫瑰色的；工人们开始闯进咖啡馆去喝咖啡和白兰地。

我们也会闯进去，我们会互相亲吻，因为我们在一起有这样愉快的时光——第一个会是谁呢，我想知道？——而且是这样好的朋友。我们会望着太阳升起，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似的；我们发誓每天一大清早就起身，要不，就通宵不睡，看日出，因为日出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致。那些是我喜欢的那种简单的、富于人情味的乐事，我能接受的那种；一个居住在巴黎的游客，自然会干这些事儿的。我真的不再住在那儿了；我真的跟那些在圆顶餐厅[1] 里的美国醉汉一个样了；过去我还常常跟我的法国朋友们一起讥笑他们哩。

我要再住在那儿。我要住在那条叫两天使胡同的那个黑沉沉的小巷里；要去买那些小尖头的、仿制的克吕尼花边上钉着宝石的蓝天鹅绒鞋；要在莫里纳化妆品商店买香水；要去看斯基亚帕雷利[2] 的春季展览，她那些丑陋的女模特儿猛地扭动身子，好像她们的行动由按钮操纵似的，在她们每次转身的时候猛拉背后的皮带，互相用恶狠狠的、女同性恋者的眼光瞪视。我要到

---

① 巴黎著名的饭店，经常有世界各国的旅游者在此进餐。

② 斯基亚帕雷利(Elsa Schiaparelli，1896—1973)：著名意大利女时装设计师。

巴黎圣母院去点一支一英尺长的蜡烛[①]，因为圣母让我重回巴黎；还要到尚蒂伊[②] 去看人们是不是把公爵的那本祈祷用的《时间之书》翻到另一页。我喜欢重新到那家在当费尔—罗什罗路上的小咖啡馆里去跟那位容貌俊俏的、年轻的侯爵跳舞——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是圣女贞德的弟弟的后裔哩。我要到巴加泰尔[③] 去帮助半枝莲开放；在寒凉的春天，它们长得半拉子的时候，可怜的东西，僵住了——你所要干的只是松开一个外部的花瓣，它就会在你的眼前开放了！我要重新到朗布依埃[④] 去，穿过那些确实跟当年华托[⑤] 和弗拉戈纳尔[⑥] 看到过的一模一样的树林。然后到圣但尼[⑦] 去再看看那些国王和王后的可爱的白大理石的脚，他们一起赤裸裸地躺在他们的坟上的正式肖像上方的屋顶上，细巧的脚趾头翘起着。

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在巴黎这座城市上空那样的彩虹，也没有看到过那样的雨……我想要知道蒙帕纳斯[⑧] 区的天主教会是不是还在向教区里贫苦然而洁身自好的姑娘们送嫁

---

① 天主教徒为了回愿或其他原因有献蜡烛的仪式。

② 尚蒂伊(Chantilly)：法国瓦兹省城镇和度假胜地，位于法国北部。那里有著名的城堡庭园。

③ 巴加泰尔(Bagatelle)：巴黎西南布洛涅森林里的一个花园。

④ 朗布依埃(Rambouillet)：法国北部巴黎大区伊夫林省城镇，镇旁有著名的别墅和大片森林，是巴黎人喜爱的旅游点。

⑤ 华托(Jean Antoine Watteau，1684—1721)：著名法国画家，风景和人物画兼善，画风以秾丽见长。

⑥ 弗拉戈纳尔(Jean Honoré Fragonard ，1732—1806)：著名法国画家，画风有罗可可风格，后期倾向古典主义。

⑦ 圣但尼(Saint - Denis)：法国巴黎北郊塞纳—圣但尼城市，位于塞纳河右岸。原是以埋葬法国国王和王后的著名隐修院教堂为中心的小镇。现所存法国墓葬雕刻已成为珍品。

⑧ 蒙巴纳斯(Montparnasse)：法国中部偏南 -个区。

妆。我想要知道那些从前常常爬上扶梯，爬到苹果树顶上采苹果的年轻的见习女修士——在那座在我的窗口下的女修道院的花园里——啊，我想要知道她们依靠绿叶蔬菜、苹果和祈祷过日子，是不是已经出落得严肃和忧伤了？……在下一个五月里，我要重新到圣克卢[①] 去看山谷第一批开放的百合花……啊，上帝啊，我想家了。我再也不会离开巴黎了，我许愿，要是这一回你让我再上那儿去的话。要是有一天每一个人都离开了它，青草长在人行道上的话，那仍然是我的巴黎，我还是要住在那儿。我会喜欢整个儿占有巴黎的，哪怕只有一天。慢慢地，在她闭着的眼睑底下渗出奇怪的、幸福的眼泪，她从清醒的梦境中渐渐陷入沉静的睡乡。

"我简直不明白，这儿干吗这么气闷，"利齐说，放下她的头发刷子，又拿起来。"真对不起。我打搅你了吗？这当儿，外边整个海面上，空气可清新极了。"

特雷德韦尔太太睁开眼睛，又痛苦地闭上，转身对墙侧睡。"他们就是要把船造成这个样子的，"她似醒非醒地说。"狭小的房间和房间里狭小的窗洞，还有各种各样的气味……有时候，他们用同样的格式造房子，"她说，觉得合理而遥远。"适合于居住的房子也是很少的，是这个世界造成这个情况的，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是谁？"

"你没有关灯就睡着了，"利齐说，向地板上的酒杯和酒瓶飞快地瞟了一眼。她稍微压低声音，表示信任地继续说，"我喝了一些可口的 Schaumwein[②]，跟里贝尔先生一起。你醒了吗？不知

① 圣克卢(St.Cloud)：法国上塞纳省城市，巴黎西部住宅区。
② 德语，"绍姆魏因酒"，德国制造的一种类似法国香槟的、有气泡的酒。

怎么着,你听起来仍然没有醒？每天,我向他学习新东西。想想看,他是个出版商。我以前倒不知道!”

“多有意思,”特雷德韦尔太太从她的枕头深处嘟囔地说。

“可不是,在柏林。那是一本服装业的新周刊,可是还设有文学性和知识性的专栏。其中有一个叫‘未来新世界’;他约请最好的作家写稿,写同一个题目,从各个观点来估量。主题思想是:要是我们能找到什么办法把所有的犹太人撵出德国的话,那么我们的德国就会被公认为是伟大的,而且未来我们就会有一个自由世界。这岂不是妙极了吗?”

特雷德韦尔太太慎重地保持沉默。也许她这个讨人厌的同房舱乘客最糟糕之处是,她的异乎寻常地粗俗的关于犹太人的谈论。她的谈吐里总是免不了出现这个词儿;不管谈到什么话题,总是会突然冒出犹太人,一种最叫人反感的魂牵梦萦的着迷;听到这词儿,特雷德韦尔太太又不由得难受得浑身冰凉,毛骨悚然。

“撇开这个事实,他,里贝尔先生,是很有知识的,”利齐假笑着,凑到镜子前,刷头发,好像她要把头发刷掉似的,“他有时候是很爱开玩笑的。他是复兴德国业的运动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专业性杂志方面;那个行业几乎已经给犹太人毁掉了。他们正在毒害德国人的思想,里贝尔先生说。我完全同意;我知道,在我的行当中,经营女式贴身内衣裤的,他们到处都是,定价啊、削价啊、改变款式啊、讨价还价啊、欺骗啊,用尽心计控制一切事情和一切人。你不知道,试着跟他们做买卖是怎么回事。要什么花招都算不上卑鄙。”

“一切买卖不都是卑鄙的吗?”特雷德韦尔太太问,又转过身去,打了个呵欠。“难道不是人人都在欺骗吗?”

“啊，特雷德韦尔太太，那些老派的社会主义分子才说这种话的；一切买卖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利的腐败行为。不，压根儿不是这样！至少在德国，只有犹太人在这么干。这才是德国的商业和金融的毛病，里贝尔先生昨天黄昏在晚餐桌旁这么说的。”

“能跟有知识的人作伴一定是极愉快的，”特雷德韦尔太太用德语亲切地说。

利齐把眼光转到她的身上，现出迷惑不解、表示怀疑的神情。特雷德韦尔太太闭着眼睛，她的面貌上看来没有一点儿异样的表情。

“啊，可不是，自然喽，”利齐尴尬地停顿了一下以后说。接下来说：“你的德语美国口音真的着实不轻，我起先还明白不过来哩。最好的德语当然是我自己的老家汉诺威的；你以前没有去过汉诺威吧，我想？”

“只去过柏林，”特雷德韦尔太太耐心地说。

“你要是只去过柏林的话，那你永远学不到好德语，”利齐说，一边尽性地在双手上抹油，接着戴着一副肮脏的大棉手套，“也许你听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举个例子吧，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尽管装出一副派头，讲的德语带着糟透了的慕尼黑人的口音；船长是按照柏林人的讲话格调讲德语的，发音蹩脚；那个事务长讲的是低地德语[1]，数他最差劲，只有那几个从哥尼斯堡附近来的水手比他更次，他们讲的德语跟波罗的海[2]沿岸的农民

---

[1] 德国北部方言。

[2] 波罗的海是欧洲北部的内海，介于瑞典、丹麦、德国、波兰、俄罗斯、芬兰之间。哥尼斯堡位于德国北部，濒临波罗的海。

几乎一个样!"

特雷德韦尔太太的头好像在慢腾腾地旋转,她的眼睑后面的黑暗中充满火星。她想要听到的是——但愿上帝让她活着再听到——在巴黎的每一条街道和小巷、每一个广场、公园和阳台上的巴黎人的说话声,从蒙马特[①] 到圣奥诺雷大街,到圣热尔曼-德-普雷,到梅尼尔蒙当,从蒙圣热内维埃夫[②] 的学生们到卢森堡公园[③] 里的孩子们——巴黎人讲话,各种口音都有,从上萨瓦[④] 和米迪[⑤] 到鲁昂[⑥] 和马赛[⑦]。她希望她不妨丧失知觉,到了那里才恢复;她希望她不妨一直睡着不醒,直到航程结束,要不,喝个烂醉,一路人事不省。难道这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要响上整整一宿吗?

"甚至里贝尔先生,"这个声音说,这会儿是从上铺传来的,"甚至他是曼海姆人,可他的口音也有一点儿土——只有一点儿。"

说话声更近了,特雷德韦尔太太睁开眼睛看到一颗黑沉沉的小不点儿的脑袋像响尾蛇的,在铺位上空一侧摇摇晃晃;那张脸一片模糊,在用矫揉造作的文雅的声音,汉诺威人的口音,向下说话。"至于那个高贵而了不起的威廉·弗赖塔格先生,他对他的牛津英语感到自豪,可是说到他的德语——嗨,真是难以解释,可是他的出言吐语有一种小小的古怪的特点,不是真正德国

① 蒙马特(Montmartre):法国巴黎一个区,以咖啡馆和夜生活闻名于世。
② 蒙圣热内维埃夫(Mont-Ste.-Geneviève):巴黎大学总部所在地。
③ 卢森堡公园(Luxembourg):巴黎市中心公园。
④ 上萨瓦(Haut Savoie):法国罗纳-阿尔卑斯大区一省。
⑤ 米迪(Midi):法国南部地区。
⑥ 鲁昂(Rouen):法国北部港市。
⑦ 马赛(Marseille):法国东南部港市,法国第二大城市。

人说话的方式。再说，他的话，意义都是恰当的，你听得懂，可是用的是糟透了的土语……里贝尔先生说，他认为那是意第绪语[1]，你能想象吗？真的，他不吃任何方式做的猪肉，也不吃牡蛎……我们说到犹太人的时候，看到他的脸上有一种表情。对一个正常的德国人来说，这种表情不对头。所以总而言之，里贝尔先生和我——并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认为他是犹太人。而且还在船长的餐桌上就餐哩！还有比这事儿更丢丑的吗？”

“不用费力气去找，”特雷德韦尔太太说，“还有许多事儿哩。事实上，我能想到许许多多。”透过酒意、睡意和厌烦造成的迷雾，她突然彻头彻尾地清醒了，觉得完全胜任至少清除这个女人的有毛病的脑子里一个小小的区域中的混乱状态，她的脑子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的那样丧失理性和烦躁不安。“你完全错了。弗赖塔格先生的妻子是犹太人，他不是。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非常爱她。所以你瞧，”她亲切地、得意扬扬地说，“你并没有被玷污的危险。”

“这是他亲口告诉你的？”利齐用被震惊的嘶哑的声音悄悄地问，“你跟他关系这么好？嘿——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喜欢犹太人吗？”

“不特别喜欢，”特雷德韦尔太太说，望着舷窗在晃动，像一个装满了暗沉沉的、像被催眠了的天空的蓝球那样。“难道我应该喜欢他们？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你应该喜欢吗？啊，我亲爱的特雷德韦尔太太，你怎么可能变得这么逗，像一个小孩，”利齐叫起来，她打了两个神经质的嗝儿来证实她的话。“啊，你们这些美国人走遍世界，可是始终

---

① 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

什么都不懂得！你应该喜欢吗？啊，你这话能说明什么意思？”她头斜着，等待回答，最后听到下面铺位上传来一声听天由命的、疲劳的叹息。在这以后，一片寂静，直到天明。

晚餐后，蒂勒船长上腹部还不舒服，又窝着一肚子不满意的怒火，在主甲板上进行仪式性的、一个人的巡视。他在喝汤以前背过一段短短的谢恩祷告，勉强按捺住性子坐在那儿，等候别人吃完，他希望能成功地掩饰他对他的客人们表现的那种狼吞虎咽的急相的厌恶。在及早上床睡觉以前，他需要透透新鲜空气。

出人意料的、所以是叫人恼火的唱歌声，还有跳舞声，倒不如说是有节奏的蹬脚声，把船长引到船尾，向下面统舱甲板望去。下面那些人在这个早晨看来还是半死不活的，这会儿，据他判断，显得有一点儿精力过剩。他们已经从他们的一个个包裹中取出，不是衣服，也不是家庭用具，当然不是，船长带着更深的轻蔑想着，而是破旧的吉他和快散架的手风琴，还有许多磨破了的骰子盒和破烂的纸牌。女人和孩子们黑糊糊，不成模样，像一堆堆垃圾，又走回来，形成一个挤得密密匝匝的圆圈，默不作声；老人们在他们面前坐成另一个圆圈；中心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体育场。

态度优美、筋骨灵活、肚子没有填饱的小男孩们——船长尽管不愿意，却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技艺看来是多少受过训练的——互相在摔跤，他们的动作是那么灵巧，简直像在跳舞；但是他们被撺掇着，在证人们发出的喊叫和催促双方立即杀死对方的鼓励声中，好像在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成年人围成一个圈，或者面对面排成两排，跳着怪模怪样的穷乡僻壤的舞蹈，关节嘎嘎的响，脚步直挺挺，然而他们骄傲地

抬起头，挺起胸膛，一起随着节拍和不断的鼓声移动，他们的脸色严肃。不过，其他的人蹲在他们慢腾腾地进行着的事关重大的赌局前，每个人放下他那张油腻的纸牌的时候，好像他的脑袋也一起跟着去似的，在扔骰子的时候，好像他那条命也扔出去了似的。每个人把他有的东西拿出来下注，从一条磨损了的颈巾到一盒火柴。

懂得不应该开口的小男孩们被允许坐在女人们的面前，但是跟那些成年人隔开着一段距离，表示恭敬，察看和认真注意这种适合于男子汉气度的行为。在几乎非悲伤所能形容的绝望的歌声中，传来平板、刺耳的说话声，而声调甜美的吉他声用轻浮的、使人心碎的嘲讽模仿那些声音；偶尔有皮靴跟发出嗒嗒声、喀嚓喀嚓声和噼啪声，好像在赶集的日子里的闲聊。

船长喜欢的作曲家是舒曼[1]；舞蹈呢，除了真正的维也纳华尔兹以外，别的他一概不喜欢；他感到他的耳朵和他的神经系统正在受到最放肆的骚扰；因为毫无疑问，在这些野蛮的节奏中，有一种奇怪成分促使血液流动，甚至反对一切意志的努力；说真的，他认识那是一股什么力量，就是那种永远在发挥作用的、对抗文明精神的黑暗和混乱的原始力量；文明精神就是伟大的德意志生命力——船长感到有一点高兴了——在这种精神中，在基督教义的统治下，科学和哲学携手并进。他往下盯着看，免不了会瞧不起那些肮脏的畜生，然而，看着整个景象，他不得不公平地承认其中有一种条理和秩序；甚至他的十分挑剔的眼光也找不出有任何真正的危害，只有允许这样的人们有任何一点儿自由才有危害；某种危害是自然而然地、天长地久地隐藏在任何

① 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0）：德国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

人类的景况中的。也许统舱中的那些乌合之众的兴致是酒引发的。允许卖给他们的啤酒是限制数量的,不过他们哪儿来钱买呢,船长想不出。他听人说,那伙人当中没有一个身上拿得出十个以上的古巴比索。但是,在望弥撒的时候发生了那场打斗以后,处处流传着谣言,那个挑起纠纷的胖子不但是个劳工鼓动分子和无神论者,而且是个非法贩卖烈酒的家伙;传说他在哈瓦那把大量恶劣的甘蔗汁制剂[1] 带上了船,你简直没法管它叫朗姆酒;他悄悄地、廉价地分别出售,希望吸引追随者和门徒。对违禁品的搜查一无所获;也许谣言只是谣言而已,船长断定。不过,这些家伙——不比四只脚的畜生好多少——说真的,是不是比它们差一些还是个问题哩——一下子显得这么精力充沛,可不是好兆头。航行出发还不久,特纳里夫岛圣克鲁斯市看来还远着哩;最后,总是使船长心烦、恼火、厌恶的是,看到下层阶级过得愉快,尤其是他们在他自己的统舱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对白天那场风波的预感重又突然迅猛地涌上他心头——眼下可不是抱前景美好的乐观想法的时候。看看表,他决定采取一个明智的措施。他在驾驶台上下达命令,一直传到那个执行命令的人那儿,他提前两小时关掉下面甲板上所有的灯光,只剩下主要的两盏,一前一后亮着。

这个办法并没有像所想望的那样马上见效;那些统舱里的乘客在黄昏并不经常用灯。他们常常在月光下玩纸牌,在星光下跳舞也不是头一回。那些仍然疲倦、身子比较弱的人最后撑不住了,脸朝下,睡在人群边上。有几个母亲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软绵绵地倒在帆布躺椅上,把她们的娃娃换个睡得更舒服的

[1] 指劣质的朗姆酒。

姿势。渐渐地，叫声越来越少；歌声，声调低沉的，越来越多；最后，只有哀婉的吉他声，像远处树林里昏昏欲睡的鸟鸣。

吉他声也渐渐消失了；一小群人围着一个人，他穿的衣服像稻草人穿的饱受日晒雨淋的衣服，人瘦得皮包骨头，走路歪歪斜斜，他的boina[①]斜戴在一只突出的耳朵上，显出一副不落俗套的派头。他狭窄的脸上尽是皱纹，长着一个突出的下巴，他张开没有牙齿的大嘴，唱观众向他点唱的即兴创作的对句。他们为他清出好大的一个圈子；当他垂着头，眼睛注视着他自己的脚，用雄浑、低沉的嗓音唱一首行吟的歌曲的时候，他们拍着手。有人会叫出一个题目，或者词儿，他就对自己咕哝一会儿，接着突然一声长鸣，唱出他的歌词，还跳着慢悠悠的、拖着脚步的舞蹈，向前向后，配合着双手拍出的节奏，跺着脚。他的听众会向他发出欣喜的尖叫和喊出愉快的双关语；他会采用那些双关语，化出更妙的词句。

表演没完没了；那个当班的年轻船员一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下面的场面，好像在盯着一个熊窟看似的；他打定主意，除非另有命令，他可以不过问这一切，绝对错不了。尽管他的航海训练和职业实践是牢固地以一条教条为基础的：不服从他的上级就是不服从上帝——而且还要危险得多——然而，在他身内最远、最深、最暗和最受抑制的地区，保留着一个态度捉摸不定的部位，这时候，从那里一下子偏激地闪现出一个大逆不道的念头：船长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惊慌失措，不是太沉不住气了吗？他眼前浮现出船长想到统舱里那些无害的可怜虫吓得浑身是汗的景象。

---

① 西班牙语：贝雷帽。

这当儿，他注意到几个在黑夜中转悠的头等舱乘客，便像鬼魂似的赶快默不作声地走开。这一天，他应付的乘客已经够多的了。这几个倒并不打他的主意，只要他能知道就好了——珍妮·布朗在跟心烦和焦虑作斗争，胡滕两口子和他们那条叭喇狗贝贝在跟晕船和失眠作斗争；人人都在从海上吹来的清新的阵风和昏昏沉沉的黑暗中寻找摆脱他们自己和互相摆脱的方法。对那个年轻的船员来说，要逃避他们，想闯进他的个人天地，他在拥挤、漫长、然而无时无刻不存在威胁的白天中极难得有的自由自在的单独的时刻的意图，倒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他已经根据经验知道，只要他们在场，他就愤慨、憎恨，只要可能就飞也似的避开。他对那些对航海一窍不通的男乘客没有用；他在跟同他自己职位和级别一样高低的海员中间找到权利和合适的友情；至于单身的女旅客嘛，他怕她们，因为不管她们起先看来可能是多么和蔼可亲，一旦要抓住你，就像螃蟹那样伸出尖利的爪子。他知道，这一切影响到他的饭碗问题。乘客们都是这样的，都是无可救药地这个德行，没法挽救了；要是他们不乘他这艘破船的话——他为这艘普普通通的"真理号"感到羞惭，费尽心机要另谋高就——那么，他以前被教导应该看作是高尚的他的这个职业甚至也无法存在了。但是，这个事实却没法改变：他一看到那些乘客，不管什么路数，一概厌恶；装作不是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船上有一个相当标致的美国女人，也许有四十岁吧，一位特雷德韦尔太太，她看起来挺不错。他渐渐开始对她产生好感；他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她甚至没有向他瞟过一眼，她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他喜欢这样的女乘客；不像那个一身味儿的西班牙女人，总是想方设法地缠着他。他已经订婚了，而且

对这门婚事挺满意;那个姑娘他从小就认识的,所以不会使他吃惊,或者说,是他希望的那样;一个男人上岸后,总该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去嘛。他不知道的是,没法想象的是,而且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是,珍妮和胡滕两口子也完全不知道他在场。冷漠和含蓄是他的性格——不是他们的。

在这次意外的相会中,胡滕太太有意对这个美国姑娘友好一点儿;这姑娘,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说真的,甚至她交叉着手指头坐着默不作声的时候——对她来说,总是看来古怪、不可理解、难以接受的;但是,她的天生的和气的性子还没有完全被压制住。归根结蒂,她丈夫先前在那天黄昏时安她的心说这次航行有个终点的时候,珍妮对这一家子的晕船深表同情。

"我们自己的不舒服倒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啊,我们可怜的贝贝,"胡滕太太说。"起先,它好一点了,后来,更不好了,"她惊异地说,好像这个现象是完全违背自然的。珍妮并不表示惊奇,只是探出身去,在贝贝的两只耳朵中间轻轻拍拍。她直起身子的时候,向左右瞟了一下,先看到戴维,好像躲藏在甲板的一边,而格洛肯先生从甲板的另一边走近来,显然已经看到他们,急着跟他们会面。珍妮试着暗自假装她一个也没有看见,更确切地说,试着装出一副跟她毫不相干的模样。

格洛肯先生,比往常更痛苦,因为服用麻醉剂而昏昏欲睡,眼花缭乱,但是睡不着,怀着希望走近他们,好像他盼望从他们得到缓和和帮助似的。他们全都高兴地招呼他;当他说不应该去睡觉,辜负这样的空气、这样的海、这样的月光的时候——"尤其是,"珍妮表示同意,"躲在那样气闷、邋遢的小房间里,辜负它们。"格洛肯先生出于好奇把注意力转到珍妮身上,因为那个奇怪的年轻人戴维·斯科特,她的情人,把她更像妻子或者妹妹或

者情妇那样对待;他一次也没有跟他的同房舱的乘客提到过她。当他伸出两条胳膊,把他的下巴搁在栏杆上的时候,珍妮在重复着说,人决不应该把月光辜负在任何地方的睡眠中,尤其是不应该辜负在船上——更尤其是在大西洋上……她以前没有到过别的海洋上,只在加勒比海上航行过,在那些避暑的岛中间穿来穿去,还到过墨西哥;难道他没有发觉大西洋更叫人难忘?连这艘船好像也知道,它在更大的海洋里,有时候像条海豚那样顽皮,等等,等等。她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好像在对她自己说话似的,时不时地向旁边瞟上一眼,向左边。格洛肯先生不难知道她不是在跟他说话,知道她不愿让他说一句话,知道她不会跟他说什么将来可能会引起他回答的话;所以,在她停住透一口气的当儿,他就说:"啊,可不是,确实是这样,布朗小姐,"用的是英语。珍妮转身,看到那个矮得像个侏儒的人向她鞠了一个躬,两个脚跟稍微喀的碰了一下,毫不犹豫地扭转身去,她认识到她干了些什么。

"啊,恐怕我伤害了他的感情,"她几乎悄没声儿地跟胡滕太太说,后者避开去,看来神情慌乱。胡滕教授先生以宽慰的话语插进来。"你用不着太折磨自己,我亲爱的小姐,"他在他妻子稍微垂着的头的上空说。"有不可治愈的肉体缺陷的人们,尤其是天生的缺陷,总是毫无例外地对别人的态度表示出过分敏感,在社交性的场合,而且特别是跟异性有关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你简直不可能避免在不同的场合损伤这样的人,不管多么无心……"

"我只是不要他挨近我,"珍妮说,几乎要掉眼泪了。"我对他有一种恐惧!"

"我认为,他现在对这已经习惯了,"胡滕太太温和地说。她

拉紧贝贝的皮带，挽着她丈夫的胳膊，当他们慢腾腾地走开的时候，她说："哎，得了，我们一定要再去试试看，睡上一会儿！明儿见。"

"明儿见，"珍妮说，第一回注意到胡滕太太稍微有点儿瘸。珍妮感到一阵恐惧：胡滕太太是天生瘸腿呢，还是一次意外事故造成的？她接着想，自己一定在变坏；她以前从来没有对畸形和病痛反感过。她这是怎么啦？难道戴维以为她跟弗赖塔格先生，也跟格洛肯先生调情，而且，跟船上任何人都调情吗？她慢腾腾地向她刚才看到戴维的方向走去，打算一看到他，就用两条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吻他，说："明儿见，宝贝儿，"因为她压根儿控制不住她对他的一阵阵势不可当的柔情蜜意。然而，她却又坚决地离开了甲板，穿过船而，走到下面通往她的房舱的长长的过道，希望埃尔莎已经安稳地睡着了。

戴维匆匆看到了珍妮和看来是她结交的新伙伴一眼，吃了一惊，就回转他的房舱，衣服也没有脱，躺倒在铺位上，熄掉灯，交叉双手，手掌向上，轻轻地摆在眼睛上。她还有谁合不来呢，他想要知道。她简直会跟任何人一起跑掉——要是一个乐队在街上一边演奏，一边走过的话，她会拔起脚，踏步走，跟他们一起前进……会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谈任何她喜欢的事情——她到底真的看到过一个陌生人吗？任何人说话她都要听，不管是最无聊、最愚蠢的胡扯，还是最明智的谈话，她都一样感兴趣——对胡扯还更感兴趣哪，真他妈的！只要在叫花子面前走过，就没法不施舍；她的家里尽是迷路的猫和狗——她离开的时候，都送给了那些不需要的人。她会坐着，神情热切地听那个乏味的大个子埃尔莎唠叨个没完——好像埃尔莎在讲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情。她挺身而出，跟罢工的工人们一起值警戒哨，甚至不问他

们为什么罢工，要不，甚至不问他们是在哪儿上工的。“纸烟厂，我想，”有一夜，他进来发现她筋疲力尽，在喝热牛奶的时候，她说，“我今天减轻了五磅，”她跟他说，自赞自夸。

“到底为什么呢?”他问。“为了乐趣，”她说，懒得跟他解释什么。然而，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跟珍妮这么亲近，几乎心心相印，爱得她一往情深，她可以为他干任何事情，可以让他知道任何事情，不管多么荒谬，或者说他这会儿相信是这个情况；那她干吗拒绝成为他缺乏的那部分呢，有了那部分他就是完整的了——她干吗那么奇怪和撒野，使他们不可能一起生活呢? 他第一次痛苦地想到，珍妮跟任何人，跟每个人好像都是以最简单的关系相处的，只有他除外。他又想到那个格洛肯窥探他的私生活，跟珍妮拉近乎，使他不寒而栗。他惊奇地发现他讨厌死了格洛肯。天知道珍妮会跟他说些什么，他会对她产生什么印象；他可以想象，格洛肯在他的弯弯绕的歪脑筋里对珍妮的低下、轻贱的看法——

灯光突然亮了；格洛肯先生出现，嬉皮笑脸地像个侏儒。“啊，还没有睡着?”他说，几乎马上又接下去用戴维认为忍受不了的亲密的声调说，“我得先告诉你，你的未婚妻是个多么可爱的年轻小姐，要不，我没法上床休息……我们刚才在甲板上交谈了一下，”他说。“她真讨人喜欢。”

戴维有一下绝招，能一下子沉下脸来，默不作声，这沉默长得远远超过说话的人停住嘴盼望有个回答的时间，表示出比言语强烈得多的不同意和不喜欢的态度。房舱里的空气这时候随着沉默变得冰冷，戴维起身，从容地脱衣服——不过，省掉了刷牙；当着这个讨厌的陌生人的面干这事儿实在太滑稽了——重又关灯，面对墙壁，憋着一肚子火，火得每一根神经都在嗡嗡叫，

每一根纤维都在跳动。过了好久，他才安静下来，睡着了；在睡梦中，他一再强烈地抽搐，但是，格洛肯先生过了更多的时间后才睡着，感到困惑、刺痛、莫名其妙。他原以为，能跟珍妮说说话，即使她粗暴地怠慢他——到底谁需要知道这事儿呢？——会被认为是跟她的情人的愉快的友谊。他本来觉得用法语“未婚妻”代替他脑子里的那个虽然更正确、然而音乐性较差的德语中的词儿，是文雅、符合人情世故和正确的，但是，他跟那两个年轻人的关系变得样样不对头了，他不得不更小心谨慎了。他认识的美国人不多，而且只限于那些在墨西哥的；他始终对他们不了解，他也并不特别设法了解他们。但是，这两个看来有点儿不一样，因为他们讲西班牙语，而且显然过着放荡不羁的艺术家生活。不管她的礼貌多么差，仍然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女人；格洛肯先生想不通，她看上了那个古怪的、坏性子的小伙子什么。最后，他睡着了。早晨，他精神很差，指名道姓地要求丹尼，请他把他的药递给他。

水手们又出动了，上上下下地清洗甲板；“真理号”在坚定地向加那利群岛开去，甲板在微微晃动；只有一两颗脑袋从它的舷窗里探出来，观赏月光和海水中间的天长地久的私情幽会。佩佩又把他的房舱让给了阿尔内·汉森，这会儿，看看表，作出判断，哪怕是为了钱，安帕罗给这家伙的时间也太长了。她以前也跟别的男人干过这样的事儿，常干；不知打了她多少回也改不了她这个习惯。不管怎样，他会再试试这个办法，不过不是现在，要等到他们在比戈[1] 上岸以后；在那儿，她可以爱怎么尖叫就

① 比戈(Vigo)：西班牙西北部港市。

怎么尖叫,不会引起人们注意了。他踮着脚,在水手的水桶和刷子旁踱来踱去,接着站在栏杆的墙压顶上望着统舱的甲板。看来好像人人都已经安置,睡得还挺安稳。这个景象使他大打呵欠。有些人直挺挺地躺在帆布躺椅上,有的就倒在硬邦邦的光甲板上,另外一些人像蜗牛似的蜷缩在吊床里。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横躺在他的吊床上,脑袋垂在一边,两只弯着的、肮脏的、光溜溜的大脚板垂在另一边。佩佩对他们大伙儿很熟悉,他是阿斯图里亚斯人,跟他们很相像;可不是,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跟一个安达卢西亚人很亲近,但是跟下面那些人中任何一个都不!他要是跟他们一样愚蠢的话,这会儿就会跟他们睡在一起了,要不,就会在西班牙哪所肮脏、凌乱的小屋里,跟虱子和跳蚤作伴。他激淋淋地打了个冷战,好像一条蛇在他光着的脚上爬过。所有的喊叫、跳舞、打斗、诅咒的阿斯图里亚斯人就像他记得的童年时的那些人,这会儿,大多数躺在比较安静的安达卢西亚人和加那利群岛人中间,姿态像排得很好的尸体;在鬼气森森的月光下,盖在人身上的被单使他们显得好像在等候被送人陈尸所的死人。佩佩挑中了那个头和脚都垂在吊床外的人,熟练地把点着的烟卷弹到他裹着腰部的干衣服的折缝中去。这会把他弄醒的!

三条人影马上跳起身来;其中一个,佩佩记得是那个唱起歌来像公牛似的大胖子,找到了烟卷,用手指头把它碾碎。他对上面那个在栏杆上的身材细瘦的人影摇了摇拳头。"乌龟!"他愤怒地用滑稽的墨西哥口音喊叫;这时候,他认出了那是开船的那天他看到的那几个到处转悠的靠女人吃饭的人当中的一个。他改变声调,变成强烈的嘲讽。"杈杆儿!"他说。"下来,我们来……"

接着，别人醒了，纷纷加入，发出一片吵闹声。佩佩担心地回头瞟了一眼，看到水手们听到了吵声。其中一个向他走来，当然没有威胁意味，但是步子稳健、平静，像一匹马那样迈着大步，只是来执行任务，查明出了什么事儿。佩佩从压墙顶旁踱过，像天鹅那样文雅但是速度快得多，向相反方向溜去。

他发现安帕罗在刷她的乱糟糟的头发，她那张像被咬过的嘴上的唇膏一塌胡涂；下铺跟往常一样乱作一团。"怎么样？"他说。在沉闷的寂静中，她向后面点点头。他拿起带一股污浊味儿的枕头，发现那儿有几张凿凿可靠的钞票。"钱多了一些，行，"他说，把钞票捋平，点数。

安帕罗皱起眉头，说："这钱也不容易挣，告诉你。那家伙不断地说：'多干一回加五块！'他要他的钱花得值得。"她旋开水盆的龙头。

"你在干什么？"佩佩问，开始脱衣服。

"我要洗一洗，"她说，仍然皱着眉头。"我脏。"

"别洗得太久，"他说。他的声调像个信号，使她微微颤栗；她兴奋得肌肉抽动。她在一块毛巾上擦上肥皂，开始擦洗她的身子；他没有好奇心地望着她，然而她的两只手在她自己的全身移动的时候，他的眼光热切地跟随着。他脱得精赤条条地躺下去。

"你刚才干了好一会儿哩，"他说，"哪怕是为了钱也干得够久的了。"

"别烦我，"她说，"我刚才已经把原因告诉你了。"

"别烦你？"他微笑着说。他很快地、毫无声息地起身，在她的肩胛骨的平坦部位大模大样、结结实实地揍了她一下，这一下揍得人好不疼痛，但是不会打出青肿。然后，他用一只手抓住她

的颈背,狠狠地摇她,另一只手从她的脊背上摸下去,最后揍了一拳。她的眼睑垂下了,她的嘴变得丰满和滋润,她的奶头变硬了。"喂,快点,"他说。

"我快不了,"她装出一副痛苦相,卖弄风情地说,一边用一个很脏的羽绒粉扑在身上扑粉。"我累了。"

"不会太累的,"他说,拿过那个粉扑,把它扔掉。"这么说,你样样都让他干了,自己也玩得昏天黑地了吗?你要我打断你身上的每一根骨头吗?"

"他简直像条公牛,"她说,"你把我当作什么人啊?"

她站在铺位附近。他抓住她一个手腕子,胳膊轻轻一转,就拉得她站不稳身子;她整个人轻易地倒在他的身上。他们的柔软的舞蹈者的大腿一时间扭在一起,像一窝蛇。他们互相用力嗅,轻轻地啃,舔和咂对方的肉,发出小小的欢乐的呻吟,探索肉体的各个部分的气味、滋味和感觉;他们的身体柔顺地用影片的慢动作节奏演出了动作像芭蕾剧那样复杂的全部节目。他从来不想望跟她作爱,除非她刚从另一个男人怀里出来,身上充满着奇怪的气味和热气,兴致勃勃,浑身烦躁,准备着接受他和他对待她的一套套特殊方式。自从她认识他以来,她知道只有他这个男人还能给她一点儿快活,而为了要使她自己快活,她只要让他使他自己快活。她跟那些只有买卖关系的男人的乏味的起落和冲撞中,像一个吝啬鬼那样节省自己的精力,而在佩佩身上,不惜卖足力气;他像猴子那样耍花样,像蛤蟆似的冷冷地控制着持久力。佩佩常常打她,是出于忌妒,他说,在他怀疑她对另一个男人有一些好感的时候。但是在打她以后,他接下来就跟她狠狠地干上几个钟头,直到他们的骨头几乎都要在美妙的筋疲力尽中散开似的。他可以爱怎么揍她就怎么揍她,因为她对他

给她的快活从不厌倦。

佩佩从她身上取走比索、法郎、美元：不管什么钱，一个不留；在这件事儿上，他是铁石心肠，绝不手软的，因为他在攒钱，打算在马德里开一家他自己的小小的夜总会；安帕罗，只要她还支持得了，将会是那儿最有吸引力的舞女；他经常抑制着怒火不动声色地威胁她，要用种种残暴的方式干掉她，他的话说得太凶了，所以她知道他不是当真的；她确实也在攒钱。在墨西哥那段不顺当的时期里和在这儿船上，安帕罗一直向佩佩隐瞒一部分她的钱；他要是知道的话，至少准会把她掐死的；安帕罗打算有一天完全靠她自己成为明星，到各处去旅行，像伟大的帕斯托拉女王那样名利双收。

船长对那些缓缓传到他耳朵里来的谣言越来越恼火，他简直不知道那是怎么传来的；他对那些对立的流言几乎无从分辨，直到在他孤独地待在驾驶台上的时候，流言开始在他的脑子里纷纷活动，搅和在一起。这些流言在他耳边低声细语，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女伯爵在她个人房舱的生活，不知道还能不能管它叫私生活，那些学生无时无刻不在分享她的生活哩。船长生气地反复考虑着一个念头：派一个女服务员到那儿去监视；但是，他知道没法找出一个多余的女服务员来执行这个任务。他时不时犹豫不决地想到，在余下的航程中把她关在她的房舱里，但是除了用强制的手段外，他办不到。一想到这个主意，他吓了一跳。他从一个人那儿——是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吗？一个很古板的女人——听到，女伯爵歇斯底里地缠着舒曼医生，他为了控制她，麻烦着实不小哩。得了，舒曼医生眼下是她的医生，让他听天由命吧。船长认为，被一个高贵的身子拥抱和扑在他身上啼哭，算

不上太不幸的命运。后来,船长尽可能说话谨慎地问舒曼医生他的病人干了些什么,他说:“的确很好。她决定在床上躺几天。她在看书。”

船长希望掩盖他的惊奇。“看书?她?看什么书?我真纳闷。”

“《侦探小说》,”医生说。“那些学生从船上图书馆里借了带给她的。她跟我说,船上的藏书不错。”

船长有点恼火地说:“我没法想象那些书是从哪儿来的,除非是乘客留下的。”

“有可能,”舒曼医生说。“不管是谁留下的,我表示感谢。几天前的一个夜晚,她紧张过度,撑不住了;我已经决定给她一套规定饮食和休息的养生法。她看那些侦探和凶杀小说了,后来跟一个或者另一个学生下棋;我在夜晚给她服一点儿镇静剂……我现在对她的情况比当时希望大得多了。”

船长警惕地说:“这么说,你认为那些学生时时刻刻在她身旁,并不扰乱她的神经喽?”

“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医生说,“他们使她快活。他们是态度粗暴、嚷嚷咧咧、不值得尊敬、无知无识的——”

“我听到他们在餐桌旁大声的讨论中,”船长说,“提到过尼采、歌德、康德、黑格尔、叔本华。”

“啊,可不是,”医生说,“他们都进了大学。”

船长偶尔邀请医生到他的住所去喝一杯下午的咖啡或者晚餐后的茴香杜松子酒,跟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可以看作是一个同等的人作一次小小的尽管始终含蓄、但是有趣的交谈。船长并不真的喜欢跟同等的人交往——他懂得眼睛不是最好向下看鼻子,就是向上看眉毛。他希望从医生那儿发现乘客中有

任何不安分和离奇的情况，这种情况他自己难以有时机和机会发觉。譬如说，似乎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这并非什么人的过错，他认为，要么是那个事务长，然而！不，甚至也不是他的过错……在他的整个航海生涯中第一次，在他这一辈子中确实是第一次，他了解到，他相信，传言是这样的，说他天天跟一个犹太人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就餐。舒曼医生是不是偶尔听到有关这事的风声？

舒曼医生轻松地回答，他两三天前听到过类似这事儿的说法，不过消息的来源很不可靠；他的语调似乎在说："是那些女士，愿上帝保佑她们，那还用说，可是别听她们的。"他甚至不屑隐瞒自己的想法，说他一点都不关心弗赖塔格是不是犹太人，而且他认为整个问题不值一提。他把时时刻刻在各种话题上肆无忌惮地表示意见看作是一种自我放纵，如果确实不是喜欢恶作剧的天性流露的话。舒曼医生在登上这艘船以前，已经有许多回，跟许多人在这个叫人相当扫兴的话题上纠缠过了；他对此有一点儿厌烦了；他感觉到不再有力气跟那些希奇古怪、缺乏理性的脑子里的想法作斗争了；那些想法无法捉摸、无从把握，像烟雾那样飘渺。

船长知道医生由于职业的关系，不愿支持哪一方，才持这样的超然态度：归根结蒂，船上个个人都可能是他的病人，他不能按照个人的好恶作出任何选择。然而他尽可能得体地向医生暗示，在他特殊的处境中，他一定知道形形色色的人的许多情况。"教士们啊、律师们啊、医生们啊，"他真诚地说，"一定会有多少秘密向你吐露的！我不羡慕你，真的。"这个暗示相当露骨，所以医生会找出一条途径，把任何丑闻、怪事和可能需要纠正的不妥当的行为传递给船长。医生并不假装听不懂，他只是不理睬这个建

议,和颜悦色地谢绝了再喝一杯咖啡,几乎难以察觉地转换了话题,很快就告别了。船长又涨红了脸,心神不安,恼火,打定主意最迟在明天着手解决这个含含糊糊的、不恰当的事态,不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医生使他产生了一个不舒服的印象:他,船长,在听女人们的流言蜚语。嗨,这是一个,严格说来,在男人间解决的问题,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把女人们排除在外,不让她们参与。讨厌的事实仍然没有改变,是女人们挑起了整个事情的:那个美国女人特雷德韦尔太太告诉了利齐·斯波肯基克小姐她从弗赖塔格先生那儿听到的悄悄话;利齐告诉了里贝尔先生;他口没遮拦地到处散布,直到传到船长的耳朵里;这是件有关社会责任和他自己的尊严的事情;眼下,他必须采取措施。他摇摇头,好像被一群虫子包围着,决定当天夜晚独自个儿进餐。

弗赖塔格迟到了几分钟,来到餐桌旁。除了船长以外,人到齐了;舒曼医生向船长的客人们转达了船长遗憾地表示他无法出席的情况;客人们按礼节表示接受。弗赖塔格悄悄地坐到他的椅子上,向所有的人都微笑着点点头,他们的点头却不带明显的笑意——是不是他自己在神经过敏地恼火,所以才使他想象这些相当乏味的陌生人都带着一种鬼鬼祟祟的好奇心望着他?只有舒曼医生除外,他的仁慈的超然的神情,有一点儿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使弗赖塔格稍微有点恼火了;还有胡滕太太,她跟往常一样,盯着盘子看。

乘务员给他上开胃菜,拌上精致的配料的威斯特伐利亚烟熏火腿,旁边是一片甜瓜。他摇摇头;那个服务员问:“那你喜欢换什么呢,先生?烟熏马哈鱼?酸奶油拌鲱鱼?”

“两样都挺不错,”弗赖塔格说,“鲱鱼吧。”

胡滕教授先生看到弗赖塔格先生在选择食物上缺乏适应性，几乎像是心不在焉地在说，好像他的思想是以一个很遥远的来源为依据的："犹太特性的状态向西方人，尤其是基督徒，提供了一种意向，那就是没完没了地研究精神和道德的矛盾，还有神秘而有力的感情和心理的黏合力。犹太人一旦受到来自外界的、他们所说的异教徒的攻击，没有什么比得上他们的团结性了，没有什么超得过他们自己在各个领域里的凶狠的竞争。我问过许多在学术上认真、在哲学上超然的人：'请告诉我——犹太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能给我一个答复。他们管犹太人叫一个种族，然而这是荒谬的。他们跟我们一样，不过是白种人的支系上一个小小的片段罢了！"

"啊，不是北欧日耳曼民族的！"利齐尖叫，"绝对不是！从什么时候算起呢？"

"那么，他们是含米特人吗？"教授回答，咄咄逼人地向她转过身去。"蒙古人？或者埃塞俄比亚人？"

"他们样样都是，是彻头彻尾的杂种，来自每个种族和民族的渣滓！"里贝尔先生说，他的愉快的性子突然消失了，脸涨得通红。"而且从有时间那会儿起，他们就是这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威廉·弗赖塔格说，放下他的叉子，"我们现在都是杂种了，我想……"

"啊，说你自己吧，亲爱的弗赖塔格先生，"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她接着探出身去，咬着牙向他微笑。"不过，我还是感到惊讶。你怎么可能呢，一个最典型的日耳曼人，金头发，高个子，灰眼珠……"

"……我问他们：'犹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问他们，'你是一个民族吗？——不。——那么，你是一个种族吗？——

不。——那么，你是一种宗教吗？——不。——你信奉宗教吗，遵循饮食教规吗？不。'"胡滕教授提高声音，像在唱歌似的说，使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静下来，他决定把他那个小小的笑话慢腾腾讲下去；他们是不会不让他讲的。"就这样，我问他们——我要你们记住，我挑选的只是那些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可能轻易地被误认为是纯种的日耳曼人——我问他们：'你凭什么自称为犹太人？'他们没有一个人例外，个个顽固不化地说：'不过，不管怎样，我是犹太人！'——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啊，原来是这样！犹太人特性明摆着是一种精神状态！'"在他的听众的赞赏的微笑下，他眉开眼笑。

"他们声称是上帝的选民，这叫我恼火，"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这使上帝显得那么愚蠢，你不认为吗？"

人们全都震惊，一片沉默，好像没有一个敢对这话发表意见，因为它一方面表示出有道理，而另一方面太接近于亵渎神明，无法支持。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顿时察觉她说漏了嘴，想办法纠正。"我的意思只是，"她开口说，"我——我——"

胡滕教授先生赶紧体贴地搭救她。"这个错误的想法，产生于部落的虚荣心，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想法，我想我们可以靠得住地说，那是一种最原始的神，他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民族。确切地说，我们不妨更确切地说，他们选择了他——在当时倒并不是一个不光彩的概念，"他宽厚地补上一句，"当我们考虑到一些其他同样古老的神的特性的时候，他还算不错哩。至少根据比较，整个说来，老耶和华① 并不显得糟糕透顶。"

"你说得对！"里贝尔先生喊叫，一边咽菜和抹嘴。"是耶和

① 《圣经》中的上帝。

华挑选了犹太人，他可以拥有他们——”

“想想看，一小撮人，在将近二十亿的其他人中间只有小小的几百万人，居然这么放肆！”利齐叫起来。“最叫我冒火的就是这事儿。还有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花招、他们的……”

“正义、仁慈和赐恩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神圣的三位一体，启示的神圣的真理，基督教带到世上来的伟大的真理，”胡滕教授先生开始说，这时候微微有点儿泄气，“证实……”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意识到里贝尔先生的社会地位低下，然而为了公正起见，压制她的偏见，同意他的意见。“你说得对，里贝尔先生，”她现出居高临下的优越的神情说。“仅仅是他们的神挑选了他们。咱们千万不可忘记。咱们并没有义务仿效他的可怜的爱好……”

“我对宗教问题不感兴趣，”里贝尔先生说，他再怎么也没有梦想到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是给他赏脸，“我只是担心日耳曼民族，我们种族的血流，必须保持清洁，不得被他们玷污。”

“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反闪米特人[①] 分子！”小个子的施米特太太突然喊叫，好像被吓慌了似的。“我不认识一个犹太人，可是我并不讨厌他们……”

“我压根儿不是反闪米特人分子，”里贝尔先生争论地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很喜欢阿拉伯人，我一度生活在他们中间，发现他们是很好的人……”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带着笑意向舒曼医生转过脸去。“你一句话也不说，亲爱的医生！你对犹太人有什么想法？”

---

① 闪米特人(Semite)：近代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古代包括巴比伦人、腓尼基人、亚述人等。

舒曼医生温和而明确地说："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我相信我们礼拜着同一个上帝。"

"可是，医生，"利齐探出身子，摇晃着脑袋，"你是天主教徒，是不是？难道天主教徒不是首先礼拜圣母马利亚，然后才是上帝吗？"

"不对，"舒曼医生说，把他的刀叉交叉摆成X形，小心地放下餐巾，不慌不忙地站起身子。"对不起，请允许我先告退，"说罢，他离开他们。

"他有心脏病，"胡滕太太跟她丈夫说。"你认为我们应该派人去问候他吗？"

"他是医生，"教授先生说，"他不需要我们的关心和意见。"

"舒曼，"里贝尔说，噘出他的下嘴唇，"那不是犹太人的姓吧？"

"在日耳曼人中不可能有犹太人的姓，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胡滕教授先生说；他看来好像有一点儿恼火，拿他来说，话说得相当不客气了。他注意到弗赖塔格先生在这场谈话中一直硬梆梆地一声不吭，时不时地用叉子把他盘子的一小口食物从这一头拨到另一头，但是不吃；他的脸是这么死板和苍白，别人可能怀疑他快要晕船了。"只有在中古时期被犹太人采用了一些德国人的姓；后来，他们决定改掉他们的古老的方式——譬如说，以撒·本·亚伯拉罕[1]——倒是一个好习惯，真可惜，他们放弃了，而那些姓一代代相传就跟犹太人家有联系了。舒曼是其中一个姓；弗赖塔格，请允许我冒昧地说，是另一个。难道不

---

① 意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亚伯拉罕乃《圣经》故事中传说人物，相传为希伯来人之始祖；以撒是他儿子。

是这样吗，弗赖塔格先生？”他直截了当地、出人意料地向餐桌的另一边说；弗赖塔格抬起冷冰冰的、愤怒的灰眼睛。“你一直在寻找你们古老的日耳曼人的姓里有犹太人旁支不觉得烦吗？”

“我不知道有任何犹太人姓弗赖塔格，”他说，他火得声音发抖了，“这就是说，只有一个人除外——我的妻子，”他说，接着他提高和稳定他的声音。“她是犹太人，她姓弗赖塔克，她使这个姓增光。”

他听到自己说的话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他又让自己陷在冒火的心情中，陷在感情夸张的举动中，陷在既虚假又不必要的处境中。他的岳母早已发现他的这个弱点。她带着一点儿讽刺的意味劝他：“记住常规。千万别说你家里的事情。千万别吐露别人希望你说的事情。用另一个问题回答一个问题。”她是笑着说的，但是他知道她的话是认真的。他一再感觉到他是生活在两个全副武装而且势不两立的阵营中间，是这一个阵营里的叛逃者，而是另一个里的闯人者，是没有人信任的变节者。他跟玛丽结婚以后，处在犹太人中间，时常会感到孤独，他们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攻击他，其中有些人公开表示蔑视，或者真正地表示个人的厌恶；另外一些人讲着犹太人出非犹太人洋相的故事；他们还让他听到他们在私下的谈话里用的、那些对基督徒不敬的名称。那么，现在且看他的自己人吧——他的眼睛慢慢地顺着餐桌一张张脸看过去，没有一张脸他不觉得可憎的——他的自己人，因为这些都是他的人，正在找另一个机会对付他；他们绝不会宽容一个这么自轻自贱的日耳曼人的。他认定，他已经受够了，双手按在餐桌边上，把椅子往后推。

利齐激动得尖叫起来，弄得他停住了正要站起的身子。“啊，弗赖塔格先生，真怪！我们当中有几个原以为你是犹太

人——我们怎么可能这么看不清呢？——几天以前一个黄昏，那个跟我住同一个房舱的古怪的美国女人——你认识她吗？特雷德韦尔太太？她告诉了我一件我压根儿不相信的事情——不是你，而是你的妻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特雷德韦尔太太？"弗赖塔格重复着说，他震惊了。"这话是她说的？"

"当然喽，我不是这么说的吗？不过——请别误解我的话——她当时有一点儿——你知道，她喝酒——有时候，她很糊涂……"这会儿，所有的脸都带着极其注意的神情朝着她；她在那些脸上寻找理解。不管他们可能听到船上那些美国人的行为有多么不体面，他们都不会吃惊。利齐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可不，不止一次，晚餐以后，独自个儿喝掉整整一瓶葡萄酒！"

弗赖塔格这当儿利索地站起来，皮笑肉不笑地望着那一圈他的同胞，像一个演员念幕落时最后一句台词那样说："好吧，我把特雷德韦尔太太交给各位亲切地照管了！"不等有人回答。但愿他们把你扯成碎片，他冒火地希望着，看到她独自个儿坐在她那张小桌旁，眼睑下垂，活生生的一个清白无辜的形象，在吃冰淇淋。他突然希望一个人要张餐桌。明天他会跟领班的服务员提出的。他不可能再留在船长的餐桌旁，跟那伙人坐在一起了。再听到他们人人都对犹太人说长道短，他就会掴耳刮子，每人一下。是这样，甚至舒曼医生，那个假正经的老家伙，他不置可否地溜走了。接着，顿时有一阵径直来自墓穴的寒意向他的熊熊的怒火袭来了——就在现在，他是在到玛丽的亲戚那儿去啊，他们那些人仍然会到玛丽的母亲家里去作客，或者去吃晚饭；他还得去听那些嘲笑非犹太人的笑话，那些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一个个创伤、使他对他们全都记恨在心的笑话。他趴在栏杆上，盯着

看颜色越来越深的海水;现在,不再有愉快的新奇感了。"我可能在想自杀吗?"他的脑子经历一段短短的完完全全的空白时间后,他问自己;因为在他以为他的脑子是一片空白的那段时候里,他看到他自己像一个专业的潜水员那样头朝下地、滑溜地潜进深水,慢慢地,慢慢地一直沉到海底,永远平躺在那儿,睁大着眼睛,十足地自由自在,心满意足。他打了个冷战,直了直身子,眨眨眼睛,开始走动。这形象是这么清晰,几乎使他失去自信。不过,不,没什么可担心的。那条容易走的出路不是给他走的。他的路是清楚的——一直走进去,走完全程,再从另一面出来;他必须做的是:一直走,别张皇失措,别让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折磨得乱发脾气,让他们白占便宜。在这段时间里,他倒想跟那位特雷德韦尔太太谈谈;可是,不急。

船长撇下他晚餐后的第二杯咖啡,走出去,同意跟利齐·斯波肯基克小姐简短地会见一次,不是在他私人的住所里,而是在驾驶台上。她体现了女人身上船长最最厌恶的一切体貌特征;将一起会见的还有她的被迷昏了头的爱慕者里贝尔先生,不用说,此人一定缺乏一些不可缺少的男人的本事,譬如说,对女人的口味或者识别力。他们书面提出了会见要求,但从时间上来说他们如此迫切毫无疑问显得虚假。他们跟他可能有什么事情不能等到明天早晨的时候说呢,即使不能等到最后审判日的话?他抑制着打嗝,神情严厉地望着他们,有意提醒他们,不该在这么迟的时候随随便便地来打搅他。

两个来见他的人被他们自己的大胆的行为,被他们受到光荣的接待,和被他们办的重要的差使,激动得都喘着粗气。他们带来的信息是简单而有说服力的。不仅是船长自己的客人们,

而且许多德国乘客几乎一开始就怀疑，有一个坐在船长的餐桌上的人是没有权利待在那儿的。也许他自己不是犹太人——虽然除了他自己说不是以外，他们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不是——可是，人们已经知道——说真的，他在餐桌上当着每个人的面亲口说了——他跟犹太人有最亲密的关系——事实上，他的妻子！啊，利齐小姐和里贝尔先生对造成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是多么遗憾，但是他们确信，船长应该知道，会十分愿意知道，在他的餐桌上出现了这么一个前所未闻的不幸。他们明白，这些小事应该归他手下管的，然而——然而——

船长马上听出话中最微细的暗示，他的一个手下竟然胆敢玩忽职守，不管那是多么细小——说真的，在船上也没有细小的职务那一类事情——这会儿高傲地抬着头，说："不用说，我很感谢你们想得挺周到。我同意这是件极不寻常的事儿。"利齐向他伸出她的长脖子，用最高的嗓门咭咭呱呱地、冲动地补充说，亲爱的船长为他们做了那么许多事情，而他们只能为他做这么一丁点儿小事情，哪怕是为他最微细的效劳，也是天大的乐趣。船长的恼火平时总是转化和表现为他的肠子绞痛和作气，这会儿开始感到他熟悉的疼痛了。他连连表示感谢和致意，甚至跟他们一起向前走了三步，催他们快些向正确的方向走去，把他们打发掉了——他们原来一直站在星空下光线明亮的驾驶台甲板上——他熬着痛，去找他的铋。他又改变主意，喝掉了最后一口咖啡，又灌了一杯茴香杜松子酒。这至少暂时得到缓解；他并不思考，他不需要，就马上采取行动，布置一连串的事情，在不久重新安排的餐室座次中将会产生微细但是关系重大的后果。

干罢这事，船长的脑子转到相对愉快的题目上去了——女伯爵——啊，得体的想法马上产生了。他会送给她一瓶葡萄酒

作为小礼物，对这点殷勤没有一位女士可能挑岔子的。她使他想起了在大学里的那些日子——他老是在剧场的入口处外面转悠，爱慕那些奇怪的偶像，大蜡人，它们涂脂抹粉，穿着束腰的紧身胸衣，用按照它们的行当穿的衣服包裹和装扮着，他谦逊地提出送鲜花和葡萄酒，表示他的腼腆的、小伙子的欲望，他的小小的肮脏的梦想始终不敢放肆得想走到胳膊够得着的地方。他从来没有能想象她们当中哪一个不穿衣服的情景；他一次也没有过把她们当中哪一个跟任何他认识的活生生的女人搅和在一起。然而，他喜欢对于她们的梦想；不知怎么着，女伯爵带回了这一切。不过，医生的话是对的——对她太宽大是不合适的。她必须按规定受到监管，也许必须要时不时地被提醒，她是他船长的囚犯。他派人送给她两瓶冰镇得很好的有汽泡的白葡萄酒，附去一封献殷勤的短信："亲爱的夫人：我们不再用'香槟酒'这个词儿，说真的，也不再喝那种徒有虚名的酒。所以我乐于奉告，这份薄礼不是法国货，而只是出产于一个品种纯正的德国葡萄园的上好的绍姆魏因酒，送酒的人真挚地希望它在黄昏时可以带给你愉快的精神和生活的乐趣。在此期间，务请赏我薄面，遵照医嘱，休息于房舱内，在医生为你健康着想而规定的必需期间，请勿外出。"他，不妨说，是乐于为她竭诚效力的

舒曼医生去看女伯爵，打当天最后一针皮下注射针的时候，发现她在哈哈大笑；她坐在床上，一件红色花缎睡袍褪在她的肩膀上，她的泛红的鬈发竖直，像小蛇那样摇晃，对她的脸来说显得稍微太年轻了一点。她手里拿着一封摊开的短信，在她身旁，摆着两瓶德国香槟酒。

"啊，"她高兴地叫起来，"你来得正巧，好跟我一起享用我的

酒和看船长写给我的情书！啊，请过来跟我一起笑吧，怎么样？”她把信给他。他站着，犹豫不决地对信望着的时候，那个女服务员按照医生的在注射麻醉剂的时候必须在场的最新指示，敲敲门，进来了。

“你来这儿干什么，”女伯爵质问，“我要你来的吗？”

“让她待着，”医生说。“我不能够看这封信，我肯定地说，这封信船长是不打算给别人，而只是给你看的。”

“好像船长的意图关系重大似的！”女伯爵喊叫。“这信跟你也有关！我奉命听从你的安排，待在房舱里——总之，我又被监禁啦！”

舒曼医生不舒适地、几乎伸直着胳膊拿着那张信纸，他既然不得不看这封不打算给他看的信，好像距离可能减轻他的过错似的；这时候，那个女服务员着手拉平床罩，伸手拿起枕头来拍松。“等我吩咐你才干这些事儿。别走近我，除非我叫你，”女伯爵说。女服务员涨红了脸，退后去，站在门框附近。

“不，你言过其实。你不信任船长，他希望保护你；我呢，希望帮助你；然而，瞧你对那些没有礼貌的学生多么亲切、多么信任，他们应该像对待母亲那样尊重你，然而——我没法向你重复别人听到的他们谈到你的那些不敬的话——不过，请相信我的话，他们是说过的！告诉我，你干吗让他们拿你当笑柄呢？”

“他们是这么干的吗？”女伯爵说，伸出手去抚摸他的手。“在这艘船上？好啊，这使我感到有趣。你听到有人在笑？不是一切小伙子都在不尊重地谈论任何年纪的女人吗？”她笑了，头一动也不动。“我不是他们的母亲！我要是是的话，他们可能有较好的礼貌、较好的亲人、较好的头脑、较多的想象力；我以为，我几乎可以断定，他们的面貌也会长得稍微好些。不，我喜欢他

们，因为他们是我的儿子们，我的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疯子的同学，他们一定要跟在他们管它叫‘革命’的事情后面逃跑！”她向他转过头来，一脸痛苦，她的双手开始动个不停。“他们现在待在哪儿呢？我把他们藏在一个小教堂的圣坛下面，藏了一天一夜，处处是士兵和暴徒，可是没有一个想到看看圣坛下面！然后，他们纵火焚烧整个种植园、甘蔗地，还有其他一切……我的儿子逃走了，可是我被带走——”

她的声音渐渐变成单调、诉苦的低声吟唱，就像他第一天在船上听到的那样，但是她两条胳膊抱着两个膝盖，很理智地望着他。“事情过去了，”她说。“他们走了。他们不会再来了。”

“你怎么知道？”舒曼医生问。“你不能稍微耐心一点等消息吗？这不一定是结局！我认为你把一切都弄得困难了，不必要的困难，”他跟她说。“我们的麻烦现在还不够吗？”

“我们？你也有麻烦来着？”

“你是我的麻烦，”他跟她说，“不过，要是我办得到的话，我会帮助你的！”

“行，”她愉快地说，她的两条胳膊垂到身子两边。“试试看吧！”

“蒂勒船长并没有给你下命令，而是向你提建议。我希望你不但接受我的劝告，也接受他的。他是位可敬的人。”

“我会永远接受你的意见的，”她说，又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摸他的手；这一回，他相当明显地避开了。她马上抽回手，又哈哈笑起来。“绍姆魏因酒！”她用讽刺的喜悦说，用怪里怪气的声调说这个词儿。“多么没法形容的德国气派！我敢肯定地说，船长的荣誉也跟这种仿制品一样高明。”说着，她挥舞着一瓶香槟酒。

“请别，”舒曼医生说，对她感到一种新的怒火，使他的声音

变得激动和带有争吵的味儿了。“对不起，请别忘了我也是德国人……”他停住嘴，总算没有说出“而且为此感到骄傲”这样可笑的话来。

“哎，可不是，”女伯爵说；她叹了口气，真正疲倦了，“千真万确。这是一种医治不好的疾病，对不？像生为犹太人那样无法解决。”

“或者说像生为女人那样，”舒曼医生恶意地说。“你自己这么说过的。”

“这可不一样，”女伯爵几乎快活地说，“我不再听你的话了，我有更好的事情要做。”她揭开床罩，从床的一边跨出她的纤细、雪白的脚、她的裸露到膝盖的腿，让她的睡袍卸掉，穿着柔软的蓝绸直筒衬裙站直身子，裙子几乎盖不没她的大腿。她拿起两瓶船长送的绍姆魏因酒，走到脸盆架前。她利索地在每瓶酒上裹一条毛巾，接着退到恰当的距离，在金属盆的边上先砸烂一瓶，接着砸烂另一瓶。有尖利的缺口的玻璃从毛巾底部飞出来；酒带着泡沫透过毛巾喷出来，溅在墙上、镜子上和地毯上。撇下那些碎片，她向那个女服务员点点头。“现在你有些事情干了，”她愉快地说。

那个女服务员挨着墙侧身走，好像她发现自己跟一只危险的野兽一起关在笼子里似的。舒曼医生不等女伯爵回到床上，在她走过的时候，就抓住她的一条上臂，一下子把针扎进柔软的肌肉。她打了个冷战，感到非常愉快；她闭上眼睛，抬起头在他耳朵边热情地说：“你是个脾气多么坏的男人；没有你，我会怎么办呢？”

他向那个沉着脸跪在地上用拖把擦洗绍姆魏因酒的女服务员瞟了一眼，回到女伯爵身旁，皱着眉头。他放掉她的胳膊，一

条条地举出他的全部生活原则，责备她行为不检点，完全不顾仪表。

"啊，太太，明儿见，一定要设法让你自己平静下来！"他严肃地说，听到他的话跟她该受的斥责相比是多么软弱无力。他等着看她用床罩盖住她裸露的身子，平躺着，在枕头上转过头来，昏昏欲睡地向他微笑着。"睡吧，"她用被压低了的声音说，"睡吧，可怜的囚犯。"

在离开她的房门几步远过道的拐角上拐弯的时候，他几乎撞上两个古巴学生，一个拿着一瓶酒，另一个拿着一个棋盘。他们鞠了一个躬，靠墙站着，让他过去，但是，他也站住脚，突然对他们说，没有一点儿客套的表示："先生们，我们已经有许多次对你们对太太缺乏关心感到惊奇，我现在必须坚决声明，你们的殷勤要立即停止。夫人是我的病人，我禁止黄昏时候的一切探望，在白天，没有我的特殊允许，也不行。对不起，"他说，心中充满着恶意的满足。

他们又毕恭毕敬地鞠躬——有一点儿在滑稽地模仿毕恭毕敬，医生想——其中一个说："当然喽，亲爱的医生先生，我们完全理解。"另一个说："啊，完全理解。"接着，他们在他前面转过身去，远远地把他撂在后面，几乎马上不见了。医生对他们只有一个匆匆的印象，就把他们从他的脑子里撵出去了；他们的皮肤肌理粗糙，看起来很厚，眼白浑浊——有一点儿黑人血统，没错儿——这有什么关系呢？他的心情又烦躁起来了，他带着报复心短暂地想到了那些砸烂瓷器的异性：暴跳如雷的洗碗碟的女佣人、被激怒了的下层阶级的主妇、忌妒的情妇——那些把一切东西，宗教啊、法律啊、婚姻啊，都搅得一片混乱的异性；想到她们的一切阳一套、阴一套的举动，她们的瞒着人的一桩桩私情，

她们的爱好黑暗的天性和在黑暗中干的一切害人的勾当。女伯爵要砸的是谁,他想要知道——他自己,或者是船长,或者两个人都是?或者是另一个人,或者是在从前抗拒过她、阻止过她、妨碍过她、拒绝接受过她、最后躲避过她的人?或者她是习惯于轻易被征服的人、痴心的蠢货吗?医生在这个节骨眼上顿住了,突然低声说了一句"愿圣母庇佑我!"并在自己胸上画了一个十字,顿时感到他的脑子清醒了一点儿,好像魔鬼都逃跑了。他平静地面对自己的不幸,好像他在思索别人的不幸似的:从一开始,他的应受指摘的爱情就染上恶意的色彩,因为从一开始,他承认那是爱情以前,就已经爱上了她;随着他的罪孽越来越深重,他想减轻她痛苦的希望正在慢慢地转变成想造成她遭受痛苦的希望,当然是另一种痛苦喽,在那种痛苦中,她会要摸他的手和试探他的意愿……为什么他的爱情希望她堕落?他知道得很清楚,她根本不是一个被激怒了的女佣人,根本不是一个忌妒的情妇;她挑选了世界上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简单和直接得甚至令人感动,来表明她对船长、对医生和对一切把她和作囚犯的力量的轻蔑和挑衅。她的脸色是平静下来过的,她把眼睛转向他的时候,是高兴得闪闪发亮过的;她把那两瓶酒砸碎,好像在给一艘船命名似的。至于她的行为不检点,穿着睡袍走来走去,那么满不在乎地露出大腿——那种举动中显示她对他很不尊敬,好像他压根儿不在场似的,或者她根本不把他当作一个她确实应该对他收敛一点的人……好像他是不会伤害人的、不能行房事的。这是女人们熟悉的花招,人人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医生的心开始怦的一跳,开始跳得太快了——这仍然是没法容忍的!他的脚步慢下来,心慌了,伸手到里面的衣兜去掏那个小药瓶。"爱情,"他憎恨地说,好像有人能听到他的话而且

回答似的:"管这种卑劣的念头叫爱情?"他慢腾腾地在甲板上转一圈,打定主意在那些教士中找一个忏悔,在一大清早领圣餐。好久以来,他第一次感觉不到正当的追悔心情——那是精神上的一个良好的习惯——只感到是个人的耻辱,一种压得人抬不起头的羞辱,为他必须忏悔的内容的可耻性质而感到的羞辱。蠢极了,蠢极了,他已经这把年纪,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在他的脑子里念念不忘地围着那个古怪的女人转,好像他是那些脸上长满疹子的学生中的一个,然而还对他自己否认他的感情,把一切都责怪在她身上,明明是他自己心术不正,却憎恨她……

他看到了两个西班牙教士[①] 中年纪比较大、更像个苦修者的那一位正在迈着大步向他走来,黑袍飘扬着,显然是在作睡觉前的健身散步。这时候,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挺直肩膀走到几步外他的面前,伸出一条胳膊,向他示意。

"神父……"他说;加尔萨神父在他面前站住脚。

第二天早晨相当晚的时候,弗赖塔格独自个儿在酒吧间里喝咖啡,仍然板着脸,情绪低沉;他几乎一宿没有睡着,听汉森在上铺跟他的梦魇吵架。上一天黄昏他的晚餐被破坏以后,他简直饿坏了,但是他的憎恨更强烈了,决心要求换一个座位才进下一餐。当他看到那些熟悉的人影开始在早晨的甲板上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就去找那个领班的服务员。

领班的服务员对权力的爱好只比船长差一点儿。弗赖塔格表示希望在剩下的航程中独自个儿要张桌子,他的口气轻松,像在餐馆里向服务员头儿订一张桌子。那个领班的服务员查看着

---

① 正文前的人物表中说加尔萨和卡里洛这两个天主教神父是墨西哥人。

他那张座位图，好像这件事儿一定有什么可疑之处似的。接着，他用铅笔头点点他的手掌，极有礼貌地说："先生，没问题。事实上，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乐于说。"

"安排好了？"弗赖塔格重复说，并及时忍住了没有问，"谁安排的？"

"你向事务长提出的要求转告了我，先生，"领班的服务员说，声音是毕恭毕敬，脸上却是一副有保留的傲慢无礼的神情。弗赖塔格马上说："谢谢。"接着转身走掉。他窝着一肚子火，觉得浑身轻飘飘、空荡荡，不知道是怎样走到上甲板去的。那可怜巴巴、叫人讨厌的鲍姆格特纳一家子带着病恹恹的神情，挤作一团走着，各自向他低声说："早晨好……你好……你睡得好吗？"的时候，他粗鲁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大大地损伤了他们的感情却浑然不知；不过，即使他知道的话，也不在乎；这么窝囊的、让人讨厌的人算不上真的活在世上，他们压根儿没权有感情。或者至少没权挡他的道。他认为，他可以清清楚楚地追溯事情的经过；拿那头猪里贝尔和那个叽叽呱呱的白痴利齐来说，没有什么难以捉摸的事情。他们会去找事务长，或者甚至径直去找船长本人；船长会像个神似的高高在上，把其余的事儿给办了——啊，这不是够清楚了吗！除了一些细节外，这甚至不是一件新事清，自从他跟玛丽结婚以来，这也不是第一回了，他在一些场所被拒绝坐上以前他受到欢迎的餐桌。但是，以前只有玛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俊俏、漂亮，一头金发，浑身整洁，稍微带点笑意，眼光望着别处，玛丽会默不作声地站在他身旁，这时候服务员头儿在解释，他表示抱歉，但是没有订座的记录："是我们的过错，没错儿，我们深深地表示遗憾，可是你也看到……"这一点不假，那儿每一张没有客人的桌上都摆着一

张大卡片，那上面写着："已订。"他会在街上，出租汽车内和回家以后大发雷霆，暴跳如雷，但是玛丽从来不丧失她的奇怪的忍耐心。"我习惯了，"她跟他说，"你还没有。不过，我亲爱的人儿，我不是告诉过你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吗？我知道哪儿我们可以去，哪儿不可以去。你不会不听我的话了吧？"

"我一定听，玛丽，"他当时答应了她。"你要是没法跟我一起来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吃午饭的时候，弗赖塔格毫不犹豫地走进餐厅，好像他知道他该去的地方。一个服务员向他跑来，好像要拦阻他似的，装出奉承的神情用哄弄的低声音引导他向一张摆在服务员入口处附近、靠着一堵空白的墙的小餐桌走去；弗赖塔格好久以前曾经注意到，那个犹太人勒温塔尔独自个儿坐在那儿。这会儿，他独自个儿坐着。服务员用一鞠躬向弗赖塔格示意他的座位，把椅子拉出来，让他坐下，抖开他的餐巾，递给他，不等勒温塔尔选定菜眼睛向上看，就把菜单给他看。"下午好，"勒温塔尔说，说话的声调就像是个坐在自己家里的人在招呼一个陌生人，也许还是个可疑的人哩。

"下午好，"弗赖塔格说，神情平淡，不带感情，考虑到他已经跟自己打罢了这场战斗，将要用绝对冷静的心情和意志力控制这个局面。"我希望没有打搅你。"

"要是你打搅了我，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吗？"勒温塔尔问，耸耸肩膀，抬抬眉毛。"有谁问过我们吗？"他看来好像并没有生气，只是在说一个明显的事实。

弗赖塔格的裸露的神经被刺痛了。"我要求那个领班的服务员给我独自个儿一张桌子，"他说，注意地显得声调轻松。"一定是弄错了。"他不得不在隔得实在太近的距离内看勒温塔尔先

生那张油光水滑的脸、他的长在没有光的巧克力色眼睛上面的又大又厚的眼睑、他的在他咀嚼和说话的时候扭动着的、难看地一张一闭的厚嘴唇。弗赖塔格对这种人知道得太清楚了——要是你错误地、和气地对待他的话,他就会显得过分亲密;要是他怀疑你生性懦怯的话,他就会对你大嚷大叫,傲慢无礼;要是你懂得怎样叫他老老实实的话,他就会见风使舵,拍马奉承。不行,这个人是做不成大事业的领袖人物的,弗赖塔格断定。他不是那种会引得人们沸沸扬扬的人。甚至其他各种各样的犹太人也不会喜欢他。他是那种来到边门前兜售一些乌七八糟的小玩意儿的人;玛丽的母亲会让狗向他扑过去!他回想起犹太人互相乱起的古怪、滑稽的名字,轻蔑和可笑的名字,而那些最坏的名字就是指这种家伙的。

勒温塔尔在用怀疑的眼光察看他,嘴角带有一点儿恶意的扭曲。"你要求之前不向周围看一下吗?你看到哪儿有一张没有人的桌子呢?"

弗赖塔格火坏了,发现自己在一本正经地回答:"餐厅另一边,舷窗附近有一张。"

"那是留给那个毛头毛脑的小伙子跟他那个有病的舅舅的,"勒温塔尔说。"不过,他已经像个囚徒;还有那个女伯爵,不过已经有几天没来了;那个时髦的美国女人,那个寡妇——她倒从不缺席!我的意思是,你非得跟一个人坐在一起不可——那么,干吗不是跟别人呢?干吗跟我呢?干吗不跟哪一位女士呢,或者那个你用不着经常看到的小伙子呢?"

"事务长运用了他自己的判断力,我想,"弗赖塔格说,"就是这样。"

勒温塔尔平静的脸上现出龇牙咧嘴的讽刺的笑意。"在船

长的餐桌上?”他不相信地问。“是你要换桌子?只有呱呱叫的人才跟船长坐在一起吃饭——这么说,你不欣赏跟那一批上层人士交往吗?哎,请原谅,不要犹太佬同桌吧,嗯?这么说,咱们是难兄难弟喽,嗯?不,不,别告诉我,让我猜!”

这种事儿又来了,来自另一个方面,弗赖塔格这么想的时候有一刹那恐慌极了。我也不能坐在这儿。他的胃像打了死结似的绞痛;他的右手紧紧握着,直到他硬逼它伸开,拿起菜单。“蔬菜清汤、麻哈鱼加黄瓜,”他跟服务员说,接着几乎用同样的声调对勒温塔尔补上几句:“我几乎不得不抱歉地说,为我个人的原因表示抱歉,可是你错了,我要是明白你好像要表示的意思的话,那么你错了。我不是犹太人。”

各种不同的矛盾表情在勒温塔尔脸上浮动,像有风的日子里池塘里的水。“时时刻刻都会发生新事情,”他最后说,“我会活着听到一个救世主说这话的!”服务员在他面前放上一盘煮得很老的鸡蛋和生拌包心菜。他咬了半个鸡蛋,加上不少包心菜,咀嚼了一会儿,继续说:“你用不着跟我说。你对这事儿要怎么办,完全是你的事儿。不止一回,我自己也忍不住,但愿没发生这样的事情,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我逃避不了——我长着这副脸相办不到。唉,刚会说话的娃娃们隔开一百英尺就嚷叫‘犹太佬’。我不妨说,你看来不像——我的眼光很凶,我也从来没有把你当作上帝的选民,确实是这样。不过,在德国,多的是这种种族混合通婚,呱呱叫的犹太小伙子纷纷追求那些黄头发的非犹太妞儿,他们真该害臊;就这样,我们有许多人的长相比我们应该有的长相更蠢头蠢脑。在德国,你瞧犹太人已经没有后脑勺了;这是不正常的。我知道有许多最下流的排犹分子用不着回顾得比他们祖父那辈人更远就能找到纯正的古老的犹太血

统……可是他们能不看的话，就不看——"

弗赖塔格尽可能在吃，一边和气地点头，好像表示同意似的。勒温塔尔包办了这场谈话，这显得局面很正常。弗赖塔格背对着屋里大部分人坐着；他要是把头转过一半就可以直接看到船长的那张餐桌，尽管距离相当远。他感到一切盯视、低语、恶意中伤、嘁嘁喳喳的无聊的说长道短，都是冲着他来的；那么，让他们瞧瞧他和颜悦色、津津有味地在听勒温塔尔先生说话，决不可能出现丝毫不愉快，或者引人注目的情景；他打算把这个再好不过的场面维持到底。他坐在那儿，感到鲜血快要从他的毛细孔里爆出来似的，忍受着囚犯被穿铁鞋[1]这种酷刑折磨的痛苦，听着勒温塔尔说话。

"有时候，这变得挺艰难，我用不着告诉你，"他继续说，"不过，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突然深深叹了一口气，"我是不是能跟我的同胞翻脸……我感到很奇怪，会被当作是另一个人。嗨，我还可能是另一个什么人呢？"他看来好像给难住了，好像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似的。"不过，我说，你要是有你的理由，而且你能逃避得掉的话，哎，我不责怪你。我，我是个犹太人；要是我有时候认为运气不好的话，那么我就想象自己不是个犹太人。呀。"他说完了，一副要呕吐的模样。

弗赖塔格的语调显得那么有耐心，看得出这激起了勒温塔尔的憎恨。"我妻子是犹太人，"他说，"不过，我不是。"仅仅为了把这个情景维持下去，他一直强制着自己继续谈话，这时候，决定把问题揭明了。"她属于最古老的犹太家族中的一个……"

一听到这话，勒温塔尔的态度又变了。他的嘴撅起，嘴角下

① 铁鞋是一种刑具。

垂，脸上尽是厌恶和不满的表情，连他的耳朵也在动；他粗暴地说："一切犹太家族都是古老的。至少，人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问题是，她家里的人是正统派吗？"

"不是，是改革派，已经有两三代了。"

"犹太小伙子可以娶非犹太人，这没什么，谁在意呢，这有什么关系？"勒温塔尔说，耸耸肩膀。"可是一个挺好的犹太姑娘去嫁给一个非犹太人！告诉我，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

"是有钱人家，"弗赖塔格说，"家里大多数人有钱。父亲是律师。已经去世了。祖父一辈中有两个是拉比[1]！"他向那个坐在他对面的可怜虫夸耀，那个人分明多少代都是小贩的后裔。

"这可更糟，"勒温塔尔说。"一个生活在低层的女人要脱离，我倒能理解，这也许对她太好了，可是一个出身在拉比家庭里的姑娘——我可接受不了！"他探出身子，故意大声说，希望可以被最近那几桌上的人，至少被那个服务员听到："这种犹太姑娘使所有我们其余的人都蒙受耻辱。任何背离宗教嫁人的犹太姑娘都要受到脑子检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伸出一个手指头去碰过一个非犹太女人，而且一想到碰一个非犹太姑娘，我就恶心；你们这些非犹太男人干吗不能别来招惹我们的姑娘，难道你们自己种族的姑娘还不够好吗？……我要女人作伴的时候，就找犹太人！我有了点钱要消磨一个黄昏的时候，就带一个对这事儿有乐趣的、挺好的犹太姑娘出去；我要结婚，就跟犹太姑娘结——我只知道这么办，其他的一概不知！真不害臊，弗赖塔格先生——你玷污一个犹太姑娘的那会儿，玷污了整个种

[1] 拉比(rabbi)：原意为"夫子"，是犹太教中的教士，他既主持宗教仪式，又执掌犹太人的法律，同时教学和从事精神治疗。

族……”

“闭上你的臭嘴！”弗赖塔格说，莫名其妙地凶起来，“要不，我会把你揍得离开这张桌子！”他浑身已准备好出拳揍人，然而及时停住，因为勒温塔尔突然默不作声，而且一动也不动，他倒愣住了。

勒温塔尔没有被吓倒；他是警觉的，注意着，而且有所防备；他看来对弗赖塔格的突然想要动手好像甚至并不感到惊奇。弗赖塔格倒对他自己差一点没干出的事儿感到震惊，仔细察看勒温塔尔的脸色。说也奇怪，脸色平静、庄重，唯一的紧张迹象是眼角周围的细小的肌肉在抽动，眼睛望着弗赖塔格，流露出一种很近似好奇的神情，好像他是一种需要懂得学会控制的动物。

勒温塔尔打破沉默，有点紧张地问出一个他的永远的问题，那算不上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声明；他的声音是合情合理的：“瞧，让我问你一件事儿——我到底对你干过什么吗？对你，或者对你的任何人？我对这次旅行的要求仅仅是一路顺利，没有麻烦，也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不是这样吗？我要求过你上这儿来吗？这张餐桌是他们安排给我一个人坐的，事先也没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不坐在这儿，坐在哪儿呢？他们把我独自个儿安排在这儿，因为我是唯一的犹太人——那么，干吗一个非犹太人一定要硬挤进来，而且因为咱们信仰的宗教不一样还要威胁我？干吗一定要……”

弗赖塔格说：“听一下。让我解释……”他吞吞吐吐地、沉痛地、尽可能地吐露在船长的餐桌上发生的事情，还补充说，“是对我妻子的侮辱叫我忍受不了……然后，我上这儿来，而你……”

“说一个犹太姑娘不应该抛弃她的同胞，可不是侮辱，”勒温塔尔说，语气仍然是合情合理的。“我压根儿不会想那是侮辱。”

弗赖塔格看到在他闭塞的脑子里对他的婚姻或者玛丽的没有一丝同情或者理解。他在失败中放弃解释,反倒顿时感到坚强些;这压根儿不是失败,他会干脆把整个问题挪到另一个场合去,在那儿继续战斗。他承认犯了错误;他一直是错误的,他愚蠢地跟蠢人们谈话,他正在为此狠狠地付出代价。他会再狠狠地控制他的事情,绝口不提。

"我很抱歉,忍不住发脾气了,"他很有风度地说,有点生硬地探出身去。"我希望向你赔不是。"

短短地停顿了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弗赖塔格感到冷汗在从他的额头上渗出来。勒温塔尔用餐巾抹抹嘴,身子也向前探出一点儿,带着期待的神情。他什么也不说。弗赖塔格振作起精神来。

"我说,我愿意赔不是,"他重复着说,非常正规地。

"那好吧,"勒温塔尔干巴巴地说,"你怎么能不说呢?我在等着听你说你得说的话嘛。"

"不要甜点,请别上了,"弗赖塔格对那个高高地站在他们身旁的服务员说。他站起身来,微微对他同桌的伴儿点点头。"我已经说过了,"他几乎愉快地说,"我要说的一切。"他用恰当的速度走出餐厅,不向他周围瞟一眼。

蒂勒船长在那场弗赖塔格危机中抓住机会,凭着他的权威又解决了一件小小的事情,这些事情一件件积累起来为他造成了坚实的动力基础;他在午餐上露面了,他的神情与其说是心情很好,倒不如说他的气消了。他的一举一动显得再好不过了。他抖开餐巾的时候,那条干净的棉布大餐巾像一面旗子那样啪地展开;他把它塞进衬衫领子。他伸伸脖子,下巴从一面转到另

一面，直到他的下巴颏儿上一嘟噜一嘟噜的肥肉都摆舒服；他一个个盯着他周围的客人们看，好像在期待他们的感谢似的。他硬挤出表情诡谲的微笑，忙着连连生硬地点头，说："我可以肯定，你们现在舒服得多了；我们不怎么挤了，而且不再有不和谐的因素。好了，"他说，举起右手，好像为他们祝福似的，"我已经把那个伪装身分混在这儿的人打发掉了；我们坐在一起的都是身分正当的人。我希望，我们将愉快地度过剩下的航程。"

围坐在餐桌旁的人个个为这篇短短的讲话叫好，姿态文雅而克制地轻轻鼓掌，向船长微笑，直到他们的颧骨鼓起来，他们的眼睛眯得狭窄成一条缝儿，现出狡猾的神情。

"真正的力量考验，"胡滕教授先生说，"是在行动中，突然的、决断的、也自然是成功的行动，绝妙的时机，明确的方向，而且是对敌人突然袭击。在这件事情中，我亲爱的船长，你的态度有任何踌躇的话——请容许我直说，这是完全不能想象的——结果会使事态不符合我们的真正的精神，削弱了我们的社会的结构。这看来好像是一件毫不重要的小事儿，"他热切地继续对他的听众说，"不过，是这些似乎次要的决定最清楚地帮助我们记起我们的原则，看清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传统风格保持一致……"

"而且还处理得这么得体，"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那还用说！归根结蒂，手腕、态度是很重要的嘛。"

船长对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潇洒地装出微笑，摇摇头；她受到了鼓励，正要说下去，这时候，利齐探出身去，向他伸出她那条细长的胳膊，迅速而用力地拍他的胳膊。"昨天黄昏，你接待我们的举止真是妙极了——"她向里贝尔先生瞟了一眼；他脸上堆满笑意，几乎眼睛也不见了。"你永远是妙极了，不过，你做了这么

一件叫我们人人担心的糟透了的事情，真可以用一个字——一个字——来包括。我羡慕这样的能力！”

餐桌上的人再度叫好。西班牙跳舞男女的那一桌隔开着一点儿距离，但是仍然太近，叫船长不高兴；马诺洛从那张桌子旁用低低的但是送得相当远的声音说：“我知道啦！他们已经把那个犹太人撵出去啦，在庆祝，好啊，我们也来庆祝！”

“好啊！”安帕罗喊叫，拍手，微笑，试着吸引船长的注意。他没有向他们的方向看，皱紧眉头，望着前面。“好啊！”他们全都轻轻地向他喊叫。里克和拉克用刀柄敲打桌子，马上被他们身旁的其他人喝止；他们仍然在向船长那桌人微笑，摇手指头。

“这可能管他们什么事儿呢？”他随口查问，脸色阴沉。“你们认为他们一直在偷听吗，要不，就是听到一些流言蜚语，才使他们胆敢这么放肆？”

“这帮跑码头的，”里贝尔先生严厉地说，“要不是在座有女士的话，我要更确切地指出他们是什么东西。归根结蒂，你们指望他们是什么呢？吉卜赛人！”

“吉卜赛人？长着那样的鼻子？”

“干吗不是呢？”里贝尔先生说，“他们应该是一个消失了的以色列支族……”

“我想，这个看法，”胡滕教授先生开始说，“属于神话或者传说的领域……”

“他们是天主教徒，”小个子的施米特太太大胆地发表她的意见，能为这场活泼的谈话提供一些情况而感到高兴。

“只是些层次很低的西班牙人，冒充成别种人的人，”船长坚决地说。“在我的家乡，我们有一句话：‘把西班牙人抓伤，为摩尔人放血。’人人都这么说！”

这当儿，舒曼医生来跟他们一起进餐了；他们向他致意，好像他缺席了好久才回来似的。他和气而冷淡，跟服务员说："只要一点儿清汤，还有咖啡。"胡滕太太用在他缺席期间建立起来的新的亲切的声调跟他说："我们一直惦记你！"这时候，他把头向她侧过去，但是神情有点惊奇。"现在，"她接着说，把医生也算在他们这一伙乐不可支的人内，"咱们只有七个人了——七个，讨个吉利嘛。"

她的丈夫始终没法消除她脑子里这种孩子气的胡闹的想法，好久以来，已经学会假装没有发觉了。他这时候对船长说："像他们那样的人，"他向威廉·弗赖塔格和勒温塔尔坐在一起的地方点点头，宣布，"像他们那样的人在船上和另外的公交工具上应该有特殊的地方。他们不应该被允许随便使用东西，叫别人恼火。"

"可是昨天你好像为他们辩护，当时我感到惊奇哩，"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

"我没有为什么辩护过，亲爱的女士——我是按照一个古老的民族的历史和宗教迷信说话；我发现他们非常有趣，可是我必须说，他们的后裔可差得多了，你同意这话吗，我的船长？"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要能按照我的办法来处理这事儿的话，"船长说，"我绝不会允许一个人上我的船，哪怕统舱也不行。他们污染空气。"

他闭上眼睛，张开嘴，把盛满豌豆和面包皮的浓汤的大调羹掉转头深深地送进他的嘴，上下唇夹紧调羹，然后把空调羹抽出来，咀嚼一下，咽下去，马上开始重复他的表演。其他的人也都把身子探出在他们的汤盆上；只有舒曼医生除外，他用一个杯子喝清汤。这段时间静悄悄，只有咕嘟咕嘟和唏里呼噜的吃喝声，

人人费劲地在喝汤，身子一动也不动，只有脑袋在不规则地低下和抬起。这桌人封闭得严严实实，抵制一切不受欢迎的人，不管是敌人还是志同道合的人。人人脸上显出酒醉饭饱、心满意足的笑意，还混合着得意非凡的神情：归根结蒂，只有他们自己这些人了，一个别人也没有；他们是强有力的人、有特权的人、十足地道的人。他们不再觉得肚子饿得慌了，开始互相眉开眼笑，态度优美，脸上表情夸张，好像在演戏似的；他们正在举行一个小小的宴会庆祝他们重新发现的亲人关系，他们特殊亲密的血缘的和意见一致的联系。他们认为，在那些外国人的注视下——事实上，一个也没有，甚至那些西班牙人也不在注意他们——他们建立了一个优秀的人用怎样的行为相待的范例。胡滕教授先生要了葡萄酒；他们全都交换祝贺。他们咂着嘴，连连说："是啊，是啊！"

小个子的施米特太太在船长公开严厉批评她以后哭过，尽管是为了她自己；不过，她一想到世界上的种种苦难，就感到痛苦；她只希望爱人和被人人爱；动物生病，孩子不幸，她都要掉泪；这会儿，甚至她也觉得她自己是这些叫人安心然而坚强的伙伴中的一员。归根结蒂，不管她的同情是多么正确，她跟那个美国人斯科特先生谈论统舱里那个可怜的木雕艺人，是错误的。她回想起船长的指责，那是完全应该的；它给了她勇气。她有一会儿忘掉了她在漫长的生活中一直感觉到的种种琐碎的屈辱，她对高高在上的人们的恐惧，她是个低微可怜的女人——尽管是个教师和教授的妻子——那个卖肉的可以欺骗她，商店里的店员们可以怠慢她，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叫她上当的无足轻重的人。不可能再有这种事儿啦！她不再甘心处于次要地位被推挤和搪塞了。她眯缝着眼瞟了一下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决定要提

出她在房舱里的权利。她会教训那个女人的！她的心胸扩展了；由于她跟那个伟大而光荣的民族有同一个血统的亲人关系，她那颗心仿佛在暖乎乎的波浪上自在地浮游，尽管她可能是那种关系中最小的、最无足轻重的一员吧。然而，瞧到她那许多特权。

她继续和颜悦色地望着船长，敬仰他，因为他严格、坚强，不讲情面，当机立断地主持公道，是眼前看得见的神秘的男性力量的化身，他不但统治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生物，而且确实像圣父，统治着宇宙。在她周围的每一张脸上，她以为她都看到了反映出的荣光。

她说："归根结蒂，船长，人必须经常采取严厉的措施为自己防卫吗?"

"防卫?"船长尖刻地接嘴。"胡扯什么呀，我亲爱的施米特太太让人们待在他们恰当的地位上，让他们安安分分地待在那儿，这不能叫严厉，也不能叫防卫。这不过是遵奉和贯彻正常的事物规律罢了。"

她退缩了一下，但是勇敢地硬装出笑容。"错了，我总是犯错误，"她低声说。船长对她明显地龇牙咧嘴笑笑，表示赞同——女人几乎属于第一批必须让她们安安分分地待在她们的恰当的地位上。在他的男性的统治的眼光下，她浑身发热，心怦怦地跳动；她仍然微笑，垂下她那颗光滑的小脑袋，吃了一口腌泡汁炖兔肉。

里贝尔先生在这第一阵欢乐过去后，越来越心事重重起来。他进餐的时候，冷汗从他的两边太阳穴上渗出来，在他的秃脑袋上积成一道道细流，淌进他的衣领。他的呼吸开始急促，而且引起他的圆滚滚的肚子抖动。他停止进餐，推开盘子，拚命想着，下嘴唇撅出，像一个发脾气的孩子。他扭动一下身子，用餐巾擦

擦他的脸和脑袋，塞进他的兜里，马上再拿出来，折叠得整整齐齐，好像他在家里，小心地把刀叉交叉摆好；刀横过叉，一上一下；他奶奶教他一定要把刀叉在空盘子上摆成十字架形，作为感谢上帝赐食物的标志。

"请原谅我的退席，"他大惊小怪、匆匆忙忙地低声说，侧着身子走开，在他走近扶梯的时候，已经变成弯着腿的慢跑了——行动，迅速、决断——可不是，教授先生的话是对的。而他，西格弗里德·里贝尔，由于他自己的疏忽，可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软弱，竟然容忍自己在这艘船上被安排在错误的位置上，这跟他作为德国人的尊严是不相称的：他跟勒温塔尔住同一个房舱，这种事儿是压根儿不该允许发生的。这是不可原谅地违背正常的事物规律；这规律不但船长而且他都必须服从，而且务必使别人服从。这一阵子，人们可能在怎么想他呢？想他也许私下里对那个犹太人挺友好哩，平起平坐地对待他呢。里贝尔先生像记起了那些梦魇那样尴尬和困窘；在那些梦魇中，他总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在一个人群中，周围的人都穿着衣服，只有他赤身露体，显得分外注目；或者更糟的是，他发现他自己可怕地被暴露在干什么希奇古怪的、被禁止的事儿，这招致他受到一大群幽灵似的观众的谴责，没有一张脸是他认识的，但是他们人人对他，对他的一切卑鄙的行径、他的可耻的经历都很熟悉……

啊呀，天啊！啊呀，天啊！他对自己说，走近事务长的办公室的时候，走得越发快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不行，不行——这情况必须马上纠正，现在一切都必须改变啦！

事务长靠在他深陷的椅子里，在吃一大块他从餐桌上带出来的香酥糕，他临走的时候，虽然自知不对，却捞了第三块。他是个大胖子，而且总是越来越胖；饥饿却白天黑夜地折磨着他的

五脏六腑。他看到里贝尔先生从外面盯着看的时候，做了个动作把糕藏在纸底下，接着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把整块糕塞进嘴去。

“好吧，进来，”他冒火地说，一边吹掉香酥糕屑，给那口糕噎住了。他使劲地咽了两次，重复着说，“好吧，进来，请啊，”有点着重地说那个“请”字。他感到营养不足，为他的糕惋惜。他原来打算慢悠悠地享受的，而且他憎恨里贝尔先生闯进来。不管怎样，从第一天起，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这家伙；他打定主意，尽可能少给他办事，不管他要办的是什么事儿。

里贝尔先生马上直截了当地说明事情。他可以肯定，事务长会马上和清楚地明白这情况。“我坐在船长的桌子上进餐，并且为此感到光荣，”他说。“船长在挑选跟他同桌进餐的伴儿这事上是很严格的。他要是不容许一个犹太人坐在他同一个桌子上，那我干吗一定要跟他住同一个房舱呢？我一定要要求你马上纠正这个错误。”

“他不是犹太人，”事务长温和地说。“他妻子才是。我已经听说了。”他即使不是确实表示同情，至少假装情愿完成他作为事务长的本分，他的本分有一部分就是听像这个人那样的家伙发牢骚。他绝不能让这个可恶的、讨厌的东西抓住任何把柄，让他以为他受到了冷淡。“你说得对。我会来看有什么办法的。不用说，弗赖塔格只有一个恰当的地方可去：跟勒温塔尔待在一起。我早知道的话，我会高兴这么安排的。可是我现在想，”事务长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咱们将不得不要求阿尔内·汉森先生换过来，跟你住同一个房舱，因为他现在跟弗赖塔格待在一起。”

里贝尔先生听到这些话，耳朵里好像灌进一片惊天动地的

响声。“汉森不行!”他几乎叫起来,接着压低声音。“不行,这简直是一样糟。”

“为什么?”事务长问;他知道为什么。汉森和里贝尔第一天在甲板上为帆布躺椅有过一场小小的、愚蠢的争论,从此以后,两人互相厌恶和回避。事务长对这种胡闹不感兴趣——知道这种事情仅仅是他的一部分工作。里贝尔先生说:“这个家伙我不要他挨近我,就是这么回事儿。”

“好吧,让我来办吧,”事务长说,“我会去看有什么办法的。请一个钟头后再来。”

里贝尔先生准时再来;那个事务长,脸色喜悦,却只有坏消息。仅仅是为了要表明他确实想尽办法,什么事儿都试过了,他已经向汉森先生谈过里贝尔先生的尴尬的处境。“说到底,”事务长用安慰的口气说,“一个瑞典人至少是人嘛。”“那一个不是,”里贝尔先生苦着脸说。不管怎样,汉森先生并没有不舒服,事实上,他对弗赖塔格先生表现得很友好,而且愿意待在原来的地方——所以那一方面是解决了。不过,要是里贝尔先生愿意搬进一个三人住的房舱的话,毫无疑问,丹尼先生或者斯科特先生会愿意搬去跟勒温塔尔一起住,而里贝尔先生就可以跟两人中的一个和那个驼背格洛肯先生住同一个房舱。里贝尔先生激烈地反对。“不行,我再怎么也不可能这么办的!”

那好。那么,让格洛肯先生去跟汉森先生住,他是绝不会不同意的,事务长肯定地说。那么,弗赖塔格可以去跟斯科特先生和丹尼先生住。里贝尔先生考虑了一会儿这个主意,最后非常不情愿地决定,在一系列全都是痛苦的选择中,比较起来这个安排可能是最可以勉强接受的。考虑到这次搬动几乎已成定局,他去拾掇行李了。勒温塔尔不在那儿;他已经习惯除了睡觉外

都在甲板上打发所有的时间。里贝尔先生又一次回到事务长的办公室的时候，遇上了没法忍受的挫折。

事务长显然是逐字逐句地在重复着说，不管是什么情况，丹尼先生和斯科特先生绝不会同意换房舱。他们说，格洛肯先生个子很小，几乎不占空间，他们对他习惯了，他对他们也一样，他们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而且生活得挺舒坦，看不出有打搅自己的理由。

然后，事务长向里贝尔先生探出身子，用暗示的态度说："我来告诉你，他们确实是脚色，可不好对付哩，啊，我不是说发火，或者是那样的事情——不，恰恰相反。你一定听到过美国人拿人开玩笑——你知道，他们总是哈哈大笑。那可更糟。那个叫斯科特的家伙用美国俚语说了些什么，我想，我听不懂，不过不管怎样，他们两人哈哈大笑——是嘲笑，你知道，不是真正的笑，叫人浑身冰凉，血都冻住了。我恨不得把那个对我这样笑的人干掉！——哎，不管怎样，你不要上那儿去跟他们待在一起。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儿。我不信任美国人——他们都有印第安人，或者黑人，或者犹太人的血统——混血儿和野蛮人。他们绑架孩子，然后杀害他们，"事务长说，简直马上要突然掉泪了。"想想看，哪怕你交了钱，他们照样杀害他们！"

里贝尔先生一直在听着，整个脑袋像火烧似的，望着事务长的脸，急切地眨着眼睛，被这样突然离开正题的话气疯了。他怀疑全是事务长弄鬼。现在绝不是哭诉被绑架的孩子的时候——而且还说什么美国人来着！明摆着他跟弗赖塔格串通，那家伙带着他那个种族的厚颜无耻的态度存心挤进比他优秀的人中间，不管他们是不是要他；因为尽管里贝尔先生知道了种种事实，他绝不会承认弗赖塔格是个基督徒。他跟一个犹太女人结

了婚，所以他是个犹太人，这是铁定了的……或者也许他跟那些下流的美国人一起阴谋犯罪，他们可能自己也有一部分犹太人血统。至于阿尔内·汉森，他那个大鼻子可不是北欧日耳曼民族的，让他管自己叫瑞典人吧，要是他喜欢的话。那个事务长，不管怎样，分明是个叛徒，他本人同情犹太人；也许勒温塔尔早就收买了他，取得了跟一个德国人住同一个房舱的权利。里贝尔先生越想越火，最后勃然大怒，他的脸涨得通红，他对那个事务长喊叫："这么说，我挨了那些下流坯的骂，被他们嘲笑，你一句话都没有跟他们说喽？"

"要我说些什么呢？"事务长问。"我对他们的态度不负责任。"

"你让他们在一艘德国船上侮辱德国人，是不？好吧，船长会听到这事儿的，我们会知道他不得不对在他的船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个什么说法。"

事务长温和地举起一只手。"我热切地劝告你不要把我的任何事情去跟船长说，"他说。"请相信我的话，你会发现他不喜欢任何乘客卷进船上的事情。我说这话是免得你受害，"他亲切地添上一句。里贝尔先生看来确实火气在平息下来，陷入类似绝望的心情。"他们说长道短，他们干蠢事儿，我们何必在意呢？"事务长大方地、有点儿含糊地问。"想办法控制你自己，里贝尔先生，这不是个很糟的情况，过几天就结束啦！事情是不能在一天内解决的！"他现出发现了什么的神情，提醒他。"我们还可以想想另一件事儿。嗨，来吧，"他带着父辈的亲切说。"我们去好好地喝杯啤酒，可能会想出主意来。"里贝尔先生听到这话，精神好了一些，看来好像愿意忍耐一些时候了。

事务长使劲撑起身子，喘着粗气。这是他打盹儿的时候，然

而他不得不哄这个蠢货。他有礼貌地说："我们走吧，"抑制住伸出他巨大而肥胖的手，按在里贝尔先生的红通通、汗淋淋的脸上，狠狠地推过去的这个值得赞美的冲动，毫无疑问，这是对他自己的始终改变不了的精神伤害。

特雷德韦尔太太过生日，这不是她在火车或者轮船上独自个儿过的第一个生日；她感觉到了她的年纪，四十六岁了，对她的讲究美的观念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冒犯。一切四十出头的数字听起来都叫人扫兴，但是四十六无可奈何地是中年了；到了这个年纪，要想年纪轻轻就死是太迟了，要想到死，又实在太早了。

不管怎样，生在八月里的最后一天，这是个难以形容的日子——严酷的、过去得很慢的、阳光火辣辣的夏天下午，一点也对她不合适，然而她已经活到了这个年纪，这一生的生活可以说是跟这个尽是虫子的月分最相像……这时候，地上没有花，只有杂草；按照叫人沮丧的、流行的说法，灵魂也长出种种污秽的念头。低级的本能为害怕失去什么而惊慌，热烈地追求微不足道的享受。人变得强硬和冰凉，他们说，要不，就变得熟得快要腐烂和软糊糊；尤其是女人们，人们被告知，那么经常丧失她们的稳重、她们的体面。她们变得动不动就尖叫，发胖，或者瘦得像豆芽，喜欢偷偷地喝酒，或者唠唠叨叨地数落她们的丈夫；她们纠缠在不名誉的私情中；她们跟对她们来说年纪太轻的男人结婚，受到了她们该受的对待；要是她们有一点钱的话，就吸引着形形色色的寄生虫；搞同性恋的女人们鬼鬼祟祟地出没在附近，等待着寂寞和恐惧给她们可乘之机；啊，这足够吓得任何人心惊肉跳，特雷德韦尔太太说，摇摇头，又拿起她的杂志。

她半靠在她的帆布躺椅上，一边在舒适的似睡非睡中看一

本过期的《画报》杂志，一边在想她的年纪，以前她确实没有为年纪担心过，在这段日子里，时间本身像一只大蜘蛛，围绕着她的生命编织着一张厚厚的、沾满灰尘的网，编啊编的，直到它把一切都盖没为止——亮光遮掉了，脉搏变弱了，呼吸慢慢地被闷住了——死亡，死亡！她说，她的恐慌就像她小时候怕黑暗那样简单和无法抵抗。啊，多么荒谬，她对自己说，站起身来，放开杂志，记起了好久以前她的长辈们高兴地胡扯什么优美地变老的话；她当场就斩钉截铁地跟她们说，她永远不要变老，不管多么优美。而且她相信这个想法——那是一个孩子的看法。不过，那么，她到底长大了吗？难道她竟然毫不知道地从童年长到这个年纪，始终没有变得——讨厌的词儿——"成熟"吗？得了，人人知道，忧心忡忡的沉思和老是缅怀过去，是最确凿的变老的迹象。她离开躺椅，来到栏杆前——这么小一艘船，几乎像一座监狱，可以去的地方这么少——靠在那儿，在清新的凉风中呼吸——确信残夏的这一天在大西洋中部倒不很糟——她能够轻易地记得那些更差劲的生日。天气渐渐地不那么热了，阳光更苍白了；因为刚过去的两个黄昏，在远处水面上升起两根巨大的、一动不动的云柱，闪闪发亮，一片红色，充满低沉的雷声和宽阔、缓慢的闪电；云柱又在开始形成了，这次是以充塞天空的规模在形成。"要是我认识某个人能跟他一起看云该有多好，"她说，决定在晚餐前不想喝一杯鸡尾酒了。

想到晚餐，就想到她那个讨厌的同房舱的乘客利齐·斯波肯基克，她一直激动地不断把餐厅里发生的那件事情，排座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渲染得神秘莫测。"这事儿可出在昨天！"利齐喊叫。"我一直在等你说哩！"

"不过，是什么事啊？"特雷德韦尔太太问，懒洋洋，不关心。

“什么？你真的没有看出什么吗？”利齐追问。“在你眼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看不出？”

“我没有看，”特雷德韦尔太太说。

“我是巴不得告诉你的，不过，不行，你一定要靠自己去发现。”

“它真的跟我有什么干系吗，要不，难道我应该偷看吗？”特雷德韦尔太太问。

“那跟我们大伙儿都有干系，”利齐用提高了的、得意的声调说。“那是件实在了不起的事儿，它叫我快活，我忍不住想笑。”她确实笑了；特雷德韦尔太太听到了这笑声，想着要是一条鬣狗歇斯底里发作的话，它会不会发出这样的笑声。就在这个时候，她离开房舱，决定去呼吸新鲜空气，看看那本法国杂志，消磨下午其余的时间。她关上身后的门的时候，利齐在对她大声说什么来着？“问弗赖塔格先生——他会知道的。”记起了这话，特雷德韦尔太太听出了语气中她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暗示。那么，干吗不去找弗赖塔格先生呢？他们在哈瓦那的那段时候里曾一起喝朗姆鸡尾酒，他很和蔼可亲；干吗不一边喝鸡尾酒一边听听最新的丑闻，并向乐队点支“我是可爱的洛拉”呢；她甚至也许还可以在晚餐后跳一会儿舞呢。她开始寻找，结果在一间书写室里找到了弗赖塔格，他刚从一张桌子旁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个封好了的信封。他一看到她，就站着一动也不动，但是她说话说得太快了，还来不及把他的脸看清楚。

“你一定要出来，跟我一起去看云，”她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他向她走过去，脸色苍白，皱着眉头，带着完全不相信的神情问：“你在说什么来着？”

“哎，我到底说什么来着？”她问。“弗赖塔格先生，有什么不对头？”

“特雷德韦尔太太，请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你有意背叛我，辜负了我的信任，向那个丑女巫斯波肯基克拿我的妻子闲磕牙，给我惹下这一切愚蠢的麻烦，你还要在这儿干什么……？”

他的话一句接一句在一阵阵的热气中像爆炸似的直冲到她的脸上；她退缩，开始颤抖，不是害怕，而是良心不安，因为她记起了一切，而且知道了弗赖塔格在说的事情，发觉她陷入了利齐给她设下的圈套。“啊，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儿，”她用颤抖的低声说；她平伸出两只手，手掌向外，停在胸前。“她说你会知道的！”

“你简直愚蠢得残忍！”他又发作了，勃然大怒，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你已经对我干出了这种事儿，难道还存心嘲笑我吗？你能假装——瞧，难道你不知道那——那——”他结结巴巴地想给利齐一个脏词儿，终于没有说出口——“她在餐桌上，当着每个人的面，一古脑儿吐露你喝得醉貌咕咚……”

特雷德韦尔太太微微摇晃了一下，坐在最近的椅子上，抱住了头。

“——喝醉了，重复说了我信任你才告诉你的话，真不害臊……而船长那头猪，那头臭猪——”

“别用脏话骂人，”特雷德韦尔太太稍微提高一点儿声音说，摇摇头，好像她的耳朵能摆脱他的大叫大嚷似的。“我没有喝醉，这是诽谤——”

“他不但是头猪，而且是头最恶劣的猪，沾沾自喜的猪，他培养和喜爱他自己的猪猡性格；他吹嘘他的猪猡性格，他大吃大喝，狼吞虎咽，像一头猪；他简直已经变成了一头猪，他要是四只

脚爬的话，看起来要好得多，而且会更舒服——”

特雷德韦尔太太重新站起来，双手按住耳朵。

“我不愿再听了，”她冲着他那像岩石滑坡那样滚滚而来的话大声说，“除非你告诉我他干了些什么。”

“他把我安排在那个犹太人的饭桌上！”弗赖塔格喊叫，他的怒火已经爆发到了极点，却神秘地拐弯了，他停住了嘴，好像他的嘴被一只手按住了。

“这有那么糟吗？”特雷德韦尔太太温和地问，好像她在迁就一个疯子。“你真的在意吗？”

弗赖塔格仍然窝着一肚子火，脸色发白，稍微平静了一点，但是坚持他的观点，那就是强迫她明白、承认和接受这个事实：她该为整个事情受责怪。只要她喜欢，她可以爱要多久就多久地避免正面表态和使他脱离正题，但是他在把事实真相告诉她。

“我在意的是你的背叛，”他说。“船长存心侮辱我，还通过我侮辱我的妻子，可是他没法侮辱我们。他只能放肆地耍威风，那头肮脏的——”

“别，”特雷德韦尔太太，摇摇头，“别再说啦。”

“你要是个可爱的朋友的话，”弗赖塔格，他这会儿的声音强硬起来，充满痛苦，“或者是我家庭中一个成员，或者是我喜欢和信任的任何人的话，你干的事儿本来是不会叫我惊奇的。可是，我怎么料想得到这种背叛、这种恶意，却来自一个外国人呢？”

特雷德韦尔太太默不作声，像一个受审的犯人，在脑子里相当冷静地反复思索这个没法回答的问题，希望这场谈话可能结束，但是知道谈话会继续下去，直到这个痛苦的人把她从他的脑子里撵出去为止。

“当然喽，我不在意勒温塔尔，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也不在意

我，"弗赖塔格说，他正在开始编造勒温塔尔和他自己之间的相当文明关系，在编造过程中，像被催眠了似的几乎平静下来了。"我们要是试着谈话的话，会互相厌烦得要命，所以我想还是不试的好。他明摆着出身低微，可是我情愿要他，而不要船长和他的餐桌上那伙蠢货——至少他有正常的感情——"他踌躇了一下——"而且确实很有礼貌——"

他说到这儿顿住了，没法再编下去了。特雷德韦尔太太已经重新坐下了，全神贯注地听着。弗赖塔格也坐下了，向她探出着身子，又说起来，这时候，她说："他听起来倒好像相当好！"

弗赖塔格看上去垮了，好像他再也没法跟这个无法讲得通的人争辩了。"我的上帝，好！"他最后说。"不，他不好，我也不喜欢他，倒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要是他七辈子都是基督徒的话，我仍然不会喜欢他的，因为他是那种我不喜欢的人。这你能懂得吗?"他带着几分好奇心问她，好像他在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试她。"真的，他甚至不是那种我喜欢的犹太人，也许扯得太远了吧?"

特雷德韦尔太太听到这种演戏似的装腔作势的讽刺，考虑到他认为是她的错，断定她让他粗暴得够长久了。这时候，她回到正题上来了。

"我压根儿没法为自己辩护，"她告诉他，斟字酌句地。"可是你干吗要对我信任呢？我可没有要过啊。我甚至没有想到过那是对我信任。要是你早就告诉我的话——可是你指责我出于这么卑劣的动机——"她说话结结巴巴了，看到他那张现在神情困惑、悲伤的脸上显出几乎难以忍受的、不顾脸面的痛苦，产生了反感。他看来好像感到不舒服；他皱着眉头，两条眉毛中间已经出现一些新的皱纹。他看来跟阿尔内·汉森一样闷闷不乐。

他这当儿把那张不友好的脸转过来，正对着她，好像这样他可以听得清楚些，但是那双神情懊丧的淡灰色的眼睛最后避开了她的。

"……不是因为我有任何动机，"她迅速地继续说，"而确切地说是因为我没有。我不是你的朋友，怎么可能是呢？我要是早就是你的朋友的话，就会知道你的生活情况，绝不可能把这事儿讲给任何人听的。你指望我干什么呢？我也不是你的敌人。我以前简直没有想到过你。"

"谢谢你，"他沉痛地说。"你的话完全对。"

"别孩子气，"特雷德韦尔太太说。"我的意思是说，不是针对你这个人。我只是想说明，我对你还不够了解，所以没有为你保守秘密——不过，你干吗对待这件事儿像一个在这问题上叫我没法理解的人。"

弗赖塔格说得再简单不过了。"我独自个儿旅行的时候，是基督徒。跟我妻子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始终不很清楚这是为什么……也许你不了解德国吧。对我们来说，那儿的事情非常说不准，而且越来越糟……"

"可是你的秘密要是对你那么重要的话，你干吗要告诉我呢？"

"我原以为，你是很有同情心的。我说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后果。"

"哎，我也没有考虑过，"特雷德韦尔太太说，"而且我也得承认一件事儿。那天黄昏，我喝了整整一瓶葡萄酒。由于厌烦，由于心灰意懒，由于心情冷漠……"

"你比一个背信弃义的朋友更坏，"他突然恶狠狠地说，"你比一个最坏的敌人更坏。由于你的厌烦！你有什么权利感到厌

烦？冷漠——你有什么权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一点也不关心你周围的人？你对一个信任你而且从来没有伤害过你的人干了一件卑鄙的、背信弃义的事情，你却甚至毫不在乎——啊，你甚至不知道你干了什么。"

特雷德韦尔太太感到浑身燃烧着怒火。她不愿再为这么一件小事儿受人大叫大嚷地欺侮。

"你先背叛了你自己，"她用轻松、流利的声调说，"你把这一切实在闹得太过分了；你完全错了。我确实，全心全意地，"她对自己会说出这个词儿来也感到奇怪，"关心你的遭遇——"

"关心你干的那事儿吧，"他发疯似的咬住了不放。"别忘了，是你，是你干了这事儿……"

"我已经对自己感到足够的惊奇了，"她说，"也许你是对的，你可以爱怎么指责就怎么指责我；不过，你使我这会儿容易地坦白告诉你，告诉你，可不是，你又对了——我只是不要为这件事儿烦恼，我压根儿不打算为它担心，我再也不会谈它了。"

她站起身来，转过身子走了几步，然后转过脸来，等着听不管他可能要说些什么。当然喽，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说话是他的特权。她心怀忿恨，浑身直打哆嗦；她面前的那张脸显出一副自我专注、指责别人、完全正当的强硬表情，叫人讨厌。

"你全心全意地，"他说，"你没有心。你不懂得正在发生的事儿。不是只有这一件事——不，不，这是一辈子的事儿，整个世界上都充满着这种事儿——还一点儿没有结束这事的希望——看着你在世上最爱的人被那些不配跟她一起呼吸相同的空气的人看作下贱的东西！你要是能见到她的话，就会知道我说的话的意思了。特雷德韦尔太太，她是个娇小、苗条、极可爱的女人，在早晨最美、最愉快，她是天真的，天真的，她在哪儿，就

使哪儿的生活迷人,她说话的时候,像鸟儿在树上歌唱!"

他向她凑得很近,急迫地说,凑得这么近,她又能感到他呼出来的气了;他的脸现出焦急的紧张神情,他的眼睛含着眼泪,亮晶晶的。特雷德韦尔太太感到突然和惊讶,事先一点也没有准备,没有受到她自己的感情的提醒,终于让步和同意按照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懂得了他的痛苦是真实而可怕的,承认她的过错,承担这次痛苦的事情中的她的一份作为赎罪,不但承担这一份,而且凡是找上了他指责他的没有形状、叫不出名字、没完没了的人类剧烈的痛苦她都承担。她双手垂在身子两边,退后一步。当然喽,这是她的过错。

"别,"她说,"别再说啦。听我说。听我说一说。"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要求得到宽恕。你一定要设法宽恕我。"

轮到他吃惊了,情况相当不愉快地、叫人震惊地颠倒过来了。他一直在欣赏这个局面,在缓缓地运用他的沮丧的怒火对她造成的压力;他原打算把她侮辱个够,满足他的报复的愿望,使她受尽煎熬后把她撇下,不让她说一句话。这会儿,他不由自主地几乎顿时涌起一片宽容的、温暖的感情,他接着说:"啊,别,请别,"几乎是困窘地,"别这么说。我也感到抱歉。我们必须互相宽恕,要是我们这样讲下去的话——"

"事情是这么可怕,"特雷德韦尔太太说,声音有一点儿颤抖,"问题就在这儿。我们在这儿谈论这事儿,好像这是真的;我想是真的,可是在我看来像一场恶梦,我没法相信……"

"可这是真的,"他说,现在他希望安慰她。"啊,不,你当然不会哭的吧?"

"多么荒谬,"特雷德韦尔太太完全是平时的态度了。"我从来不哭。"她格格地笑起来,却忍不住掉下大颗的眼泪。弗赖塔

格是个结了婚的男人，对女性的一些紧急情况已经习惯，心情镇定，向周围瞟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人走进书写室见到这情景，把身子挪到她和门中间，作为屏障，然后掏一条白麻布大手绢给她。"喂，喂，"她在擦眼泪擤鼻子的时候他安慰地说。"啊，这好些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们去好好地喝一杯，一大杯鸡尾酒，你说怎么样？"

特雷德韦尔太太说，"等一下。"她从她的手提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粉扑和唇膏，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众化妆。有一个人看见跟一伙人看见一样使人身败名裂。她不在乎。她筋疲力尽了，一下子，平静了，泄气了，这场装模作样的戏剧是那种她厌恶的活剧——啊，一副哭哭闹闹的邋遢的场面，而且她一直不信任弗赖塔格，他显然是个讨厌的惹事者——然而，不管这是怎么回事，她有那么一刹那，甚至在当时就知道这场面不可能持久，心里感到一阵轻松。她不顾后果地，或者是怀着类似的心情说，"我喜欢来一杯鸡尾酒，大大的一杯。"接着他们一起出现在过道内，像两个亲切而谈得来的人，显然关系再好不过了。

弗赖塔格说："我不知道今夜我是不是睡得着，会一直想着把船长扔下船去，让这只小耗子从他自己的驾驶台上摔进海淹死，有多有趣。不过，我现在不会受这个诱惑摆布了，谢谢你。"

"为什么？你对船长要干什么我不在乎。"

"你反正使我的头脑冷静下来了。我还得去德国，把我妻子和她的母亲接出来，这才是我不得不想的一切；我必须在不引起任何注意的情况下办成这件事儿。淹死那个船长确实是，"他说，"一个叫人高兴的白日梦，可是我决不该放任自己把梦做下去。我必须把种种事情安排妥当。"

他们坐下以后，他问："真的是你的生日吗？你刚才进来的

时候，是这么说的吗？”

她点点头。“四十六了，想想看！”他对她的不符合女性做法的坦白，模模糊糊地有点儿反感；为了掩饰反感，他说：“多叫人高兴！还有许多，许多哩！”

“不会太多啦，谢谢。我会让你知道的，要是我再要一个生日的话。”

他放眼望着酒吧间，这会儿人拥挤起来了。珍妮·布朗和戴维·斯科特坐在高脚凳上，用墨西哥方式招呼他，右手举得跟脸一样高，手掌向上，手指头扭动。他用同样的姿势回答他们；特雷德韦尔太太说：“我认为这挺漂亮。”弗赖塔格说：“他们说，这个举动的意思是‘走近些’，”接着继续把他的眼光在一张张脸上看过去，好像他盼望每个人都注意到他在场，虽然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件事情。吕茨一家子和鲍姆格特纳一家子依次看到他在看人，对他点点头；不用说，他们是船上最迟钝的人当中最迟钝的——可能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坐在船长的餐桌上的人都在那儿，明显地没有感觉到他在场。那些糟糕得不像话的西班牙人，甚至他们也不向他转眼看一下，尽管有一个姑娘，年轻的孔查，近来一直跟在他后面，好像她有什么心事似的。甚至那对年轻的古巴夫妻也不睬他，虽然他原来一直跟他们的小孩子们一起玩过游戏，吹过纸笛，让他们用纸手枪对他射击，把两个孩子分别扛在两个肩头上在甲板上溜弯；甚至那个驼背，甚至那个从得克萨斯州来的怪家伙丹尼，不知什么缘故，竟然也没有看到他；他没有想到先跟任何人说话，也不记得他平时希望他的所谓的旅伴别挨近他。

“我刚才忘了，”他说，眉头皱得更紧了，“可是你愿意被人看到跟我在一起吗？我在这儿是贱民，别忘了。”

"你能肯定吗？你数过你的朋友们了吗？"

"据我所知，我本来就没有任何朋友，"他说，很快就恼火了。"顶多比够得上聊聊天熟一点儿。"

"那么，你干吗现在要计较有没有人跟你说话呢？"她问；她的感情慢腾腾地、很肯定地退回到它的藏身所在。"我又惹是非了，"她提醒自己，一手握在鸡尾酒杯的长脚上，眼睛盯着弗赖塔格先生的领带结下面的一个地方，相当冷静地想着，这个人跟那个讨厌的丹尼一样不可能情况正常。不过，因为怕他会怀疑她的心境起了变化，马上又说，她在船上发现了几个讨人喜欢的人——她没有说他们的名字——然而，确实是这样，哪怕没有一个人在剩下的航程中望她一眼，她也会照样这么快活。

"我也一点不在乎，"他说，"当然不。可是别忘了，人们，尤其是那些你瞧不起的人，突然觉得他们自己能冷淡你的时候，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可不是，"她说，喝干酒，吃油橄榄。

"再来一杯？"他问，不等回答就说："请一定要再喝一杯。我也想再喝一杯。"

"这敢情好，"她说。他们在等上酒的时候，特雷德韦尔太太，胳膊肘搁在桌子上，两个手掌捧着两边脸颊，用她惯常的、在寂静中随便说话的声音说，所以别人用不着费心去记住一言半语："想想看，我以前总是以为你是世上没有一件麻烦的人——也许是唯一的一个；只要我没有把那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告诉那个讨厌透顶的利齐的话，我想我仍然能这么以为的。我觉得这事儿挺有趣，而且我也用不着想着你。这下，我以为，咱们有了联系，咱们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朋友，而且不管是不是心情

好，互相说话要小心，只是为了不让那一切咱们永远不会再看到的、或者说我不希望再看到的陌生人看到咱们在互相剧烈地争吵，且不说利齐、里贝尔、船长和其他一切人吧……”

弗赖塔格在听；她的话使他有点儿不安。他已经想到，在书写室里这么亲密的场面可能招致她产生进一步亲密的念头。她从前一定是个很标致的姑娘，她现在也并不难看，显得气度文雅，有点过分娇弱，但是一想到跟一个四十六岁的女人上床，他吓坏了，害怕脸上会露出吓坏的神情。你要是要把一条狗训练得对你无限忠诚的话，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经常揍它。有些女人也差别不大。这一个在精神上确实挨了一顿痛打——她已经挨过了——但是他现在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将“甩不掉”她了吗？他一定要弄清楚，要是他办得到的话。

“可咱们是朋友嘛，可不是吗?”他谨慎地问。

他得在过些时候才发现，他用不着害怕她的种种迫害，而且将对他自己为这事儿恼火感到惊奇；但是她对这问题的回答并没有平息他眼下的忐忑不安。然而，特雷德韦尔太太又神态自然了，微笑着挨过她喝掉第二杯鸡尾酒那段时间，等待溜走的时刻。

“自然喽，”她说，声调中信心十足，他不可能梦想她正好指的是相反的意思。

他断定，他只需要适当地谨慎，有一点儿提防，就可以避开她。他一口喝干了酒，放下酒杯。特雷德韦尔太太也放下酒杯，没有喝干。他们分手的时候，他又拿不定主意了：他压根儿不要她，而他不愿让她完全离开。“经过了这一切不愉快的事儿，”他说，“这倒变得有趣了。我觉得咱们互相的了解多得多了吧?”

她朝他的方向微笑，透过他好像透过一块玻璃似的望出去。“啊，多得多了，我可以肯定，”她说，接着慢悠悠地走开去。他心中又冒起对她的怒火，不过是另一种，不是狂怒，而是强烈的怨恨。他有这么许多理由向各方面发火，无法把握住真正的、主要的理由。不过，其中有一个理由是，他冷不防被船长逼迫得无可奈何地采取行动，而那个女人——他注意到，她在从他身旁走开的时候，裹在她剪裁合身、价钱昂贵的亚麻布连衫裙内的扁平的屁股和细长的大腿几乎看不出在移动——该为整个事情受责怪。尽管她短短地掉了一会儿泪，他不相信她真正感到一点儿悔恨；尽管他说过那些话，狂热的欲望却在他心中不停地折腾着：他要更进一步地羞辱她，让她在公开场合出乖露丑，好生教训她……这当儿，勒温塔尔先生跟往常一样独自个儿进来了，站在酒吧柜前；啤酒端来给他了。弗赖塔格觉得喉咙堵住了，好像他被伤害感哽住了似的；有件事是肯定的，他不情愿跟那个犹太人一起坐一张桌子……不，他向自己解释，好像在跟一个不赞成的陌生人争辩似的，不，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是因为竟然这样对待我们两个人。但是，他再怎么也不会承认，除了他自己以外，别人受到了亏待。他脑子里像闪过一道亮光似的想起一个念头——我对犹太人没有偏见——我怎么可能呢？玛丽就是嘛，玛丽——但是他干吗一定要为那个小小的可怜虫，干的又是那种滑稽的买卖，担心呢——他只会到处成为一个笑柄。“他有钉死耶稣的十字架的碎片吗？”珍妮问过；弗赖塔格不怀好意地为他的回答感到高兴：“我听说他有，藏在一个小小的手工雕刻的象牙圣盒里，装着一面放大镜——跟头发一样粗细的一丁点儿碎木头！”

“我说不出我出于什么原因，可是我发现这叫人恶心，”珍妮

说。“就像要是一个基督徒设法出售给他约柜[1]的碎片，或者哭墙[2]的残块，或者亚伯拉罕的剪下的趾甲呢？”

“他会精明地不接受，”弗赖塔格说。他会说：“这一行的货我自己进得太多啦！”他们轻松地笑起来，但是这会儿，弗赖塔格觉得他受到了罪过的侵蚀，跟那个浅薄的姑娘一起一再嘲笑玛丽的一个同胞。但是那是发生在他被撵出船长的餐桌以前嘛。他难受地提醒他自己，他一定要容忍勒温塔尔，不管他说过或者干过什么，一定要有礼貌地对待他——哪怕没有别的理由，为了玛丽，他也应该这么做。为了他自己的自尊心，他也应该这么做……我会吩咐把饭菜送到房舱里来，他作出决定；有时候，我会在甲板上进餐。我在不得不跟他说话的时候，就跟他说。

勒温塔尔先生自从遇上了弗赖塔格先生以后，他的情绪好了一些，他的心境也平静了一些。他一直感到比较安全了一些，当潜藏的敌意、邪恶的算计、无形的憎恨的气氛，终于，迟早难免地，不管在哪儿，变得有形状，有色彩，有方向，有语言的时候；当异教徒世界的迫害、他作为犹太人的不可逃避的命运，以及对他的选择无法解答，当这一些毫无疑问不再观望而是给予他压力的时候，他心中确实时不时地冒起热乎乎的、得意扬扬的感觉。事情变得不像他原来害怕的那样坏，即使他想象不出迫害将以何种形式出现，然而他发现他再怎么也不会对任何事情真正感到惊奇了——没有两次是相似，而总是一个样——用话

---

① 约柜(Ark of Covenant)：《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古代犹太人存放上帝约法的圣柜。

② 哭墙(wailing wall)：公元70年被罗马人所毁的第二圣殿残存的西墙，犹太人作为祈祷的场所。

语的形式吗，说些什么呢？侮辱、威胁、谩骂、下流的笑话——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没法碰我一根汗毛；他只要从他们得到一样东西；他已经得到了——跟他们做买卖。干吗不把雕刻的圣像卖给异教徒呢，要是他们要的是这个的话？而且价钱也卖得很好。他在挣钱；他还会挣得更多；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可以在各地用钱买到多少称心的地方。某一天他能看到自己用钱买地方可以到什么程度——在那些地方没有人敢把他撵出来——那才叫真正的乐事哩！他的情绪快活得像过节似的；他一口喝干他的啤酒，再要一杯；他盼望那天黄昏弗赖塔格坐在那张餐桌旁；他会让他感到，那是他的，勒温塔尔的餐桌，而弗赖塔格是被勉强容许待在那儿的……勒温塔尔点燃了一支上等雪茄，坐定在他的啤酒杯前。他听说那头猪里贝尔怎样想办法要把他撵出他的房舱，但是没有成功，因为也没有人要里贝尔！感谢上帝，他最后抵达杜塞尔多夫以后，这倒是可以告诉萨拉表妹的一条重要新闻。过了一些时候，进晚餐的时间到了，弗赖塔格先生没有出现，他不得不独自个儿吃他的没味道的罐装鱼，他有一点儿扫兴、失望。他一定要说服他回来，哪怕是为了摆摆场面。他会在某个时候，在甲板上，当着许多人的面跟他说，声音响得让他们听见："你千万别误会我说过的话，弗赖塔格先生。你是极受欢迎坐在我的餐桌上的，要是你在别处没有座位的话！"他乐于听到他对这话的回答！

当他听到那个服务员干脆地回答他的问题："弗赖塔格先生喜欢独自个儿进餐，晚些时候，"的时候，他大为尴尬和不高兴。

特雷德韦尔太太坐在她铺位的边上系凉鞋，准备晚妆；利齐一看到她，就格格地笑和颤抖着声音说话。特雷德韦尔太太向

上瞟了一眼，什么也不问；利齐愣头愣脑地说："啊，我一定要听听你向弗赖塔格先生提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他不得不说些什么！"

"没有说很多，"特雷德韦尔太太轻描淡写地说。她站起身来，抖搂开她那件折叠着的银色长袍，套到身上，然后向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束上腰带。"整个说来，他看来好像觉得这是个往好的方面的大变化——他的同餐桌的人，看来他好像认为……"她提起她的裙子，轻轻地关上门。

"戴维，"他们的酒杯碰在一起的时候，珍妮说，"祝你健康，干杯，戴维宝贝儿！你没有发现弗赖塔格离开船长的餐桌被安排在别处这件事儿吗——你知道吗，想想看他告诉了我那一切事情，可他始终没有告诉我关于他老婆的这么一件重要的事儿！不过，他以为她在月亮上！——难道你不以为这是你听说过的最丢丑的事儿吗？"

"不，我听到过更糟的事儿，"戴维说，"你也听说过。可是这也很恶劣。"

"我认为我们应该跟弗赖塔格说说，让他知道我们的想法！"

"去吧，"戴维宝贝儿说，眼睛里冒出怒火，声音冰冷。"从什么时候起，你需要一个借口了呢？"

"你在这件事上简直叫人受不了，戴维，"她用痛苦的低声说。"你明知道，他是个结了婚的男人，热爱着他的妻子，他爱好交际，可是孤单，在船上没有多少人可以谈谈——啊，整个事情是这么无聊，我都不好意思提！我真不明白。你以前从来不这么忌妒的……"

"我以前不忌妒吗？"戴维词锋犀利地插嘴问，"你能肯定

吗?”

“哎,你上次错了,”珍妮说,“现在你又错了,——可是我不计较,只要——”

“只要什么?”戴维温和地说,因为他们两人都觉得这种同样靠不住的温情,使心会变软,会使他们进一步犯错误。“我要是忌妒的话,你不是能感到有一点得意吗?一定是这样,你不这么认为吗?对我的行为的任何另外解释都是愚蠢的。”

“不,我不感到得意,”珍妮说,“不过,你知道我刚才脑子里有什么打算吗?你会发火的。我刚才想,你可以邀请弗赖塔格来跟我们坐在一起,他跟那个怪里怪气的小个子坐在一起一定难受极了……”

“不,我不发火,”戴维说,“我只是对你的清晰、完美的脑子转出来的念头受不了。也许勒温塔尔也不快活哩。”

“嗨,那还用说,他怎么会快活呢?可是他以前独自个儿一直也处理得挺好嘛;要是弗赖塔格上我们这儿来的话,那么勒温塔尔就恢复了老样子——完全舒服了。”

“你凭什么认为弗赖塔格会高兴跟我们来往和交谈,而不高兴跟勒温塔尔待在一起呢?”戴维问。“我们怎么知道,他跟勒温塔尔在一起不是心满意足呢?”

“我原以为你能想到的。”珍妮说。“我把这件事儿留给你去办。”

“为什么?他是你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十几个词儿的话。”

“我们应该有共同的朋友,”珍妮说。“我们应该试着喜欢同样的人。不过,该由你去请他。”

“我弄不懂你脑子里在转什么念头,”戴维说;他的鼻子变得

苍白和尖起来了，"可是我以为你在尝试把我当丈夫对待。"

"我至今没有过丈夫，"珍妮说，"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指望受到怎样的对待。"

"要是你喜欢的话，去请弗赖塔格坐在我们的餐桌上就是，"戴维说，"我会高兴过去，跟勒温塔尔坐在一起的。"

他们的心又突然硬起来了，他们两人都对这感到惊奇。他们冷冰冰、恶狠狠、固执地交换眼色，都决定应该由对方挽救这个破碎的局面，要是有什么破碎的局面得挽救的话。在酒吧间的另一边，两人都看得很清楚，引发他们争吵的罪魁祸首，或者不如说他们争吵的借口弗赖塔格正在跟特雷德韦尔太太一起喝鸡尾酒，他们两人神情相当平静，而且模样漂亮，并不要求任何人瞎起劲去帮忙或者同情。一看到这个场面，珍妮的沉着的态度、她的自信、她对自己观察事物的信心顿时烟消云散。她背对戴维，弯下身去，拾起不管他们打破的是什么局面的第一个碎片，接着是另一片，开始设法把那些碎片拼凑起原来的形状。

"戴维，宝贝儿，我想再来一杯——我想喝许多杯。我天天听到跟我毫不相干的其他事情！"

鲍姆格特纳两口子带着他们的年纪还小的儿子汉斯，坐在酒吧间里那张最大的桌子附近；大桌子周围挤满了那个西班牙歌舞班子的人员，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一大块一大块楔形的蛋糕，灌着一品脱一品脱加牛奶和糖的咖啡。鲍姆格特纳太太忍不住说到这个场面，有分寸地表达了她对社会道德的看法。

"他们真是生活有节制的人，"她发表意见，向她丈夫那个几乎已经喝空了的球形白兰地酒杯瞟了一眼。"瞧，在整个航程中，没有人看到他们喝比佐餐酒更烈的酒，几乎总是喝咖啡！"

"有种种上瘾的人，也有染上咖啡瘾的，"鲍姆格特纳先生提醒她。"还有那些狼吞虎咽地吃大蛋糕和油酥点心的人，糟蹋他们的健康！"他用严厉的眼光迅速扫过她盘子里那些堆着掼奶油的点心。"那些西班牙人不是凭食物就能判断他们的道德的人，我亲爱的，不管他们吃些什么。仅仅戒酒对人们有什么用呢，他们陷在其他种种不良嗜好中嘛。"

"你怎么知道?"鲍姆格特纳太太问。"我喜欢看他们跳舞；要是那些女人确实轻佻，哎，她们毕竟是吉卜赛人嘛。"

"轻佻！"鲍姆格特纳带着无限含意说。"喂，我亲爱的汉斯，晚餐前别再喝紫莓汁了，那会败坏你的胃口。"

他又要了一杯白兰地，为鲍姆格特纳太太要了一小杯樱桃甜酒；她带着责怪的神情向他微笑，然后坐着，时不时地闻闻那杯甜酒，用舌头舔上一点儿。但是，没用，从其中得不到乐趣……唉，可不是，从生活中的每一样东西中都得不到乐趣啦！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让甲板上的服务员把她的帆布躺椅的椅背升到舒适的位置，把她的红绸面罩更往下拉一点儿，好把她的眉毛多盖掉一点儿，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让斜射来的阳光在她的脸上投下玫瑰色的亮光，第二个是她在记她的近来被忽略的日记的时候，保证没人打搅。

"尽管我这样说并没有夸张，我活着的时候，没有一刻，不管是醒着还是睡着，可不是，甚至在最深沉的睡梦中，不在想念跟奥托作伴和交谈，然而在过去的几天里，要是可能的话，我比以往更强烈地想念着他，由于有一场咱们本来应该一起欣赏的小小的风波——一个好得足以编个戏的滑稽的场面：一个娶了个犹太妻子的基督徒被错误地安排在船长的餐桌上！他还是个最

迷惑人的像模像样的年轻人——人们只得惋惜他的糟糕得不像话的趣味。然而，在这种问题上，是没有机会获得容忍的——再简单不过了，他一定要从正当的德国人圈子里被无条件地清除出去。我们坐在船长的餐桌上的人，不用说，都高兴地一致认为，他应该被打发到他的合适的位置上去，跟那个犹太人坐一桌。我听说，这件事儿在其他的乘客中间引起一些小小的骚动。那些讨厌的美国人，还有粗俗的吕茨一家子（瑞士人！），甚至更粗俗的鲍姆格特纳两口子（我想是巴伐利亚人）对他表示了引人注目的同情。我对那些美国人倒不感到惊奇，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卑贱，让他们去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吧；但是甚至那些最低下的德国人——人们会以为他们的血统会对一件这种事情作出恰当的反应，想都不用想一下。唉，事情并不总是这样。在墨西哥，我发现情况叫人相当心烦。我知道在那儿正统的社交圈中的最纯正的德国人邀请——确实不是经常——他们的犹太顾客或者商业合伙人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就餐。他们向我辩解——'啊，那不过是个买卖问题罢了，'他们说；或者说，'你知道我们在德国想都不会想这种事儿。在这儿，这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这的确有关系，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上帝在看我们；我们的死去的英雄在天上痛苦和惊奇地俯视着我们！我的奥托在一次战败后写信告诉过我这事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对一切事情的本能是绝不会错的！他夸口过，没有一个犹太人跨进过他父亲的家门，一代代地回溯上去，直到还记得的那最远的一代中都没有。可是，我不能没完没了地说这事儿——这实在太甜蜜和辛酸了。

"还有一件里贝尔先生遭到小小的屈辱的事儿，他被安排跟那个犹太人住一个房舱；现在，他非住在那儿不可了，因为没有

别的地方可以安排他，想想看，我不怎么在乎里贝尔先生的遭遇，他是那么粗鲁和庸俗——他为什么会坐在船长的餐桌上是个谜，除非因为他算是个出版商，我认为这一点值得考虑——然而，我还不至于残酷得说他活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不用说，事务长在为一切事情受到责备；他转过来责备墨西哥城的船票代理商，说他给许多乘客提供的资料不完全，或者引人误解。我谁也不责怪，而只是从这个小小的节外生枝的事故中得到乐趣；在这次说起来一定是无疑有一点儿沉闷的航行中，这个事故提供了一个叫人稍微轻松一下的机会。”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把面罩推上去，套上自来水笔，文静地探出身去，伸出她的脖子和两条胳膊，来减轻她书写的劳累，真不幸，偏偏正好吸引了一个西班牙男舞蹈演员的注意，那个他们管他叫蒂托的，被人认为是洛拉的丈夫——歌舞班子里的“明星”，那对身分模糊的孪生兄妹的假定的父亲，尽管他们不大像是人生出来的，倒不如说，是两个人们猜想带着一阵硫磺[①] 味儿出现，又在眼前消失的小魔鬼。不过，两天前晚上，当她跟一个最俊的年轻船员跳罢了一支舞，这个蒂托不知脸皮有多么厚，竟然大胆地请她跟他跳舞。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她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不管她什么时候记起来就会脸红，满脸通红，产生发出火辣辣的疹子的感觉。她想尽办法不去记它，下定决心在日记中也只字不提，也不去想它；她甚至重复背诵她能够记住的一切祈祷文，一遍遍地迅速背诵，作为抵御邪恶的咒语。

她没有用相当从容、友好的语调拒绝他——对一位绅士她是经常这样做的——这样他就不会怀疑她害怕他这个放肆的提

① 硫磺是地狱中的燃料，此处指那两个小孩来自地狱。

议，她站着，呆呆地一动也不动，嘴唇张开着，没法说出一个音节；他的黑眼睛像蛇的眼睛，邪恶地闪闪发亮，离她只有几英寸；她感到没有得到她同意她就被搂住，像一片云似的被不知不觉地带走了，在她经历过的最轻灵、最肯定、最温柔的搂抱中，这一次的跳舞是从她的天真的少女时期起她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她自己又变成一位像薄纱那样最轻盈的纯正的淑女了——啊，不，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对自己呻吟，我能干这样的事儿吗？啊，我真的允许发生这事儿吗？

一曲跳罢，他很快地亲了亲她的手，一溜烟似的走了，撇下她独自个儿站在那儿，头昏眼花；利齐·斯波肯基克在像一架旋转木马似的跟马勃菌那样圆滚滚的里贝尔先生旋转过去的时候，嘲笑地对她叫道："你的响板在哪儿？"那个年轻的职员这时候又回来，要求再跟她跳一支舞；尽管他先前看来是那么文雅和潇洒，这会儿，他们在旋转的时候，几乎步子也配合不到一起了；尽管他相当风趣地说："我一会儿也不敢让你独自个儿待着，一个吉卜赛人会绑架你的！"她知道她同时在被提醒和责怪。在想到她自己的岂有此理的行为，想到她的奥托——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个执法者——会给她怎样的惩罚时，有那么一刹那她几乎庆幸他不在场。正确的念头马上在她心中涌现，她认识到只要奥托还活着，啊，只要他还活着，她压根儿不会上这艘倒楣的船，不会跟这些低下的人来往。她一直保持着一位贵妇人的神态和举止；她的丈夫不管她处身在哪些人中间，都为她骄傲！嘿，她一定要向利齐表明态度，确保使她不敢在船长的餐桌上提到那个西班牙人的冒昧的行为，也不会容忍任何别人拿这件事儿口没遮拦地开什么玩笑。她整个人变得僵直了，但是实际上大可不必。没有人提这件事儿——甚至好像没有人听说过这件

事儿。甚至利齐在第二天也从来没有放肆地向她露一丝鬼鬼祟祟的微笑。结果，这反而更糟——他们的不当一回事可能是对她的行为和道德的一种批评方式——然而，她问自己，有哪个人可能说什么或者干什么使情况好些呢？

她一定要干脆忘掉，就像她在忘掉堂佩德罗，就像她在忘掉她这个出身贫困的姑娘不得不通过自学在英国当女教师的种种痛苦经历；就像有时候她真害怕的，她在忘掉奥托。不管什么时候她记起奥托，这倒是经常发生的，在她的有点模糊的记忆中，他不再是个活生生的人，说话的声音也不像一向那样洪亮地传进她耳朵，不；他现在出现的时候，是个全身发光、离地几英尺的形象，像个来访问的天使，穿着纯白的金边制服（虽然他生前是个军官，却是炮兵部队的，不是海军），脑袋周围有一个彩虹的光环，使他的五官相当模糊。她已经多年没能看到他的面貌了；而今，她不得不经常费劲地看和摸这个形状奇妙的、金光闪闪的脑袋，她从前是把它搂在怀抱里亲吻，对它唱歌，好像他是个小孩似的，摇晃着他入睡，他们两人热情如火……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有一种正在被水淹没的感觉；她闭上眼睛，喘着粗气，脑袋眩晕；她重新睁开眼睛，只见蒂托风度优美地向她弯着身子，他穿着紧身的黑舞蹈衣、红腰带、敞胸的短上衣、有褶裥的衬衫，等等；他在说话——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左手拿着一摞小小的不知派什么用处的票子；他抽出一张，向她递过来，没有微笑，只是用他的凝视吸引住她的凝视，好像他打算催眠她似的。里特斯多尔夫太太伸出手去拿票子，票子缩了回去，他说："等一等。让我跟你说件事……"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的脑子清楚了，她坐起身来，注意地听着，估计会听到一次见不得人的、被禁止的，或者至少是不体面

的活动。不料那是一次促使人和睦的、孩子气的、简单的活动。歌舞班子希望组织一场船上人人都能参加的小型联欢会，一场特殊的欢乐的晚餐会，每个人都会戴着面具出席，而且要调换餐桌的座位。将会为大伙儿提供特殊的音乐、舞蹈。歌舞班子自告奋勇在它的全部节目中拿出最精彩的在整个黄昏表演；接下来是抽签，备有一些精美的奖品，奖品是从特纳里夫岛的圣克鲁斯市的店里买来的，那儿以精致的艺术品和工艺品闻名。这完全是在船抵比戈的上一夜--种对船长致敬的行为；歌舞班子在比戈上岸。

"我们一直在说，真可惜，度过一次这么长的航程，竟然没有一场联欢会，"蒂托认真地说，好像完全是个想办件好事的人。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的脑子在别的方面也清楚起来：她的商业本能在发挥作用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你的话听起来很实惠，"她对他说。"你怎么这么讲究实际？"

"我是班子的经理，"他跟她说，"又是导演，而我妻子是我的助手。"

"洛拉？"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带着居高临下的态度说。

"是的，堂娜洛拉，"他傲慢地纠正她。

一听到他的声调，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脑子里的迷雾一扫而空。"你得让我想一下，"她慢腾腾地说，手在挪动，好像她要重新打开她的日记本似的。"我对任何形式的抽奖游戏不怎么热心——"她转动眼睛，向周围看看，看到利齐·斯波肯基克就站在隔开两张帆布躺椅的地方，拿着一本她并不假装在看的大开本的杂志。这个景象使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着实恼火，她坐起身来，态度十分坚决地说话了。

"你的抽奖游戏的票子多少钱一张？"她尖刻地问。

“只要四马克，”蒂托说，扭曲着他的嘴唇表示他们两人一定会认为那是一个多么微不足道的数目。

“钱我倒不成问题，”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有点儿担心地注意到这个场面再引人注目不过了。人们已经开始晚餐前的散步，纷纷走过。那对新郎和新娘，不用说，是不会注意的；舒曼医生，啊呀！那些古巴学生，这些天来，稍微安分一点儿了，但是一肚子坏水，嘴毒得很，你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乏味的吕茨两口子带着他们的乏味的女儿，除了说长道短，没有别的事儿可想！那两个教士——她一向对他们鞠躬，不过这会儿她希望她变得看不见。那个讨厌的美国人丹尼，流露出不怀好意的讥笑和恶毒的眼神——看来船上整个头等舱的乘客趁她陷入困境之际在看热闹。这件事她再怎么也说不明白了，因为蒂托向她弯着身子，显出一副非常自信的欢迎神情，好像她可能就要接受他的喝咖啡的邀请似的。他手上的那摞票子不见了。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鼓起浑身的劲儿，坐得比什么时候都更直，同时注意到洛拉和安帕罗也穿着有褶裥的舞蹈衣服，正一起靠在附近的栏杆上；她坚决地说话了。

“我一定要向其他人更多地了解这事儿，”她说。“它有点儿不清楚，我还没有确切地弄明白你希望我参加的是个怎么样的会。你提议的不符合习惯。在那些最好的轮船上，你会发现没有这种在中途，或者接近中途的时候，为船长举行演出的习惯。为船长举行晚宴的恰当的时间，你会发现我是对的，是在抵达终点港前的倒数第二个晚上。相信我的话，我直到现在为止一直乘最好的轮船旅行，上流社会人士就是这么干的……最早也要在倒数第三天晚上，取决于天气或者其他这类情况……不行，你急着硬要提前举办这个晚会，只是因为你们得在比戈上岸，我看

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大多数人要继续航行到终点。在我们马上要到不来梅港以前，我将高兴地参加任何向船长表示我们的谢意的小小的计划，因为他在航行中一路不辞辛劳地为我们服务。在此以前，不行。请你千万原谅。”

“可是，我们在比戈离船的人也希望对咱们的高贵的船长稍稍表示恰当的敬意，”蒂托说，举止完全合乎礼节，说的德语也相当过得去。

“这不符合上流社会的人士的办事方式，”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回答，这会儿完全泰然自若地做起老师来了，她的灰眼睛里闪出使徒似的亮光。“我看没有理由认为，要是我们给船长提供一场不按照社交生活公认的方式举办的联欢会的话，他会看不出其中的不一样的地方……再说，也许你不知道，从来没有——说真的，我记不起在这种场合有过商业和抽奖活动搅和在内。没有人为船长的晚宴买票。说真的，在最后的情况说明中，我要试着向你说明白，船长的欢送宴会是船长出面邀请乘客的，不是倒过来请的。食品、装饰品、小礼物、音乐，确实，一切东西都由餐厅供应，只有香槟酒除外，不但船长的餐桌上的客人，而且全体乘客都在被邀请之列。所以，”她得意扬扬地结束这场谈话，因为蒂托一直全心全意地在听，她也希望他能把她这堂课铭记在心上，“你和你的西班牙朋友们一定要在私下里干你们希望干的这件事儿，别把一些对这种事儿有不同看法的人扯在内！”

蒂托跟洛拉和安帕罗很快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她们两人已经挪近了一些，她们的薄纱短斗篷挎在胳膊弯里。他行了一个模仿得很好的德国式敬礼，潇洒地咔嚓一声碰了碰他的漆皮舞鞋的后跟，微笑着说出一连串连珠炮似的西班牙语：“不管你喜不喜欢，你这用老太婆的屁股肉做的臭气熏天的德国香肠，我们

一定要办我们的演出，你一定要出钱赞助。”洛拉和安帕罗忍不住尖声大笑，为他的表演鼓掌喝彩。他转身跟她们待在一起，他们一起走开去，站在远处，哈哈大笑。蒂托弯着身子，双手叉着腰。里特斯多尔夫太太不明白，或者不相信她好像听到的话，怀疑最糟糕的是——甚至有一点儿害怕她被看到神色慌张——怕他真的是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靠女人吃饭的杈杆儿，脸涨成火辣辣的深红色，靠回到躺椅上。

“老天爷啊，”她说，向利齐转过去，好像把她当作一个知道能向她提供信心的女人，“老天爷，对这种人，叫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总是可以跟他们跳舞的!”利齐说；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感到她的恶意像电火花似的星星点点从她的毛细孔里闪烁出来。

看见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听到这话后下巴在打哆嗦，利齐用带着虚假的同情的声调继续说。“他们确实是在要你，那些小猪……瞧瞧他们吧，里特斯多尔夫太太，你以前看到过这么气势汹汹的模样吗？他们只差对着你把大拇指放在鼻子[①]上了。我倒想知道，那家伙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可是听起来挺可怕。”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她给了利齐这样一个出色的机会显示她的特有的才能；她马上开始纠正。“也许，不是只有我遇上，”她说。“可能下一个就会轮到你了，要是你还没有遇上的话!”

利齐把她的杂志当扇子扇。“啊，他们当中有一个——不是那个家伙，那个他们管他叫马诺洛的——还有一个女的，今天早

---

① 把大拇指放在鼻子上，其他四指伸开，在西方人中，是一种侮辱人的手势。

晨来找我——看来他们的计划在积极进行……你真的没听说过?”

“没有,”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有气无力地说,“没有人跟我说过。”

“我乐意花钱买太平,”利齐沾沾自喜地承认。“我只花了四个马克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多出两倍的钱也值得。”

“那么,他们可以用另外的理由嘲笑你,”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至少他们骗不到我的钱、没法把我当傻瓜。”

“难道你以为我真的会去参加那个小小的低级联欢会吗?”利齐问。“我给他们钱,就像我给叫花子钱那样。”

“我也不会去他们那个联欢会的,”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情绪慢慢好起来了。“我有权不去参加,决不会付一芬尼的!”

这两个女人默不作声了,带着强烈的憎恨望着那几个西班牙人在甲板北头飞快地挪动的脚。他们的叽叽喳喳的声音传回来,只是加深那两个直挺挺的躺在躺椅里的女人周围的阴沉气氛。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打开她的日记本,继续记述种种发生的事情。她握着笔,想了一会儿后,坚决地写下去:“有一个模样长得像小食品袋的、叫施米特太太的女人,我的同房舱的伴儿,她在过去几天里,没有向任何人提出过一个要求照顾使用任何东西的权利,开始流露出迹象,她的品性在发生变化。她独占了脸盆架和镜子。她老脸皮厚地坐着,在脸上扑粉,把她的耗子颜色的头发梳成一个发髻,慢条斯理地,好像她没有让我在等似的。我时不时地看我的表,说多么晚了,而我也得梳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起作用。我是对任何人都不会行为粗鲁的,却不得不采取行动,纠正她的坏习惯了。纵容或者宽恕一个身分低下的人胆大妄

为，是违反道德的行为。有效的严厉措施——这是我跟那些顽皮得要命的英国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学会的——来自不断的、毫不留情的、十足地道的坚持，不管怎样，一刻也不能松劲，而是要警惕，警惕，一直警惕，要不，他们就会像一群鬣狗那样向你扑来。"她考虑着这话，加上一句："注意：我必须特别提防船上有些非常卑劣的人，他们对任何人都不怀好意。警惕，警惕。"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感到很累，很饿，好像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似的。她巴不得听到那通知进晚餐的亲切可爱的号声。她脑子里挤满了种种不该在那儿的想法，互相碰撞，冲击，使她的头隐隐作痛。她在合上日记本以前，加上了一句。"这一切可能十分叫人腻烦，可是我必须认为这是必要的；这样做的意义将来会变得清楚的。"

"那些讨厌的外国佬在筹划什么事儿，"丹尼跟戴维说，"他们在实现一个计划。"他对着刮胡子的镜子，在察看他的下巴新长出来的三颗丘疹；这使他的皮肤遭受的灾害扩大了五倍，而且使他永远处在惊慌失措的状态中。"我的上帝啊，瞧这些玩意儿！"他跟他的同房舱的乘客说，抬起下巴。

格洛肯先生蜷缩在下铺上，在等候那两个年轻人在晚餐前换衬衫和打领带。"从我这儿看，倒看不见，"他说，存心在安慰他。

"也许你是近视眼，"丹尼说，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轻他的痛苦。格洛肯先生把手伸进短上衣的兜里，戴上眼镜。"即使是这样，"他一边认真地盯着看，一边说，"我也只能仅仅看出来。"

戴维在扣衬衫钮扣，没有转过头来。"什么'讨厌的外国佬'？"他问。他讨厌丹尼用非正式的、难听的词儿来称呼除了他自己的国籍以外的一切国籍的人；然而，甚至对他自己的同胞也有几个他喜爱的名称——譬如说，"赶马车的"，但是这严格地指

佐治亚州人;“穷白人”是另一个称呼,是专门用来指社会地位低下,又无力清偿债务的人的;泛指的时候,是指任何他发现的、对他或者他的观点无动于衷的人。

“那伙跳舞的西班牙外国佬,”丹尼说,怀疑戴维的声调中暗示责备;丹尼经常怀疑戴维·斯科特不赞成许多事情,但是他始终没有能确实知道是哪些事情。但是说“讨厌的外国佬”的时候声音中那种轻蔑的意味这会儿——

“嗨,你管他们叫什么来着?”他问。“帅小子?达哥儿?不,那是指意大利人。波兰佬?不。几内亚人[1]?不,他们是波多黎各人,对不对?要不,是巴西人?他们不是黑人。也不是基基佬[2]。基基佬是犹太人为低等犹太人起的名字。譬如说,像那个勒温塔尔。不过,他倒不是个坏人。我跟他交谈过。你知道吗,我活到十五岁上学后才见到第一个犹太人。要不,十五岁前要是看到过一个的话,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们镇上一点也不歧视犹太人——我们甚至没有一个犹太人!”

“也许你们忙着用私刑杀害黑人,来不及挤出时间来对付犹太人,”戴维说,声调是那么疏远和冷淡,使丹尼一下子张开了嘴;接着他啪的一声闭上。

“你是哪儿人?”他有心停顿了一下,问。

“科罗拉多,”戴维说。丹尼使劲回想除了银矿以外他曾经听到过还有什么跟科罗拉多有关的东西。他想不起那个州的人的任何性格特征。据他知道,他们没有绰号,像山里人[3]、凯强

---

① 在美国俚语中,“几内亚人”是指意大利人,因为意大利人皮肤比较黑。

② 20世纪移居美国的东欧犹太人姓名结束多为基音,所以被贬称为基基佬。

③ 美国印第安纳州人的绰号。

人[1]。你又没法叫他洋基佬。

"在矿里干过?"他冒昧地说。

"没错儿,"戴维说,"在墨西哥的一个矿里当计时员。"

"我想你说过你是画家,"丹尼说。

"我是。在矿上当计时员是我的一种靠它活下去的手段,所以我就能干画画了,"戴维说。丹尼想了一会儿,接着说:"瞧,这事儿我真不懂了——你花时间干一件你没法靠它活下去的活儿,你又干一份活儿,那样你可以挣足够的钱,去继续干你的那种养不活你的活儿——这真把我闹胡涂了,"他说。"你自称是个画家,可是你不同时是个矿上的计时员吗? 你干吗不能自称是个计时员呢?"

"因为我确实不是,"戴维说,"我只是靠它活下去,或者干……哎,我就要尝试做一个靠卖画活下去的画家了,不过,要是我办不到的话,嘿,我可以总是找一种活儿维持生活,同时干画画。"

格洛肯先生直起身子,在镜子前捋他的脸和头发,把他的领带结向中间拉一点儿,颤抖了一下,弄直他的皱巴巴的衣服,准备走了。"哎,唷,这是英勇的生活! 这是信任自己能挣钱生活的人的态度。我,我经营我的小摊子,我的报纸和杂志、生日卡和圣诞卡,还有墨水、钢笔和信纸。每天,我的手里周转着零钱;每晚,我收摊后,我已经挣到了日常生活的钱,而且还有一点儿多余;我拿钱投资,这样,就总会有更多的芬尼——一分的硬币——滚滚而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我一直没有像样的生活——我只是活着! 我不可能会好起来,只是人却老了。要

---

① 从阿卡迪亚迁移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裔移民。

是我不小心谨慎的话，会死在桥底下，或者贫民医院里……”

“也许我也会这样的，”戴维愉快地说，尽管格洛肯先生突然推心置腹地吐露他的私事使他寒心。

“也许吧，”格洛肯先生说。“没有人知道他的结局！可是你不必因为生前始终没有勇气生活而非在绝望中死去不可！你一直把握着你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人能使你为此感到懊悔！”

他说得这么强烈，那两个脊背挺得笔直的、幸运的年轻人也许第一次有共同的感情：一种带有内疚的羞耻的刺痛，好像他们对他的不幸的身子欠着一份补偿，欠着向他说明为什么他们的勇气来得容易——因为丹尼觉得他也在开始，在把握；事实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工程师，有四十个好工作等着他，但是他有权利选择会使他离家最远、冒险最大的那一个——至少他有这个自由。不过，他看不出毫无顾忌地鲁莽行事有什么意义——戴维·斯科特给他的印象就是毫无顾忌地鲁莽行事的，而那个可怜巴巴的驼背就在吹捧他的鲁莽，好像他羡慕他似的，他响亮地说：

“不是你的身体的形状，而是你的脑子形成你的生活，”他说；他听到他自己的哲学性的叙述，又惊又喜——他原先不知道他想到了这。“我敢说，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反正会卖掉你的报摊的，”他说，“我来告诉你，我相信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啊，”格洛肯先生呻吟了一声说，接着他开始向门口走去。“啊，别介意，原谅我刚才说话太冲，那不是对你们的，而是对那种这么虚假的信念——那是生活的最大的谎言之一！啊，不，不——因为我在世上只要做一件事儿——”他停住嘴，来制造效果。

“那是什么？”戴维出于礼貌问。

“当个小提琴家！”格洛肯先生说得感情动人，好像他在指望他们掉泪似的。

“可是，这干吗办不到呢？”戴维问。

“在别人看到了我以后，你可能还这么想不通吗？”格洛肯先生的眼光是悲伤的……“哎，得了，”他最后说，“要叫人懂得是办不到的。可是，我有过热情，”他说，一边轻轻地拍拍他自己胸前尖起来的、畸形的肋骨，“而且我现在还有，这多少给我一点儿安慰。”他露出那种痛苦的嘲笑者的微笑，走掉了。

“得了，”丹尼说，“我希望事情到此为止。”没有一句话再提到格洛肯先生了。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西班牙人的绰号，”丹尼说。

“我不知道他们在西班牙要互相侮辱的时候怎么称呼，”戴维说，“可是在墨西哥，印第安人管他们叫 *Gachupín*。它的意思是踢马刺，或者是一种踢起来像毒蛇咬人那样刺痛的皮靴。阿兹特克人对踢马刺的婉转的说法。”

“太抬举他们了，”丹尼说。

“你认为他们在干什么？”戴维说，回到歌舞班子上。“我看见他们在纷纷拦住人谈话，不过他们还没有走到我这儿来。在闲谈中，人们在谈论他们在组织某种演出，还有抽奖活动，等等：这是船上老一套的联欢会的方式，那将变成一个新鲜玩意儿。我说不上我喜欢他们的相貌和作风……”

“那个阿尔内·汉森大吹大擂他在那个安帕罗身上花了好多钱，”丹尼说，毫不掩饰他的羡慕。“他们已经干了我现在可以说出来的事情。那个帕斯托拉……”

他停住嘴；他本来打算吐露那个下午遇见帕斯托拉的事实真相，但是考虑到这要把自己也交代出去，话到了嘴边，心慌意

乱地说不出口了。他再三考虑后，决定不说了，因为他希望维持他已经在戴维·斯科特的脑子里构成的对他的品格的看法，他自己是个决不会上女人的当的男人，她们个个都是这个上帝的世界上除了死乞白赖地要钱以外一无所求的人。任何脑子正常的男人想到她们不费劲去挣就得不到一个子儿应该是莫大的乐趣……但是他一回想起他自己，就又看到发生了的那件事儿：帕斯托拉从来没有费心去掩饰对他的轻视，在甲板附近的散步场上劈脸遇上了他，突然把两条胳膊向他笔直伸出，姿势坦诚、优雅，泰然自若地拦住他，一只手抓住他的领带。她的深色的眼睛睁得老大，她露出最吸引人的微笑，用孩子说的英语说："来帮我们办我们的联欢会！我们会跳舞，我们会唱歌，我们会玩游戏，我们会亲嘴，干吗不来呢？"

"多少钱？"他听到自己在问，但是他觉得像一只鸟在盯着看一条蛇的眼睛。

"啊，算不了什么！"帕斯托拉迷人地说。"两元，三元，五元——十元——你爱给多少就给多少。"

丹尼吃了一惊，身上有了汗意，他觉得他应该说："那么，就算两元吧，这个价钱对我合适。"但是，他怕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会有另一个了。

"去喝一杯，怎么样？"他鲁莽地问。他们在酒吧间里一瓶德国酿的仿香槟酒前坐了好一会儿。他注意到，那酒十二马克一瓶，但是帕斯托拉满心欢喜地抿着，他们的脚在桌子底下贴在一起；丹尼在想，香槟酒，哪怕是最好的，味儿也像兑水的醋，不过有泡沫罢了，他的心里是那么紧张，而且充满他不敢相信的企望。帕斯托拉要抽烟。"来一支这个吧，"丹尼提议，递上他的骆驼牌。帕斯托拉没法抽这种烟。她要的是一种素馨花味的、金

头的细支烟卷，装在紫缎盒子里，盒上印着金字："王妃牌"。丹尼很快地算出了马克兑换美元的价钱——二十支一盒，一元九毛。他买了一盒。接着帕斯托拉卖给他两张抽奖票，五马克一张——比印着的价格贵一马克。丹尼付了钱，直到好久以后才发现这个欺骗行为。帕斯托拉从她的一只小小窄窄、穿得很旧的黑缎舞鞋中褪出一只脚来，把她的脚从他的裤腿里爱抚地移上去，她的细小的脚趾头在他的小腿的肌肉上像手指头那样灵巧地挤压和捻弄。"什么——什么时候这个联欢会举行？"他问，尽可能地在这既愉快又尴尬的境地中不扭动身子。"啊，要在抵达比戈以前，"她告诉他。"不过，我们什么时候待——待——待在一起？"他结结巴巴地说。

"咦，我们已经待在一起了嘛，"她狡猾地提醒他。

"可不是，我知道，"他说，尽可能地鼓起勇气，一切最深沉的怀疑又都在他的心中飞快地涌起，"可是不可能老是这么继续下去，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我不大听得懂英语，"她跟他说，"不过，你的意思是要跟我睡觉吧？"

丹尼对谈话转到这方面来感到高兴。"这还用说，"他说，"好，你开口了。我要知道，什么时候！"

"不行，"帕斯托拉一本正经地说，"首先是，钱，多少钱。"

"好吧，要多少钱？"

"二十元。"丹尼正在喝下他的最后一口酒，这一下哽得好不厉害，酒被喷到她的头顶上方的空中。她被喷了一身，用纸巾擦擦她的头发，带着几分尊严说："这样不好。现在我走了。"她站起身来的时候，丹尼抓住她的手腕，不顾一切地说："今晚？"

"今晚不行，"她冷冷地说，一边挣开她的手腕。"今晚我累

了。”

“明天?”

“也许吧。放开我的胳膊。人们会以为你想要把我按在这儿的桌子上干呢。”她终于挣脱了他的手,撇下了他。他能够做的就是付账,离开。人们个个都在盯着他看,要不,这是他这么认为的。他不敢向周围看一眼到底是什么情形。

这会儿,他决定告诉戴维·斯科特一个情节重新编造过的故事。“我买了一瓶那种糟透了的香槟酒,”他相当羞愧地承认,没有提烟卷和抽奖的票子 。“她喝得不多,可是她只要最好的——我的意思是说,她要香槟酒。她长着我见过的最俊的小小的脚,跟娃娃的一样小,像一堆羽毛那样软。她脱掉了鞋;我们一直暗暗地玩脚碰脚的游戏,像两个同学的小孩。可是她要从我这儿得到更多的钱,她就是用这种腔调说的。”而他在达到目的以前是不会掏钱给她的。他希望,他不至于蠢得干这种事儿。时不时地请她喝上一杯;他会一直逗逗她,就是这样。不上床,不真干,这是他的办法。

“没错儿,你还是在掏钱给她以前先把你要的弄到手,”戴维说。“先拿到了钱,她再怎么也不会跟你干了——我知道那种女人。”

“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够公平的,”丹尼说。“我要是在付钱以前就跟她干了,也就不会付钱给她啦!”他闷闷地思索了一会儿他自己的话,对自己作出这么激烈的决定感到惊奇。他还从来没有想要赖一个姑娘的钱。他一向只是小心谨慎,避免付得过多。但是,这一个女人的做法有点儿拿他当傻瓜耍,使他产生了向她报复的心思。“听着,”他说,他确实火了,好像那个

骗局已经实行了，“要是我先给了她钱，她就要乖乖地跟我干，要不，那我就会是她最后一个欺骗的白人。”戴维加了一句：“到现在为止，除了白人姑娘以外，我从来没有碰过任何女人的身子。”

“那些姑娘是白人，”戴维说。

丹尼显然不知怎么说才好了。“哎，我的意思是说白种——美国姑娘。”

戴维经过长时期的磨练，学会了混在墨西哥矿工营地上各种不同种族的男人中间做个男人，从绞合式旅行手提包中拿出他那瓶用真正酸麦芽浆酿造的“老雪松秧鸡牌”威士忌。“来一口吗?”他问。丹尼点点头，望着他把酒倒进房舱里的厚平底的玻璃杯。“洗掉你嘴里的香槟酒吧，”戴维说。

“首先是，”丹尼美美地喝了一大口以后，用担心的声调继续说他唯一的心事，“首先是，这艘船上没有地方。她把她那个杈杆儿留在房舱里，跟她待在一起，当然喽，我知道汉森在安帕罗的房舱里的时候，她那个杈杆儿不管白天黑夜，所有的时间都在船上躲躲闪闪，可是那种下三滥的贱货使我心慌。鼓不起劲儿来干，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看到里贝尔和他那个像走鹃那样的长腿女人偷偷摸摸地在船上到处转悠，钻到一些黑沉沉的地方去，什么地方都去，可是我以为并没有真的干什么，而只是喜欢互相逗弄罢了。再说帕斯托拉，她没有说过一句实在的话，就是讲钱。她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地方，什么时间。”

“你干吗不问她?”

“我问过。她说，也许明天。可是在什么地方，我一直在想这事儿。”

“在矿工营地上，”戴维说，又倒了一次酒，重新盖上瓶塞，用两只脚夹着酒瓶，“在墨西哥的山区里，那是我第一个干活儿的

地方，有家窑子，只有那一家，只是一个大房间，大得像谷仓，里面放着一排排帆布床，床和床挨得那么近，你只能勉强从中间挤过去。房间里除了一角落里有一盏红灯外，是黑沉沉的。你和你的姑娘摸黑走过去，直到你找到一张空床为止，全靠你用手一路在床中间摸过去，直到你没有碰到一条大腿或者一个屁股，然后你挤上去……”

“啊呀，我走路有点瘸，”丹尼说，吓慌了，坐在地板上，脱皮鞋。

“当时的情况不算太坏，”戴维说，“事实上，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还挺不错哩。”慢慢地，他的憎恨和无法容忍的性冲动又在他全身的血管里剧烈地涌动起来了，那种感觉是恶心和死一样的欢乐的有毒的混合；它像以往那样渐渐减弱和消失，只是有点恶心。他跟珍妮交往的初期，有一次，他们在阴凉的春天早晨，精神饱满、快快活活地作爱以后，他吞吞吐吐地承认，在那地方他有过几次那种奇特经历；不知什么缘故，他感到，而且希望她明白，这种带着强烈厌恶的回味使他净化，使他恢复成为一个从未被触及过的、完整的成年男人。他很高兴能够说，经过几个这样的夜晚以后，有好一阵子他想到性欲就厌恶。他感到不被那些性行为和性伴侣所迷惑，而且依靠他的起净化作用的轻蔑态度完全摆脱和脱离了它们的污秽。

珍妮坐在床上，探出身去，双手捧着他的脸，漫不经心地说：“没关系，宝贝儿。这是一个卫理会信徒的残存的正常的毛病。男人喜欢吃得呕吐，而用美妙的词儿来谈论他们呕吐的东西……我，我真的希望，你不会呕吐在我身上！”他永远不会宽恕她这话。永远不会。

“再来一口？”他问，在倒酒。丹尼点点头。“嘿，在这艘船

上，随便上床的机会可多的是啊！"他检查他的长到肉里去的那个脚趾甲，吓慌了。"啊呀，"他说，"我想它感染啦！"他一个劲儿寻找碘酒，把其他一切都忘了。

在他们上船以前，汉斯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父母一起穿衣服和脱衣服。他能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们会把他抱到床上，跟他一起玩。但是，有一天，他记不起是哪一年了，他母亲跟他说："不行，汉斯，你现在是个大男孩了，是停止干这一切娃娃的事儿的时候了。"在这以前，他只要高兴，就能打开他们的房门走进去。以后，他时不时地转动门把，门总是锁着；他的父亲和母亲倒过来在晚上到他的房间里来，跟他一起做晚祷告。

在这个狭小、拥挤的房舱里，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去。时间一到，他母亲用一条手绢裹住汉斯的眼睛，说："喂，在我告诉你以前，别拿掉手绢，也别偷看！"不过，不用说，他哪会不偷看呢。他不怎么懂得这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他们背对着他，也互相背对着，他们每一回脱一件，同时把他们的睡衣拉上一点儿，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真的完全脱光衣服；他只是偶尔看到他母亲的一个丰满的肩膀或者他父亲的瘦削的肋骨一眼。这个景象使他越发莫名其妙，因为他有许多次大白天在海滩上看到过他们更多的肉体。所以他确信脱衣服上床跟在其他时间脱衣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打定主意，要是办得到的话，他要找出有什么不一样。在汉斯能完全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前，他们已经全身穿好衣服转过脸来了；他父亲穿着一件红棉布镶边的瘦长的衬衫式睡衣，他母亲穿着一件宽大蓬松的长袖白睡袍。她会说："行啦！"好像是一场游戏似的，猛的一把拉掉他眼睛上的手绢；汉斯会装出迷迷糊糊的模样。

房舱里的空气浑浊，甚至舷窗开着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在夜晚，舷窗是关着的，因为夜风总是危险的，而海上的夜风却要人的命。汉斯的父母脱衣服的时候，从他们的皮肤上散发出气味，使他希望要求他们打开舷窗，但是他不敢——他父亲的气味，冲鼻难闻，像墨西哥城里那家药店的，他父亲经常带着医生给他开的一张小纸上那儿去；他母亲的气味，甜得叫人腻烦，像在默塞德市场下午火辣辣的阳光下的互相为邻的一个鱼摊和一个花摊散发出来的混合气味。他分辨得出哪种气味是哪个人的，他父亲的和他母亲的，因为他时常在室外也闻到那么一丁点儿，在墨西哥的花园里，或者在餐桌旁，甚至在这艘船的甲板上。这使他恶心，这使他有时候觉得他母亲和父亲是陌生人；他害怕他们；他父亲的呼吸和他母亲的胳肢窝不对头；这使他怀疑他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头。他时不时地把头转向一面肩膀，吸气，或者甚至拉开他的衬衫，使劲地闻闻下面。他的气味总是没有变，没有一点儿不对头；他的心里会觉得比较自在一会儿。

他母亲跪在床边；汉斯起床，跪在她身旁。她搂着他脊背的那条胳膊散发出刚洗过的亚麻布的香味。他父亲跪在另一边；他们一致低低地齐声地背着祈祷词。他们两人都拥抱他，亲他，说明儿见；他顿时觉得跟他们是这么亲近，这么充满信任。他又坐起身来说："妈妈，今天里克和拉克跟我说，他们要把我扔进海去，可是我不怕。"

他母亲厉声说："汉斯，你不应该在做过祷告以后又说话。"但是他父亲差一点没从衬衫式睡衣里蹦出来，说："你说什么来着？"接着跟他妻子说："你没听到他说什么吗？那两个坏得没法治的西班牙小孩威胁……"

"胡扯，"他妻子嚷着说，接着跟汉斯说，"你这话是什么意

思，跑去跟那两个孩子玩过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别理睬他们吗？”

他父亲跟他母亲说：“嗨，当时你在哪儿，你没有在照看他吗？”

“我在理发室里做头发，我嘱咐过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他的帆布躺椅上等我。怪我吧，当然喽——我抽不出一点儿时间去干些什么！”

“照看好你的孩子，别折磨你的丈夫，”他父亲在吼叫；汉斯看到他们已经把他完全忘了。

“我没有离开过躺椅，”他几乎眼泪汪汪地说，“他们走来，站在那儿，接着他们说，‘我们要把你扔进海去。还要把其他所有人，和那只叭喇狗。’这是他们的话，不是我的过错。我说：‘走开，要不，我会告诉我父亲。’他们哈哈大笑，取笑我……”

“可恶极了！”他母亲说，被深深地震惊了。“那条善良、天真、孤立无援的狗？啊，汉斯，你要是竟然这么狠心，虐待一条可怜的哑巴畜生的话，永远别让我听到。”

“我再怎么也不会伤害贝贝的，不管为了什么都不会，”汉斯虔诚地说，又引起他母亲的注意。

“我会跟他们去说的，必要的话，跟他们的父母说，”他父亲说。“他们还威胁过把汉斯扔进海去，这毕竟不是可以随便说的笑话，别忘了。”

“我的意见是什么也别跟他们说，完全不把他们当一回事，好像他们不存在似的；汉斯呢，要一直待在我身旁，告诉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别让我非说两遍不可。”

“是，妈妈，”汉斯用最顺从的声音说。灯光熄灭了，一片寂静。汉斯担心了短短一会儿以后，睡着了，因为他母亲看来好像

压根儿不愿听他想要告诉她的事情：她在洗头那会儿，丝毫没有想到他，而他却差一点没被扔进海里淹死。

里贝尔先生振作精神，作出一个对付利齐·斯波肯基克小姐的决定。首先，她压根儿不是小姐，而是个老于世故的女人；虽然里贝尔先生只是喜欢女人的分寸掌握得恰当的卖弄风情和开玩笑的拒绝，不过，做得过了头，就变成嘲笑和直截了当的顶撞了，这样就没有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男子汉能忍受任何一个女人的这种行为了，不行，哪怕特洛伊的海伦[①] 本人也不行。他怀着这样的心情，晚餐后，挽着她的胳膊，带着她去散步。他一边听音乐，一边拉着她走上楼梯，来到摆救生艇的上层甲板，带着一个心存歹意的男人的默不作声的紧张心情，把她领到烟囱的黑暗的一面。他一点也不提醒那个落在他掌握中的女人，不让她有时间掴他耳刮子或者逃走，抓住利齐，把她往下按在他的肩膀旁，希望把她的两条胳膊压在她的肋骨上，把她一把拉到他的怀里，张开嘴，死命地亲她。

就像搂住了一架风车。利齐发出一声古怪、紧张的尖叫，两条长胳膊围着他的起伏着的腰部，把他搂紧。她的又薄又宽的嘴吓人地张着；她的尖利的牙齿甚至在昏暗中闪闪发亮。她把他狠狠地一推，他们扭在一起，往后摔倒，她的两条扭动着的腿压在他身上，她把他翻了个身，让他仰面朝天地平躺着，她的胯骨狠狠地在他的肚子上碾了一会儿。里贝尔先生对于她的这么出人意料的强烈反应，闪现出吃惊的喜悦，然后在惊慌中认识

① 希腊民间传说中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之妻，是著名的美人。

到，除非他马上恢复正常，情况将会失去控制。

他打起精神来扭转这个不正常的姿态，打算翻过身来，使成为男人高高在上的恰当的地位，但是利齐直挺挺地躺在他身上，像一个有许多支柱的帐篷。她的牙齿现在使劲咬着他的下巴颏儿，正好在他的牙床骨下面。在里贝尔先生的全身的感觉中，疼痛居第一位，超过其他一切感觉。他默不作声地含着眼泪，挣脱她的身子。但是在挣扎中，他有一种默默的喜悦。哪一天，他占了她的上风，他觉得，他会得到值得占有的东西的。在这段时间里，她没有表示投降的迹象，而是用她的膝盖夹着他，好像他是一匹没法控制的马似的。她的两条胳膊把他紧紧地抱住，几乎叫他受不了，胳膊上的瘦长、坚硬的肌肉简直像小伙子的肌肉在使劲。

他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在恰当的时刻不让自己被体面地征服的女人：她的本能应该告诉她是在什么时候呗！在绝望中，他的下巴现在已经麻木了，他的眼睛东张西望，好像在寻求帮助似的。在半暗不明中，出现一个白点子，那原来是贝贝的一动也不动的身子。它发现胡滕的房舱门开着，就独自个儿出来漫无目的地遛遛，直到最后，它站在那儿，离他们不到三英尺远，大模大样地盯着看。

“利齐，我最亲爱的人儿，”里贝尔先生气喘吁吁地说，“利齐，那条狗！”

他的痛苦得没命的声调使利齐从她的咬着下巴肉的恍惚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她的牙齿松开了。她透口气问：“在哪儿？”里贝尔先生猛地把脸转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她的两条胳膊松开了，他抓住她的手腕，同时翻了个身，翻到了至少是睡在她身旁的地方了。他采取了一连串坚决的、解除纠缠在一起的动作，因

为现在利齐在他手里看来好像有气无力了，最后使他们两人又一次坐了起来。

贝贝用它的弯腿站稳身子，随着轮船的起伏微微摇晃，它的有皱纹的鼻子抽动着，现出一种动物的狡猾的神情，好像它也叫人极尴尬地懂得人类生活中隐藏着的一面。它显然看得出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的意图对它来说不是一个秘密，但是由于他们的奇特的形状，他们发出的古怪的声音，它困惑了——困惑了，还有一点儿反感。说真的，它一点也没有同情的表示。

"走开，滚，"里贝尔先生用一种贝贝本来也可能发出的低沉的吼叫命令它，但是贝贝是一只浑身有毛，四脚爬行的畜生，所以它是神圣的，不可能对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了。里贝尔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是感情丰富的；小时候，他看到一匹马摔倒在结冰的街上，被挽具纠缠着，摆脱不开那辆送啤酒的大车，哭得两眼红肿。他要揍，要杀那个让它摔倒的狠心的赶车的。里贝尔先生对整个动物王国的温情是谁也比不上的——说真的，他还认为任何虐待那个神秘世界中的最低级的生物的人该受绞刑。他每一次由于不可避免的训练的原因不得不打他自己的狗的时候，几乎心都要碎了。他这当儿用最亲密的声调哄弄贝贝。"走开，乖狗狗，"他说，一边怀着希望在周围寻找有什么比较重的东西，好向它扔过去。"乖狗狗！"

利齐忍不住了，开始笑出声来，两只手捧着脸。"啊哈哈哈，"她发出的声音尖细得像一根拨动的弦。贝贝默默地离开他们，用它的大脚轻轻地走着，被打发走了，但是并不在意，去忙乎它自己的事儿了。不过，它已经破坏了这个局面。里贝尔先生在这可能大有希望的时刻，却没有勇气再打这个现在稍微收敛一点的利齐的主意了。他满足于握住她的双手，安慰地说："别，

别——行啦，好啦！”她爬起身来，断断续续地说话，在里贝尔先生的胸膛上有气无力地轻轻戳了一下，在他前面跑下楼梯，没有回头看。里贝尔先生跟在后面，但是比较慢，心事重重地摸着他的下巴。他一定要一会儿也不容许泄气。这毕竟只是又一个女人——一定有办法，他会找到的。他有点羡慕地想到那个古老的风俗，首先在她们的头上揍一下——当然不能重得打伤她们，而是相当结实的一拍，消除她们的矛盾心理。

那天黄昏，在比较早的进晚餐的时候，胡滕教授先生仍然没有适当的胃口，总算没有推开盛满了饭菜的盘子站起身来去呼吸新鲜空气，但是他的妻子倒吃得很好；尽管看到她这个模样，他有一点儿反感，然而这不成为阻止她的好理由。其他的客人看来好像跟往常一样，医生和气地默不作声，里贝尔先生和利齐小姐散发出叫人作呕的不正常的亲密气息，施米特太太跟平时一样不引人注目，只有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向着船长的方向轻松地闲聊——一个轻浮的女人，这把年纪了，还这么虚荣！——胡滕教授先生即使不抱希望会听到带一点儿建设性和启发性的话，还是带着微弱的希望听着，好让自己忘掉肚子里的不舒服。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察觉到他在注意，看到其他人的脸开始现出在听的神情，没有放松对船长的注意力的掌握，向其他人都巧妙地瞟了一眼，稍微提高她的声音，把那些最近对于歌舞班子的古怪的行为和他们的在船上举行礼节性的联欢活动这个不合常规的想法感到兴趣或者感到恼怒或者既感兴趣又感恼怒的人都圈在一起——如果说，不合常规这个词儿可以引申得这么远，跟这件事儿扯上关系的话。首先，是那个他们管他叫蒂托的冒失无礼的家伙，他向她兜售一种什么票子，他们设计了一个小小

的骗局,票子就是派这用处的,谁知道那是什么骗局?

"哎,可不是,"利齐插嘴说,"抽奖用的! 我买了一张,把他们给打发了。"

"你应该告诉我的!"里贝尔先生叫起来。"因为我买了两张——你一定要放弃一张!"

"我会去退给他们的,把钱收回!"利齐尖叫,猛地把头一抬。

"啊,"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那就等着瞧吧,任何人都不可能从那些强盗的手里取回一个芬尼,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为人!不行,亲爱的小姐,你是好买卖人,人人知道,可是单凭这,你还办不到!"

"不过,你不是找到极妙的舞伴了吗,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里贝尔先生高兴地问。利齐啪的打了一下他的手,感到恼火,因为她打算自己说这话的。"真不害臊,"她说,"你不太体谅人。有时候,舞伴很少;挑选的时候,不能老是过分挑剔。"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本来已经准备对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表一番精彩的议论,被话题这样转变感到震惊,扯着嗓门,像唱女高音似的然而不失女士风度地高声说:"哎,有些老脸皮厚的放肆行为是这么出人意料,叫人冷不防地遇上了,来不及抵抗,那还是听从本能的好——对,还有就是听从所受的教育! 而且举止行为要表示出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对头的事儿那样——我怎么能梦想到出这样的事儿呢?"她靠在椅子上,把餐巾举到嘴唇边,餐巾上面的两只眼睛苦恼地盯着利齐看,而利齐的笑声像一长串白铁皮器具在倒下来似的。

"哎,可是这是女人们应该梦想到的呗,"里贝尔先生高兴地嚷着说,探出身去,使他的话透过利齐的吵声,让人听到。

猪狗,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在想,她的沮丧一下子变成一阵无

法克制的狂怒，至少我不会堕落得跟你跳舞。她向他露出牙齿，扬起眉毛，眯起眼睛："你肯定要知道女士们梦想些什么吗，里贝尔先生？"她带有危险的意味问。

这一套手法给里贝尔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止一次地被一些容易触怒的女士掴过耳刮子；在这当儿，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像她们每一个，不论是声调还是神态。一个男人对这种循规蹈矩、木头人似的女人，再小心谨慎也算不上过分，不管她看起来多像呆鸟。他顿时无条件地退缩了。

"我只是开开玩笑罢了，我的太太，"他说，显得既悔恨又恭敬。

"那还用说，"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把她的声音当作刀锋在他的受伤的虚荣心中转动。"那压根儿不用说。"

里贝尔先生不甘心就此认输，而是狼狈地挣扎，挣扎。"这是一个对弗洛伊德[①] 对——哎——梦的意义的一个婉转的引用……"

"我对他的理论很熟悉，"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冷冰冰地说，"可我看不出那些理论跟我们现在谈的题目中间有任何一星半点的关系！"

里贝尔先生把身子靠回到椅子上，撅出下嘴唇，开始沉着脸用叉子舀菜。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把脸转向船长，现出最热烈的微笑，在她彻头彻尾地抨击了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弗洛伊德，没错儿！——后，充满了信心地说："我们大伙儿都瞧不起那些西班牙人，可是既然看到这件事儿没有办法，我们还是忍

---

①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派创始人，提出潜意识理论，主要著作有《释梦》等。

耐一些的好，我们一定要忍耐到他们这伙人在比戈上岸为止。不过，告诉我，怎么可能让这种事发生的，这种人怎么能在一艘可尊敬的德国船上成为头等舱的乘客？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们造成的处境中……"

船长听到有人称他的船"可尊敬的"，而所用的声调是在暗示仅仅可尊敬罢了，并不感到高兴；他不喜欢听到他的乘客中有人的品德受到批评，尽管他私下里除了女伯爵以外，不尊敬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但是她在个人的表现方面实在叫人太失望了。他恼火地撅出下巴，尽可能地把话说得生硬："墨西哥政府付了他们的船钱；毫无疑问，把他们打发掉是值得的。"

"确实毫无疑问，"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快活地说，"看到他们真的在比戈上岸，那会叫人大大地松一口气，我们剩下的人将平静而安全地继续航行……因为船长，我相信那些人是危险的罪犯。他们是坏人，是那种应该由警察控制的人，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

利齐出于对里贝尔先生的忠心，即席发出一句刺人的话："甚至跟你一起跳舞吗？"

整个席面上，掀起一阵小小的震惊——甚至舒曼医生看来好像对这个毫无顾忌的攻击也表示吃惊。船长马上干预，认为这是他的权利和义务，而且采取决定性的打击。他从眼角向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瞟了一眼，眼睛闪着钢铁似的微光，接着说："亲爱的女士，你不是在抬举他们吧？作恶也需要一定的性格力量，而这些人，在我看来，倒不如说是一些出身低微的普通的小人物，不值一提。我的船，跟任何其他的船一样，运载各种各样的人。我被授予一切维持纪律的权力。我可以请求你吗？请允许我来判断他们有多么危险。"

眼睛里闪着温和的、对公道得以申张而大快人心的亮光，小个子施米特太太不由自主地观察到，现在轮到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吃惊和退缩了，还差一点没掉下眼泪，她的脸从头发边一直到端庄地显露着的正中央都染上清晰、鲜明、好看的红色。然而，甚至在她观察的时候里特斯多尔夫太太也好不庄严地抬起下巴，转过头去，傲慢地打量其他同桌就餐的人，然后重新进餐，默不作声、彬彬有礼地吃着，她唯一不安的迹象是，她脸上的红晕已经消失，她脸色苍白得像还没有出娘胎的小牛犊。沉默开始形成压力，甚至胡滕教授先生也感到了；他对任何种类的闲言琐语，尤其是对冲口而出的、想法片面的谈吐，反应麻木。

他从飘过耳边的一些混乱的词儿中抓到一个话题，“罪犯——作恶——什么事儿都做得出”，神态温和、恭敬而又掌握分寸地对船长说话，掩藏着他的绝对正确感；这种神态也总是对船长起镇定作用，因为他不必去听或者假装要回答教授，教授并不对讨论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在客人面前发表他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当众演讲的人，教授早就懂得，一个默不作声的听讲者是专心的听讲者。

“全部的哲学体系是建筑在对人类整个堕落的假设上的，”他开始说，把他的手指尖放在他的胸膛上，时不时地伸出和摊平手指头，然后在关键时刻又收在一起，“也许用不着说出那些体系吧？”他向周围瞟了一眼，认为那将是没有用的。“我必须说，一些思想卓越的人士给了我们一些非常严密的论证，来支持这个论点。这也无可否认；他们能通过有力的例证，指出仅仅是人的行为的种种方面就证明了人性是彻头彻尾、无可救药地邪恶的。然而，然而，”他说，“尽管有强有力的相反的证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些现象，没有哲学头脑的人（或者头脑没有足够地

受到健全的宗教教育支持的人)可能不得不认为是相反的证据的一些现象,我还是只能毫不动摇地相信——管它叫 Sancta simplicitas[1],你要是一定要有个称呼的话,"接着他把他的下巴颏儿塞进去,谦逊地把他的手指尖蜷曲在一起,"毫不动摇地相信人性根本上是善良的,是天性;上帝的意志,你可以这么叫它,闪闪发亮地启迪着有血有肉的人。作恶的人看来好像天性是恶的,是存心作恶的,却是苦恼的、反常的——他们背离神的安排,走上邪路;不过,一点也不必相信,他们不会每个人都受到上帝的及时的赦免……"

施米特太太使人人吃了一惊,她相当坚决地、响亮地说:"只要他们忏悔和要求上帝宽恕,"她说。"任何天主教徒都知道,没有人会丧失灵魂,除非滥用上帝的仁慈,或者否认——"

在胡滕教授先生的打断下,她退缩了。"这倒不是首先需要考虑的,亲爱的施米特太太,"他温和得叫人受不了地说。"我要说的是,要是人们由于无知而作恶,他们不该宣告有罪。这是因为他们的教育被忽略了,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被好的影响所感化,在那样的影响下,就可以经常给他们看到善良的、真诚的、美好的——实际上,正义的,让他们热切地信奉。

事实真相有时候是可憎和残酷的,施米特太太想;事实真相是,我的丈夫躺在放在货舱里的棺材中,而我是一个在回家途中的寡妇,直到不再存在为止;我一直尽可能做个好人,热爱上帝,可我这样做得到了什么呢？因为她要是太久不跟忏悔师和神父来往的话,就会偏离正道,陷人这样混乱的思想状态了。她不再说什么,只是悲伤地想,她不该接触那些路德宗的教义。不是那

① 拉丁语,"神圣的单纯性"。

些教义引诱了她，不，不——而是想到这么许多人，像教授那样真正的好人，也这么误入迷途，使她心中难受。她尽管懂得两种文字，却不是很清楚词儿的意义。事实真相是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一件事实是任何存在着的事情。

"在我的经历中，很少发生过什么事情扰乱我的信心，"教授继续说，这会儿身体和精神都再好不过了，"这信心是建筑在童年的信仰的原则和上帝的仁爱上的……"

不过，这不是路德宗的说法，船长想，皱着眉头。我跟他一样是路德宗信徒，我甚至知道这说法有点儿不对头。因为尽管他想尽办法不去听，他还是都听进去了。

"总的来说，"教授继续说，"我已经发现，哪怕是最愚昧、顽固的人，只要你先在每一个最微小的方面证明你有着体而地对待他的意图，他就会被推近、说服，去完全接受正确的看法和无可指责的行为……至于孩子们，"他接着说，他的兴致跟他那些在脑子里滚滚奔流的高兴的思想一起高涨了，冲走想象中的疾病，他为他在颂扬的那些美德乐得在肥大的脸上堆满笑意，"他们对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老师的坚定的手、毫不动摇的观点和坚决而合理的方法的反应是最显著的；不过，那些老师，一旦纪律要求，却能毫不仁慈地挥舞教杖，因为真正的公道是严厉的，而且必须严厉地执行。从长远观点来看，我们还是把仁慈留给上帝更好，只有他有足够的力量和聪明来正确地使用仁慈。然而，我还是要说，从一天到另一天，可不是，甚至从一小时到另一小时，从一会儿到另一会儿，我们必须在追求美德和学问的艰难道路上领导一些小小的出击。"

胡滕太太把双手平放在餐桌边上她盘子的两边，稍微扭动她的手指头；她丈夫在说话的时候双手要的那些花招，使她神经

紧张——他的手总是这样。每个人的神情都像在听讲道——一场沉闷的讲道。他把他们折腾得厌烦得要命，她能够感到它，像在她的血管里有醋在流动。她记得，许多年来，当她确确实实、亲身插在她丈夫和她完全无法忍受的生活中的丑恶、污秽、卑鄙、破烂、叫人厌烦的那个方面中间，就完全处在巨大的被淹没的潮流中。那一切愚蠢的琐事，那一切没完没了的跑腿，跟不老实的人、肆无忌惮的人、懒惰而蛮不讲理的人、无知的人、反复无常的人、贪婪的人的种种花招、骗局和懈怠作长时间的斗争，看来就是那些人从上到下的构成了工人阶级；他们来来往往、没完没了地大量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她跟他们所有的人打交道，没有一次打搅她的丈夫，求他帮助。他的优秀的脑筋、他的重要的职业，需要他把精力和尊严节省下来，用在生活中更高级的事情上，所以她一直为他节约。没有人看到过教授手里拿过一个最小的包裹——甚至没有看到过他往返学校的途中拿过一本书。她携带一切东西，他的书啊、纸包啊、手提箱啊、网线袋啊，甚至推着一辆像婴儿车那样的手推车。她骄傲而带着爱意干这事儿，因为凡是看到她的人都知道她丈夫是一个著名的教授，而她是个乐于奉献的好妻子，样样都干得很好。“典型的德国妻子，”那些她有理由信任和尊敬的人都这么称呼她。

然而——还有需要她干的事儿。多么经常有年纪比较轻的学生中那些最对立的被带来，交到她的手里，接受最后的纪律教育；他们年纪虽轻，却都憋着一肚子怨恨，宁折不弯，不服管束；还有他们的力气，胡滕太太不止一次地尝到过。

尽管她怨恨加在她身上的这份额外的工作，她回想起，一旦一个处处作对的学生交到她的手里，她怎样迟早能使他完全相信，对他的惩治是不断的、不会放松的，而且是每天增加的，直到

最后——不管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他的事儿！——他自愿地、完全地，甚至热切地屈服，这使她感到骄傲——也使她感到厌倦。哪怕性子最倔的人，她也从来没有治不服的；她知道得很清楚，她的新门徒没有一个再看到她不打冷战的。干吗要她作出这个牺牲呢？她只向上帝要求，爱她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像巢中的鸟儿那样温柔地抚养大。她从来也不会打一个她自己的孩子，或者让他挨饿，或者用威胁吓唬他，也同样不可能下手惩治她可怜的贝贝的。它是条小狗，却像天使似的接受训练，用不着做什么事情，只要几句简单的话和几种调子不同的声音、手指头的抚摸、一小口饼干，就把它引向正确的方向。这样，她的孩子们会始终是可爱、聪明、听话的孩子——为什么不呢？考虑到她自己的品德和她丈夫的，他们的孩子干吗不应该是其他人的光辉的范例呢？

她知道她的丈夫是个圣徒，对这个世界来说是太好了，她为此爱他。要是那些愚蠢的人只要能听从他说的话，他们会听到一些对他们有好处的事情。嘿——哪怕由于她的过错，某种粗野的事情时不时地传到他那儿，他不责怪任何人，尤其是一点不怪她，而且从来不把那件事情放在心上。他甚至看来好像真正相信他们从来没有拌过一回嘴，这是多么甜蜜啊，她的眼睛里差一点没掉下泪来。她鼓励他这样做。要是他忘掉了他们最初的五年的话，那也好，由他就是。至于她自己，她永远也忘不了，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她获得的那么许多教训已经融化在她的血肉之躯中了，把她改变得她自己也几乎认不出了。现在，她模模糊糊地记得那些沉痛的教训，而没有了对她的新郎的暗地里的愤怒，哪怕她的愤怒在最激烈的时刻她也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对她的结婚誓言的背叛。她知道得很清楚，婚姻美满的责任这整

个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重担都由女人撑着。有时候，这看来好像是又一个落在所有的妻子身上的、忍受不了的负担。另一些时候，短暂而愉快，就像朋友们的婚宴、生日宴、周年纪念日、圣诞节、复活节，或者甚至只是天气晴朗的日子，健康良好的日子，或者有好消息的日子，说真的，只要在她的丈夫对家庭生活感到满意和认为是享受而容光焕发的时候，她就可以飘飘然地感到好像她的灵魂长出了翅膀。她的坚定不变的忠贞复活了，蓬勃发展，更加坚定；她的信心几乎可以跟她丈夫的相比；他对他们的婚姻美满的说法毫不犹豫，甚至是坚信不疑的。他从来不承认有过一丝阴影或者一点缺陷，而总是带着从不减退的、虚假的温情谈及，而且教她谈及他们在一起的过去和冗长的岁月里的日常生活。

胡滕太太像被闪电击中似的震得心惊肉跳。虚假的？天啊，她到底想到哪儿去了？她向周围瞟了一眼，震惊得有点哆嗦，她有一种经常会有的无可奈何的感觉，不但在睡梦中会有，而在现在这样完全清醒的时刻也会有，那就是害怕她的思想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害怕那些畸形的幼稚愚蠢的想法会丢人现眼，招来公开的耻辱——她自己的耻辱和跟她在一起的她丈夫的耻辱，因为他经常告诫她记住，一个做妻子的干了失面子的事儿，哪怕是最微细的不检点，也会使她的丈夫失面子，因此落得个治家无能的名声。“你是对我负有责任的，我亲爱的，”她早年对他露出孩子气的反抗的迹象的时候，他经常教训她，“当然喽，除非是处在一个你可能发现跟法律直接冲突的境况中；不过，我是为自己，也为你向上帝负责的，而且在许多方面，也向以天意为依据的世俗的法律负责。啊，我亲爱的孩子，”他会在那些精神恍惚的时刻温柔地说，声音变得沙哑和颤抖，两只手直打哆

嗦，“按照生活的真实情况接受它，依靠我的爱情和帮助了解它，这对你是多么重要，”他会说，感情是那么强烈，压得他们无法反抗，只得听凭摆布；老是这种装腔作势的场面，这种永远没完没了的陈词滥调的说教，要怎样才有个完呢？在床上，总是在床上，在长时间的美妙和不觉得害羞的作爱中融为一体，她感到这太不像话，简直不像夫妻间干的事儿。她始终不敢向她的丈夫吐露这感觉；他在白天绝口不提他们在夜晚梦幻似的生活，好像他们被白天变成两个不同的人，或者作爱是一个他们互相要保守的秘密……

胡滕太太开始脸涨得通红，不过不是害臊，不是内疚，也不是后悔。啊，她怎么能甚至在那一刹那想到这个词儿“虚假”？因为她知道得多么清楚——她怎么忘掉了呢？——那种迫不及待、起维持作用的温情，那种坚决的摆脱人性中的缺陷和沉淀，那种争取完美的奋斗，是他们一起干的一件事情，唯一的事情；那就是他们一起生下了的孩子，那个她梦想是尽善尽美的孩子？她用柔软的、弧形的动作举起双手，捂住她的脸，接着又把手放在盘子两边。

“你头痛吗，我亲爱的？”她的丈夫打断他自己的话问，因为他还在说理。“啊，不，”她说，“请别担心。我很好。”

他又转过头去，这一回是对着舒曼医生。“善恶问题凭定义是解决不了的。除了作为概念在人的脑子里以外，它们真的存在吗？即使存在，它们是怎样和为什么产生的？这在哲学上是无法回答的。我只是为了论争才问的。”

“对我来说，这不是个哲学问题，”舒曼医生说，“即使是的话，我可不是个哲学家。我依赖教会的教导；很抱歉，这问题我没法论证。我是个可怜的罪人，”他温和然而干巴巴地说，“天天

需要神的帮助。我同意船长的话，真正要作恶，需要坚强的性格。我们大多数人都太松松垮垮、半心半意，或者怯头怯脑——幸亏是这样，我想。我们跟恶的勾结是消极的，你不妨说，是听之任之。我认为，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同情罪犯的，因为他们真正地干出了我们梦想干的事情！想想看，人类真的被分成严阵以待的天使和即将侵略的魔鬼——不，现在这样，已经够糟的了，"他一边说，一边把刀叉交叉摆好，"我们有十分之九的人似睡非睡，而且拒绝被叫醒。"当他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在拖长，像教授的说话那样源源不断地说下去的时候，他的语调变得稍微轻下去和带有歉意。他默不作声地喝干了最后一口酒。

胡滕太太并不仔细地听她的丈夫说话，因为他那些话她都牢记在心，但是尽管她多年来细细揣摩他的人性的理论，认为它跟实际情形相隔得那么遥远，那么毫不相干，她却不敢在她生活中跟那个披着工作服的恶的化身进行日常斗争后在这个问题上向他暗示一下她的结论。

她出声说，听到她自已的声音吃了一惊："我确实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恶人，恶人比好人，甚至懒惰的好人多得多；有的生来就恶，有的有心作恶，有的对作恶有最深切的爱好，处处都是恶人；我们对他们仁慈，为他们找借口，或者像舒曼医生说的那样，仅仅是松松垮垮，这样就怂恿了他们。只要他们还没有伤害我们，就无动于衷，不愿去操心。有时候，即使他们确实伤害了我们，也这样。他们一点也不在乎我们一直处处谨慎、公平而诚实地对待他们——不在乎，他们在暗暗笑我们，管我们叫蠢货，甚至变本加厉地欺骗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太笨，不可能知道他们在对我们干些什么！而我们也不按照他们该得到的那样惩治他们，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是非感，我们说，'我们要是把

一个小偷关进监狱，或是把一个杀人犯处死，我们就跟他们一样是罪犯！'啊，对无辜的人来说是多么不公道，和多么不正当地滥用感情；我们应该对这感到害臊。或者我们不断盲目地说，'要是我们待他们好的话，他们到头来也会待我们好的！'这是生活中的一个大谎话。我已经发现这使他们的胆子更大，因为他们本来应该害怕我们的，却变得瞧不起我们了——这全因为我们自己软弱，可不是，我们让他们作恶而不受惩罚，也是在作恶。他们以为我们是孱头；他们没错儿。至少，我们是被人愚弄的人，我们活该受到他们摆弄……"

她在绝望和听起来有点疲惫中慢悠悠地把话说完，在冷淡的沉默中听到她自己的清楚得吓人的声音。其他的人在沉思地把他们的盘子移来移去，摸弄他们的餐巾。晚餐已经结束，他们准备离开餐桌，等着她结束谈话。她的丈夫坐着，像一座用沙塑造的人像似的，他的表情是一个坚强、无辜的男人盯着一窝眼镜蛇在看的表情。她短促地向他的脸瞟了一眼以后，不敢把眼光从他交叉着摆在肚子上的双手上面移开。她想，唉，我把他的生活给毁了；她当时没想到，稍后才想起，她可能为她自己的生活干些什么事儿，她的生活是完全依靠她丈夫的安乐的嘛。她甚至不是不顾后果地，而是压根儿没有经过考虑地违反了她丈夫的信念，她当时是那么一心要发表她自己的意见，对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不在乎了，违反了她丈夫的主要信念，他们的婚姻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是牢固地建筑在这个信念上的：那就是，妻子的首要的责任就是每时每刻都要跟丈夫保持意见一致，不管在什么问题上，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更尤其是，当着众人公开表示一丁点儿不同意见是最不忠诚的行径。她用不着急于积极支持他——那会使她的态度显示出强迫的模样。不，她该担任的就

是那个表示沉默即同意的友好角色。在任何情况下，她的意见是绝不会算数的。重要的是她对她丈夫的不容置疑的不变的情义，这经常可以不用言语更雄辩地显示出来。

胡滕太太逼着自己吐出一口粗气，好像临终的人叹的最后一口气，从她的身子深处一下子吐出来的。然后，她坚决地面对终身的惩罚；她的灵魂好像飞入一个苦难无法触及的领域，好像她用同意接受惩罚的痛苦来逃避这种痛苦似的。

"我同意你的话，"小个子施米特太太出人意料地说，"我们必须不去鼓励人们作践我们。要是我们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碾过的话，那是我们的过错……"

"啊，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那么，你到底说过什么呢？"施米特太太困惑地说。

胡滕教授先生一听到这话，就站起身来，伸出胳膊去让他的妻子挽住；胡滕太太也站起来，对她能从跟另一个女人进行一场愚蠢的讨论中脱身，心存感激。她的丈夫有一个信条，一切女人间的交往，哪怕是最偶然和短促的那种，都是不正常的，性质是不健康的，是共谋反对男人的温床，会导致夫妻分手。已婚的女人总是对她们的丈夫的性行为和过错"交换意见"，对年轻的姑娘们提出不好的意见。一个女人的忠诚绝不应该，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给她的同性，而要给她的有关的男人——给父亲、兄弟、儿子，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毫无保留地要给她的丈夫。在男人中间，自然地存在着对具有高尚的、受人尊重的真诚友谊的理解，在女人中间却没有；她们不可能有，她们生来就是对头，不可能互相信任。在女人们的交往中，虽是存在着被败坏的、歇斯底里的情况；她们不被允许进入伟大的、跟外界隔绝的男性社会，因为她们对神没有敬意，对圣餐礼没有敬意……啊，胡滕太

太是多么经常听到她丈夫就在她的客厅里当着男女客人发表他的高论，那时候，她默不作声地坐着，接受教诲，但是心中几乎在无言地抗议——“可是我们还有许多事情看来他不知道！情况并不完全是这个样的——”无可奈何地说不出话来，而且奇怪地——真是奇怪，她始终没法解释——可怕地感到孤独。不过，别的女人看来都同意，或者屈服于这话，而大多数她认识的男人都这么说，再说她在许多受人尊敬的作者的书中或多或少地看到这种说法；她的父亲也说过，还有一些教士也这么说。到头来，她不得不承认，这个叫人痛苦的判断是又一个她天性不适宜于领悟的那些伟大的真理之一。

他们鞠了个躬，溜了。“请别走得这么快，”她在上楼梯的时候喘着粗气说，走路一瘸一拐。她的丈夫马上放慢脚步。“哎，”她感激地说，接着急忙说话了，免得那充满危险的沉默在他们中间扩大，“我亲爱的，我刚才干吗这样说话，我简直没有头脑，没法好生想想。”

教授的语调跟他的步子一样不慌不忙。“走在楼梯上别气喘吁吁地说话，我亲爱的，”他冷静地说。“一个做妻子的既然在大庭广众前，当着陌生人的面，在一个他花过功夫研究而她一无所知的问题上，说了不少跟她丈夫唱反调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提醒你，她要是想不出她干吗要说的话，难道她不可以干得好些，默不作声吗？”

“啊上帝，啊，上帝！”胡滕太太嚷着说，在可怕的生活陷阱前，她陷入了道德的讨论中，她的生活像走在一条横着一道道铁丝网的小路上。“啊，上帝，我不是有意的！”

教授先生几乎当场站住脚，接着又一下子向前冲去。“你不是有意的？”他惊奇地问。“你当时只是随便说说的吗？像个女

人吗？你既然说的是这样的事情，不是有意地说，是不可原谅的。只有出发点虽然是错误的，却是真心诚意的，这样昏了头的想法才能得到原谅。那么，我该怎么理解呢？你只是为了自己的理由，就希望使你的丈夫丢丑。简直是不忠诚！"

"啊，上帝，不是的！"

"对我的想法不忠诚，"她的丈夫说，在短短地爆发了正当的愤怒以后，恢复了他的合乎理性的语调，"对我的整个思想，对我的微不足道的学者生涯，对我的生活的全部内在意义，我是这么愚蠢地把这些都交托给了你——就是这样，"他推心置腹地向她说，语气温和得叫人害怕，"没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们走到通往他们的房舱的过道上了；他们两人马上看到房门大开着。两人各自感到另一人的震惊。教授先恢复过来。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儿？"他问他妻子，仍然用他的合乎理性的声音；这差一点没叫她发狂；在他用这种声音说没有一点儿道理的话的时候，她总是会这样。

"我没有干过，"她说，眼泪涌上来了，"我干吗必须为一切事情受到责怪？"

"眼下不是自我怜悯的时候，"教授说，"你是在我后面出来关上门的，我想是这样的。我记得你的手在门把上。"

"不，这真叫我受不了，"她跟他说，声音也颤抖了。"你这辈子什么时候从门里走出去的时候走在我的前面？你知道，你为我推开门，在我们身后关上。"

听到这话，教授先生站住脚，仔细打量着他妻子的脸，好像他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而且已经准备好一看到她就不喜欢她似的。

"我干的吗？"他挖苦地问。"你能肯定我一直对你这么礼貌

周到吗?”

“不错,”她说,“你一直是这样的。”她十分倔强地迎着他的眼光。教授有点儿动摇——她用一个可恶的办法把他陷入尴尬的困境,因为不用说,他对她确实是礼貌周到的;习惯已经成为第二天性,而且他已经不记得他的举动了,可是明摆着是他推开着门,又……

“也许是贼,”他们进去的时候他说,还假装检查门锁。他的妻子稍微弯下身子,皱起眼睑,盯着看每一个角落。

“它不在这儿,”她用孩子气的低声说,“我亲爱的,它走掉了……它独自个儿溜出去了,因为你让门开着!”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几乎喊叫了。

“……它不见了,去找我们了。它在怀疑我们干吗抛弃它。要是它转悠到它不该去的地方的话,有人会揍它,或者踢它。啊,我们赶快回去找到它,啊,你让门开着的那会儿,干吗不想到贝贝呢?它像个孩子,它要跟我们一起到每一个地方去……啊,你怎么可能?”

“你还是不在动脑筋想,这挺清楚,”教授先生说,用力地耸耸肩膀,突然挺起身子,右手向外一挥,借此振作起精神。“得了,乘你还没有完全失常,我们去找那头畜生吧。难道你没有想到过,这可能是破门而人,偷窃才是目的吗,你的石榴石项链和你奶奶的金刚钻耳环在哪儿?”

“交给事务长保管了,”胡滕太太说,这会儿眼泪淌个不停。“请吧,我们去找到它,好不?”

教授手握着球形门把,站在一旁,让她过去,然后把他身后的门一拉,牢牢地关上。“难道你看不见吗,我关门的时候,多么牢靠地关上了门?”

“是这一回，”她毫不松口地说。教授不是第一次细细揣摩他的一些父辈对女人的名言，热烈地表示赞同：她们不过是年纪大了一些的孩子罢了，时不时地要让她们尝尝棍子的滋味，才能使她们安分老实。在叫人痛苦的沉默中，他们挽着胳膊，又出发了，在比较低的一些封闭着的甲板上走上走下，问每一个人，乘客啊、水手啊、高级船员啊、服务员啊，他们哪一个是不是看到了他们的狗。“你们肯定记得它喽？一条白狗——船上唯一的狗。”有几个人承认记得它，但是没有人在那天傍晚看到它。他们转过身去，又向上爬。胡滕太太感到她的丈夫的一个肩膀抬起，他不耐烦地用胳膊肘轻轻推了她一下，好像她的重量对他是一个负担似的。她吓了一跳，几乎放开他的胳膊，然而她不敢放开，只怕他会把她的感情受伤害的迹象当作怨恨。这个新产生的害怕使她紧紧地靠在他身上；她知道在这节骨眼上，她干什么事儿，或者不干什么事儿，都只会使他更生气。

晚餐后的华尔兹音乐在左舷甲板上热烈地演奏着，节拍像钟声那样有规律，夹杂着海风从下面传来的一阵阵飘忽不定的更狂放的手风琴奏的曲调；统舱里的男人在那儿围成一圈圈跳舞，拍着手，啪啪地打着榧子，哒哒地跺着脚跟，嗒嗒地敲着响板和喊叫着“好！”女人和孩子们紧挨在阴影里，一动也不动地看着。

“啊，爸爸，”埃尔莎恳求着说，“我不要跳舞……总是那老一套的华尔兹……”

她母亲说：“得了，埃尔莎，你知道，那决不是不跳舞的理由。华尔兹曲子对一位女士来说是很美和很合适的。你要什么，难道要跳那种不成体统的爵士舞曲吗？在圣加仑的人们会怎么想

你呢?”

“别,妈妈,也许跳一支狐步曲吧……”

“得了,我的埃尔莎,”她的父亲说,“你只是在害臊罢了,所以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你去参加一个舞会,你第一支舞要跟你的保护人跳。我既然是你的保护人,你第一个跟我跳;以后呢,谁知道?在你最近的生日舞会以后,你还没有跟你爸爸跳过舞呢。”

“再说,别人看到你在跳舞,”她母亲说,“就会来邀请你了。”

埃尔莎向周围瞟了第一眼,就看到她那个学生在跟那个叫帕斯托拉的西班牙姑娘跳舞;她的一直受到挫伤的心又碎了。她把头搁在她父亲的肩膀上,害怕即将到来的考验。不管是什么音乐,她父亲跳的总是一种滑稽的、跳跳蹦蹦和转来转去的舞步,把她一再旋转出去,又把她拉回来,在停顿的时候跺着脚,而她被悬而不决地搁着,等待他的下一个动作。她甚至不敢看周围,害怕别人取笑他们两人。她比他个子高大,而他像一只矮脚鸡那样神气活现,高声说话:“抬起你的脚,埃尔莎,我的女儿,移动,移动,难道你听不见音乐不成?”

埃尔莎恨不得喊出声来:“我不是面粉袋,我不是扫把,这不是在跳舞,你让我们显得可笑,除了你,没有别人是这么跳舞的!”她父亲跺脚,跳跳蹦蹦和违背她的意愿把她拉来拉去的时候,脸上现出欢乐和充满着爱;她跟着他移动,麻木地忍受着痛苦,因为一个女孩子必须服从她的父亲。

一个站在附近的穿白制服的船员跟另一个刚走进今晚火爆场面的船员说:“我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一定要去为那个姑娘干些什么。该是谁呢?”

另一个从兜里取出一个小硬币,说:“正面还是反面。”

“正面，”另一个说。硬币掉下来，反面向上。扔硬币的那个说：“全是你的事儿了，”拾起硬币。“你会遇上机会的，”另一个说。他们两人笑起来；输掉的那一个在那支舞结束的时候，不慌不忙地走进去，必恭必敬地跟吕茨太太说话。“我很高兴跟你的女儿跳舞，”他一边说，一边鞠躬，“请你允许。”

“你可以邀请她，”吕茨太太说，态度极为娴雅，好像她在给人一个珍贵无比的恩惠似的。唉，埃尔莎也比那个服装整齐、个子矮小的船员高大，这一点她痛苦地感觉到，而且还跟不上他的步子。他感到颈窝里都湿了，把她抓得更牢，显示自己的权利，只要音乐还在响，就把那一大堆不抗拒也没有反应的肉这儿那儿地推个没完，总是想方设法地避开她的双脚，跟乐队保持合拍。最后，他再三向她道谢，搀她回来，交给她的父母，飞也似的溜走。“你看到了吗？”吕茨太太说。“一件事儿会引起另一件。我们进去下棋了，可是隔开得不远。待在这儿，好生享受！我们一个钟头后回来。”

埃尔莎横下一条心，要找个藏身的地方，要是没有的话，找个座位也行。服务员们在周围留下几张帆布躺椅，其中有一张挨近那个可怜的病人的轮椅；那个可怜的病人尽管他自己快要死了，却相信他能医好别人的病。她走近他，神情腼腆，拿不准她是不是受欢迎，由于她自己遭受了痛苦，还产生了被关闭在正常生活之外的感觉，变得性情温柔和仁慈。她离开他还有几步的时候，他热切地举起手，向他附近的一张躺椅指指。“拉近些，”他说，“咱们来谈谈。”

她把躺椅向他拉过去，傻乎乎地坐着，她的膝盖几乎碰到他的。她向四面看看，她的悲伤的眼光掠过一对对跳舞的男女：珍妮·布朗和弗赖塔格；特雷德韦尔太太和那个面貌最漂亮的船

员，还是一个穿金边制服的哩，刚才跟她跳的船员穿的只是银边；汉森先生永远跟那个可恶的安帕罗在一起——叫人难以相信，但是他们在那儿，旋转和摇摆，身子贴得那么紧，中间透不出一丝光；那个沉着脸的小伙子和那个叫孔查的姑娘。没有人跟埃尔莎跳——没有人，而且永远不会有人；她会老是坐着，看她喜欢的人跟别人跳舞，总是有帕斯托拉那样的女人！她的鲜血在血管里汹涌，她开始感到真的浑身疼痛了。格拉夫先生看到她的苦恼，亲切地问："你今晚觉得怎么样？"她还没有想起问他的健康。"一个像你这么好的年轻姑娘，你干吗不跳舞啊？你该跟我那个性子暴躁的外甥跳，而不该让那个怪里怪气的姑娘跟他跳……"

"我喉咙痛，"她说，不大懂得怎样把谎话说得流利。"我妈说我还是安静一会儿的好。"

"更挨近一些，"他说，"向我靠近，我会医好你的喉咙的。只要上帝还借给我他的医好你的力量，你就不用生病。"他的手已经举起，准备伸出来抚摸她。她没有挨近，反而避开去；她的迟钝的头脑和活人的肉体对挨近尸体似的人有一种反感，死亡本身——

"不过，先医好你自己吧，"她声调温和地但是直截了当地说。

"'他救别人，让他救自己吧'，"格拉夫先生脱口而出地说，因为他以前听到过这话许多次了。"'要是他是基督的话'，记得吗？他把他的治愈的力量传给他选择的门徒和使徒，然而他们也没有一个能医好自己，咱们是神圣的后裔，甚至直到今天也不能。我干吗要医好自己呢？上帝没有这个意愿，我也没有。听我说，我的孩子——我要是医好自己的话，就会变得跟其他人一

样自私了,我会去追求我自己的欢乐,忘掉我对受苦的人们的责任。上帝但愿我跟其他住在痛苦和死亡的房屋中的人待在一起受苦。我只有在痛苦中,才对上帝有用,他把他的话传递给我。这并不困难,"他用衰弱的低声说,低得几乎被波浪声淹没;风吹过她的耳边。她向他深深地凑近,来听清这些话,对这番神圣的话表示尊敬。他接着说。"别怜悯我。这挺容易。这是我对上帝的爱的显示。"

她默不作声,眼泪汪汪。音乐刺耳地响起,灯光明亮的甲板上,一对对跳舞的男女闪来闪去,一派欢乐的气象,甚至那两个糟透了的西班牙双胞胎兄妹这一次看来也挺快活——星星看来是这么近;迅疾的风是这么美妙,这么纯净,这么凉爽和清洁,这么美好——

"我得走了,"她不自在地说,"我希望你有一个很好的夜晚,格拉夫先生。谢谢你提出帮助我……可是我确实没有生病,确实没有……"

"我已经承担了世界上的种种痛苦,所有的病人的病痛,"他告诉她,"用我的肉体承担,所以我也能承担你的喉咙痛和你的不快活……可是我必须抚摸你,"他说。他向前探出身去,稍微伸直他的脖子,稀稀拉拉的山羊胡子尖从胸前翘起来。"让我摸摸你的喉咙,"他说,"为你背一段祈祷词,你就会真正好了,灵魂和肉体。"在她敢后退以前——她不希望显得粗鲁——他已经伸出胳膊,用冷冰冰的、皮包骨头的手抓住她的喉咙,弯曲的手指头软弱无力地握了一下,就松开了,滑过她的乳房,重回到他盖在膝盖上的毛毯上。他看到她的恐怖的脸色,感到她结实的肌肉猛地打了个冷战。"愿上帝宽恕你,你这个狠心的姑娘,"他严厉地说。她站起身来,走开去,但是看到了眼泪流出他的眼眶,

从他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到他的稀稀拉拉、邋里邋遢的胡子上。她不顾一切地、急匆匆地在甲板上跑着，经过那些在跳舞的人，从那只白叭喇狗贝贝身旁闪开，它恰巧在这时候从放救生艇的甲板的楼梯上走下来，出现了，走进了灯光明亮的友谊厅。她的父母是那么全神贯注地在下棋，她在挨近他们坐下的时候，他们只向她点点头。她有一点儿气喘吁吁。

"看来你在喘粗气，埃尔莎？"她的母亲问。"你一直在那么来劲地跳舞吗？"接着，他们两人向他们的女儿流露出赞赏的微笑，那种笑容满面的、热情、亲密的一家人的微笑。"哎，好，好，"她父亲说，"咱们的埃尔莎绝不该是那种靠墙坐着的姑娘。好了，去睡吧，"他指示她，"去美美地睡一觉。"

特雷德韦尔太太跟她那个年轻船员在跳舞。他已经成了习惯，几乎每天黄昏都邀请她。他早就说了他的姓名，甚至也说了他出生的城市的名字。起先，她混淆了那两个名字，后来干脆一个也记不起了。她不直接面对他的时候，几乎记不起他的脸；他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经常没法马上认出他。自从她最近跟利齐和弗赖塔格发生纠纷以后，她比任何时候都不希望接触别人，或者被接触，不管是用手，还是用说话接触。他们那种语言可以变得像用爪子扒和用撬棒撬那样叫人受不了。她喜欢他那个年轻的船员只用手指尖揽住她的方式，他的右手搁——不，不是搁，而是毫无重量地虚放在她整个身子最不敏感的部位上，那个正好在她右肩胛骨下面那个无害的地区。她的手则正好在他弯着的胳膊上面轻轻地转动，保持着两个身子中间的规定的距离；在学校里的舞会上，女孩子是负有全部责任来保持这个距离的。

"你要是拿不准你是不是处在恰当的距离，"她的舞蹈教师

热切地告诉她，"你在心里抬起你胳膊肘弯着的右胳膊，直接从肩膀那儿伸出去，要是它碰到你的舞伴的胸膛的话，这包管你是完全正确的。要是你的舞伴看来像要搂紧你的话，只要坚决地可是优雅地推开他的身子，不要乱了步子，直到他接受暗示为止。记住了，他要是个正派人的话，他会接受暗示的。要是他不是的话，那你就别跟他再跳舞了……"这声音从她的洪水时代[1]以前的遥远的青春期传来，使她那么高兴，那鬼气森森的声音越过数不清的、被遗忘的空间。她对着他露出迷茫、温柔的微笑，当她看到他的反应是稍微有点困惑地，要是算不上表示被打搅的话，皱了皱眉头的时候，她就完全清醒了，同时，他握得比刚才稍微紧一些，而且比刚才把她温柔地拉近他一些。特雷德韦尔太太在心里抬起她的胳膊肘弯着的右胳膊。那个年轻的船员马上放松他的胳膊，看到贝贝在跳舞的人中间磕磕绊绊地走来走去，关心地说："我想不通这条狗独自个儿出来干什么?"特雷德韦尔太太也想不出。他们在轻松、沉默、和谐中跳着舞，直到音乐停止。"谢谢你，"他说。"愉快极了，"特雷德韦尔太太说，对他轻描淡写地笑了笑，"明儿见。"接着她马上离开甲板。

安帕罗仍然在教汉森跳舞，毫无乐趣地旋转着他，她一脸都是厌烦的神情。尽管她费劲地指导他，他终于让自己和安帕罗撞到了正在迅速旋转的约翰和孔查身上，他们像鸟儿似的转弯和逃走。"蠢货，"安帕罗紧张地说，这是那天黄昏她跟他说的第一句话。"你指望我要这样坚持多久?"

---

① 典出《圣经·旧约·创世记》。上帝创造世界后，看到世界上的人败坏了，决心毁灭世界。他命挪亚造方舟，将挪亚家人和其他各类动物的一公一母安置在方舟内，然后使暴雨连降四十昼夜，洪水泛滥，所有的生命全都毁灭。此处只是指特雷德韦尔太太感到她的青春期的遥远。

汉森一声不吭，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重新狠命抓紧，向前踩去，好像他在犁地似的，差一点没让他们撞着乐队。“白痴！”她说。汉森跌跌撞撞地往前去的同时在沉思。“我付你钱的，是不是？”终于他笨头笨脑地说。“那也不能踩我的脚呗，那不行，”安帕罗说。“傻瓜！”她愤怒地说，“小心你的大鞋跟！”

弗赖塔格和珍妮都费尽心机使对方相信，他们是完全偶然在甲板上遇见的，磨磨蹭蹭地在想他们到底是不是再敢一起跳舞。戴维随时可能决定翻脸。珍妮无意中见到独自个儿站着的弗赖塔格，他稍微弯着腰，一只手插在兜里，望着跳舞的人们，要不，是假装在望，他的面貌毫无变化地露出一副奇怪的皱着眉头视而不见的凝视模样，有时候他的眼白显示出周围的虹膜，这种神情珍妮现在经常看到。起先她完全相信，而且怀着愤怒的同情，近来，总是有两种想法——第一种想法是，他的痛苦是真的，而第二种是，他也许有一点儿做作。然而，她对船长向他作出的粗野的侮辱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又能冒起微弱的怒火。她公正地把责怪安在船长的身上，因为只要他用一句话就可以制止那种胡说，他不但不干，反而让它产生后果。打击一个没法回击的人毫无疑问是怯懦和下流的。可怜的勒温塔尔先生也是受到亏待的，而弗赖塔格看来好像始终没有想到这件事儿——这是他的错。她相信反击，以打击回报打击，而且要尽可能的加利奉还。不抵制和惩治一个伤害人的行为，不管那伤害行为是对那个人自己或对任何别人的，是对坏事的赞同，在她看来，是明显的道德怯懦，再没有比这更叫她瞧不起的了。她走近弗赖塔格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些念头，而且越想思路越分散和模糊；他看到她的时候，就抖擞起精神，好像满心欢喜地露出了笑意，她当即把那些想法一古脑儿地忘了，问：“你喜欢跳舞不？我对照顾

戴维的疑心病厌烦了!""真荣幸,"他说,"当然喽!"

他们一起先按照一两个拍子摇摆一下身子,然后按舞步跳起来。他说:"我告诉过你我是怎样第一次看到我妻子的吗?我们在一家巨大、豪华的柏林夜总会里,一种高级的行为放荡的场所,那儿任何人都可以去。"他停住嘴,好像把那个词儿的结尾咬掉了似的。"那就是说,你要是衣着讲究,一副有钱人的气派的话。我在跟一个姑娘跳舞,那些光着脊背的女士之一,她们一起在舞蹈中间玩一些天真的比赛如手球等,来炫耀她们的身段和灵活性……而那个俊俏的小妞跟一小群模样极有钱的年轻男女一起进来——我巴不得当时你能看到她——从她的舞伴的肩膀上看着,脸上充满着一个惯坏了的、却受到很好保护的姑娘的调皮和大胆的神情,高声招呼着我,好像在回答我刚才跟她说的什么事情似的:'嗨,当然喽,下一个舞不妨跟你跳!'你可以想象,我去找她了,问她这话是不是当真的。"

老脸皮厚的小妞儿,珍妮想,但是这办法倒是管用的,实在是经常管用的。

他又开始说起一个同样不真实的回忆。他在这样不断地折磨自己的时候,珍妮耐心地听着,拿不准他是不是察觉。最后他用过去时态谈他的妻子了。"她实际上原是个很遵守传统的姑娘,她并不经常干这样的事儿。后来,隔了不少时候,我问她干吗这么干的时候,她说一见到我就爱上我了,甚至还没有靠近我,还没有近得可以看清我眼睛的颜色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嫁给我啦!真是疯啦,对不?"

"完全对,"珍妮说,"真是自杀性的想法。"他听了这话稍微有点儿不安,不过放过去了。

"她是那么聪明,"他亲切地说。"她到了她母亲的年纪,会

比她母亲更聪明……她经常会正确无误地告诉我事情会变成怎样，她不可能被哄弄，她能在一个地方吸一下空气，说：'走吧，这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有时候，我不相信她的话，或者说不希望相信，我会对她是这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失去忍耐，我会跟她说，她正是另一个受迫害的犹太人[1]，断定不管遇上什么事儿都要受到憎恨和迫害。她会冲着我的脸说——'所有的非犹太人都憎恨犹太人，那些假装喜欢我们的最坏，因为他们是虚伪的人。'我跟她说，这种想法正好使她神气活现——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是灌输进人的脑子里的最不可原谅的狂妄的和彻头彻尾地糟糕的自私的念头！'我想你不得不会为自己感到害臊的，'我会说……我们不在争吵，不，绝对没有。不过，这种事情时不时地发生。她会发火，大叫：'老一套的非犹太人的论调……我不是跟你说过的吗？'接着我们会惊慌地互相把对方迅速搂在怀里，说：'我们别互相攻击啦！'一切风波就会过去，因为我们真的相爱。"

他的话说个没完，好像他被旋转的华尔兹曲子和音乐声下面的他自己的滔滔不绝的声音催眠了似的。珍妮拿不准他是不是还记得要说些别的关于他妻子的事情，尽是那些纯洁的爱慕，浪漫的温情，充满欢乐的蜜月幻景，保护性的、防御性的、始终不变的赞美——干吗不可以呢？说到现在为止，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嘛。但是一个人扯得那么远，总是必须回转去，逗留一下，再开始造出一套新的事实。做一个梦，那是一种现实；醒过来，那是另一种现实；要不，那是同样的现实，却有数不清的面貌。她终于知道，他刚才没完没了地谈他的妻子，就像人们谈死人。

① 此处是弗赖塔格嘲讽他妻子以耶稣自居。

在这种对她经久不变的回忆中，他是带着鲜花去探望她的坟墓，看他自己为她写的碑文。

"……啊，上帝，"他几乎悄没声儿地说，他的嘴凑在她的耳朵边，他们一边在乐队附近从容地转圈子，"我希望我能带着她，不带她的母亲——她母亲一时半刻也不让我们忘记，为了我们的缘故她已经几乎失去了她所有的朋友——找到一个国家——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像人那样生活——像其他的人那样生活，再也听不到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那样的词儿。"

"你可以去非洲，"珍妮说，"你可以找一个还没有消灭的食人者和猎头者的部落，你们在那儿会平等地双方都被憎恨，因为你是另一种皮肤颜色。你可以轻松地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臭得要命，一直搔痒，而且向木棍和石头下拜，披花里胡哨的毯子；然而他们带着同样的热情喜欢和爱慕他们自己，就像我们其余的人爱我们自己那样，而我们的皮肤颜色使他们想起了幽灵和死亡，他们说我们身上的气味使他们反胃。你会比较喜欢那种情况吗?"

弗赖塔格把他的脸往后退了几英寸，他那双生气的、自我怜悯的眼睛严厉地责备她。"你说话太轻浮了，你是在拿一场可怕的人类悲剧开玩笑。"他们的舞步慢下来，几乎停住了。

"我有时候说的话比我本人轻浮，"她说，"这正是我叫人遗憾的作风。这几乎招来我的一切纠纷……"她的眼光越过他的肩膀，看到戴维在门口出现了一下，望了一眼，看到了这个场面，没有表示认出的迹象就不见了。"戴维来过了，"她说，没有吃惊的表示。

"在哪儿?"弗赖塔格说，头转得太迟，来不及看一眼。他的

脸色开朗了，一丝淡淡的、古怪的微笑绷紧在他的嘴角上。他用带有阴谋意味的亲热的动作很快地把珍妮拉得更近些，把他的脸颊贴着她的。“他还在那儿吗？他还忌妒吗？哎，我们干吗不给他一些忌妒的理由呢？”

“他什么也不需要，”珍妮欢快地说，对他的莽撞产生反感，靠着他的胳膊的身子绷紧了，“他一直独自个儿过得很好，谢谢你。”

弗赖塔格哈哈大笑，珍妮注意到这跟他的为人是相称的。他并不打算当戏剧中的，更不要说悲剧中的，主人公了。“你的意思是，你这个狠心的家伙，你要让他在你的有生之年跟你在一起，跟假想的敌人作斗争吗？你太坏了，在他那么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的时候，却不给他——”

“啊，不，”珍妮说，“你完全错了。他不要我对他不忠实。他要的只是这样一种感觉：老是有别的男人可能打我的主意。他要的是指责我犯了什么事情的权利——那些事情他要是真的相信的话，他就不会现在跟我一起在这艘船上啦！不过，你介意吗？我们别谈戴维吧。这是他讨厌的事情之一。我并不责怪他！”

“我刚才在跟你谈我妻子，”弗赖塔格提醒她。

“可完全不是用这种方式，”珍妮说，觉得她是在为鸡毛蒜皮争论。他们是两个一直愚蠢而粗俗的人。拿她来说，只要他们在这艘拥挤的、叫人不舒服的船上，不管在哪儿，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一起睡上几宿的地方，她会一刻也不在乎哩。对他她也不存什么别的希望，只是像发高烧似的被那股沉静而狂暴的力量折腾着，想要干成那事儿，抛弃一个梦。她真弄不懂他——难道他是那么麻木，没法通过毛细孔感觉到她吗？

“这话不错，”他表示同意，“完全不一样，可是她不在这儿，这就使一切都不一样了……你要干些什么呢，我亲爱的？”他温柔地问。

“我不知道，”珍妮说，“我只知道应该结束了。”

弗赖塔格突然热情奔放地把她搂在怀里，很快地跳着华尔兹舞步旋转到乐队前。“请奏《再见，我的年轻的近卫军军官》，”他向那个萎靡不振地坐在那架破旧的小钢琴前的人嚷着说。那人点点头，对于他这个人的在场的最微细的承认使他感到宽慰。戴维在另一个更远的门口第二次站住脚的时候，看到他们用步子很大的、波浪形的、醉汉似的舞步，跳着一种轻快的、即兴发挥的舞蹈，两人都哈哈大笑，活像疯子。他退回到酒吧间去。

“啊，小心，”弗赖塔格说。“贝贝在呢，它在这儿干什么？”它确实就在脚边。它也在躲闪，他们互相避开，它晃晃悠悠地一路走去。

里克和拉克在转来转去跳舞的人们外面，在跳着他们自己的舞。跟往常一样，互相面对着，牙齿对牙齿，他们手握着手，脚趾头几乎只是点在地上，互相尽可能远地往后仰。他们一圈圈地像行星似的猛烈地旋转，他们的皮靴尖像响板似的哒哒直响。这个游戏是看哪一个先筋疲力尽，支撑不住，在打转中狠狠地摔倒。甚至更妙的是，其中一个会放开另一个的手，同时身子往前冲，保持平衡，而另一个的脑袋被砰的撞到。然而，既然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不相上下，实际上，这种胜利主要是假设性的。一个松开手，往前冲的时候，另一个抓得更紧，也往前冲。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站定的头对头的冲撞，碰得凑巧，两人都可能鼻子流血。

这是一个鼓不起兴致的日子。他们不欣赏他们的游戏，但是固执地不肯停下来，除非他们想法成功地伤害了对方，用什么法子倒无关紧要。所以他们围着中轴线打转，肩膀张开着，下巴缩拢，眼睛邪恶地盯着看眼睛，好像两个娃娃模样的戈耳戈[①]在一心把对方变成石头。谁也不肯让步，而是更激烈地旋转，互相把指甲掐进对方的手腕，费尽心机地踩对方的脚，渐渐等到那个时刻，用不着开口，就完全心照不宣地松手，飞快地分开，看谁摔倒，或者倒霉。

孔查在跟约翰跳舞，跳到他舅舅附近的时候，打了个冷战，藏起她的脸，说："哎，上帝，他的脸相多像死人——我们别更靠近他了。把我带开去。他干吗还不死？"

约翰怨恨地说："天知道，我巴不得他死哩。"他把他光滑的脸颊贴在她俊俏的、神情平静的小脑袋顶上，脑袋上长着一束束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光滑的黑发；他自己的头发是金色的，甚至在昏暗的亮光中也闪闪发亮。舒曼医生正在赶到统舱去，为又一个产妇接生，站住脚，高兴地、怀着真诚而极度的喜悦欣赏他们的充满活力的青春美——像他们这样邋遢和贫困的人怎么可能显示出这种美呢？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出身；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性跟他们的生活一样是贫乏和寒碜的，然而，瞧，他们跳过去了，身子骨长得像有荣获过冠军的马的血统的赛马，他们的盼望和没有把握的神情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的眼泪那样动人。"这种美是魔鬼给的，"他最后说，转过身子，赶去把又一个新生

---

① 戈耳戈（Gorgon）：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怪之一，面貌狰狞；人看到她，就变成石头。

儿接到这个世界上来，"这种美是魔鬼给的；他不久就会抛弃他们——甚至在现在，他已经开始抛弃他们了，真可怜！"

孔查跟约翰，或者任何男人跳舞的时候，不只是靠得近，或者把自己紧紧地贴在那个男人身上，而是柔软地融化进他的身子，从头到脚，温暖、结实，然而没有重量。她的呼吸带着细小的哼哼的声音轻轻地在他的脸颊上来来去去。她热情地凑着他的耳朵眼呜呜地叫，用鼻子擦他的脸颊和脖子，小心地、看不见地用舌尖在他的下巴上留下湿润的、颤抖的、热溜溜的、微细的亲吻痕迹。"别这样！"他说，不是搂着她的腰，而是狠狠地抓住她的脖子。"你要把我弄得发疯吗？"

"啊，你说，你说是这样说，可你并不真的爱我——你甚至并不真的急不可耐地要我。"她把头远远地靠在他的胳膊上，无可奈何地抬头看着。"那么，我该干什么呢？你说你没有钱——唉，我也没有。你有你舅舅照顾你，可是我谁也没有，只有我自己。我并不要求你许多，可我总得有一点儿呗！你比他强壮——你干吗不使他给你一些钱呢？"

约翰愁眉苦脸地说："他快要死了，是这样的情况。他会把钱留给我；他常跟我说，时间不可能长了；要我耐心点。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恨他——我恨他知道我的怨气，恨他明知道他使我过得多糟，还对我的怨气说长道短。可是，他毕竟还没有死，所以我不得不等。"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变了；他闭上眼睛，抓紧她，好像她是他生命的唯一支柱似的。

"请别抓得这么紧，"孔查说，浮起一丝漂亮的微笑，对他的体力表示欣赏。"喂，你有一点儿爱我吗，或者没有？你把我当作那些夜晚站在门洞子里的人看待吗？"

"你不是个跳舞的吗？不能靠跳舞挣钱过日子吗？"

"不是个跳得很好的,"孔查冷冷地说。"除非我出了名。名气还不够。可是你真不害臊——难道你要替代马诺洛做我的'经理人'吗? 他揍我,要是我不把所有钱都给他的话。你会吗?"

"他要是拿走你所有的钱的话,你挣钱还有什么好处呢?"约翰问,他的德国人的商人血统对她那个行当的经济状况感兴趣了,他的好奇心几乎超过了他的其他种种想法。

"他没有全部拿去,尽管他使尽了办法,也办不到,"孔查说。"要是他确实全都拿走了的话,你比他又好多少呢? 他要我跟男人睡觉,挣钱来给他;你要不花钱跟我睡觉——两者都是欺骗!你还谈什么爱情哩。"

"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约翰愤怒地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词儿!"

"好吧,"孔查说,她的轻轻的、轻蔑的笑声直刺到他的骨头里,"归根结蒂,你只是个孱头罢了——你不能正视什么东西,甚至爱情这个词儿也不行。你还不是个男子汉……"

"我会叫你看个明白,我会叫你看个明白的,"约翰暴跳如雷,往前直冲,那么粗暴地推她的背,差一点没使他们站不稳脚。

"不,"孔查说,"那不是我说的男子汉的意思……我说的意思要好得多。可不是。让我们一边跳,一边离开别人;我会告诉你的,"她把一只手掌紧紧贴在他的脸颊上,亲密地说:"别发火,我亲爱的人儿。"她按照步子和节奏跟他一起转开去,那条肥胖的白叭喇狗独自个儿在跳舞的人们中间晃晃悠悠地穿过去的时候,他们几乎踩到它,她还指引他,提醒地说:"啊,小心!"它闻闻他们,冷漠地继续走去。他们靠在栏杆上。孔查说:"我没法想象你怎么能容忍这些苦恼,没有一个苦恼是必要的嘛,没有一丁

点儿必要。事情是那么容易，那么安全，就可以了结了——压根儿没有危险。瞧他——"

他们望了格拉夫先生一下，远在甲板另一边，脑袋耷拉在胸前，眼睛闭着——"那个大个子丑姑娘走了，"孔查说，"嗨，甚至现在他也不是真的活着。他几乎不在呼吸。只要一个枕头，一个软枕头，在他的脸上盖几分钟——un momentito[1]，"她认真地说，用大拇指和食指揸开，比划时间的短暂——"啊，这经常是干得成的。那么，你就会得到他随身带的钱。你到家后，就会有钱啦！哎，要有点儿勇气，我的宝贝儿。没有人会知道的——甚至我也不知道！他要是今夜就死的话，我也不会感到惊奇的，或者提出任何问题——其他任何人也不会的……我们全都感到奇怪的是，他到底为什么仍然还活着？他怎么还能继续呼吸？所以你明白……？"

约翰害怕地听着，不断地把头转来转去和咽口水，好像他被掐着脖子似的。这个本来那么经常地巴不得他舅舅咽气的人几乎被这个要他杀人的建议吓得愣住了。他可以发誓，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念头。他的耳朵嗡嗡作响；他浑身感到像遭到电击似的。他在那一刹那甚至感觉不到那只握着他手腕的小手正在悄悄地伸进他的衣袖，一直摸到他的胳膊上面。

"下手吧，"她说，带着温柔而催促的态度，气呼在他的脸上，"下手吧，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做个男子汉。"

"你的意思是说今夜？"他问，把他的声音从被堵住的喉咙里逼出来。

"干吗不？明天更好些吗？"

---

① 西班牙语，"一眨眼"。

“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这事儿,”他突然极度痛苦地说,“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那么,是该你想到的时候了,”她说,“嗨,啊,我多么希望我们能来一瓶香槟酒庆祝一下。我们一定要一起喝香槟酒,你不能哪怕买一小瓶吗——哪怕是那种德国货也行——在今晚?”

约翰呻吟了一声,他感到的羞愧是那么深,看来他的骨子里都受伤害了。“等一下吧!”他用乞求施舍的人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等一下吧,我一个芬尼也没有——明天,我答应,我答应,我一定会买一瓶香槟酒给你!”

“好吧,那么,今晚让我来买,钱你明天还给我好了。不过,你一定要照我告诉你的话干,你绝不可以再做一个胆怯的孩子了。来,我把钱给你——”说着,她把手伸进她的薄纱紧身黑胸衣底部。

“不行!”约翰喊叫,风把他的声音吹到水面上。“你什么也不要给我。你想要干什么?难道你把我当作靠你养活的杈杆儿?你会看到我是怎么样的男人……你胆敢对我说这种话吗?好吧,明天你试着说说看!”

“我现在敢,”她说,轻轻地靠在他身上,抚摸着他的手说,“我明天也敢。别威胁我。我不怕你,我怎么可能怕你呢?你永远不会伤害我的,对吗?我会使你非常快活的,你永远不会要伤害我的!我们别吵嘴,这多乏味,我们来跳舞……”

“我不要跳舞,”约翰说,摆出一副不折不扣的粗暴的架势。“我跳舞跳腻了。我要一些别的东西,一些真的东西,真的东西,你耍弄得我够久了。下一回,事情就会不一样啦!”

“啊,我希望是这样,”孔查说,“要不,咱们谈些什么呢?你走了吗?”

“当然喽，”他说。“时间晚了，我得把我舅舅送到床上去。”

“你会干什么呢？”

“把他送到床上去，我说过什么来着？”他问。“你认为还有别的什么吗？”

“然后，你让他睡着？……”

他把她放在他胳膊上的手推开，而且在把它从他身上推开的时候，狠狠地扭了一下。“要是他今晚咽了气的话，你会告我的，”他说，“你会说，是我干的。我会让你看到，他今晚不会咽气——你没那么容易抓住我的把柄！”

“也许明晚？”他像一个逃命的人似的向前面他舅舅的轮椅跑去，她在他后面嚷着说。她站着，看他推着轮椅穿过门洞子，擦擦手腕，她的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然后，她走进酒吧间。马诺洛坐在那儿，面前摆着一瓶喝掉了一半的红酒，还有两个玻璃酒杯。她在他对面坐下，他们短促地接触了一下眼光；她把她的酒杯向他推过去，他为她倒酒。他们重新点燃烟卷，坐着抽烟，好像他们都是独自个儿，或者他们是陌生人似的。

贝贝停了一下，有礼貌地闻闻格拉夫先生伸出的手，他拍拍它的头，在它走过去的时候为它祝福。“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在充满爱的上帝的手中获得了拯救，”他向它保证说；它微微摇晃身子，算是对他的仁慈的语调的反应，但是摇摇头，把他手上的气味从它的鼻子眼里喷出来。它在船头附近摇摇摆摆地走着，正巧在胡滕教授先生和太太从酒吧间里出来的时候，不见了；他们问跳舞的人们：“你们看到我们的白叭喇狗吗？你们记得它吗？”

里克和拉克越转越慢，终于站住了脚，感到厌烦了，准备好

生打一架，这时候好像用一双眼睛似的看到了贝贝的庄严的屁股正在从那个病人的轮椅旁笨拙地挪开。甚至没有交换眼色，他们转过身去，迈开大步，穿过船，来到没有人的下风舷，去截住它。他们拚命地在甲板上奔跑，遇上了贝贝。它看他们前来，决不定地站住脚，它的鼻子在扭动。里克和拉克猛地一转，一先一后扑到它的身上，手忙脚乱地但是铁了心要达到目的地把它紧紧地抓住，马上把它拉到栏杆旁。

贝贝又有点儿晕船了，它没法抗拒，但是它深深地憎恨被这样拉过去。它转动眼睛，嚎叫，低声咕哝，软弱无力地前后摇动身子。他们使劲把它举到栏杆上，它四条柔软的腿悬空着，柔软的肚子在无能为力地、一上一下地颤动。它的后半身在栏杆上停了一下，但是他们一起使劲狠推，它惨叫一声，摔到栏杆外面去了。它像一袋沙子似的撞到了海水，沉下去，大海吞没了它的身子。它马上浮了起来，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勇敢地不沉下去，使它的鼻子和疯狂地挥动着的前爪浮出在水面上。

丹尼转悠着，假装在看跳舞的人们，但是他唯一的目的是，看到帕斯托拉向他看一眼，但是这个目的总是不能实现。有一个古巴学生一直缠着她不放，他们一起度过了黄昏，一支接一支地跳个没完。丹尼终于不得不承认他的前景烟消云散了，在失望中甚至喝酒的兴致也没有了。喝得滥醉是对付不了这个打击的。只是由于习惯，他站在酒吧柜前很快地喝了三四杯，然后带着一杯双份的波旁威士忌走开去，来到船的另一面；他在那儿可以不被人看见地逗留着，凝视着被舷窗里和甲板上射出的灯光照亮的单调的波浪，有害身心地生闷气和用咬着牙吐唾沫来安慰自己，压低了声音重复着骂女人的粗鲁的脏话——所有的女

人，她们整个儿都是肮脏的一伙，不仅仅是帕斯托拉。干吗在千百万人中偏偏挑中她呢？这个跟那个一个样，都是骚母狗，他断定，这时注意到一个大白包裹击在甲板中部附近的水面上——他猜想是一大包从厨房里扔出来的垃圾——里克和拉克眼光极度惊慌地张开着嘴，舌头伸出在嘴角上，像发疯似的匆忙跑过的时候，他看到了；几乎是同时，他看到另一个黑糊糊的长包裹落在那个白包裹附近的水面上，然后，从统舱里发出一阵长长的、使血液凝结的叫声，像一群丛林狼的嚎叫。这阵声音升起来，低下去，又升起来，其中最响的是女人的连续不断的、刺耳的高声尖叫。丹尼泼翻了威士忌碰落了酒杯面没有注意到，他急忙跑到栏杆前看下面露天的甲板，看到黑压压不定形的一大群，蜷缩着，拥挤着，一些身子在栏杆上探出老远，发疯似的蠕动着，好像人们都纠缠在一起，分不开了似的，但是痛苦的嚎叫分明是人的，而且其中还含有哭声；丹尼已经有醉意，眼前好像有迷雾，也是满眶眼泪。他用手捂住嘴，开始哭了，接着又跑到船边去看，这时候，船尾的波痕中抛下了六七个救生圈，漂在一个在海中挣扎的男人和一只白狗附近，一人一狗都在游泳，那人抓住狗的颈圈，一些身材细小的白色人影在拼命划着一艘救生艇，向他们靠过去，每一次往前冲过去都形成一起一伏的跳动。他感到他乘的船在前进中冷不防地停顿了，一阵内部的震动，好像它的机器被突然关掉了。他看到航线在改变，感觉到船在转身，船头那儿有沉重的螺旋桨转动的声音和喧闹的声音，它慢腾腾地围着那艘救生艇和那些漂浮着的救生圈在打转。一道探照灯的强烈的白光照出了那个游泳的人，仍然戴着贝雷帽，伸手在抓最近那个救生圈；他没有抓住，又沉下去了。那只狗被抓到救生艇上，这时候，他又冒出水面，那个人。

鲍姆格特纳先生显得比平时更痛苦，问丹尼："那些人干吗大哭小喊地嚎叫？"

"有人从船上掉下去了，"丹尼有根有据地说，他的眼泪干了。鲍姆格特纳先生作出叫人满意地强烈的反应，那么使劲地挤眉弄眼，连耳朵和头皮都在动了，他拍拍自己的额头，响亮地发出一声呻吟，赶紧跑去看那场还没有结束的热闹。不久，弗赖塔格跟他凑合在一起了。后来，人人都对这事儿感到惊慌，或者说把它当作消遣。跳舞的人们离开了音乐，乐队的成员放下了乐器，大伙儿都拥到栏杆旁，去看拯救的情况。海员们开始在他们中间走动，要求他们别都挤在这一边，在救生船过来的时候，别挨近它，请往后站，他们声称没有什么可看的；拯救已经成功了。乘客们东张西望，好像他们在听，但是没有一个人移动或者回答。胡滕太太在找寻中急得越来越像发疯似的，几乎是绝望了。她开始对每一个人流露的冷淡的神情表示憎恨，没有人同情或者想帮助她。她这会儿用胳膊拉着她的丈夫一路走去。她几乎不瘸了。看到那个名声不好的小伙子丹尼，离她最近的人，她忘掉一切克制向他冲去，眼泪汪汪。"啊，丹尼先生，请问——你看到我的善良的贝贝，我的白叭喇狗贝贝了吗？啊，我们在哪儿都找不到它！"

丹尼转过头来，用充满嘲笑意味的眼光斜看了一眼，又把头转回去，指指海，问："那是它吗，在下面那儿？"

胡滕太太往下看，看到那艘救生艇正在被吊上来，贝贝伸开四腿直挺挺地躺在船底。她尖叫一声往后倒去，撞在她丈夫的胸膛上，撞得那么重，他差一点没摔倒，然后，他在抓住她的腰的时候，她又向前倒；他可以感到她的身子前扑后倒得那么厉害，她本来会脸向下地倒在地上的。

水手们把那个男人的软得像海藻的身子抬上轮船。他的赤着的双脚垂着，脚趾头弯曲着，那条寒碜的黑羊毛围巾仍然系在他的脖子上。他们小心地把他抬回到下面统舱甲板上的时候，海水一道道从他的衣服上直淌下来。两个水手把贝贝举到胡滕太太伸开着两条胳膊里。在它的没有生气的身子的压力下，她没有接住，它掉在甲板上。她跪在它身旁，出声痛哭，像母亲在她的独生子的坟墓旁。

"真是难看死了，"戴维对恰巧在附近的威廉·弗赖塔格说。鲍姆格特纳听到了，忍不住表示不同意见。

"悲伤终归是悲伤，痛苦终归是痛苦，斯科特先生，不管是什么原因嘛，"他说。他的嘴苍白、下垂。

"哎，胡说八道的日耳曼人，"弗赖塔格说，非常厌恶地走开去；他不愉快记起，不免吃了一惊，这是他妻子用的词儿，而且是他一直讨厌她用的词儿。胡滕教授先生羞惭得汗流浃背，最后把他的妻子扶起来，一个水手走上前来帮他抱贝贝；这一小群悲伤的人不见了。这时候，吕茨先生想起向一个年轻的船员建议，也许该请舒曼医生来看看那个几乎淹死的男人。"他们已经对他采取了急救措施，"那个船员说，责怪他的爱管闲事。不过他确实派人去请舒曼医生了，如他本来就打算这么做的，即使没有乘客提出建议，这一点是肯定的。

舒曼医生慢腾腾地从过道上向主甲板走去，没法从声音断定出了什么叫人恐慌的事情或者紧急情况，在第一个拐弯的地方遇见了女伯爵，她像个幽灵似的在散步，穿着黑睡袍，披着一件陈旧的猴子皮镶边的长锦缎披肩。

"哎，你来了，"她用迷迷糊糊的孩子似的声音说，伸出手指

尖去摸他的脸，好像她不指望摸到他有结实的肌肉似的。“那奇怪的闹声是怎么回事？船在沉吗？”

“我想没有，”他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这儿走走，跟你一样，”她回答。“我的女服务员跑掉了。为什么不走呢？那个男服务员告诉她出了什么事儿？”

“也许你跟我一起去的好，”舒曼医生一边说一边挽住她的胳膊。

“这是我最喜欢不过的了，”她低声说。他看到他一直在给她的药开始失去效用了；现在这时候她本来应该是没有知觉的——船只失事也不能使她醒过来。他想到她被那个胆小的女服务员抛弃在那儿，可不是——可不是吗，是被他抛弃，他先使她落到没人帮助的境地，然后随她去听天由命，想到这些，他心中涌起一股危险的怒火。在这个可能产生危险的时刻，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她。“愿上帝帮助我，”他说，几乎被他发现的他天性中的邪恶吓坏了。

“我们走得快点，”他跟她说，“船似乎在打转。一定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

“你怎么能知道船是不是在打转？”女伯爵问，而他在想，船在移动，仿佛它已经沉在水底了。她把身子靠过去，直到她的脸颊贴在他的肩膀上，用颤悠悠的、唱歌似的声音说：“想想看，要是船沉了的话，我们就拥抱着一起沉下去，慢慢地，慢慢地直沉到海底，平静、黑暗的爱在阴凉、寂静的海水中……”

舒曼医生的头发在头顶上摇晃，呈现着波纹。他怒火中烧，恨不得把她从身旁打开；简直像恶魔附在他身上，这个花痴女人像蝙蝠似的缠着他，这个邪恶的精怪从她的地狱里出来虚伪地谴责他，引诱得他神魂颠倒，要他对她承担欺诈性的义务，使她

成为他的生活负担，直到他去世为止，使他陷入绝望。

“嘘，”他说，在这个温和的词儿中放进发号施令的压力，控制住她的没有一定方向的注意力，甚至在她的声音中点燃了一星细小的生活的火花：“哎，可不是，我的确说话太多，你一直这么说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舒曼医生没精打采地说。

“啊，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说出口过，”她说，又一次陷入半胡涂状态中。在楼梯上，她精神好了一点儿，说：“那不是我的女服务员回来了吗？”她回来了，后面跟着那个男服务员。“下面请你去，先生，”他说。“有个男人掉下海去，淹了个半死。”

舒曼医生对那个女服务员说：“把这位女士送到房舱里去，没有我的吩咐，别再离开她。”他回到自己的房舱里去取他的黑医疗包，一边在想那个女服务员领受他的责备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那种交织着掩掩藏藏的傲慢和虚情假意的谦恭的神态，一副太熟悉的心怀怨恨的奴才相。他不自在地想着，她是不能信任的，女伯爵倒知道得很清楚该怎样对付她那种人，但是现在她身体不好控制不了她。他感到千千万万越来越多的智力低下的人的压迫，那些没有头脑的、只配进坟墓的人甚至做个好佣人也不能胜任，然而，他们人数多、力量大，凭着产生反面作用的邪恶，威胁着要统治世界，这时候，他越来越激动了。汗从他的额头上冒出来，他把一颗白色的小药丸放到舌头低下，拿起医疗包，以他所胆敢的最快速度迈步走去，希望能救活统舱里的一个蠢得掉进海去的、不知姓名、不知面貌的蠢货。“耶稣、马利亚和约瑟[1]！”他祈祷着，撵走一大堆叫人心烦的念头，而且在到了甲

① 马利亚是耶稣之母；约瑟是耶稣之养父。

板上的时候，大模大样地在胸前画十字，并不在乎谁看见。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看见了，响应地也在自己的胸前画十字，对吕茨一家人冲动地说：“哎，这个亲爱的好人，赶去干善事还祷告哩！”

“干善事？”吕茨先生问；他认为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摆出的气派超过她在生活中的地位——她的地位跟他的一样低！“怎么能算是善事？他只不过是去尽他拿工资的本分罢了！”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带着感兴趣的好奇神情眼睛亮晶晶地盯着他看了一眼，好像他是一种奇怪的虫子，然后默不作声地走开去。

加尔萨神父原来跪在那个臭气熏人的房舱里那个落水的人躺着的床铺附近，他被蜷缩在地板上的那些哭哭啼啼的女人和脸色阴沉的男人包围着。舒曼医生站在门洞子里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转过头去。天花板上，嵌着一个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射下黯淡的光线，一张可折叠的小桌上，孤零零地点着一支蜡烛，是那个教士带来举行天主教仪式的。他吹灭了蜡烛，收拢圣物，摇摇头。

“我怕太迟了，”他说，神情相当愉快地微笑着，“药物也没有用了。”

“不过，”舒曼医生说，“还有些事情要做，”接着他拿着听诊器走上前去，坐在那张脏得要命的铺位边上，那个死人，上半身赤裸着；被含盐的海水洗涮和涤净过，十分平静地躺在那上面，现出端庄和尊严的死相。

舒曼医生在长期的经历中，是一个不得已的死亡见证人，亲眼目睹了一切死人的模样，从来没有丧失过对鬼魂的敬畏和温情。他现在又感到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幽灵在他们的上空盘

旋。他凭一切征象和他的一切感觉，知道那个男人死了，然而他继续用他的听诊器按在他长长的身子的瘦骨嶙嶙的胸腔和洼下去的饿瘪了的肚子上，专心地寻找生命的搏动和信息。这人有着巨大的肩关节、枯骨似的胳膊和变形的大手，这双手现在向内弯曲，像孩子的手。什么声息也听不到。他站起身来，向那张神情忧伤而疲劳的黑黪黪的脸看了一眼，它现在浮现着一丝无声的微笑。女人们，一起蜷缩在死人的脚的附近，开始出声祈祷，她们的念珠发出哒哒的声音。一个男人走上前去，把死者柔软的手交叉放在胸膛上，并轻轻地把他全身覆盖起来。

"你能想象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加尔萨神父和舒曼医生慢腾腾地走回去在甲板上一起拐弯的时候，他用蹩脚透顶的德语向医生说，"夜晚，在海洋上，一个人从一艘在开的船上跳下去，淹死了，这是件绝对应该受指责的不顾后果的行为，当然不是自杀，而是应受责备的对自己的生命的不尊重，这么轻率地抛弃这生命就不属于他了——想想看，我亲爱的医生？去救一只狗的生命？"

舒曼医生在考虑他自己的鲁莽的行为，跳去从里克和拉克的手中救下船上的那只猫，拿不准教士对那件事儿会有什么想法。他觉得他不必想任何事情，那个人的冲动几乎完全出自天性，没有一点儿做作的成分。"我看到过他在下面用他的小折刀雕小小的动物像，"舒曼医生停顿了一下，说。"他是个巴斯克人，"他找补了一句，好像那可能说明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似的。

"一个不讲道理、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族，"加尔萨神父说，"他们的语言离奇古怪、没法听懂，他们信的是带有异端色彩的天主教组织……有什么可指望的呢？他叫埃切加拉伊，"他发音正确地说，带着感官的愉快响亮地念着那个名字。

“我一定记住,”舒曼医生说,“谢谢你。对不起,我有个出诊。”他转过身去,然后走回一步,“啊,神父,你以为是谁把那条狗扔进海去的?”

“歌舞班子里那两个魔鬼附身的孩子,当然喽,”加尔萨神父回答。“还有谁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看到他们,”舒曼医生高兴地说,“或者他们真的是变成任何模样的魔鬼,或者能隐去他们的身子,干那些邪恶的勾当?”

“结结实实地揍一顿,三天只有面包和水填肚子,这样的惩罚就会把他们的魔鬼撵走,”加尔萨神父说,“他们只是相当愚蠢的小罪人。我不想管他们叫魔鬼使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只需要接连狠狠地揍几回,加上饿肚子就行了。”

“我希望事情也许这么简单,”舒曼医生说,他的眼睛里闪着强烈的不耐烦的亮光。看到那个神父皱起眉头向前瞟了一眼,而且他的嘴继续没完没了地唠叨着这个话题,舒曼医生急忙说了声“明儿见”,就拐弯了。

他发现胡滕两口子跪在他们的房舱里地板上,弯着身子,看贝贝的趴着的身子,像一尊圣母怜子雕像[①]。贝贝时不时地抬起头,打呃逆,呕出海水。他们抬起头对着它,现出跟那些围在死人身旁的男女同样的心头压着沉重负担的、悲伤的神情。胡滕太太不顾她信奉的有关家庭事务的处理要稳重的全部原则,首先说:“啊,医生,我知道问你是不对的,可是,啊,我能为我们的贝贝干些什么呢? 它在活受罪哩!”

---

① 圣母马利亚悲伤地抱着耶稣的遗体的形象。

舒曼医生干巴巴地说："我家里也养着几条狗。"他把一只手伸在贝贝的脑袋底下，把它抬起来，轻轻地放下，"不断使劲按摩它，让它肚皮贴地趴着。它会好起来的。可是那个男人，"他加上一句，"那个跳进海去救它的男人死了。"

胡滕太太往后坐在她的脚后跟上，干脆掩着她的两只耳朵。"啊，不，不！"她嚷着说，在震惊下口气中带着愤怒，接着记起来了，又去把她握紧的拳头伸进贝贝的下肋骨和脊背，来回推动，使它发出低低的哼声和吐出一股有泡沫的水。

"让我们听听医生先生要告诉我们的话，"胡滕教授先生完全按照正规的礼仪说。他带着只是装出的挣扎站起身来，面对医生，摆出男人对男人的架势，让他的妻子做比较低微的事儿，照顾他们那头可怜巴巴的畜生；教授没法回避，清楚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麻烦的负担。

"你是希望我知道，先生，"他问，"一个人跳进海去救了我们的狗吗？"

"我原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医生说，"一艘救生艇采取了拯救措施，"他说，"还有甲板上所有的船员。没有人告诉你吗？"

"当时我忙着照顾我的妻子，她差一点没晕过去，"胡滕教授先生几乎悔恨地说，"可不是，我听说过，可是我不相信。谁可能是这样的傻瓜呢？"

"他可能是，"舒曼医生说。"他是个巴斯克人，名叫埃切加拉伊。他是那个用木头雕那些小动物的人……"

"哎，"胡滕教授先生说，"原来是他！可不是，现在我记起来了——他是那些危险的鼓动者中的一个——船长下令解除了那些人的武装……"

"他们拿走了他的小折刀，可不是，"舒曼医生说，疲惫而绝

望地叹了一口气。“他没有一点危害性,可是太不幸了——”

“哎,不用说,他指望得一笔酬劳,”胡滕太太用获得启示的声音嚷叫,“我们会乐于付他一大笔钱的！真遗憾,我们没法跟他握手和谢谢他了。”

“至少,”胡滕教授先生神色庄重地跟医生商量,“至少,我们能提供微薄的经济援助给他的家人……”

“他没有家人,或者是船上没有,”医生说,看到教授的脸上闪过松一口气的神情,像闪过一道亮光似的。胡滕太太的脸上也像反射似的闪闪发亮。“得了,没法子了,”她几乎愉快地说。“现在这事儿算完了,我们没事可干了。”

“是啊,”舒曼医生表示同意。“所以我们明儿见吧。别让它着凉。”他说,一边低头看贝贝。它在显示出恢复的迹象。“给它喝点热的牛肉汤。”

胡滕太太向他丈夫伸出两条胳膊,他熟练地拉她站起身来。她偷偷地跟在医生后面溜出来,招呼他站住脚,好像有什么秘密要告诉他似的。然而,她只是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她压得很低的声音中有一种神秘和惊奇的意味,那张上了年纪的胖脸突然变得孩子气了。

“埃切加拉伊,”舒曼医生小心面清晰地说,“在巴斯克人当中,是一个很普通的姓。”

“啊,”胡滕太太说,不想重复这个名字,“想想看,他为我们的贝贝断送了性命,而我们甚至不能让他知道我们的感激！我真是受不了,”她说,一副眼泪汪汪的模样。

“明天早晨举行葬礼,在第一次望弥撒的时候,”舒曼医生说,“要是你希望参加的话。”

胡滕太太打了个冷战,摇摇头。“啊,我怎么可能呢?可是,

我谢谢你，”她急忙说，转过身子走了，咬着嘴唇，眨巴着眼睛。

“医生说他姓什么？”教授问，站在她刚才离开他的地方；他的注意力不是在贝贝身上，而是在房舱墙外，在船外某个地方，好像他的困惑要到那儿才被拦住，才是极限，才遇上海岸线。

“一个奇怪的姓，”她说，“几乎是滑稽的、希奇古怪的……埃切格——埃切格——”

“埃切加拉伊，”她的丈夫说，“啊，可不是，我记起了墨西哥城里有几个巴斯克人姓那个姓……我承认，我亲爱的，我深深地被那个不幸的人的动机闹胡涂了。希望酬劳——那不用说，可是这有点儿太简单了。难道他希望自己引起旁人的注意，被认为是个英雄吗？难道他——当然是不知不觉地喽——巴不得死，所以采用这个自杀的办法，用不着真的感到内疚？难道——”

“啊，我怎么知道呢？”他的妻子嚷着说，恼火得简直要抓自己的头发，但是贝贝救了她，使她没有做出这个鲁莽的动作；它又开始呕吐海水了，而且吐了好一会儿。胡滕太太和教授先生轮流用白兰地擦它的身子，用浴巾擦干，直到那个眼睛亮晶晶、气得呼哧呼哧的女服务员端来他们要的牛肉汤，汤盛在一个大碗里，有一夸特。她伸直两条胳膊，把汤交给胡滕太太，不等着看给人喝的上好的牛肉汤给糟蹋掉——想想世界上那些无辜的、挨饿的穷人和小娃娃——竟然倒进一条毫无用处的狗的喉咙！那个救这头畜生的人被海水闷死的时候，在那臭气熏人的统舱里，是谁陪在他身旁！他从那个伪善的教士只得到一小个干圣饼和一句歪曲地模仿上帝的话！女服务员感到自己处身在波涛汹涌的怒海里也闷得透不过气来；她气得关节都僵硬了，她开始像个瘸子似的一瘸一拐地在过道上走去。神圣的造物主给

了她向一个身材矮小的小男服务员当面发泄怒火的机会，他捧着一摞亚麻布制品在向什么地方跑去。

"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做人还不如做狗！一条有钱人养的狗在喝穷人的骨头熬的汤。一个人的生命跟一条狗的相比算得上什么呀，说给我听听？当然说的是有钱人的狗喽！"

那个十四岁的孩子一直过着吃不饱肚子的苦日子，面色苍白，发育不足，察觉她不是冲着他发火，马上不再害怕。"一条狗，小姐，请问，我是不是可以问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现出对那些比他身分高的人的出于礼节的低头哈腰的态度；船上的人个个比他身分高，所以他没有流露出一点儿自尊，要是有一丁点儿这样的表示的话，他们没有一个不会把他当作是十足地道的傲慢无礼。

"给那条狗喝牛肉汤！"她又喊叫起来，几乎哽住了。"那个男人却死了！为救一条狗送了命！"她尖叫，一边伸出一条长长的胳膊，猛地向身旁甩去。那个孩子吓慌了，侧着身子从她身旁走过，撒腿就跑，他的两个膝盖直打哆嗦。"我要让他们两人都淹死，还有你，"那个小服务员对他自己说，"你这发疯的老母骡。"他非常喜欢这句话在他嘴里的感觉，一路低声重复着，直到他的受伤害的感情平静为止。

尽管教授先生和胡滕太太作了种种努力，贝贝还是不断地受到剧烈的煎熬——痉挛折磨着它的身子。它最后站起来了，在他们担心地扶着的手下，神情昏沉和冷漠。胡滕太太说："它使我感到内疚，"因为它看来好像在问她一个可怕的问题，它的泪汪汪的眼睛里现出疑惑。甚至它的沉默看来也像在谴责她对它居心恶毒。

"它天性是沉默的,"她丈夫提醒她,"这不是新鲜事儿。"

"啊,不过,这不一样!"她说,吓坏了。

她忘掉了她已经深深地惹她的丈夫生气了,她失去了他的欢喜。她跟往常一样信任地向他靠过去,耷拉着脑袋,又淌眼泪了。她伸出手去握他的手,他马上作出反应。"它信任我们,"她哭了,"它是我们过去的一部分,我们一起生活的,"她说,"幸福的过去。"她坐在床边上,衣衫凌乱,愁眉苦脸,她的丈夫走过去,坐在她身旁。"墨西哥!"她喊叫,抽抽咽咽地哭着,她丈夫从来没有听到过她哭得这么伤心。"墨西哥!我们干吗要离开呢?是什么事儿打发我们来作这次糟糕透顶的航行的?我们在那儿是幸福的,我们一起在那儿是年轻的……我们干吗把一切都扔掉呢?"

多少年来第一回,眼泪滚滚地、不可遏制地从胡滕教授先生的脸上淌下来了。"忍着点,别这么悲伤,我可怜的孩子,"他说。"这使你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扭伤,而且严重地搅乱你的神经。你近来,"他提醒她,鼻涕正在从他的鼻尖上挂下来,"不像往常那样显示出你处事谨慎,有预见能力,性格温和,凡是认识你的人都一直钦佩你这些优点的……"

"宽恕我的软弱,宽恕我吧,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就是善良的化身。我敢肯定,我忘了关门,这全是我的过错,你永远是对的,"她哀求着;尽管教授先生掏出手绢,擦干他的眼泪和抹着额头,打定主意要在这场危机中态度坚决,不让他的似洪水泛滥般的感情吞没他脑中当天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和他对她的正当的怨气,然而,他没法控制或者否认在他的整个身子里有什么在融化。他脑子里的痛点平息了,他的受伤害的自尊心停止抽动了,好像某种有魔力的香油已被倒进他的灵魂中的敞露着的创口。

仁慈、慷慨、基督教的博爱、宠爱妻子的热情,甚至对人的温情也雄赳赳地走进他的身躯,重新一一占领他心中恰当的地位,真是次序井然,丝毫不乱,一个名字也没有叫错。教授已经多年没有感受这么丰富的感情了;从他贮存美德的心的深处散发出一阵狂喜;他的妻子用简单的话又一次认同并激起了他这种美德。

他着着实实地吻在她的嘴上,好像她是新娘,几乎把他的舌头伸进她的喉咙,按照老方式抓住她的脑袋,拉她的头发,他在要求迫切的时候总是那么干,拉得她好不疼痛。他们开始笨手笨脚地把那些比较碍事的衣服扯掉,好像他们要互相把对方扯开似的。他们拥作一团,摔倒下去,像两只青蛙那样扭在一起。他们纵情使劲延长于那事儿的时间,在一场不顾死活的角力比赛中扭动,呻吟,咕哝和打滚;完事以后,他们垮了,躺在一起,浑身酥软,毫无力气,发出长长的痛苦而欢乐的呻吟,接着紧挨着,筋疲力尽,浑身热乎乎,满心喜欢,舒适地躺了一会儿。他们的婚姻关系修补得跟新婚一样好,他们的感情是崭新和受到净化的。

“我的小妻子,”教授低声说,就像结婚那个夜晚心花怒放地费劲破了她身子后那样称呼她。“我的丈夫,”当时,她回答得得体极了;直到现在,她还偶尔说这个词儿,作为一种礼节。

贝贝从它在角落里的毯子上,从它的受到折磨的睡眠中,发出一声长长的、带着哭音、充满恐怖的嚎叫,叫人毛骨悚然,吓了他们一大跳,使他们从懒洋洋的情意缠绵中摆脱出来。胡滕太太几乎是出于习惯又哭了。“啊,它知道,它知道他们下手要淹死它,”她嚷着谴责地说,“它的心碎了。”

教授的神经系统,因为他异乎寻常地使劲,稍微有一点儿损伤,现在毛病发作了。他又呻吟了,这一回是真的痛苦。“我不

许你为这件事儿再掉一滴眼泪，"他声音洪亮地说，他的一切男性的权威恢复了，而且在发挥作用了。"再说，你说的'他们'是什么意思？小心点，别随口乱说，我亲爱的。"他亲切地稍微摇了摇她。她乐于假装害怕他发火，因为这万无一失地使他高兴，哪怕是在他真的发火的时候，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是假装出来的。她不由得想起，在她的一辈子中，她只有一回害怕他，那是在几个钟头以前，她相信她不可饶恕地得罪了他，她压根儿没有力量控制他，对他没有魅力，没有手段可耍。多么奇怪，多么可怕——千万不能再发生这种事儿了。"请让我去看看它，"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上擦干眼泪。"我是指那两个坏得没法说的孩子，"她用小心而有节制的语气跟他说。"当然喽，只有他们才干得出这种事儿吧？"

"我同意，"她丈夫说，"可是我们还是千万别这么说，因为我们没法证明。再说，在法律上，淹死一条狗，也许是没罪的吧？"

"哎，可是他们造成一个人死亡！"

"怎么造成的？"教授问。"他是被迫才这么鲁莽地干的吗？任何人，甚至那两个孩子想到了吗？"

胡滕太太不再说话，慢腾腾地跪下去；她的膝盖又痛了；她双手捧住贝贝的脸，说："不是我们，不是你的小爸爸和妈妈，记得吗？对你这么干的。我们爱你，"她热切地告诉它，爱抚它的耳朵和下巴。"它完全听得懂，"她跟她的丈夫说。"去睡吧，我的宝贝儿，"她一边说，一边把它的脑袋放在毯子上。

"哎，我也可以睡了，"教授说，帮她站起来。他们脱掉身上剩下的衣服，换上睡衣，好像他们已经睡着了似的，而船在他们身子底下移动，以前是那么讨厌，这会儿像摇篮的摇晃。教授在似睡非睡中低声说："医生说那个人叫什么来着？真奇怪，现在

我记不起了。”

“啊，这有什么用呢?”胡滕太太困乏地、轻轻地说。“我们别费劲去记了。”

埃尔莎直挺挺地躺着，两条胳膊垫在头底下，睡眼蒙眬地盯着看明亮的蓝色天空，天空看来好像近在舷窗外面。“这么早就起身了?”她并不好奇地问，看到珍妮忙着梳洗和穿衣服。“啊，我不行，我太懒了。”

“今天早晨他们要给那个淹死的可怜人下葬，”珍妮说，“你想想他吧，独自个儿给留在这儿。”

“嗨，他不知道，”埃尔莎相当明事理地说。“他怎么可能在乎呢? 我父亲说，昨晚他干的是件很愚蠢的事儿。他说，是他那样没有脑子的蠢人才会给别人惹出一切乱子来。他说——”

“他的意思是指救别的蠢人的蠢狗吗? 那样的事儿吗?”珍妮用冷冰冰的声音说。埃尔莎坐起身来，她的面貌有一点儿皱眉蹙额的痛苦神情。“我父亲并不是那个意思，”她担心地说。“他是个天性善良的人，他从来不会去伤害任何人。他并没有不为那个可怜人表示遗憾的意思。这是件很难说得清楚的事情——”

珍妮冷冷地做完头发，一声不吭，让埃尔莎艰难地处理这个局面。

“有时候，他只是太实际了，几乎像我妈。他说，生活就是要活下去，而死人什么也不需要，我们绝不可让我们的感情在没有一点儿好处的时候白白浪费掉! 我的母亲说——”

珍妮忍不住哈哈大笑。“啊，埃尔莎，你放学的时候高兴吗?”

埃尔莎不信任地盯着她看，她近来越来越多地这么看她了。她的同房舱的乘客看来好像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但是她没法确切地说她是怎么一个人——她有一点儿怪。“我不念书了，”她说。

珍妮用一条深色绸围巾裹住头。“没关系，”她说。“他上路的时候，我要到下面去，跟他告别，不管他是不是听得见。”

从水面上反射出来的清晨的阳光跳跃着，在加尔萨神父的眼睛里闪闪烁烁；他站在统舱甲板上的栏杆旁，他的圣坛附近，但是他的眼花缭乱的眼光向上看，盯着上面甲板上那一溜儿爱打听稀罕事的人——兀鹫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不肯飞远。加尔萨神父对他自己的和别人的人性有长期的感受，已经学会怀疑任何无偿的同情或者怜悯的形式的纯洁性。他胆敢放肆地认为，那儿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心中有基督徒的思想，也没有一个在祈祷。在他面前，那具尸体已经准备好，在规定的时刻将被推进海中。尸体裹在深色的帆布中，狭长、僵硬，呈木乃伊形状，由几个头发乱蓬蓬的水手端着，向外平放在栏杆上，水手们的呈现在白布服装上面的红润的脸上现出为了参加仪式而显出的庄严的神情。统舱乘客们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黑压压的一片，尊敬地站在后面，挤在一起，像一群嗡嗡叫的蜜蜂那样哼着，转动着念珠，身子摇来晃去，激动地不断在自己的胸前画十字，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嘴唇在动。只有那个胖子穿着一件色彩明亮的橙黄色的衬衫，稍微站开，跟一小拨跟随者在一起，他们个个铁板着脸，一看就知道是准备闹乱子的。那个胖子时不时地打一个响亮的嗝儿，伸开着手指头画着十字，而大拇指则停在他的鼻尖上。他知道得非常清楚，有不少在做祷告的男人也在密切地

注视着他，他们的眼睛里杀气腾腾；这似乎激发他一再干这富于独创性的亵渎神明的行为。

加尔萨神父尽管专心地在主持下葬仪式，口中念念有词，好像那是他每日的祷告似的，却看到那一切，就像他看到周围的每一件事情那样。“来帮助他吧，你们这些上帝的圣徒们，迎接他，你们这些主的天使们，接受他的灵魂，献给上帝看……给他永久休息吧，啊，主啊，让永恒的光辉照在他身上。接受他的灵魂，献给上帝看……啊，主啊，我们求你，对你的仆人胡安·玛丽·埃切加拉伊的灵魂行行好吧，为了他，我们向你献上赞美的献祭，凭着这些和平的供奉谦卑地求告你上帝，他的灵魂可能被发现值得赢得永久的休息。通过我们的主。”

波浪有节奏的拍打声、挤在一起的人们的持续不断的说话的嗡嗡声、群众的始终不会停止的神经质的动作、那个胖子的下流行为，对那些站在死人旁边的、受过训练的人毫无影响，他们默不作声，一动不动。该念的祈祷词都念过了，该举行的仪式都举行过了，该表示尊敬的动作都表示过了，什么圣水啊、铃啊、《圣经》和蜡烛啊、香和画十字的手势啊，都出现过了；那具容纳过一个人的灵魂的、裹得密匝匝、沉甸甸的尸体被推出去了，慢腾腾地向下倾斜着；当它向前滑的时候，被给了一个决定性的冲刺，使它脱离舷边，径直掉下去，脚先着水，慢悠悠地沉下去，这时候，船在从他身旁移开。“愿上帝接受他的灵魂，”施米特太太低声说；那几个年轻的古巴人和舒曼医生，还有奥尔特加夫人，那个墨西哥外交官的妻子，都暗自说着同样的话，甚至里特斯多尔夫太太也在她自己的胸前画十字；他们仍然看得见那具尸体，在水底下相当深的地方，在长长的、斜斜的阳光中。等它看不见的时候，船开得快了；加尔萨神父还没有走到上层甲板上，那个

死人已经给留在后面了。

那些虔诚的宗教信徒只是在把念珠放进衣兜时稍有停顿，就愤怒地向那些渎神的人扑去。他们一大堆人向胖子和他的朋友们——尽管这些人无关紧要——拳打脚踢，在水手们终于把他们拉开以前，他们已经用空手着实光荣地惩治了那伙宗教和礼仪的敌人。只有一个人用一把小小的螺丝扳头——始终没有人弄明白他是在哪儿或者怎样弄到的——在那胖子的头顶上稍微靠前一点儿的部位给了他瞄得很准的一击，结束了他的积极活动，至少在这次航行中他没法活动了。

珍妮马上找到了戴维，他正用胳膊肘支撑着向前探出身子，衣领翻在两耳旁，两只手掌拱着放在两只眼睛上方，设法把下面的场面看得更清楚。他的眼睛近视得很厉害，但是他始终不愿戴眼镜，除非独自个儿工作的时候。然而，在他们两人之间这一点却是一个愉快的共识：眼睛近视适合于他，而且还是一个特别的优点。他们走在树林里的时候，他总是发现细小的奇花，或者极小的草，结果弄清楚原来是植物中的珍品；在沙滩上，他发现只有在放大镜下才显出美的贝壳；在印第安人的市场上，他径直走到那些只有很小的孩子的手指头才做得出的极小的玩具前。他就在最近还带着得到了好东西的得意的神情给她看了几回他最近得到的宝贝——他从那个人们正在统舱甲板上为他举行葬礼的人那儿买来的满满一袋一英寸长的木雕动物。她默不作声地站在他身旁，直到他察觉她。他说：“嗨，珍妮天使！”但是，显而易见，此刻他对外界是封闭的，他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感情中，要是她碰碰他，或者说一句话的话，他会变成石头的。她马上后退，试图把她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开，她的上腹部产生了那种

熟悉的像挨饿的空洞洞的感觉，心中沮丧，还觉得充满着那种非常盲目、非常无意义的痛苦，她为这种痛苦瞧不起自己，那就是他随时会要心不在焉的可怕的花招来使她感受到的痛苦。她心烦意乱，撞上了丹尼的目光，他手里拿着一杯啤酒急匆匆向他们走来。阿尔内·汉森跟在后面，紧紧地皱着眉头，不向任何人瞟一眼，就像珍妮经常想的那样，这会儿她又想到，他的神情看起来好像一个独自个儿待在荒岛上的人可能会有的神情。

里克和拉克比往常更撒野和邋遢，爬到栏杆上，叉开腿坐在上面，好像他们跨坐在一根树枝上，危险地探出身去，好把事情看得清楚一些，他们的嘴张开着，眼光锐利而像发了狂似的。没有人注意他们，甚至一个走过的水手也没有费心去吩咐他们下来。那群在看的人，不管是成双作对的，还是一个人，都严格地站开着，没有对任何在场的别人打招呼，每一个人有一个他自己的好位置，然而他们个个盯着一个地点看，好像他们是正在一起照相的人。

珍妮站着，双手紧握，举得跟她的胸脯一样高，也瞪着眼看下面在举行葬礼的人群，注意到那些缩短了的人影儿的布局和从他们身上斜投出去的泛蓝色的长影子，记在她的脑子里，等她一回去把铅笔和纸拿来就速写。她想不通，她为什么不随身带着纸笔，也想不通她为什么缺乏感情。景象很不真实，是一场依靠提线来表演的傀儡剧，在那个深色的帆布卷里，没有什么有生气的东西；就在她想不通她自己的冷漠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眼眶里充满完全没有意义的眼泪，不为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甚至不能缓和她的空虚的痛苦的眼泪；通过一片迷雾，她看到那个帆布卷向外跳去，碰击水面。

她是那么专心地试图看着它一路落进深海，几乎错过了那

场扭打的骚乱，它发生得很快，结束得也很快。当时，丹尼在她身旁相当近的地方喊叫："好啊，妙极了！他们打中了他！好啊，妙极了！"她看到几个水手把那个胖子拉到空地上，而另外一些使劲打乱进攻者的阵形，使他们后退，不再骚扰。他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火气平息了，心满意足了，作好充分的准备，承担一切后果。阿尔内·汉森举起两个拳头，暴跳如雷地摇晃，喊叫："孱头！蠢货！奴隶！杀死你们的敌人，不要杀你们的朋友！蠢货！蠢货！"他浑身痉挛地喊叫，好像他没法停止似的，最后，那群走近他的人开始交换不安的眼色。下面甲板上，几个进攻的人向上看了一眼，他们的脸色都像腌胡桃那样饱经风霜，他们中间有一个带着藐视的神情叫着回答："闭上你的大嘴，你这瑞典蠢货。别管我们的事儿！"他们大伙儿爆发出叫人恼火的讥笑声。汉森迈着笨重的大步走开，耸起两个肩膀，夹着他的脑袋。

那个胖子直挺挺地仰面朝天躺着，鲜血在缓慢地从一个叫人震惊的、在阳光下张开着的、闪着反光的伤口里淌出来。舒曼医生不等人来叫几乎马上出现在下面的甲板上，跟加尔萨神父说话；神父带着他特有干脆利索、独来独往的神态正要离去，但是停住脚说："没有什么严重的事儿，医生——你不会需要我的！"发出一阵笑声，有点像是嘲笑。

戴维相当突然地从那阵自我专注中摆脱出来，虽然他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他的眼睛里却有好奇、高兴、兴奋的激情。"好啊，"他说，"他们干成啦！我一直在想，他们可能会办成的。""这正是丹尼说过的，"珍妮突然愤怒地冒出这句话。他密切地盯着她看，看到她脸上的眼泪还没有干，挖苦地说："我的上帝，难道没有事情你不想要参予的吗？你现在到底干吗要哭呢？"

"样样事情，"珍妮说，她的声音在颤抖。"整个世界上的样样事情。那种使你遭受损失，在某个地方……"她看到他眼中开始微微闪着欢乐的亮光，这能使他让她产生一种会把任何事情和样样事情一古脑儿吐露出来而事后又会为此感到遗憾的情绪。但是，不管她多么遗憾，她知道她不会被宽恕的。这只是又多了一件事儿罢了。珍妮转过来盯着他看，好像她跟他一样是近视眼，用很快的低声尖锐地说，"不，戴维，不，你别——别再——这一回不行！"相当缓慢地——所以他可能看清楚了——她完全控制住自己了，接着向后转过身去，开始从他身旁走去，恶狠狠地说："你别跟我——别跟我说话！"

"别担心，"戴维说，他的整张脸冷冰冰、阴沉沉，"我不会的！"

里克和拉克仍然叉开着腿坐在栏杆上？开始尖声叫着一个词儿，叫个没完，还发疯似的向辽阔的大海摇晃着脑袋和胳膊。

"鲸鱼，鲸鱼，鲸鱼，鲸鱼！"他们高兴得像着了魔似的尖叫，而且的确是这样，当时正有一些鲸鱼在游过，这时候，凡是在场的人都免不了会不情愿地瞟了一眼，人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念头：这是没有意义的、不合适的；然而，瞟了第一眼以后，他们都兴致勃勃地盯着看了；在不太远的地方，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三条庞大的鲸鱼看来几乎浮出了水面，在阳光下闪现着银白色，喷出一道道长长的水柱，像快艇那样迅速和声势惊人，一路向南游去——没有一个人能把他的眼光从这美丽的景观上移开，直到鲸鱼游得看不见为止；他们的脑子里，关于死亡和暴力的念头一扫而空。"鲸鱼！"里克和拉克尖叫，从他们跨坐着的地方站起身来，身子没有站稳，差一点儿没掉进海去。他们摇摇欲坠，努力保持平衡，叫人看了头晕，然后恢复正常，回到甲板上，没有受

伤。没有一个人伸出手去帮助他们,尽管附近有十几个人。没有人挪动身子。他们对待里克和拉克的危险,说神态冷漠还不够确切,也许他们的态度还要更积极一些,仿佛这两个小孩的掉进海去会被他们完全冷静地当作自然规律的一次无法解释但是并不造成什么惨祸的恶作剧来接受。他们没有一个不会对于两人掉进海去跟其他所有人意见一致,持深切的赞同态度,越深切越好,认为掉进海去是里克和拉克的一个最合适的位置。他们中的任何人,要是被指责对未成年人缺乏比较高尚和恰当的感情,会大发脾气;但是,里克和拉克算不上人。他们是无可否认地在人这个范围之外,这一点他们自己也知道了好一阵子了,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他们的地位,而且他们完全能坚持下去。所以,他们稳住了身子,像猴子那样牢固而灵巧地留在那儿,大喊尖叫,兴奋不已,欣赏那个被他们害死的人的葬礼——那个坐轮椅的疯老头子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这话让他们好不高兴——欣赏他们在甲板上的打闹,欣赏他们的鲸鱼。这是个美好的日子。唯一欠缺的是,他们没能骑在鲸鱼背上。

在甲板上走了约摸一半,珍妮站住脚看鲸鱼,忘掉了悲伤。戴维径直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胳膊,说:“我们对这种情况还嫌不够吗?我们去喝些咖啡吧。”“行,去吧,”她说。他们在走的时候,她开始说:“戴维宝贝儿,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天气美好的日子,一直远远地游到科珀斯克里斯蒂湾[①]里,我游回陆地的时候,一大群海豚径直向我游来,啊,它们在波浪中一起一落,看来好像一座座山,我想,我可能会给吓死了,可是它们偏偏在

① 科珀斯克里斯蒂湾(Bay of Corpus Christi):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同名城市海滨。

我两旁分开，继续游去，风扫云滚似的直奔墨西哥湾。我突然感到很快活，认为：'哦，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叫人高兴的事情！'"

"是吗？"他问，神情很是温柔，有一点儿逗。

"差不离，"她说。

"没有刀，感谢上帝，由于我们的船长态度坚决，有预见，"几个钟头以后鲍姆格特纳先生在酒吧间里这么说。

"他们用不着刀子，"事务长说，他对种种事情都觉得满意，使他说话随便。并非他关心天主教徒们遇到的事儿，他们举行可笑的仪式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该是有人当场阻止那个布尔什维克分子的行为的时候了，要是天主教徒们干了这事儿的话，得，也是一件功劳嘛。"他们居然干了一件好事儿，"他说，望着他那杯在早晨喝的啤酒眉开眼笑。"那个布尔什维克分子——那些天主教徒！让他们都互相残杀吧——好事一桩！"

卡里洛神父通常是个爱好和平不喜欢争吵的人，在高高兴兴地主持了早晨的弥撒以后，把那件难对付的活儿留给乐意干这种活儿的加尔萨神父，正坐在离酒吧柜不远的一张小桌旁，手里拿着一杯雪利酒，他听到了事务长那句简短的蠢话。"他是个很平常的那种低级的西班牙工联主义者，"他说，"压根儿不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你信口胡说，滥用名词，"他平心静气地说，"许多人都犯这样的错误。"他几乎失去了沉着的外表，火得脸上发光。"再说，你要是希望别人尊重你的宗教的话，不管是什么教，谈到别人的信仰的时候，还是有礼貌一点儿的好。"他突然站起身来，撇下没有喝过的雪利酒，走掉了。

那个事务长对他自己的违反纪律吓得惊慌不堪，急忙从高凳上滑下来，笔直地立正。"我请你原谅，神父先生，我请你原

谅,"他在教士的僵直的身影后面嚷着说。"神父先生,我深深地表示遗憾!"但是,那位有父亲衔头的教士[1] 拒绝原谅那个路德宗信徒的挖苦,继续走着,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事务长仍然站着,他的脸和脖子变得异乎寻常地红肿;他把啤酒怀里的酒灌进喉咙,就像灌进下水道。

"让他见鬼去吧,"丹尼赞同地说。那个事务长对丹尼的评价甚至比对天主教的更低,大模大样地不睬他:对他粗鲁无礼是完全太平的。他的重要的职务之一,当然喽,是不存偏私地有礼貌地对待乘客,一视同仁,不管他们中有任何人在他个人看来是多么讨厌。这是一件牺牲性的日常工作,因为在三十年来继续不断的航行中,他对抗和征服了他心中的最强烈的发自本性的想把至少二十个人的脑袋砸烂的冲动,他们都是乘客,而且几乎都是男人。他对女性是彻头彻尾地瞧不起的,还混合着一点儿健康的恐惧,完全没法探测她们的心机,或者应付她们的异想天开的怪念头,他装出有宽容的好性子这个虚假的外貌,欺骗或者至少安抚了大多数女人;她们,她们所有的人,只要奉承就行,他在好久以前就为他自己找到这个办法了,这个办法使事情大大地变得简单。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猪那样恶毒的眼光狠狠地瞪了丹尼一眼,也不等着要第二杯啤酒——他甚至在第一杯喝到一半的时候,就盼望这第二杯了——费劲地挪动笨重的身躯,肚子晃晃悠悠,屁股来回摇摆,颈窝里的层层叠叠的肥肉抖抖索索。

丹尼用压低了的声音哼了一声。"德国佬[2]!"他对着空啤

① 在英语中"神父"和"父亲"是一个词。

② 原文是 Krout,意为酸菜,是美国人对德国人和美国的德国移民的贬称,因为德国人爱吃酸菜。

酒杯说。他向那个酒吧间服务员摇摇他的啤酒杯。“喂!”

阿尔内·汉森坐在隔开三个高凳的位子上,弯着身子,双手捂着脸,他的啤酒没喝过。这会儿,他向丹尼转过脸来,带着满脸绝望的神情,用湿润的低声的吼叫说话,像一头生病的熊。“我要是信仰一个上帝的话,就会诅咒他,”他说。“我会在他的脸上吐口水。我会把他送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啊,宗教是多么肮脏!那些住在下面统舱里的人,他们低头哈腰,迎合奉承,把钱给教士们,活得像癞皮狗,人人能踢上他们一脚,可他们得到什么呢?一串摸弄的念珠和一口鱼面包[①]!……”他拉自己头顶上的头发,扭绞着。丹尼断定,这话是针对他的,他不但尴尬,而且震惊。“哎,别生气,”他说,因为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你爱怎么诅咒和辱骂一切都行,只要你不是当真的就没关系。拿宗教开玩笑也没关系,样样东西都有可笑的一面,一个人总得对世上的许多东西一笑置之,要不他会发疯的,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不相信某种东西。他受到的教养对天上那个长着长胡子的老人[②] 怕得要命,那是个动不动就发火的人,到头来他几乎把所有的人都送进地狱。不用说,有一个天堂,但是丹尼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去了那儿,或者至少是没有在他年轻的时候上那儿去了,也没有一个是从他的社区里去的。他的一个表哥,个子和年纪都比他大一倍,是个恃强欺弱者,有一天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手掌凑在一根点燃了的火柴上。在丹尼双脚乱跳,高声尖叫,舔灼伤的地方的时候,那表兄说:“这个,我就是要让你明白,只要你一死,下了地狱,你就会浑身尝到这个滋味,尝个没完!”丹尼嚷

---

① 天主教徒每逢礼拜五只吃鱼,不吃牛、羊、猪和家禽的肉。
② 指上帝。

叫着回嘴:"你才要下地狱哩!"但是这件事并没有给他多大好处。当他记起那件关于地狱的事情使他担心了有多么久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蠢货。不过他已经摆脱了这个烦恼,这挺好;宗教几乎是最不使他感到麻烦的事情了,但是,真奇怪,他还是忍受不了无神论者。这个家伙听起来像个无神论者,要是说丹尼听到过一个无神论者说话的话。他也不是在说笑话。

"别生气,"他说,"你反对宗教能得到什么呢?——我说的是,唔,宗教?我不是指念珠、鱼面包和那一套装模作样的把戏,我是指——唔,我只是弄不懂,就是这么回事。"

"对,你不懂,"汉森呻吟着说。"你知道今天早晨那个可怜人的葬礼上发生的事儿了吗?他为一条没有用的狗,那些肥胖的中产阶级的娇生惯养的宠物,他们——"

"我差一点儿错过,"丹尼说,"我正好赶来看到那场扭打。嗨,活见鬼,怎么啦,我当时就站在你身旁嘛!"

"那会儿我没看到你,"汉森说。

"唷,我他妈的差一点没赶上,"丹尼说,已经忘记了他争论的头绪,不管那是什么。汉森叫人困惑地、恶狠狠地盯着他的啤酒看,不再说话,看来好像忘掉了丹尼在那儿。勒温塔尔先生鬼头鬼脑地侧着身子走到酒吧柜前,一脸的苦恼,向丹尼点点头;丹尼是他感到还保持着可以说说话的关系的几个乘客中的一个。他龇牙咧嘴地笑笑,把一只平摊着的手按在肚皮上。"这事仍然叫我恶心,"他说,"想想看,被缝在一个布袋里,扔到海里去,像一条狗!真叫我恶心……"

"得了,我想不出他们能有其他什么办法来处理他,"丹尼通情达理地说。

"什么,他们可以把他盛在一个箱子里,放上冰,保存着他,

直到我们踏上陆地，"勒温塔尔说，"然后把他当作人那样埋葬。"

"这是不实际的，"丹尼说。"太贵了。再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习俗……你要是死在船上的话，你也得海葬，是不？"

"我已经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已经有多少回了，在这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这看起来像异教徒[1]。"

"唔，是的，"丹尼不情愿地表示同意说，"那些天主教徒。可是你关心什么呢？"

"我不，"勒温塔尔先生说，"我倒是应该担心基督徒们在互相干些什么的——不操这份心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不过，这叫我恶心。"

轮到丹尼苦苦思索了。他的处境很糟。这一方面，有一个无神论者，说话像布尔什维克分子；另一方面，有个犹太人，批评基督徒……那就是说，天主教徒。嘿，他不喜欢天主教徒，跟不喜欢无神论者一样，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想到一个犹太人在谈话中攻击基督徒。他，丹尼，要是跟勒温塔尔说"我认为犹太人是异教徒"的话，他会有什么想法呢？他会马上指责他迫害犹太人……丹尼开始感到脑子疲劳。他开始指望结束他在德国的逗留，再次回到布朗斯维尔去，在那儿，一个男人知道谁是谁，什么是什么，而黑人、疯疯癫癫的瑞典人、犹太人、拉美人、蠢头蠢脑的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该死的扬基佬[2]都知道自己的地位，安分守己地过日子。那个住在统舱里的胖子遭到了他应得到的下场，他那样嘲笑一次葬礼，所作所为确实像

① 此处是非犹太教徒。

② 指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区（包括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等6个州）的人。

个无神论者，但是丹尼觉得生气的是，那些讲西班牙语的天主教徒砸伤了他的脑袋。"黑皮，"他大声却并非对任何人说，"简直是一伙黑皮。"

"黑皮？"勒温塔尔先生不自在地说，眼睛深处冒出火星。"什么黑皮？"他不等回答，就拿着啤酒走开。"我不认识什么黑皮，"他回头说。

"犹太佬，"他用保密的声调对他自己说，"就是这么回事儿。"

弗赖塔格和勒温塔尔，尽管他们不知道，或者要是他们知道了的话也不会承认，他们有共同的理由感谢乘客们的注意力从那个鲁莽的巴斯克人被淹死和海葬这些富于戏剧性的事情转向别处；那个人的姓名甚至现在已没有人记得了，也许除了只有极少数几个也同样没人知道姓名的统舱乘客还记得。弗赖塔格对船长餐桌上那个小小的下流的诽谤的愤怒和怨恨，一下子把他猛推到他没有料想到的心境中，把他暴露在特别虚假的、不相称的状态中，确实虚假，因为这个事件不过跟以前发生过的许许多多次事件在形式上稍有不同罢了，只要他跟玛丽保持着夫妻关系，他会一次又一次地遇上这种事儿的。这次经历糟就糟在这是他第一回不跟玛丽一起旅行的时候遇上了这种不愉快的事儿。他不得不承认他指望能有几个会使他们分开即使几天的场合，在那些日子里，他可以完全放松心情，重新享受作为世界统治种族中的统治阶级的一分子的特权——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特权，而在过去的日子里，他是怎样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啊？——只要他自己有足够的才能，他就可以在任何方面发展他的事业，无拘无束，没有挑战地上升到他选择的社会地位。

啊，他在这场疯狂的婚姻中抛弃了什么——可不是，他对玛丽干了什么？她的生活跟他自己的一样受到威胁。突然，一点也不顾外表，因为他是坐在帆布躺椅上，他握紧两个拳头，捂在眼睛上，呻吟着说："玛丽，宝贝儿，宽恕我吧。"他听到她的柔和、动听的声音马上在说，"唷，那还用说，我宽恕你——你干了什么？"

整个事情，从开头到结束，都是他的过错；他只能接受这个难对付的事实，带着受伤害的骄傲打滚——在他和玛丽的一生一世的生活这个问题上，他自己干出了这样的傻事，他怎么还能信任他自己呢？他的火气又冒起来了，这是他第一回放肆地冲着每一个目睹他受屈辱的人发的，冲着那些冒昧地表示同情他、赔不是的人发的——那个令人无法容忍的鲍姆格特纳——也冲着那些擅自来分担他的委屈的人——那个珍妮·布朗，她有容易动感情的习惯，老爱设身处地地为所有人着想。说实话，他比较喜欢特雷德韦尔太太，她不流露一丝半点的感情。至于他们其他的人，尤其是船长的餐桌上的那些蠢货，只要他们能看到他一眼，就会以怠慢他为乐，他深深地希望玛丽跟他在一起；玛丽会凭着她的无情的幽默感和迷人的、彻头彻尾地冷酷无情的怨恨把他们变得着实有趣。"嗨，玛丽！"有一回，他跟她说，受到了震惊和表示钦佩，"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你属于人类吗？"她短暂地停顿了一下，乜斜着眼锐利地瞟了他一下，说："不，确实不属于——我是犹太人，记得吗？"

尽管存在着不愉快的状态——这对勒温塔尔来说并不是新鲜事儿——他仍然很愿意跟任何向他这儿走来的人稍微聊上几句，作为与人交际，只要他们不谈宗教这个题目——指他的宗教，因为他不承认任何其他宗教存在；除了他自己的宗教以外，一切宗教只是一伙异教徒在信奉假神。他们管自己叫什么，是

无关紧要的。他不止一次地被一个非犹太人提醒，世界上大约有二十亿人，据推测都是同一个上帝创造的，而犹太人，只是个约摸两千万人的问题，他想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上帝到底在打什么主意，表现得这么不公正地偏心？这种胡说八道始终没法使勒温塔尔有一会儿心慌。“我在这个话题上没什么可说，”他会回答，“你应该去跟一个拉比辩论。我相信他的话，他知道上帝的事儿。”但是只要一听到“上帝”这个名词，甚至是用异教徒的语言说出来的，甚至这名词只是用来代替那个绝不可以说出来的名词的，他就不自在。他总是改变话题，要是他办得到的话；要是他办不到的话，就走开。非犹太人怎么想他，他们是不是喜欢他，他不在乎。他不喜欢他们，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抢先一步。他不要他们对他有任何恩惠——他要独自下手，从他们那儿弄到他想要的，不感谢任何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想要的一切是，有权利正常地做人，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干他想干的事情，不受他们干涉——他们有什么权利呢……？

世界上，或者人类的一切历史上，没有一个种族或者民族享受过这种权利，这对勒温塔尔先生没有一点儿影响；他不为跟他不相干的事情烦心。这个欲望窝在他的心里，像地下的沸腾的岩浆那样在闷烧，冒泡，不断翻腾，没有出路。他不信任一切非犹太人，但是他最不信任的是那些用谈话折磨他的人，他们说他们不赞成种族歧视啊，他们自己不歧视啊，还说他们讨厌船长的做法啊，他们有很好的犹太朋友啊，而且人人知道世界上有些最有才能的人是犹太人。而且犹太人是那么慷慨——总是帮助人。勒温塔尔先生撅着嘴，几乎是当那个美国非犹太姑娘的面，气急败坏地说话；那姑娘到哪儿都带着一个画图的本子，跟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一起旅行，好像这挺要紧似的！她从背后走来，

甚至没说一声“早晨好”就跟他走在一起，叽叽呱呱地说，她认为整个事情是不折不扣的丢丑，她要他知道，她对这感到震惊。

“震惊什么?”他问，不看她，由于她挨得近，他的脸讨厌地皱起来。她继续歪着脖子，试图看他的眼睛，但是她只看到他很快地瞟了一眼。他忍受不了任何距离的非犹太姑娘。“什么事儿让你震惊了?”

她没有领会他的暗示，而是继续说，她没法容忍他这样的想法：人人都跟船长，或者里贝尔先生，或者——嘿，像他们那样的人，有同样的看法。几乎每一个她交谈过的人都憎恨这整个事情；但是船长，她指出，统治全船，所以一个乘客能够干些什么呢?“我只是要你知道罢了，”她相当腼腆地结束了她的话，好像这解决了一件事情似的，好像他在乎她的想法似的，好像她说的话会对他有所影响似的。她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他说：“得了，我得为这一切干些什么呢? 我不担心。我只是坐在他们安排我坐的地方，关心我自己的事情；也许弗赖塔格先生才是你应该同情的人。他才是被撵出来的那个人，不是我。我一直就在外面，”他说，“我一点儿也不抱怨，我已经习惯于做个犹太人了。”

那个非犹太妞儿当场站住脚，勃然大怒地问他：“你老是这么愚蠢、粗鲁，还是这是特殊的一次?”不等回答，她转身向相反方向走去。勒温塔尔先生注意到她的两条大腿像鹳鸟的。在心满意足的高兴的心情中，他点了一支上等的雪茄，直挺挺地躺在他的帆布躺椅里。他对一个经过的服务员打了个榧子。“啤酒，”他说，简短而不乏亲切的意味。

一个西班牙舞女在他的轮椅旁站住脚，递给他两张上面印着字的小小的长方形硬纸卡。“这是两张你参加我们的庆祝会

的票子，"她的粗嗄的声音低得像是粗声粗气的低语。勒温塔尔先生灵机一动，决定假装以为它们是礼物。"还是得谢谢，"他摆出赏光的派头说，作出要放进衣兜的模样。

"两块钱，"她说，伸出她的稍微向上弯的手掌，大拇指和食指在一起摩擦。

"什么？你们这票是卖的？为什么？"勒温塔尔先生存心拿她开玩笑。

"一场庆祝会。"

"哪种庆祝会？"

"我们跳舞，我们唱歌，我们又吃又喝，然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抽奖活动，备有美丽的奖品——也许你的一张票会抽中？也许两张都中！谁知道呢？"

勒温塔尔先生的好兴致消失了。"谁知道呢？我就知道一件事儿。我的运气就是这个样——我的衣兜里要是有一个号码中了奖的彩票的话，等我到那地方去领奖的时候，号码就会自动变了……好啦，别争啦，"他说，把两张票塞回到她的手里。"把这拿去，走吧。"

"肮脏的猪，"她用吉卜赛土语说。

"婊子，"他用意第绪语说。

马诺洛向小个子的奥尔特加夫人鞠躬，身子弯在她的帆布躺椅上方，递出两张彩票，还加上一大套叫人无法拒绝的、措词火辣辣的宣传。那个印第安保姆抱着娃娃坐在附近，很快地瞟了两张票一眼，然后看别处，脸色平静，眼睑下垂。她不识字，但是她在大老远的地方就能嗅出博彩游戏的气味；她看到了数字能认出来，而且每种她遇上的彩票都买一点儿，因为她对另一件事情知道得很清楚：她这样的人，生在草垫上，从生到死都赤着

脚走在泥地上，只有一个发财的希望——中奖，只要一回就行！她去世了的母亲经常在梦中焦急地跟她说话："尼古拉莎，我的孩子，现在小心听我说——听着，你听到了我的话吗，尼古拉莎？我就要把下一次彩票的得奖号码告诉你了。把那号码的彩票整个儿买下来，注意看，要找到那个有这号码的彩票的经售人。他住在五月五日街上。他的名字叫……"但是，总是在她开始说他的姓名、号码、连续编号的时候，就会快得连在一起，她的脸变得模糊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完全听不见，尼古拉莎吓得醒过来，会听到她自己在大声叫："啊，等一等，妈妈！别走……告诉我，告诉我！"

奥尔特加夫人对尼古拉莎脸上的表情微笑。她很熟悉那表情，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向马诺洛买了两张票，一句话没有说就交给了那个印第安姑娘；要不是奥尔特加夫人马上收回手的话，她会吻她的手的。她随即把他撂在一边，看也不看他一眼，好像他是个笨头笨脑的佣人似的，却对那姑娘说："让我抱一会儿娃娃。他今天早晨真乖。"马诺洛脸皮很厚，很难对付；他收下了钱；要羞辱他可不是一个墨西哥混血儿所能干得了的。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喜出望外的成功得意扬扬，接着在兴头上又向鲍姆格特纳两口子和那对新郎新娘卖出了彩票；他们并没有任何推托。然而，他看到那两个美国画家的两双眼睛里，一双浅蓝、一双深蓝，隐隐闪现十足地道、毫不动摇、充满敌意的光芒，在他走近的时候，那种目光毫不动摇。他找不出话来表示他对这一对没有个性、缺乏性感、像蔓菁那样没有汁水的男女的轻蔑。他们坐在一起，拿着图画板，假装是艺术家。他反正没有在他们的躺椅前站住脚；他把他们留给洛拉和安帕罗，尤其是安帕罗，去办，安帕罗连老虎也驯服得了。

珍妮和戴维亲切地坐在一起，望着马诺洛为了照顾他们而屁股特别一转从他们身旁跳过。戴维说："在他们把社交意识和敲竹杠搅合在一起以前，我还比较喜欢他们一些。你今天早晨看了布告牌吗？"

"我那时对那个勒温塔尔那么火，什么也看不成了，"珍妮说。"那些跳舞的这会儿在干什么？"

"我本来可以跟你说，什么都别跟勒温塔尔说的，"戴维说。"首先，这压根儿跟你不相干，哪怕相干的话，勒温塔尔也不这么想——你不过是另一个非犹太人罢了，就他来说，是敌人。"

"我本来想他能分辨在什么时候一个人是对他是真正友好的，"珍妮说；她的脸上开始出现愁容。

"你的意思是说，你原以为他会把你当作例外吗？他只是不得不看到你是多么真诚吗？嘿，珍妮天使，他可能为这一点更恨你哩！啊，难道你始终看不出吗？"

珍妮正在用交叉排线法速写出马诺洛的背影，小心谨慎地说："我以为我的感觉压根儿不是这样的。我不知什么缘故想要插手改正这种情况。我要他知道……"

戴维说："天使，你要牢牢记住，他不想知道。他已经知道他知道的事情了。"

"好吧，戴维宝贝儿，"珍妮说，"咱们别为这弄得吵起来。我感到今天跟你一起挺快活。请让我坐在这儿，挨近你，别责怪我。我对吵嘴感到腻烦了……不过，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思想是我的一部分，我不可能就这么丢掉它；不管我对你怎么假装，反正我不可能既不说这，也不干那，也不感受我所感受的事物——这样来打发我所有的日子。得了，我情愿看到你先忘掉

这事儿。”她说话的声音一直很低，而且始终没有停止作画。

戴维也继续作画，一声不吭。他的脸显得苍白和冷冰冰，珍妮害怕他这种模样，但是越来越经常地看到了。她喜欢戴维的肤色红润的活力，一种生机勃勃的年轻男子的色调，敏感而健康结实。要是他不注意提防的话，那么，有一天，食物和酒精会损害他的身子的；有一天，他醒过来，那要命的红颜色会已经出现在他的鼻子和脸颊上。这个对他不敬的想法从她的脑子里一冒出来，她就马上采取起行动来。戴维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专心地在创作，而珍妮乜斜着眼，一再偷偷地睃他，开始画一幅未来的戴维的肖像，譬如说，五十岁时候的肖像吧。她给戴维的熟悉的、瘦得皮包骨头的身子骨上裹上四十磅松弛的肥肉，增加了二下巴，使他的头发稀疏得只到他的耳朵旁，把他那个英俊得叫人难以相信的鹰钩鼻放大了一倍，把他的下巴夸张得简直像潘趣[①]的，最后，为了达到心满意足的效果，不惜狠心地在他的后脑勺加上一嘟噜条顿人的肥肉。她是那么快活地、一心一意地、平心静气地进行着这场小小的丑化活动。她的容貌呈现出戴维喜爱看的甜美的安详和内在的热情的光芒，而且只有在无意中突然看到她真正在专心工作的时候才看得到。他自己绝不可能做到使她的脸上出现这种神情的。珍妮只要一面对他，总是处在紧张状态，摆出一副准备较量的架势，充满矛盾的感情，她的眼光总是在搜寻，彷徨，凝视，闪烁，放大和畏缩。她已经成了习惯，估计他会惹麻烦，不管是什么麻烦。他不高兴地想着：“她现在是一点儿都不肯迁就的，不会干别的任何事儿的。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不可能好转了，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哄骗自己

① 潘趣(Punch)：英国传统滑稽木偶剧中的鹰鼻驼背的滑稽木偶。

每天这么短短地想上一会儿。再说，她是个多么糟糕的画家啊！干吗她不能看清这个情况，放弃作画呢？”他又仔细打量了她几秒钟。她的两个膝盖蜷起着，作为她搁图画本的桌子，她的细巧的脚踝子交叉着，嘴角弯弯地流露出一丝微微的笑意，不是喜欢得着迷，而是带着柔情蜜意，高兴，快乐。他忍不住要进行破坏了。他冷不防伸出手去抢她的画。珍妮猛的跳起身子，刷地把它从他手中夺过去，要把它扯坏。他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抓住那幅画，对她反抗得这么凶感到惊奇。

“这是什么，你这么喜欢？”

“不行，戴维，放开——放开——你不可以看——”

“小心，珍妮，你要把它扯坏啦！”

“我就是要把它扯坏。”她把画塞进她胸前的衣服里，交叉着两条胳膊把速写板挡在胸脯上。“我干过偷看和抢你的画稿的事儿吗？”

“啊，”戴维说；他生气了，沉着脸放弃了。他讨厌珍妮顽固地坚持认为他对她的所作所为和她对他的所作所为之间有着可以比较的关系。她跟他凶狠地斗争，反对他的拆她的信的习惯——他没有这样的权利，她说。“我就不拆你的信，”她争辩说。

当然不拆——她干吗要拆呢？“你怀疑我收到情书吗？”她愤怒地追问。当然不是——更确切地说，哦，一点不是。他就是没法承认珍妮有任何他一定要尊重的隐私。至少，这是她对事物的看法。他自己的界限和禁区是不容侵犯的，而珍妮在渐渐发现这情况；但是她还没有发现，而且也没有什么会教会她，一个男人从一个女人那儿真的需要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他跟往常一样，感到像陷在雾中。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对他没有什么

意义。珍妮倒是个问题，而他没法找到答案。她又靠回到她的躺椅上，蜷起膝盖，交叉着脚踝子，紧紧地捂着她的画。她愉快而俏皮地迎着他的眼光。“这是唯一的你永远看不到的画！”她向他说清楚，忍不住哈哈大笑，从头到脚都笑得直打哆嗦，她的赤露着的脚趾头在平底的、系皮条的墨西哥凉鞋里扭动。

他的抱怨和坏性子既然没有用，也只得算了，珍妮的笑声总是那么清脆和欢快，又把他迷住了；你管这叫抖动着肚子的笑声，说那是从那小小的平坦的中腹部发出来的，可不确切，不过，它每一次都确实发自丹田。他说：“喂，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好笑。我也喜欢笑嘛。”

“不行，那样就不有趣了，”珍妮说。不过，她仍然心情很好，微笑着，温和地说：“戴维宝贝儿。要是你知道你现在在我看来有多美的话，那有多好。我们永远不要变老、发胖。”

“好吧，定不下心来的小蚱蜢。不管怎样，不发胖。”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发胖是对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的一个不可原谅的过错，依次用伦理学、道德学和美学的观点来论证，接着又倒过来论证。“别像那胡滕两口子。”

“别像贝贝，”珍妮说。“你刚才说那些跳舞的男女有社交意识，那是什么意思？”

那些古巴学生被女伯爵的忌妒的情人那个医生剥夺了跟她的交往以后，对他们那个没有人打算闯进去的秘密团体和除了他们没有人看的报纸稍微有点儿厌烦了，开始爱好起国际象棋比赛和乒乓球来了。然而，他们的风格没有变，暗示着那些迷人的、不落俗套的秘密一定会被懂得他们的象征性的语言和仪式的新成员们所读懂。他们渐渐感到，确实没有人在乎他们；他们

没有使任何人恼火得有所改变。他们决定直接出击了。那些歌舞班子的人只是恶狠狠地盯着看那些受他们作弄的人，大声嘲笑，结果总是会引起那些人愤怒和害臊地涨红了脸，然而那些学生想到一个他们认为更巧妙和厉害的方法。他们一本正经地互相商量，然而用超然的临诊态度对待一个他们挑中的对象，用旁人听得见的声音互相谈论：

"病情严重吗？"

"没有希望了，"另一个会说。他们会摇摇头，用刺透人的眼光向他们的病人又瞟上一眼，继续下棋。

他们在甲板上经过的时候，交换严重的病症看法。"慢性消瘦症，"他们指利齐，贪婪地盯着看她的脸上马上出现的害怕神情。"没有希望了。"

"先天性 albondigitis[①]，"胡滕两口子踩着沉重的脚步，贝贝由一条皮带牵着费劲地摇摇摆摆地走来的时候，他们互相大声说。"没有希望啦！"胡滕教授赶快向他的妻子瞟了一眼，看她是不是听到。当然喽，她听到了，而且她的感情又受到了伤害。教授回想起，一开头他就表示过不喜欢那些野蛮的孩子，表示过他听到他们用快速难懂的谈吐互相把尼采、叔本华、康德这样受尊敬的名字挂在嘴边卖弄时很吃惊；难道是他的耳朵听错了，还是他们竟然还敢狂妄地提到歌德的名字吗？还有，尽管说得比较少，他们还是说到了莎士比亚和但丁这样可尊敬的名字。他们的脸甚至在相对安详的时候也不是严肃的；他们说起话来，不是经过考虑的，也没有正常的语调。他们在胆敢提到尼采这个名字的时候，说话叽叽呱呱，活像一群猴子，毫无疑问，为了求得他

---

① 拉丁语，意义见下文。

们自己的卑劣的满足，曲解和污辱了他。在伟大的事物面前，没有尊敬，没有合乎传统的谦恭——这些是非北欧日耳曼民族的缺点，伊比利亚民族、拉丁民族，尤其是高卢民族；轻浮确实是他们的地区流行病，他们把这一祸害带到了新大陆，他们的缺乏有智力的持重实在叫人震惊。胡滕教授觉得，要不是古老的日耳曼精神的残余还存着一点儿希望的话，他本来可能对人类绝望了。他勇敢地振作起来，试图安慰他的妻子。

"别听他们说的，我亲爱的，他们不过是一些穿得邋邋遢遢的顽童罢了，生性愚蠢，而愚蠢总是邪恶的，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这些话使他惊恐，听起来像是别人说过的——从哪儿听来的呢？——贮藏在他的脑子里。不用说，他不相信有什么人，不管他在罪孽里陷得多么深，是不可挽救的。他怎么啦？他没法想象，但是也没法否认，这个奇怪的观点像被揭示的真理那样强烈地打动了他。在人类的灵魂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对邪恶的不可救药的钟爱。教授的嘴里尝到了这种苦味，他拿不准是不是他胆囊里的胆汁都倒在他的舌头上了。

"可是，我听到他们的话了，"胡滕太太说，像个伤心的孩子。"他们管我们叫胖肉丸子。"她本来不指望他们会说什么比较像样的话，她只是对人们的互相攻击厌倦了。

"事实上，"教授果断地说，"他们是在用低年级的医科生说的蹩脚拉丁语说我们是害医不好的先天性肥胖症的病人——你知道，是一种臃肿的状态。你要是一定要听不愉快的话，至少要听正确。不管怎样，这种小丑行为不可能对我们有一星半点的损害。"

"我认为他们是小丑，"胡滕太太温和地表示同意，"可是，我从来没有嘲笑过他们。他们干吗要嘲笑我们呢？"

这是一个教授可以大发议论的题目。他在整个早晨散步的时候和接下来喝啤酒的时候，都在向胡滕太太解释，创造出每一个个人的人性特征的分配是神秘莫测、千变万化的——可不是，在四只脚的动物中也是这样的，甚至在每一种东西中，昆虫啊、鱼啊、花啊、鸟儿啊——甚至任何树的两片树叶都没有完全相似的！——这造成了无穷无尽、没法计算的观点、需要、欲望，为了种种，可以说是无限的，个人的满足，甚至斗争到断送性命，例子不知有多少，可以从最邪恶的辱骂、残酷行为、犯罪的方式算起，一直到圣徒和殉道者境界这样的高度。那群古巴学生是一个可悲的例子：他们生来思想卑劣，不可能有比较高的理解力，显示出他们的能力没法接受他们的教育；他们自然没法把他们的教育用在好的方面，就非用他们的猢狲爪子把每一样高明的东西拉到跟他们一样的水平不可了。他们没法容忍，事实上他们憎恨，在任何层次上的崇高和伟大的事物。"他们认为，要是他们把口水吐在米开朗琪罗[1]的摩西像上的话，他们就会证明雕像跟他们不分高下，"他得意扬扬地说。"这是他们的大错误，"他用安慰的口气结束他的话，"总有一天，他们会受到教训的。"

胡滕太太对她丈夫的改变观点感到惊奇，现在他的观点完全跟她自己的一致了，但是她没有挑明；在继续说出她心里想的事情以前，他等待着一段沉默的时间来表示尊敬和同意。

"他们又在印一张报纸了，"她告诉他，"是为那些西班牙跳舞的男女印的。我看到他们在一起，一边看一张印刷的纸，一边笑。"

胡滕教授的思路没有被打断。"那跟我们不相干，这是肯定

---

① 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雕塑大师，摩西像是他著名雕像之一。

的。"他还在继续阐述和解释他对这个题目的信念。"我们态度是清楚地表明了的,我们不必有一点儿怀疑。我们一定要继续保持到现在为止的态度,不理睬他们的存在,不用言语或者神情作出哪怕最微小的反应,不给他们一点儿得意。要是他们坚持他们的野蛮行为,闹得到了我们再也不可能维持跟我们身分相称的尊严的地步,那么——报复,迅速、猛烈、准确。我会找一个办法让他们感到我的锋利的训斥的。别烦恼,我亲爱的。我们以前对付过寸步不让的顽固分子。"

胡滕太太摸着贝贝的耳朵,向她的丈夫微笑。"当然喽,"她说。她展望未来,不由得想起她丈夫已经在惦记他的课程和讲演室了。显然,他的脑子里正在形成一套完整的新讲稿。她打定主意建议在他的口授下把讲稿写成文字,开始思索他有可能在黑森林某种小小的教育机构里找一个额外的职位,或者甚至在一本刊物或者哲学杂志上刊登文章。要不,他也许回到他的办公桌旁,周围尽是文稿和书籍,而她会那么忙地处理家务,所以他情愿亲自写讲稿,让她有一刻安静。胡滕太太最后对她自己承认,她对"思想"厌烦得要命。要是她再也听不到这个词儿的话,她会从心底里乐出来的。她继续抚弄着贝贝,向她的丈夫微笑着。

"这不是一处骨裂,"舒曼医生跟蒂勒船长说,选择了讲给不懂医道的人听的语言,"而是一处又长又深的头部损伤,伤到颅骨,有一点儿脑震荡。他还没有恢复知觉。"

船长用调羹搅了一下他的咖啡,一口喝干,接着字斟句酌地说:"他要是永远不恢复的话,那倒会好得多。"

舒曼医生搅了搅他的咖啡,但是没有喝。"那可以是致命的,可是并不一定。他的心脏好得叫人羡慕——像头公牛的那

么好，我想是这样。”

“这种猪总是这样的，”船长说，轻易地采用适合于这个话题的粗俗的比喻。“我感到兴趣的是，”他恼火地说，“这件事儿。武器是从哪儿——”

“螺丝扳头，”舒曼医生实事求是地说。

“螺丝扳头，”蒂勒船长说，庄严地接受了这个纠正。“那是从哪儿来的？谁打了那一下？我们就是要找到那个人。”

“螺丝扳头是在扭打的现场附近发现的，”舒曼医生说。“看来谁都一点儿不知道它的来路。”

“好像那是一点儿不重要似的，”船长说。“他们要是喜欢的话，那就让他们互相残杀吧，可是别在我的船上。我感到惊奇，加尔萨神父离得那么近，却没有注意到和认出罪犯。”

舒曼微笑，喝咖啡。“加尔萨神父分不清这张脸、那张脸，”他说。“他只看到灵魂。”

船长考虑了一下，才断定他对这个笑话也来发挥一下并非不妥当，尽管听起来它稍微有点轻视神职。

“他在那个肮脏的人堆里能看到一个灵魂，需要锐利的眼光哩，”他几乎愉快地说。他向医生探出身去说，好像在作出按规定并不需要的慷慨的让步似的：“我承认船上乘客拥挤，尤其在统舱里酝酿着敌对因素，可能爆发形式最低级的暴行和混乱。我没法轻易地采取可能最有效的纪律措施。”

他对这番话仔细想了一会儿，加上一句：“说到底，头等舱的乘客有权必须受到考虑。”他带着一闪而过的讨厌的表情考虑他们，接着说下去。“坦白地说，我没有得到教士们的帮助。我的船员当然在各方面都干得极出色，可是他们不能马上在各处出现！航行公司习惯于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的二等客轮超载，——”

他停住嘴;他对逗留在他面前的空气中的“二等”那个词儿,对他不明智地提到那些经营航行业务的、不理所当然地尊重船和船员的陆上人员感到惊讶——这样的苦恼是他自己的,跟舒曼医生不相干。他闭上嘴,紧紧地皱着眉头。

“各方面都应该受到指责,”舒曼医生说,也许说得太快了。

船长撇开那个话题。“在我能把这些下三滥在西班牙港口卸空以前,我该怎么对付他们呢?”他坦白地问。“我亲爱的医生,你有什么意见吗?”

舒曼医生说:“我需要一点儿时间,亲爱的船长,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可是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要说,什么也别干。这儿最糟糕的情况当然已经过去了,那个真正惹是生非的人已经解决了,在航行中不可能再捣乱。我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处于劣势的低级政治运动的职业鼓动者,总是他出现在哪儿,哪儿就有动乱。然而,总的来说,我认为那些人是无害的好人——他们没有一点儿不对头,只是出生不幸……”

“他们竟然生下来就是大伙儿的不幸,”船长说。“我们别无他法,只得尽可能地把他们隐藏起来,防止他们的祸害扩散。”

医生保持这种静默的局面,船长认为这是一种态度暧昧的表现,为了避免坦率的争论;有时候,这种态度看来近乎对坏事的默许,而船长对那些坏事是注意得那么快,镇压得那么激烈的。只要是任何涉及纪律的问题,船长早就发现医生是个不能依靠的人,而他对比较严重的问题的冷漠的态度,给船长留下一个印象,他是个危险的道德惰性分子。然而,他属于正宗的容克[1] 阶级,他的本能、所受的训练、惯常的观点,当然一定会支

---

[1] 普鲁士贵族地主。

持这个伟大的社会;他们两人生来就在这个社会上取得合法的地位,尽命中注定的责任,得到他们的及时的酬报——办事严密,绝不妥协,做个容克,至死不变。

"我们在行使权威中显得软弱的时候,我们的道德品质变得松弛无力的时候,就背叛了我们的阶级和国家,"他严肃地说。

舒曼医生站起身来。"说得对,说得对,"他亲切地说。"我们的责任是永远没有个完的。"他向船长说了声"明儿见",从那个局面和论争中脱身——也不是第一回了,船长生气地想。他想起得太迟了,忘了问女伯爵的健康情况;在医生的照看下,看来她好像没有什么起色嘛。

布告牌引起人们忐忑不安的好奇心。牌上贴满许多印刷醒目的布告,每一份布告都是单独印刷的用图钉平坦地钉在牌上。

烂肚子买不起一张票去参加船长的庆祝会,因为他已经害怕付不起酒吧间的酒账,然而他坐着一杯又一杯地喝白兰地。他的溃疡万岁!

"太下流啦!"鲍姆格特纳太太喊叫,激动地挽住她丈夫的胳膊。"别理睬它,我亲爱的,"因为她被他脸上的悲伤的神情感动了。他勇敢地向她微笑,擤擤鼻子,擦擦眼睛,他们一路走去,鲍姆格特纳太太默不作声地,深深希望这些残酷的措辞不是真的。"他们把别人说得更坏,"她提醒她的丈夫,后者装出一副受到安慰的模样。

勒温塔尔读着:要是一个犹太人被邀请参加人的社交活动的话,他还是抓住他的机会的好。这不会有第二次。他在页边的空白上仔细地用粗铅笔写上:什么人?然后晃晃悠悠地走去,显出一副对自己挺满意的神情。

"这正是我的意思,"戴维跟珍妮说,匆匆看完了早晨展现的那些侮辱。"瞧!那两个所谓的美国艺术家害怕,他们要是把鼻子从他们的速写本上挪开,有人就会发现他们在互相画漫画像,因为他们不能阅读。"

"不管怎么着,没有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叫我沮丧,"戴维说。"我的感情没有受到伤害。"

"我的也没有受到伤害,"珍妮说。"让我们给他们画一些漫画像,张贴在这儿。"

"干吗?"戴维说,"这会引起一场闹得很凶的争吵。有什么意思呢?"

"这正是那种我喜欢惹起的争吵,"珍妮说。

"得了,别把我卷进去,"戴维说。"这不值得。"

珍妮心里的火像刚燃烧的篝火那样冒起来了。"消极抵抗,"她轻蔑地说。"沉默优势。傲慢的矜持。死活不开口。说真的,挨了耳刮子后,凑上另一面脸颊,不过带着尊严。别让他们竟然胡思乱想,以为我们太胆小怕事不敢回嘴。眼下不要去看,他们会对向我们眼睛里吐口水这件事感到腻烦的。切不可让人说——"

戴维像一个参加检阅训练的士兵那样,端端正正地掉转脚跟,从她身旁走开。珍妮紧紧捂住她的眼睛,双脚在甲板上跺得像打鼓似的,在他身后尖叫:"孱头,孱头,孱头,你永远是——孱头,孱头!"

她然后睁开眼睛,看见威廉·弗赖塔格站在不到十英尺外的地方望着她,眼睛里闪着真正感兴趣的光芒。珍妮试图把她的尖叫变成一阵欢乐的大笑,但是弗赖塔格不受骗。他径直走到她面前,仔细地望着她的眼睛,漂亮地微笑着。

“你可真了不起，”他说，“我再怎么也想不到，你心里竟然有这么强烈的火气。我原以为你是那种冷静的、自我克制的姑娘。告诉我，一个男人得干了些什么才使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珍妮说：“我说的话你不会相信的，戴维什么都没有干；什么都没有，他不愿说，不愿待着听，不愿回答，不愿让步；他不愿相信我说的任何话，他不愿——”

“他要是不愿的话，那他就是不愿嘛，珍妮，”弗赖塔格非常温和而且通情达理。“难道你妈没告诉过你这话吗？”

“没有人告诉过我任何有一点点用处的话，”珍妮说，她一下子恢复正常了，性子也好了。“即使他们说过，我也不会听他们的。”

“我的话你是不是听呢？”弗赖塔格问。“你喜欢喝一点儿咖啡吗？”

“不特别喜欢，”珍妮说，“我喜欢有个伴儿。”

“有什么特别的人吗？”他说，充满自信。她走在他身旁，不回答，他从她脸上的戒备的神色看出她对这个开场白有什么想法。这使他再度毫不困难地断定，她不是个有吸引力的姑娘，至少对他不是，显然，对她那个年轻人也不是。一个处在她的境况中的姑娘没有权利摆出一副这么倔头倔脑、难以对付的模样。

里贝尔先生和利齐停住脚，望着那些西班牙人张贴出来攻击别人的有趣的字句，又笑起来了；他们看到这一张：

要是那头粉红的猪停止滥灌啤酒，和向那只雌孔雀暗送秋波的话，他可能是此次航行中更明亮的社交明星。紧挨着它的是用红蜡笔写的起来、西班牙！起来，蟑螂！消灭漠不关心的分子——！

“可是那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利齐问,火得直打哆嗦。“咱们对这种野蛮的手段何必在意呢?”

舒曼医生走进酒吧间来喝他十一点钟喝的那杯黑啤酒。一个古巴学生正在把一张新布告张贴在牌上,个子矮小的孔查站在一旁望着。医生戴上眼镜,看着:冒充的女伯爵戴着玻璃的珍宝和料珠,喜欢跳舞,可不愿付钱——一种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态度。也许她的忠诚的医生应该把他的处方由麻醉药改为一张参加船长的庆祝会的舞票。

舒曼医生眨眨眼睛,他的脸皱缩了一下,好像他的眼睛里吹进了灰尘似的。他把那张纸从牌上扯下来,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把它带到那些跳舞的男女坐着喝咖啡的那张墙角旁的桌子前。“依我看,”他仔细而坚决地说,这是他在对一个可能是杀人狂的病人说话的时候才用的态度,“这么做,你们愚蠢的玩笑就开得太过分了。我劝你们改变一下你们的方式、你们的礼貌、要是可能的话,至少在剩下的航程中。”他在把那张布告扯成碎片放在桌上的时候,仔细望着那些坐成半圆形的、瞪着眼、沉着脸的人,脸上显出的表情好像他盯着看的一双双眼睛都是放错了地方的,它们都是属于在笼子里或者在丛林里准备一跃而出的某种凶恶的猛兽的眼睛,那些野兽在那儿盯着看,暗暗走动,用鼻子嗅,找寻血腥味;里克和拉克的眼睛流露出同样的表情,只是更老成,有更强烈的意识并且跃跃欲试,这使他好不震惊。他们没有一个说话,而且像潜伏着的猞猁那样一动也不动。他们盯着看,成功地把舒曼医生的眼光压下去。他不由自主地把闪烁的眼光斜向一旁。他严厉地说:“请安分些,别再胡闹。”

一阵叫人不寒而栗的大笑一直送他到甲板上。舒曼医生倒不怕恐吓,但是对于这样的傲慢无礼行为竟然可以不被追究感

到厌恶和气愤，想起了所谓的生活中的比较轻松的一面，娱乐性的艺术和它们的从事者；有歌舞表演的酒馆和啤酒馆，人置身其间，以比较天真的心情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听听流行音乐，喝一点儿葡萄酒或者啤酒，看看年轻、漂亮的舞女，隔着桌子跟别人的妻子碰杯——生活的这一面怎么完全出自像这些人那样的人之手呢？这些犯罪世界中最底层的人组织和管理的一个犯罪团伙！可不是，甚至种种有益健康的户外运动不也是这样吗？干运动生意的人就是那些经营干毒品买卖、贩运妇女卖淫和收钱杀人的人；那些进行种种十恶不赦的可能实行的欺骗和伪造的人。玲珑透明、闪闪发亮的、欢乐的表面轻轻地覆在最臭的邪恶的泥塘上。然而，没有了舞蹈、音乐、酒和作爱，那一切叫人着迷的闹哄哄的事儿，生活会多么沉闷啊！愿上帝仍然保佑喜剧演员吧——我们不都是罪人吗？

他知道得很清楚，下一回，这伙无赖决定穿上跳舞服装，拿出乐器来，用他们迷人的方式跳舞，唱歌，叽叽呱呱的闲聊和随心所欲地弹奏，他会在那儿的；他没法抗拒，他会不知不觉地陷在他们的节奏中，压根儿不去想或者在乎他们确实是什么，事实上他们是什么？他只会把那时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当作是现实的，那时他们看上去不是人，面是一群羽毛艳丽的鸟儿，是一个供他欣赏的漂亮的景象。舒曼医生始终喜爱马戏、歌舞杂要剧场、有歌舞表演的酒馆，或者任何灯光幽暗的、发生种种古怪的事情的地下室小酒馆。他长大以后，他的职业严肃感、责任感管束着他。他的妻子看来挺严肃，事实上不是这样，时常在他疲倦的时候劝他：“去吧，我亲爱的，我们去看歌舞杂要剧。我们需要改变一下！”而她始终是对的。舒曼医生承认，但是只对他自己承认，要是鬣狗是美的，能够唱歌和跳舞的话，他也会

宽恕它们是癞狗。但是它们到底会宽恕他是人吗？再说，他算是什么东西，怎么竟然敢擅自提出宽恕哪怕是上帝创造的最微不足道的生物呢？他究竟是干什么的？他喜欢女伯爵，因为她精神错乱，迷失本性，吸毒，是个不受宗教、法律和道德约束的女人；她长得美丽，任性，而他，毫无疑问，是个天生的撒谎的人。他试图怎么样帮助她呢？他使她依顺，把她关在房舱里，跟那些态度暧昧的学生隔开——甚至在对他们的流言蜚语从船上的谈话的表层下像污泥浊水那样渗透出来的时候，他就把她跟他们隔开了；他不是用任何医药措施，也不是出于人的同情，而是滥用他的权力，用对她伤害最大的毒瘾，用毒品把她隔开的。

舒曼医生面对在此以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存在于他的品质里的一个方面。他一向与自己的性格里那给人以假象的邪恶成分相安无事；而一个信条——人除非自己同意，否则不可能遭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人的赎罪的愿望是跟他自己的灵魂一样是不死的——这个信条使他心安理得；他在干坏事的时候是知道他在干什么的。他既然相信自己一心只想帮助那个不幸的人让她舒服，怎么可能错待了她呢？他吓慌了，简直可以听到自己在头脑里说的那些否认的话在出现，在发声。“不，”他在说，“我没有伤害他，我是在紧急情况下尽可能地采取一些措施。加尔萨神父向我保证我作的事儿是不错的，还说我必须像一个负责的医生那样严厉地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那样……‘否则从一个方面说，是危险的方面哩，你在迁就她的勾引呢，’加尔萨神父说……”

他没有得到安慰和产生信心，而且知道，不管他采用任何现在能想象的方法，永远得不到安慰和信心。她是压在他的良心

上的一个负担，他不得不带着它直到死亡为止。他发出一声又响又深的叹息，但是并不表示听天由命，接着用最愉快的神情跟那个可怜虫格洛肯先生说："你好。"他跟往常一样在独自个儿散步，但是脸色比平时更阴郁。"你今天早晨好吗？"舒曼医生鲁莽地问。

格洛肯先生听到这句既表示人情味又毫无疑问表示医药专业的兴趣的话，脸色开朗了。"我觉得不怎么好，"他热切地说。"我胸口一直有一点儿闷。"

"你采取过什么措施吗？"

"这个，没采取过什么，"格洛肯先生说。"那是最近才有的现象。"

"也许你还是到我的医疗室里去一次的好，让我给你检查一下，"舒曼医生说；他的脑子想到即将干正经的工作，清醒了一点儿。格洛肯先生现出一副惊讶和充满可怜巴巴的希望的神情。"现在吗？"他不相信地说。

"现在，"舒曼医生说。

格洛肯先生不仅需要医药，他的灵魂也毁坏了。洛拉向他走去，摇摆着裙子，她的左手摊开着平放在屁股上。她微笑着往下看，右手掌向他伸出着，像一个算命的吉卜赛女人。"用银币在我的手掌心画一个十字，小个子，"她说，"我答应给你一张有幸运的号码的彩票，你可以得到一把漂亮的抽纱扇，带回家去送给你的俊俏的德国情人。"

格洛肯先生禁不住打了个冷战，没法控制他脸上的痛苦和害怕的抽搐。他转过头去，闭上眼睛。她热切地把身子弯在他上方，用尖利的手指头狠心地敲打着他的驼背："为了好运，你只

对这件事儿有用处[1]!"她说,然后猛地掉过脚跟,走到其他人那儿去,他们等在附近,默不作声地围住她,一起走去,点起烟卷。

下一个早晨,又有一张纸张贴在酒吧间里的牌上:你如果是一个驼背的话,即各种堕落的象征,你可以被豁免,举止行为不必像一个正常的人。

格洛肯先生在看针对其他有些受害者的布告的时候,总是得意扬扬地流露出微笑,这时候,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把这些令人震惊的文字看了一遍又一遍;接着,很快地向周围瞟了一眼,他一把扯下那张小小的纸,塞进他的衣兜,然后走过去,脸扬起着,双手紧握,在身后垂得低于膝盖,他的细瘦的大腿把他安全地送到外面甲板上。那儿,没有人看到他的丢丑。乘客们,不管他们是谁,总是个个不怕麻烦地对他以礼相待,招呼他,向他问好。他们这会儿又亲切地招呼他,微笑地端着他们早晨那杯肉汁清汤,在他的脸经过他们的视线的时候,在短促而没有好奇心的一瞟中,注意到那张永远悲伤和痛苦的脸紧绷着。他们打量着他,却并不在想到他,他一走过,他们就心情平静、漠不关心地忘掉他了;这是那些看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感到自己没有遇上危险的人的心情。他们再怎么也用不着憎恨或者害怕他,他的病是不传染的,他的厄运是他自己的,绝不跟别人相干;"可是多可怕,"小个子施米特太太跟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我一看到他,就感到多不幸!"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用神情作出了反应,那是她以前的许多求婚者所说的那种神情:一个嘴角翘起,鼻子微微皱着。她在她那个红皮面本子上迅速地写着:"请问,要是有一条贯彻得很好

---

[1] 西方迷信,敲敲驼背,可得好运。

的、强制执行的法律，一切有缺陷的孩子一生下来，或者在以后一发现他们可能显然孱弱的话，应该给予他们安乐死的恩惠，这是不是对人类有益呢？让我们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读一读所有那些支持这样做法的论据。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条看来多少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

安帕罗看到珍妮独自个儿走进一间小书写室，全力向她冲过去，毫不踌躇地走到她面前，好像一个没有时间可浪费的人似的突然跟她说：“你还没有买奖票——为什么不买?”她的声音和态度都显出那么理直气壮的责怪意味，珍妮差一点招架不住。安帕罗站着，像钉在地上似的一动也不动，等待着，右手伸出，手中有一张小纸卡，头向上，左手平放在屁股上，脚趾头向外，好像她马上要开始跳舞似的。珍妮原来不承认这个女人的存在，这时候产生了深深的憎恨，憎恨她不知怎么着必须不愉快地跟一个没法不理睬的不存在的人打交道，并且把这人打发掉。她用恶狠狠的尖声说，用瞪着的眼光看，她希望她的眼光跟另一个人的一样硬得像钢：“我不会买票的，也不会为这事儿烦心。”她转身绕过安帕罗走去。安帕罗的眼光盯着，而且跟踪着她自己的眼光。暴徒的眼光，要是我什么时候看到过一个的话，珍妮断定，同时感到纳闷，自己的表情会使一个不知道内情的旁观者产生什么想法。“别打搅我，”她愤怒地说。

安帕罗拍了一下大腿内侧，猛地掉转身子。“没有钱，没有男人，没有这个，”她说，又拍了自己一下，“耶稣!”接着神气活现地走了。

珍妮觉得她逃过了一次真正的拦路抢劫，还是持枪的哩，没有显示出一点儿要是显露出来的话安帕罗就会认出的得意扬扬

的样子。她短短地生了一阵子气后，去找戴维，告诉他这个小小的风波。从左舷绕过船头到背风处她才看到戴维，他背对海洋，胳膊肘搁在栏杆上，看来斜着身子在避开洛拉，洛拉呢，向他弯着身子，几乎脸碰着脸。看来戴维没有不快活，他径直盯着洛拉的眼睛看，露出一丝带着戒备神情的微笑，但是挺高兴的——珍妮的第一个冲动是干涉，或者像她所说，"赶紧去搭救"，她已经向前跳出一步，接着马上放慢行动，慢腾腾地踱过去，假装没有看到栏杆前这幅荒谬的图画。她看到戴维并没有在说很多话，但是双手一直放在衣兜外面；她并不完全信任他，并且毫不含糊地打定主意，要是他竟然买一张荒唐的票，她就抓过来把它撕得粉碎，扔进海去。她坚决地走过去，不向那两个男女瞟一眼。但是，戴维不久就走到她身旁，说："我想，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结论是，我是个没有母亲、没有五脏六腑、没有人的感情的男人；在洛拉的国家里，他们把我这样的家伙关在笼子里。"

珍妮哈哈大笑，戴维也跟着笑起来。"啊，这可不太坏！安帕罗跟我说，我没有钱，没有男人，还没有这个，"接着毫不害臊地，像猫用舐湿的爪子擦自己那样，拍了她的大腿内侧的上部。戴维顿时脸色开朗，露出一片红晕，连他的眼珠子也闪闪发亮了；他咬牙切齿地说："珍妮天使，"那话听起来是那么狂热，像是在诅咒，"你到底想到过你是怎样的模样吗？"

她默不作声地打量着他的脸，带着超然而惊讶的笑意——"我以前确实没有看到过你露出牙齿的凶相，"她说。"我们从前有一匹老是要咬人的马，你的模样有一刹那完全像它——我简直没法相信我的眼睛——"

"我也没法相信我的眼睛哩，你干的有些事儿，"戴维说，英勇地抑制着他的脾气。珍妮开始嘲笑他的时候，是无法控制、毫

无顾忌的。

“我认为，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手势，”珍妮说。“你过去常常认为那是一件有趣的事儿：两个印第安女人为一个男人争风吃醋要打起来的时候，拖着长裙，互相跺着脚越来越逼近，都乜斜着眼，露出牙，拍着她们自己的那个地方，在正中间，各自夸口说她自己得到的而另一个没有得到的东西——”

“可不是，”戴维不由自主地说，“而那个她们要为他打起来的男人只是站在那儿，看起来像个傻瓜——”

“嗨，戴维！我一直认为，他看来显得骄傲，高兴得蠢头蠢脑，而且充满着哪一个会得到他的好奇心——我要是跟，譬如说，特雷德韦尔太太，为了你翻脸大吵的话，你会怎样？”

戴维听到这个想法没法控制自己，几乎笑出声来。“当然喽，像个傻瓜，”他说。

“我想不出这是为什么，”珍妮说，“那两个女人在向全世界证明他真的是个值得占有的男人，她们不是在为了一个笨蛋互相扯头发，挖眼睛，抓破鼻子上的皮。其他的男人尊敬地站在后面，假装他们不在那儿，但是不错过一丁点儿细节。女人们都挤在一起盯着看，她们嘴湿润，互相用狠狠的警告的眼光看着，好像在说：‘注意，小心！’整个场面充满着浓得你可以背靠在那上面的性气氛——你明白吗，戴维？”珍妮喊叫，好像她已经向他说明了一切似的，而且在她这方面证明了什么。“你应该看看那个安帕罗的。她真了不起。我不得不想一想，我是不是也能这样做！”

戴维清楚而直截了当地说：“你用不着对我证明什么，珍妮天使。”他挽住她的胳膊，他们向栏杆走去，他们的鲜血在他们中间猛烈地汹涌澎湃起来；他们互相依偎在一起，一声不吭，喘着

粗气，感到他们互相碰到的地方肌肉在溶化和熔合。

丹尼走过去，他走路的速度好像他真的在赶往某个地方的，举起胳膊向戴维和珍妮挥挥，兴奋地大声喊叫："要看到陆地了，今儿个黄昏要看到陆地了，事务长告诉我的！"

消息传开了，尽管并不是出人意料的。特雷德韦尔太太、鲍姆格特纳两口子和吕茨一家人带着他们的双筒望远镜来到甲板上，其他的乘客都开始借他们的望远镜，长时间地盯着海洋和天空看。那些古巴学生，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排成队伍，吹着白铁皮喇叭，喊叫："起来，西班牙——消灭那些反蟑螂分子！"接着非常突然地在酒吧间的一条室外走廊上坐下来下棋。陆上生活的人钉在布告牌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已被消除干净，稀疏地、零零落落地贴着的简短的布告告诉经过的人，陆地已经在望——"真理号"正在开近特纳里夫岛的圣克鲁斯；对东航的船只来说，那是加那利群岛中的第一个岛。另一些纸片正在出现，带着有点儿抱怨的声气说话，那种语言倒是适合于那些既不知身在哪儿和又不懂航海语言的人的身分的。他们估计在一大清早靠码头，希望在陆地上待上一天，船在四点半再启航。这天是九月四日，礼拜天，离月圆还有两天。施米特太太把这记在一间书写室里的日历上，随口对特雷德韦尔太太说："上弦月是在两个礼拜前的礼拜三。埃切加拉伊就是在那一夜淹死的。"

特雷德韦尔太太站在一张桌子旁翻阅一本时装杂志，没有抬起眼睛，心不在焉地说："那好像已经遥远得很了。"

里克和拉克在船上作例行的巡视，发现他们自己在一条走廊的尽头，走廊上没有别人，只有那个戴着那条洛拉和安帕罗老是在说的珍珠项链的疯女人。她穿着一身白色薄绸衣服，赤着

脚。她慢腾腾地一路走来，眼睛半闭着。里克假装害怕，说："是个鬼！"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互相抓住手，用指甲掐进去，等着瞧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可能干些什么。女伯爵迈着慢条斯理、摇摇晃晃的步子走近的时候，他们两人在相同的一瞥中都看到，她的珍珠项链的搭扣松开了，项链从她的胸前滑下，被她腰带的褶裥挡住，直挺挺地挂在那上面，随着她的脚步微微来回摇荡。等她注意到的时候，已经离他们很近了，她心不在焉地把一只手伸出去，划了个半圆形，要他们让开道。他们既不掉转身子，也不让在一边，反而从她身旁冲过去，粗野地撞她；里克离得最近，他一边从她身旁经过，一边一把抢过项链，塞进他的衣领，他们歪歪斜斜地向甲板拚命跑去。女伯爵在他们经过的时候，受到猛烈地冲撞，伸手一摸喉咙，马上知道他们已经抢走了她的珍珠。她转过身子，在他们后面追赶，直到轮船的颠簸使她跪倒在地上。她坐在那儿她的脚跟上，双手捂着喉咙，直到那个女服务员找到她。女服务员把她重新扶到床上去的时候，带着豁出去的勇气生硬地说："我的夫人，我要是有办法的话；就不再伺候你了。你是在自己伤害自己，而我会受责怪的。"

女伯爵说："你爱怎么干都行。不过，在这以前，去叫人把事务长找来。那两个孩子抢走了我的珍珠。"

女服务员说："在哪儿？什么时候？"

"在走廊里我散步的那会儿，就在刚才。"

"我希望我的夫人原谅我，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你今天，从一大清早起，就没有戴珍珠，我的夫人。项链在这个房间里会找到的。"

女伯爵说："我这一辈子中最大的苦恼是一直必须跟一些蠢货打交道。去把事务长找来。等到我征求你的意见你再开口

吧。"

埃尔莎跟她的父母走在一起，差一点跟里克和拉克猛地撞上；他们看来好像尽可能地在逃跑，或者追赶，比平时跑得更快。他们躲避吕茨一家子，但是没有完全避开；里克撞了吕茨太太的左胳膊，击中了她那条使人浑身打冷战的神秘的神经。吕茨太太马上抓住他的一条胳膊；她的给这个孩子做规矩的母性本能整个儿被激发起来了。"一定要有个人教会你行为规矩一点儿，"她用德国腔的墨西哥西班牙语跟他说。"我来开个头。"她狠狠地掴了他一个耳刮子；他那么使劲地急忙逃跑，项链从他的衬衫里掉出来了。拉克跳过去重新捡起，项链从她两只手里垂下，摇摇晃晃。接着吕茨先生试图抓住她，但是她逃掉了，跑到栏杆前，爬上去，把珍珠扔进海里。吕茨太太放开了里克；他也逃到栏杆前，跟拉克待在一起。

小个子施米特太太随便走走，没有什么目标，正在担心她的丈夫，或者确切地说，担心她丈夫的尸体和他在底舱的棺材里怎样过活，注意到甲板上稍远处相当闹哄哄的场面，但是当她看到那两个双胞胎兄妹的时候，她就不向自己提问题了。他们在哪儿，哪儿就有乱子、混乱和坏事。可能这在冥冥中跟上帝的意志有关，是他的伟大而神秘的安排。不过，他们刚扔进海去的是什么？她从吕茨一家子身旁走过的时候，举止文雅地招呼他们，注意到他们有一点儿脸红和衣衫蓬松；但是，既然施米特太太在这艘船上正在逐步意识到在这段时间以来生活一直在安排要让她学到的一个大教训——想想看，她以前一次也没有猜测过这教训会是什么——她必须保持沉默，藏在心里，不发表意见，不作见证，不传播流言，不吐露任何秘密，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

的，没有一个人在场——这是一件叫人没法相信的事情！

她的一切准备跟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对抗的决心，都毫无结果。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把她的梳妆用品都推到一边，说："请把你的东西拿开，别妨碍我！"她，施米特太太，把它们塞进梳妆台上一个小小的空间中。有一回，她说，试图说得听起来坚定、果断："我不喜欢夜晚舷窗开着。""得了，我喜欢。"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那舷窗一直开着。施米特太太长长地透了一口气，想不出那两个孩子把什么东西扔进了海去，尽管那不管她的事儿。

那个女服务员请事务长去见女伯爵；他去了，听她讲述了经过，注意到她的受麻醉药影响的语言和态度，断定那是一个幻想，派人去请医生。舒曼医生相信她告诉他的话，向事务长解释，他了解她的性格，幻想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建议事务长向船长报告这次偷窃行为，毫无疑问，船长会布置一次搜索和调查。事务长的报告使船长对他的船上最近发生了这件尴尬事儿大为烦恼；事务长竟然放肆地说，舒曼医生相信那位夫人的话，而他，事务长，不信。船长马上下令搜查，一次全面彻底的搜查，罪犯可能在统舱里有同谋犯，在这段时间里，他会乐于问舒曼医生几个问题。

舒曼医生问女伯爵："你有把握吗？是那两个孩子——？"

她用双手握住他的一只手，松松地握着，抚摸他的手指头，说："你简直跟那个事务长一样差劲。问得出这样的问题。"

"你老是这么起床，独自个儿转悠吗？"

"只要女服务员一走开，就去转悠。"

"告诉我，"他焦急地说，"要是你的珍珠找不到了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我还有翡翠，"她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东西。"她把自己

的额头在他的额头上碰了一下，接着缩回来，微笑。“现在这可能有什么要紧呢？我对这件事儿感到高兴的是，你在为我着想——你感到不安，你要是可能的话，会帮助我的！不过，你帮不上忙，”她得意扬扬地说。“没有人帮得上。”

一个小服务员来通知舒曼医生船长有请，他站起身来，亲亲她的手。“你上哪儿去？”她苦恼地喊叫。“别撇下我。”

“我去帮助船长寻找你的项链，”他说，“我希望你安静地待在这儿，我知道你是安全的。请你能不能不干那事儿？”

“为了你，”她说，“为了你，不为其他任何人。”

“女伯爵的医生来了，”吕茨先生说，“让我们来问问他，她是不是已经发现她的珍珠不见了？”

吕茨太太说：“你只会为自己惹麻烦，只有你才可能这么说话随便！我们怎么知道那是珍珠呢？说不定那是料珠，也有可能嘛。”

吕茨先生说：“那上面有一颗金刚钻扣子啊。而且藏在上衣里。”

“你怎么知道那是金刚钻？除了藏在上衣里，还能藏在哪儿呢？”

吕茨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带着极大的失望，用一声叹息把它吐出来。“哎，我可怜的妻子，我跟医生说话的时候，你待在老地方别动。”他径直向舒曼医生走去，挡在他面前，使他站住脚，只说了几句话。舒曼医生很严肃地点点头，接着继续走去。

搜寻丢失的珍珠这件事儿，原来只是一场可以说是事先准备好的活动：歌舞班子的四间房舱差不多翻了个底朝天；统舱里

的几个可疑分子，被认为是反宗教的，被折腾得忍不住绷着脸，神态傲慢；甚至那个胖子也被拉起来，坐在他的铺位上，而三个水手在搜查褥子和枕头套里面。他满腔怒火地吼叫："你们在找什么?"一个水手说，"要是我们找到了的话，你会知道的，"把他撇在一旁，让他丝毫摸不着头绪，只得骂尽种种脏话。

事务长派人去把蒂托和洛拉叫来，但是所有的跳舞的男女都被搜查的水手们撵出了房舱，所以他们全体来到事务长的门前；除了蒂托、洛拉、里克和拉克外，他们都没有进去，被要求等在外面。

那个事务长毫无礼貌地提问："这两个是你们的孩子吗?"从洛拉到蒂托，然后是双胞胎兄妹，一一瞟过去，两个孩子蜷缩着并肩站在后面，像两头遭到危险的野牛在硬顶。他的神情交织着厌恶和不信任——当然喽，这样的生物是不可能真的存在的。但是，可不是，他们站在那儿嘛，他们的蛇一样的眼睛闪闪发亮。他转过头去，看他们的父母。

"当然喽，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洛拉说。"你以为他们是谁的呢?"

"在这件事儿了结以前，要是他们是别人的孩子的话，你可能会高兴哩，"事务长说。他冷不防对里克和拉克大喝一声："你们偷了那位夫人的项链吗?"

"没有，"他们马上异口同声地回答。

"你们拿它怎么样了?"事务长问，继续保持着严厉和响亮的声音。"回答我。"

他们默不作声地盯着他看。洛拉抓住里克的颈背摇晃。"回答!"她凶狠地说。事务长注意到她的脸色变得出奇地黄，她的嘴唇苍白，她看来像要晕过去。事实上，洛拉不知道水手们为

什么搜查这艘船。歌舞班子已经计划抢劫女伯爵，但是不到最后的时刻不会动手，也许在她离船的时候，或者离船以后，但是这两个恶劣透顶的小鬼破坏了一切。事务长也许产生了怀疑，他可能只是试着用那套古老的把戏，用乘人不备的袭击和吓唬他们的方式，吓得哪个人承认，但是她洛拉已经知道，最糟的是真有这事儿——里克和拉克已经干了，不管干的是什么事儿；他们差一点没使她在这个肥猪似的事务长面前显出惊慌。“耶稣！”她虔诚地低声说。

里克清楚而从容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而拉克向他，而不是向别人点点头。

事务长对蒂托和洛拉说：“暂时别管他们。你们要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的话，”他话里有话地说，“那么，我来告诉你们。”接着，他把这件事情的一个个凑起来的片断告诉他们——医生从女伯爵那儿听到的话，吕茨先生首先告诉他的话，后来吕茨太太也勉强地，甚至还有埃尔莎也这么说——可不是，拉克的手里有一条项链，她把它扔到海里去了。洛拉和蒂托毫不费力地现出恐慌和惊讶的神态，还表明他们相信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并且希望那些指责他们的人能被证实是弄错了，还严肃地答应在私下里进一步盘问两个孩子，查出真相。事务长始终对他们说的一句不信，认为他们是在演一场水平不错的戏，但是还没有好得可以哄弄他。

蒂托和洛拉回转房舱的时候，水手们已经走了，已经把一切摆得井井有条，但是他们发现安帕罗和佩佩、马诺洛和孔查、潘乔和帕斯托拉等在那儿，挤在一起，一声不吭；他们默不作声地站起身来，把他们两人围在中间，他们各自高高地抱着双胞胎兄

妹中的一个，几乎高至他们的肩膀。他们嘴里的热气互相呼在脸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安帕罗悄声问。“是关于我们的吗？那些学生是这么说的，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事儿。”

“全都走开，”洛拉说，“别来打搅我。”她用胳膊肘推出一条道，走进房舱，坐在长沙发的一头，用两个膝盖结结实实地夹住里克。蒂托站在一旁，抱着拉克。

洛拉说：“好吧，告诉我。”他用两条腿围住他，抓住他的两只手，开始狠狠地压他的手指甲，一次一个，态度坚决、冷静，痛得他浑身扭动和嚎叫，但是她只说：“告诉我，要不，我会把你的手指甲一片片翻过来，我会把针刺进你的指甲下面去！我会把你的牙齿一个个拔出来！”

拉克开始在蒂托的手里挣扎，断断续续地尖叫，但是她不承认。洛拉开始用大拇指和中指把里克的眼睑翻上去，于是他的尖叫从疼痛变成恐怖。她说：“我要把它们挖出来！”马诺洛的声音压得变成沙哑的低声：“继续干。给他点厉害尝尝。别停手！”其他的人心情烦躁地不断挪动身子，发出一片刺耳的、闹哄哄的高声，要她别停止，继续干，逼他说出来。

最后，里克在她的膝盖中间垮了，他的脑袋不由自主地倒在她的怀抱里，眼泪淌个不停，透不过气来，叫着说：“你说那是些料货，不值得麻烦。只是些料货！”

洛拉马上撂开他，加上一个耳刮子，算是额外的补偿，接着气呼呼地站起身来。“他是个白痴，”她说，“我们干吗要带着他？我要把你留在比戈，”她跟他说，“让你挨饿！”

拉克一听这话，尖叫起来，在蒂托的掌握中乱蹦；他用拳头连连狠击她的脑袋和肩膀，她才安分下来，但是大叫：“我也走！把我也撂下。我不跟你们在一起——我待在比戈——里克，里

克，"她像一只被黄鼠狼叼在嘴里的兔子那样大声尖叫，"里克，里克——"

蒂托放开拉克，转过身来，对里克施行做父亲的规矩。他抓住里克的右手腕，慢腾腾地、一个劲儿地扭过去，直到里克的肩膀几乎在他的骨臼里转过来，里克跪倒在地上，发出一声长长的嚎叫，然后声音渐渐低下来，变成像小狗那样的凄惨的抽抽咽咽的啼哭，他才松开那凶狠的扭动。拉克蜷缩在长沙发上，抚摸着自己的一个个青肿的伤痕，又跟他一起哭起来。接着，马诺洛、佩佩、蒂托、潘乔、洛拉、孔查、帕斯托拉和安帕罗，个个脸上深深地笼罩着非常恼怒和害怕的神情，一起走开去仔细讨论这件事情的叫人沮丧的转折的每一步，通过一些话和点头决定，最好还是到酒吧间里去喝咖啡，在晚餐时间跟往常一样出现，在这以后，在甲板上举行一次排演。他们都非常烦躁，随时准备互相掐脖子。洛拉在出去以前，逗留了好久，抓住拉克的头发，摇晃她的脑袋，直到她静下来，不敢啼哭为止。他们走后，里克和拉克爬到上铺去，寻找安全；他们半裸着身子躺在那儿，缠在一起，像吃了苦头的丑恶的怪物在洞穴里，筋疲力尽，不动脑筋，不久就睡着了。

第　三　部

海　　港

因为在这儿我们没有延伸的城市……

（圣保罗）

黄昏，已近夜晚了，淡绿和淡金的阳光仍然映在海洋和天空中，乘客们等候了漫长的一天，逗留在原地，盯着地平线看，眼下得到酬报了，特纳里夫岛已经遥遥在望，那是突兀地从灰色的海水中冒出来的一座岛，像一座凹凸不平的、具有岩石形状和岩石颜色的堡垒，基部雾蒙蒙，上部笼罩着飘动的紫色的云。

戴维和珍妮一起长时间地把胳膊靠在栏杆上，默不作声，免得打搅他们间的平静的心情；他的显示出深深的满足的容光使她吃惊。后来，他轻声跟她说话。"这是我心目中的西班牙，"他说，"这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国家。托莱多[1]，阿维拉[2]，而不是塞维利亚[3]。橙子园、响板和抽纱披肩——我没兴趣。"

"不过，对那些喜欢得到它们的人来说，在西班牙也能得到这些东西，"珍妮亲切地说，"可是，你不要，你没兴趣，戴维宝贝儿。花岗岩、砂子、上好的西班牙皮革面料、苦面包和歪斜扭曲的橄榄树——在那儿，甚至婴儿也那么结实，不用尿布。我知道那是你心目中的真正的天堂，对不对？"

"对，"戴维勇敢地承认，"某种结实而伟大的东西——托莱多钢和花岗岩、西班牙皮革和西班牙人的骄傲和憎恨，西班牙人的残酷——他们是唯一懂得怎样制作残酷艺术的民族……我讨厌一切轮廓柔软、圆润的东西……"

“难道没有什么介乎轮廓像刀锋一样犀利和轮廓柔软、圆润之间的东西吗?”珍妮问,听出她自己有所想望,希望戴维没有注意。“甚至在特纳里夫岛也有棕榈树和鲜花嘛,我敢跟你拿随便什么打赌;还有许多人都非常和气地交往,小伙子们在月夜也跟在墨西哥一样向姑娘们唱小夜曲——你会讨厌的!”

他不再说话,用她喜欢的蓝眼睛看了她一眼,这使她完全沉默下来了,因为不管出现什么使他们争吵的事情,她仍然相信她情愿按照她自己的条件讲和,只要她能找出是什么条件。

海鸥纷纷飞出来会见他们,盘旋着,愤怒地尖叫,一上一下扑动着它们僵硬的、机械似的双翼,转动着它们的仿佛装在铰链上的木头似的脑袋,认真地看着这个景象,像石头似的落到波涛上,抓住一团团厨房垃圾。

“老一套,”吕茨先生说,在一旁站住脚,“都在找吃的东西,不在乎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要是再也听不到他说的话,那才好哩,”珍妮满怀希望地低声说。

早晨,发动机发出嘭嘭嘭三下响亮的声音,停住了。珍妮把头探出去。她的舷窗外就是特纳里夫岛的圣克鲁斯,果然是一片长长的、嶙峋的岩石,长着一片片棕榈树,漫山遍野都是九重葛花,方方正正的平房高高地蜷缩在峭壁一样高的地方,好像是用凿子凿出来的。码头建在一个广阔的沙滩上;码头工人

---

① 托莱多(Toledo):西班牙中部一省。

② 阿维拉(Avila):西班牙中部一省。

③ 塞维利亚(Sevilla):西班牙南部一省。

已经聚集在那儿,准备好了,小小的一群人等待着,没有多大期望。两个警察来到他们中间,开始挥手要他们向码头两边退去,直到他们面前出现一条宽阔的道路。珍妮听到铁锚落进水中的声音。等她走到甲板上的时候,跳板已经铺好了。她看到几乎人人都在跳板那儿,面且几乎都穿着节日穿的、上岸去的衣服。进早餐的号声响了,但是几乎没有人从舷侧挪动。一个响亮、粗嗄的声音,也许是事务长的,通过喇叭筒开始吼出好意的建议:"头等舱的乘客们务请去进早餐,早餐已准备好。无论如何,务请头等舱的女士们和先生们让出甲板,有一部分三等舱的乘客现在将从主甲板上岸。注意!头等舱的乘客们务请……"

他们不情愿地零零落落地散开去,戴维也在他们中间,珍妮迈步向他走去,但是被威廉·弗赖塔格截住,他有礼貌地伸出一条胳膊来拦住她的去路。"会有些东西瞧瞧的,"他说。"谁要吃早饭呢?"戴维要,珍妮想,望着他走得看不见。"我们上这边来,"弗赖塔格说,一边挽着她的胳膊肘儿,"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出现的。"

统舱里那些即将上岸的乘客,聚集在陡峭的铁楼梯脚旁,结结实实地挤在一起,肩上都扛着鼓鼓囊囊的麻布包裹;比较小的孩子们跨坐在他们的身上,一张张脸都向上望着,等着一声号令,他们就能登上有广阔自由的上甲板,等着那个叫人高兴的词儿一出口,他们就能走过跳板,重新踩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了。每一张脸上都现出各人个人的盼望。焦急的喜悦、着迷的兴奋。他们站着的时候,每一个身子都斜着,使劲往上拔,一声不响,一动不动,他们的呼吸汇合成一阵小小的呻吟,整个人群有一阵紧张的颤栗。一个矮个子的年轻人,下巴黑糊糊,长着一副说话直率、态度随随便便的相貌,头发乱蓬蓬;他赤着的双脚紧紧勾住

梯级，不受约束地、急匆匆地爬到扶梯顶上甲板的栏杆旁，脚趾头伸开着站得稳稳的，像一只鸟儿似的瞪出了眼，眼光远眺着那个躺在山脚下、向尽是岩石的岛的两边升上去的小镇。他忘掉一切，微笑着，那双圆滚滚的、流露天性的眼睛里饱含着眼泪。威廉·弗赖塔格看着他，羡慕他已经到家；甚至珍妮也说："高兴得掉泪，一定滋味美妙！"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轻的船员向那个人冲过去，似乎要打他似的，在离他三英尺外，突然站住脚，张开嘴，带着大发雷霆的权威干脆而嚷嚷咧咧地说话。

"回到下面那儿去，你！"他喊叫，但是那个人没有听到。"回到下面去！"那个船员嚷着说，显示不礼貌的愤怒，他几乎火得说不出他的蹩脚的西班牙语，他的脸涨得发紫了。特雷德韦尔太太正在进门去进早餐，带着几分好奇心站住脚，瞟了他一眼。可不是，没错儿，正是她那个礼数周到、文雅的年轻的舞伴。她继续走去，一条眉毛稍微抬起。栏杆前那个人眨巴着眼睛，终于听到和听懂了，向那个发狂似的船员转过脸去，仍然流露着同样温和的微笑，那层亮闪闪的泪膜遮住了他的眼睛；他仍然微笑着，像一条没有被惹火的狗，顺从地转过身去，钻回到下面的群众中间去，摇晃着他那个麻布包裹。甚至他还来不及转回身子，那个船员就探出身去，喊叫那些等着的人："来啊，你们，上来啊，赶快啊，从这儿上来，离船上岸！别挤，三人一排过来，来啊，快上岸，快上岸！"他咋唬和吆喝的时候，下面的几个水手把那群人赶在一起，催他们往前走。

那个年轻人马上跳到前面，带着人们往上爬。他们赞赏他的大胆，他们重新振作起精神来。他们攀登，磕磕绊绊，互相高兴地推来推去开玩笑，互相大声说着笑话和开头语，形成一片刺耳的哈哈大笑的合唱声；他们不再感到受压迫和受威胁，而是结

束了背井离乡的生活，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他们熟悉的种种烦恼中，终于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在那儿，一个人的生和死是他自己的事儿。他们不理睬那个在大叫大嚷地发火的、脸涨得发紫、说着滑稽的西班牙语的小个子；他什么也干不成了，说什么语言也没有用了，再也没法对他们施加任何影响了；他们心急火燎地要离开他的船。他们转过身来，向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祝福和告别，后面的人跟他们一样喜悦，满怀希望地用同样的话大声回答他们。

在航行期间，有七个生下孩子的妇人在慢腾腾地走过来，她们有几个被他们的丈夫扶着，或者靠在别的女人身上，抱着她们的紧紧包裹着的婴儿。她们身体软弱，面色苍白，有几个的额头和脸颊上有星星点点的黄斑，她们的肚子仍然松弛和柔软，她们的陈旧的衣服前襟上留着奶渍。她们的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们坚决地抓着她们，眼睛里流露出悲伤和丧失权利的神情。一个约摸十二岁光景的男孩来到上甲板的时候，带着恶狠狠、火辣辣的微笑转过身去。

“好啊，好啊！”他大声喊叫，举起一个握紧的拳头在空中摇晃。“我们比动身的时候多了许多人！”

有一个母亲抬起她那张憔悴的黑乎乎的脸，得意扬扬地高声回答：“可不是嘛，还有男人，他们所有的人！”一条巨大的嬉戏欢笑的急流在他们所有的人中间汹涌起伏。他们喊叫着往上攀，像一阵波浪向甲板涌去，分散开来，逼得船员们和其他乘客退到栏杆旁和门里去。在跳板前，人流井井有条地变细，从船上流出去，没有一个回头瞟上一眼。那个船员把脸转在一边，脸上一副忍不住要呕吐的抽搐的神情。他直勾勾地看着舒曼医生的眼睛，医生正在赶去向女伯爵告别和准备扶她上岸。“上帝啊，

他们真臭，"他说，"他们是怎么繁殖的——像害虫！"

舒曼医生什么也没有说，那个船员稍微平静一点儿，把医生的惘然的眼光看作是同情。医生望着两个水手帮助那个胖子走上楼梯。他穿着在维拉克鲁斯上船的时候穿的同一件樱桃红衬衫，但是他头昏眼花，沉甸甸地靠在两个扶他的人的身上。舒曼医生下去给他更换绑带，重新包扎他的脑袋；伤口恢复得很好。毫无疑问，他会复原的，然后更多地惹是生非，进行捣乱。那个人经过的时候，他从巨大的头盔似的包扎下直勾勾地望着舒曼医生，但是没有认识的表示。

在他转动球形门把手的时候，舒曼医生注意到他的手没有血色，一条条血管都陷下去，泛出绿色。他觉得人软弱，巴不得停下来喝杯咖啡。他发现女伯爵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妥当，甚至戴了一顶玫瑰色的小帽，脸前披着一条粗网眼的黑面纱，几乎是平贴在脸上的，好像是覆盖在她坟墓前的肖像上的，她的脚踝交叉着，手提包挂在一条胳膊上，左手拿着一副短的白皮手套。她微微向他侧着头，微笑着。那个女服务员早就接受这一对的古怪行为，他们当然年纪已经够大的了，本该懂事些；她必恭必敬地对医生鞠了一个躬，迅速关上那个她正在往里面放东西的小手提箱，马上退出房去。其他的行李都已提出，灯已经关掉，这地方整个儿空空洞洞，灰蒙蒙，一片凄凉。

他站在她身旁，脸上显示的沉重和沮丧的关心神情是那么深切，使她从他身旁缩开，眼睑极轻微地抖动了一下，声音里带一点儿害怕的意味问道：

"他们来要我这个人了吗？"

"对，他们已经在这儿了。不，请听下去。船长和我跟他们

谈过，知道他们是奉命要你的。他们受到了指示。他们不会碰你，或者甚至不会靠近你。他们只待在跳板的另一头旁边——不对你看，你甚至用不着看他们——证实你离开了船，船再启航的时候，你在岛上就行了……"

"船再启航的时候，"她说，"想想看吧，我的航行就会结束了。"

"你压根儿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说，拿起她的一个手腕，为她按脉。甚至现在他还拒绝怀疑，他干的事儿也许不对吧——到底谁拿得准呢？——这是唯一可能干的事嘛。女伯爵抽回她的手，说："啊，现在按脉息有什么作用呢？一切都完啦。你可以说，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对你来说是多么轻松，你是在回家啊！可是我将在这儿当囚犯。我只要一想到我要留在这儿，归他们管，就不免会想到他们会把我独自个儿关在一所又暗又脏的房子里。"

他坐在床边，紧握着她的手。"你这个囚犯这整个岛上都去得，"他告诉她，"一个极美丽的地方；你可以爱住在哪儿就住哪儿，喜欢怎么住就怎么住。"

"按照我的喜欢？"她说，她的声音提高了，但是不是在问。"独自个儿？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子儿？没有我的孩子，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以及他们到底怎样才能找到我？啊，我的朋友，你已经被美德和虔敬摆弄得痴迷了吗，你已经丧失人的感情了吗，你怎么能忘掉痛苦是什么滋味呢？"

"等一等，"他说，"等一等。"

他取出注射器和针剂，从容不迫地准备再为她打一针。她望着他，没有流露她惯常的聪明、淘气的表情，而只是顺从，她的眼光几乎不移动地跟踪他的行动。她默不作声地坐起来，脱掉

她的外套，解开袖口的钮扣，为她自己很慢地卷起衣袖，在针刺她的肌肉的时候，短短地吸了一口气说："哎，我会多么想念这滋味！没有了它，我会怎么办呢？"

"你需要的时候，还会得到它的，"他向她保证说。"我会给你一张处方和一份特殊的医嘱，你可以给你在那儿选中的不管什么医生看就行。我相信任何医生都会同意的。我认为你不会被允许受痛苦的。"

她用双手握着他的一只手，紧紧抓着不放，用哀求的口气问："你干吗不告诉我那是什么呢？或者更好是，把针剂给我，让我自己使用——我懂得怎样打针。"

"我不怀疑你会，"舒曼医生说，"可是我不能这么干。你实在太无法无天了。我没法信任你——记得吗？你自己跟我这么说过的。"

"那是那时候，"她愉快地叫起来，又穿上她的外套。"我现在整个儿变了，你看到了——被你这个良好的榜样改好啦！"她把两只脚放在床沿外坐在床边上，坐在他的身旁。"告诉我一件事儿，"她说，"你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那么，我们干吗不可以像朋友那样，或者甚至像情人那样，或者甚至像在身后的另一个世界里那样谈话呢？哎，来吧，让我们来扮演两个长期在炼狱里洗清了罪孽、在天堂里相会的、长着翅膀的小小的灵魂吧！"

"不过，你跟我说过，你不相信身后的另一个世界，"舒曼医生说，微笑着，"更不相信灵魂和天堂。"

"我不相信，可是这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还是照样会在那儿相会。不过，现在干吗不告诉我一件事儿？"

她向他靠过去，直到他感觉到她的轻微的呼吸，她很干脆地

问，声音里没有任何特别的感情：

"你昨宿很晚的时候来过这儿还吻了我吗？你搂着我的身子，几乎把我从枕头上抱起来，还管我叫你的情人吗？你是不是说过，睡吧，我的情人？要不，还是我在做梦？告诉我……"

舒曼医生向她转过身去，把她深深地搂在怀里，头靠在她的肩膀上，把她的脸拉到他的脸前面。"我来过，我来过，"他呻吟着说，"我来过，我的宝贝儿。"

"啊，为什么？"她嚷着说，"为什么要在我还在睡梦中似醒非醒不知道的时候？为什么你从来不在我可以肯定地知道的时候，我可以感到快活的时候吻我？"

"不，"他说，"不。"他抬起头，重又搂住她。她开始有一点儿摇晃，从一边到另一边，好像她在摇一个摇篮，然后很温柔地抽出身子，坐回到他的身旁，两只手按在他的肩膀上说："啊，这么说不过是一个梦罢了——啊，你知道那是什么，来得这么迟，这么奇怪，怪不得我弄不懂。那是我应该在做小姑娘的时候有的天真、浪漫的爱情！可是没有人天真地爱过我；啊，要是谁天真地爱我的话，我会怎样取笑他啊！……得了，我们一起在这儿。天真的爱情是一切爱情中最痛苦的那一种，是不是？"

"我没有天真地爱过你，"舒曼医生说，"而是自觉有罪的；我已经对你犯了极大的过错，我也毁了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早就毁掉了，我已经忘掉它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了，"女伯爵说，"所以你不用把我摆在你的心上。你也千万别想我会睡在石板地上，靠面包和白水过活的，因为我永远不会这样——这不是我的做人方式。这不适合我。我将会找到一条摆脱一切的出路。喂，喂，我的情人，让我们这一回真的在大白天亲吻，互相希望对方称心如意，因为眼下是我们说再见的时候

了。”

“死，死，”舒曼医生说，好像是在对一个站在他们一旁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的幽灵在说话似的。“死，”他说，害怕他的心会爆裂。

“嘿，当然喽，死，”女伯爵说，她像沉醉在她的幻想中似的，“可是不是现在！”他们没有亲吻，但是她拿起他的手，把它贴在她的脸颊上一会儿。他在打哆嗦，所以几乎没法书写，好不容易才开出他答应过的处方和医嘱。他打开她的手提包，把写好的东西塞进去。他们不再说话。他跟她一起走到跳板前，把那个小手提箱交给她。她没有抬起眼睛。他望着她跨进一辆漂亮的白色轻便折篷马车，拉车的是一匹不漂亮的、毛皮邋遢的小马，接着他注意到两个相貌很普通的人坐上下一辆可以找到的马车慢腾腾地跟在她后面，保持着得体的距离。

“你有什么计划吗？”弗赖塔格和珍妮逗留着没有走，他问珍妮；这时候，学生们排成一溜儿，跳跳蹦蹦地跑过跳板，高声合唱着《蟑螂》。

“他们真讨厌！”珍妮说，望着他们。“压根儿没有计划。我在等戴维。”

“那么，我要去走走，”弗赖塔格轻松地说，“也许我们可以在岛上什么地方遇见喝上一杯。”

“也许。”他的越来越远的笔直的背影和显示出男子汉气概的大步子，使她想起了演员，一个通常一出场就在舞台上光彩夺目的、英俊的主角。他老练地在一小群零零落落的、模样肮脏的人身旁绕过去，那些人当中有男人、女人，还有一两个孩子，他们带着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上船来出售，一块块的麻布和丝绸，都

是不值一看的粗糙的小东西。一个皮肤很黑的吉卜赛年轻女人走到珍妮面前，好像她一直在找她，有好消息告诉她似的。“站住，”那个吉卜赛人用西班牙语说，“让我来告诉你一点儿奇怪的事情。”她走得这么近，珍妮闻到了她的呼吸里的胡椒和大蒜的气味，以及她的皮肤和巨大的、花里胡哨的红黄两色的长裙上散发出的没法消除的野兽的臭气。她握住珍妮的手，把手掌心翻到上面。“你在去一个对你不利的国家，而你现在的男人并不是你真正的男人。不过，你不久就会到一个比较好的国家去，然后你会找到你的男人。你还会在恋爱中得到幸福的，别烦恼。付钱，用银币在我的手掌上画十字！”她紧紧抓着珍妮的手，目光是精明和傲慢的，还咬着牙微笑。

“走开，吉卜赛女人，”珍妮用英语说。“你知道得不够多。你的脑筋太狭隘，拐不过弯来。我不要别的什么男人，这个想法叫我讨厌。我会坚持我熟悉的烦恼。在我的生活中，将会有许多比这个男人或者别的什么男人有趣得多的东西，”她用极严肃的态度向那个吉卜赛女人作出保证。那个吉卜赛女人盯着看，她的眼睛闪着怀疑的微光；她握着珍妮的手，拿不到硬币不愿走。但是，她们的手交换位置了——珍妮这当儿握着吉卜赛女人的手掌心向上的手，仔细地研究起来了。“你说的那些我都很喜欢听！现在轮到你了，”她用西班牙语加上一句，“你将要有一次漫长的旅行，遇到一个黑皮肤男人……”吉卜赛女人猛烈地把她的手一下子挣脱出来，退后一步。

“你在跟我说什么？”她怒气冲冲地说。

“我是在给你算命，免费的，”珍妮用西班牙语说，把一张一元的纸币放在她的手里。“你天生是幸运的。”

“上帝真保佑我，”吉卜赛女人说，突然变得温和了，在自己

的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她的黑糊糊的手指头弯起来，把那张皱巴巴的纸币藏在手内；一种彻骨的轻蔑、得意的神情，一种叫人极为吃惊的憎恨的流露，马上扭曲了她的嘴，使她的污垢下面的皮肤变苍白了。她旋转身子，她的许多裙裥转成圆圆一片的时候，她回过头来，扔下一句珍妮听不懂、但是从她的语气和神情上可以意会的话。她充满着信心，用她最好的西班牙语清楚地高声回答："你也是！"

"你真的知道她管你叫什么吗？"戴维问，突然出现在她身旁。

"对付得是恰当的，合适的，没错儿，"珍妮说。"反正她得到了回报。"

"你一定要跟吉卜赛妇人吼个没完吗？"戴维问，不过并没有好奇心。"你找到什么新花招吗？"

"等着瞧吧，"珍妮愉快地说。"别管闲事。"在寂静无声中，他们在跳板上走过去，正好在胡滕两口子和贝贝后面，在埃尔莎和她的父母、鲍姆格特纳两口子和紧跟着的汉斯前面。弗赖塔格先生已经看不见了；特雷德韦尔太太戴着一顶巨大的、扁平的黑帽，还——真叫人没想到——带着一把遮阳伞，跨进另一辆等着的折篷轻便马车，好像永远被载走了。那些学生挤进一辆比较大的交通工具，胳膊和大腿纠缠在一起，他们的脑袋紧挨着像一窝吱吱喳喳的鸟儿。

那个西班牙歌舞班子的人员一起走去，异乎寻常地沉默，眼睛盯着前面看，脸色呆滞、生硬。里克和拉克看上去仍然有一点儿蔫儿不唧、落后和沉着脸。妇女们都披着宽边的绣花黑丝披肩，孩子们穿着有很深的兜的短外套，男人们在这次航行中第一

回穿上极平常的成套的便装，只是裁剪得有一点儿过分贴身。他们全都打扮得齐齐整整，绝不会有模样极不体面的麻烦。一旦到了码头上，他们就收拢队伍，走在石头街道上，向小镇走去，好像他们赶着去赴一个迟了的约会。

紧跟在他们后面，每个人在他的行动中专注着他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汉斯和丹尼发现他们在跳板上胳膊肘稍微碰了一下。"他们往那儿走了，"丹尼说，心里又恨又沮丧，试图保持领先汉斯的局面；汉斯沉着脸，还是用肩膀粗鲁地推开他，超过了他，大声喊叫："这关你什么事？他们干吗不去他们高兴去的地方？"

火气别这么大，你这个大杂种，丹尼对自己说，接着出声说："到十字路口去干坑蒙拐骗的勾当，我敢打赌。"但是不再抢先了。这个大个子瑞典佬看上去是个结实的家伙，跟他纠缠没有用，不管怎样，现在犯不上。他试图从那堆跳舞的男女中找出帕斯托拉；那伙人这会儿稳稳地走在零零落落地穿过码头的人群的前面，等到丹尼和汉森上岸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见了。

统舱里的乘客留在船上，那些要在比戈上岸的挤在栏杆前，悠闲地靠着，专心地但是并不羡慕地望着码头上他们的同船的乘客正在被来照管他们的船员围起来，再一次点数。在上甲板上，约翰把他舅舅的轮椅推近跳板，把它靠栏杆放稳，他的眼光闪闪烁烁，心怦怦地直跳，试图从那些披着黑披肩的跳舞女人的摇晃着的和越来越远的俊俏的背影中认出孔查。他从他的心底深处发出一声那么强烈的绝望的叹息，使格拉夫先生吃了一惊，说："你有什么烦恼，亲爱的孩子，你在苦恼吗？"

约翰踢着轮椅的那个离他最近的轮子，震动了那个病人，他畏缩着，大声呻吟，东张西望，要叫任何偶然走过的人来做他这个不要脸的外甥的行为的见证。"这不关你的事儿，"约翰说，也

在东张西望，低声说。停在港口的这艘船上，人几乎走空了，一片寂静，使他们两人心神不定，好像一层保护墙被拆掉了似的。舒曼医生慢腾腾地走着，背着紧握着的双手，打算到他的房舱里去，但是又怕去那儿，在他们身旁站停了一下，“今天早晨，你看来气色挺好，”他跟格拉夫先生说。“我希望你旅途愉快。”

“我的灵魂是平静的，”格拉夫先生向他保证，语气里有一点儿不高兴，“不管是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任何地方。我在哪儿都没有关系。”

“这是最幸运的喽，”医生亲切地说，“最值得羡慕的。”

“这是个上帝的恩赐的问题，”格拉夫先生说，他对医生和外科医生的怀恨是牢固地建筑在对专业的忌妒和受神的启示这个基础上的；神启示他，他们阻挡了他的出人头地，妨碍了他，使他在治疗灵魂和肉体这件事情上没法自由自在地按照上帝的意志办理。“要是灵魂生了病的话，你所有的医药理论有什么用呢?”

舒曼医生温和地说：“这是医药理论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拿我自己来说，我尽力做好做人的本份，把其他的都交给上帝，”因为他总是甚至对心灵受到最深的折磨和信仰最错误的人都给他们恭敬的回答；这会儿，他对自己的罪孽所感到的痛苦，使他缓慢地陷入一个对一切痛苦的人表示同情的、巨大的、乌烟瘴气的、无形的泥沼，那里乌七八糟，一片混沌，他再也分不清侵犯者和被侵犯者、污辱者和被污辱者、出卖者和被出卖者、爱者和恨者，或者谁是讥笑者，谁是漠不关心者。这整座伟大的建筑物是以正义和仁爱这一对柱子为基础的，它从大地上升到永恒；人的灵魂靠着它一步步地从最基本的善和恶观念，人和人之间的简单的、日常行为的观念，攀登到对一丁点儿信仰或者感情，对教义的和人神相通的感觉的最精微的区别和选择——现在，正好

他站在那个快要咽气的小个子宗教狂热分子的身旁，那个小个子，憔悴不堪的脸上带着表示自己优越的假笑向上瞟着他的时候，这座塔楼摇摇欲坠，快要倒坍了。

奇迹是一刹那间出现的，但是不能被召来，而是自个儿来的，通常是在不大可能的时刻，发生在那些最意料不到它会出现的人头上。然而，奇迹利用一些奇特的助手。拯救医生的奇迹借用格拉夫先生的那太富有人性的一瞟，有意告诉医生他是个多么可怜巴巴的、不够格的、不像样的、贫乏的基督徒；这个信息像箭那样击中要害。医生受到的心灵感应像挨到一次闪电的袭击那样强烈，他的感情的烟雾顿时一扫而空，于是他面对事实，那是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但是他可以应付；他无条件地认识和接受了下来。他所陷入的悲惨境地，在过去这些日子里，在感情上如此残酷而犯下的罪行只是他道德崩溃的症状罢了：他过去拒绝承认他错待了女伯爵，他利用了她是个囚犯的身分，用他的有罪的爱情折磨她，而又拒绝给她——也拒绝给他自己——人间的爱情欢乐。他让她毫无希望地离去，甚至没有丝毫帮助或者搭救的诺言。真是个孱头，真是头猪，舒曼医生平静地对自己说，这是由于格拉夫先生的轻蔑态度改变了他的观点；不过，要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话，他不会只有平静，不会完全平静。

他用一声愉快的"早晨好"，驱散了跟格拉夫先生的弥漫着乌烟瘴气的神学讨论，走进一间小书写室，在那儿，他写了一封短信给女伯爵；他把信交给事务长，事务长是知道怎样把信交给恰当的警探捎去的。舒曼医生希望传递他对夫人的敬意，他给了她自己家乡城里的地址，还有他的电话号码和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总部的地址，并且热切地要求夫人马上给他写信，让他知道信寄到哪儿才可能随时找到她。他再次表示担心她的健康，

希望四点钟船启航以前得到一封回信。他在信尾自称是她的心甘情愿的和忠心耿耿的仆人。然后，他在船上的病房中转了一圈，在那儿他看到两个水手，他们都不再要诊治了，接着到统舱里去打了个转，那儿有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的肚脐眼有一点儿轻微的感染。这花去了他几分钟，清洗，敷油膏和包扎，但是这一天他终于没有事儿了，可以自由支配他的时间了，而他却不知道怎么打发。他慢腾腾地在甲板上转悠，发现格拉夫先生和他的坏脾气的外甥已经不见了，多少舒一口气；但是走路使他疲劳。最后，他屈服了，回进他的房舱去休息。他按照他习惯的模仿中世纪初期的肖像的姿势躺在那儿，交叉着两只脚，双手交叉放在中腹部，他的反常的痴心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他对他的爱情的不信任和憎恨——那一直只是一个漫长的白日梦。那个人也许注定得不到他或者任何人的帮助，一阵对她的强烈的悲伤像浪潮似的涌起，充满他的肉体和心灵，接着自动平息了。在任何人咽气以前就说他已经注定，岂不是胡说八道。一个挺长的补偿计划——它简单、明智、切合实际、无瑕可击——慢慢地、清楚地、稳扎稳打地展现了；他将为她提供生活费，保证她受到照顾和保护，保证她可以享受医疗待遇；她将受到监护，使她自己不可能再干出那种浪漫而愚蠢的自杀行为。这将是一件无可指责的、也用不着解释的善事，可以在远处办理，而他的妻子永远不必知道。他怀着习惯的亲切的心情想起他的妻子，她的一直被感觉到的、始终不变的分量，她的意想不到和总是在变化的软弱和忽发奇想。她是他的婚姻的中心、理智和意义，他的生活就是环绕着这场婚姻像有机体那样成长的；她不该为了任何事情受到干扰。他会为他的错事默不作声地作出补偿，作为一部分惩罚。舒曼医生陶醉在神圣的希望中，良心不再受到谴责，他

得到了安慰，心神安定，感到幸福地睡着了。

他在熟悉的吱吱嘎嘎、砰砰嘭嘭、嚷嚷咧咧的骚乱声中，在"真理号"这个老伙计的摇晃和起伏中，醒过来了；船又出海了。他一动也不动地在那儿躺了几分钟，欣赏着他的荒谬处境：在这样一艘旧船上，充满家庭气氛的混乱状态和在航海纪律控制下的严格情况混合在一起，天知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医生觉得神清气爽，心情愉快，微笑着。他从舷窗口望出去，看到那座隔开一点距离的岛已经裹在雾中，岛上那些零零落落的灯光，像圣诞节的蜡烛光似的在闪烁。他的宝贝儿在那儿，这会儿，她会知道她不是独自个儿，没有被抛弃，没有落到听天由命的地步，那个小小的任性的灵魂永远不应该受到严厉的对待。他知道她会在那座岛上待一段时间，直到他找出办法使她获得释放，心里好受一些；在这段时间里，那个服务员为什么不把她的回信给他呢？他要起床。事实上，进晚餐的喇叭声在响了；船长不在的时候，医生应该总是出现在餐桌旁。他在事务长的办公室里耽搁了一下，查问信件。那个事务长当然已经去进餐了，但是那个年轻的助理得到过指示，要给舒曼医生一个答复。他站得笔直，小心谨慎地说，那个警探已经把医生先生的信交给夫人。她当着他的面看了信，那个警探说，他乐于等她写好回信。

舒曼医生跨前一小步，伸出他的微微弯着的右手。"信呢？"他问，声音紧张。

那个事务长助理回答时好像在背诵。"先生，"他说，"夫人谢谢那个警探，说回信不写了。"

"戴维宝贝儿，"珍妮说，"让我们再来做旅游者吧。啊，瞧，瞧，"她如痴如迷地说，"这儿的一切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譬如说……?”戴维懒洋洋地问,头也不回。“棕榈树,你的意思是说?小驴儿?红瓦屋顶?赤着脚的、没有洗干净的庄稼汉?那一切我们在墨西哥都有过。那一切我们在西班牙也会有……”他们两人发现又处在最熟悉的困境中,对下一步怎么办完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坐在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一小片空地边的一条长凳上,旁边是一条有棕榈树和金合欢树遮阳的狭窄的、往上去的石头街道。

“嗨,还有骆驼哩,你这白痴,”珍妮耐心地说,“譬如说。骆驼在它们的驼峰上驮着许多东西,赤着没有洗干净的脚、包着头巾的庄稼汉们赶着它们。”

“只是在一个主题上变化罢了,我们干吗不能坐在这儿,让风景在我们面前经过呢?”

珍妮一时不愿接受这一点。她坐立不安,在寻找,戴维知道,除了风景以外的什么东西。她僵硬地探出身子,坐在长凳上,眼睛转来转去,两只脚结实地踩着地面,准备一有发觉就马上跳起来,跑开去;她确实跳起来了,挥着手,高兴地对埃尔莎和她的正费劲地从小道上走上来向小镇的市场中心走去的迟钝的父母喊叫,仿佛他们是老朋友和愉快的伴儿。埃尔莎稳重地挥手回答。吕茨先生和太太不停地摇着脑袋,脸色严肃,因为吕茨太太不赞成埃尔莎的看法——珍妮在房舱里的所作所为像个品行端正的女人。珍妮活泼地说:“好吧,戴维,你待在这儿泡蘑菇吧。我跟邋遢的吉卜赛人一起去啦,啊!”戴维被留下,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考虑这个事实,这个无法理解的事实,珍妮有时候情愿跟任何人作伴,而不要他。

一支小小的队伍懒懒散散地在他面前经过,珍妮、吕茨一家子,几步路后面是弗赖塔格和特雷德韦尔太太,斯波肯基克小姐

和里贝尔先生跟在后面不远的地方，跟往常一样吵吵嚷嚷，粗野鄙俗，摇摆着手，叽叽呱呱。鲍姆格特纳两口子稍微落在后面，汉斯在他们中间。那对新娘和新郎走在相当后面，互相挽着胳膊，他们低着的头靠在一起，他们的脸上显示陶醉在如痴似迷的性爱中的幸福的光。戴维感到一阵强烈的带着性冲动的忌妒；他们始终是那么谨慎，显然他们认为没有人看见他们；他们眼下正处在蜜月旅行的高潮中，这是明摆着的。新婚的腼腆在渐渐被克服；他们两人的眼睛都洼下去，而新娘的脸颊上有疹子。要是他们早晨待在甲板上的话，他们会睡着在他们的躺椅里，手紧握着。下午，他们消失不见，在晚餐时出现的时候，筋疲力尽，默不作声，脸色平静，不泄漏一点儿他们的心情，只有在交换眼色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才……

戴维突然站起身来，摇摇头，浑身燥热，一阵热血涌到他的一切生命活力的关键部位——他的神经中枢像烈火在焚烧，他的脑子里是一片乌烟瘴气的强烈的精液状的形象和感觉，他讨厌这些，因为它们给他快感。他向前走去，存心跟随珍妮。新娘和新郎这时候看到了他；他们挽在一起的两条胳膊马上垂下，新娘悄悄地把一只手伸进新郎的那个弯着的胳膊肘；他们相当僵硬地走掉了。

戴维觉得像个蠢货。他对所有那些受到色情场面、音乐、某些话或者读物，受到舞蹈，受到肮脏的故事的刺激而引发色欲的叫人讨厌的想象力，无比轻蔑——什么偷窥者啊、偷听者啊、偷摸者啊、玩反常的性游戏的啊、勒脖子[①] 的啊、脱衣舞迷啊，或者只是做白日梦的，他们只要坐着不动，眼巴巴地望着天空，就

① 这是一种性欲变态者以窒息自己的呼吸来获得性快感的做法。

能经历性欲亢进。至少，他自己的办法是干脆的。一旦有这方面的需要，他就去找一个对象。有一两次，他尝试冒险在矿山营地上找一个固定的姑娘。但是这样做几乎马上会造成难舍难分的局面；他真弄不懂娘们儿。他愿意打赌，世界上没有一个妓女不相信有个男人会出现，爱上她，把她带走，去过豪华的日子，或者至少消消停停的日子。她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梦想结婚——听说有过这样的事儿。一个邋邋遢遢、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姑娘，指甲黑乎乎，美丽、浓密、光亮的头发里长着虱子，吸引过他。他把煤油浇在她的头发上（她不信任那玩意儿，不懂得怎样使用），接着在他的狭小的、有围墙的院子里烧了几加仑水，在露天的阳光里，把她从头到脚，好好地擦洗干净，包括长毛发的部分和手指甲。他干完这事儿以后，给她淋上他的西印度月桂油香水。他为这次寻欢作乐准备得太周到了，等到事事办妥，发现已经兴味索然。结果，他给了她五个比索打发她走，叫她完全摸不着头脑。她在穿裙子的时候就事论事地问他："你干吗不娶我？我会做个好妻子的——我懂得怎么做！"他解释说他还不准备结婚，她便高高兴兴而且信心十足地走了，但是从她的神情和态度看，明摆着她把他看作是个被阉割了的人，或者是个有特殊爱好的外国人，因为她一边走一边在说："你觉得像个男子汉的时候，你要让我知道！"

得了，他的思想绕了一个多大的圈子才走出这个一团糟的局面。他等那对新娘和新郎走过后才加入了这个零零落落的漫游的队伍。他没法不注意到珍妮这会儿跟弗赖塔格和特雷德韦尔太太走在一起，当珍妮突然高兴得跳起来，兴奋地向前指的时候，他生气了。人人都站住脚，转过头看去。戴维也这么干，他看到了一个景象，奇特、以前没有见过、美丽；过了那一天，他不

会再见到，或者始终不会忘掉。

一个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像芭蕾舞女演员那样柔软而结实，穿着一套短短的紧身黑衣裙，现出她赤裸着的棕色大腿，她的头裹在一方小小的黑披巾里，额头上覆着一顶很小的帽子，跟玩具娃娃戴的一样小，不知道是用什么办法在发髻下固定着；她猛地穿过他们在走的小道，跳上他们前面的岩石斜坡，敏捷地转向一条更窄的小道，步子跟鹿一样稳健而活泼。她的头上顶着一个平底大盘，盘子里摆满一个个陈旧的白铁皮水罐；她承受着这个重量，穿着一双旧网球鞋，飞也似的上山去，几乎像在小跑，肩膀一动也不动，下巴昂起着，屁股夸张地摇晃，两条胳膊伸开，像两只翅膀。

那些旅客看看周围，发现不是只有那个姑娘一个人。在那天其余的时间里，从四面八方的每一个地方，他们看到运水的女人们在这座岛上上上下下，她们大都是年轻漂亮的姑娘，鼻子端正，嘴唇细巧，一身奇妙的西班牙人的乳白色的皮肤。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女人，也许三十上下吧，仍然保持着这份受过训练的运动员的美——“这活儿会在一个礼拜里让两个码头工人送命的，”弗赖塔格看了她们显然毫不费力毫不疲倦地这么不停地奔跑以后，佩服地发表意见。“她们没法坚持太久。”

所有的外国人都着迷了，关于这景象他们要一个解释。他们本来也许知道，这其中没有什么奥秘。他们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招呼了他们看到的第一个经过的岛民，一个头发乱蓬蓬、赤着两只脚、棉布长内裤卷到膝盖上的男人，他背上扛着一个奇形怪状的大包裹；胡滕教授先生盘问他这个现象。那个岛民是干接待外来的船这一行买卖的，对这些外国人知道得清楚，所以跟往常一样，开始谈起那些姑娘，说她们是很可敬的年轻人，从事

一种体面活儿谋生。他熟悉那些旅游者的——而且不仅仅是男人的——在牵涉到外国土地上的年轻女人品行时的奇怪观点。然而，他尽管长时间地跟一船又一船经过的旅游者打交道，却发现他们始终不明白年轻的姑娘们运水是一项简单、自然的日常工作，他没法消除自己对这一情况的惊奇。多少世纪以来，这是女人的一部分家务事嘛，她们不干谁干呢？她们都受年轻的姑娘必须遵守的严格的家规约束……她们被那个控制运水的公司雇用；当然喽，她们穿制服。说到这儿，他总是要再提到他们想要知道的一件事儿：每个姑娘戴在她的额头上的就在她的盘子底下的那顶玩具娃娃戴的小黑帽，那有什么意义？这他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岛上的居民问过这个问题。这是风俗，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她们的衣着的一部分。要是一个姑娘不戴那顶帽子的话，那就不准她运水。事情是再简单不过了，然而他们不明白。弗赖塔格问起了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她们干吗都长得这么美？"这时候，那个头发乱蓬蓬的人很高兴提供了他那个熟悉的回答——"我们在这个岛上没有选择。上帝赏赐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我们所有的姑娘都是美丽而纯洁的。"

这话总是受到沉默的尊敬，没有一次例外。

鲍姆格特纳两口子跟汉斯、弗赖塔格和特雷德韦尔太太，吕茨一家子和珍妮，胡滕两口子，他们两人赶上他们了，还有系着红领带的格洛肯先生，这会儿都簇拥在那个岛上的人周围。那个岛上的人对他们很了解，旅游者嘛，所以是没有文化的人呗，建议带他们去看一些景点，都是有相当历史的，只要每个人付一点钱。这是这群人当中哪一个都不愿干的事情，所以他们稍微

分散开，互相隔着考虑周到的距离继续走去，但是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而且迟早一定会为十许多相同的事儿在一些相同的地方遇见。格洛肯先生不可避免地一路掉在后面，只得减少歇息的时间。他在经过戴维的时候，友好地向他挥挥手，闪现出费劲的微笑。“赶快啊！”他帮忙地大声说，“你要落下啦！”

戴维一路跟在后面，保持着看得见的距离，但是并不打算赶上他们。他带着几分高兴的心情想着，人人穿着他们临时手忙脚乱地拿来应付的海滨服装和不对头的皮鞋，看来不合适得离奇古怪。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甚至珍妮穿着那件松松垮垮的像袋子似的黄麻布连衣裙，也显得难看；她不管时间和地点总是以料子是手织的为理由，坚持穿在身上，要是她自己能看到，那就好啦！在极清新的空气中，在棕榈树荫下，在洒落在那些歪歪斜斜的狭窄的老街——因为他们已经正在走近小镇——上的斑斑点点的阳光中，他们才现出他们的可怕的迟钝，包括珍妮。加尔萨神父和卡里洛神父穿着飘动起伏的黑法衣和侧面有松紧带的便鞋晃晃荡荡地走着，戴在他们严厉的脸上方的那种平顶、卷边的帽子硬得像板；他们像鸵鸟那样迈着大步赶上和超过那伙拖拖拉拉的观光者。

戴维稍微考虑了一下他的情况，承认看来是没有希望的——然而，不是一直是这样的吗？他一直是人在一个地方，心却在想要到另一个地方去；他一直是一陷在一个困境中就无时无刻不在计划脱身而出。他从来没有认识过一个他可以信任的姑娘，而珍妮使他忍无可忍了。不过，他没法恨她——或者说，还没法恨她，间歇性地发脾气的时候除外。不管他们相互之间的感情变成了什么样子，现在甚至可以算是一种爱情了，他想，不过，如果是爱情，没有了它，他们两人都会比较好一些……怎样好一些，或者以

什么方式比较好一些，他心里没有底。好像这有什么关系似的。他的心情变得宽容了，他随即急忙往前去，赶上了珍妮，抓住她的胳膊，而且在他经过弗赖塔格、特雷德韦尔太太和其他一些人身旁的时候，一一跟他们打招呼；他向她吐露了他的行动计划："珍妮天使，我们去找一家好小馆子，尝尝这个国家的葡萄酒，来点牛肉红肠？我饿了，我们先吃点儿，随后才到处去看看。"

珍妮说："我们走。"微微跳了一下。他们突然一下子加快速度，跟其他人拉开了相当一段距离，来到一个有不少店铺和酒馆的场所。因为家家酒馆的模样和散发出的气味都差不离，他们试着挑一家，碰巧看到有一家的门上有块牌子上写着：免税。"我们去这家，"珍妮说，"来吧，戴维宝贝儿，让我们忘掉烦恼吧。"他们在那张靠近一扇幽暗的小窗的桌子旁坐下的时候，看到歌舞班子的人员在从另一面走进这个场所。他们涌进一个装饰着绣花披肩和抽纱边的亚麻布用品的门洞子，纷纷扑到陈列着的商品上，而里克和拉克在铺子外面的一个柜台旁乱摸、乱拉、乱扯一卷卷的料子。那个女铺主冲到外面去把他们吓走，然后回进来警惕地注视着她的顾客。戴维说："看来更像一场洗劫，而不是逛店铺。"珍妮接着说："很可能是洗劫——"他们懒洋洋地说着话，继续在品尝从靠墙一个个排着的酒桶里舀出来的种种加那利群岛的葡萄酒；他们要了一大盘香喷喷的西班牙辣椒和红肠就酒，品尝马拉加白葡萄酒啊、麝香葡萄酒啊、马拉瓦西亚葡萄酒啊，还有一种岛上酿造的"三杯牌"白兰地，后来还要了一种跟咖啡一起喝的橙子酒，这勾起了他们对库拉索橙皮甜酒的遥远的回忆。丹尼走进来，几乎亲切地招呼他们，跟他们坐在一起，好像他受到了邀请似的。

"上帝啊，我累坏了，"他开始说。"我拼命地跑，几乎把这个

岛跑遍了。你们知道那些头上顶着盛水的白铁皮罐的姑娘吧？嘿，其中有个姑娘对我看了一眼，我真没想到；要是她穿着搬运工的制服的话，我就会知道她是哪种人——所以我跟在她后面，想着她很快就会停下来，准备来一次——来——"他咽了一口唾沫，望着珍妮，"来一次小小的社交活动，天啊，她却像一头山羊似的在那些石脊和小道上踩上踩下，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到一所房子前，几乎并不停住脚就能稳住她的盘子，弯下她的膝盖，一个女人会走出来，提走一罐水，放上一个空罐，她随即急急忙忙地飞快跑去，我跟在她后面，伸着舌头。有两次，她突然往回跑，从我身旁经过，每一次都用那种眼神看我——她没有笑，只是用闪闪发亮的眼睛看我。……你在喝的是什么？"他问戴维。"给我要一杯，好不？我不会讲外国话。我不知道那些酒名怎么说——最后，我估计她快要干完了，这会儿，除了空罐，什么都不可能有了，所以我跟着她着实走了一程，她来到一种摆满大桶的长棚前——那些都是极大的水桶，那儿坐着许多姑娘在休息，还有许多姑娘把又灌满了的水罐放进盘子。不过，我那个姑娘没有休息，她又顶着满满一盘水，像一只逃走的猞猁那样在我身旁经过，这一次，她只对我看了一眼，用西班牙语说：'开开玩笑，开开玩笑'……这话的意思我懂。老一套的搪塞。得了，我把供水场附近的情况看了个遍，断定什么都干不成……"

"没什么嘛，"戴维说，"等你时来运转吧。"

"瞧那个帕斯托拉，喂，"丹尼说，举杯喝第二杯马拉加葡萄酒。"这玩意儿太甜，有没有比较冲的？"

"她就在街对面那家铺子里，"珍妮怂恿地说。

"让她待在那儿吧，"丹尼说，"暂时。我实在没有要看她的意思。现在我对是不是再见到她毫不在乎。我开始在想西班牙

女人是明摆着极反复无常的，"他说，"看来你没法让她们乖乖地跟你在一起待到事情有点儿眉目……"

"哎，你已经观光过了，"珍妮说，"该由戴维和我去当一会儿旅游者了。"戴维用美金付了账，而找回来的却是一把西班牙硬币。

"你还是赶快去的好，把这些钱花了，"丹尼说。他摇摇酒杯，示意再要第三杯，几乎哀求地说，"白兰地怎么个说法？我希望你们不要都走，撇下我独自个儿。我会落得挺狼狈的。我心情不好。要是我再喝上几杯的话，我可能会走出去把那个帕斯托拉揍得屁滚尿流——"

"除非她先揍你，"戴维高兴地说，"她比她看起来更结实，而且还有一帮结实的人跟她在一起。"

"你干吗不去找宪警的麻烦？"珍妮问，她已经看到有两个壮实的大个儿宪警在码头上，戴着亮晃晃的三角帽和绷紧在身上的制服，看上去结实得像核桃。"你干吗要找一个姑娘麻烦？"

丹尼出人意料地显示出逻辑性，甚至模模糊糊地、极微细地显示出一丁点儿埋藏已久的正义感，甚至是道德性，甚至可以过度地引申说，显示出伦理观。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显示出常识。

"因为她是叫我大为恼火的人，"他干脆地说。"宪警跟我有什么相干呢？"

珍妮深切而友好地对他微笑，但是她想到了他可能认为这是一种有心勾搭的暗示，马上收起了笑容，却说："你说得真对！戴维，你听到那话了吗？丹尼先生刚才说出了荣誉准则中的一条重要的规则。"

"没有……那是什么？"戴维不自在地问，但是珍妮毕竟是个完全无害的蠢女人。"嗨，别跟任何你对他不恼火的人打架呗，"

她说。“别恨错了人……要运用你的判断力。”他们走出去的时候，都对丹尼挥挥手。他皱着眉头，紧盯着他那个有一半酒的酒杯。他拿不准那个口没遮拦地冲撞人的妞儿是不是在取笑他。得了，等他下手去勾搭她，那将会是在正月里的一个大热日子[①]。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独自个儿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棵树底下，一张桌子旁，有一点儿不自在——尽管一个脸色阴沉的老头把一个杯子和一条陈旧的餐巾摆在她面前，那所营房似的房子里不断散发出油腻的气味，她还是没法管那东西叫咖啡——她把她的玫瑰红的围巾稍微往眉毛上拉拉，在她的咖啡旁摊开她的记事本写起来：“那艘船上，数不清的、各种不同的分子这么不受限制地混合在一起，自然引发一连串最不幸的事情，这是缺乏纪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下层阶级只要有丝毫自由，就会傲慢无礼——”她把这一句念了一遍，断定她的愤怒破坏了她的文风，她在犯段落不清的毛病。她用笔把每一个句子划上细线，细线不粗，没有把句子涂没，而只是起到否定了这些句子的作用，使它们成为在将来应该避免的一个有关写作训练的例子。她开始写：“整艘船上，都是他们这种人，到处都是，像一群入侵的耗子。我一直注视着他们，知道他们在无孔不入地偷窃。我没法清楚地指出他们在偷什么，也没法确切地说明他们的方法，因为我没法凑近去看个一清二楚。我感到他们带来了一场瘟疫，他们在周围散发真正的超自然的邪恶气味。”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停下来，带着惊奇和喜悦的心情念这一句。这一句是怎么

---

① 此系直译，意为“不可思议”或者“荒谬绝伦”。

写出来的？是她写出来的吗？还是她从别的什么地方看来的？她记不起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她当然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这样的事情。说真的，有这样一种气味吗？她一向信奉一句谚语：脏东西是摆错了地方的东西。它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证，要把社会地位低微的人摆在他们所属的地方。这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但是使她又想到这个题目上。那个歌舞班子的人员，还有这次航行中头等舱里的一些人，当然是摆错了地方的，后果正在十分明显地被看到……

“那位不幸的女伯爵，”她写着，“她眼下在哪儿呢，被抛弃了，这座死人岛上的一个囚徒？”里特斯多尔夫太太仰起下巴，转动眼睛，瞟了半圈，看到了一幅忙忙碌碌的景象，各种各样年纪的男人、女人、孩子，简直是一拨形形色色的家畜，带着难以想象的爱好忙乎着他们各自的事情。这样可怜、寒碜、神情疲劳的人为什么要活下去呢？这是她的一个大问题，他们到底能不能说是活着呢？

隔开不到十英尺，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她周围的一些篮子里盛着正在蔫下去的、准备出卖的东西。她交叉着膝盖，用大腿做成一个摇篮，把她的娃娃放在里面，让他贴在她露出的奶头大得像大拇指的大胸脯上，而她在狼吞虎咽地吃着一张硬邦邦的、烤得半生不熟的、没有发酵过的圆面饼，饼里包着红葱头、西红柿、红肠和杏儿。那个娃娃喜悦地咂着奶头和踢着脚。这会儿，她放下了在吃的东西，在照料顾客了。他们拿着棕榈叶织的袋子盛蔬菜，她从身旁一个扁平的小篮里取出钱来，找给他们。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对这景象是这么恶心，她没法拿起她那支铅笔。娃娃长得胖乎乎，显然已经断了几个月奶了。那个女人的脖子、脸和手上的皮肤像陈旧的皮革，两边的牙齿都掉光了，用门牙撕

开和嚼烂食物，然而吃起来像头狼。那个娃娃从她的大腿中间爬出来，站直身子。他只穿着一件刚好遮住他的肚脐眼的衬衫。他站稳脚，叉开腿，摆好姿势，他的细小的男性生殖器竖起来。斜指向天空，非常有力地喷出一道闪闪发亮的弧形的水线，嗒嗒地落到离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的纯洁无瑕的浅色皮鞋和透明的丝袜不到三英尺的尘土上。她是那么吃惊，差一点没叫出声来，只是很快地站起身子，往后退，裹拢她的裙子。那个做母亲的不明白她的动作，也不明白她瞪出的眼睛，因为她带着无限的爱和温情伸出手去，鼓励地拍拍她娃娃的脊背，这时候，那个娃娃已经干完了他的正经事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发出欢乐的、心满意足的闹声。做母亲的把他拉回去，用空着的手遮住他那个可爱的、叫人害臊的玩意儿，开心地向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微笑，骄傲地大声说话。"Es hombre, de veras[1]！"——他是个男的，没错儿！——好像这说明了一切，成为女人间的一个愉快的秘密似的。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收起她的东西走开去，吓得浑身发冷，毛骨悚然，好像从过去中伸出了一只皮包骨的手冷冰冰地紧紧抓着她，在把她向无知、贫穷和牲口过的生活的泥沼中拉去，她从前差一点——啊，差一点逃不出这个泥沼啊！他祖父母的那所泥土地面的小屋，那儿，什么猪圈啊、牛栏啊、鸡窝啊，都通向一个房间，全家人都住在那个房间里；她那个做鞋匠的父亲和做女裁缝的母亲的那座单调、寒碜的乡间木屋，他们觉得在他们的天地里，地位已经升高了；他们对她最大的希望是当一个乡村学校的教师——啊，啊，啊，整个可怕的回忆在喊叫，不但以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设法忘记的那些去世了的人的声音和面目出现，而且

---

[1] 西班牙语，"确实是个男的"。

以那些牲口、闷得人透不过气来的墙、泥土的地面、臭气冲鼻的做鞋的皮革和她上学去带的涂在酸面包上的猪油的味道的形式出现——就是那些面包，又全都从她埋藏它们的那个深坑里冒起来了，一个个形象鲜明；它们用可怕的无声的喧嚷喊叫、悲叹和谴责她，毫无声息，像梦魇中的尖叫。那些地面、猪、面包、她的祖父母、她的父母，都用同样的声音，同样可怕的声音喊叫她听不明白的那些话，然而她知道它们要告诉她什么。里特斯多尔夫太太站着，微微摇晃，右手平贴在额头上。那个围着脏围裙的老头挺有礼貌地跟她说话，伸出一只手。“啊，对了，”她说，“我还没有付钱哩。”她接着小心翼翼地把确切数目的西班牙硬币，那是她从船上找来的，放在他的手掌里，另外加了几个铜子。她的耳朵里轰轰地鸣叫，脚底下的地面在摇晃，像“真理号”的甲板。“我一定在发什么病，”她用德语出声说，那个服务员用西班牙语同意地说：“是啊，是啊，太太，当然喽！”这使她认为完全是多此一举的废话。她一走动，很快就复原了；不过仍然闹不清她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儿。她决定回“真理号”，在那儿进午餐。她小心谨慎地在石块上选择道路，看到奥尔特加夫人带着她的保姆和婴儿坐在一种相当古怪但是漂亮的、叫折篷轻便马车的小型交通工具上，一路悠闲地、晃晃荡荡地过去（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烦恼，上巴黎她的丈夫一个成功的外交家那儿去），这就是说，那种马车要是配上合适的马和车夫的话，是可以显得漂亮的。她发觉自己累了，也可以为她自己叫一辆。她想到车费就担心起来，所以没有叫。她预见到，这样的浪费不可避免地会使她有一个寂寞的老年，在中产阶级的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成为一个在舟车上奔波的、年老体弱的家庭女教师，带着一份偶尔得到的假日旅游指南，容忍那些普通家庭里年轻、能干的女人不愿

照看的无法无天的孩子……奥托要是想象得到她会落到这样的结果的话,他会英勇地阵亡而一点儿不想一想她吗?他给她留下了什么?一个铁十字勋章、他的军礼服和剑。要不是他的父母把他的不多的遗产给了她的话,她今天会在哪儿呢?但是,啊,奥托,奥托,你要是现在看得见我的话,要是你能想象到我会变成什么模样的话,啊,你当然不可能白白地抛弃你的生命了。

她高兴地受到一两个船员的招呼。她在往下走回她的房舱的时候,遇到施米特太太带着她的编结的活计往上走。“这么快就回来了?”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问。施米特太太苦着脸说:“我看够了,都一个样。”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本来打算走过去了,一听这话,马上站住了脚。

“这么说,还是有些东西可以看看的喽?”她用自以为优越的居高临下的语气问;施米特太太发现这种口气是这么叫人恼火,简直无法回答。

“对那些眼睛看得见的人来说,”她说,“是有些东西的。”她从这样大胆的态度上感到她的头脑里不乏急智,不等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重振旗鼓,就向宁静而舒适的、空无一人的娱乐室走去。

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对她那个同房舱的伴儿的这句顶撞的话并非毫不介意,而是决定暂时不理它。她已经在她的思想里划了一条她不知道在哪儿的线,但是她已经把它撇在脑后了;她的心情出奇地轻松,好像她的脑子里卸掉了一个一直消耗她的体力和拖累她的大负担似的……她打开手提袋,取出护照盒,用两个手指尖在一个个夹层里摸索了一会儿,取出她丈夫的一张装在一个扁平的银相框里的小相片。哎,不对头——他不是这个

模样。她一看到这张身穿军服，盯着看的、没有生气的相片，没有光彩，没有颜色，清澈的眼睛空洞、冰冷，像玛瑙，总是使她心目中的那个英俊的形象受到损伤。不，不，再也不可能是这样了，再也不可能是这样了。她把相片放回去，把手提袋放到一边。她要忘掉那位已经忘掉她的、已经使她落到什么结果都可能的地步的英雄——对一个喜爱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一件多么自私、残酷的事儿啊！对，对，她要忘掉，她要另外找个丈夫，这一回，要找个真正的丈夫……这次愚蠢的航行结束以后，她要待在那个她所属于的家里，她要待在她那些自己人中间，那种男人会欣赏她的品质的……姓名、面容纷纷飘进她的脑海。她打开她的记事本，开始把他们一一写下来……"最要紧的事情最先做，"她轻轻地告诫自己。她的想象力漫步在以前没有见过的、仿佛春光明媚的景色中，那儿充满可能跟一些合适的人相见的机会，有些人认识，有些人不认识，都是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相会。一个个景象在她的眼前闪现。堂佩德罗一度闯人，但是马上被拒绝了，而她自己跟不断在更换的伴儿的无声的散步次数多得数不清，像一场场迷人的哑剧那样演下去，在这段时间里，她把自己的头发刷了几百次，没有数。她忘了进午餐。她一直在害怕家里人、她的朋友和她丈夫的家里人的迎接，他们一定会把她在墨西哥的经历看作她的失败，因为她在墨西哥的那个社交圈里的人一直急于把她跟堂佩德罗的恋爱的每个阶段都向他们通报——可不是，甚至通报到最后……还有，那个报应女神的出没无常的阴影，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会以一个蠢得像白痴的亲戚、外甥、表亲的面貌出现在她的门前台阶上，寻找她的亲族中的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人，她受过教育，走出家门闯进那个伟大的世界，所以毫无疑问是有钱的，而且会乐于帮助他们干同样的事

情。随着时间的过去,她的害怕越来越减弱,但是危险照样是现实的。她专心地翻看那本红金两色的通讯录,慢腾腾地一页页翻着,在这儿那儿的姓名上做一个记号:情况变了,电话号码也变了;人们找到了新家,他们的心也找到了新的住所;她千万不可盼望奇迹,但是她还是要写六七封信给一些她信得过会高兴再听到她的信息的往昔的仰慕者,有一个在不来梅,她会告诉他她乘的船的名字、她抵达的日期、地点和钟点,除非她已经完全丧失她的女人的直觉,他会站在船旁迎接她的,甚至跟在过去那比较快活的时候一样,捧着鲜花。

"嗨,戴维,我过去一直没有发觉嘛,"他们安全地走到露天的地方以后,珍妮说。"你是怎么容忍你那个同房舱的家伙的?"

"那压根儿不是我的房舱,"戴维通情达理地说。

"别咬文嚼字地挑毛病,"珍妮说,"你完全清楚我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是肆无忌惮的横行霸道。"

"起先,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他只是叫人厌烦的家伙罢了。不过,他刚才确实还算是行为检点的呐。我当时还感到惊奇哩。"

"也许是尾随别人弄得筋疲力尽了,"珍妮说。"让我们去买点东西。我们在古巴一样也没买?我们算得上哪门子旅游者啊?"

"你想要买什么呢?"他们向这场所的另一面一溜儿店铺走去的时候,戴维问。

"我说不上。我们互相送一件礼物吧。"他们两人在哈瓦那的时候那种着迷的情绪又有一点儿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他们握住了一会儿手,向一家家店铺的门洞子看进去。"没有篮子,"他

们经过的时候戴维说，珍妮接着说："没有玩具娃娃和动物，没有陶器，没有珠宝，不过，戴维，总该有件当地土著的艺术品吧，对不对？"

"也许是吧，"戴维怀疑地说，"可是没有凉鞋，没有皮革制品，也没有木制品。"

"没有抽花或者绣花的东西吗？"

"我才不要呢，"戴维坚决地表示意见。

"我们别去想这事儿吧，"珍妮相当疲劳地说，"我们只是一路走过去，时不时地随便看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儿。"

他们按照她的话去办，随便看看，果然看到了发生的事儿。特雷德韦尔太太和威廉·弗赖塔格从两扇门外的一家店铺里踱出来，扭动他们的手指头打招呼，戴维自己也感到意外地扭动手指头回答他们，没有一点儿勉强。弗赖塔格问："他们在哪儿？你们看到他们了吗？"

"他的意思是指我们的朋友，那些歌舞班子的人，"特雷德韦尔太太也带着异乎寻常的活泼的神情说。

"他们在那里面，"珍妮指了指，说，"或者是几分钟以前在那儿。有什么事儿？"

"他们答应过在这儿圣克鲁斯买奖品的，记得吗？"弗赖塔格问戴维。"哎，他们正在风风火火地采购——这倒是件值得看一看的事儿！"

"那我们就去看看，"戴维说，但是正好他们走进那家铺子的时候，里克和拉克冲出来了，跟他们在一起的大人跟在后面，一伙温和、安详的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无拘无束地闲聊，像一个人似的都向右拐，避开看热闹的人，很快地拥进隔开三扇门的一家铺子，两个孩子走在前面。

他们刚离开的那家铺子的女店主走出来，表示她对他们的看法。“小心你们的臼齿！”她对户外的听众喊叫。“数数你们的手指头！这种人不是来买东西的！”她脸色悲伤，双手颤抖，仔细整理她的掷倒了的、凌乱的商品，然后苦着脸对那几个美国人说：“十足地道的亚麻布，”她告诉他们，“真正的抽纱，全部手工的刺绣，货色精美，价钱便宜……”但是她显然没有存希望他们会买，那一天她不可能有好运了，她并不真的想吸引他们买什么。她伤心得没有心思去查明被偷走了哪些东西。

珍妮和戴维、弗赖塔格和特雷德韦尔太太跟在那些跳舞的男女后面走进隔壁的铺子。佩佩守在门口，往旁边退了一步，微微鞠了一个躬。那个店主在接待施米特太太，后者要买有朴素黑边、服丧用的、真正的亚麻布手绢。一伙形形色色的陌生人突然闯进来，女店主只瞟上一眼就分出哪些是体面的人和哪些是下等人，这使她心慌。她刚才曾把一盒盒正宗的服丧用的手绢给施米特太太看，但是那些手绢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不是太厚就是太薄，黑边不是太窄就是太阔，不是太贵就是太便宜。女店主在惊慌中收起手绢，尖声对施米特太太说：“夫人，我没法为你效劳！没办法！没办法！”因为她绝望地看到那几个体面的外国人站在后面，而那伙偷东西的男女正在向她扑过来。

施米特太太非常吃惊，态度这样的变化深深地伤了她的心，她往后退，看见她同船的乘客——不是那些西班牙人，她没有把他们算在内——那两个古怪的美国人，毕竟古怪而不赖，不由得喜出望外。她不由自主地记起了斯科特先生和他对那个统舱里的那个可怜的小个子木雕者的良好的感情——对每一件事情严厉、冷静和正确，像那个最充分地显示这种作风的船长，但是同时还富有人情味，爱他的同类，对可怜和不幸的人有怜悯心，真

叫人感动。她唯一的念头是在这个不友好的地方高兴地看到了斯科特先生的脸，哪怕那像一张蜡脸，眼睛像蓝大理石。那个跟他一起的年轻的女人她没法理解，那个寡妇她不信任，而弗赖塔格先生确确实实做了错事，居然真的去跟一个犹太女人结婚，丢掉了他的基督徒的身分……“然而，啊，上帝，”施米特太太伤心地说，用大拇指和食指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我该怎么办呢？死在孤独中吗？”

她走近那群人，他们都对她说话和微笑，所以她就站在他们附近；他们每人都用自己的、不同的方法在看，全都看到了同样的事情。歌舞班子的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在眼下的事情上，对旁观者显露出跟他们在船上显示的同样的大胆的轻蔑，完成他们排演得很熟练的活动；那就像是一场演出：安帕罗和孔查走到店铺的一边，两人同时拿起商品，喊叫女店主，大声地问价钱，分散她的注意力。马诺洛跟佩佩一起在外面。帕斯托拉和洛拉在铺子的另一边，不断地跟潘乔和蒂托嚷嚷咧咧地说话，时不时地拿着一件商品，风风火火地来到女店主面前，把她的眼光从安帕罗和孔查身上引开；这两个人值得监视，女店主的怀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伙人全都在不断地到处移动，还跑去给马诺洛和佩佩看打算挑选的商品，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回到货架前又取下一些货色，把它们分散和倒翻。里克和拉克来来回回，忙个没完，他们一有演出总是处在最佳状态，这会儿死乞白赖地要求和纠缠：“妈妈，请给我买这，给我买那。”不管是什么，只要他们能拿起，就挥舞着。严厉的洛拉于是会威胁说要揍他们，吩咐他们把每样东西放回到他们拿走的地方。几分钟后，仅仅几分钟，全班人马拥出那扇窄门，强烈地表示，归根结蒂店里没有值得买的东西，或者说他们决不会出这种高得像抢劫的价格！女店主被撇

在她的小店角落里，无可奈何地窝着一肚子火，她的一切商品是这么凌乱，她得花几个钟点去寻找、折叠和点数，然后才可能发觉偷掉了什么东西。

在别的场所，有别人亲眼目睹他们在继续干这种勾当。胡滕教授先生和太太遇见他们正在从一个极窄小的地方拥出来，在讥笑和嘲讽一个流露出气疯了的眼光的男人，他诅咒他们是一伙贼。他们发出叫人毛骨悚然的大笑，大模大样地跑去。胡滕太太对她的丈夫说："他们跟在船上的时候一模一样！难道我们什么都没法干吗？警察在哪儿？宪警呢？他们看来挺能干嘛。他们在哪儿呢？我们干吗不去叫他们？"

胡滕教授先生亲切地紧紧抓了一下她的胳膊；没错儿，她有一种他认为最讨人喜欢的品质，尽管她已经失去了青春，美貌，苗条，布满蓝色微血管的乳房，洼下去的、香喷喷的胳肢窝和结实的、玫瑰色的下巴，她这个品质还存在，这就是，她那个永远不变的、女性的愚蠢的信念：世界上有一股力量，它唯一的用处是，只要它一旦被要求去拯救无辜者和被压迫者，它就一定会赶去……

"叫警察，"她说，这个可爱的白痴。

"听着，我亲爱的人儿，"他说，"这不是一个我们熟悉的国家，它的风俗对我们是陌生的。他们不可能喜欢我们，我们来自另一个国家，说另一种语言——"

"我们的西班牙语跟他们说得一样好，也许更好些，"胡滕太太带着女孩子的虚荣心说。她的丈夫现在时常跟她作爱。她跟他在一起像个新娘似的充满信心。自从那一夜那个可怜的巴斯克人为了搭救贝贝淹死以后，她的丈夫似乎又恢复了基本的男性状态，这使她觉得也变成一个年轻的妇人了。她开始注意起自己来，计划她该干些什么来保持她的吸引力；第一件事，减肥。她头

发中的一缕缕灰白色一定要染掉。她的丈夫毫无疑问会在一所良好的德国大学里找到一个教授的职位。她会要求他雇一个秘书，豁免她干搜寻资料、打字和校对校样这种种苦活儿，那是一个教授的妻子的整个乏味的生活。她要为了爱情腾出身来。

“你说得对，”她说，搂住他的胳膊，“这不是我们的事，压根儿不是。”

施米特太太跟着弗赖塔格和他的两个朋友走了几步，来到街上，但是她听到他邀请他的同伴去喝一杯，这当儿，她站住了脚。事情太明显了，她是不包括在内的，事实上，他们看来好像也没有理她。当然喽，这不是，不可能是，他们有意表示对她不礼貌；他们是心情愉快、不拘小节的人，只想到他们自己。施米特太太有正当的自尊心，在她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始终跟她在一起；尽管她可能受到了伤害，新近丧偶心灵变得脆弱，但是她情愿死也不会强迫自己出现在不需要她的地方。她站住脚，买了一小袋蜜饯水果，然后回船去。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尽可能地不让人看见，因为她知道得很清楚，只有没有教养的人才会被看到在街上吃东西。她只能希望没有被人看到。

格洛肯先生心里没底地在找一件使他的寒碜的服装变得漂亮的装饰品，羡慕地摸摸只有男舞蹈演员围的猩红腰带、可爱的有褶子的假前胸、斗牛士用的卖俏的窄衬衫领子。领带不是那种窄黑带，就是那么色彩艳丽，只能用在化装舞会上或者其他穿花里胡哨的服装的场合上。他贪婪地摸摸一条上好的丝围巾，是他喜欢的那种颜色，大红的，正在鼓起勇气来想要问价钱，尽管不问就知道他是一定买不起的，这时候，那个女店主现出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对他亲切地说：“进来——我里面有许多更好

的东西，价钱不贵——”

格洛肯先生没有那么蠢，认为她那张硬邦邦的脸上有一丝卖弄风情的迹象。她有要求，不过是什么呢？接着，他听到歌舞班子的人的再熟悉不过的讨厌的声音；那个女人急切地说：“请进来，帮我看住他们！”他跟着她进去，与其说是帮忙，倒不如说是保护；他把驼背挡在那些折叠着的披肩和头巾上。

他看到那个女人精明而谨慎。她用刺耳的声音招呼那些闯进来的人，吩咐他们都站在外面，进来一个人，只许一个人，不管他们选择谁进来买东西。好像她没有说过什么话似的，他们冲进来，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开始拉东西，问价钱，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争论。扎查看到格洛肯先生试着躲藏。她愉快地喊叫：“啊，瞧，我们的带好运来的人来了！”说罢，她扑过去碰碰他的驼背。接着，每个人轮流地挤过去碰他，引起一片混乱。他为了保卫自己，更向披肩里面退去，两只手平摊着护住两个肩膀。但是不管他用什么法子，也不管是他身上的什么地方，只要他们能碰到，就碰；他们用摊开的手掌狠狠地掴他，直到他受不了。他在惊慌中突围而出，逃到户外，里克和拉克在外面望风，尖叫着追赶他，也要捞到他们的那份好运。他鲁莽地飞快地冲进鲍姆格特纳一家子中间，还冲到了就在他们前面的吕茨一家子中间。吕茨太太那份做母亲的责任心又受到触发，马上作出了反应，她一下子用脚绊倒了里克，把他摔了个仰八叉，抓住拉克的胳膊，大快人心地掴了她一个耳刮子，然后严厉地跟格洛肯先生说：“你干吗不保护自己？你刚才在想什么？”

格洛肯先生非常伤心和羞愧，低声下气地说：“我刚才没有想什么。就像是掉进了蚂蜂窝。”

他们走近那家铺子，但是没有人敢进去。铺子里到处都是

西班牙人，那个女店主没法同时监视他们所有的人，她没法把他们撵出去，因为他们不听她的，但是，为了吸引她的注意力，洛拉使用了讨价还价的方法拖延了不知多少时间，还用了极快地说话和尽量贬低商品的办法后，终于掏出现金买下了一小方有抽纱的绣花薄纱。当时，两个孩子已经回到他们的岗位上了；那个绝望的店主被挤在角落里，喊叫着要他们都滚出去。就在洛拉递交货款，那个女人在数找头的时候，他们一古脑儿拥到了街上。那些看热闹的人看得清清楚楚，那伙人的形状都古怪地在有些地方鼓出来了，从安帕罗的黑披肩底下，垂着一条白披肩的有穗子的一角。

他们穿过这购物场所，叫住一辆由一匹可怜巴巴、瘦骨嶙嶙的大马拉的敞篷大马车。女人和孩子先一个接一个地挤上去，马诺洛、佩佩和蒂托蹲在踏板上，潘乔硬挤进去，在赶车的身旁。“快，”他说，“快，我们来不及了。”

“来不及什么呀?”赶车的问，“瞧，先生，这马车可以坐六个人，你们是十个人了，你要付给我十个人的车钱。我按坐车人数收钱。”

“这不是抢钱吗?”潘乔说，“我决不会付的。”

赶车的把马拉停。“那么，所有的人都得下车，”他说，使人相信没有一点儿商量的余地。洛拉向前探出身去，说：“我们怎么停住了?”声音里有一点儿惊慌。

“我们遇上抢钱了，”潘乔说，尽管说得不大有力。

“告诉他赶车，赶车!”洛拉尖叫着说。“蠢山羊，蠢骡，赶车啊。”

潘乔说：“你在跟谁说话? 闭上你这张大嘴!”

蒂托说：“听着，潘乔，你不是在跟帕斯托拉说。洛拉是指挥

这次行动的，别忘了。现在赶快走……”接着他跟那个赶车的说话；赶车的看来跟他那匹马一起睡着了。“你要多少钱？”

赶车的马上精神抖擞，说出了价钱。“而且我现在就要拿到钱，先生。”他神情安详，一副早有准备的模样，显示在这种耍花招的行动中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现在就要，”他说，没有拉起缰绳，伸出他弯着的手，这样不管是谁，只要有钱，就可以放在那个应该由它收的地方。蒂托付了钱。

吕茨一家子和鲍姆格特纳一家子到处转悠，享受着这个岛上提供的种种娱乐，包括这个国家的甜美的、有浓郁香气的葡萄酒，既叫人快活又叫人镇静。鲍姆格特纳先生比平时多喝了两三杯，还买了一瓶马拉瓦西亚葡萄酒，答应她的妻子，他今后用这种葡萄酒代替白兰地。他们现在总是无意中遇见人，鲍姆格特纳先生说，看来这是命中注定的，他们一会儿也摆脱不了那些邪恶的人，跳舞的男女——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破坏这次旅行，他们会破坏到旅行结束……”

“不，他们在比戈上岸，感谢上帝，”吕茨先生说，“统舱里剩下来的那些人也上岸。”

“那么，那将是一艘愉快的船了，”鲍姆格特纳太太跟吕茨太太说。

“我没法以为情况会改善到那个地步，”吕茨太太说，在平息一切希望，“不过，至少我们有权利希望船上会显得正派了。那些人啊，”她说，下巴向那辆马车摆动了一下，那辆旧马车像一个挤着过多的鸟儿的鸟窝，正在歪歪斜斜地驶去，“要是有公道这个东西的话，就应该关在这儿的监狱里——”

“去替换那个可怜的女伯爵，”鲍姆格特纳先生说，“我敢肯

定她是位无辜的、受疾病折磨的夫人，痛苦，可是不够坚强，忍受不了她的痛苦，只得靠麻醉剂来解除——”

“我一直不赞成那个女人，”吕茨太太说，“我找不到一个喜欢她的理由，不过我认为她为她的过错受到惩罚是不公道的——不是说她不该受惩治——而是那些比她更坏的罪犯却逃脱了惩治，没损伤一根毫毛……得了，你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指望呢？”

格洛肯先生隐隐约约地憎恨吕茨太太，她毫无策略地插上一手，固然解救了他，但是也使他出了洋相；他大着胆子开始说出事实。“他们今天到处在偷，他们一直在船上坑蒙拐骗——那帮下三滥——那两个孩子，两个小妖怪，偷了女伯爵的项链，把它扔进海去——”

“这事儿始终没有证实，”吕茨先生说，“没有人知道那是不是真的珍珠，甚至——也没有人知道扔进海去的是她的项链，还是一串念珠——”

吕茨太太突然用冷静、愤怒的话插嘴：“我的丈夫的近视眼很深，”她说，“或者说，他至少没有看清楚。他不可能知道那两个孩子在甲板上撞上我们的时候，是什么事儿……我确实看到了，所以我现在确实知道，尽管起初我怀疑，那是一串珍珠项链，有一颗金刚钻的搭扣。那两个古灵精怪的孩子偷了它，那个女孩子把它扔进了海。就是这么回事，”她挖苦地说。“这么回事。这是绝对够不上打搅任何人的，我们去关心这种小过错是不正确的——”

吕茨先生挨着个儿跟别人一一说话，用这个办法来表示对他的妻子的责怪，好像她不在场似的：“我可怜的妻子有极强的原则性，至少，只要是干坏事，不管多么细小，她都要求惩治，我

从来没有发觉过她忽略任何人的品德中的最微小的过错，她自己的除外。跟她说不管现象可能是怎样，情况可能指引什么，我们绝对不可以把它们作为确凿的证据来依靠，哪怕在最轻的案例中，跟她说这些是没有用的——"

吕茨太太坚决地大声说："埃尔莎，你也看到的，对不对?"埃尔莎一直默不作声地站着，胖得一堆肉，她望着别处，不向大人们看，也不在听，被吓了一跳，马上回答："对，妈妈。"

鲍姆格特纳先生心情激动，伸出手去，跟吕茨先生握手，说："可是你说话像个律师，像个好辩护人，很少能找到一个不干这一行的人却掌握了裁定证据的伟大原则，一切法律程序的关键……祝贺你！你也许念过法学系吧?"

"没有，不过我有几个好朋友是干这一行的。我的行当需要他们。他们给我出好主意。"

格洛肯先生正在为他的败退，他的逃走感到苦恼，他原该坚持阵地，亲眼目睹歌舞班子里的人干偷窃的勾当的，谴责他们，看他们一古脑儿被抓起来，拉到司法机构去——但是他没有表现得这么英勇，而是怯懦地逃跑了。他甚至让那位吕茨太太为他抵挡那两个孩子——孩子呀；多丢人现眼！他接着看到那伙跳舞的男女带着他们的赃物离去，其他一切人也看到，然而他们站在那儿，全都七嘴八舌地谈着这件事儿，没有一次承认内疚或者共谋……

"我们应该干点儿什么，这我知道，"他对他们大伙儿说；他们全都带着不同程度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俯视着他。

"你能想到干什么吗?"吕茨先生问。"在我的行当中，我们压根儿不注意小偷小摸的行为，我们在一个顾客那儿失去的，在另一个顾客那儿取得补偿。我们有一笔补全可移动的物品的预

算——你难以想象旅游者多么喜欢胡乱收集纪念品，这跟他们的模样多么体面不相干。所以我并不把这事儿看得多么严重——”

吕茨先生看看他的表，又看看太阳。就跟他们在昨天遇见的一个样，一团团巨大的乌云从东方滚滚上升。其他的人也看他们的手腕。鲍姆格特纳先生说：“我们晚了。我们要是步行的话，可能赶不上船了。”

“它会等我们的，”吕茨先生说。但是，在所有这些人身上，他们喝的葡萄酒所造成的蒙蒙眬眬的感觉和容光焕发的形象看来消失了。每张脸都对别人现出担心的神情，人人都不免有点儿惊慌，他们拦住了一溜儿折篷轻便马车，声势出人意料地显赫，赶到了跳板前，跳板确实已经在准备抽起来了。他们喘着粗气攀登上去，跟其他乘客汇合，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那些人一溜儿站着，看乱哄哄的启航景象的。传说海港外有大风浪。乐队开始奏《再见，我年轻的近卫军官！》，大量在码头上转悠的兜售羊皮毛毯和鸦片的叙利亚人散掉了。

防波堤和轮船中间的水面越来越阔，右面远处的圣克鲁斯又现出初见时候的美景，歌舞班子的那伙人默不作声地蜷缩在栏杆前，但是神情专注、气势汹汹、注意地望着岸上一个发疯似的在看的女人，她挥舞着两个拳头，对正在移动的轮船的上甲板尖叫着发出绝望的诅咒和谴责。一个战无不胜的模样的宪警离开他的巡逻的同伴，来平息这个不体面的扰乱。他握住那个女人的两个肩膀，转过她的身子，利索地把她推到那艘外国轮船和它的乘客看不见的地方去。防止发生这样的坏宣传，是他的一部分职责。这种行为使这个镇获得不友好的形象。“离开这儿，”他粗声粗气地吩咐那个女人。她用披肩围在她的头上走

掉，不回头看一眼。

珍妮和戴维把他们的胳膊肘搁在栏杆上；珍妮说："过了一个码头。喂——戴维，我要在比戈设法弄到法国签证——"

"要是我们在比戈停的话，"戴维说。

"眼下都在说会停的。所有那些跳舞的人……还有我都会在布洛涅上岸。"

"要是我们在那儿停的话，"戴维说。

"我们会作好离船准备，一艘小船会来接我们的，"珍妮说。"我们就乘上去。"

"谁说的？"

"那个事务长。"

"我们是谁？"

"特雷德韦尔太太、我和那些蠢头蠢脑的学生。啊，戴维，请你务必跟我一起走。甚至一想到你继续乘过去，就叫我难受。你独自个儿在西班牙要干什么呢？"

"你在巴黎要干什么呢？"

"这倒是个问题，"她说。他们绕着走，踱到甲板的另一边去。"我们今宿顺着非洲海岸线外航行……圣克鲁斯没有什么新鲜和奇特的东西，对不？在墨西哥都可能遇上，歪歪斜斜的老街、西班牙人的说话声音、小市场和各种颜色的灰泥——可是你注意到了吗，看来真奇怪，在镇上的新区内，真正的国际贸易就在那儿吗？你注意到砖墙上那块铜牌上写着英国西非银行支行吗？"

"哎，没有，"戴维说。"那又怎么样？"

"就在那一刹那，我感到离家遥远，是在一片陌生的，陌生的

土地上，而我不想待在那儿。”

“家在哪儿呢，珍妮天使？”戴维柔情蜜意地说；他的温情总是出人意料，能在她融点最高的时候把她融化；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对他眨眨眼睛，小心翼翼地微笑。

“我不知道，”她说，“我还是不知道，可是它远得很。”他们靠在一起，脸颊摩擦着脸颊，鼻子摩擦着鼻子，然后亲吻了。戴维用随便的、听不听都行的、或者甚至有点好像不指望被听到的口气说：“我们会在比戈弄到法国签证的；我们会在布洛涅港外面乘上小艇，然后我们第二天就到巴黎了。我不争论，珍妮。”

“你喜欢我搂着你的脖子喊叫，用我的鼻子擦你的领带，把我的眼泪滴在你的衣领上吗，宝贝儿？我不在乎谁看到我们，”她一边说，一边用一条胳膊勾住他的脖子，用头顶磨擦他的下巴。

“别这样，珍妮，”戴维说，“你以为我们在哪儿？”

她挺直身子，从她的衣兜里掏出粉盒。“嗨，我们晚些时候去西班牙，”她答应说，“去马德里、阿维拉、格拉纳达[1]，哪儿各处都去。戴维，你要是想的话，咱们先去西班牙，然后去巴黎……真的，宝贝儿，我不计较。在这以后，我不在乎我们上哪儿去。我们在希洪[2] 上岸，怎么样？然后去马德里。”

怒火在戴维的心中涌起，好像它刚才耐心地埋伏在附近，等待着被召回到它本来在的地方。这是她老一套的花招，坚持到他让步，然后突然向他表示一切都让步，假装那一直是她想要的，使他束手无策，无法防卫。不过，首先，他一定要让步。“我会停止的，你要是……”“你要是先干我想要干的事儿的话，我就会为你

---

① 格拉纳达(Granada)：西班牙南部一省，其省会同名。

② 希洪(Gijón)：西班牙西北部港市。

干任何事儿——”她既然已经又赢了，她完全赞成把胜利给他，向他显示，要做到大方、不坚持己见、跟他快活地取得一致意见是多么容易——每一件事情都是她一开始用不着这样一次次顶牛就会做的。这会儿，不用说，她已经完全接受了西班牙旅行，安排一切，从希洪出发，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在那个港口登陆。我的上帝，现在一切都要倒过来重新来一遍了。他的沉默使珍妮担心。

“戴维？”她说，温柔地靠着，用她的“溶化了的”的声音说。“你在想什么？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的地方去，走遍那个国家，然后我们到马德里，这不是挺好吗？”

戴维说，“干吗偏偏是马德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马德里，我喜欢在海岸线上逗留一些时间——也许是桑坦德[1]，或者是圣塞瓦斯蒂安[2]，或者一直到法国边界，到伊伦[3] ——”

“好吧，”珍妮说，“只要你喜欢，哪儿都行。”

“看来你好像忘了我们要去巴黎，”戴维说，“西班牙不去了，记得吗？我们一起去巴黎，然后我们会去看——”

珍妮把脸转向他，神情严肃，带着挑剔的意味，不是愤怒，也不是受到伤害，也不是受到威胁，也不是憎恨的表情——而只是用表示极为不满的眼光注视着他；戴维带着一点儿苦涩的幽默感认为，她是用不知提高了多少倍的声音在平稳地说话。

“我希望你有一次打定你的主意，戴维，就一次，然后保持不变，直到我们能把一件事情办完，或者对一件事情作出决定，或者甚至——得了，这就像你一直所做的那样，在九点钟带我走上

---

① 桑坦德(Santander)：西班牙北部一省，其省会为港市，同名。

② 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an)：西班牙北部港市。

③ 伊伦(Irún)：西班牙吉普斯省一区。

两英里路，到某一家馆子去吃饭，然后在门前改变主意，又走上一英里路，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所以不止一回，我们结果在街角上吃从一个锅里取出来的嫩玉米蒸肉……难道这次旅行又自始至终要弄成这个样子吗？我们干吗不现在就干脆离船上岸去，就此了结了这事儿呢？戴维，你想要什么呢？"

戴维让她的话落在他的耳朵上，就像雨点从瓦屋顶上滚下来那样。珍妮的性格中的泼妇的气质发作起来的时候，她整个人都变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毫无头脑的女性，满嘴尽是跟理智毫不沾边的话，除此以外，一无所有，这时候，戴维心中那个紧张的结才松弛，他愉快地感到他已经卸下了负担：不必认真对待她，不必使劲回答，不必解释或者安抚，任何争论都无关紧要，任何有关爱情的问题都失去它的意义；一个女人既然像在用帽子的饰针那样刺他，作为一个男人，他就一点儿也不欠她什么了，一刻也不用去注意她了，一星半点也不用照顾她了。他宽心地看到珍妮，这个这么特别的人，这个跟其他女人没有一点儿相同的女人，融化进没有姓名、没有脸、无法治愈的男人生活的瘟疫中，那个叽叽呱呱、忍受着委屈、不断谴责的女性首主教。离船上岸？为什么？他注意到在起风浪，船开始有一点儿颠簸。珍妮甚至在像女人那样说话的时候，说这话也是愚蠢的。

"我的主意打定了，"他说。"你刚才不在听，珍妮天使。我们去巴黎，这事定了，不再改变。"要办理和了结这件事儿，它看来好像跟任何地方一样好——柏林、马德里、巴黎，有什么不一样呢？"把西班牙搁一下吧。是开始安排法国的时候了。"

"你安排吧，"珍妮，神情亲切得好像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狠话似的。"我们将会看到在比戈会发生什么事儿。"接着，她几乎腼腆地说："我正在像从前那样要突然离去的时候，你这个亲爱

的情人却不跟我争吵。戴维，我并不指望你相信我的话，可是我快活极了——极了。请别去想我说过的话——"

"我再也不会了，"戴维说，使她放心；他心情很好，但是怀着恶意，这种恶意像内心的微笑那样扩展到他的全身。

进晚餐的喇叭声响了，但是他们耽搁了几分钟。船正在离开港口，海上的波浪是那么猛，那艘领航船差一点儿没被淹没。那个掌管舵轮的人浑身湿透了，要坚持在船上着实困难。

领航员从绳梯上爬下去，像一只蜘蛛下到它的网里去那样，钻进那艘几乎要翻身的领航船。他掌管着舵轮，船慢慢地向前移动。经过一番着实激烈的搏斗，引擎熄火了。领航员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稳稳地掌管着舵轮，抬头看着那阴沉沉地屹立在他上方的那艘轮船的高高的船头。珍妮说："啊，戴维，瞧他！"她远远地探出身去，取下她那块正方的红围巾，向他挥舞出一个个大圆圈，直到她引起他的注意为止。他用一个漂亮的挥舞的手势，取下他那顶素净的领航员帽也挥舞着，算是回答。戴维用双手抓紧栏杆，挪开身子，两条胳膊直挺挺的，一直僵到肩头。他打了个冷战。珍妮逗留着，她的头巾飘荡着，她的脸色柔和，充满欢乐和温情。戴维挽住她，把她拉走。

"让我们等着瞧他干什么，"她说，但是戴维对她这一天已经忍受够了。"他会干得很好，可是现在是进晚餐的时候了，"他跟她说，她顺从地走了；她这个顺从的表示带着极少见的、完全的欺骗性，但是表演得挺精彩。它通常是表示她已经想到另一件稍后要做的、使她感到更有趣的事儿。

珍妮干了第一杯酒，跟戴维照照杯，觉得——她说不出为什么——她过着一生中最可爱、最迷人的时光。戴维有点儿在独自个儿想心事。船在晃动，长长地、叫人头昏眼花的颠簸，足够

叫人的胃穴发冷，然而她却没有发冷。同样的乘客占用着同样的桌子，可不是，他们差不多到齐了，看来大致一个样。她没有喝醉，所以这不是那可口的加那利白葡萄酒在眼前形成的迷雾所产生的效果。歌舞班子的人员进来得稍微迟了一点儿，默不作声地坐下，皱着眉头，甚至里克和拉克也不像平时那样精神抖擞。珍妮跟戴维说："我听说，他们为了那串珍珠项链把两个孩子狠狠地揍了一顿——揍得他们失去知觉。可是，看来他们好像还不错嘛，对不？"

"谁跟你说的？"戴维问，"我没听说过。"

"威廉·弗赖塔格，"珍妮说，"是那个事务长告诉他的。那些学生跟着女伯爵到那家她住的小旅馆去，还从市场上买了一车鲜花，靠在她窗下的墙上，叫佣人们挂在她的阳台上。可是她不肯出来，不肯跟他们说话。"

"这是谁告诉你的？"戴维问。

"弗赖塔格，"珍妮说，"在我们上山的时候，那会儿你躲躲闪闪地落在后面。"

"躲躲闪闪，"戴维重复着说，在想心事。接着他问："弗赖塔格怎么知道得这么快？"

"一个秘密警察看到的，他在咱们离船以前，就回来了。"

"我想不出，"戴维说，"他们怎么有时间干这一切。"

"可是，是有时间的嘛，"珍妮说，"事情的确发生了。"

戴维改换话题。他带着几分好奇心看着那些西班牙人。他们极认真地在进餐，不说话，难得仰起脸，大口大口地吃着。

"他们倒不如当德国人的好，"戴维说，"不过，一下午混在顾客堆里，在铺子里偷东西，也该肚子饿了。"

珍妮轻轻地拨弄她面前的萎蔫的生菜。"你认为他们没法

在那个岛上弄到一些新鲜的蔬菜吗?”

“也许伤寒,或者霍乱吧,”戴维说,省略掉动词,为的是不耽搁他享用嘴里的那些酸菜咸猪蹄加豌豆泥,更不用提那堆炸红葱头了。

“尽是些老顽固,”珍妮说,她在墨西哥的生活使她远离细菌这个问题的威吓,使她对那把一切吃的和穿的东西煮沸的外国人产生一种由衷的轻蔑,使她惦起一切可爱的水果和印第安人的村子里的热气腾腾的瓦煲里煮出来的香喷喷的墨西哥食物。眼下,她不饿,或者说,对这一切结实的、把肚子塞得发胀的玩意儿不感兴趣。她又在对戴维的胃口感到奇怪了,不管怎样,他总是照吃不误,像一只特别贪嘴的鸟儿抬起它的喙裂的嘴,吞下不管是什么在它前面晃荡的东西。至少,他吃相挺好,不狼吞虎咽,不发出难听的咀嚼声和吞咽声,不塞着一嘴吃的东西说话。那些啬刻的阿姨、姑妈也许让他饿得慌,但是她们教会了他怎样有礼貌地吃她们给他的那一点儿东西,不过,真叫人惊奇,他有条有理地吃个不停,越吃越少,最后吃得盆底朝天,然后他去加一点儿。他不在他面前留下一丁点儿面包皮或者一小口任何菜,不但在早餐、午餐或者晚餐桌上都是这样,而且在上午十点喝肉汤或者在下午喝茶吃三明治的时候也是这样。然而,在他的眼睛东张西望,向下看和向两旁看,寻找另一口食物的时候,他的眼睑现出一种可怜巴巴的、紧张的饥饿相,他的嘴微微张开,现出一副好似被人忽略的孤儿的神情;每一次珍妮看到他这个模样,心就会硬起来。她的欢乐的情绪就变成恶作剧的心情,便开始修改戴维的身世。一个被小精灵偷换而留下的孩子[①],

① 英国民间传说中,被精灵偷换而留在人间的又丑又蠢的孩子。

不用说，他就是这样的人。那些顽皮的小精灵前来从摇篮里偷走一个母亲的亲生儿子，留下一个她们的小怪物代替。你已经有一切迹象，我可怜的戴维。那个孩子吃啊吃的，吃个没完，但是不长一两肉，而且老是肚子饿；不管他被人爱得多深，他从不回报爱心；他没法感受自身的或者别人的痛苦；他没法为任何事情啼哭，也不在乎他为每个人惹出多少麻烦；他拿取他能得到的一切，却始终什么也不给，然后，有一天，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失踪了，他干脆走了。“这就是那些无赖就是那些小怪物变的，”珍妮六岁的时候，那个年老的苏格兰保姆说过。“那么许多可怜的母亲以为她们的任性的孩子已经在漂洋过海，或者在周游世界，到了印度或者非洲，或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荒无人烟的沙漠里了，那些可怜的人儿，她们想不通，她们毕竟为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干了许多事儿嘛。但是，她们不知道，她们一直在焐暖一条毒蛇——可不是，而那些精灵在人间生活中也不再是处处都有了，她们在帮助偷了孩子换上代替的小妖怪以后回到她们的坏人中间去了，而且永远不来了！”珍妮想起了一个问题，不过是在多年以后，已经太晚了：“她们怎样处置那些她们偷去的孩子呢？”

服务员终于拿起戴维的盆子，送来大大的一块苹果馅饼，饼上盖满掼奶油。“我吃不饱，”他向珍妮友好地说真心话，用叉子插进馅饼。

“她们怎样处置那些她们偷去的孩子呢？”

珍妮向周围看了一眼，说：“人人看来都一副疲劳相。完全跟我们在维拉克鲁斯或者哈瓦那的时候一个样。我们都记得，我们是外国人，所以并不互相喜欢。我们全都在往别的地方去，巴不得互相不再见到。我一想到在我的有生之年哪怕再收到这艘船上的哪一个寄的一张明信片，就感到讨厌！”

戴维又叉了满满一叉苹果馅饼。“你的意思是说，甚至包括弗赖塔格?”

珍妮放下手里那把不在使用的叉子，拿起身上的餐巾，放在桌上。“好啊，戴维。但愿你睡得好。明儿见，”她说，火透了。她轻灵地站起身子，好像她身上有弹簧，而不是肌肉，以最快的速度迈着她的紧张的小步离去，好像她在溜冰似的……戴维吃罢甜点，喝了咖啡。

乘客们零零落落地走出餐厅，在甲板上转悠一两圈，就不见了。舷窗里的灯光很早就熄了。船长在驾驶台上吞下了铋，去睡觉了，不顾人们习惯上的想法，在领航员离去以后，是他，而不是二副把船开进海去的。事务长在做书面工作，吩咐送去咖啡和蛋糕，在吃的过程中有时打盹。舒曼医生好像在睡梦中行走似地在统舱里转了一圈，给那个肚脐眼感染的娃娃处理了一下，给一个患腹绞痛的男人服复方樟脑酊，给那个参加统舱闹事的人包扎了额头，尽他可能地干了一切，打发这个叫人受尽折磨的夜晚的时间，他感到海洋、距离和时间挤在那个他和那座他永远不会再看的、事实上他也根本没有看到的小岛中间；他只看到了从码头开始的一条陡峭的道路上有一辆小小的白马车在慢腾腾地往上离去，带走了他生活中的一切虚荣和幻想。加尔萨神父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要像对待穿红衣服的女人[1]，对待不可救药的异教徒那样对待她，别中了她的圈套。”但是，这些话改变不了什么，也没有什么意义。他在甲板上转悠，向船上的乐队

① 典出《圣经·新约·启示录》，新教徒开始用来指罗马教会，后来泛指一切反基督教的邪恶之徒。

摇摇手打招呼，他们奏了一两个装装门面的曲子，就要结束今夜的演奏了，他踱到那些在船上都有自己的地方的水手附近，多么结实的漂亮小伙子啊，他们都没有一根颤抖的神经，幸运儿呗；全体水手中，没有一个病人，除了那个游走肾的男孩，这孩子还管着甲板上的一切游戏哩，而且看样子管得着实不错，虽然他对舒曼医生的治疗意见丝毫不摆在心上。舒曼医生压制了他打算问那个孩子他近来身体怎么样的冲动，而且在经过的时候只对那个漂亮的小伙子——他是个十足地道的完全没有脑筋却身体健康的人的范例，推着一个一脑门怪念头的、快要死亡的人出来透最后的晚风的轮椅——瞟了一眼，没有像他已经成为习惯的那样表示出于同情的痛苦。舒曼医生又注意到那张紧绷着的、气呼呼的脸笼罩在出于本能的、自以为是的憎恨中，感到迅速被他乖戾的天真所引起的奇怪的忌妒所刺痛。

看来他们好像顺着非洲的海岸线在前进，格洛肯先生断定，用他的手指头在他从图书室找来的一本地图册中的一张地图上一路划过去。他被在圣克鲁斯市镇上度过的昨天的记忆困扰着，不是被那个市镇，也不是被镇上的人，而是被乘客们亲眼目睹的他在发生的事情中扮演的那个不光彩的角色困扰着，他们肯定会因为他缺乏沉着应付的本事，甚至因为他怯懦而瞧不起他。怯懦这个词儿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使他不寒而栗。他浑身疼痛，痛到血管里和骨头里，他的牙齿抽痛，加倍地服用了药也没有使他减轻痛苦。他为了维持体力进了晚餐，然后很早就上床了，避免跟同房舱的乘客打一个钟头交道。他侧身钻到毯子底下，脑袋下面放了两个枕头，打开那本可能会帮助他入睡的、庞大、乏味、沉闷、尽是事实的书。“最新的地图，”前言说，“……

一切国家……一切领土……种种美景……一条条发现的航线……海洋、湖泊、河流、岛屿、山脉和星星的统计资料……”格洛肯先生可以在他的手指头下面的地图上清楚地看到，船在顺着这片无关紧要的海岸线颠簸前进，沿岸没有一个港口。对他来说，他在哪儿，或者做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呢？他睡着了。

戴维过了一会儿发现他在那儿缓慢地呼吸，灯仍然开着，摊开着的地图册盖在他的脸上。戴维拿开那本书，关掉灯，没有打扰他。他接着记起看到丹尼在酒吧间里；到这时候他还那么泡在酒里，戴维差不多认为，他在每一回点烟卷的时候，人会着火。不过，这事儿没发生；他会很迟才回房舱，倒在房间里不管什么东西上，浑身发臭，大汗淋漓，咕哝个没完。戴维的第二个念头是，把格洛肯先生床前的帷帘拉上，重新开了灯，给丹尼照明引道，然后上床，拉上自己的帷帘。似乎只有他脑子的顶部仍然还在，或者至少还在起作用，他可以听到任何说话声音，而那声音不断像鹦鹉那样愚蠢地重复着说：“见鬼去吧，离船上岸。就在比戈上岸，继续前进。离船上岸，见鬼去吧……”这嚷嚷咧咧的声音响个没完，直到他想起他还是数羊的好。他慢慢地数羊，同时深深地呼吸，这是他母亲在他五岁的时候教他的一种使他安静下来的办法，在唱歌和床边讲故事都不灵以后，就用这个。这个老办法，果然丝毫没变，照样灵验；第二天早晨，他醒过来的时候神清气爽，丹尼和格洛肯先生简直没法跟他比，丹尼大声打着呵欠，还哼哼唧唧，格洛肯先生呢，要求别人给他倒杯水；这时候，具有绝对权威的进早餐的喇叭声响了。

珍妮醒得挺早，从舷窗看出去，看看天气怎样。天空一片苍白，没有阳光；海水第一回变成灰色，水面上有点点银斑。她打

了个冷战，在梳洗的时候套了一件套衫。船在夜晚已经穿过一条圆周线。不再是夏天了，而是初秋。

埃尔莎睁开眼睛，伸一伸身子，起身来到舷窗前，高兴地呼吸潮湿的空气。"啊，瞧，"她有点儿惊奇地说，"啊，现在又像是欧洲了，全是雾，暗淡而柔和，我现在记得了。像是已经到家了。我曾经在墨西哥住过，这似乎挺奇怪……"

"可是瑞士总是一片阳光，色彩鲜艳，或者说我听说是这样，对不对？"珍妮说。"我从前以为那儿到处阳光灿烂，没有别的天气呐。还有雪。旅行小册子上都这么说的。"

埃尔莎把头从舷窗口缩回来，移开去。她那张没有女孩子味的脸现出近乎微笑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也许不很好看，但是使她的惯常的茫然的悲伤表情有所变化。

"啊，不，"她带着古怪的、热切的骄傲神情说，"在圣加仑，我们有雾，有雨，跟其他地方一样。啊，"她绝望地呼了一口气，"也许那儿会好一些。"

布告牌上密密麻麻地公布着航海消息：轮船的抵港和离港，世界各地的港口海员罢工和其他的动乱，古巴国内的种种风潮，西班牙的种种风潮，德国的种种风潮，节[1]，纬度，经度，日出和日落，月相[2]，今天对明天的天气预报；还有种种游戏啊、赛马啊、电影啊、音乐啊，和船上的游泳池；另有歌舞班子贴出的一个通知：等待已久的、向"真理号"的尊敬的船长致敬的庆祝晚会将在当晚举行，备有晚宴、音乐和跳舞，晚会的主人，歌舞班子的全

① 每小时航行的海浬数。

② 指月有四相：新月、上弦、满月、下弦。

体人员将演出一台精彩喜剧，最后是抽奖活动，向幸运的奖券持有者提供高贵的奖品。请穿奇装异服和戴面具。为了使庆祝会有新奇的阵势，座位的排列都作了变更。尚有部分对奖券未曾售出，凡欲购买者，洛拉女士和安帕罗女士乐于效劳。一场奖品的特殊展览将在早晨进茶点的时间在酒吧间内提供。真挚邀请全体乘客。

那些在这件事儿上受到粗暴攻击的人，有几个在走过的时候，斜着眼看上几眼——格洛肯先生、鲍姆格特纳一家子；里贝尔先生乘利齐不在场也看了看，猜不出那些下三滥接下来想干什么；甚至弗赖塔格也被好奇心所打动，也站住了脚在念。

"语气完全变了，"他跟在他后面跟进来的两个人，胡滕教授先生和太太说，"不是好兆头，我说。他们倒对我们讲起规矩来了，这不是稍微有点儿太迟了吗？"

"好规矩，可不是，"教授先生小心翼翼地说，"在他们一直用另外的规矩对付我们之后。可这是变好啊，我说，亲爱的先生，哪怕只是表面的，暂时的，和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他们还能有什么另一种呢？"弗赖塔格问，一下子觉得高兴起来。教授先生对付任何话题和情况的态度有一套，他一听到，马上就把它倾注在他的脑子的模子里，把它铸成一件完整的铸件，递回给你，没有一丝裂缝，这使弗赖塔格产生一种恶意的幽默感。做一个这样的讨厌人倒也需要才能。

胡滕太太微微拉了拉贝贝的皮带，向它发出信号。她的丈夫接到了这个暗示，他们随即向酒吧间走去。胡滕太太几乎迫不及待地要看那些偷东西的跳舞男女设法弄上船来的那些东西。她不是唯一一个。洛拉和安帕罗看上去令人注目地精神抖擞，不像往常那样轻视一切，她们站在一张狭窄的搁板桌的两

头，桌上放着一个类似陈列架的东西，这是酒吧间招待员和餐厅的食品保管员一起给他们临时凑合出来的；陈列出来的贼赃还着实可观哩；也许稍微有点偏向女性，好像有意让女性为她们自己去赢取，或者让男性去为她们赢取似的。“你要是喜欢抽纱的话，真不赖，”特雷德韦尔太太经过的时候，戴维跟她说；她含含糊糊地微笑，说：“我平时确实喜欢抽纱，可是今天不。”有几把雕刻精美的长柄玳瑁壳梳子、各种各样的抽纱桌布、一条薄得透明的黑抽纱披肩、一条大的绣花白披肩、一些色彩鲜艳的围巾、一条相当粗糙的抽纱床罩、各种各样的黑白抽纱扇、两条褶裥裙和一段白色绣花薄亚麻布。施米特太太没法断定，这段亚麻布是打算用来作圣餐台布呢，还是作裙子褶裥的。不管怎样，她决不眼红想要占有它，甚至拒绝欣赏它，因为那是偷来的东西，而那些人是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的。但是谁来惩罚他们呢？向哪个权威人士揭发呢？谁会听她的话呢？她已经有够多的麻烦，够多的悲伤，一想到有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再对她冷落或者怠慢，她就受不了。这是个可怕的、邪恶的世界；她处身其间，无能为力。她伸出手去，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捻捻那段亚麻布。“真美，真美，”她用德语跟安帕罗说，几乎是压低了嗓音。安帕罗马上伸出握满了奖券的右手，用左手从那一叠上撕下一张。“四马克，”她说，好像施米特太太在向她买似的。“等一等，”施米特太太说，有点儿喘粗气，一边在她的放零钱的小钱包里摸索。

丹尼尽管累得够戗，还是一会儿就赶上了帕斯托拉。他们坐在酒吧柜附近的一张桌子旁。他在喝恢复健康的啤酒，她呢，在一小口一小口地呷咖啡，一边从咖啡杯的边沿上敏锐地观察他。他后来跟戴维说，他始终没有真正弄懂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但是听帕斯托拉说，好像是一次挺好的正经娱乐——“完全是一次正规的舞会，”他说，“听起来好像是拉丁美洲的小伙子老是在布朗斯维尔[1] 一带举行的方形舞舞会。哎，我们去吧。不管怎样，我今宿要把那妞儿弄到手，要不，我倒要弄一个一清二楚，我干吗不行。”在这段时间里，他决定不再喝酒，好好睡上一觉，使他自己外形端正地去参加舞会。

鲍姆格特纳喜欢的理论是，一次社交活动是一个神圣的义务，不管个人的身心情况怎样，要尽可能地完成。他的父母起初带着几分赞赏的态度，认为这是孩童的喜爱热闹事的正常的精神，后来他们看到他会放着家务事不做，不顾一切学习时间，不顾一切家中的规则，甚至作出反抗，去追逐一些最琐碎、最短暂的欢乐，还经常跟一些最讨厌的同伴混在一起，就有点泄气了。鲍姆格特纳太太长时间地接触了她丈夫的种种异想天开的怪念头以后，同意他父母的意见：他内心里有一种不可救药的轻浮习性。尽管这样，她始终没有放弃做妻子的提醒和警告，倒不是反对那些无害的娱乐，谁能反对那些呢？而是反对磨夜、纵酒、没完没了地打纸牌而结果总是输钱，还有体育协会里的那些男人的游戏，玩保龄球啊，一唱就是半宿啊，手里拿着啤酒杯，还有跟一拨哥儿们溜到街头市集上去打泥鸽，吃墨西哥食物吃得生病，抱回家来一大堆没有一点儿用处的玩具娃娃、花瓶和机械玩具，哪怕是给汉斯也嫌太小孩子气，汉斯恭顺地假装喜欢它们。唉，得了，她干了她可能干的，然而——难道她的丈夫爱她，是她的

---

① 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美国南方得克萨斯州一城市。该州和墨西哥国交界。

过错吗？她可以肯定他是爱她的；在他们最初结合的那些年中，他是那么兴高采烈，心情愉快——她没法否认，到最近的几年前，他一直还是个忠诚的丈夫、父亲、供养者——他在家庭欢乐中，在温和的家庭习惯中，在他和亲爱的家人相处中得不到满足，难道是她的过错吗？她开始担心她永远不会知道。

所以下午三点钟光景，他在拥挤的房舱里搜寻，找出跟狂欢节穿的服装相配合的种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的时候，她并不感到惊奇，而是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他试穿她的红白方格的短上衣，那衣服穿在他身上当然不相称，产生了滑稽的效果。“你在干什么？”她问，不等他说话就知道答案了。

“可我真不明白！”她喊叫。“咱们非跟那些糟糕透顶的人打交道不可吗，他们骗走我们的钱，然后在圣克鲁斯凡是他们能下手的地方就偷……我们看到了他们干的事儿。嗨，我们干吗去参加他们的舞会？”

“舞会还是舞会呗，”鲍姆格特纳先生认真地说，一边系上把那个古巴女小孩吓坏过的那一把凌乱的络腮胡子。“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宴会上成为扫兴的人。至少，孩子们应该被允许有一点乐子。”他对汉斯微笑，这孩子望着他父亲作种种准备的时候，脸上露出幸福的亮光。“他们是天真的，”他虚情假意地说，“我们干吗因为他们的大人犯了罪而惩罚他们呢？”

“什么天真的孩子？”鲍姆格特纳太太问，严厉地向汉斯瞟了一眼；他缩了一下身子。“天真？你的意思是说，那两个把贝贝扔进海去，造成那个统舱里可怜的乘客淹死的犯罪的双胞胎兄妹吗？你的意思也包括他们吗？”

“干吗不呢？”鲍姆格特纳问，现出一副老是让他妻子大为恼火的虔诚的神情。“应该由上帝做他们的裁判者，而不是我们。

甚至还没有证实是他们干的，你也知道嘛。"

"没有证实！"他的妻子说，故意压低她的声音。"需要什么证实呢？船上还有什么别人，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除了这两个人外，还有谁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啊，可是归根结蒂，你倒是天真的。"

"我希望，在经过了这些年以后，我终于还保存一点儿这种幸福的品质，"她丈夫沾沾自喜地说，一边用铁丝挂在两个耳朵上，戴上一个用纸型纸板做的巨大的红鼻子。"我要做的事儿简单得很。我要给孩子们一些玩具，试着逗他们稍微乐一乐——就是这么回事儿。可是我亲爱的，我希望你有时候对这一类小小的逗乐的活动宽容些……"

"我并不打算不宽容，"她说，被打动了，"只是有时候我有点不明白……"

"请稍微打扮一下，"她的丈夫说，"穿上你的我们在墨西哥参加舞会的时候你经常穿的那套巴伐利亚庄稼汉服装。就算是为我穿的吧，"他甜言蜜语地说；他那双眼睛在他那个小丑的红鼻子上面充满温情地闪闪发亮。

"我要想想，"她回答；她丈夫马上明白她会照办的。汉斯坐在一旁，戴着一顶纸做的大牛仔帽，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鼓，跟往常一样，耐心地望着争论告一段落，接下来的事情开始。当他的父亲说"嗨，我的汉斯"的时候，他跳起身来，向门口迈出一步。他母亲的带有熟悉的提醒语气的声音使他颈背发凉，他马上站住。

"来亲亲我，"他的母亲说。亲罢以后，他和他父亲一起溜走，他的父亲皱着眉头，好像他的胃痛又发作了。在他们来到甲板上以前，鲍姆格特纳先生站住脚，从后裤兜里拿出一顶一个服

务员给他的纸做的小棕仙[1] 的帽子,把帽子压到耳朵上。

"喂,"他高兴地喊叫,弯下身去对着汉斯的脸,"告诉我,我叫什么名字?"接着他转着圈跳起"单脚跳—蹦蹦跳—跳"那种舞蹈来。

"侏儒精灵!"汉斯扯着嗓门喊叫。

"对!"他的父亲尽情吼叫;他们急急忙忙地往前奔,觉得舞会已经开始了。

在将近黄昏的亮光中,珍妮坐在她的躺椅边上,在凭记忆给一只飞翔的海鸥画素描。她已经画满了几张纸,形形色色都有,有六七幅用急速笔法画的可能是一只飞鸟的意笔画,还有一幅用严谨的笔法画的一只海鸥头的工笔画,那颗鸟头裹在像链子甲似的羽毛里。跟往常一样,画得样样不对头。戴维坐在附近,又在看《堂吉诃德》,也许是第十二遍了——"要温习你的西班牙语,没有比这办法更好的了,"他说;他那本系着一条带子的素描本搁在他的躺椅旁。自从她为了给他看她的画发过脾气以后,他不再跟她一起画素描,也不再要她给他看她在画什么了。珍妮假装没有发觉,不知道他会坚持多久。

"我想我现在要走了,换衣服的时间到了,"她说。"服务员也许能给我一次例外的淋浴。"

戴维没有从书上抬起眼睛,小心谨慎地问:"你真的要为参加那场为蠢货举办的舞会换衣服吗?"

"不参加,换衣服呗,"珍妮说,"每天黄昏,我总是换的。难道你没有注意过吗?"

---

① 棕仙(brownie):传说中夜间帮人做家务的善良的小精灵。

鲍姆格特纳先生出现在他的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像一个军乐队指挥那样转动着他的手杖，迈着鹅步，孩子们一边尖叫，一边迈着鹅步，凌乱地跟在他后面。餐厅人员分发了喇叭、鼓、响葫芦、哨子，由他们尽情地摇啊、打啊、敲啊、吹啊。汉斯走在他父亲身旁，那两个古巴小男孩和小女孩跟在后面，里克和拉克落在后头，一起敲葫芦和打鼓，脸上现出一种几乎是孩子气的喜悦的神情。在他们走近的时候，珍妮站着微笑，轻轻地鼓掌。鲍姆格特纳先生从他的假鼻子上瞪着眼看她，用不带丝毫欢乐意味的气势汹汹的神情大叫："干吗不跟我们一起来玩？你干吗不帮忙？"

"你用不着，"珍妮回答，但是她还是跟着他们，戴维紧张得气都不敢透，担心她会闯到他们中间去走鹅步；她是极可能这么做的，她一分钟也按捺不住，总是叫人难以相信地要冒出来出风头。他对女丑角极为讨厌；在这样的时刻，他痛苦地感到，在珍妮的性格中，有一种强烈的爱好低级喜剧的气质。他望着她跟着那支微型的狂欢的队伍消失在酒吧间里，仍然稳稳地走着，但是一边走，一边鼓掌，因为汉斯和鲍姆格特纳先生这会儿气喘吁吁地唱着"这不是一个金戒指吗？这不是一个金戒指吗……"同时，那一对双胞胎兄妹和两个古巴孩子只是多多少少按照节奏尖叫。他们绕着一张张桌子走过，大腿直橛橛地向上和向外踢出；喝酒的客人在他们经过的时候，纷纷抢着把酒杯挪开。鲍姆格特纳先生有相当长的时间停止歌唱，皱着眉头，用痛苦的声音劝聚集在四周的人："干吗不跟我们一起来玩？你们干吗不帮忙？"尽管那些寻欢作乐的孩子得到了在这种场合照例会得到的亲切的眼神和微笑，一晃眼就过去的童年的欢乐当然是神圣的，

不管有时候它是多么腻烦，然而没有人在他们的座位上挪动一下，在这阵骚乱过去以后，也没有转过头去看他们。鲍姆格特纳先生把失望藏在心里，噔噔噔地走到外面甲板上，保持着他的震碎脊骨的鹅步，他在服军役的那会儿是最讨厌这种步法的。他领着他们转了一圈，然后在酒吧间附近把他们解散，在那儿每个孩子都可以找到他们的亲人——只有汉斯除外，他被送回到他的母亲那儿去，好像他为了什么事情在受罚似的。他拿着他的玩具走去，差一点没哭出来。出了什么事儿？他干了什么啊？其他孩子马上散开了，没有交换说一句话，没有互相看一眼，各人捧着玩具，顿时把鲍姆格特纳先生忘掉了。鲍姆格特纳先生也一心想要被人忘掉和忘掉别人；他只是渴望着不被人打搅，不被人看见，和一瓶白兰地。他筋疲力尽，要了一大杯啤酒，坐在啤酒面前，一脸内疚、认错的神情，在他的妻子来以前，不敢喝白兰地；她已经让他严肃地答应，除了跟她在一起以外不再喝酒。坐着想了几分钟以后，他记起了拿掉他的络腮胡子、假鼻子和棕仙小帽。他的妻子在进餐前带着汉斯来跟他一起了，她围着有缎带、有花边的头巾，穿着有褶边的外套和不止一条裙子，刚扑过粉，还散发出紫丁香香水味，他放下他的第三杯啤酒，令人愉快地探出身去。"我的格蕾塔，你真美——仍然是我从前的那个姑娘。自从我们结婚以来，你一点儿没有变！这么些年啦——"

"十年了，"她心平气和地突然说，"你的记性太差了。你答应过我不喝酒，除非——"

"哎，"他高兴地说，因为他的胃舒适和暖和了，"我原以为这只是指白兰地！"

"不对，"她回答，"压根儿没有提到白兰地。你再怎么也不能独自个儿喝了。"

他决定做出忽发奇想的样子回答。“哪怕柠檬水也不行？水也不行？咖啡呢？”

“胡说八道，”她说，有点儿恼火了。“你说话像个律师。我们两人都知道你答应的是什么。再说，我真不希望你穿我的短上衣。你把它撑得走样了。我认为男人不该穿女人的衣服，哪怕是在化装舞会上。”她不自在地向四周望望，但是酒吧间里几乎没有人了。“人们会说闲话的，”她说。

“我去另外找一件，”她的丈夫可怜巴巴地说。

“为什么？”他的妻子问。“现在太迟了——人人都已经看到你了……我想我也来杯啤酒吧。”

汉斯把胳膊肘搁在桌子上，手撑着头，等着这一个或者那一个为他要树莓汁。

弗赖塔格走进房舱，想洗个澡，刮刮脸，发现汉森穿了一半衣服，伸直着手脚躺在他的上铺上，光着脚悬空垂着。

“怎么啦？晕船？”

汉森那张担心的大脸从床沿上伸出来。“我，晕船？”他看来好像要生气的模样。“我是生在一艘捕鱼船上的。”

他吐露了这个私人的秘密以后——如果这是个秘密的话——翻过身去，向上盯着看。“我在思想。”

弗赖塔格脱掉他的衬衫，开始在洗脸盆里放热水。

“我在想，”汉森说，“处处有人在做的那一切互相使别人痛苦的事情——”

“你妈在一艘捕鱼船上干什么？”弗赖塔格问。“我原以为女人是不允许上捕鱼船的——”

“那是我爸爸的船，”汉森愁眉苦脸地说。“瞧，最大的麻烦

是，没有人听。人们不听别人说的话，除非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他们每一个字都听进去。要是你试着说些有见识的话，他们还认为你不是当真的哩，或者认为你反正什么也不懂，或者认为这不是真的，或者认为这是反宗教的，或者认为这跟他们经常在报上看到的不一样……”

听到这儿，弗赖塔格不再听下去了，一心一意地在他的脸上涂肥皂泡沫。他熟练地在颠簸的船里稳住身子，开始用一把折叠式剃刀刮胡子，他对这一手绝活挺自负。要是有哪一个亲眼看到他刮胡子的人谈到这件事儿，他肯定会说，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刮法才是真正的刮胡子。在整个航程中，汉森不止一次地看到弗赖塔格这样刮胡子；他从管子里挤出现成的肥皂泡沫，用一把小保安剃刀轻松地刮他的脸颊和下巴，好像完全不知道不止有一种刮脸方法。弗赖塔格再听到汉森说话的声音时，他在说：“不，他们不会听的。譬如说，在法国——所有的瓶子，白葡萄酒的、红葡萄酒的、粉红色葡萄酒的，一切葡萄酒的，香槟酒的除外，瓶子都有瓶肩，没有不是这样的吧？”

“完全对，”弗赖塔格说，一边把他的短筒袜卷起来，放进一个绣着两个绿色的字洗涤的棕色亚麻布袋子里。

“可是你到德国去——可不是，只要跨过国境，甚至不用去德国，只要到阿尔萨斯省[1] 就行——你会发现什么情况呢？所有的瓶子都没有瓶肩，瓶子就像保龄球柱！”他的愤怒的声音震撼了弗赖塔格的神经。

怪不得人们不听，他不友好地想。现在，那是指什么来着，

---

[1] 此省位于法德交界地区，原来为德国领土，后归法国，1871—1919 年又属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重归法国。

我纳闷——那个西班牙女人，或者里贝尔先生，或者什么别人？他发现了汉森的一个情况，他好久以来猜测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情况——他们的抽象的思维和概括的手法，他们的正义的怒火或者对暴政的憎恨，或者别的不管什么，非常经常地掩盖了与显然正在谈论的话题相去遥远的深刻的个人怨恨。

他认为人性中的这个基本事实是他在别人身上发现的，他一次也不把自己包括在内。他自己的困境是独一无二的，是他特有的，超出一切规则的。他对他的困境的看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是只受他自己的判断支配，除此以外，不受任何影响，而且一刻也不该跟汉森这样的不值一提的小麻烦相比较。

"事情就是这样，"汉森说，"人们在一个地方坚持制造有瓶肩的瓶子，离开不到五十英尺，在一条纯粹是想象中的界线——要不是人类的愚蠢和贪婪的话，那条线就不会存在——的另一面，只是为了表示他们的独立，他们制造没有瓶肩的瓶子！"

弗赖塔格觉得耐心像迷雾那样降落，压在他的情绪上。"可是那条界线并不是想象的，它在那儿，给某种东西划出界线，赋予一种观念形式，表明某一个民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瞧，"他说，向那张在他上面的叫人困惑、没法看透的脸瞟了一眼，"没有人为瓶子的形状斗争。他们首先是为使瓶子的形状不同的他们的脑子里的不同的想法斗争……"

汉森坐起来，大吼："说得对，说得对，这正是我要想告诉你的。这正是我要说的。"

"这话我不大懂，"弗赖塔格说，折叠起他的剃刀。

"自然不懂喽，"汉森说，他满脸都是绝望的神情，所以弗赖塔格对他的粗鲁的态度倒也不生气了。"没有人听。"

汉森坐起身来，穿上短筒袜和皮鞋，猛地跳下床铺，伸出手

去，从挂在最上面的横杆上取下衬衫，接着说："一切都不像话，样样都这样——瞧那些西班牙人。你知道他们是婊子和靠女人吃饭的杈杆儿，没有人需要他们的舞会——可是我们还是得要，我们都付了钱，我们都得去，像一群羊！他们勒索，他们欺骗，他们撒谎，他们在圣克鲁斯偷遍了那儿的人，人人都看见，都知道——我们干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下面那个可怜的胖子——他有什么罪？他在一个教士面前说了自由这个词儿！所以——他们砸得他脑袋开花，再把它缝起来，这样人们就没法说他们没有照顾他了，可不是，甚至像他那样的被社会排斥的人。宗教和政治——我刚才告诉过你什么来着？"他的粗嗄、沉闷的吼叫越来越响，几乎叫人没法忍受。

"哎，可不是，你告诉过我，"弗赖塔格亲切地说，一边在想，只要他能打发掉那个里贝尔——那个人没人要——的话，勒温塔尔可能是个多么安静的同房舱的伴儿。可不是，甚至那个里贝尔可能比这个鬼迷心窍的、在痛苦的人好些。痛苦应该严格限于个人的事儿，他断定；一个人享受他自己的苦恼，是人的特权的一部分，不要把他的苦恼跟另一个人的搅和在一起——尤其是，他一向认为，一个根本没有权利对他的苦恼表示同情的人，却出于错误的理由对他表示同情，这才是最糟不过的了。他当然想到珍妮，她坚持高尚的立场，把种族歧视，或者任何歧视，尤其是排犹主义看作是一种心理的和道德的疾病症状，这从任何立场看都是不可宽恕和不可原谅的。他一直好不容易才压制住他的强烈的愿望，没有去打断她那种小小的狂热的说教，没有说："嗨，我认识许多不关心犹太人的人，可你没法管他们叫排犹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些人非常喜欢阿拉伯人！"她永远不会懂得他拿一个词儿的正确的含义开的玩笑，面使她震惊和生气只

是干蠢事。跟她跳舞是愉快的，着实有趣哩，从她的轻松的闲谈中，往往会冒出充满好奇心的天真、幼稚的看法，一本正经的对道德的热诚态度，像池塘面上冒起来的模糊的泡沫，使你想要知道在下面游的是什么奇怪的鱼，或者是什么被淹没的东西从下面送上来冒气的信号。玛丽只要瞟上一眼，就能对她作出评价，一句话就能打发掉她——只要舌头一转，吐出一句锐利的、杀人不见血的话就行，那话一点也用不着符合真情实况，或者甚至用不着接近实际情况，但是那会致人于死地，会使他为对这样一个姑娘感兴趣而感到害臊。玛丽永远不会听到珍妮的——她干吗该听到呢？他在系领带的时候，开始感到有点儿兴奋，接着变得大为高兴，好像他到甲板上去的时候，会找到玛丽，好像这艘船甚至当时就正在被绞船索引进码头，玛丽在那儿的防波堤上等他，已经在用望远镜寻找他了。他的幻想把他的兴致提得那么高，使他那么出神，直到他用玛丽送给他作生日礼物的一对英国制造的鲸须刷用最快的速度刷头发的时候，才发觉汉森默不作声了，急忙试着向他表示一点儿礼节上的注意。

“他们砸烂他的脑袋，当然是不对的，”他小心谨慎地说，“可是我不敢肯定他配得到太多的同情。一个在葬礼上大吵大闹的人一定有不对头的地方，再说，那毕竟是一个跟他一样穷的工人的葬礼嘛。不过，你以为他会对死人表示一点儿敬意的，对不对——”

“始终是这样，”汉森呻吟着说，双手把他头顶上的头发抓住了一会儿，“尊敬死人，从来不尊敬活人！”

“我们上去喝一杯吧，”弗赖塔格提议说，把它作为脱身的办法。

汉森放下双手，摇摇头。“我不要喝，”他说，像一个五岁的

孩子那样以自我为中心、那样坦率。弗赖塔格跨出房舱的时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摇摇他的两个肩膀，好像那个海中老人[①]赖在他的肩膀上似的。

特雷德韦尔太太用她的一只瘦瘦的手扶着扶手，走下通往餐厅的楼梯，在楼梯的平台上挑剔地看着大镜子里她自己的映像。她的镀金凉鞋露出她的涂着鲜红指甲油的趾甲。身段着实好哩，她断定，虽然稍微有点儿偏平坦，没有这样差的头型就更好了。她希望没有那些从鼻子到嘴的皱纹儿，或者下巴下面那个褶子的一个小阴影。除了这些，她在长时间内不必担心什么了；但是，却有这些缺陷啊，去不掉，而且越来越深，还在增加其他的阴影，褶子和皱纹，作为她走向老年的漫长的孤独的行程的每一步的标记。四十六岁是第二个尴尬的年纪。什么年纪会变得更糟呢，十四岁，不是孩子，不是女人；或者是她现在的年纪，不年轻，也不老？我现在有什么指望呢，我想要知道，她问自己，就像她十四岁的时候这样问过自己一样，当时几乎感到同样的困惑。我仍然跟从前一样在跳舞，仍然在骑马，仍然在游泳，仍然在喜欢干大多数我从前喜欢干的年轻人干的事情——仍然，仍然——是个多么可怕的词儿。她小心谨慎地打扮，准备度过一个可能有某种享受的黄昏；她确实巴望心情愉快和轻松，但是既然没有人跟她一起轻松，这怎么可能呢？一两个粉红脸的年轻船员会伸直着胳膊，步子稳重地跟她旋转上几回；她是那么喜欢跳舞，一个笨拙的舞伴有时候比没有舞伴好。我巴不得有一个相貌漂亮的舞男会请我跳舞，但是他们当然没有一个会请她

① 典出《一千零一夜》，骑在辛巴德肩上的老人。

的，这些讨厌的东西。他们会继续跟他们那些风骚的姑娘跳舞、争吵和作爱——至少，她们年轻，而这才是他们需要的。由于在她的两条眉毛中间正在出现一条细纹，一条她几天前才注意到的，她在楼梯平台上的镜子前站住脚，在刺眼的亮光下，尖锐地察看她自己的脸。真的，她老了，她多少年以前就已经不年轻了，她一直不知道，也不害怕，甚至想也没有想过；现在清楚地、毫无掩盖地看到她自己，别人一定就是这样看她的，事情是明显得叫人痛苦和无法相信。她的年纪好像是一件暂时的东西，是身外之物，是一件她可以随意脱掉的衣服，一个画在她脸上的面具，她可以凭某种简单的魔法，在洗澡的时候，随时把它洗去。啊，亲爱的上帝，我要是不在乎的话，我会在夜总会里出钱，叫舞男跟我坐在一起。要不了多久，我那些剩下的可爱的朋友中就不会有人送花给我，跟我跳舞，请我看戏了。我会独自个儿坐在墙角的桌子旁或者平台上，一个头发波浪型、眼神不正经的男人会装出一副假笑走过来："亲爱的太太，你高兴跳支舞吗?"而我呢——我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干的！我要文雅得体地步人老年，就像人们从前经常提醒我应该做的那样——在那些日子里，我知道我会永远年轻——现出一副虚假的庄严模样。没有人会怀疑，我是那个不会长大的不幸的姑娘，在我的老太太的素净的外表下小心翼翼地隐藏着我那颗十六岁的心。这将是我自己的枯燥无味的事儿。我在巴黎首先要做的事是，买一切新的和更适合我年纪的东西。她那件薄薄的、打褶裥的玫瑰红长袍，从她的袒露着的双肩平滑地垂到她的两个由抽纱内衣贴身地托着的、轮廓鲜明的、小小的、尖起的乳房上，配一条镀金的阔皮带——确实漂亮得很，但是跟她的脸一点儿也不相配，她还是第一次注意到哩。我该多穿黑衣服吗，我纳闷？我要是把脚指甲

染成绿色的话，有人真的会喜欢吗？

这当儿，深深的忧伤压制着她的心情，她几乎打算回去换一身普通的衣服。戴维·斯科特原来一直跟在她后面，赶上了她，站住脚跟她说话，而且用一种欢喜的、赞赏的眼光盯着她看；她对男人的这种眼光是很熟悉的，也从来不讨厌被人这样看。"你看来美极了，"他说，语气也恰到好处；这出于他的嘴里，实在出人意料。特雷德韦尔太太挽着他的胳膊，亲密而娇媚地对他微笑。"你真好，嘴这么甜，"她跟他说；他们一起走过去。她注意到他系着的黑领带有点儿歪，他那套亚麻布西装稍微有点儿皱，不过没关系。她把手指尖搁在他的前臂上，配合着他的步子走，被他的有吸引力的、毫不含糊的男性风采重新鼓舞起信心和从中得到安慰。

"不过，我原来以为，"戴维说，"咱们都同意不睬这次舞会的。"

"得了，这毕竟是一次舞会，"特雷德韦尔太太说，"不管它是怎样办起来的。我打算稍微跳跳舞，我喜欢喝香槟，而且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假装我觉得比一向精神稍微好一点——至少，现在是这样。哪怕只有半半拉拉的乐趣的事儿，或者只是逗人笑笑的，你知道吧？荒唐——竟然可能发生。那些下三滥的跳舞的男女要给任何人办一个舞会！想想看，他们还确实偷了奖品和摸了别人的衣兜吧？我没有给他们一个子儿，你也没有。我们干吗要错过演出呢，要是有演出的话？"

"他们会办成的，"戴维说，"他们总是办得成的。"

"我对有关道德的记载厌烦死了，"特雷德韦尔太太温和地说。"他们是谁？他们干什么事儿跟我有什么相干呢？"

戴维听到这种充满憎恨的冷漠的话，骨头里都感到寒冷，绷

紧他的胳膊，冲动地把它垂到身旁。她马上把她的手指头从他的袖子上挪掉，接着说："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伙叫我厌烦的人，或者说对我干蠢事的人——就是那种人罢了。那些西班牙人——我管他们干过什么，或者可能干什么呢？他们跳舞跳得好，他们有一种粗野的、乱头粗服的美，至少让他们逗乐吧！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什么用呢？不过，他们甚至用那些对人们不友好的可怕的小小的布告攻击一些人，把这次活动弄得听起来叫人扫兴……"

"那是一种勒索的方式，"戴维说，"而且几乎总是有效的。他向特雷德韦尔太太瞟了一眼；她的注意力转移了。他们来到了正在走进餐厅的人群中间，她向几个方向微微点头——对弗赖塔格，他用点头回答她，没有笑；对那对新娘新郎，他们微笑；对事务长，他满脸堆着假笑，俗不可耐；戴维注意到，她对任何人和所有的人点头，却对所有人都视而不见。事实上，她的行为像珍妮，只有一点不同，珍妮总是在寻找什么，寻找某种反应，几乎是哪种都行，或者是有点太强硬的，或者是有点太温柔，那标准他不懂得也不相信。他只要一看到珍妮在设法暗中损害他，在不惜用任何方法摧垮抵抗生活本身的他的整个人生——抵抗不管他发现自己处身于其中的什么环境和社会，这时候他心中就会涌起对她的强烈的憎恨。他情愿接受特雷德韦尔太太的不装模作样的、不乏文雅风度的缺乏道德感的谈吐，而不愿接受珍妮那样焦躁不安地寻找反叛的天性，这种天性努力在任何方面或者在一切方面把她和她最挨近的那些人结合在一起，不管是谁。他就是忍受不了杂乱的交往。他几乎忘掉了身旁那个女人，陷人对珍妮的熟悉的憎恨中，她在他全身的血管里流转；接着，他看到她站在下面的墙前，在等他，向上望着，穿着一套素净的白

连衫裙——这套衣服在一天中任何时候穿都挺好看——显得很美。她有一个小小的已婚妇女的严肃相和朴素相，从头到脚光滑和相称，看不见胭脂或者粉，没有涂指甲油的趾甲，像一个玫瑰花圃那样清新和可爱；她在向他微笑，他用微笑回答，微笑时那么深地吸了一口气，使特雷德韦尔太太向下看，对珍妮点点头，接着转过脸来看戴维。他的脸色苍白和紧张，他的眼睛里冒着火一样的热情，使她吃惊。"她来了，"他说，只向特雷德韦尔太太点点头，就撇下她走了，跳跳蹦蹦地跑下楼梯，就在这时候，珍妮在向他走来。

里贝尔先生一时半刻也没有放弃他要不惜施展一切伎俩和手腕成功地把利齐完全勾引到手。"某一个时候，某一天，某个地方，用某种办法，"他默不作声地对自己唱着一支他喜欢的流行歌曲的选句；不过，这不行，一定要在船上干成这件事儿，要么今宿，要么就永远办不成了。一旦他到达不来梅港，就挤不出一点儿时间来了，事实上，在码头上，就会有几个雇员来接他。他在送利齐上开往不来梅的公共汽车的时候，除了向她最亲切的告别——亲切而正式，当然喽，是最后的——以外，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自从那条狗在那个不幸的夜晚出了事，接着又发生了一些乱糟糟的事儿以来，他只有一次把利齐引诱到甲板上来；那一次，她一直非常端庄和拘谨，不让他抚摸她任何重要的部位，直到最后他想出一个新策略——变得谦和和孩子般的温柔。他把脑袋枕在她的大腿上，管她叫他的小羔羊。她抚摸了几次他的额头，她像在想什么心事似的。她的确在想心事。她不明白，里贝尔先生老是这么一次次重复这老一套，干吗一回也不提到结婚呢？她并不希望跟他结婚——根本不希望。她要求永久

性地定局，她已经打定主意她的下一个局面应该是永久性的定局，牢靠的婚姻，双重牢靠的婚姻，用婚前的经济契约的铁销拴定的婚姻，事实上，她对这比对里贝尔先生，要看重得多。不过，无论如何不能让哪个男人不受情况约束，不管是什么情况；一定要始终清清楚楚地摊明——不仅仅是靠含蓄、暗示、征兆、眼神、默默的理解，而是要用许多话说明——她是那种到了结婚年龄的女人，任何跟她打情骂俏的闹着玩儿，只能是可能走向圣坛的前奏曲。她认识的其他每个男人在跟她上床以前都毫不含糊地说出那个神妙的词儿"结婚"，不管事实上后果是什么。这个人没有说，等他说吧，就这样！眼下呢，就到此为止吧！

里贝尔先生一直没有向她提到结婚，虽然他可能是非常喜欢提的，说到底，最简单的理由是他有个他在法律上已经跟她分居但是她拒绝跟他离婚的妻子，而她本人从任何法律的观点来看无可指摘，所以他没法跟她离婚。他养活她和三个孩子；那四口人都恨他，他也恨他们；他们会一辈子缠着他不放，喝他的血。啊，他到底干了些什么，才落到交上这样的好运？然而，事实就是这样，而千万不能让利齐听到他这个尴尬的处境，这将是对他的自尊心的没法容忍的冒犯。再说，他可以肯定，她永远不会理解，她干吗要理解呢？啊，这个美好的高个子女人，走起路来像一匹良好的雌赛马，唷，在一家安静的不来梅旅馆里的一张舒适、柔软的床上，在他必须继续去办事以前，哪怕只乐上一天一夜。没有这样的希望。必须在这儿和眼下完成，在那些不要脸的下三滥西班牙人莫名其妙地为向我们的船长表示敬意而举办的舞会进行的期间完成——敬意，亏他们说得出口！

他继续在轮船甲板上转悠，找一个可能的地点，又陶醉在他的白日梦中：她在喝了大量的香槟酒和听了大量的甜言蜜语以

后，在甲板上配合着温柔的音乐长时间地跳了华尔兹舞以后，会像烤面片上的热干酪那样溶化和渗出汁来。他然后会说服她在美好、温柔的夜晚散一会儿步——夜晚正在变得有点儿阴凉和多风——而那件事儿一晃眼就能办完，而这时候，其他的人都在下面的甲板上跳舞，或者在酒吧间里喝酒哩。眼下，他的心情是这么热切，他甚至害怕到了紧要关头缺乏男子汉气概，控制不住，甚至一想到这事儿就感到这样丢丑实在丢得太大，简直无法面对。在他的想象中，一切顺顺利利，不受阻碍，极为愉快，像儿童故事的快乐的结尾。

他梳洗打扮，直到看来他好像上了一层清漆似的；由于开玩笑的兴致正处在顶峰，他围了一块娃娃的围涎，秃头上戴了一顶有褶边的娃娃帽，把帽带系在下巴底下。他像一只归家的鸽子那样笔直地挤过那些在找座位的混乱的客人，因为座位的安排已经完全改变，平时的座位卡倒是都放着，但是没有人知道上哪儿去找到他自己的；他散发出一股强烈的玛丽亚·法里纳牌科隆香水的香气。服务员们待在那儿忙乎，在帮忙，人们盲目地跟着他们走来走去。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人人都知道，那伙西班牙人将坐在船长的那张餐桌旁，而船长原来的那些客人都不在桌旁。里贝尔先生耷拉着脑袋，使劲挤过人堆，抓住利齐的胳膊肘。她一看到他的娃娃帽，高兴得尖叫起来。她穿着一件绿抽纱长袍，戴着一个小小的遮住眼睛的绿面具，扯着嗓门问，他究竟是怎样设法认出她来的！里贝尔先生坚决地把她向舷窗下面一张双人座桌子前推去。“不管怎样，我们坐这儿！”他不顾一切地喊叫，突然用男高音唱起歌来：“某一个时候，某一天……！”

“某个地方，用某种办法！”利齐参加唱起来，比他高两个音，

走调了。他们互相弯腰凑过去，两个鼻子几乎碰到了，合唱的时候，互相把歌声灌进对方的嘴去。“马上送香槟来。”他吩咐那个最近的服务员，他不是管那张桌子的。“为你效劳，我的先生，”那个服务员说。他顿时不见了，没有回来。

“香槟，香槟！”里贝尔先生对着空中喊叫。“我们要香槟！”

“某一个时候，某一天，”利齐唱着；他们两人都对她的机智大为欣赏，高兴得忘形了。他们注意到鲍姆格特纳两口子；她穿着巴伐利亚庄稼人的服装，而他呢，戴着用粉笔画的小丑面具，假鼻子和挂上去的络腮胡子。两口子打量着他们，脸上特别现出没有欢乐的、带有谴责意味的表情。那伙古巴医科学生排成一溜儿，唱着《蟑螂》跳跳蹦蹦地进来，全都穿着水手穿的短上衣，戴着有红绒球的便帽。他们冲到他们自己的餐桌旁，好像是在用突击占领它，而且准备为它的被包围抵抗似的。那对新娘和新郎穿得跟平时一样简单，安静地坐在他们的桌子旁，拿走座位卡放到隔壁的桌子上，然后坐着，相对温和地微笑。他们打开放在他们盘子旁的两个小包，取出镀金的纸帽和发出尖声的哨子，把它们放在一边。一瓶葡萄酒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在喝酒前碰了碰杯。

一只厚实的大手——手指头两头一样粗，一个粗壮的大拇指跟手掌连在一起，手掌有力地连接在一个肌肉发达的手腕子上，手腕子上盖着密密麻麻的一层在餐桌的灯光下闪闪发红的汗毛——从里贝尔先生的肩膀后面伸出来，从金属插座上拔起座位卡。

里贝尔先生的皮肤冷飕飕地起鸡皮疙瘩，当一个熟悉的粗声粗气的声音带着回荡声和外国口音说出简直糟糕得没法听的德语的时候，他更冷了。“对不起，我这么来打扰你，不过这是我

的桌子,"阿尔内·汉森绕过来,走到他能面对里贝尔先生的地方,在他的鼻子底下挥舞着座位卡。他的背后,站着格洛肯先生,在他的头发里孤零零地插着一支彩色羽毛的大羽毛笔,他的粉红色的领带上写着花体字姑娘们,跟我走!汉森在利齐的盘子前拿起第二张卡,挥舞着。"难道你们看不见吗。这上面写着汉森先生和格洛肯先生。所以我真弄不懂,干吗……"

利齐伸出手去,轻轻地在他的前臂上碰了一下。"啊,可是亲爱的汉森先生,一定要设法弄懂——"

"请别说,"里贝尔先生打起精神说,他的头顶上清清楚楚地冒出大颗的汗珠,那些汗珠马上汇合在一起,流动了,"请别说了,小姐,让我来解决……"

"没有什么事情要解决的,"汉森用他的没有压低的、重得像大棒的声音吼叫,"什么事情也没有,你只要去找你自己的桌子。别来碰我的就行啦!"

"汉森先生,"里贝尔先生说,剧烈地克制自己的感情,他的下巴从衣领里刷地冒出来,他那顶娃娃帽一跳一跳的,"我不能忽视你对一位女士态度粗鲁。请在主甲板上跟我见面。"

"我干吗要在什么地方跟你见面?"汉森吼叫,以压倒的姿态居高临下地盯着他看。"我要求你归还我的餐桌,你要为这找麻烦吗?"接着他轻蔑地看了利齐一下,刺痛了她。她膝盖打着哆嗦站起身来,央求里贝尔先生:"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接着她那么快地走去,他不得不跑着赶上她。"找到我们的桌子,"他对最近那个服务员喊叫,几乎跟汉森先生一样凶狠。那个服务员马上说:"跟我来,我的先生——餐厅里从来没有这么混乱过。"不过,他似乎认识里贝尔先生,很快就找到他们的桌子,拉出利齐的椅子,一边利索地对里贝尔先生吩咐:"马上送香槟来!"说

“是！”

“他侮辱了我，”利齐抽抽噎噎地说，揭起她的小面具轻轻地擦眼睛。里贝尔先生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这种情绪。他只感到高兴而不管起因。

“别再想这事儿了，他会吃苦头的，”他坚决地说，擦着他的头顶，把他的手绢塞进衣领。“我们别让我们的黄昏被那个蠢货毁了！”

“他总是说你的椅子是他的——记得第一天的事儿吗？我当时就知道，他是个下等人。从他的谈吐来判断，我想，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分子……”

“哈！”里贝尔先生说，“那一回，我把他撵走了！这一回，他来报复。”这个想法使他的心情好转。“瞧，我要让他为这事儿感到遗憾！”

“你要怎么办？”利齐高兴地问。

“我会想办法的，”他回答她，充满信心地满面笑意。

他们从眉毛底下鬼鬼祟祟地望出去，望过半个房间，只见汉森戴上放在他盘子旁的那顶红三角帽，沉着脸向周围瞟了一眼，把帽子取下来。那个驼背格洛肯龇牙咧嘴地笑着，像屋檐上作滴水嘴用的怪兽雕像。没错儿，他会高兴看到打上一架的——他不会有危险！“你看到那个叫人作呕的矮子吗？”在倒香槟的时候，她说。“干吗要允许这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活在世上呢？”

“这是个大问题，”里贝尔先生说，对她露出一脸笑意，开始谈他喜欢的一个话题。“作为出版人，我的目的是引导我的读者的思想到我们的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去。我近来找到一个医生，让他开始写一系列非常渊博、科学性非常强的论文，鼓吹消

灭一切不健全的人，一生下就被消灭，或者一旦他们证实在任何方面不健全，就马上被消灭。当然喽，没有痛苦，我们希望对他们也跟对其他每个人一样仁慈，不但消灭身心有缺陷的或者没有用的婴儿，也消灭老人——所有过了六十岁，或者六十五岁的人，或者譬如说，等他们到了没有用的时候，已经丧失健康、筋疲力尽，已经成为消耗我们的民族的有才能的人、年轻人和强壮的人的能量的累赘——我们干吗要用那些负担来拖累他们呢？那个医生准备提出那篇论文，列举一些引自医学研究、实践和社会学的统计资料的最有力的论证、例子和证据。当然喽，包括犹太人，还有一切非法混合了种族血统的人，白人跟任何一种有色人——中国人啊、黑人啊……一切这样的人。至于任何犯了严重罪行的白人——好吧，就说他吧，"他不怀好意地对她眨眨眼，"要是我们不把他处死的话，有一个情况是肯定的，他不能再生孩子，把他那种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妙极了，"利齐乐得唱起来，"那么，我们就不会有那个矮子在我们附近了，也不会有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可怕的小个子了——也没有那些西班牙人啦！"

"还要消灭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哪！为我们的新世界——"里贝尔先生举起他的酒杯向她的伸过去；他在那一片辉煌的未来幻景中，又兴高采烈了，几乎忘掉了，他要消灭的那种他不喜欢的人数目再大也不可能包括那个他最不喜欢的人——阿尔内·汉森，他这个人是个强壮、健康、有用、强有力的人，是个懂得怎样保护自己的人，他总是会，不管在哪儿始终会，找到标着他姓名的座位，占用它，或者像他对付里贝尔先生的帆布躺椅那样，尽管清楚地标着他的姓名，还是满不在乎地占用它。那只长满了毛的爪子能跟狮子搏斗，那张长着一口整齐的大牙的嘴——"

里贝尔先生冷不防打了个冷战。这样的念头会把一切都毁了的——别去想了,到明天早晨再说。他一口吞下那杯香槟酒,好像他在从啤酒杯里大口地喝第一口啤酒似的,利齐也一仰脖喝干她的酒,他马上再倒,吩咐再来一瓶。盛大的晚会终于开始,它不是在哪儿都可能结束吗?里贝尔先生有把握,他知道。

那个事务长躲闪和拍打那些飘浮着挡住他的道的彩色气球,好像它们是马蝇似的;他站住在特雷德韦尔太太的桌子前,一只手里拿着一个酒瓶,另一只手里拿着两个香槟酒杯。"我们德国人,夫人,"他严肃地说,"在那次战争以后不再容许用香槟这个词儿来称呼我们德国的冒气泡的酒——我们不希望这么做。不过,要是你允许我向你提供一瓶我们的上好的绍姆魏因酒的话,我会高兴的。我自己把这种酒跟质量最好的莫耶特·香当[①] 或者克利科[②] 作过多年比较,没法分出有什么区别。"

"当然没有,"特雷德韦尔太太抚慰地说。"务必请坐下,我会高兴的。请端个椅子来。"事务长站着,拿着酒瓶,打不定主意,稍微有点怀疑她的诚意;他天性多疑,她的热诚的表示像一阵小小的凉风吹过他的笼罩着云雾的脑海。不过,他把酒瓶放在桌子上,示意服务员端来一张椅子。

珍妮和戴维坐在他们自己的餐桌旁,望着这个没有欢乐的、激动的场面,注意到有人没有来——舒曼医生、威廉·弗赖塔格。珍妮在几分钟前看到弗赖塔格在酒吧间里,坐在那儿的一

---

① 莫耶特·香当(Moët Chandon):法国埃佩尔内地区酿造的一种著名香槟酒。

② 克利科(Veuve Clicquot):法国波尔多地区酿造的一种有泡沫的葡萄酒。

张小桌上进晚餐。他站起身来，鞠了一个躬，大声跟她说："今天黄昏跟你跳第一支舞吗？""行，"她没有站停，大声说，用微笑回答他的微笑。她第一次感到，这个黄昏可能不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她兴奋起来了，手往上伸出去，轻轻地拍一个飘浮在她的头顶上半空中的汽球。

"瞧，"她说，"戴维宝贝儿，这是我对这个狂乱的狂乱的黄昏的贡献。"因为戴维在那么快地跑下来跟她会面的时候，她注意到他的脸，注意到特雷德韦尔太太却这么磨磨蹭蹭，不走近他们，她知道他又爱她了，或者说信任他自己对她的感情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可喜的和解又开始了；她感到他一下子那么喜悦那么热情，好不容易才使劲克制住自己没有说出一些十分糟糕和令人没法回答的话把事情统统弄僵掉，譬如说——"啊，戴维宝贝儿，我们干吗不能……我们干吗不，或者我们干吗要，或者我们将干什么或者说什么，或者我们将上哪儿去，为什么，为什么，当我们有了这个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互相叫对方不快活呢？"她保持沉默，对他微笑，她的眼睛微微闪亮。戴维伸出手去，摸摸她的手。"珍妮天使，你的模样真可爱，你真的可爱，"他一本正经地说，好像他希望她相信这话似的。她确实相信，而且是全心全意地相信，看到他的容貌都变了，在他们的爱情神秘地显现的时候，他的容貌总是会这样改变——没有理由，没有缘故，有它自己发作的时候和时机，一晃眼就不见了，然而它总是带来它会天长地久的幻觉。

勒温塔尔先生独自个儿坐在餐桌旁，那顶古怪的纸童帽歪戴在他那张爱挑剔的脸上，他挑了酸奶鸡油鲱鱼、黄油甜菜、煮土豆和慕尼黑人牌啤酒作他的欢宴的晚餐。那个服务员的手的

随随便便的动作引得他向上瞟了一眼。他看到了一丁点儿他非常熟悉的神情，一种鬼鬼祟祟、叫人讨厌、好奇中带轻蔑的神情，不仅仅是嘲笑勒温塔尔先生个人、他的整个民族和宗教，也嘲笑他的不像话的晚餐，它是他的生活情况的象征，是他作为在一个极端自私的非犹太人社会中的一个贱民的地位的象征：他不得不从大堆的肮脏的烤猪排啊、炸猪排啊，火腿啊、红肠啊、猪蹄啊、龙虾啊、蟹啊，牡蛎啊、蛤蜊啊、鳗鱼啊——天知道有多脏——中小心谨慎地挑出他那一份饭菜，谈不上洁净，只是过得去罢了，甚至在他的肚子有点儿饿的时候，他一看到卡上的菜名还反胃。

那个服务员是个脸相温和的年轻人，他对犹太人的厌恶是那么根深蒂固，已经习以为常，变成第二天性了，他完全发觉脸上流露出神情；他正要倒啤酒的时候，勒温塔尔先生几乎叫起来："别倒！这不是我要的……把酒瓶拿回去，给我送一杯慕尼黑人牌生啤来。"

那个年轻人说："对不起，我的先生，可是我们没有生啤了，也没有黑啤了，只有瓶装的淡啤酒。"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应该先告诉我，是我点酒嘛，"勒温塔尔先生狂怒地说。"是你付这啤酒钱呢，还是我付？这酒是谁喝的，是你吗？这是什么地方，你可以不告诉顾客就改变他要的东西？你要我告诉你的服务员领班吗？"

那个服务员对这个威胁显得泰然自若。"如果你高兴的话，我的先生，"他用恭敬的语气说；勒温塔尔又看到一些那种神情了，这一次，没有掩饰——上嘴唇竟然那么微细地撇了一撇，那双天生傲慢无礼的蓝眼睛转动了一下。

"嗨，你在等什么？"勒温塔尔问，他的火又冒上来了。"倒酒

吧，倒酒吧，给我再拿一瓶来！"他把酒杯向桌子边推去。那个服务员倒啤酒，在餐桌上作了一些老规矩的讨好的动作，好像在改善服务似的，然后很快地走掉了。勒温塔尔先生记起了他那顶滑稽的帽子，把它一把拉掉，捏得皱成一团，踢到桌子底下去。他大块地吃他的土豆和甜菜，然后吃鲱鱼和酸奶油，饭菜哽在他的喉咙里，啤酒都很难把它们冲下去。他刚才跟其他几个乘客在船上转了一圈，厨房里的景象和气味叫他难受。他带着憎恨的心情又记起来了，甲板底下那个肮脏的地洞似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毫无例外地放在同一个锅里煮，压根儿没有办法保持洁净，没法正正经经地进食，因为他们处理食品的方法不管从哪方面看都是肮脏的，脏得可以毒死人。哪怕是一口他都再也咽不下去了，然而他的肚子饿得慌。那个年轻的服务员拿着他的第二瓶啤酒回来的时候，他推开他的盘子说："把这些猪食拿走，给我来两个煮得很硬的鸡蛋来，再来一瓶啤酒。"

为了制造戏剧效果，歌舞班子的人拖延到人人都入座后才进来。船长一点儿不知道这个策略，按照惯常的时间就座。他向周围的空座位瞟了一眼，就毫不耽搁地开始点他的晚餐。那些装饰使他想起农村教堂墓地里坟墓的装饰。桌子中间放着一大堆红玫瑰，其中混合着闪亮的锡纸树叶和一种叫不出名字的镂空的纸花。一只缺了一些羽毛的鸽子标本停在那堆人造花装饰的上面的一根棍子上，嘴向下，它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小纸牌，牌上用彩色蜡笔只写了一个词儿："致敬"。船长带着懒洋洋的好奇心，甚至是觉得有趣的心情探出身子，看着这个孩子气的陈列，鼻子里闻到一股几乎要致人于死地的人造的玫瑰浓香。他往后靠去，头转过一边，尽可能地呼去，然后开始打喷嚏。他无

声地打了三个喷嚏，用一个食指紧紧压住他的上嘴唇，像他在童年别人教他的那样，免得在教堂里打喷嚏。他沉默地憋着，不让喷嚏打出声来，身子都痉挛了，感到眼球好像要爆裂出来似的，要不，鼓膜会震破。最后，他屈服了，去摸手绢，直挺挺地僵坐着，头转到房间的一边去，痛痛快快地一连打了十一二个喷嚏，用手绢捂住声音，打得直淌眼泪，直到把那股怪难闻的香气打出来为止；他的鼻子擤得通畅极了。这使他脑子清晰，但是使他的眼光更模糊，看不清这个考虑不周到、用意极暧昧的晚会，这个场面不像他一生的经历中参加过的任何一个场面。他伸直胳膊用双手把传播疾病的致敬的装饰品从他身旁推到桌子对面。那只鸽子从停着的棍上掉下来了，船长没有注意到。他看看表，给他上汤有规定的时间，现在差不多过了一刻钟了。自从他当船长以来，船长从来是没有这样等待的，哪怕是在他自己的家里。他开始窝着火，瞪着眼，气鼓鼓地，一动也不动，极像一只受了冒犯的鹦鹉。他的尊严要求他马上开始进晚餐，作为对他们的无礼的一种谴责，而且更可以尽可能地表示他不把那些从格拉那达来的，或者不管他们打哪儿来的，下三滥放在眼里。他向周围望去，后来眼光冷冷地逗留在几个原来跟他一起进餐的、现在分开了的人身上——胡滕两口子和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坐在一起，已经在用餐了，对他们周围发生的种种事情漠不关心。那个叫里贝尔的家伙和那个利齐跟往常一样，像猴子似的忙个不停，互相照杯。小个子的施米特太太跟鲍姆格特纳一家子坐在一起——至少他已经被豁免跟他们作伴啦！他没法说因为他们哪一个不在场而感到惋惜，但是他憎恨他们不在场的原因。保护他自己不受他餐桌上的乏味的客人打扰是他正当的权利和特权，在一次次累人的航行中都是这么办的；他可以而且确实退到

他的驾驶台这个圣堂去，他在那儿只见到下属，他们不会想到说话的，除非他们听到在跟他们说话，如果吩咐他们去办事，他们马上默不作声地照办，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才是他的真实的世界，其中包含着不容置疑的权威、界限分明的等级和仔细地分成的级别的特权；他对不得不跟任何别人接触极为厌烦。他知道得挺清楚，他的船上——所有的船上——来来往往地运送着从世界各地的港口上船的那些人渣：赌徒啊、小偷啊、走私分子啊、间谍啊、被驱逐出境的政治犯和难民啊、逃票的乘客啊、毒品贩子啊，一切统舱里的下三滥像传播鼠疫的耗子那样从一个国家流通到另一个国家，拥来拥去，逞强抢劫，暗中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全世界的文化和文明的秩序。甚至在表面上——人们可能希望至少事物有个好门面吧——一有机会，人们就显示出道德多么堕落的现象。他知道得太清楚了，家庭里的可尊敬的父亲，或者受信赖的妻子和母亲，独自出门去旅行一次，度一个抛弃正派生活的假期，仿佛在另一个没有人能查出他们的姓名的国家里；一艘船好像仅仅是他们的漂在水面上的窑子！

他的胃在痛，他拨弄了一下他的清淡的汤，害怕他的食物会使他呕吐和疼痛。哦——甚至在他从他的餐桌上的客人们那儿听到关于那些西班牙人的流言蜚语以前，他已经对他们有所耳闻了。这压根儿不值得他注意，他们完全明摆着是一伙带着他们的婊子的权杆儿，为了弄到合法的护照假扮成表演跳舞的男女，白天黑夜都在干他们的见不得人的下流勾当。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从偷偷摸摸地骗乘客的钱到把圣克鲁斯市镇上的店铺全都偷遍——他这会儿懂得在开船的时候码头上那个大叫大跳的疯婆子是怎么回事了。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怎么居然有办法勒索这么许多人，他们居然能坐到了他的餐桌上来，这是他们

再怎么也没有权利坐的地方嘛；首先，他们怎么会这么大逆不道地放肆，竟然想出这个念头来？他脑子里一直在想什么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痛苦的问题：他一直在想什么呢？居然让这样的混乱状态在他的眼皮底下蔓延开来，认为那是无关紧要的，只是让妇女们闲磕牙的事情。

他压制住马上离开餐桌的冲动。还是待在这儿的好，可以看看他们下一步的行为，让他们的胆大妄为的行径充分表现，然后在恰当的时刻用他的轻蔑来公开斥责他们。对付这种人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就是控制他们，牢牢地管教他们，使他们安安分分地待在他们的位置上。一旦你容许他们有一丁点儿越轨，他们就会硬挤进来，把你挤出去，就像那只把鼻子伸进阿拉伯人的帐篷的骆驼；在那以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采用：必须用火和剑把他们镇压下去。

船长对美国警匪片着迷，片中充满枪战、对夜总会的袭击、警察和匪徒的疯狂的汽车追逐、刺耳的喇叭声和响个没完的机关枪声，还有劫持、路边谋杀、一些直挺挺地倒在街头的身上中满子弹的流血的尸体，只是有时候隔了相当长的时间会有一个孤零零的匪徒在最后一个镜头中被带进死囚行刑室。他这会儿像有时候那样，把梦想作为自己的娱乐，他正提着一支真正精巧的手提机关枪，转身对准处在某个地方的一伙骚乱的暴徒；他总是处在极为有利的地位，把机枪旋转着，半圆形地扫射，把他们一排排地扫倒。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脑子里有一些想不通，但是还不足以打扰他享受他的幻想，因为尽管他没法想象自己除了站在已经确立的政府方面外还会站在哪一方，在事实上他却注意到，银幕上几乎总是匪徒们在使用机关枪。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事情应该是这样，这种事态只能存在于美国这样

野蛮的国家里。说真的，一切美国人都特别热心犯罪和做罪犯，热心在下流的演奏黑人爵士音乐的地下室酒馆里跳不正派的舞蹈和吸毒，他们是一种在邪恶中醉生梦死的堕落的民族，让他们的警察主要依靠比机关枪笨拙效力也差的催泪瓦斯弹或者手榴弹或者左轮手枪。姑且假定一个美国人是个正派人吧，虽然这很不可能，那干吗让他处在那么不利的地位呢？要不是那些匪徒总是内讧、自相残杀、死了许许多多人的话，他们可能已经完全接管这个国家了，好多年前就接管啦！不过，人人都知道，美国的匪徒和警察密切勾结，一方不靠另一方就没法壮大。双方的头头分割权力和赃物，捞进一切，从最高的政府职位到工会、最放荡的夜总会，甚至牲畜市场和粮食——可不是，还有国际运输业。天知道！一切的一切都表明那是一个巨大的匪徒的天堂，那儿只有小罪犯、愚蠢的警察和正派的工人才被杀害，或者挨打，或者受骗。除了电影告诉他这一切外，每天的报纸也告诉他同样的情况。总之，整个国家是被一帮帮匪徒统治的，只要他们高兴，那儿没有一条法律他们不能破坏，而胆敢反对他们的人一个也没有。

船长出生于以完全坚持道德著称的地方，是个靠航海图和罗盘仪掌管舵轮的人，牢固地处身在一个往上升的阶层中，其中有数不尽的地位高的人，最高那些他是不认识也看不见的。他深深地爱上了他对整个美国被无政府主义骚乱的世界末日似的幻景，那个地方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因为他的船从来没有把他送到任何比得克萨斯州休斯敦[1]更有趣的港口，那儿是那个国家的远离文明痕迹的部分，有一片草原，当中有一条运河。那条运

---

① 休斯敦（Houston）：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南部港市。

河比把他送进不来梅港的那条威悉河更窄、更沉闷。

他暗底里着迷地想着一再爆发的无法无天的杀人狂热，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甚至有的地方他在地图上也指不出，但是他自己总是在那些为执法而杀人的人中间，处在中心地位，总是在指挥和掌握。足以跟他希望的暴行相比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哪怕在战争中也没有；在战争中，他的作用，哪怕不显著的话，这他不得不承认，却是有用的、光荣的，但是他完全没有机会施展他的真正的才能。命运似乎跟他过不去：尽管他有能力处理最大的骚乱和犯上作乱的人，他在这儿船上处理的是愚蠢的争吵，统舱里有人砸烂脑袋，一伙小无赖在制造的麻烦；这些都不值得他注意，但是他必须去处理。

他沉默地想着他那个消失了的德国，他的童年和少年的德国，他只让那个德国进入他的心扉——那个秩序井然、和谐、纯朴、有礼貌的祖国；那儿每一个公共场所都挂着告示牌，不准干这，不准干那，指示人们，所以任何人不能有犯错误的借口，不管是谁干了错事，都清清楚楚有犯罪的意图。这使司法当局办案比别的国家迅速而果断。在一片草地旁竖立着一块写着“禁止”的极小的告示牌，哪怕一个不识字的三岁的男小孩也应该懂得，不可以把脚趾踩到草地边上去。他还不懂得，或者也许一时疏忽，没有注意告示，因为他出于孩子的无知或者不小心，把他的脚趾头踩在那块小告示牌附近的草地上了，他的带他早晨来公园散步的爸爸就用手杖揍他，揍得他的背上马上布满了青一条、紫一条的伤痕，这样，不但犯错的人能把这个教训牢记在心里，而且当众显示了做父母应该对年轻的子女执行纪律的范例……

船长打了个寒战，从他的白日梦中挣脱出来，看看他的表，对服务员说：“请给我倒葡萄酒，端鱼来。”

这当儿，西班牙歌舞班子的人员风风火火地冲进餐厅，穿着他们的职业的服装，显示出他们的职业的技能，排成一溜儿，好不热闹地向船长走去。他们按照一支流行的斗牛士入场进行曲的曲调的节奏走着，蒂托和马诺洛用两把吉他演奏着这支进行曲。那些女士用套在手指上的响板轻轻地打着拍子。她们的带着高兴的微笑的脸是黑色、白色和红色的面具。她们穿着红白两色有图案的薄棉纱长袍，有很长的褶裥拖裾。高高的玳瑁壳梳子和棉花做的玫瑰花突出在前面，梳子上披着短短的黑抽纱头罩，使她们的闪闪发亮的黑头发格外生色。她们一闪一闪地扇着用闪光装饰片装饰的扇子，彩色玻璃的项链、耳环、手镯和金色金属的装饰品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她们的裙子前面短，现出她们的穿着黑抽纱长筒袜和红缎高跟便鞋的俊美的脚踝子和脚。

男人们都穿着统一的服装：紧身的高腰黑长裤、红色的阔腰带和黑色的短上衣，他们的轻软的浅口黑跳舞皮鞋上有平坦的缎子蝴蝶结。里克和拉克各自穿着斗牛士的和嘉尔曼[①]的服装，他们身上有一点儿凌乱，因为都要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互相在背后拉头发或者服装。

整个歌舞班子的人员围着餐桌绕成一个圆圈转，一边鞠躬，演奏，发出喀哒喀哒的响板声，旋转着身子，形成狂热的庆祝，每一张脸上都现出热切的微笑。船长的反应十分冷淡，他站起身来，按照死板的礼节回礼。他们像面对一群热烈的观众那样作

① 嘉尔曼是梅里美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个吉卜赛女子；比才将小说编成歌剧。嘉尔曼的服装即吉卜赛姑娘的服装。

出反应。最后，那些服务员为女士们拉开椅子，她们发出小小的兴奋的叫声坐下，像一群乌鸦落到玉米地里；洛拉坐在船长的右边，安帕罗呢，在左边，其他的人在那张加长了许多的餐桌旁找到了座位；他们经过长时间的搏斗后，终于发现自己坐在船长的餐桌旁了，那是他们下定决心要坐的高尚的地方，哪怕一辈子只坐一回，不只是坐在那儿，而且证实了他们已经赢得了他们坐这个位子的权利。他们瞟着他们周围的其他乘客的时候，他们的微笑消失了，他们的眼神冷酷起来了，闪闪发亮，现出一副得意扬扬的神情；那些乘客中有些人仍然假装对他们不屑一顾。由他们去吧！他们一会儿也忘不了他们这个胜利的时刻。他们到船上来是来向船长致敬的，他们终于这么做了，并且场而热闹非凡。菜一道道端到他们面前，等冷掉了，端下去，只有里克和拉克除外，他们没有胃口不好的时候，其他的人一个个依次站起来，端着酒杯，发表讲话，每个人把花里胡哨的言词的安排稍微变化一下，都带着火热的希望表示，这个美好的盛会有助于促使两个伟大的、受尽苦难的国家，德意志和西班牙，互相更紧密地团结，可能恢复那古老而辉煌的制度——极其光荣的西班牙君主国和德意志帝国！

讲话一个接着一个，船长开始微微扭曲他的身子，当他们的言词中的政治态度显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他气得脸色煞白。他始终没有中止为皇帝[1]感到痛心；他恨透了被击败的德国的下流的假共和主义，发现这一伙乌七八糟的下三滥竟然声称在某种程度上跟他自己有关系，还自称为保皇分子，他感到震惊；他们在为一个崇高光荣的事业祝酒，按照事情的性质来说，这个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而逊位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事业他们是没有份儿的——他们只能生活在这个事业的下面，就像生活在他们的主人的鞭子底下。保皇分子？他们怎么敢说这个词儿？更不用说以此自称了。他们是要饭的，应该一溜儿待在街道边上，等皇室人员经过的时候欢呼，在皇室人员举行婚礼以后趴在地上拾从大教堂的门里扔出来的钱，在集市的街道上跳舞，然后传递那个篮子。

船长实在不愿意举起酒杯，他觉得要是跟这些不光彩的人混在一起，有一滴酒通过他的嘴唇的话，他会哽住的。他把酒杯举到离他的盘子几英寸高的半空中，用几乎看不见的动作挥动了一下，眼睛不向上看，生硬地点点头，又把酒杯放下。歌舞班子的人员轰地一下子站起来，好像佩服得要发狂似的，喊叫着："你的母亲万岁！"船长听到这种不合适的亲密的表示，脸涨得通红，恨极了。他的母亲死了二十多年了，而且在她生前他也不怎么喜欢她。那些闯入者紧紧逼到他的跟前，探出身子，直到女人的眼睫毛上的点点滴滴的黑睫毛膏、男人头发上的水汪汪的生发油，以及他们搽的香水散发出的叫人没法容忍的臭气，几乎沾在他的皮肤上，永远染在他的身上，他憋着一肚子气假装的感谢的神情化为乌有。他的脸色变得更阴沉沉、冷冰冰了，他把双手搁在椅子扶手上，往后靠去。他以前的那些客人开始为他感到痛苦，他们从分散坐着的餐厅的各个地方，开始用眼光接触，第一次表示一种意见一致的看法，甚至利齐和里特斯多尔夫太太都摇摇头，皱起眉头，甚至那个事务长和来迟了的舒曼医生也在交换不赞成的眼色。那对年轻的古巴夫妻让他们的孩子吃了早晚饭以后去睡觉了，这会儿邀请那个墨西哥外交官的妻子，小个子的奥尔托加夫人，跟他们一起坐在安排给他们的餐桌上，因为她自己的那张餐桌已经没有她的座位了；而他们正在寻找紧急状态下的可敬的

伴儿。他们对那些围着船长的餐桌的跳舞男女的表演看了几分钟。那个年轻的丈夫说:“太不像话了。我买那些奖券的时候,再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会安排这样丢人现眼的表演!”

“这几乎叫人为做个西班牙人感到害臊,是不是?”奥尔托加夫人问,她完全知道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哪怕是最低级的,对墨西哥和古巴的西班牙人是怎么想的……像鹦鹉学舌那样说西班牙语的混血儿,他们的血管里流着被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血败坏了的血。“这些人比印第安人更低级。”

“啊,不错,”那个年轻的男人说,“他们不过是一些吉卜赛人,从格拉纳达来的。”

“我听说,”他的妻子说,“他们甚至比吉卜赛人更坏——他们是自称吉卜赛人的西班牙人。”

“可不是,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奥尔托加夫人说,“不过,我多么怜悯那个可怜的船长,我以前从来没有料到要为他感到难受过!我总是发现一切德国人都是没有同情心的。在墨西哥认识了那么许多德国人,我经常跟我的丈夫说:‘啊,请小心防备,别让你自己被派到德国去!’”

“我的曾祖父是德国人,哈瓦那的一个买卖人,”那个年轻的古巴人的妻子说,相当不高兴。

“啊,”奥尔托加夫人说,感到震惊。“我实在抱歉。”他们默不作声地继续进晚餐。

在船长的餐桌上,洛拉按理负责礼仪。她转动身子,眼睛里冒出怒火,向四面八方挥舞她的酒杯,像挥舞武器,用她低沉的声音喊叫:“静一静!我想提议来一次祝酒!为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西班牙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永久的友谊干杯,为在这两个贫困的国家里恢复秩序和政府的领袖们干杯!万岁!”“万岁!万

岁!”其他人异口同声地喊叫,干了他们的酒。船长没有动,而且除了他们自己人以外,也没有一个人举杯。接着洛拉又喊叫,她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响亮刺耳:“为一切自私、刁难阻挠、没有人性的人干杯,他们拒绝作出一份贡献,或者拒绝向勇敢、向领导、向崇高的理智和感情致敬,为——总之——为你,我的船长,”她说,一边向船长鞠躬,现出她的最娇艳的微笑,“为那些试图破坏这次欢乐和美好的致敬会的人,永远的耻辱、失败和丢丑,干杯!”

歌舞班子所有的人,甚至里克和拉克,都喊叫“万岁!”并喝干他们的酒。船长感到头里嗡嗡地在响,拿不准那是祝酒,还是诅咒,是拥护还是攻击什么人,站起身子,扔掉他的餐巾。那些古巴学生马上跳起来,摇晃着他们手里的盛着红酒的高脚酒杯,兴高采烈地喊叫:“为永远的失败!为丢丑!为耻辱!羞耻万岁!蟑螂万岁!”然后他们突然唱起他们那首不幸的蟑螂和她的许多贫困的遭遇的歌来。整个餐厅里的声音都参加进来了,开始是一片混乱的喊叫,马上就变成一场合唱,他们拍着手,轻轻地跺着脚:“蟑螂,蟑螂,你已不能走,因为你没有,因为你没有,大麻烟抽!”船长把手指头插人衣领,好像他快要被勒死似的,恶狠狠地咬牙切齿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餐桌中间视而不见地直冲过去。

那些舞蹈演员一点儿不顾这种情况和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选中的那个对象除外;他们跟在他后面,仍然大叫:“万岁!万岁!”虽然叫声被那吵闹的歌声盖过。他们在楼梯的顶端找他,没有找到;他已经避开他们,躲进了驾驶台,像狐狸躲进了地洞那样,二十四个钟头内不会再被见到了。

正像戴维预料到的那样,珍妮控制不住自己了,开始跟其他人一起摇摆身子、跺脚、拍手、扯着嗓门唱《蟑螂》,一路唱下去,

越唱越不像话，因为每一节比上一节下流；珍妮一字不差地唱下去，直到附近餐桌旁的人开始盯着看。只有她一个女人在唱。“我的上帝，”他终于绝望地说。“你知道你在唱什么吗?”

珍妮继续唱着，用手和脚打着拍子。“当然喽，我知道。你要是乐意的话，我就用英语唱。对不起，戴维，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心里被什么控制着，就跟你一样被控制着。我认为，整个事情是疯狂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不正当的，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是你知道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你为什么不干些事儿管一管呢——你为什么不及时告诉警察，或者一个店主呢？我们看到那些人到处乱偷呢。”

戴维顿时不耐烦地说：“这不关我们的事儿。”

“好吧，那么，你凭什么自以为正派，看不入眼这事儿？你干吗坐在这儿生闷气呢?”珍妮问，完全不顾他的不耐烦。

“这也不关我们的事儿，”戴维说，语气好像关闭泄水的弯管那样斩钉截铁。珍妮喝干了她的酒，看着乘客们慢腾腾地、零零落落地跟在那些跳舞的男女后面走去。“好吧，”她告诉他。“愿你过一个愉快的黄昏，我要去跟那个第一个邀请我的人跳舞啦！”留下他独自个儿享用甜点和咖啡。

乐队的领班已经得到蒂托和洛拉的仔细的通知，他得一支隔一支地演奏德国和西班牙舞曲，直到抽奖的时间来到为止。抽罢奖，他可以爱演奏什么就演奏什么了。为了答谢他同意帮这个忙，他们送给他五张抽奖的票子；他已经心心念念地想着要把那条绣花的白丝披肩送给住在威斯巴登[①] 的他那个女儿了。

---

① 威斯巴登(Wiesbaden)：德国黑森林州首府。

歌舞班子的人员和跟着他们来的人一露面，他就精神抖擞地奏起他心爱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音乐响起第一个声音的时候，一星微弱的火花、一点荧光似的欢乐，在人群中传开，用摇曳不停、充满希望的微笑点亮了每一张脸。整个西班牙歌舞班子的人员脚一踩上甲板，就一对对分开，旋转着迈开舞步，一对又一对配合着节拍跳起来，他们都像苗条的瓷人那样般配，显示出训练有素的优雅的风姿，蛇一样柔软，细细的骨头，光滑瘦削的脑袋，细巧的手脚。看来他们好像是一群俊俏而心地邪恶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冷酷的眼光和凶相的嘴跟他们的欢乐的动作互相抵触。有几对德国人跟着跳了——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和一个年轻的船员、鲍姆格特纳两口子，他们都苦着脸，埃尔莎和她的父亲、里贝尔先生和利齐——他们跟那些西班牙人一比，都显得土里土气、笨手笨脚和不相配——他们的身子，不管是体形、身高、身宽和他们的脸全都难以形容，他们的面色没有生气。只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笨重，说明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人员；这个特征，加上一点儿阵发性的、不自在的轻快，让人觉得仿佛他们在练习完全不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交风姿。那些西班牙人甚至不屑于向他们瞟一眼，但是那些德国人盯着西班牙人看，没法把眼光移开。他们盯着看的时候，一个模糊的印象首先在一个人，然后在另一个人的脑子里产生了，不久印象叫人心烦地变成了肯定；这些歌舞班子的人员不再用他们飞鸟一样灵巧的姿态在跳纯正、古典的维也纳华尔兹舞；他们在——可不是，没错儿——模仿——带有侮辱意味地用模仿来嘲弄德国式的华尔兹舞。

特雷德韦尔太太跟她的年轻的船员在进人跳舞的人群时，注意到这出最有趣的小小的喜剧，一起欢快地笑起来。珍妮和

弗赖塔格也同时看出来了。珍妮说："啊，多么伤害人和滑稽！"接着弗赖塔格有一点儿气呼呼地说："几乎太真实了，不滑稽了，我想。"接着他坚决地带着她旋转起来。他们转了一两圈，不可能不清楚地看到，那些歌舞班子现在正在模仿他们——而且他们中间任何人都再也不能否认，他们跟那两个出名的笑柄，里贝尔先生和利齐一样滑稽。佩佩和安帕罗已经成为特雷德韦尔太太的矫揉造作的、胳膊伸得笔直的舞姿和她的木头人似的年轻的舞伴的惟妙惟肖的模仿者；马诺洛和孔查恶作剧地模仿着弗赖塔格的显示出肌肉强健的、稍微有点咄咄逼人的姿态和珍妮的听凭摆布的、神魂颠倒的模样，头懒洋洋地往后仰着。潘乔和帕斯托拉从一开始就坚决地用模仿里贝尔先生和利齐的舞姿来嘲笑他们，潘乔像一个橡皮球那样蹦上蹦下，帕斯托拉呢，像一根装着轴的活动旗杆骨碌碌旋转。

"不像话，真的，"珍妮说，冷不防站住脚，"这太过分了。那些人真叫人受不了……我不想再跳舞了。"

特雷德韦尔太太跟她那个海员跳了一支舞，拒绝了丹尼的邀请，他原以为可以跟她一起消磨时间，直到他能跟帕斯托拉在一起。特雷德韦尔太太接受了那个胖子事务长的邀请，他用惊人的速度在狭窄的舞池里转了三圈，他的舞伴被紧紧抓着，像一条围巾那样飘动，接着，他突然站住脚，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鼻子里喷出响声，脸红得发紫；他闭着眼，把特雷德韦尔太太吓慌了，问，她是不是能为他做点什么？

"行，"他气喘吁吁地说，"你可以跟我坐在一起，再来一点儿绍姆魏因酒。"

但是，偏偏她那个面貌漂亮、身穿金边制服的年轻船员插进

来了，恭恭敬敬地向事务长鞠了一个躬，又把她带走了。他有一张光滑、俊俏的脸，没有一丁点儿表情，她察觉，一点儿都没有。他圆滑、利索、端正得无瑕可击和一副不懂人情世故的模样，好像他是浇铸出来的。他跳舞跳得像蜡那样光滑，均匀的小步配合着她的步子，跟她保持着不时髦的、正规的距离，好像他是在她自己的跳舞学校里训练出来的。“唷，他年纪轻得可以做我的儿子，”她不由自主地想着，“可他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她断定这不是真正的缺陷，定下神来配合他的悠闲的旋转的风格，开始享受那飘浮似的灵活的转动和令人愉快的男性的接触，没有重量，没有负担，只有一个幽灵。她闭了一会儿眼睛，在引人入睡的黑暗中跳舞，对这个用手指头轻轻接触着她的腰和手掌的、在引导她跳舞的幽灵产生着柔情，这个幽灵是在她跟任何男人跳舞的好久以前，在她的白日梦中跟她跳舞的那个情人。睁开眼睛，她发现他用一种出人意料和叫人心烦意乱的古怪的热切的神情望着她的脸。这是她的想象吗，是由那隐伏的兽性启发的吗，这是她自己的寻找的眼神吗？或者这真的是好色的闪光吗？——因为她的眼光跟他的眼光相遇的时候，他的眼神变得没精打采、冷淡、甚至也许有一点儿厌烦，接着他说：“让我们离开这些流氓。你喜欢在船上转悠一下不？这是有庆祝演出的晚会上的惯例。”

特雷德韦尔太太回想起她在形形色色的船上经历过的航行，到过多少港口，然而似乎还从来没有在欢庆晚会上到船上去转悠过哩。也许，难以想象还有什么事儿更乏味的了。她向她的陪同者微笑，轻轻地把手伸进他弯着的胳膊肘，动身去看新的景色，要是算不上有趣的景色的话。

当音乐变成伦巴的时候，那些古巴学生全体出动，找上那些西班牙舞蹈演员作舞伴——这是一场炫耀的比赛，在比赛中，每个人都声称姑娘是他最先邀请的。有两个学生落空，他们马上另找可能遇上的别人，一个抓住了刚跟弗赖塔格跳罢舞分手的珍妮，另一个微笑着，哼着曲调，一条胳膊搂住埃尔莎，一只手握着她的手。她发现自己恍恍惚惚地盯着他自己的爱人，那个陌生人，那个她喜欢的漂亮、愉快的人的眼睛在看。不，这不可能——然而，他在微笑，稍微皱着眉头，而且她感到他的一条胳膊在推她的腰，她呢，站着像一株种植在泥土里的树，一丝肌肉也没法动。"啊呀，来吧，"他用有礼貌的西班牙语哄劝地说，说得明明白白："我们去跳舞。"

埃尔莎站着，挪动不了。"我不会，"她用小孩的声音低声说，透着害怕。"不行，不行，对不起——我不会。"

"你自然会，"他语气轻松地安她的心，"任何有腿的东西都会跳舞！"接着他在原地表演起他的跳舞技巧，因为拥抱着这样一个不动的身体实在太沉，他没法把她推离基础。"你瞧？"

"啊，不行，"埃尔莎绝望地喊叫，"我从来没有学过怎么跳舞嘛！"

他垂下双手，站到后面去；她心惊胆颤地看到他脸上极厌恶的神情。"对不起！"他说，接着转过身子，很快地走掉了，好像离开一件极讨厌的东西似的；她站在那儿，他去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啊，他再也不会回头看了。几秒钟后，他在跟特雷德韦尔太太跳舞了；她暂时离开她那个年轻的船员，换上这个从欢乐的晚会上来的有趣的人儿；埃尔莎感到她的心最后碎了。她巴不得马上上床去，尽情大哭一场，但是她先得跟她的父母说一声，要不，他们会找她的。他们在交谊厅里玩跳棋。"别，埃尔莎，"她

的母亲说，"你要是这么早就上床的话，你会睡不好的。你干吗不去跳舞呢？"

"我不想跳，妈，"她说，声调是那么凄凉；她的双亲带着亲密的同情和理解的神情看着她。"好吧，"她母亲说，说得这么知情会意，埃尔莎羞得满脸通红，"你倒聪明，还是安静一会儿的好。那么就坐在这儿，跟你爸爸下跳棋吧，我要继续编结，在经历了这一些吵吵嚷嚷、愚蠢荒唐的事儿以后，我们在一起过个美好的黄昏吧。"

埃尔莎的心里感到她的不幸的命运，以前她还只是害怕在某个可怕的未来会遇上哩；她茫然地向她的父亲微笑，开始下棋。

阿尔内·汉森坐在帆布躺椅上，一瓶啤酒放在他身旁的地上，他的巨大的脊背弓起着，两条眉毛在鼻梁上打成一个结，望着安帕罗先跟马诺洛跳舞，接着跟那一伙疯疯癫癫的学生中的一个跳舞；整个黄昏，她没有对他瞟一眼。奏起第三支曲子的时候，那是一支德国华尔兹，他笨重地走到她面前；她站在马诺洛附近，在扇扇子。马诺洛知趣地走得无影无踪。汉森紧紧地抓住她的两个胳膊肘；他在跳舞的时候，喜欢这么抓着。她使劲挣开了他的手，扇子掉在了地上，这他没有注意到。她弯下身子去拾扇子的时候，他第二次向她扑过去；她用鞋跟狠狠地踩在他的脚上，还冷不防挺直身子，冷不防用头顶喀的一声撞在他的下巴上，撞得他突然闭上嘴，咬伤了自己的舌头；舌头流血了。

"嗨，瞧你干了什么，"他责怪地说，掏出一条大手绢，让一滴滴鲜红的血滴在那上面，轻轻地抹了又抹。

"那么，别来碰我！"安帕罗怒火直冒地喊叫。"这整个黄昏，

我决不会拉着你这具臭气熏天的尸体到我转悠的每一个地方去的。我在干活儿，抽奖的时间快到了。你去坐在那儿，喝你的啤酒，别来碍事。”

“我买了四张票，”汉森提醒她，一边在他的衬衫兜里摸，掏出他的票。

“可不是，四张，你这个下三滥的杂种，”安帕罗不慌不忙地说。“四张！”她吐了一口唾沫，正好飞过他的左边袖子。

“你会收回你的话的，”汉森突然庄严地说，“你会为你这么干懊悔的。他回到他的躺椅那儿，又要了两瓶啤酒。

珍妮遇上的那个学生一抓住她的腰和手就开始摆弄她起来，旋转她，合着拍子伸直胳膊把她推出去，拉回来，逼近她，热烈地拥抱她，又满不在乎地把她抛出去，直到她估计他会抓住她的两条腿，把她头下脚上地旋转。她喘着粗气抗议。“我是个贴身搏击者，”她笑着说，“我喜欢贴身肉搏，比一个高低。这一切杂耍表演——是为了什么呢？”

他对这些恭维话感到高兴。“啊，”他用怪声怪气的英语说：“你喜欢？是这样吗？”他出人意料地开始不断旋转她的身子，好像她是个陀螺似的。

“别，”珍妮说，“别，”她挣脱了身子，当然是哈哈笑着。她欢快地，欢快地向他挥手告别，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她跑到弗赖塔格那儿去。

他给了她一个非常德国式的微笑，说：“告诉我，你应该知道的，是不是一切女人在心里都情愿要暴徒、靠女人吃饭的权杆儿和下三滥？女人对下流的爱好是怎么回事呢？对污泥的思念吗？”

“下流?”珍妮说,感到困惑。“污泥?他只是一个嚷嚷咧咧的中产阶级的医科学生,他可能讨人厌,可是他下流什么呢?”

“他刚才跟你跳舞,显得不尊敬,好像他在拿你开玩笑,”弗赖塔格直率地说。

“他可能是那样吧,”她干脆地说。“可那是他的事儿,不是我的呗。”

“你没有自尊心吗?”他严厉地说,因为他已经对试图理解这个奇怪的姑娘感到厌烦了;她似乎缺乏他需要的女人身上的所有素质,然而她不断地引起一种跟他以前经历过的都不同的性欲——赤裸裸的欲念,没有丝毫热情和柔情。他甚至不喜欢她。

“不多,”她说。“你在试图跟我挑起一场争吵吗?别这么干。我已经吵够了。”

弗赖塔格想着,这确实是一个坏开端,他本来对这个黄昏是抱有一些希望的;他马上改变调子。“别对我不满,”他说,“我也许只是有一点儿忌妒。我们在开始散步以前先去跳舞吧。那些脑子有毛病的西班牙人在想什么,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戴维吃罢甜点,喝了一杯兑利口酒的咖啡,抽了一支烟,然后悠闲地踱出餐厅到酒吧间去,相当希望珍妮也许会注意到他沉着安详的态度。不过,他没有看见她,所以他在酒吧间里跟威廉·丹尼待在一起;那儿,鲍姆格特纳两口子已经坐在一张小桌旁了,没有带他们的儿子。胡滕两口子坐在另一张桌子旁,共同享用着一瓶酒;贝贝看来完全从它的不幸的经历中恢复过来了,躺在他们的脚旁。

戴维时不时地想着,他和丹尼竟然结下了这个交往有限但是令人满意的酒友关系,对这种方式感到奇怪。他断定丹尼能

够跟任何人或者独自个儿喝酒,没有一点儿不一样;但是戴维的主要麻烦是,他确实不喜欢任何人,只有珍妮有时候除外,而珍妮呢,也每天越来越少想见她了。跟丹尼在一起倒挺自在,因为在戴维看来,丹尼压根儿不存在,不管怎样,无非是一大堆平庸的欲望和古怪的地方性的偏见。他已经掂掇过他了;在他看来,他算不了什么。他们坐着,各自喝酒,默不作声,互相那么疏远和没有关系,所以反倒有了伙伴的模样。

他们喝了第四杯威士忌后,戴维的舌头稍微有点儿大了,他用慢悠悠的语调说:"每一回,我向外面那儿看,看到她跟弗赖塔格一起走过去。瞧,她又走过去了,"他说,有气无力地挥挥手,"她走过去了。"

丹尼在他的高脚凳上斜探出身子向戴维凑过去,脸上充满一肚子阴谋诡计的表情。"我不想进行人身攻击,"他热切地说,"我再怎么也不搅合在别人的事儿里,听着,可是要是那个任性的妞儿是我的话,我会折断她的每一根骨头。这跟我一点儿不相干,不过,相信我的话,你在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他的醉貌咕咚的关心的表情感动了戴维,后者的反应是马上涌起一股强烈的表示善意的感情,倒不是针对丹尼的,而是针对这些话。"啊,那没什么,"他说,"我知道你遇上了什么难题。那个帕斯托拉。我们是两个轮船出了事、待在同一艘救生艇上的水手,"他亲切地说。他身子里仿佛有细弦线发出嘣嘣的声音在断裂,一次断一根,他的肋骨底下好受些了。他甚至听到他自己像个蠢货那样对丹尼说话也不对自己恼火,丹尼一直像蠢货在说话;事实上,他欣赏这种情况。"我们都有自己的烦恼,"他豁达地说。"你会找到一条摆脱它的路的。"

"我在试图找出一条陷进去的路,"丹尼带着猥亵的意味说。

"摆脱出来的路是容易的。我不介意告诉你,她从我这儿得到的钱比我打算给她的多得多,她是个狡猾的老手,现在她在设法搪塞我。好吧,今夜会跟她摊牌的,就在这儿今天这个夜晚,我老实告诉你。不会有任何麻烦的,除了她以外,任何人都不会有一点儿麻烦的,"他说。"我只是把她弄到手,像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么回事。"

戴维仔细想了想这话。"哦,"他同情地作出了判断,"跟那样一个女人在一起,怪不得你吃酵母。"

丹尼感到困惑,但是并不生气。"酵母跟这有什么相干?"他问。"谁说过酵母?"他开始伸直胳膊轻轻推戴维转身,催他去。"去啊,"丹尼说,"你是个男人,还是耗子?去干啊。现在是你动手的时候了。去打掉她的门牙。"

"帕斯托拉的吗?"戴维问。"你干吗不去呢?这是你的事儿嘛。"

"说得对,好吧——"丹尼疑惑地说,"不,不必真的这样。我的目的是再给她一些时间做应该做的事情。我喜欢她处于完好的状态,"他考虑周到地说。"我不愿她给揍得鼻青眼肿……我老是说,男人操心好些,妞儿操心糟些。我就是这样的。不过,你已经有了那个珍妮,要是她是属于我的话,我不会让她随意跟人交往的。"

戴维有点儿使劲地把他那双近视眼看着那张斜着凑近他的脸,因为他现在想起了丹尼在彻头彻尾地进行人身攻击;他清楚地说,"得了,她不属于你,"心中闪过一个念头,顿时觉悟,补充说:"她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不属于她自己。"他有几分惊奇地听到这话,心中立刻感到像越过一道界线进入了一个新的真实境界,甚至接着就在平静地回顾从前的虚假的希望。那些跳舞的

人迅速转过酒吧间的门的时候，他的兴高采烈的心情又一下子变得闷闷不乐了——他们当中，有帕斯托拉和她那个学生，珍妮和弗赖塔格。他敲敲酒吧柜，把他们的两个酒杯往前一推。“照样再来两杯，”他说。“啊，好啊，只要他们不断地经过，我们就知道他们在哪儿。”

“可不是，还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丹尼说；他是那么放肆地乜斜着眼瞧，他的脸都变形了。

那对新郎和新娘胳膊挽着胳膊，本来吃罢晚餐在散步，这会儿在离开跳舞的人群的背风的一面站住脚，让那个沉着脸的金发小伙子推着那辆坐着那个病人的轮椅过去；那个像活鬼似的快要死的小个子蜷缩在一大叠毯子中间，用抖抖嗦嗦的手指头在翻一本小《圣经》。他靠近他们的时候，抬起兴奋的眼睛，举起一只颤抖的手，伸出去要抚摸新娘。他的丈夫感到她浑身剧烈地打着哆嗦，往后退缩，靠在他的身上。“愿上帝保佑你们的婚姻，早生孩子，”格拉夫先生说。那个新郎说：“谢谢你，先生，谢谢你，”因为由于年纪关系，他是不能不表示敬意的；他们站着，一动也不动，直到那个小伙子满脸怒火，不睬他们，稳当地推着轮椅从他们的身旁经过。新娘仍然有一点儿颤抖，靠得离她的丈夫更近一些。“啊，听起来倒像是诅咒，”她说，“啊，他差一点摸到了我！”

她的丈夫用一种做丈夫的表示亲切、纵容、宽慰和指导的新语气——这种语气对他们两人都是美妙的说：“你完全知道，根本没有那种叫诅咒的东西。再说，有什么能伤害我们呢？他不过是个可怜的、快要死的人罢了——说到底，他希望我们好。人要老和生病，真是件可悲的事情……”

那个新娘是个性情温和的人，马上懊悔她的不厚道的想法。她是个诚实的人，知道她有这样的想法是出于她厌恶老年、丑陋和疾病而且害怕那一切和更害怕死亡；死亡是唯一的选择，是逃避那一切的唯一出路。她感到自己相当明白事理和心情平静，情绪欢欣和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她用仿佛说梦话的声音说："我希望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死去。"他的丈夫，在船头隐蔽的地方悄悄地用胳膊搂着她，稍微摇晃了一下。"在年轻的时候死去？我们永远不会死的。我们会生活在一起，直到世界末日！"他们一起为幸福哈哈大笑，没有一丝嘲讽的意味，匆忙而心慌意乱地亲吻，生怕被人看见。

约翰这么迟来进餐，餐厅里几乎没有人了，他错过了汽球、纸帽和一切；没有人来跟他坐在一起。他来迟了，因为他舅舅偏偏在那时候发作了一阵咳嗽，差一点儿没把他闷死。约翰给他嗅盐，帮助他透气，给他用凉水洗脸，坐着用一把折叠扇给他打扇，希望他会咽气。他没有死，反而相当顽强地挺过来了，还吩咐他给他洗澡，换衣服。他死里逃生以后，倒精神抖擞了，要约翰坐在他身旁，帮助他吃晚饭，晚饭后，坚持要约翰推他到甲板上去呼吸空气——这个假冒为善的老头儿假装他需要新鲜空气，而实际上他想要的是看跳舞，听音乐，还要说那一切是多么罪孽深重。待到约翰匆匆忙忙地吃罢晚饭来到甲板上的时候，孔查在跳舞。她从她的舞伴的肩膀上向他扭扭手指头，用能溶化石头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但是约翰仍然知道，没有钱，他始终不可能比眼下挨得她更近一些。当她再看到他的时候，他正推着他的舅父在舞会的边上打转，她跟另一个舞伴在跳，这一回，她望着他的舅舅，在她自己的胸前画了个十字，用右手做了一个

下流的手势抵挡毒眼[1]，然后跳开去。

约翰慢慢地下定一个最胆大妄为的决心——他会弄到钱的，他一天也不会再容忍这个自私、贪婪的老人了，他假装是个圣人，却是个十足地道的魔鬼。他会结束这种奴役状态的，不管采用什么办法，他会使自己获得自由的——这是结局，结局，他说，每一次，他把这个念头说出口的时候，他总是又感到一阵惊吓，几乎心跳都停止了；然而，他会干的。他会再一次要求他的舅舅付给他欠他的钱——不会比他不得不付给一个佣人的多；他要是拒绝的话，嗨，那么——那么，他就会搜房舱，他会找到钱的。他认为他舅舅一直把钱包放在床头的垫子下面。他会等到他舅舅睡着，他会给他吃一包安眠药粉，他会找到钱，然后拿走——"

他突然掉转轮椅，把它推进门道，向房舱走去。

"你上哪儿去，外甥？"格拉夫先呻吟一声醒过来，问。

"你以为上哪儿去呢？回那个肮脏的窝呗。是你该睡觉的时候啦！"

"掉回头去，约翰。我不想睡觉。"轮椅的轮子砰砰地在一磴磴台阶上剧烈地碰撞着滚动过去，约翰固执地一声不吭。格拉夫先生找补说："上帝是善良的，可是他也是公正的，我再说一遍。我把你交给他，约翰。"

"这样最好，"约翰轻蔑地说，"你也只能这么办。"

他把轮椅猛地推进房舱，那里白天黑夜都亮着昏暗、微弱的灯光，积聚在那儿的浓重的讨厌的气味几乎使他的决心化为乌有；他吓得从头到脚都在慢慢地出汗。一时半刻也不敢耽搁，他

---

① 据迷信的说法恶毒的眼光会给人带来厄运。

旋转轮椅，低头弯腰，好像他要扑到格拉夫先生的身上去似的，几乎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喂，你要给我一些钱，要不，我会——钱在哪儿？你把它藏在哪儿的，你这个老吝啬鬼？我再给你一个机会！钱在哪儿？”

“声音别这么响，约翰。我不想要陌生人知道你出乖露丑。我早料到了，”他平静地说，喉咙里有痰的泡沫声。“这是你走向地狱的又一步。钱在它应该在的地方……”

“把它给我！”约翰横了心喊叫。“给我一点儿就行，可是我一定要。我想，你要是不给我钱的话，我会要你命的！”他举起双手，手指头弯得像鹰爪，好像要掐他舅舅的喉咙似的。

格拉夫没有挪动脑袋，眼睛盯着约翰的眼睛看，举起双手，手掌向外。他用使劲的、中气不足的、只比耳语高一点儿的声音说：“别干，我的约翰，我亲爱的孩子。你会被查出来的。他们会把你处死的。除此以外，你在这儿遇上悲惨的结局以后，还有上帝的审判呐。”

“该死的上帝的审判，”约翰说，暴跳如雷，但是退后一步，双手握成拳头。“别再跟我说这种混话。钱在哪儿？钱在哪儿？”

“你要是一定要做的话，就做个小偷吧，可是别做杀人犯。我求求你，不是为了我——你以为我怕死吗？为了你自己也别做杀人犯。别送掉你的命，我的孩子。你干吗不能耐心地再等几天呢？在我去世以后，你还有许多年可享受哩。”

约翰的愤怒和惊恐在他的身子里破裂，就像爆裂的动脉。他的脸皱巴巴，下巴打着哆嗦，眼睛里淌着眼泪，挂满在脸颊上，嘴的中央紧闭着，在抽搐，两个嘴角倒张开着；他发狂似的喊叫和抽抽咽咽地啼哭，直到他的话几乎噎在他的喉咙里：“我不想要你的命，我不想抢劫你，你干吗逼得我这么干呢？你干吗不能

把我像个人那样对待呢,舅舅?我损害你什么呢?给我一点儿钱吧,"他啼哭着,伤心极了,"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我不会要你命的——我只要自由!"他蜷缩着身子,坐在长沙发边上,用他的肮脏的手绢擦脸,擤鼻子。他的舅舅望着他,在悲伤地摇头。

"没有那种叫自由的东西,约翰,"他说,长长地、断断续续地叹了一口气,"没有那种东西。要是有的话,你怎么能指望用这样的办法得到呢?"

"我要买一瓶酒!"约翰喊叫,重又涌起一股反叛的激情。"我需要一些像样的衣服,你弄得我一直像个要饭的!我要跳舞,在年轻的时候要活得像个年轻人。我有生活的权利。只因为你快要死了——这难道也算是个理由,你可以把我跟你一起带进坟墓吗?"

格拉夫先生说:"我只想要拯救你的灵魂,约翰。我是非常爱你的。"

约翰觉得自己在软下来,在后撤,在节节败退,因为这狡猾的袭击打在他脆弱的部位上,使他暴露出弱点,这个部位就是他的作为人的感情:他对爱情的渴望、他对永远被排斥在生活之外、置身于一切情况之外、始终没法参予、尽他的一分力、成为他自己的同类的一员所感到的剧烈痛苦;他内心里在跟他自己挣扎和扭打,试图找到那些他需要的适当的话,向这个老人解释清楚,使他安心,要是可能的话,从他那儿得到他需要的钱,却不伤害他,不偷他,不结果他的性命,他这个该死的!"我的灵魂是我自己的,"他几乎是用他正常的声音气呼呼地说。

"不,这不对,"他舅舅平静地说,"这是说蠢话。不过,我再也没法跟你争了。我会放你走的。"他指指他的铺位。"那儿,"他说,"把手伸到垫子下面去,在墙壁附近,把我的钱包给我。"

约翰被这个突然的胜利所震惊，用双手在毯子中间没有方向地东摸西摸，害臊，低首下心，一肚子怨气。他找到了钱包，交给格拉夫先生，他马上打开它，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一个夹层，数也不数地给了约翰厚厚一叠钞票，他的痛苦的脸上现出可怕的微笑。

"为了你好，我本来也许应该采用另外的方式的，"他温和地说，"不过，没有一件礼物是吉利的，除非给的时候经过祝福，"他说。"祝福你。约翰，你本应该知道，我并不怕死。我并不是怕你可能要我的命才给你这笔钱的。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怕，要不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变成一个杀人犯。这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儿，约翰。这是你的，我不再是你的监护人了。爽快地收下吧，你可以走了，我的孩子。"

约翰紧紧地握着这厚厚一卷他相信可以替他买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的钞票，被他舅舅这个使他永远背上错误名声的决定弄得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说："舅舅，你把我像佣人那样对待，可是你不会敢像欺骗我那样欺骗一个佣人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把你错当作佣人，约翰。别打算用这种不老实的借口为自己辩护……好了，请扶我上床，因为我很累了。"

约翰把钱塞进他的短上衣的里面的兜，窝着一肚子火，沉着脸，忙乎他的活儿。"给我一份安眠药水，"格拉夫先生说。看他喝下药水，约翰被引发了怜悯心。他按照他学的那样给这个瘦得像骷髅的小个子小心地换衣服，在把服装换成睡袍的过程中没有不礼貌地暴露他的身子，一次举起他的一条胳膊，然后轻轻地放下，把睡袍拉到他的肿起的膝关节上，用两条胳膊像抱孩子似的把他的软绵绵的身子抱起，让他的四肢都伸直，轻轻地把他

塞到毯子底下;在这段时间里,约翰在跟他这种以前没有过的奇怪感情作斗争。"给你安置好了,"他用沙哑的声音说。"谢谢你,永远谢谢你,"他舅舅说。"好了,我可以休息了。"

约翰站在他的床前,犹豫不定,然后说:"舅舅,谢谢你。我会干得好些的。我保证——"

"请别保证,"格拉夫先生说,举起一只手,现出他的可怕的快要咽气的微笑。"唉,我的需要没有变。我一定仍然是你的一个负担,直到航程结束。我一定要活着,约翰,再一次看到德国。耐心些。"

"舅舅,你不会是我的负担的,"约翰热切地说。格拉夫先生第一次看到一张坦率、友好的脸,说也奇怪,一张宽容的脸,脸相变得那么厉害,他几乎认不出他的狠心的妹妹的狠心的孩子了。约翰向房门冲去,站住脚,回头看了一下,说:"明儿见,舅舅,愿你睡得香。明儿见,"他说。

格拉夫先生闭上眼睛,让那使人舒服的麻醉剂进入他的流动缓慢的血液和痛苦的神经——啊,闭上眼睛,停止呼吸,招来一个没有光的世界,不,一个黑暗的宇宙,那将是十足地道的幸福。啊,上帝,让太阳和月亮变得黑暗吧,熄灭你那些星球的亮光,就像我吹灭蜡烛那样。从你的没有神经的手中,降下黑暗和沉默、沉默和静止、埋葬在尘土底下的尘土的静止、没有眼睛的海洋深处的黑暗、沉默和静止。在你的黑暗中治愈我的悲伤吧,啊,上帝,我在你的亮光中眼花得看不见了。愿你在一个仁慈的时刻记得我,回答我的祈祷:愿你永远生活和存在于你的真身中,在你的光明中统治,可是放我走——放我走。别拒绝给我你的神圣的沉默作为礼物,你的永远的黑暗。啊,上帝,让我永远地死去……

约翰走近漫长、昏暗的通道的尽头的时候，已经能够听到音乐声、人声和海洋的声音。他在楼梯脚下逗留了一会儿，心慌意乱，心情忧伤。他的神经因为刚才受到惩罚被擦破而仍然感到刺痛，在他的脑子深处，仍然逗留着一股怨恨，一种他仍然被冤屈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始终不会消气的。他拒绝对他的舅舅心软下来，尽管他没法否认心在软。他跟他自己争辩，他的舅舅只是干了早就应该为他干的事情罢了，用不着等他提出要求，更不说威胁了。约翰几乎绝望地想着："我永远摆脱不了这事儿——永远不行——"

他把手伸进短上衣的兜，摸了摸那卷钞票，挺着身子，动身去找孔查，胃里却有一种不舒服的、担惊受怕的、往下沉的感觉。

他没有往远处去找；她就在那儿，跟安帕罗和蒂托一起在钢琴附近，闲着没事干。那儿已经放着一个盛着彩票的、盖着的小篮，奖品也展示着——形形色色的抽纱女性用品：桌布啊、围巾啊、扇子啊，还有两条打褶裥的裙子，料子是红色薄棉布的，镶有粗糙的白抽纱花边。他的心怦的一震，他突然站住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露天的甲板上；他在那儿，她可能看见。她没有看见，继续拿着一条裙子，轻轻地在褶裥底下踢着脚。倒是蒂托先看到了他。他向孔查做了个谨慎的手势，她看到后，把裙子递给安帕罗，向约翰扭了扭手指头，走过去见他，脸色严肃，一只手举着；她的屁股按照一种节奏摆动着，他听到她说过，那叫扭摆。有一回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她把他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腰部一侧，就在股骨上部那个地方，说："感觉到吗？只有西班牙女子能够这样摆动，这叫扭摆。感觉到吗？我不是吉卜赛人，你知道吗？我是真正的西班牙人，这就是特征。"他被微妙地从一边扭摆到另一边的屁股撩拨得上火了，这是完全出于天性的，不是在肌肉里

而是从骨头里发出来的；她坚持着这么摆动。“你是有意晃动的，”他责怪她，但是她一本正经地说：“不是的，我生来就是这样的。你听到过他们说的话吗，我的股骨？他们说扭摆，扭摆，完全是自动的。”

他站着，等她一路走到他的面前，对他好不容易才战胜他的舅舅这件事儿，仍然感到疑惑，仍然心惊肉跳；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干过的事情和面对的情况，血液里有一种很像恐怖的感觉。她靠近的时候，他们的目光紧紧地连在一起，没有一丝笑意，直到她来到他的下巴底下，抬头看，没有卖弄风情，在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丁点儿耍花招的神情。他甚至认为他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焦虑。他是处在这样强烈的兴奋状态，浑身打着哆嗦，简直不敢说话，因为怕他的声音会暴露他的情况，但是她毫不踌躇。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心上以后马上说：“你按照我跟你说的干了吗？”

他皱起眉头，用吓唬人的声调说：“你以为我会吗？你当我是这样一个傻瓜？”

她的手移开了。“上帝保佑我，原来你没有弄到钱。”她的失望使他发火。

“我当然弄到了，”他冒火地夸口说，一点也不害臊，“而且我甚至也没有偷。”

孔查一下子扑到他的身上，试图偎依在他的怀里。他双手抓住她的腰部，把她旋转着举过他的头，然后又把她放下来，仍然没有一丝笑意。

“我们跳舞吧，”她凑着他的耳朵低声说，用她雪白、光洁的牙齿咬他的耳垂，“我不在乎你干了些什么！让我们来一点儿香槟酒，”他们慢腾腾地一起转过身去，没有按照音乐的节拍跳舞，

她找补了一句。“记得吗？你答应过的。”

他紧紧地抓着她的肋骨周围，抓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我们上床去，”他跟她说，“现在。记得吗？现在，这时候，人人都在外面。你的房舱在哪儿？”孔查说：“别做这样的德国人！”他拉着她穿过甲板的时候，与其说像个情人，倒不如说像个警官。

“你指望我做怎样的人？”他问，但是好像他的心思不在这个问题上似的。

“好吧，”孔查不自在地说，“听着——”这时候他可以通过那条细而在屈服的胳膊感到她浑身都在抗拒。“那么，听着，要是你要这样的话，你给我看了你的钱后，我会带你去看我的房舱的。我怎么知道你告诉我的是实话呢？马诺洛会要我的命的……我怎么知道呢？”

“你会知道的，”他说。“且等一等。”这会儿，他可以肯定了，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事情，他的衣兜里藏着稳赢的牌。他的脸色明朗了，变得和蔼可亲。他小心地，但是热情地抓了她一下，这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亲热的表示。

“得了，”孔查说，她的疑惑也消失了，“你要是哄我的话，我会要你的命的。”她靠在他的胳膊底下。

“你这么想的吗？”约翰说，现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宽容的态度。“试试看。”他很快地把她拉到他的身前，在昏暗的过道里，双手轻轻地围住她的喉咙。“是这样吗？”

孔查愉快地微微颤抖，抬头对他微笑，没有一丁点儿不自在的阴影，说：“不，不是这样。是另一种方式。要好一些。”他们互相脸对脸地哈哈大笑，继续走去，他的一条胳膊搂着她的脊背。

“我们到了，”她告诉他，打开门，先进房去开了灯。她预料会受到一次袭击，一场野蛮的乱摸，剧烈、盲目，那些雏儿和急色

儿干的这种事儿她知道得太清楚了。要不,更糟的是,恐慌、阳萎和对阳萎的恼火,或者要命的绝望;她必须不露痕迹地精心讨好和照料他们,使他们心平气和,因为男人使自己这么丢丑,往往会变得一肚子怨气,没法对付,甚至是危险的,为了他们的受到伤害的男性尊严会责备她,要报复。她提防着,准备应付一切,但是,他只是站在那儿,期待地望着她,容光粲然,一头金发。她对金发的男人有偏爱,而这一个显得充满渴望,热情和单纯;他伸出手去,抚摸她的光滑的黑头发,用德语说:"美,美!"

她笑着舒了一口气,发现一切会比她所想的容易对付些,用两只手握住他的一只手,说:"进来吧,别感到陌生,你是跟我在一起——我们在一起会快活的。"她按低他的脑袋吻他,然后解开他的领带,说:"你也一定要帮我脱衣服。什么都一起干更有趣。告诉我,宝贝儿,我是你的第一个姑娘吗?"他点点头,臊红了脸,然后鼓起勇气来说:"你干吗说这个?"孔查撇开这个话题。"你爱我吗,啊,说呀——你有一点点爱我吗?"

"我说不上,"他嗓音沙哑地说,一边搂得她那么紧,她简直没法给他脱衬衫。他开始拉她的衣服的前襟,摸她的乳房。"等一等,"她说,"你要让我对你很好吗?"她扭动着身子脱掉那件小小的、寒酸的黑上衣,卸下那条彩色的丝裙子,赤身露体了。"我是个很坏的女孩,"她挑逗地说,"你会知道的。"他似乎没有听到她的话;他也不需要任何甜言蜜语的撩拨。

里贝尔先生又一次送啤酒给乐队,第四次点奏《维也纳森林的故事》。音乐、绍姆魏因酒、星光闪烁的天空、在华尔兹的音乐声中心情温柔和高兴地在旋转的利齐,几乎使他尽情陶醉在眼下的愉快中而忘却了未来的欢乐。他的围涎转到了他的一只耳

朵底下，他头上的那顶娃娃帽滑到了颈背上，他压根儿不在乎。他时不时地咂咂他的嘴唇，细细品味他的甜美的喜悦，这时候，他那张说个不停的阔嘴就露出他的潮湿的粉红色舌尖。他强健有力地抓着利齐的腰和手，小而坚硬的胃顶着她，突然用男高音唱起没有歌词的歌。“拉德达达，拉德达达，拉德达，德达！”里贝尔先生唱着，像一个半人半羊的农牧之神那样欢蹦乱跳，踮着脚轻灵地，心醉神迷地向上看着利齐，她马上回应“拉德达达”，像厄科[①] 自己。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农牧之神，这个农牧之神在森林深处的空地上迅速奔跑和跳跃，在把他的两只尖尖的、小小的亮晃晃的羊蹄底下的一朵朵碎裂的鲜花踩进盖满树叶的泥土；一阵阵风像小提琴声在树顶间呻吟，甜美的鸟鸣在树枝中间互相叫着拉达达，而树枝间响着竖琴琴弦的悲叹，那个仙女在等着那个年轻的半人半羊的神，他的羊蹄灵巧，随时准备使那个身穿绿色长袍的、可爱的长腿姑娘跳起身来，而她也喜欢高高地跳一跳啊！啊，拉德达达，德达，那个年轻的半人半羊之神一边在心慌意乱的狂喜中扯着嗓门唱着，一边站在他的羊蹄尖上发狂似的旋转，这时候，那个仙女腰向后弯下去，稳稳地转着圆圈，使她的抽纱裙扬起来，裙子的后部慢腾腾地展开去，像一把张开的扇子。

汉森靠在他的躺椅里，抿着他那瓶啤酒，紧紧皱着眉头，瞪出了眼睛看他们。他们在他的面前经过了几次，最后一次，他们离他那么近，利齐的裙子轻轻擦过他的膝盖，一阵无法克制的怒火涌上他的心头，他打定主意，只要她再干出这样的事儿，他会

① 厄科(Echo)：希腊神话中的仙女，因爱恋那喀索斯，遭到拒绝，最后只留下声音。英语中 echo 即作回声解。

伸出脚去把她绊倒,使这一对摔倒在地上。他们又向他转过来,这一次更疯狂了;他打起精神,伸出一条腿准备着。利齐的飘扬的裙子这次擦到了他的脸,他眨眨眼睛,缩了一下,接着里贝尔先生的皮鞋踩下来,狠狠地压在他的脚上。汉森先生从内心深处发出一阵低沉的呻吟,马上站起身来,站得直挺挺,举起啤酒瓶,使劲砸在里贝尔先生的光着的、没有防备的脑袋上。里贝尔先生顿时站住脚,一动也不动,一副无比吃惊的模样。啤酒瓶砸碎了,一道长长的、鲜红的血流马上出现在他的头上,开始迅速地流动着淌下来。

"你瞧见了吗?"汉森先生严厉地追问,好像他证实了什么不容置辩的事实似的。"你瞧见了吗?"

这一下砸得里贝尔先生更深地陷入幻想。他像一只山羊那样叫着:"咩咩咩,咪咪咪!"接着向汉森先生用头撞去,准确地击中正好在他肋骨分开的地方,敏感的中腹。汉森几乎把身子弯成两截,困难地喘着粗气。他还没有复原,几秒钟后,里贝尔先生又出手了。"咩咩咩,咪咪咪!"他用足力气喊叫和用头撞去,在汉森先生的衬衫的前襟上留下斑斑的鲜红的血迹。

"得了,现在别这么撞了,"汉森先生喘着粗气,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他再一次认输,用他的手掌把里贝尔的脸推开。"得了,现在你别干了,你别这么撞啦!"

里贝尔先生甩掉他的手,拉开距离,准备第三次用头出击。那个打击乐器手把他的纸帽从额头上推掉,一把抓住里贝尔先生;他看来神情迷惑,没有挣扎。那个小提琴手把一只手按在汉森先生的胳膊上,轻轻地阻止他,被他像小猫似的挣脱。音乐这么突然地停止后,那些本来在跟西班牙姑娘跳舞的古巴学生挤在附近看这次精彩表演;当他们看到里贝尔先生的挂了彩的脑

袋时，都喊叫："鲜血万岁！暴行万岁！"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跟胡滕两口子刚才一直坐在一起，与其说他们是看热闹的，倒不如说他们是公开谴责不端现象、坚持礼仪的活范例。他们都大模大样地站起身来，尽管没有人注意他们，走开去。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说："我们一定要应付得很好才能活着抵达港口！"这个结论是这么明显，胡滕两口子都认为不需要答话。

利齐站着，盯着看，一只手捂住嘴；她震惊得额头都被扭曲了。那个小提琴手轻轻地拍拍她的脸颊。"行了，行了，"他安慰地说；一受到这种温和的对待，她遭到了不幸的感觉被唤醒了。她的脸上一下子出现一丝丝细皱纹。她掉转身子，盲目地奔跑，弯着身子，双手向上伸着，手掌向外，发出一声声尖叫，像雌孔雀的叫声。那个小提琴手急匆匆地跟在后面，说："我亲爱的小姐，让我来帮你，要是我办得到的话。别试着独自个儿走。"她弓起一边肩头，脱离他的手，突然发出尖利的笑声和淌起眼泪。她经过里贝尔先生身旁，没有向他瞟一眼，他呢，也没有看到她或者记得她。汉森先生独自个儿走去，两条胳膊交叉着紧紧地捂住他的胃部。那个打击乐器手牢牢地待在里贝尔先生身旁，后者明显地头昏眼花了。里贝尔和汉森两人突然站住了脚，隔开一段距离，扑在栏杆上。折腾了一会儿以后，他们向后站去，擦擦脸，随着甲板的起伏，摇摇晃晃地走去。

那个小提琴手这会儿在后悔这个帮助一个悲伤的女性的仗义行为了；她赤裸裸地现出一副丝毫不懂感激、不顾体面的模样，除此以外，没有一点儿其他表示。每一回，他试图握住她的胳膊引领她的时候，她会尖叫："别碰我！"好像她在遭到强奸似的。然而，她一直是在磕磕绊绊地走过这条过道，从这一边晃到那一边，一次次撞在墙上；天知道，她是他看到过的女人当中而

貌最丑的了。然而，他没法摆脱他的良好的教养，也许还有他的善良的天性，只得装出一副勇敢的门面，坚持干下去，终于达到目的，在她住的房舱门前卸下了他的包袱，他尽可能大胆地敲响房门，等候着。

丹尼那天黄昏第一回从他那张酒吧间的高脚凳上挣扎着站起来，说："我有点事儿。我要去打断帕斯托拉的跳舞。我看到她忙乎着跟一个古巴佬转来转去。她现在要大费口舌地讲讲清楚了——她还一点儿不知道要尝什么滋味哩！"

戴维刚才一直只是脑筋迟钝了一会儿，没有享受到一点儿越来越强烈的喝醉的乐趣，这会儿感到自己够冷静的，可以给丹尼提供一些好意见，而丹尼明摆着是个生来干错事的人，不管他干什么。"也许你应该早点去。你已经失去自制力了。你没法掌握分寸，或者适可而止。记住，不管在什么地方，搂一个女人是危险的，甚至在你没喝酒的时候。她们浑身都是碰不起的地方，她们受不了。"

"这一个碰得起，"丹尼坚决地说。他摇摇晃晃地站不稳，用左手抓住酒吧柜，用右手搂了一下他自己的肚子，响亮地打了一个呃逆。好像这一个呃逆有稳定作用似的，他向那些跳舞的走去，走得还算直哩。戴维一路走去，指望看到丹尼受到恰当的拒绝。压根儿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古巴学生马上放弃他对他的舞伴的一切权利。帕斯托拉来不及拒绝和逃走，就被丹尼搂在怀里；他们摇摇晃晃地绕着一连串椭圆形的圈子的时候，帕斯托拉抓着丹尼的两个胳膊肘尽量把他推远，而丹尼叫人毛骨悚然地默不作声，靠在她的两个肩膀上，把各种不干净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的臭气呼在她的脸上。"放开我，你臭得像只兀鹰！"帕斯托

拉大叫，转过头去，挣扎着。总而言之，是一个没有好结果的景象，这倒是戴维喜欢看到的。他心情愉快地希望丹尼要忙乎整整一个黄昏去折服帕斯托拉，并且会为这件事儿带来世界上的一切厄运。

他有自己的烦恼；正像近来开始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况那样，当威士忌满足他的希望，使他的头脑变得清醒，使他的担心有所减弱的时候，他想不通自己怎么会这么没有自尊心，让任何女人，尤其是珍妮那样的一个女人，日日夜夜沉甸甸地盘踞在他的脑子里，骚扰他的种种想法，干涉他的种种计划，将他推到他从来没有打算过要去的地方，用一些不公正的理由把他逼入困境，针对他的弱点，用她的眼泪、她的作爱施加影响，扰乱他的工作和逼得他纵酒——只因为她没完没了地胡作非为——天啊，他一直在想些什么哟？他待在这儿，天天喝得醉貌咕咚，只是为了摆脱她和对她的想念，这有了什么结果呢？珍妮变得怎么样了呢？他以为他了解的那个姑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几乎相信自己是从那个盛放青春期的幻梦和想象的碎布零料袋里取出一些零碎料子把她拼凑出来的。当然喽，是他成长的时候到了。他从前把珍妮想象成的那种姑娘，在现实生活中是再怎么也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的……

他醉得几乎摔倒。他靠在栏杆上，捧着头，尽管他身子底下的膝盖嗦嗦发抖，他胃里的东西在往上冒——即使他没有受到这么强烈的刺激，也经常反胃——他的心和意志更坚强，好像它们另有自己的生命，并不屈从于酒精的作怪。“真该死，珍妮天使。我要跟你分手了。我不再跟你斗争了。这不值得。我没法这样生活。”他听到他自己说话的声音的时候，震惊得东张西望，但是附近一个人也没有。珍妮的嘹亮的声音用叫人受不了的愉

快的嘲讽的语气清晰地说："……库奥托莫克皇帝这时候从他的火坑里跟他说话，问：'你以为我是在玫瑰花坛上吗？'"这话是她在好久以前就已经说过了，当他不认真地对待她的时候，她就这样说；当他告诉她，她使他苦恼，惹得他不快活的时候，她总是用一种转弯抹角的办法回答说，她也不快活，这是他的过错，而她却有这样的信念，只要他们作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但是，她始终没有说过他们该怎么努力，也没有说过该由谁开始。

帕斯托拉一脸怒气，拼命奔跑，经过他的身旁，她的褶裥裙和抽纱黑披肩向后飘扬；她向后瞟了一眼，溜进最近的那扇门。丹尼大大地偏离重心，来得比较慢，但是追得挺热切。他向戴维眨眨眼睛，跟他亲密地吐露了秘密："她以为她逃得掉，"他自在地说，"可是船上没有一个她可以藏起来的地方。我会逮住她的，别担心。"

戴维说："也许你应该等一等，等到早晨你的模样好一些的时候。"但是丹尼固执地摇摇头，说："不行。就是要在今宵。"他歪歪斜斜地走过去，有不少浪费的动作，但是总算安全地走到那扇门前，帕斯托拉已经不见了；他在门框上靠了几秒钟，继续走去。戴维没有目的地转悠，遇上一些在走动的游客，他像隔着一层雾似的迷迷糊糊地看到他们——特雷德韦尔太太跟那个神情严肃的船员、可怜的埃尔莎正由她的父母陪着可能是去睡觉、舒曼医生好像在梦游：他们在他的身旁飘过；从船的另一边，传来那支永远不会结束的、叫人心烦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的曲调。最后，他确定了自己是在往哪儿去，在找谁，指望找到什么；他丧失了感觉，他的神经系统死去了，然而他仍然感到痛苦，一种好像是要他命的苦恼，简直使他心惊胆战；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

害怕他可能死亡。不过，他没有一点儿办法，只得继续走啊走的，走上一磴又一磴的楼梯，来到放救生艇的上层甲板上，他在那儿小心谨慎而偷偷摸摸地转来转去，直到他发现他们一起在那儿；他们甚至不打算遮遮掩掩哩。他震惊得热血沸腾，好像他一直不知道他们会在那儿似的，他的寻找结束了。他们蜷缩在一起，挤在甲板上，背靠着一个烟囱；他们的膝盖蜷起着，两人都沉思地相对低着头，他们的额头贴在一起，他们的身子弯着，熨贴地偎依在一起。云中的月亮的微弱亮光照亮了珍妮的跟霜一样白的脸，她的闭着的眼睛和嘴上现出一个在睡梦中感到痛苦的神情。弗赖塔格紧紧地、自在地搂着她，他的两条胳膊完全围着她，一只手握着她的交叉着的双手，搁在她的并在一起的、无能为力地转向他的膝盖上。

戴维的手脚冰凉，他的鼻子变尖，变白，鼻尖向下，鼻子眼在扭动——他可以感到鼻子在变形，在极度厌恶地向里收缩。直率的忌妒、发自人性的愤怒、对珍妮的冷得透骨的憎恨，顿时纷纷在他的心中嚷嚷咧咧，形成一片可怕的混乱。然而，他没法分清，对他来说哪一种比较不可恨；是这个景象、这个景象的含意，以及珍妮那张无耻、带着既痛苦又狂喜神情的脸呢，还是弗赖塔格的沉着的态度、他轻易地带亲切感地对她的掌握和控制，即他作为天生的女人的摆布者和调教者所显示出来的那种专业的巧妙的手段。

这是戴维在当时和后来没法忍受的；一看到弗赖塔格的和蔼、平静的脸和相当讨人喜欢的兴高采烈的神情，他的心里就杀气腾腾。明摆着，他在等候珍妮在他的细心帮助下进入她的欲望的另一个阶段，在他跟她扭在一起以前，先吐露心事。他们的眼睛里除了对方，别的什么也没有，简直就跟待在一幢塔楼里或

者一座岛上一样。弗赖塔格从珍妮的额头上抬起他的额头，一只手放在她的头发上，把她的头往后仰，使她的脸对着他自己的，默默地带着兴趣打量了几秒钟，然后从容地亲她，嘴上现出最强烈的享受意味。珍妮微微动了一下，看来想要躲藏在他的怀抱里。他合适地把她整个儿搂住，不慌不忙，也不激动，开始拉直她的两条大腿，直到他直挺挺地躺在她的身旁，一只手在抚摸她的乳房。

仍然望着她的脸，他自在地转过一个肩膀，用他的上身盖住她的上身，停止在那儿，把他的脸颊凑到她的脸颊上，好像在听她的呼吸似的。然后，他把身子转开去，躺在她身旁，把她的头搁在他的胳膊上，接着他笑了，发出一种古怪的、低低的笑声，笑声压在喉咙里，完全是对自己在笑。他稍微摇摇头，亲她，拉她坐起来，试图拉她站起来。“真不害臊，你这个小妞儿！”他说，心情好极了。“想想看，在这样的时刻咽气的滋味！”珍妮呻吟着说：“啊，别管我。把我留在这儿！”

“你知道，这事儿我不能干，”弗赖塔格说，他的语调像是恼火的哥哥的。“喂，站起来，珍妮，别叫人讨厌。”

戴维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在烟囱的阴影里，过了一会儿，转过身去，他大为震惊，觉得自己丢尽了脸，踮着脚走下楼梯，他的脑袋像海螺壳那样轰鸣。

鲍姆格特纳先生在酒吧间里，他的小丑的化妆现出一条条斑纹，他的络腮胡子掉在他椅子底下的地板上；他在摸着他那个盛利口酒的高脚杯，碰着了他的咖啡杯，咖啡溅在他的餐巾上。他把餐巾当作手绢，默不作声地一边哭一边心神烦乱地擦他的嘴、眼睛和额头。他的妻子望着他，眼睛像玛瑙，用压低了的、生

硬的声音说："人人都非常小心地不朝你看。所以我想你别自己当众出洋相。"

他咕嘟一口吞下了他的本尼迪克丁酒[1]，他的昂贵的、节日喝的餐后的享受，也不品品酒味。他把胳膊从摆在他们中间的调味品架上方伸过去，用一个食指碰碰她的手指，轻轻地拍拍。她只能看到遮在餐巾后面的一只眼泪汪汪、灰心丧气的眼睛，和一个充满着没有说出口的责备的嘴角。"我的小宝贝儿，"他说，"你忘了吗？今天是我们结婚十二周年纪念日。"

"那有什么可记得的呢？"她毫不宽容地说。"一直在过什么生活呢？待在一个地狱里受罪呗，从一开始就待在一个地狱里活受罪。"

"不，"他说，"不是开始就这样的。这不是真的——"

他又盖住他的脸，从餐巾后面发出呻吟。"可不是，可不是，我感到害臊，可是我快要死了，格蕾塔，你知道，我快要被那些溃疡折磨死了，也许是癌，我们怎么知道呢？我快要死了，可你关心什么呢，你到底关心过什么呢……？"

"你要是不白天黑夜地喝个没完的话，会好起来的，"她跟他说，向他凑近些，"你想要生病，你想要给我吃苦头，你想要毁了我们大伙儿的生活——我现在明白了。你恨我。你这么干是向我发泄怨气……"

鲍姆格特纳先生挺直身子，又弯下去，摇摇晃晃，他用两个拳头撑在桌子上。"很好，"他说，"这叫人再也受不了啦。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玩儿完了，我已经活得太久了——再也

---

[1] 法国诺曼底的费康所产的一种甜酒，最早为16世纪本尼迪克丁教士所酿，故名。

不愿受一会儿折磨了。我要去自杀。”

“不用说，”他妻子又气又怕，呆住了，“唷，又来这一套啦！好吧，不过，你这一回打算怎么和什么时候结束你的生命呢？我倒想要知道这一回你的计划。”

“我马上就去跳海，”他说，咕嘟一口喝下他的咖啡。“那将是——”他砰的放下咖啡杯，劲使得那么猛，杯子都碎了；几个人向周围望望，马上又把眼光移开。他迎住了每一道在移开去的眼光，挤出一阵像在做戏似的、没有欢乐的笑声。“那将是最安全的办法！”

“可不是，”她说，逗弄他，“你会惹出一场大骚乱，然后像贝贝那样被救起来——”

“要不，也许像那个巴斯克人，”他提醒她。

“呸！”她说。“你叫我恶心！”

他沮丧地看到她只是在发火，没有别的表示，看到她只是把这事儿当作另一场争吵罢了，但是他已经做得太过分，没法下台了；他只得硬撑下去，直到逼得她相信他的威胁的严重性，像一个做妻子的应该做的那样采取行动阻止他实行计划。

鲍姆格特纳太太几乎完全掌握他的心思。她看出他在等待她的下一步行动，他盯着看的眼光中显示出他在进行淘气的、孩子气的估算，试图算出她的抵抗的限度，试图治得她低首下心地求告，一直到他同意为了她的缘故活下去。她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交叉着胳膊，往后靠着，厌烦地说：“你永远不会干什么的，所以别胡说八道了。我对这感到厌烦了，我要去睡了，你可以待在这儿，高兴待多久就待多久好了。”

一听这话，他盲目地跳起身来，迈着大步，向最近的那扇门走去，然后回头看看。她的妻子仍然交叉着胳膊，不在看他。他

从甲板上再回头看的时候，她已经离开餐桌，正在向跟他相反的方向走去，她那个庄稼妇女戴的头饰上的花里胡哨的飘带飘扬着。

这次背叛，这次抛弃，震惊得他麻木了，他再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她会干出这样的事儿来，他磕磕绊绊地走出去，慢腾腾地沿着栏杆走，他的眼光在东张西望，寻找她随时从任何方向出现；她肯定只是打算惩治他几分钟，然后，她会从哪个地方冒出来，截住他，阻止他，恳求他，使他恢复理性，像她以前经常努力做的那样。他突然站住脚，等着，抱着他的头，胳膊肘一动也不动，试着假装他真的打算跳。眼睛盯着看汹涌起伏的海洋，被甲板的难以控制的颠簸晃得歪歪斜斜，他一想到自己横在栏杆上，下面是可怕的深不可测的大海的那一刹那，随着船的倾斜身子向前斜出去，成一道弧形，头向下，摔下去，就在那一刹那，格蕾塔向他伸直两条胳膊，握着拳头跑来，恳求着说："啊，不不不，等等，我的爱人宽恕我吧！"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他吓得往后退，几乎站不稳身子，差一点没撞上特雷德韦尔太太，后者正跟鲍姆格特纳先生先前注意到跟她在一起的那个孩子气的年轻的船员走在一起。他们欢乐地笑着，随着甲板的起伏歪歪斜斜地走着；他一条胳膊搂着她。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一边恢复站稳身子，鞠躬，直弯到腰部，还试图咔嚓一声碰撞鞋跟。他们点点头，把看着他的冷淡的眼光移开，轻轻地招招手，继续走去，压根儿对他的痛苦漠不关心，冷冰冰地一点儿没有注意到他处在结束他的悲惨生命的边缘——更糟的是，甚至没法想象这样的灾难！——他们跟他的没有心肝的妻子心里都没有一丁点儿同情和人情味。他回到栏杆边，紧紧地抓着它，又注视着海水，思忖他的处境，心情稍微

平静了一些。他就是处在这个境地，在这儿和这个时刻；他已经落到这个地步了，他真是个蠢货，竟然希望情况会好些！这真是一场悲剧，一个男人在绝望的时候被他的妻子抛弃了；这个妻子他一直喜爱和信任，并且为她提供了最好的一切，这个妻子他一直信赖是欣赏他的奉献的，是尊敬他的崇高的动机的，是用她的忠诚支持他的勇气的，是宽容他的弱点的，不管那可能是什么弱点，因为，谁能一点儿弱点也没有呢？在一切事情上给他自由，而同时维持日常生活的约束、外表和规矩——做妻子的不是就该这样吗？然而，他独自个儿站在这儿，在九月的半夜里，在潮湿、多风、寒冷的海面上，打算自杀，她没有动一个手指头来救他。事实上，她一直嘲笑他，没完没了地拿他出洋相。

啊，该结束了。他忍受不了。不，他也不会忍受的。他这个想法是多么疯狂，竟然使他产生这样的念头，哪怕只有一刹那吧，想撇下他的天真的、大有前途的儿子，他的独生子，让他变成一个孤儿，而且归根结蒂，会受到很差的抚养。他的冷酷无情的母亲当然会再婚的，把她的孩子交给一个后爸，听凭他听天由命地让别人摆布，就像她把她丈夫交给无情的大海。他心头涌起一阵恐怖和新的愤怒，但是也涌起一个新的决定，他开始进行长长的、模模糊糊的回房舱去的努力，脑子里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但是在他的五脏六腑中某一个地方牢牢地扎着一个念头：现在是该跟那个在过去灾难重重的十年中他一直把她热情洋溢地藏在胸中的凶恶的女人算清早就该算的一些账了。

鲍姆格特纳太太打开她的房舱门，没有一点儿声音，在开灯的时候用手掌遮住壁灯光。汉斯睡在床上，像她离开他的时候那样。他睁开眼睛，向她眨眨眼，微笑着。她坐在他的床边，用

一种她无法控制的声音问他："你睡着过吗？做过梦吗？"

"一点点，"他腼腆地说。"我听了好一会儿音乐。"

"你做过祷告吗？"

"我忘了，"他焦急地说，生怕挨骂。她不但没有骂他，反而摸摸他的头发，亲吻他。"我们过一会儿做吧，"她跟他说。"你爱听个故事吗？"

汉斯马上高兴地坐起来，完全醒了。"啊，你在我们登上这艘船以来，还没有给我讲过故事哩！"

"可怜的孩子，"他的母亲说，一边伸手去拿她的编结袋，接着又坐近他。"你要听哪一个？"

"汉塞尔和格蕾塔，"他马上说，"我爱听那个。"

"你快要成为一个大男孩了，怎么还要听这种孩子气的故事，"她跟他说，一边控制她在颤抖的手指头，开始编结。

"可是我仍然喜欢它，"他有点儿腼腆地说。"你在结的毛衣是我的吗？"

"是的，"她说，"我打算我们在抵达不来梅港以前把它结成。我简直没法再为什么事情犯愁了。"她不自在地短短停顿了一下，在这段时间里，他望着她的脸，想要找出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对他微笑着，开始讲故事："从前，有一对小兄妹住在黑森林里。他的名字叫汉塞尔——汉斯，像你；她的叫格蕾塔，像我；有一天，他们在森林里转悠，采鲜花，这时候，来了一个老巫婆……"

她的声音平稳、光滑，渐渐变得温柔、低沉，像一只在摇动的摇篮似的在给汉斯催眠；当她说到那一对可爱的小兄妹把那个邪恶的老巫婆塞进她自己的那座燃着熊熊烈火的炉灶那部分的时候，汉斯的眼睑扑闪着不想闭上，但是白费劲，最后他屈服了，

听到那个难逃一死的巫婆的号叫，他温和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枕头上把头转过去。

鲍姆格特纳太太用一条小围巾遮掉了灯光；她的眼睛里已经在淌眼泪了。她又坐下，开始不用眼睛地编结起来，数着针数。要是需要编结上整整一宿的话，她会坐在那儿编结，等她的丈夫。

当他大大地打开门转身进去的时候，简直不相信他看到的情况，然而，一切都清清楚楚地明摆着。他原来不知道他打算干什么或者说什么，但是，当她抬起她那张固执的脸，毫不后悔地盯着他看的时候，他举起了他的右胳膊。她猛地躲向一边，但是在他的像木板似的手掌打在她的脸颊上以前，眼泪已经在她的脸颊上淌下来了。他是轻轻地拍了一下，并没有给她造成什么伤害，但是她在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绊了一下，摔倒了，颧骨撞在洗脸盆架上。汉斯醒了，蜷缩着身子，抖抖嗦嗦；他交叉着胳膊，遮住眼睛，尖叫。船颠簸得好厉害，鲍姆格特纳太太笨手笨脚地在试着从地板上爬起来；她的丈夫抓住她的两只手帮她。"编结！"他把她拉起来的时候，冲着她大叫，悲伤得几乎要发狂，把怒气全都忘了。"啊，你怎么会这样呢？我差一点没结果自己的性命，你却在编结！啊，上帝，一个男人该怎么对待这样一个女人呢？"

"我不在乎！"她现出叫人害怕的固执神态喊叫："我不在乎！瞧你的这个可怜的孩子，"她说，"你要把他吓死了。他看到我们这副模样会变成怎么样呢？你真不害臊！"

做爸爸的向他的儿子转过身子，伸出两条胳膊去抱他。汉斯双手伸在身前，恳求说："爸爸，请别打我！"这话刺得鲍姆格特纳先生一直痛到骨髓里。他跪在那张床前，把那个在抽泣的孩

子拉到他胸前，温柔地低声说："爸爸的可怜的小男孩，可怜的好小男孩，我不会损坏你头上的一根头发的。你怎么能以为我会损伤你呢？"汉斯的身子变得僵硬起来，他倔强地转过头去，避开他爸爸的鼻子眼里散发出来的臭气，把他的嘴闭得紧紧的，害怕地感觉到他父亲的滑溜溜、暖乎乎的眼泪跟他自己的眼泪一起在他的脸上淌。他的母亲默不作声地走过来，她不哭了，她的颧骨有一个大青肿块。她伸出两条胳膊围住她的儿子和丈夫，用最亲切的声音说："瞧，卡尔——一定要结束这事儿。我们用我们的麻烦这么折磨他是错误的。他会生病的。他会永远记在心里。卡尔，设法宽容我吧，我很抱歉。"他马上挺起身子，转过去，几乎把她越过汉斯向他拉过去，汉斯尽可能地从他们两人中间躲避开去。"我的可爱的格蕾塔，"他说，"我也很抱歉。我的心碎啦！"

"啊，不，不，"她说，心里很慌乱。他们掉眼泪掉得心软了，对越来越炽烈的性欲感到惊奇，开始爱抚，不是互相爱抚，而是爱抚他们中间的那个孩子；他们新燃起的互相的情欲像波浪似的来来回回在他的身上和通过他的身子汹涌澎湃。汉斯使劲往旁边移开去，试图摆脱他们的像牢笼那样束缚着他的胳膊。于是他们镇定下来，放开了他。他在床上弓着背，靠在墙上，尽量不看他们。他母亲的头饰已经掉在脚旁，缎带都皱巴巴了，被他们的皮鞋跟踩上一条条污迹。她停下来去拾，他的父亲弯下身去把它递给她。他们一起站起来，又一起坐下去，互相用胳膊搂着。"啊，啊，啊，"他的母亲不断地喘着粗气低声哼，把她的脸埋在他的父亲的肩窝里，好像她巴不得被闷死似的。"啊，啊……"

她抬起头的时候，她的恍恍惚惚的眼神停留在她的小男孩身上；他的头转在一边，两只手垂着。他的模样像任何一个迷失

的、不幸的、被忽略的孩子，像身处一个房间里的弃婴，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受人欢迎。她没有动，因为她丈夫的脸这会儿紧贴在她的肩膀上，她用熟悉的、母亲的声音跟汉斯说："去洗脸和洗手，我的儿子，你会觉得舒服些——马上去，用热水，别用凉水。时间晚了，你该睡了。我们现在都必须睡了，必须睡了。"

汉斯起身，腼腆地洗脸，伸手去摸潮湿的洗脸巾，眼睑下垂着，好像他对自己穿着睡衣被人看到、当着这两个陌生人的面洗脸感到害臊似的。他在无声的苦恼中，可怜巴巴地撅着嘴，擦干他的脸和双手，爬上床去，把被子拉到下巴上。

他的母亲又轻轻地走到他面前。"啊，你不用担心，我亲爱的小乖乖。去睡吧，睡吧——一切都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糟糕的事儿。有时候，我们跟最爱的人最容易发脾气。做祷告吧，小亲亲，明儿见。"

她含含糊糊地微笑着，完全不是对他，而是对她正在想的一件事儿。他的父亲也来了，用潮湿的嘴亲他的脸颊。"明儿见，我的小乖乖。"他们关掉灯，开始很快地脱衣服。他能从声音中听出来。

在黑暗中，他一动也不动地躺着，胳膊紧紧地交叉搁在胸前，膝盖僵着，胃部像打着一个硬邦邦的结，听着几英尺外那张床上他的父母在移动和翻身的声音，被子被揭起和推开的声音，轻轻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和他们说悄悄话的嘁嘁嚓嚓声，粗短、凌乱的呼吸声和他母亲的缓慢、有节奏的叹息声——"啊，啊，啊……"好像她在疼痛似的，以及他父亲的"吁—吁—吁——"的喘气声突然停止，变成一声长长的、低低的呻吟。在黑暗中在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件他们不让他知道的叫人害怕的事情——他紧张地瞪着眼看，但是眼前只有像堵墙似的一片漆黑，

还有一些搏斗的声音。那甚至不是声音，而是一种骚乱的感觉，好像他们在搏斗似的——然而，也许不是，因为他的心跳得那么厉害和那么响，他的耳朵有一会儿听不见了，等到他的耳朵恢复听觉，什么都听不到了。然后，他听到他父亲用缓慢的低声柔情蜜意地问："你觉得怎么样？你快活吗？"接着他的母亲传来昏昏欲睡的低语："啊，快活，快活，快活——快活。"

那个小男孩的肌肉、神经，甚至他的手指尖和头发根都一下子松开了，浑身都觉不着了，好像紧紧地捆在他全身的上千根绳子都一下子断了。他长长地打了个呵欠，一阵甜美的睡意像温暖的水似的在他身子里流动。他松弛地侧过身去躺着，几乎脸向下对着墙，他的双手、双脚和颈背感到舒适和柔软；他无忧无虑地睡着了，像独自个儿在腾云驾雾那样进入黑甜乡，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梦。

另外几个船员加入到特雷德韦尔太太和他那个年轻的船员中间来了，他们一起在船上转一圈的时候，好像把两人带进了一个酒会。她后来记得她处处都玩得相当开心——首先在烤面包房里帮几个很有礼貌的小伙子烤面包。她那一伙人先后闯进了厨房、酒吧间、船员食堂、四层甲板、轮机舱，不管他们到哪儿，总有一盘盘的酒端上来。有人敬她她就喝，什么白兰地啊，查尔特勒酒[①]啊，波尔图红葡萄酒啊，亚马·皮孔酒[②]啊，莱茵干白葡萄酒啊，和德国香槟。在一个地方，他们遇到了事务长，当特雷

① 查尔特勒酒(Chartreuse)：法国格勒诺布尔的加尔都西会修士酿的一种苦味芎麻利口酒。

② 亚马·皮孔酒(Amer Picon)：法国的一种苦味利口酒。

德韦尔太太称呼他是一起寻找乐子的伙伴，而且亲切地吻他的时候，这是他这辈子最吃惊的事儿了。他对这个恭维的回报是，在她脸颊上着实响亮地吻了一下，用尖锐的眼光盯着她的眼睛看了一眼。“唷，”他友好地说了一声，继续慢慢地朝前走，后面跟着那些级别比较低的船员。她那个晚会的伙伴然后表示指望她吻他，她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一件用不着说明理由的事儿。特雷德韦尔太太认为，等到明天再看他们两人那时候对这事儿的看法是个好得多的主意。对这样的观点，他没法掩饰他的震惊。“这简直糟极啦！”他严厉地说。

“我想是这样！”特雷德韦尔太太说。“对不起。”那个年轻人看来窝着一肚子气，而特雷德韦尔太太第一次察觉他随身带着一个手电筒。他把那个光圈照在特雷德韦尔太太的脚旁，给她照亮路，两人默不作声地走下一磴磴狭窄的梯级，他坚定地握着她的胳膊。“我以为你喝醉了，”他最后告诉她，“在驾驶台上，你建议由你来驾驶船。当然没有出什么乱子——可是我认为船长是第一回遇上这样的事儿。”

“他一定过着受到严密庇护的生活，”特雷德韦尔太太说，“可怜的人儿。”他们在主甲板上踱过去，经过和着音乐跳舞的人们，注意到利齐和里贝尔先生仍然在跳华尔兹，靠船头那边，那个神情沮丧的鲍姆格特纳先生待在栏杆旁，看来在发病。他转过身来，现出一脸绝望，几乎在呼吁帮助。他们走过去，这时候，那个年轻的船员用一条胳膊围着特雷德韦尔太太的腰，扶着她。

“不知什么缘故，他看来好像病得很厉害，”她说，“也许要死了。他说他遇上了非常痛苦的事儿，快要死了。”

那个年轻的船员没精打采地说：“我压根儿不相信那话。他只是一直喜欢喝酒，害得自己老是像在生病。”

特雷德韦尔太太相当清醒地说："这么说，你不相信人们有时候只是自然地害病和死亡喽？死于某种他们没法医好的疾病？"

她第一次注意到他趾高气扬地戴着他的白制帽，比平时大大地歪在一边。他马上用一种不耐烦的声音说："当然相信。可是干吗有人只是因为他恰巧快要死了而有权利获得特别关心呢？我们都在生病，"他武断地说，自我怜悯的坚忍的面具一刹那遮住了他的面貌。"我们都会死的，只是速度不同罢了……得了，这算什么要激动的事儿呢？"

"我一点儿也不激动，"特雷德韦尔太太说，有一点儿采取守势，"可是你看来倒好像在激动。"

"我从不激动，从不，"他跟她说，声音带一点儿愤怒的颤抖，"这完全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数不清的纪律之中，没有耐心跟他那样的人造成的愚蠢的混乱搅和在一起，那种人不懂得怎样生活！"

"你懂吗？"特雷德韦尔太太轻轻地问，站住脚，抬起她的脸，对着他的，这样他们的眼光稳固地遇上了。"告诉我。"特雷德韦尔太太根据她看出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觉得这是一场奇怪的谈话。他把她整个儿搂住了，腰、肩膀、胳膊，一下子把她控制住，猛烈地亲吻她那张还在说话的嘴。特雷德韦尔太太感到一种以前经受过的不愉快的感觉，打了个冷战，那是一种嘴被咬过后，血被吸进嘴里去的、她感到恶心的感觉；她避开身子，头向外躲开，用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拒绝和防御自己，这使他泄气和冒火。

他把头退后，抬起他的胳膊肘，用前臂把他的头发掠到脑后去，这时候她看到他额头上的一滴滴汗珠。"我一直在看你，想

你，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声音粗嗄地说。"你始终不注意我，即使我们跳舞的时候也不——干吗不呢？现在这时候你还不吻我——干吗不呢？……你要我求你吗？要我说我爱你吗？我再怎么也不懂得人们说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别说，别说，我受不了听到这个字的声音。"

他的脸、态度、情绪，都随着他的剧烈的性子改变了，从迫不及待的情欲要求变成十足地道的心胸狭窄。"那么，你干吗跟我一起出来，你干吗逗引我吻你？"

特雷德韦尔太太把整个身子挪开，退后去面对着他。"现在是第一次情人争吵了，"她肆无忌惮地说，而且带着某种极有兴味的神情笑了。他有一张多年轻的脸啊，她看着他，好像是第一回似的——光滑、没有皱纹、清清爽爽的面貌，紧绷着，嘴角上现出愤怒的虚荣心，眼睛里冒出火辣辣的担心神情。

"我不该受你嘲笑，"他说，现出一种使他的怨恨渡过危机的庄严神情。他又向她伸出胳膊，但是仿佛不想碰她。"谢谢你让我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黄昏，太太，我将乐于送你到房门前。"

"啊，谢谢你，可是这完全不必要。请别麻烦了，我能独自个儿走完剩下的路。"

他碰了一下脚跟，猛地弯下腰去鞠躬，好不迅速地转过身去，径直向那些跳舞的人走过去。特雷德韦尔太太从容地欣赏他，认为男人喜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锻炼身体是有道理的——毫无疑问，他跟她一样喝得醉貌咕咚了，然而她在这儿，从陡峭的梯级上一磴磴地冒险地往下跳，从主甲板跳到B甲板上去，不料在跳到倒数第二磴的时候，她的一只凉鞋在金属边的踏板上蹩了一下，把鞋跟蹩掉了。它骨碌碌地在她的面前滚到下面去，而她用一只脚站了一会儿，稳住身子。一个正在擦鞋的年轻的

服务员站起身来，走到前面，拣起鞋跟，伸出他的手，用极良好的礼貌说："你要是同意的话，我的太太，容许我来为你修。"特雷德韦尔太太招招手，笑笑，弯起她的膝盖，抬起脚，让他拿那只凉鞋，他脱下那只鞋，然后，她一跳一跳地跳过过道，时不时地站住脚，撩起裙子，试着做一个高踢动作，挺直身子，用脚尖站立。一个多么荒谬的晚会，多么高兴知道它已经结束了。她喜欢那个服务员的模模糊糊的脸和得体的表示，要是人人都像他这样生活，就可能会过得好得多了。

利齐会一直跟她那头喜欢的猪一起跳舞，然后在各个角落里躲来躲去，躲到随便什么时候。特雷德韦尔太太靠在离那面镜子很近的地方，认真地打量自己的容貌，开始在自己的脸上画一张别的脸，借此来逗乐，她以前在参加化妆舞会的时候也经常这么干。她描上很黑的、长长、细细的眉毛，眉毛几乎在她的鼻梁上连在一起，还延伸到她的两边太阳穴上的头发里去。她在她的眼睑上抹上泛蓝色的银光眼睑油，用黑蜡熔珠使眼睫毛往上翘，用厚厚的白粉把她的脸涂成小丑的白脸，最后在她的相当薄的嘴唇上画一张深猩红色的、闪闪发亮的、四四方方的大嘴，它的形状显得无比的野蛮和淫荡。她把她的黑头发从额头上光滑地往后梳，退后几步，在一个适当的距离欣赏这次化妆的效果。可不是，效果会很好的——她可以围上一条披肩，头发上插上梳子，化妆成一个歌舞班子的演员参加舞会——也许是安帕罗。她干吗刚才没有想到。因为这样会变得挺乏味，而且不管怎样，晚会还是会照样结束的。

特雷德韦尔太太几乎玩完了第三副单人纸牌戏，纸牌摊在镜子前梳妆台上她的小牌板上，她在这儿可以时不时地向她的

化妆得奇奇怪怪的脸瞟上一眼，这张脸她不再感到有趣，而看来好像是她的性情深处的一种邪恶的素质的显现。首先，特雷德韦尔太太简直不怀疑她的性格中有“邪恶”这个词儿被认可的意义的成分，而且从来没有感到欠缺过。也许相当迟她才发现性格里有个深渊，那儿隐藏着形形色色不讨人喜欢的素质，那些素质在其他任何人的身上她会厌恶，在她自己的身上她就更加厌恶了。她叹了口气，没有玩完牌戏就把牌理在一起，在她的化妆品盒里找安眠药片。

房门砰的一下打开了，利齐摔进来，跪在地上，一转身又站起来；她的五官都扭曲了；她语无伦次，泪流满面。她背后有一个瘦削的、老是带着担心的神情的年轻人，因为害怕被拉进一个女人住的房舱，放开她的胳膊早了一点儿。他一看到特雷德韦尔太太那张化妆得奇形怪状的脸，没法掩饰他的惊奇。他看第一眼的时候，错误地以为那是一个西班牙舞女，第二眼他才看清楚，可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退后去，站在外面的阴影里。“我的太太，”他开始说，很快地短短叙述了事实的经过。利齐歇斯底里大发作，两条胳膊搂住了他的脑袋，按照抽泣和打呃逆的节奏摇晃。“我不得不把她交给你，我的太太，”那个年轻人说，“我在乐队里演奏，不得不马上赶回去，干我的那一份活儿。”

“谢谢你，”特雷德韦尔太太神情极其可亲地说，关上门。利齐毫无顾忌地呻吟着，这会儿直挺挺地躺在长沙发上，而且一直这样躺着，时间长得叫人受不了：“这个畜生，这个野人，这个野兽，”她单调地重复着说。特雷德韦尔太太一边帮她脱去衣服，换上睡袍，一边抑制自己的出于优越感的冲动问：“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她甚至拣起那些还散发着体温和喷洒了不少时候的香水味的服装，把它们理整齐放到一边。她随即记起了她的安眠

约，吞了两片。利齐在枕头上把那张可怜巴巴的痛苦的脸转向她，流露出像挨揍的狗那样的眼神，额头上尽是亮晶晶的汗珠。“啊，”特雷德韦尔太太说，充满了同情和温柔的感情。“你也需要这个。”她取来了水和安眠药片，利齐默不作声地吞服。“好了，”完全像一个友好的女人对另一个那样，特雷德韦尔太太说，“至少今儿晚上是解决问题了。”

“啊，可是还有明天啊！”利齐断断续续地说，平静了一点儿。

“明天？让它来吧！”特雷德韦尔太太说。“至少今晚会过去啦！”她的心情平静和自在了，她的轻松的心境本来几乎会是快乐的，只是，当然喽，要是那样会很荒唐。有什么可快活的呢？她着实不稳地走来走去，没有察觉她的一只脚穿着高跟凉鞋，另一只赤着在走动。利齐受到安慰，身心疲倦，忘掉她的麻烦有好一会儿了，可以盯着看特雷德韦尔太太的脸了。“可是这到底为什么呢？”她喘着粗气。“到底为什么——你对自己干了些什么呀？”

“我戴了个面具，”特雷德韦尔太太合情合理地解释。“为了舞会戴的面具。”

“可是你迟了，”利齐说，又哭了，“舞会结束啦！”

“是的，我知道，”特雷德韦尔太太说，一边在想，利齐已经在恢复她的糟糕透顶的老作风，不久就会变得像平时那样叫人讨厌。她觉得她一定要喝得酩酊大醉，因为利齐的高声传到她的耳朵里，充满回声，好像她在对着一口井喊叫似的：“啊，我现在要做些什么呢？啊，一切都变了。啊，我再怎么也不希望见到他了……啊呀，特雷德韦尔太太，你可以告诉我吗，我怎么会受到这样的欺骗呢？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现在可看清楚啦！”

“人对这些神秘的事情怎么会知道得那么有把握呢，先是一

件事儿,然后是另一件?"特雷德韦尔太太问,态度亲切而超然,微笑着,手里拿着晨衣。她似乎在对天花板说话,因为她的眼睛向上看着,好像指望在那儿看到一个写着的回答似的。"你怎么知道你感觉到一些什么呢?"

她没有好奇心地、慢腾腾地低下眼睛,听了一会儿门口的吵闹声,那是凶横的敲门和踢门的声音,还有醉醺醺的喊叫声。她走近些,听出是丹尼的声音:"听着,帕斯托拉,让我进去,你这肮脏的小——"特雷德韦尔太太的耳朵打了个冷战,但是她听着丹尼大着舌头叙述他打算施加在帕斯托拉这个人身上的种种粗暴的性虐待,其中强奸不过是开场的节目而已。

利齐坐起身来,掩住她的耳朵。"啊,不,不,不,这叫人受不了啦……不,不,我不该遭到这么对待……不,我不要受这种罪,不,不,不……"

"啊,请别叫,"特雷德韦尔太太细心地说。"他不是在跟你说话。他也不是跟我们两人说话。他在跟他自己说话嘛。躺下去,安静些!"

她从容地把一条湿毛巾放在她的额头上,重新把她安置好,好像她是一个组合起来的玩具娃娃似的,然后一跳一跳地走到门口,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手放在球形把手上。冷不防她一下子把房门向后大开。丹尼吃了一惊,摇摇晃晃地退了一步,然后冲上前去,抓住她的晨衣的前襟,把它扭得稀皱,说:"出来,你这婊子,"说得那么有板有眼,好像在传递另一个人的信息似的。"马上出来。我要折断你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扭了一下晨衣的前襟,勒得她的乳房好痛,使她几乎站不稳身子。

她用双手抓住他的手腕,热切地说,"你糟糕地认错人了。你还是再看看的好!"

"你是谁?"他模模糊糊地说,然后又说:"耶稣啊,这是什么人?"并凑过去打量涂着油彩的那张脸,把一股讨厌的臭气喷在她的脸上。"啊 ,来啊,来啊,你骗不了我。"

特雷德韦尔太太贴着他站稳身子,在他的胸膛上用力一推;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有这么大的力气。他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去,不提防趔趔趄趄地撞在对面墙上,沿着墙斜倒下去的时候引出一大堆混乱;他嘴里咕咕哝哝,挥舞着两条胳膊,砰砰地发出响声和沙沙的刮擦的声音,直手直脚地躺下了。特雷德韦尔太太一动也不动,惊奇地望着他,没法相信她这次没有经过考虑的小小的出手竟然有这么大的效果。他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特雷德韦尔太太跪在他近旁,用手指尖摸摸他的头和脖子,不愿意进一步碰他了。看来没有什么地方破裂;虽然他的脖子摸上去松松的,那也可能是完全正常的。他张着嘴,呼吸声很响,半闭着眼睑,眼睛往上翻着。他的舌头伸在嘴唇边,看来好像要说什么;特雷德韦尔太太握紧拳头,再三狠狠地打他的嘴、他的脸和他的鼻子。她打得手都痛了,但是似乎对丹尼没有一点儿影响。他挪动身子,好像要站起来。她感觉到脚底下有一只鞋,把它脱下来,紧紧地抓着鞋底,用鞋跟打他的脸和头,喘着粗气;她跪着挺直身子,更挨近一些,嘴唇抿着,牙齿咬紧。她打他的时候感到的愉快是那么强烈,一阵敏锐的痛感从她的右手腕开始,往上射去,直痛到她的肩膀和脖子。那尖尖的包着金属的高跟每打一下,他的脸上就会出现一个慢慢地呈现猩红色的、半圆形的小印子;当他的额头、脸颊、下巴和嘴唇上印子越来越多的时候,特雷德韦尔太太对她在干的事儿害怕得浑身冰凉,然而无论如何也停不了手。丹尼动了动身子,痛苦地呻吟,睁开眼瞟了一下,然后惊讶地睁大眼睛,挣扎着坐到一半,又倒下去,在

他的梦魇中用被闷住的声音喊叫:“帕斯托拉,帕斯托拉!”

特雷德韦尔太太站起来,感觉到不是丹尼,而是她,避免了一个叫人震惊的结局。她醉貌咕咚,筋疲力尽,摇摇晃晃,用一只脚着地平衡着身子在穿凉鞋;她刚穿好鞋,有个服务员在过道的一头出现了。她担心地向他招招手,他急急忙忙地赶到她面前,好像她是受伤者似的,尽管他马上看到她脚旁不怎么近的地方倒着一个垮了的人。

“我的太太,”他着实焦急地问:“你没有受伤吧?那位先生,”他向下瞟了一眼,“他没有……?”

“啊,没有,”她含含糊糊地说,“没发生那样的事儿。”那个小伙子跪在丹尼身旁,后者已经不省人事了。特雷德韦尔太太认出,那个小伙子就是她把另一只凉鞋交给了他的那个。“我刚才在我的房舱里,”她说,神情坦率得无可指摘。“我听到了叫声,我听到有个人倒下去……他好像在叫什么人,我听不清楚……我出来看看是不是能帮点儿忙……”她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变成一个不知怎么说才好的孩子的声音,嘴唇发抖。“我吓坏了……”她加了一句,声音清楚,说的完全是实话。

“你别烦恼了,我的太太,”那个小伙子说。“这我会处理的。情况并不严重,”他说,一边察看布满在丹尼的面貌上的一个个在流血的半月形小伤口。“只是这位先生有一点儿——也许……不完全……”

“我肯定是这么回事,”特雷德韦尔太太说,现出不以为然的微笑,用小小的、圆转的、防御的动作从她的额头上把手放下。“我非常感谢你,并且为给你添了麻烦感到抱歉。明儿见。”

利齐把床单拉过她的头顶,偷偷地张望着特雷德韦尔太太,像一只胆小的毛茸茸的野兽从巢穴里向外望。特雷德韦尔太太

的眼睛里要是没有了微笑的话，那么微笑仍然逗留在她的嘴唇上。她显得非常令人宽慰。“他走了。没什么，只是弄错了。他敲错了门，就是这么一回事。现在他知道了。”

“我还是希望死掉算了，”利齐抽抽咽咽地说。“生活叫人受不了，你不觉得吗？”

特雷德韦尔太太尽情地哈哈大笑。“胡说八道，”她说，一边递给利齐一玻璃杯水和第三片安眠药片。“我认为美妙极了。”她自己也又吞了一片，望着镜子里她那张邪恶得可怕的脸愉快地微笑。她又喜悦，又兴奋，一把脱下她那只血迹斑斑的凉鞋，吻它。在躺在长沙发上的利齐的上方——利齐迷迷糊糊地问：“你现在在干什么？”——她探出身子，把那只鞋扔出舷窗。“一路顺风，我的朋友，”她说，接着对利齐不容违拗地说：“马上睡觉，要不，我会给你满满一把安眠药片的！”她站在她床旁威胁。利齐昏昏沉沉，对这一切照顾感到喜出望外，错以为这都是出于这个难对付的陌生人的一片出乎意料的好心，渐渐轻轻地打起呼噜来。

特雷德韦尔太太用尽办法洗她那张描画得变了形的脸，泼上温水，抹油膏，轻轻拍打，恢复她自己认识的面貌。她极为愉快地低声哼一支不入调的歌，一边扎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束发缎带，换上她的灯笼袖的白缎睡袍。她弯起身，像一个做完祷告的好小女孩那样睡下，这时候，传来一下谨慎的敲门声，把她又引到门外。那个年轻的服务员笔直地站在那儿，鞠躬。他把那只凉鞋递给她，鞋跟已经修好了。“经你的许可修好了，”态度倒是必恭必敬的，表情却太近乎会意的微笑，跟他的话配不上，“我的太太，你的凉鞋。”

她紧紧地抓住鞋底，好像抓的是一件武器似的。她轻声轻

气地、谦虚地感谢他，站在他的面前，一点不在乎她穿着睡袍。他的眼光闪烁不定地看了她一下，向上看，向下看，侧看，他憎恨他看到的一切。对她来说，他只是个佣人，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罢了，一听到叫唤，就得赶来，一有吩咐，就得去办。他跳跳蹦蹦地在过道上奔去，希望有个跟她平等较量的法子——给她惹麻烦，站在那儿，装出一副奸笑的模样，好像他不知道那个蠢头蠢脑的丹尼先生是怎样才会在脸上有这些鞋跟印子的。他活该挨打。他做出吐唾沫的模样，但是他并没有吐——吐了的话，他不得不拾掇干净嘛。

利齐伸手伸脚地躺着，特雷德韦尔太太又走到她上方的舷窗前，把第二只镀金凉鞋跟另一只一样扔进海去。她把身子探出去一会儿，心情极愉快地呼吸潮湿而清新的海风，再听着在缀满无数星星的深蓝色天空下那些小山似的圆圆的巨浪发出的汹涌澎湃的声音。她记起，从前，她在蒙泰涅大街[1]的一所高高的大房子里坐着，让一个年轻的画家给她画肖像；黄昏来临的时候，他走下一磴磴的梯级去，把面包、干酪、冷牛肉和一瓶葡萄酒拿上来，作他们的晚餐。后来，她在爬上那架吱吱嘎嘎的扶梯时，他为她扶住它，她从屋顶上一个打开着的小小的天窗口探出头去，看到慢悠悠地亮起来的巴黎的闪闪烁烁的灯光，上面是清澈的、颜色越来越深的蓝天，星星在一个又一个地出现。那是五月中旬。

夜晚在慢得叫人沉闷地过去，舒曼医生出来散步，也看看周围的景象，但是不久就厌烦了：像浪潮那样涌现和散开的骚动和

---

① 在巴黎。

混乱，单调、野蛮的音乐节拍，和轮船上举办的狂欢晚会的那些不可避免的结果。他注意到，那些跳舞的西班牙男女保持着完全清醒的状态，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他们的事儿。他们还有事儿要办理，尽管四面八方的观众看来越来越少了。一两个年轻的船员还偶尔在跟那些西班牙姑娘跳舞；那些学生跟往常一样，显得不知疲倦地健壮，在用滑稽的动作表演巴斯克男人跳的方形舞；但是另外有几个人却糟糕地喝醉了——譬如说，丹尼先生，他在跟那个歌舞班子里那个叫帕斯托拉的舞蹈女演员剧烈地争吵。舒曼医生认真地考虑采用什么办法可以控制这种人，至少控制他们在公共场合的语言和行为，不该容许那个家伙在船上用这样的语言对付哪怕是她那样的女人；不过，那不是他的事儿，感谢上帝。几乎每一个还在场的女人都流露出最近流过眼泪或者发过脾气的迹象，或者两样都发生过，而且她们有几个也酩酊大醉了。他回到他住的房舱里以便在需要他的时候人们可以在那儿找到他；几乎马上有一个房舱服务员传来了信息，里贝尔先生的房舱里需要他。他不顾疲劳，马上赶去，发现勒温塔尔先生昏昏欲睡，窝着一肚子火，满嘴啤酒的气味，用冷水绞着一条条毛巾，放在里贝尔先生的头顶上。

"用酒瓶打架，"他说，"像在那些最下等的场所。进来吧，医生。嗨，告诉我，有哪个人能给我在这艘船上指出一个我可以摆脱这个家伙的地方？他什么事儿都不干，只是天天给我找麻烦。一天下来，我也够累的了，几乎睡着了，我作了什么孽，非跟他搅合在一起不可呢？"

他把另一条毛巾放进脸盆架，然后绞干，啪的一声放在里贝尔先生的头上。"有什么办法让我跟他分开吗？"

舒曼医生说："等一下，我来看看他。我怕没有地方安置他。

我会派服务员来护理他的。”

“护理?”勒温塔尔呻吟说。“有这么严重吗?”

舒曼医生用手电筒照着,很快地看了一下里贝尔先生的伤口,用酒精擦擦他的头上,在他的额头顶打了一针,在他的头皮上一溜儿整齐地缝了七针。舒曼医生是用一根黑色的细丝线缝的,缝后把线剪掉,这样,里贝尔先生的头上看来好像另外长出了一溜儿眼睫毛。在动手术的时候,里贝尔先生紧紧闭着眼睛,除此以外,他没有任何动作。舒曼医生接着给他打了一针,差人去叫来服务员给他脱衣服,把他扶上床去。勒温塔尔先生几乎完全泄气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不断地对他自己低声说,直到舒曼医生说:“他会睡很长时间的,我想你不用再为他担心了。不过,你要是需要我的话,来叫我就是。”他在说这些礼节性的话的时候,听到他自己的声音显示出疲劳的、沙哑的音调。

他刚睡上床,快要进入睡乡的时候,又被那个房舱服务员叫起来了。这一次是丹尼先生,那个年轻的得克萨斯人;他遭到一次神秘的武力的袭击,他的脸上,从额头到下巴,留下了一大片密密麻麻、邋里邋遢、模样丑陋的小伤口和瘀伤,布满血斑,而且已经肿起来了。

格洛肯先生自知无能为力,吓得嗦嗦发抖,神情激动。“是我差人请你来的,医生,他可能遭到了什么事儿?两个服务员把他送来的,说他们发现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其中一个说,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以前看见过,这些是女人的凉鞋跟留下的印子!”他在舒曼医生的身旁神情激动,发着牢骚;医生在给他的病人打预防破伤风针,作为第一道手续。他用酒精小心地擦着那张被打得伤痕累累的脸。“说得对,要不,就可能是用钉锤打的。一定是有金属包头的。”舒曼以前也看到过这种伤痕;不用

说，他马上断定，那些西班牙舞蹈女演员的凉鞋的尖跟同任何一个和所有的伤痕都是完全符合的。

“可能出了什么事儿，医生？”格洛肯先生急促而含糊地说。他的自我怜悯的脸还明显地表示着：“干吗我老是遇上这种事儿？我现在该做些什么呢，又没有一个人帮我？”他恳求说：“医生，你知道我的身子不好。别留下我独自个儿跟他在一起！说句悄悄话，亲爱的医生，他是一种怪物，当然不大有人性，我看到过他的行为，听到过他的说话。我能做些什么呢？”

舒曼医生非常坦率地对他微笑，说：“你是今天夜晚我看到的船上极少几个没有喝醉的乘客中的一个。干吗不去把戴维·斯科特先生找回来帮你呢？不过，我想你用不着。丹尼先生会睡着的，别害怕。明儿见。”

格洛肯跟着他走出房舱，但是独自个儿愁眉苦脸地走上甲板去；舒曼医生马上离去，害怕来不及赶到他的房舱一边服用去氧麻黄碱粉滴剂一边透过舷窗透透气就可能垮了。在那时候，他确实想到了死，把一切闯入者都看作是他的敌人。他毫无例外地全都撇开他们，撇开他们每一个，撇开跟他们都是人的密切关系，撇开一切作为医生的责任心，仅仅保持一个医生的形象。他一点儿也不关心他们中的任何人的情况。让他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和时间过着糟糕的生活和糟糕地死去吧，有这么多的腐烂的尸体在充填坟墓呗。他在自己的胸前画了个十字，交叉着胳膊，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小心地呼吸，头慢腾腾地转来转去，拒绝承认他自己的愤世嫉俗的想法，尽管那些想法在他的身内痛苦地涌起和全身流动，好像他的血管里充满了芒刺。

叫人舒服的药剂又在发挥作用了。在他的似醒非醒的睡眠中，女伯爵的脸，没有身子，在他的上方飘浮着，一会儿很近，盯

着看到他的眼睛里去，一会儿退后去，盯着看，一会儿像幽灵似的默不作声又来了。那颗脑袋迅速飞远去，缩得跟苹果一样大小，然后弹回来，又肿又白，像一个被手抛上去的玩具汽球，一个在空中跳舞的死人头，却微笑着。舒曼医生在他的睡梦中站起来，把他的手往上伸，伸出去，抓住了那个死人头，它仍然在微笑，但是在淌眼泪。“啊，你干了些什么?”那颗脑袋在问他。“啊，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在抱怨，只是表示惊讶。他温柔地用摊开的手掌捧住这颗脑袋，亲吻嘴唇，捂住说话的声音，然后捧着脑袋回到床上去；脑袋轻轻地躺在他的胸膛上，没有微笑或者眼泪，默不作声，而他一直睡得那么沉，不知道这是一个梦。

十一点，乐队演奏《再见》后，除了弹钢琴的那个，都走了；他手里拿着一张抽奖的票子。西班牙歌舞班子的表演开始了，唱机调到最响的程度。他们首先跳了一支波列罗舞[1]，里克和拉克也参加了，在跳舞的时候，他们面对面，互相凶狠地寻找对方的眼神，威胁要杀人。那些医科学生围成一个浅浅的圈子坐在他们附近，在适当的时刻拍手和叫“好”。然而，预期的观众几乎都散掉了，那些待着的、或者走来走去的、或者往回走的人，都不是有票的人。阿尔内·汉森打发掉了里贝尔先生，失踪了一会儿去换掉沾着血迹的衬衫后，回到他的躺椅上来了，旁边放着一瓶啤酒。他看来够平静的，闭着眼睛，别人可能会以为他睡着了，只是每隔一段时间，他会伸手拿瓶，灌上一大口。他时不时地坐起身子，向服务员招招手，说上一句:“再来一瓶。”安帕罗过早地断定，她用不着认为这个夜晚他会有什么麻烦了。

---

① 一种轻快的西班牙舞。

施米特太太紧紧捏着她的抽奖票，胆小地坐在乐队附近的躺椅里。里特斯多尔夫太太走过，说："明儿见。祝你好运！"要是她把针刺进施米特太太的身子的话，那也不可能给她更厉害的伤害了。为了避开他十分厌恶的里贝尔先生而离开了他的房舱，勒温塔尔先生在书写室里抽烟，喝啤酒，给他的家人、朋友和买卖合伙人写一些准备从南安普敦用航空邮件寄出的明信片，度过了这个夜晚的早些时候，然后离开书写室，来到他下面住的房间，恰巧遇上接待里贝尔先生这个狠狠地挨了揍的人。这时候，他回到甲板上，打算待在那儿，直到最后的灯光熄灭。他甚至想到过悄悄地安置在书写室里长皮沙发上。他的胃已经不会好了，他不愿让他的鼻子眼再被那头猪的臭气糟蹋。没有人能强迫他；他会先睡在甲板上。他会到下面统舱去——现在，那儿有许多空着的地方了，不管怎样，在甲板上。他站在栏杆旁，交叉着胳膊，沉思着，他的雪茄烟把点点火星飘进风中；他盯着看安帕罗在熟练地表演一种她管它叫卡楚恰舞[①] 的舞蹈，一点儿不欣赏，这种舞他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会再看到；他纳闷的是，不管这样一个女人在干什么，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可能在她身上看到什么。他听说过许多次，非犹太姑娘是好货色，你只要用正确的方式对付她们，这就是说，你用不着想她们是人，跟犹太人一样的人，只要把她们当作活生生的肉体就行了，但是他始终没法相信这种说法……过了一会儿，他走进酒吧间，要了一杯啤酒和一块干酪，回到书写室，享受他的小吃。他关掉灯，舒展着身子躺在皮沙发上。喔唷，喔唷，喔唷，真是太平和安静，在这次航行中，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哩。

---

①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一种快速舞蹈。

一个服务员没完没了地拉他的衣袖催促。天已经亮了，那个服务员说："你一定是睡着了，先生，"现出一副冷冰冰的无可奈何的神情；他再也经受不起对于在永久存在的混乱状态中把一小块凌乱的空间理整齐而表示绝望了。勒温塔尔先生顿时完全清醒了，坐起身来，迅速地用他的手掌擦擦脸，脚踩到地板上，用讥讽的口气问："你怎么认为呢？"那个服务员猛地转过身去，愤怒地两个肩膀一耸；勒温塔尔对强迫下人干不管哪种不愿干的事情都感到高兴，看到他这个举动，就大声吼叫："嗨，服务员！"表示要一壶咖啡。他满意地看到，那个服务员的迈着的脚步像自动装置似的站住，但是那个服务员的心中另有一个人，那个人胜利了，他竟然冲出房间，好像有魔鬼在后面追他似的。

勒温塔尔先生感到迷迷糊糊和动作笨拙，回到他的房舱里去洗脸和换衣服，准备进早餐。他想他不得不继续在那儿干这些事情，但是再怎么也不会睡在那地方了——没有什么能够强迫他。他发现另一个服务员和舒曼医生已经在那儿，为里贝尔先生忙开了；他被安置在下铺上，事前并没有问过他勒温塔尔先生，下铺的合法使用者；他看到这情况，顿时勃然大怒，但是只有从他的微微发抖的声音中才听得出他在发火。"让他睡我的铺位上就是，医生，既然他已经睡了。我不要它了，我不再使用它了。"

那头猪里贝尔继续闭着眼睛，但是他的眼睑在动，假装睡着了，或者不舒服，或者没有听见，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在假装，这足够把一个老实人逼疯了。好像用一个酒瓶轻轻地砸一下，就能伤害这样一颗脑袋似的。舒曼医生在换包扎，难闻的碘酒气散布得到处都是；他一边点点头，一边不在意地说话。"哦，不必，我想你不必这样，"他说。"不管怎样，长沙发始终摆着

嘛。”

在勒温塔尔先生的心中，一种缓慢、低沉、越来越增强的无声的号叫在升起、回荡和消失。那是一阵号叫，也是一支有歌词的歌。“抢走我的桌子，抢走我的床，抢走我的鲜血，碾碎我的骨头，上帝诅咒他们，他们还要什么？”他憋不住满腔怒火了，在舒曼医生的耳朵边那么响地喊叫，以致医生吓了一跳，几乎把正在绕着里贝尔先生的额头的纱布掉在地上。“小心点，行不？”他大喝一声，但是勒温塔尔先生的声音淹没了他的说话声音。“也许我要自个儿用我的床呢，医生？也许就这么一回，我倒喜欢在从什么地方回来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人在把我推出去呢？有哪一条法律说，我不该得到我付了钱的东西呢？你怎么能进入这房舱来，弄得好像他拥有这个地方似的，占用了我的床，只是因为他喝醉了而我没有？医生，”他说，他的话在结束的时候，流露出悲伤的声调，就像一个正派的人在向另一个人的同情心和是非感呼吁：“医生，我想要知道这些事情——你告诉我吧！”

舒曼医生对这场自私和坏脾气的表现极为厌恶，好像他那个讨厌的病人还不够麻烦似的，冷冰冰地问：“不过是把你的床让给一个需要它的人呗，尤其是你已经有了一张一样好的嘛，难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牺牲吗？你要是想要的话，我会吩咐人把他移到长沙发上去的，可是船开始在颠簸得很厉害了，让他躺在这儿，掉下去的危险少一点儿。”

这么说，等到犹太人全部回到耶路撒冷后我就可以掉下去喽，这是怎么回事？要是砸烂的只是我的脑袋的话，有谁会关心呢？他用无比轻蔑的语气出声说：“让他占用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吧，我不使用啦！”

舒曼医生用疲劳的、嘲笑的语气说：“谢谢你。”一听这话，勒

温塔尔先生用撅起的嘴唇响亮地、唾沫四溅地呼了一口气，走到外面过道去，才没有真的说出他对这种谢谢的想法。

船长邀请舒曼医生到驾驶台去喝中午的咖啡，马上开始谈话。"我得到几个不同的值班船员报告，"他一边说，一边把他的下巴上垂下来的肉拉直，再塞进衣领，"那些制造混乱的西班牙舞蹈演员不但办事极为放肆无礼，不但对任何正当的社交礼节一无所知，而且看来还是一伙抱成一团的专干小偷小摸的勾当的小绺儿。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多事的航行——"

"这是一场灾难，"舒曼医生说，不打算掩饰他对整个乌七八糟的局面的厌倦或者漠不关心。

"这个词儿我们在海上是不用在任何比沉船轻的事情上的，"船长说，用淡淡一笑来缓和他的严峻的语气。"一个海上的老把式[①]，"他说，让舒曼医生猜想他指的是什么老把式，"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和灾难，不可能错误地把一船乘客的轻罪当作任何严重的罪行。他们不懂得怎样在船上行为规矩——"

"他们有些人，在陆地也不行。不过，船上还有一些规规矩矩的人。"

船长对这个好像是放在盘子里端给他的机会几乎得意地笑出来。"你要是能指一个给我看的话，我会大为高兴的，"他带点儿奉承、快点地说。舒曼决定装出有点儿感兴趣的样子。"这是困难的，"他表示同意地说，"相识的日子短，又在一个尴尬和陌生的环境里。很少的人会显示出他们最好的方面。"

这话不需要回答。船长接着说："我听说女伯爵的珍珠被偷

---

① 原文是 sea dog，可指经验丰富的水手、老水手、海盗等。

走了——不幸的女士！我最后开始想，她的脑子不怎么——"他用他的食指轻轻地碰碰他的额头。

"有可能，"舒曼医生说，为了结束这个话题。"我们不知道珍珠到底有没有被偷。女伯爵说那两个孩子从她那儿抢走的。她的护理人员，那个女服务员，说女伯爵那天没有戴珍珠。那两个孩子把什么东西扔进海去了。有两个证人，吕茨先生和太太，可是不幸的是，他们并不互相支持对方的证词。什么都没有证明。"

"这种事情的麻烦是，"船长举起一只手，不说话了，在这段时间里，那个站在听不见的地方的年轻的服务员走过来，添了一点儿咖啡，"麻烦是，如果一个男人，任何一种男人，"他宽宏大量地找补说，"不仅仅是一个海员，发现自己卷入了女人们的低级的闲磕牙中，不得不应付那些本身就是低三下四的事情，那是对他的自尊心的一种冒犯。我听说，那些跳舞的西班牙男女在圣克鲁斯偷了许多家铺子，而乘客中许多那些你可以称之为正派人的亲眼目睹了这个情况。没有人当场干与，或者采取措施阻止吗？"

"有几个乘客，不是女人，"舒曼医生说，"今天早晨在他们中间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他们看到的情况确实非常可疑，他们掌握了种种可靠的疑点，可是归根结蒂没有证据。任何人都没有感到他应该去干与，或者甚至去特别注意。"

"这真是非常谨慎，"船长干巴巴地说，"告诉我，你的伤员怎么样了？那个我记不得名字的年轻人，看来好像被人用一件不是一般的武器袭击的，也许是钉锤，或者鞋跟？"舒曼医生看到船长的灰眼睛里隐隐闪现一种关心男女私情的微光。"我想，船上跟通常那样，总是有几对谈情说爱的男女，不可避免地有失望和

戏剧性的场面,"他津津有味地说:"那个年轻人在恢复吗?"

"他会活下去的,"舒曼医生说,"跟其他一切人一样。又得提出那个问题来了,到底是谁干了这个彻头彻尾的恶作剧的举动。那个年轻人口口声声地咬定是一个叫帕斯托拉的姑娘,西班牙歌舞班子里的一员。可是一个服务员为那个姑娘辩白,说她是无辜的——这个词儿用在那个班子里的任何人身上都是奇怪的——说他可以肯定是一个戴面具的女人干的,因为戴了面具,所以他认不出她。这就是他知道的一切。"

"关于里贝尔先生在甲板上头皮被擦伤的那件事儿怎么样了?"

"只有这件事儿我们是完全清楚的。汉森先生在整个航程中始终显示出他是个动不动发脾气的、一脑门子怪念头的人,他凭着他自己的理由,在里贝尔先生跟一位女士毫无恶意地在跳舞的时候,他在里贝尔先生的脑袋上砸烂了他的啤酒瓶——"

"女士——"船长沉思地重复着说。这个词儿笼罩在他们中间,像吹过一阵雾。舒曼医生没有停顿,继续说下去:"人人知道这件事儿,而且只有这件事儿是人们确实知道的。其他的一切只是一些猥琐的、微不足道的事儿,引起人们一阵大惊小怪而已,一个琐碎的谜团。"

"女伯爵是个谜一样的人物,"船长说,"那个美丽的女士再怎么也不应该被独自个儿撇在那座野蛮的岛上。不管她干了些什么。没有一个女士能在政治上做出那么多的危害而应该受到这样的判决。顺便问一下,你当过她的医生,而且受到她的信任,她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舒曼医生相当生硬地回答。

船长的下巴凹进去了,他的脖子僵硬了,他的脸慢慢地涨成

紫红色。“我一开始就这么想，”他怀着积怨说。“很可惜，她经你治疗后没有什么好转。说真的，我有这样的印象，她经你的手治疗后，她的情况要坏得多……哦，舒曼医生，肉体是脆弱的，对不？一个医生经受不起把他的失误作为压在他心头的负担！”

舒曼医生在船长的话说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站起身子，在他说到结尾的时候，生硬地鞠了一个躬告别，注意到船长的愤怒和懊丧的迹象，但是他自己的心中燃烧着刺痛人的愤怒，他只在过了好一会儿后才想到，船长的血压看来相当高。

丹尼的响亮的呻吟和要向帕斯托拉报复的威胁，在舒曼医生的针下平静下来了，但是在像一个大南瓜似的纱布包扎中，仅仅能看到的他的肿起来的嘴唇和鼻子尖，在那一夜其余的时间里一直在发出嘟嘟囔囔、叽叽呱呱和呼哧呼哧的声音。戴维摇摇晃晃地站着，叉着腿，脚在哆嗦，试着站稳身子，并想弄清楚房舱里怎么会乱得这么一团糟。格洛肯先生几乎吓得没命了，眼泪汪汪地要求戴维不要睡，也不要让他格洛肯先生睡。在这艘船上，生命太危险了，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一样受到危险，而且是无辜的人先——

“不总是这样，”戴维说，带着醉汉的自命不凡的神态向丹尼一挥手。

“总是这样，”格洛肯先生固执地说。

“随你的便吧，”戴维说，挣扎着走到靠墙的铺位前，脸向下，倒在他的枕头上，听凭他的醉意摆布他。他通过令人晕眩的波浪沉下去，沉进淹没人的然而淹不死的无底的海洋。梦魇团团包围他，是一片回旋的火光和可怕的、没有固定形状的幻象似的橙色亮光，还有一只只眼神发疯的眼睛和一张张使劲扭动的在

无声地尖叫的嘴。他翻了个身，脸朝上，张开眼睛，看着他周围像低级的喜剧似的环境，听到他自己出声说："我准备去疯人院！"

"什么？说什么？"格洛肯先生马上作出反应。"别关掉你的灯。别睡着！"

"好吧，"戴维说，"我不会的。不过，你睡着就是。不管怎样，一切都过去了。不可能再发生什么事情了。"

"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格洛肯先生呻吟着说，但是几分钟后，戴维看到他睡着了。他最后也睡着了，睡了一个钟头，在一阵阵要命的头痛中醒过来，痛得头都快要裂开来了，还有喉咙里直想吐，口渴得像火烧，胃也在闹别扭，不肯接纳它仅有的朋友阿斯匹灵和凉水。

丹尼又醒过来了，这一次只是断断续续地呻吟，要求喝水，但是抬不起身子或者转过脑袋来喝。戴维说："看在上帝份上，只要躺着别动，把嘴尽可能大地张开就行了，我会倒进去一点儿，你咽下去就是！"干这事儿造成不少混乱；丹尼的嘴里溢出水来，喉咙里发出哽住的声音，还有格洛肯先生的恳求："劳驾，劳驾，劳驾，我的药，斯科特先生，请把我的药给我。我已经迟了，劳驾——"

戴维给了他他的药，又吞了一些阿斯匹灵；他在脸盆架前轻轻地洗脸和换衣服的时候，问丹尼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丹尼的被打了的嘴动了，慢条斯理地说出了他受折磨的经过，或者说他以为的经过，他用的词汇甚至使戴维感到惊奇，戴维认为那些词汇他都知道，也听懂了大部分的意思。他注意那些语言注意得着了迷，几乎忽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帕斯托拉这个名字出现在他咬牙切齿的最强烈的痛恨声中。

"你能肯定吗?"戴维说。"我最后看到她时她像一只兔子似的从你那儿跳开,跑在前面,隔着好长一段路呢——"

"我最后赶到她的房舱前,"丹尼用低沉、粗嗄的声音说,"她马上出来,用一把破冰锥猛扎我。我敢打赌,是她那个杈杆儿出的主意要她干的。我敢打赌,他就在那儿,她的背后——"他撅起嘴,嘴角扭曲。"她已经收过我的钱了,"他低声说,"该死的是,她还要哩。我猜想他们估计一切会顺顺当当,不会有什么毛病的——"

戴维离开房舱,不再等什么,假装没有听到格洛肯先生热切地恳求斯科特先生别撇下他一个人。"让他独自个儿上甲板去吧,"戴维决定,"没有我的事儿了。"他弓着背,身子不舒服,找到了他的餐桌。这一回,他肚子不饿,喝着咖啡,希望珍妮来,又害怕她不来;每一回有人进来,他都不由自主地向周围瞟上一眼,一想到要看见她就憎恨,简直就要忍受不了这样等她。最后,他觉得他有件她没法回答的事情要跟她说。她要是再敢对他说:"这不是爱情,戴维——"的话,这一回他才不在乎那是什么哩。他就到此为止了,他将要在比戈离船上岸。

他又向周围张望的时候,珍妮在那儿了,正在向他走来。他激动得像瞎了眼似的,看不清了,直到她走得很近,才看清她脸色苍白,筋疲力尽,眼睛肿着;但是她刚洗过脸,浑身散发着玫瑰花的香味,她的微笑是坦率和友好的,即使有一点儿害臊的话。她坐下来,抖开餐巾,说:"主啊,昨宿过得多难挨啊?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醉得这么完全不知道过。抽奖的事儿怎么啦?我想要知道。结果怎样?或者还有什么别的事儿?戴维宝贝儿,你看来好像彻头彻尾地累垮了。你怎么啦?"

她尽管在微笑,却并不对着他的眼睛看;她这会儿向服务员

点了橙汁、咖啡、烤面包、果冻和牛奶，接着说："天啊，这只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罢了。我什么也吃不下！你也只要了咖啡吗？"

戴维用短促清脆的声音说："听着，珍妮，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你这一向在打算干什么？假装你记不得？得了，我以前这么跟你说的时候，你不信我的话，这回我不相信你的了。"

"这倒是够公平的，"珍妮说，"可是现在我相信你的话了，因为我跟弗赖塔格跳了许多支舞，在船上胡乱转悠了一阵又喝了许多酒以后，我一件事儿也记不得了；今天早晨，我在我自己的小小的干净的铺位上醒来的时候，头痛得要裂开来，埃尔莎睡在房间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她问：'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我高兴地告诉她，我觉得简直再糟糕不过了，她听了这话似乎满心欢喜。"

戴维看到她真的不自在，在她说个没完的时候，始终用冷冷的眼光盯着她看，不过中途打断她，问："你不记得了？"

珍妮说："我在尽最大的努力试图告诉你，在我的放荡的经历中，我第一次过了一些时候以后一件事儿都记不得了。我们跟特雷德韦尔太太和她那个女人气的小个子船员在一起待了一会儿；我们好像走遍了全船，而且看到什么酒就喝什么酒，可是我记不得我怎么回的房舱了。啊，"她痛苦地说，双手捧住她垂下的脸。

"你到底能肯定你回你的房舱了吗？"戴维现出尖刻的微笑说。

"我在那儿醒的嘛，这点可以算是个证据吧，"珍妮说，感到她的脊背上一阵凉意，因为戴维将要告诉她什么她不想要听的事儿了，她凭本能知道那是什么事儿。"怎么啦？"

"怎么啦，没什么，"戴维说。"喝醉以后，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事儿是挺方便的，对不对？”

“嗨，不对吧，”珍妮干巴巴地说，“不会是你又跟在我后面转悠和偷看吧？怎么啦？我干什么了？”

他把头转过去，他的侧影现出一个紧绷着的、莫测高深的微笑。“去问弗赖塔格，”他说，眼光锐利地盯着她的苍白的脸色上呈现的浅绿色阴影。

珍妮对他脸上的这个表情太熟悉了，又对它憎恨起来。“我稍后会去问的，”她说。“用不着急嘛。”她声音里的怒气跟她渐渐汪满在她的眼眶里的眼泪不相称。再掉些眼泪，可不是，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淌眼泪——这一回，眼泪不灵了。“别哭，珍妮，或者，别在人们的面前哭。他们会以为我在打你哩——”他说。“你确实哭得挺精彩，不过，现在这么干有一点迟了。我们已经有了隔阂，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干吗不能挑明真相，一拍两散呢？”

“我们不是一直在这么干，渐渐地散吗？”珍妮问，她的眼泪马上干了，脸上开始现出淡淡的愤怒的红光。“难道非闹成一场痛苦的分离不可吗？难道我们非闹得筋断骨折不可吗？我希望，我们真的对这样的结果都有了准备，就能让这件事儿自然而然地了结了——这样，就不会太伤人！我们会渐渐地习惯它——”

轮到戴维勃然大怒了。“我应该对什么完全习惯呢？看你直挺挺地朝天躺在轮船的甲板这样一个简直是公共场所的地方？你总算对我保持忠诚，没有干那事儿的唯一理由竟然是你喝得太醉了，对那个勾引你的男人不感兴趣。”他又倒了一杯咖啡，说：“我们别谈这个话题了。我已经对它厌烦了。”

珍妮喝了一大口太烫的咖啡，微微喘着粗气，说：“你是个没有人性的人，你知道吗，你这个没有人性的家伙？”

"你的酒还没有醒吗?"戴维问,语气中带着近似得意的意味。"有时候,我想我是清醒了,又可以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平庸、琐碎的事儿了,一杯热咖啡会又把我推进水沟,我不得不再一次从湿漉漉的泥地和野草中爬出来——"

"你对自己挺满意,是不?"珍妮指责地说。"你对发生了这事儿感到高兴,是不? 你确实一直在希望出这样的事儿,对不对? 我愿意不惜代价知道,你在过去那段时间里,脑子里一直在想什么——并不是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以前它确实跟你有关系,"戴维用一种新的语气说,好像他在和气地跟一个陌生人说话似的,"可是你说得对。现在跟你没有关系了。"

珍妮平静地站起来,她的脸上神情安详而坚决,但是戴维看到她的手在颤抖。"对不起,"她说,"可是我现在一定要走了。我有个问题要去问一个人。"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戴维稍微提高他的声音,但是她走出去的时候,不再瞟她一眼。他又倒了一杯咖啡,跟服务员说,"我现在要熘蛋糊和火腿,谢谢。"

特雷德韦尔太太和弗赖塔格先生早晨在甲板上散步,互相和气地打招呼,而且一致认为一起在露天进早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来消除昨宿残余的混乱气氛。他们两人对人情世故都有高明的观察力,心情也正在好头上,所以当有几个模样特别明显的惯常寻欢作乐的人在他们的躺椅旁转悠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相对微笑。他们交谈着一两个普遍的,即使是次要的,事实真相——寻欢作乐往往比干最艰苦的活儿更容易淘空人的身子;他们两人都曾经注意到,放荡的生活有时候使人

的面相变得具有憔悴、痛苦和崇高的纯洁相；这本来应该是过禁欲生活的人才会有的面相，但是往往没有。“两种生活同样毁损人的面相，”弗赖塔格说，“真正糟蹋生活的罪孽是滥用和破坏美，甚至是个人自己的美，甚至尤其是个人自己的美，因为这是应该由我们照管的，我们有责任让它处于良好状态——”

特雷德韦尔太太转过她的深蓝的眼睛，微微惊奇地盯着他看。“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她说，“我以前只想到美是生活的一个方面，总有一天会跟其他的一切一起过去的——”

“也许吧，”弗赖塔格说，“不过，这跟急急忙忙要消灭它可不一样，你想对不？”

“也许不一样，”特雷德韦尔太太说，望见珍妮·布朗在向他们慢腾腾地走过来；她头朝着海，两只手交叉着，在手腕处合拢。她走过去，没有看见他们，脸色苍白、忧伤。“那个可怜的姑娘，”特雷德韦尔太太相当懒洋洋地说，向弗赖塔格转过脸去。他吓了一大跳，身子一惊，盘子里的食物都发出了响声；他盯着看越走越远的珍妮，睁大了的眼珠子使他的灰眼睛冒出黑色的火。特雷德韦尔太太窘得浑身发热，好像弗赖塔格说了什么极为不得体的话似的；他只是不懂得自我克制，不懂得保持尊严罢了。他和那个姑娘中间发生哪一种事情，都无关紧要嘛；他实在太软弱了，让他心中的感情都这么暴露出来。她小心地避免面对他。这就像几天前那个早晨谈到他妻子的时候；就像他在书写室里跟她挑起那场争吵的时候。特雷德韦尔太太小心谨慎地把盘子放在他们的两张躺椅中间的甲板上，两只脚都踩在地上，站起身来，好像她在从汽车里出来似的。

“你上哪儿去？”弗赖塔格问，简直像个小男孩。

“我的同房舱的乘客身子不舒服。我答应过帮助她。”

“不是那个尖叫的丑女人惹出一切麻烦来的吗?”弗赖塔格扭曲着嘴问。特雷德韦尔太太走掉了。弗赖塔格站起身来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寻找珍妮。他寻找了一个钟头,没有找到她。

特雷德韦尔太太走近她自己的房门的时候,她隔壁那个房舱的门开着,鲍姆格特纳一家子随即走了出来;那个小男孩走在前面,一副怯生生的窝囊相。鲍姆格特纳先生为他的妻子拉着门,在旁边跨出一步;他那张长着软弱的嘴的、自我怜悯的脸上几乎像在做戏似的现出恭敬的表情,同时现出习以为常的内疚神情。他的妻子像个陌生人那样经过他身旁,然而她的永远悲伤的模样这时候染上羞愧的神情;三个人都默不作声,好像他们共同负担着一个压力沉重的秘密。特雷德韦尔太太打开房门,人进去一半,然后回头匆忙地说:“你好——,”然后关上门;利齐从她的额头上推掉冰帽,唉声叹气地说:“请问,这会儿有什么事儿吗?”

“没什么,”特雷德韦尔太太说,“我可以为你干些什么吗?”

“我想再服一片安眠药片,”利齐神情抑郁地说。“告诉我,你在上面听到什么消息吗? 那个舞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特雷德韦尔太太递给她药片和一杯水。“流言蜚语倒是有,”她说,“不太有趣。抽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了;双胞胎中的一个从一个敞开着的篮里抽出奖票;西班牙歌舞班子里的人赢得了所有的奖品,只有一条小小的白围巾归那个弹钢琴的,一副响板落在一个古巴学生的手里……这我只是听说的——有几个德国人在说,胡滕那两口子和别人。没有人直接告诉我。喂,”她亲切地说,“你还要睡觉吗?”

“我想是的,”利齐说,人几乎完全变得收敛了。“你没有听

到关于里贝尔先生的消息吗?"

"他在休息,"特雷德韦尔太太说,"我希望你也休息。"

她近乎绝望地走出去,不过总算一路走到了那间小小的书写室,不向任何人瞟一眼,也不向任何人打招呼;这些日子里,几乎没有人上那儿去。她独自个儿坐在那儿看旧杂志,直到进午餐的号声传来。鲍姆格特纳一家子的脸的幻象一直在她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出现。明摆着昨宿他们也发生过一场不怎么体面的小事情。特雷德韦尔太太甚至不想去猜,那可能是什么事儿。不用说,他们互相有失体统地得罪了对方,所以才会有那个蹩脚的、无精打采的、礼数周到的表现,而他们的孩子,不用说,在打算证明他们并不像他们互相给对方造成的印象那样低下。那个小小的、可怕的拉门和鞠躬的场面无非是在说,你可以看到,在别的时间或者别的地方,或者别的场合,我可以完全不一样,比你看到过的我要好得多,是不是?特雷德韦尔太太往后靠去,闭上眼睛。他们在互相说的只是,*爱我,不管怎么样,爱我!不管我爱不爱你,不管我是不是适合爱,不管你能不能爱,哪怕没有爱这种东西,爱我!*

随着这些零零星星的念头,出现了一种小小的、深沉的、游移不定的厌恶的感觉,对自己的反感。她又记起了,就像在梦中那样,她的绝望,她的长时间哭泣,她的失败的爱情或者她被告知是爱情的东西所造成的没法治好的悲痛,和那些毁灭了的希望——什么希望?她记不起了——她一直孩子气地从这个或者那个前提出发拒绝承认和接受人所希望是真实的情况与仅仅是人间的约定俗成的习惯之间的差别,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她受过伤害,她复原了,那不全都仅仅是愚蠢的、粗心大意的浪漫经历吗?她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这个气闷的房间里踱

开了。整个早晨,她一直试图在脑海深处正确地拼凑出她昨夜发生了什么事儿,干了什么事儿。跟那个年轻的船员在一起的情景是够清楚的。她记起了鲍姆格特纳先生靠在栏杆上,看来好像有病。她在自己的脸上化妆的时候,利齐被交到她的手里来了;然后——

再回避是不行了。她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找不到她那双镀金的凉鞋了。她的睡袍的前襟下面有凌乱的血迹。她在走动的时候,记起来了,站住脚,紧紧抓住一张椅子背,觉得人要晕过去。她又走动了,然后走出房间,开始去找珍妮·布朗。她是丹尼的同房舱的乘客,那个相当自我专注的小伙子的"姑娘",一定知道一切情况……特雷德韦尔太太很清楚地记起了发生过的事情,她干过的事情;她要知道一些她造成的伤害的细节,尤其是要弄明白她的敌人是不是认出了她。

珍妮·布朗在看布告牌。一张边缘参差不齐的古代布告的复制品上写着:昨夜暴行和流血事件的受害者在安静地休息。行凶的嫌疑犯已经受到监视,尚未被捕,但是希望早日揭露一些有趣的特征。署名者:蟑螂报童。

至于其他的消息,有从遥远的世界传来的运输业罢工,多少港口瘫痪,多少人牵涉其中,工人损失了多少工资,运输业损失了几百万的营业额,而且看不到结束的前景;古巴的局势未见好转,各派别间种种达成和解的尝试已告失败;失业遍及全世界,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处处是真正的威胁;昨天的乘客抽奖由勒温塔尔先生赢得,钱数若干;马赛将在两点钟开始;谁遗失一支上面刻有大写首字母R的金镶边自来水笔,请去事务长办公室领取。

特雷德韦尔太太对珍妮说:"但是没有布告说到昨晚战斗中

的受伤人员。我想要知道他们眼下在干什么。”

珍妮说:“听起来好像都是关于男女间的事儿的。听说那个叫帕斯托拉的姑娘用一把破冰锥攻击了威廉·丹尼。而那个长腿的瑞典人用啤酒瓶砸了里贝尔先生的脑袋。这些是我刚才在甲板上溜达的时候听到的情况。”

特雷德韦尔太太突然叫人惊讶地笑起来——不是响亮的或者空洞地笑——而是小小的、充满欢乐、充满纯粹喜悦的带着颤音的笑声。珍妮受到这种笑声的极大的影响,她也发出了小小的、颤抖的笑声;她原来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为任何事情而笑,这会儿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这么说,到底还是那个小个子舞女喽?”

“这是他说的,我想他应该知道呗,”珍妮说;她们语声中带着轻轻的笑声继续谈下去,心情轻快而毫无怜悯心,对那个凶狠霸道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坦率地表示喜悦。

“它几乎恢复了我对生活的信念,”珍妮说。然后,她的脸色顿时变了,又一次变得苍白和焦急。特雷德韦尔太太看到弗赖塔格在向他们走来,一点儿也没有不自在的神情,她用她那种奇怪的、没有动作的走路姿势走掉,仿佛她不使用普通人的肌肉。珍妮站着,等弗赖塔格径直走到她的面前,等他说话。他凑得很近,温和地说:“我一直在为你担心。”

珍妮说:“别,请别。”

他说:“我一直在到处找你。你刚才在哪儿?”

珍妮心平气和地说:“这儿那儿转转。没有人在这艘船上可能长久地丢失……啊,我再也忍受不了啦。啊,我要在比戈离船,可是我还没有弄到西班牙签证。”

“别说‘啊’,”弗赖塔格先生安慰地说。“事情还没有糟到那

个地步。你还没有遇到任何要伤心的事儿。"

"啊,这你怎么知道的? 告诉我,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你要是能看看你的脸的话,那有多好!"他跟她说。"珍妮,你真是个奇怪的姑娘。你刚才以为你已经被判了死刑。听我说,"他说,像哥哥那样亲切。他用不涉及男女私情的哥哥的动作轻轻地挽着她的胳膊,把她带到甲板中心,跟她一起散步。"也许这你不会相信,可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发生过,我们都喝得太醉了,我遗憾地说;我当时什么事都干不成了,而你当时——唷,压根儿不在那儿,在月亮上,当然;珍妮,也许这有一点儿乏味而且当然荒诞,我们两人都用不着再去想它了。你在听我说话吗?"他说,凑上前去,盯着她的脸看。她突然站住脚;使他吃惊的是,她发出了令人相信的欢乐的笑声。"多么愚蠢!"她说,"归根到底,没有什么。你既然给了我这一切麻烦,我原应该是有点儿什么的! 有点儿什么比麻烦更严重! 你用不着再去想它,可是戴维会想一辈子的。他昨宿看见了我们,看见了差一点儿没要他命的事情,我想……"

"只要他一直偷偷地跟在后面侦察你的行踪,"弗赖塔格毫不畏缩地说,"他看到的任何事情都会对他过于好的。"

停顿了好长一会儿以后,珍妮走了几步,走在他前面。"这是我应该得到的,"她直截了当地说。"再见。"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儿后悔的神情;他表情古怪地看着,她的告别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并不谦虚的。她突然对他冷落,在他的心中勾起一种恼火和奇怪地受到伤害的感觉;他没有马上抛开这种使他刺痛的感觉。甚至在他提醒自己以后——他提醒自己,她并不真正有吸引力,是个小小的不值得男人注意的无足轻重的姑娘,只是个

喜怒无常、浅薄和神经过敏的美国姑娘，假装自己是个艺术家，用虚假的重要性来装点自己罢了——这整整一系列贬低她的标签似乎对于他的受伤害的感觉以及他要对她进行某种报复的念头都显得力度不够。他对特雷德韦尔太太跟利齐那场不相干的闲谈的怨恨早已消失了——说真的，他对特雷德韦尔太太倒稍微有一点儿新的不满，因为她一次也不表示最微细的姿态来促进他们的前途未卜的和解，这样他就无从得意地施展他熟悉的那些小小的手段去捉弄她，恰到好处地煽起她的征服的欲望而又不至于使她丧失勇气。他对她又愿意跟他一起进早餐相当高兴，好像他们的这个开端已经使他们中间产生了小小的联系似的；后来，她粗鲁地走了，结束此事；尽管她看来好像出身于比较好的阶层，归根结蒂，她跟珍妮一样粗鲁地走了；得了，也许美国女人她们个个都是粗鲁的。他摇摇头，好像那会摆脱他那些不愉快的想法似的，试着想起玛丽，但是他离她人越是近，在他的脑子忽隐忽现的形象越是模糊。那有什么可想的呢？她是玛丽，她在那儿，在等，他们会在中断一起生活的地方重新一起生活——不，他们从来没有在什么地方中断过一起生活；这次分离算不了什么，仅仅是一次习惯、惯例和美好而温暖的日常婚姻生活的被打断罢了，好像婚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双方的分离所改变和影响似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大声叹息。

在酒吧间里，汉森先生弯着身子，对着一杯啤酒，好像对着一个敞开着墓穴的坟墓。西班牙歌舞班子的人员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他们面前放着咖啡杯，里克和拉克的手伸在糖缸里；他们都默不作声，沉着脸，只心心念念地想他们自己了。他们跟这艘船和船上的乘客们的事儿结束了，他们跟船上的一切都了结了，他们用不着再表示憎恨和轻蔑。他们沉着的脸上流露出一点儿

沉闷和忧伤的神情,好像他们的胜利不值得花那么大的代价,而他们累坏了。弗赖塔格一路穿过酒吧间,当他看见谁已经在那儿时他没有站住脚: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喝什么啤酒也没有用。

珍妮回到她的房舱;埃尔莎坐在长沙发上,双手摊在她膝盖上的一本书上。"你在看什么书?"珍妮问,一边洗手,因为没事可做。

"《圣经》,"埃尔莎冷淡地说,没有抬起眼睛。

"你吃过早饭了吗?"

"吃过了,"埃尔莎说,"那些西班牙人已经在那儿了;我们经过他们身旁的时候,我母亲以他们能听见的声音说:'注意你们的钱包!'可是他们假装没有听见。我可怜的父亲,我为他感到难受,他低声开了个玩笑,我想,要是我妈对那种外国人说这样的话,她就会使他在背上挨上一刀,而我妈只是大声用西班牙语说,在他们用一切话骂了其他人之后,用小偷这个词儿称呼他们还算是客气的哩。我想,我还是死了算了,"她突然找补了一句。她冷不防合上《圣经》,侧身倒在长沙发上,直挺挺地伸着手脚,号啕大哭起来,眼泪滚滚地淌到她的头发里去。

"没有用,"她唠唠叨叨地说,"再怎么都没有用。我是这么丑,这么蠢,没有人要接近我,没有人肯跟我跳舞,我在那本书里找不到教我怎么生活的话!我母亲曾经要我尝试学弹钢琴。我学了多少年,可是任何人都比我弹得好,没有人要听我弹琴——"

珍妮递给她一条干净的手绢,无可奈何地说:"埃尔莎,埃尔莎,事情还没有这么糟,拿着这。我们去洗把脸,甲板上去。我

们快要到比戈了，我们上岸去，而那些下流的跳舞的男女会待在那儿，那么，样样都会好些。”

“不，不，”埃尔莎说，“我不去。你去。”

约翰从他的短短的沉睡中醒来，浑身温暖而轻松，他舒展身子，打呵欠，像猫似的打滚，喉咙里发出舒适的声音。他在天刚亮前才进来，大大方方地轻手轻脚，而不是偷偷摸摸，也不是小心提防；他的舅舅醒着，没有盘问他，只是要了一杯水。这会儿，他睡得很沉，神态舒适安详，脸色平静和善，眼皮紧闭着，他的蜡黄的脸显得平滑和冷冰冰。约翰吓慌了，把他的手掌放到他的嘴和鼻子眼上，摸摸他还有没有气，然后摸他的心；他的手在哆嗦。“舅舅！”他高声喊叫。“醒醒！”他舅舅睁开眼睛，发出一声小小的悲伤的不满，说：“不要，干吗非叫醒我不可？我很晚才睡着的嘛。”

约翰猛地把手抽回，结结巴巴地胡乱道歉。他的舅舅没有回答，只是又闭上眼睛。约翰拿不准地等着他舅父呈现生命的迹象，试着记住他的诺言，把憎恨和不耐烦，其中还夹杂着对死人的恐惧，硬压下去——他干吗不能咽下最后一口气，了结这个恶劣的局面呢？“舅舅。”他说话的声音比他打算发出的更刺耳。“你现在想要洗脸、吃早饭吗？告诉我！”

他舅舅睁开眼睛，说：“好吧，约翰，你的活儿是跟昨天的一样的。跟往常一样，干那些必须干的事儿。不过，首先，在这儿我身旁跪下，让我们一起做祷告。”约翰跪下，耷拉着脑袋，一肚子不愿意地默不作声；他舅舅背：“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他并不附和。孔查会在等他，她答应过独自个儿跟他一起过一个下午的。他把两只手紧握成拳头，捂在嘴上；折腾得人死去活来

的欲望的魔力像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击揍得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那种强烈的打击力量不像是欢乐，倒像是致命的疾病或者别的他没有梦想到的、也没有人提醒过他的祸害。“把我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他舅舅说。“阿门。”约翰笨手笨脚地站起来，开始准备去洗个海绵擦身澡，默不作声，回进房舱，带着防备的心情在为自己的情欲冲动而生气，在那个虔诚的老伪君子面前，他的无法控制的身子简直使他感到害臊，老头儿会假装感到震惊，而且会为了再一次有一阵这样的感觉而付出任何代价。他继续干活儿的时候，完全平静下来了，甚至因为想到要对那个已经成为他累赘的可怜、痛苦的人干粗鲁的事情而感到小小的后悔；最后，服务员端来了盛早餐的盘子，他表演得非常出色，装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走了。一旦走到门外，他像一只公鹿那样跳跳蹦蹦地奔跑，吹着口哨：“只有一回，不会再有——”

利齐终于起床，大着胆子来到甲板上。她躺在她的躺椅上，用围巾和披肩包裹着，像个病人那样喝滚烫的清汤。她几乎默不作声，而在剩下的航程中，她坐着或者独自个儿走动，把吃的带进房舱，她的脸色忧伤或者迷惘，好像她没法清楚地看东西，或者是她刚听到叫人痛苦的消息似的。特雷德韦尔太太跟她一起在沉默中过活，她们相当舒适地陷入了自然的陌生人的关系，像蚕蛹在茧子里那样各自独处。然而，特雷德韦尔太太出于某种冲动，也许是模模糊糊的恶作剧的冲动吧，从餐桌上带给利齐一个橙子，说：“里贝尔先生今天早晨起床走动了。他看来好像恢复得很好。”

利齐把大拇指甲掐进橙子皮剥掉了一部分，好像她在剥有疼痛感觉的东西的皮似的。“由他去，”她说，把牙齿咬进那个橙子。

比戈停满着下了锚的、毫无生气的船，船头一律朝着大海。统舱的乘客又挤在主甲板上，首先被赶到下面的跳板上去。那对新郎和新娘，她的手挽着他的胳膊，上岸去，再怎么也不会回来了，没有向任何人说一句告别话，就走得无影无踪。那一家带着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的古巴人一边走，一边在跟几个海员点头和鞠躬。戴维和珍妮最后一致同意，一起去申请到法国去的护照。他们就在那个西班牙歌舞班子的人员后面走下去；那些人一溜儿走着，不向他们最近的同谋犯，那些医科学生瞟上一眼，甚至皱一皱眉；他们又背着他们的包裹，这会儿其中放着他们从特纳里夫岛上偷来的贼赃；他们像蓝背樫鸟那样叽叽呱呱地说个没完，模样和行为跟他们在维拉克鲁斯上船的时候一模一样。天气太好了，既温暖，又柔和；他们马上赶到附近一个笼罩着树荫的小公园去，在那儿占了六、七张长椅，看来好像第一次感到自己轻松了。

珍妮和戴维正处在愉快的休战状态中，去找法国领事；那是一个态度极严肃的、热切的、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他带着表示遗憾的姿态告诉他们，他没有能力批准在途中的人签证。他送他们到门口，仍然在用坚决的、没有商量的余地的声音在表示他的同情。戴维抓住珍妮的胳膊肘扶着她走下台阶的时候，她托着自己的脑袋。“我们去西班牙吧？”她伤心地说。“不，”戴维说。“你知道我们先去哪儿吗？”他们又经过那个小公园，那个歌舞班子的人员仍然坐着，拿他们来说，是安静的了，好像他们在等什么事情发生似的。珍妮和戴维坐在一张离他们相当远的长椅上，戴维无缘无故地掏出他的钱包，看他的护照和船票。“去不来梅港的，是到那儿去的，”他跟她说，同时他发现他的票上写

着“南安普敦”。

“仁慈的上帝啊，”他说。“让我们去吧。”他们急急忙忙赶回去，去找事务长，他已经在准备让戴维登上南安普敦派来的英国交通艇，这个主意使戴维吓得没命。事务长那张留着胡子的嘴低声咕哝了几句，说人们经常在航行途中改变主意；他完全拒绝同意这个过错不该算在乘客的头上。珍妮想要跟他争论这个问题，但是戴维坚决地把她推出去，不过他们一起走的时候，他没法阻止她实在太热烈地感谢他。“需要拿主意的是船长，”珍妮说；接着他们交换着从一个人的耳朵传到另一个人的耳朵里的点点滴滴的熟悉的传闻；有人听说，船长一再赌咒发誓地说，统舱的乘客在比戈出清以后，下一个港口是不来梅港。他不会在希洪，也不会在布伦停，对不起，也不在南安普敦停。他的论点是——传闻是这么传布的，——他的船是一艘在穿过一些敌人的水域航行的德国船，他的任务是把船安全地开进他的祖国的海港，不发生国际性事件。威廉·弗赖塔格一直指望到了布伦以后再也见不到那些古巴医科学生，更不用说特雷德韦尔太太了。然而，即使照眼下的情况看，这艘船看来也几乎是空的了。除了戴维·斯科特和珍妮以外，没有人上岸去。乘客们事先被提醒要待在船上，除非有要紧的事儿到岸上去，因为“真理号”要在天黑前离港，到底是由于海港的规定，还是天气关系，或者是因为运输业罢工，通知的人没有说。戴维从事务长那儿知道，从比戈出发以后到所有的港口的票价是一样的，所以从那以后，船长可以爱把他们卸在哪儿就卸在哪儿，或者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不来梅港，接着那个事务长亲切地说：“我们这位船长情绪不好，不会允许任何人对他的命令提出异议的。不过，不管怎样，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在南安普敦不会靠岸的。”

“好吧，不管怎么说，我总可以到不来梅港喽，”戴维说，珍妮马上接着说：“可不是，那我们可以得到去西班牙的签证啦！”

戴维没有说什么。他们一起来到甲板上，情绪奇怪地变得充满柔情蜜意，他们竟然相爱到这样的程度，好像是两个第一次见到对方的脸、发现那面貌是多么可爱的两个陌生人。戴维的达到白热化程度的狂怒融化了所有的他对珍妮的已经形成习惯的观点、印象和想法，而这些成见化为液体，混为一体，重新形成完全不同的形状，是那么新，那么出人意料。戴维，甚至在他自己看来，也是个陌生人；他想，不管从前他熟悉的珍妮是怎么样的，她已经消失了。他默不作声地看着她转变成另一个人，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也许他永远不会认识，然而在他面前的这个新人当然是为他自己创造的，就像他从前创造了另一个那样，用的是零零星星的取自他自己的欲望的材料。他们偎依在一起，他们的手在栏杆上悄悄地移动，温柔地互相握着。珍妮说：“我们在干什么啊，在没有人管的情况下大胆闯荡这个灰色的世界吗？——我不知道这一回应该诅咒谁，是那个小可怜虫墨西哥代理商呢——他告诉我，我可以在任何港口弄到法国签证——还是那个出纳员，当时要另打主意还来得及，他在维拉克鲁斯向我保证，船在布伦不停，不过，不要紧，只要去找比戈的法国领事，那个撒谎的老头儿说——”

“我压根儿不在乎，”戴维说，“我才不在乎我们在哪儿登陆，只要总有一天我们确实在某个地方一起登陆就行。我真的是这么想的，珍妮天使，我希望你别再烦躁了。”

“或者我也许该诅咒我自己，”珍妮说，假装出逆来顺受的神态，喜悦地把她的脸在他的衣袖上紧紧地挨了一会儿。“戴维宝贝儿，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可以轻手轻脚溜回进你的身子，再做

你的肋骨[①]!”

“我更喜欢你现在这个模样,”戴维说。接着他在脑子里还加了一句:哪怕我没法阻止你偷偷摸摸地跟别的男人躲到角落里去……有一天,这也算不了什么,只会有助于了结事情。他改变了话题。

“我们当然不会逗留在港内的,”他说,“我们一路上到希洪都有领航员。”

珍妮说:“我想知道那个特纳里夫岛的领航员顺利地回去了吗?”

戴维说:“领航员们总是行的。”

在比戈到希洪的途中,那有名的天气开始大发威力了。海水大起大落和旋转,涌起一座座凶恶的绿色的山峰,突然又淘出一个沉渊。“真理号”在快要接近比斯开湾的时候,几乎失去控制。珍妮没法睡觉,只得坐在舷窗前,几乎一直守到早晨,望着一座座巨大的灯塔沿着海岸线在突然发光、转动、发光。西班牙有甚至她所能想象的最美的海岸;在经过了坚实的岩石海岬以后,一片巨大的绿色高原从海中涌现出来,再往前,是一溜儿小山,像布满最绿的苔藓的低矮的土岗,接着又平地拔起一块块岩石,像愤怒的拳头,但是色彩绚烂,像玛瑙、翠玉和珊瑚,巨大的愁云阴沉沉地笼罩在它们的上空。“我有什么不对头吗?”她纳闷。“这一路上都应该是西班牙。我们会径直到西班牙去的,”她坚决地使她自己放心,望着转动的亮光掠过波涛翻腾的水面,希望她永远不会忘掉这个景象。“真理号”会时不时地像一匹受惊的巨马那样直竖起来,用它的一切机械装置发出一声响亮的、

① 典出《圣经·旧约·创世记》,上帝取亚当的肋骨造夏娃。

吓呆了的号叫，再一次颠簸着破浪前进。

在希洪，船进港的时候，弗赖塔格听到外面一阵阵尖叫，把脑袋探出舷窗，看上一眼新地方。“真理号”在很慢地掉头。六七艘汽艇围成一圈，船上载满了大喊大叫的热心支持罢工的人，全都挥舞着各种颜色的围巾，几乎全部不顾危险地站在他们的起伏不停的小艇上。还有长长的一溜儿西班牙船整齐地退缩在船坞内，像停着的汽车。此地，他后来在布告牌上看到，码头工人参加了总罢工，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此地无法卸货。气氛是阴郁和沉重的，弗赖塔格注意到，那些在小船上挡着道、大喊大叫、表示欢迎的摇摇晃晃的人们所起的作用，只是增加混乱，而不是欢乐。那艘船在将要离开海港以前，又开始发疯似的颠簸起来，舒曼医生跟胡滕教授先生说，看来这像是一次上好的经典性的渡海表演，他估计要用掉大量的镇静剂了，而那些统舱的乘客已经全部安全登陆，真叫人松了一口气。胡滕教授先生乘这个机会，要了一些扁型胶囊药剂帮助他的妻子睡觉。

后来，那艘船，终于在午夜停在布伦港外，雾号连鸣，空了一半的船上亮起了灯，水手们匆匆地跑动着，忙个不停。珍妮在她的睡袍外面罩上一件长大衣，没有穿袜子，悄悄地套上皮鞋，匆匆赶到船的一边。一艘黑沉沉的、小小的法国领航船缓慢地靠到下甲板的跳板旁，它的小小铃声不断地叮一叮叮的响着，珍妮探出身去，看到六个古巴学生，这一回默不作声，跳到狭窄的甲板上。特雷德韦尔太太跟在后面，向一个船员伸出一只手去，要他帮忙；她背对着她正在离去的那艘船坐下。接下来是那个墨西哥外交家的妻子，带着那个抱着婴儿的印第安人保姆。那个

船员从她的怀里接过婴儿；在她走进那艘潮湿的、打滑的小船的时候，珍妮看到她的光着的狭窄的双脚。珍妮愉快地听着那用尖利、急促的鼻音说的法语，带着想要上那儿去的近乎痛苦的渴望看着，而小铃叮一叮地响着，那艘领航船慢悠悠地开出大船的光圈，隐隐约约地闪着它自己的暗淡的微光，向有福的海岸，向可爱的不夜城[1] 开去——她什么时候才会上那儿去呢？珍妮把她的头往下靠在栏杆上，淌眼泪了，然后发疯似的跑回她的房舱。埃尔莎在舷窗前，但是收回她的头，马上关心地问——

"嗨，出了什么事儿？"

珍妮挂起她的大衣，从衣兜里取出一条手绢。"啊，没什么！别费心……这一回轮到我啦！"

在南安普敦，没有交通船来接他们，只来了一艘武装快艇，送来了税务官员和其他不可缺少的官员。没有乘客在那儿上下。珍妮当时想到一幅叫人十分惊讶的幻象：戴维一直绷紧着僵硬的上嘴唇，流露出完全不同意的眼光，在被带到英国海岸去，一个他们两人做梦都从来没有想要去的地方；她简直要笑出声来。一个邋遢的、一副没有人照管的模样的小男孩捧着一摞报纸来到甲板上，但是戴维和珍妮试着向他买一份报的时候，他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而那个小男孩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只有德国钱，戴维把六个马克放在他的手里，他沉着脸，不信任地望着钱，既不把钱退还，又不愿给他们一份报纸。

"那个小孩说的是什么语言？"戴维问一个正在他身旁经过的年轻的船员。

---

① 指巴黎。

“英语，”那个船员简单明了地回答，没有站住脚。“胡扯！”珍妮在他背后说。

那些英国官员，在船长的邀请下，坐在暂时关闭的酒吧间里向阳的一面。珍妮踱进去，完全有意地坐在一个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地方，尽管戴维拒绝跟她一起留下。但是那些官员叫人失望地沉默了一会儿，打开和查看他们的形形色色的文件，互相传阅，签署着什么。一个英国官员态度和气地要求船长解释某一页上一个叫人看不懂的项目；他的食指相当突然地指着那地方。接着，他向周围瞟了一眼，看到了珍妮，随即压低了声音；六七个人的脑袋凑在一起了。接下来，使珍妮懊丧的是，他们演了一场发脾气和不同意的哑剧。船长的脸涨得通红，他显得尴尬、沮丧、有火发不出，甚至他的长着垂肉的下颌都冒到衣领上面来了，他的眼睛充血。那些年轻的英国官员安详沉着极了，他们背靠着椅子，下巴高高抬起，双手都摆得挺合适，眼光从他们的鼻子上盯着看那个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的德国人，要把他的威势压下去，要用他们这种正直、自在的态度使他认错。珍妮高兴地看到那些英国人的行为真的像报纸上和小说中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行为表示出好像他们认为那是一个社交场合而有个身分低微、未经邀请的人设法闯了进来制造骚乱。

船长提高了他的声音。“不用说，法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他们什么都有了，他们爱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只有德国人，他们不必指望公道，或者确切地说，现在这时候，连体面也不必顾及。”

“规定不是我制订的，”他们当中有一个用叫人心寒的声音说，“我只是上这儿来监督执行情况的。”他紧紧地皱着眉头，但是珍妮注意到他眉头越是皱得紧，就越是毫无办法地涨红脸，显

示出深深的、无法形容的困窘。

“当然喽，”船长气呼呼地说，“我们都是为了执行任务而不得不作出自我牺牲的人，这谁不知道呢？不过，事态已经到了我们连发发牢骚都不可以的地步了吗？”

接下来，是一片局促的沉默。有一个英国官员伸出手去，摸摸文件。“我们不妨照这办理，”他跟其他的人说；随后，他们只是互相说话，没有一次再跟船长交谈。

“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知道他们在争论什么，”珍妮后来跟戴维说。

“毫无疑问，乏味的事情，”戴维说。

“我希望知道那个小男孩打算告诉我们什么，”珍妮说。

“他打算卖一份报纸给我们，”戴维说。

“啊，没错儿，”珍妮说，“没错儿，没错儿。”

最后一部分航程相当平静和愉快，剩下不多的乘客们在他们中间一致同意：甚至勒温塔尔先生注意到餐厅里有许多空座位，便向服务员建议，也许弗赖塔格先生眼下可以独用一张桌子进餐了。服务员愉快地通知勒温塔尔弗赖塔格先生已经为自己想到了这事，桌子已经换过了。威廉·丹尼起床，没有告诉舒曼医生，就拆掉了头上的绷带，医生马上给他包扎起来，但是允许他下地去用餐。他唯一的在心头缓缓燃烧的憎恨是，帕斯托拉终究逃得无影无踪了，几乎犯了杀人罪而逃得无影无踪了。“这些头上的小伤口是很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舒曼医生说，“你以为我干吗为你打破伤风预防针呢？务必请你让我来处理伤情。”

“那个帕斯托拉应该送去终身监禁，”丹尼说，“在送去以前，还得他妈的结结实实地揍一顿。”

舒曼医生对他的病人的粗鲁、低下的性格深深反感，非常冷淡地说："不是帕斯托拉干的。是特雷德韦尔太太，你不知怎么着，终于把那位谦逊而温和的太太惹得怒火大发，没法遏制了。"

丹尼听后大为震惊，他只能吹了一声长长、低低的口哨，结尾是"耶啊啊啊—稣！确实吗？你怎么知道的？"

"一个年轻的服务员告诉我的。"

"哪一个？"丹尼追根究底地问，突然坐起来。

"这我不能告诉你，"舒曼医生说。"这个插曲眼下已经属于过去的事情了。你还是把它记在心里，作为经验要好得多。早晨好。我明天会来看你的。"他关上他的黑提包，走掉了，感到一种真正的恶意的满足的乐趣，其中又混合着道德上的安慰；这一次，公道尽管是通过最迂回曲折和毫无疑问应受指责的方式执行的，但是看到它在发挥作用，对舒曼医生的心脏有好处。

船经过怀特岛的时候，珍妮看那座仙女模样的城堡看得着迷了；它屹立在翠玉似的草坪上，周围是小小的幼树，草地剪得整整齐齐，一直伸展到海边。他们经过的时候，离岸很近，她以为她又被她的嗅觉所欺骗了；她的嗅觉使她闻到一阵阵奇怪的、不可能的交叉气流。这会儿，她闻到草本植物、刚割下来的草和吃草的母牛。

"可不是，可不是，"埃尔莎几乎快活地说，"这是真的。这是我第四回经过这儿了。我小时候，我想，天堂也许就像是这样的。"

乘客们开始既心神不定，又毫无生气；日常的娱乐停止了，有几部影片第二次放映，他们懒洋洋地待在甲板上或者他们的

房舱里,开始整理或者重新整理他们的随身行李,还担心他们放在底舱里的那些行李。"真理号"已经穿过水闸,开进那条狭窄的威悉河了,利齐听说里贝尔先生已经回到他的老位子上去了,她仍然拒绝回到船长的餐桌上去。她回想着特雷德韦尔太太只是拾掇好一切就离开房舱,那模样好像她是到甲板上去溜一圈似的,没有说一句告别话——甚至一句一钱不值的小小的、简单的"你好"也没有。她靠在帆布躺椅里的时候——她已经吩咐把她的躺椅跟里贝尔先生的移得远远的了——一看到他匆匆走过,就闭上眼睛,假装睡着——实在活像一头小猪,秃脑壳上还包着一大片胶布和药棉……生活是多么恶心!

船长、里贝尔先生、里特斯多尔夫太太和胡滕两口子,还有施米特太太和舒曼医生,几乎默不出声地坐在餐桌旁,因为他们全都觉得他们所有的共同话题都会引出尴尬或者琐碎的说长道短的闲话。他们不再对别人要说的任何事儿感兴趣——他们的脑子都又包围和封闭着,只关心他们自己的事儿,他们的共同的希望:离开船,结束航行,再一次处理他们的真正的、各自的生活。然而,在进这一顿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们举杯互祝健康,互相表示友好的神情,胡滕教授先生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终于离家近了,我们终究都是善良的德国人在一起。让我们感谢上帝的赐福!"

最后,他们又看到一座海港城市了,拥挤和杂乱的船坞和仓库一直挤挤挨挨地伸到水边,一溜儿熟悉的停着的空船像停在世界上其他海港里的船那样在等着罢工解决,船只周围都漂浮着海港的垃圾。又有那些载满人的小船开玩笑似的围成一圈,挡着道,船上的人挥舞着围巾,叫喊着欢迎。

不来梅港！“真理号”这个老伙计安全抵港了，停在一批跟它相似的船中间，那些都是饱经打击、锈迹斑斑、疲惫不堪的老船，船身上留着艰难的航行造成的累累伤痕，来自全世界的海洋，长途航运，载着不整洁的货物和过着提心吊胆的普通生活的普通乘客，他们旅行并不是寻找乐趣。然而，从每一艘船上，旗子都在飘扬或者下降，表示对这座港口城市的敬意，每一块甲板上，都有一支小乐队在奏它们的节奏跳跃的曲子，水手和船员都站在他们的位置上，全都精神抖擞，合乎身分，准备妥当，纪律严明。“真理号”上，乘客们排成一溜儿，尽可能地挨近跳板，没有混乱和拥挤。他们确实都是德国人，而且排在一起，只有三个美国人除外，他们站在一起，稍微靠后，分开一点儿。眼睛又模模糊糊地对着眼睛，几乎没有认识的表示，也不再说话。他们又变成陌生人了，尽管不像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那样表示怀疑和敌意。这是一种对于除了重返生活这一幸福时刻之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愉快态度。有一会儿，所有的脸都抬起，眼光在寻找城里的一幢幢屋顶，眼光里充满豪情而显得柔和——他们的心自由地跳跃，他们的胃随着喜悦的幻想颤抖；所有的人都神秘地着迷了，好像他们在走近一个照亮了的神坛，他们准备着再一次踏上祖国神圣的土地。

这一天是阴沉和寒冷的，还微微飘着雪。一家家人待在一起：高个子、金头发的约翰和他那个坐在轮椅上快要死的舅舅，舅舅时不时地睁开眼睛，看看周围，那个姓鲍姆格特纳的孩子穿着那件橙色的墨西哥牛仔穿的鹿皮衫，不是在淌汗，而是在直打哆嗦。埃尔莎穿着一件白羊毛大衣，她的白贝雷帽盖着她的头发，她紧紧地抓着她身前的小提包，对她母亲对她提的每一个问题耐心地重复着说：“是，妈妈”，或者“不，妈妈”，有时候还要说

两遍。“埃尔莎，你把你所有的发夹和安全别针都收好了吗，你遗忘了手绢吗？你把你所有的袜子都收在一起了吗？你遗忘了你的绞指甲刀和剪刀吗？你出发的时候，内衣内裤都是每样六件，我希望我们到家后，还是这个数目……还有套衫——”

吕茨先生开玩笑地说：“埃尔莎，你一直没有确切地说有多少发夹。也许是二十七个吧？”

“啊，爸爸，”她感激地说，“我肯定一切都带上了。”

“你当然带上了，我亲爱的小姑娘。这会儿我们回家了，你应该快活了。”

“可不是，感谢上帝，”吕茨太太说，对转移争论感到高兴，因为她是明摆着争不过的。“而其余的是上岸以后的事了，坐在欧洲列车的我们的包房内，又像真正的一家子那样，不用跟那种我们避免不了的低三下四的人搅合在一起。哈！”她说，现出阴沉的得意神情，“这是我最后一次航行。我们要去住的地方没有海，埃尔莎。”

“没有，埃尔莎，”她的父亲说，“也没有船。还没有碘和盐。你从药房里买加碘的盐。要不，你会害甲状腺肿。”

“啊，真不害臊！”吕茨太太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埃尔莎，你爸爸是在讲笑话——”

“你在圣加仑的亲戚中有多少是害甲状腺肿的？”吕茨先生通情达理地问。“有菲克姨妈和威廉明娜姨妈，还有沃尔夫冈舅舅和奥古斯特表哥和你自己的姐姐洛特，和你的姥姥——”

“住嘴！”吕茨太太喊叫，几乎气疯了。“去毁谤你自己家里的人吧，别说我的！”

“这不是毁谤，”吕茨先生说。“埃尔莎，你在找什么？你在看谁？”因为他注意到，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她的眼光在半闭着的

眼睑下慢腾腾地、稳定地、悄悄地瞟过去，她的头是那么微细地转动；他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脸上有这样的表情。作为父亲，他不赞成，他的心被搅乱了。埃尔莎脸涨得发紫，一只手捂住她的嘴。“没什么，没有人，”她说，神情那么慌乱，他就不再说什么了。这当儿，汉森先生突然走过，他的脸包扎着，他一边走一边瞟了埃尔莎一眼，是随便看看、不找什么的一眼，然而对埃尔莎来说，是残酷的一击，好像他是有意的。他总是那样看她，好像她是稀薄的空气或者是一堵没有门窗的墙似的。她缩了一下，她的父亲说：“这个人对你来说是万万不行的。”她母亲感到震惊，表示同意。“多么怪的想法，”她嘲笑地说。“有谁哪怕会很短暂地这么想？”

尽管她讨厌汉森先生，然而他疯狂地喜欢那个可怕的安帕罗，而且他有充足的理由，她可以肯定，砸那个可恶透顶的里贝尔先生，所以他是个感情强烈的人，只是他从来没有把她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待，她在乎什么呢？然而，她确实在乎。她并不真正想要从他那儿得到什么，不，甚至看一下也不要。她会记得一辈子的是她那个学生，在音乐声中站在那儿甲板上，还搂着他，迎着他那张微笑、询问的脸，说着甜言蜜语——不过，她没法跳舞。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得那么深，她觉得一定要解释一下。“我只是累了，”她告诉他们。“我没有生病，妈妈。”

弗赖塔格从那伙德国人中走出来，来到珍妮和戴维面前；他们两人手握着手，站在丹尼附近；丹尼在揭去贴在他满脸的凉鞋跟伤口上的一小块一小块胶布和棉花。弗赖塔格在他们面前站住，向珍妮伸出一只手，她从戴维的手中抽出一只手，递给他，稍微加一点儿压力。她微笑着，但是他看到她的眼睛里神情阴郁

而激动。“再见，”弗赖塔格说，他自己的灰眼睛是清澈而愉快的。“我希望你会喜欢这个地方。”

戴维伸出手去，弗赖塔格以十足地道的男子汉气派握了他的手。他们的眼光遇上了，尽管他们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珍妮看到在他们中间掠过一种古怪的神情——仅仅是闪烁着瞟了一眼，像水面上的光，但是这使她浑身冰冷。这完全是两个男子汉对他们互相一致作肯定的无言的表示，是来自遥远的本能深处的完全的理解，这种理解不受事情的一切表面的动作和纠缠的影响；这是他们以不可剥夺的男子汉身分缔结的一个小小的秘密同盟，她被自然规律排斥在这个同盟之外。珍妮哆嗦得那么厉害，戴维说：“你冷了吗，珍妮天使？让我来帮你。”他从她的胳膊上取下大衣，提着，让她穿上。他一边干这事儿，一边跟正在向跳板走去的弗赖塔格点点头。

“祝你好运，”他说，弗赖塔格挥挥手，作为回答。

“简直没法想象，一切都过去了，”珍妮说。“不久，那会只是一场梦。我干吗上这儿来呢？”

“因为你要去法国，而我要去西班牙，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吗？”

“我是个梦游者，”珍妮说，“这是一场梦。”

“梦也是真实的，”戴维说，“梦魇，什么都是。”

“戴维，我们不会一直在一起生活的。我们干吗这样继续下去呢？”

“你不记得了吗？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他站在她身旁，又握着她的手，非常安详自若，对自己的情绪很有信心。他看到她的眼睛开始闪亮，接着，他显得对她非常激动和温柔，好像有时候她由于他的缘故哭的时候他会表现的那样。看到他软弱和服输

的样子是他最高兴不过的事儿了。

“你知道吗，”他虚假地说，“也许我们将永远互不分离。我们能到哪儿去呢？”

“我们会想到一个地方的，”她说，“让我们等吧。”

“唷，我们又在说话了，”戴维说。“让我们想一些叫人高兴的事吧。”

“你想些什么吧，戴维宝贝儿，”珍妮说，“想些最好不过的事儿吧。”

戴维极慎重地凑过身去，脸色正经地低声说：“今夜在不来梅，我们换个方式睡在同一张床上。”珍妮对他轻轻地嗯了一声，接着他看到她的脸乐得眉开眼笑了。

最后，乐队奏起了《再见》，奏了又奏，直到放下跳板，乘客们纷纷迅速而默不作声地开始走下去。那些乐师在擦他们的乐器的吹口，包好他们的鼓，放开他们的小提琴的时候，都微笑着，张大着嘴，他们的脑袋朝着船坞，朝着那个确切的、狭窄的地方，“真理号”已经被牵曳过去，锚泊在那儿了。在乐队人员中间，有一个笨手笨脚的小伙子，他的模样好像这辈子从来没有吃饱过，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人说过一句他好的话似的；他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才好，用眼花得看不见的眼睛盯着看，一边在把他的口水从喇叭里甩出来，一边颤抖着嘴，重复着低声说：“你好，你好，”仿佛这座城市是一个善良、可亲而靠得住的朋友，是走了好长的路来欢迎他似的。

1941年8月，于亚多
1961年8月，于鸽子湾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愚人船
作者=
页数=678
SS号=10402060
出版日期=